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上　　册

〔美〕路特·费舍著

（供內部参考）

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下　　册

〔美〕路特·费舍著

（供内部参考）

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

上　册

〔美〕路特·費舍著

何式谷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

下　册

〔美〕路特·费舍著
何式谷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出版説明

本书作者路特·費舍(1895—)是德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叛徒。1921年她被选为德共柏林支部主席，后来和德共另一个叛徒馬斯洛夫結成所謂“左派反对派”集团。1924至1926年間費舍曾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員，与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最为友善，积极支持托季反党联盟。1926年費舍和馬斯洛夫被德共开除出党后，仍同苏联的反党分子保持联系，阴謀成立一个“左派共产国际”。1941年費舍投奔美国，入了美国籍。她在美国搜集了大量反苏反共材料，加上她自己的叛徒經历，写成此书，1948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此处所謂“国家党”是对列宁、斯大林所領导的苏联共产党的誣称。在这本书里，作者从叛徒的立場，叙述了1918到1929年間德国共产党的历史、苏联共产党的党內斗爭以及德共的政策和苏共党內斗爭与共产国际內部斗爭之間的关系。众所周知，这一段时期是列宁和斯大林領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了国內外敌人的进攻、胜利地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时期；是列宁和斯大林領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帝国主义、一切反动派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的时期。在叛徒費舍看来，当然不是这样。在本书中，她企图說明，这一时期布尔什維克党怎样变成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共产国际怎样成为“恐怖主义俄国国家党的縮影”，德共和其他各国党如何成为“莫斯科的附庸”等等。

叛徒费舍在本书中对偉大的无产阶級革命导师列宁和許多革命領袖肆意进行誣蔑和歪曲，对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尤其表露了刻骨的仇恨。和托洛茨基一样，叛徒费舍的一个主要論点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俄国取得胜利。她說斯大林把1917年的革命国际主义变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即变成“保卫一个集团的权力”，違背了十月革命的一切初衷。在叛徒費舍的眼中，斯大林所領导的无产阶級政党成了“失去一切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特点的”“国家党”，斯大林毕生捍卫的无产阶級专政成了以“独裁者”为中心的“国家党”专政。在最后一章作“結論”时，叛徒費舍竟企图論证德国納粹是“竭力仿效”斯大林而成长起来的。

本书共六十万言，暴露了作者本人和其他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理論和活动，提供了不少反面材料。兹特全部譯出，內部发行，供有关方面参考。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3年10月

目 录

原　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工人阶級沒有联合在一个团結的、单一的工人阶級政党之中，这对于德国、对于全世界說来都是一个不幸的悲剧。假如那时有一个这样的党，它就可能使 1918 年的“革命”成为一次眞正民主的革命，給予新建立的魏瑪共和国以有效的支持，它就会抵制住反动的軍国主义者和极左派的过激主义力量，克服由于战敗和数百万軍队官兵迅速复員而引起的社会混乱。这些軍人带着战时养成的种种习慣在社会上流蕩，无法找到工作或者使自己适应战后的环境。于是，他們便紛紛糾結在“志願团”里，这种团体起初还包含一些正直的有理想的人，后来就逐漸墮落为目无法紀和妨碍治安的軍事組織，图謀推翻魏瑪共和国，杀害政府部长，直至构成終于在 1933 年摧毀共和国的納粹冲鋒队的重要支柱。

德国工人沒有組成一个单一的政党，而是分裂为至少三个对立集团，每一个集团都爭取使德国广大群众支持自己。由此而造成的政党繁多的局面（政党的数目很快便超过二十个），是魏瑪共和国的致命弱点之一，它使一切联合內閣都极不稳定。这种局面也导致了主要代表德国工人阶級的三个政党之間有害的內訌。

在 1918 年，这三个无产阶級政党中的第一个，历史最久和力量最大的一个，就是艾伯特和謝德曼領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簡称 SPD）。这个党是在 1875 年由馬克思主义者和拉薩尔派合幷組成的。前一派由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內西領导，曾經加入过第一国际，在意識形态方面相信阶級斗爭不可避免以及革命无产阶級

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拉薩尔派带有較多的民族主义色彩，有一个要求种种实际改革的社会主义綱領。这个綱領虽然在当时显得非常激进，但是在今天的一切工业先进国家中，由于工人的斗爭，它的大部分要求都已經得到实現。拉薩尔派主張实現这一綱領的方法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漸进的合法手段——通过取得和利用选举权与議会权力来改善工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两派——馬克思主义者和拉薩尔派——合并以后，在意識形态方面都还继續保持着一些原来的东西，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政綱往往反映出两种彼此有些矛盾的行动計划。可是，随着德国工商业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巨大进展，德国工人阶級在工資、劳动条件、法律权利和政治力量方面，都逐漸变得比过去要好得多。在1912年的議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获得普选总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了議会中議員人数最多的政党。然而，在福利和政治力量都有所增长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領导集团在他們的观点和行动上，却变得比过去保守，民族主义越来越多而国际主义越来越少，甚至有些資产阶級化了。

第二个工人政党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或独立党（簡称USPD)。这一派人具有馬克思主义的反軍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傳統，不能容忍1875年合并前拉薩尔派中那些更为保守、更具有民族主义和資产阶級色彩的傾向，因此在1916年从体現了这些傾向的社会民主党内分裂了出来。他們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是正在罪恶地延长着战爭的帝制派、軍国主义者和大工业家。他們鼓吹在“不割地、不賠款”的基础上立即媾和，幷且号召举行罢工促成和平的实現。这个党在战爭結束后不久便停止存在。在1920年10月举行于哈雷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三分之二的代表决定退出本党，加入新組成的共产党。十五个月以后，剩下的人便决定和

他們在 1916 年与之分裂的社会民主党重新結合。

第三个党，德国共产党(簡称 KPD)，直到 1918 年 12 月底才独立存在。它的大多数成員都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內作为“斯巴达克团”存在的左派。他們比其余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更加猛烈地反对軍国主义，更加狂热地贊成社会革命。他們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內西那里得到思想上的指导和精神上的鼓舞。前者是一个杰出的波兰青年知識分子，是“一只鷹”①——列宁虽然在許多观点上和她有尖銳分歧，却送給她这样一个称号。她从沙皇压迫下逃亡出来，1897 年定居于德国，和一个德国工人結婚从而取得了德国国籍。卡尔·李卜克內西是俾斯麦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战斗的奠基者之一、威廉·李卜克內西的儿子。卡尔在 1911 年发表了一部反对帝国主义和德国軍队的有影响的著作《軍国主义和反軍国主义》。大战初期，他是第一个拒絕投票通过軍費預算的社会民主党議会議員，并且在导致独立党 1916 年和社会民主党分裂的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他們的反战立場和鼓动兵变，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被德皇政府监禁，直到 1918 年 10 月和 11 月这个政府倒台时才被释放。

在 1918 年的最后几周中，由于德国軍事上的失敗、工厂中罢工事件的日益增多、基尔的水兵兵变、继之而起的全国起义以及工人出身的士兵对德皇旧軍官的憎恨，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影响迅速增长。俄国布尔什維克革命的成功，以及指望俄国人能够帮助他們完全摧毁德国的軍国主义、并为在德国也进行一次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的这种希冀，也增加了他們两人的影响。和俄国的苏維埃相似的工人士兵委員会迅速出現于德国各地。在

① 《政論家的短評》。《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80 頁。——譯者

柏林的五金工人当中，在汉堡、不来梅、鲁尔和其他地区的工业中心，还出現了一种新型的激进組織——自己选擇工厂代表的工厂委員会。

11月9日艾伯特代替馬克斯·馮·巴登亲王担任首相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巴达克团的領袖之間，发生了一場爭夺权力的混乱斗爭，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为了保卫未成定局的边界和防止过于匆忙、过于激烈的革命，艾伯特在許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向軍队求援。在斯巴达克团看来，这是对神圣事业的叛变。于是，在1918年12月30日，斯巴达克团的成員便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另行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德国共产党(KPD)。可是，这个党剛一誕生，它的两个最杰出的領导人就于1919年1月15日被帝制派軍队逮捕，并在几小时后“企图逃跑时”被杀害。正是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路特·費舍来到了柏林，并且很快在这个新的政党中担任了領导职位。

德国共产党坚决信奉馬克思的学說，同其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相比，它具有更眞实的国际主义性质和观点。从德国的龐大工业人口来考虑，它也是俄国以外欧洲最重要的共产党。結果，它便对德国境外的共产主义者起了一种磁石般的吸引作用——既吸引那些希望利用它达到自己民族主义目的的布尔什維克，也吸引那些希望它能够建立国际社会主义的个人。就像它的另外几个領袖(罗莎·卢森堡、列夫·約吉契斯、亚卡迪·馬斯洛夫)一样，路特·費舍不是出生于德国而是被吸引到德国来的，这一点也許是意味深长的。

路特·費舍生于奥地利，在維也納长大，她的父亲魯道夫·艾斯勒是維也納一位著名的教授和好几本哲学及社会学論著的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作为維也納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她參

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但是，由于这个党在多民族的帝国中主張保存奥-匈国家的結构，只同意让各民族享有文化上的自治，她一怒而加入了党的极左派。“左派激进主义者”主張一切民族都有权摆脫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掌握它們自己的命运。

这种为列宁所主張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中被提出的自决权，給維也納的青年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它使路特·費舍对布尔什維主义产生了积极的兴趣。她和奥地利警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并且发表了几本“地下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于是，她得到了布尔什維克先从瑞士然后从莫斯科来信的鼓励。在奥匈帝国崩潰的时候，一个在紅十字会名义掩护下从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团，建議她和她那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和青年工人在奥地利成立一个共产党，加入当时正在筹建的共产党第三国际。1918年11月4日，她成了欧洲最早的共产党之一、奥地利共产党的第一号創立人。这样，她便同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維埃政权发生了直接联系，并且会見了貝拉·庫恩、尤金·瓦尔加、馬克斯·列文等領导人物。

可是，奥地利共产党是一个能力相当不足的、人为的和軟弱的組織，特别是在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它的原来各組成部分紛紛独立以后。此外，大部分維也納工人也不願意离开他們原来的党。因此，路特·費舍在1919年迁居到在她看来已經变成了欧洲革命斗爭眞正中心的柏林。她作为一个組織家和作家为共产党展开积极活动。1921年11月，出乎她的意料，她竟当选为柏林党支部主席。让一个才二十几岁、甚至还不是德国公民的女青年領导帝国境内最大的共产党組織，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步驟。所以采取这个步驟，一半是由于她所表現的能力，一半也正是由于她年輕；許多普通党員不信任年岁大的領袖，希望使党組織避免变成由一小撮人把持

的或被俄国代理人利用的工具。当时，虽然卡尔·拉狄克早就在德国为俄国的利益积极活动，德国共产党还沒有像后来那样完全处于苏俄的影响之下。

路特·费舍在共产党内代表左派反对派。这个集团认为，党应該在德国有一个自主的政策和民主的組織。它要求共产国际保持原来的国际主义和革命性质，而不要变成为苏維埃国家专制政权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軍事目的服务的机构。

1922年，路特·费舍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从1924到1926年，她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員。在这里，她为左派反对派的观点进行了斗爭，然而最后并未成功。她还被选为德国議会的共产党議員，并且在1924—1928年期間担任議会的外交委員会委員。

她在担任以上各种重要职位期間，从1922到1926年到俄国去过十多次。她开始对俄国的布尔什維克有了比在远方对他們可能有的认識要亲近得多的了解。她結識了列宁、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拉狄克、托洛茨基以及其他許多被斯大林为建立自己的独裁逐步消灭掉的老布尔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是她最知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她还直接观察和逐步了解了曼努伊里斯基、季米特洛夫、維辛斯基、多列士、陶里亚蒂和其他許多今天仍然在若干国家中起領导作用的斯大林主义者。

作为德国共产主义問題的顾問，她得以洞悉共产国际的內情——在这些年代里，"德国問題"是第三国际的主要問題。她觉察到共产国际的种种問題是如何危險地和布尔什維克的內部冲突交織到了一起。这些冲突是在列宁逝世前后爭夺列宁继承人位置的斗爭中发生的。在謀取继承列宁衣鉢的竞爭者当中，如所周知，斯大林证明是最狡猾和最残酷的。路特·费舍由于是在近处观察

这些冲突，认識到斯大林如何在把列宁的組織变成一个新型的高度集中和极权主义的机器——一种借助于紅軍、秘密警察、恐怖、最后还借助于經济統治而实行的国家党专政。她还看出同样的极权主义方法如何正在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俄国国家党的代理机构，并且正在把同样的傾向輸进了組成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

看到继列宁革命之后发生的“斯大林革命”所引起的这种危險变化，路特·費舍变成了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以及馬斯洛夫在德国領导的反对派集团中的积极成員。这样，她就招来斯大林的憎恨。她談到斯大林在好几次私人会見中，曾作过想把她爭取过去的徒然努力。在她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員身分为出席其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而最后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曾授意秘密警察对她进行监視，把她在路克斯飯店里軟禁了十个月。不过，她設法同她的朋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保持了联系。在他們的关照和帮助下，她趁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作短期旅行的时机，在1926年6月逃回了德国。

在此期間，她于1924年当选为德国議会議員。她继續在德国共产党內領导少数左派反对派，但是在她从莫斯科逃出以后，她便被已經落到斯大林主义者手中的党机构开除。他們还要求她辞去議会中的議席，但是遭到了她的拒絕。此后控制着党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台尔曼和托尔格勒或者皮克和烏布利希这样的人——前两人后来被納粹关进了集中营，后两人在1933年以后逃往莫斯科，1945年重返柏林，在德国的俄占区政府中充当斯大林的主要工具。

在1926到1933年期間，路特·費舍一直和她在俄国的反对派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她也观察到，崛起的納粹如何采取了斯大林的許多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思想和方法。1933年希特勒掌握

政权以后，冲鋒队洗劫了她的住所，并且把她的小儿子带走作为人质。她本人逃到了巴黎，在那里一直住到1940年，仍然同她在德国和俄国的朋友保持秘密联系。由于她继續反对斯大林主义，她和她的同志馬斯洛夫被牵連进了1936年莫斯科大清洗的审訊中，受到缺席审判。維辛斯基控告他們曾在托洛茨基的指使下，于1933年派了一个間諜到莫斯科去暗杀斯大林！

1940年德軍占領巴黎以后，路特·費舍通过西班牙边境逃往里斯本。第二年她来到美国，終于加入了美国籍。她在这里搜集了大量有关德国共产党盛衰、布尔什維克党如何轉化为极权主义专政以及共产国际蜕变情况的珍貴資料。根据这些材料以及她自己清晰的回忆和經驗，她在本书中报导了从1918到1929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在本书的續編中，她計划說明在希特勒建立他的战爭机器和极权主义专政的同时，在执行五年計划的危急年代和莫斯科各次大規模的清洗中，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党和恐怖主义的极权統治如何越来越严密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路特·費舍的这部书中，貫串着三条有力的綫索，把形形色色的細节和复杂的意識形态方面的解說牢固而紧密地連成了一个整体。

第一条綫索是1918—1929年的德国共产党历史。在这方面，已經有人写过书：保尔·梅尔克尔从斯大林主义的宣傳观点出发，写了《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1944年版)；弗里德里希·斯坦弗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角度出发，写了《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十四年》(卡尔斯巴德1936年版)。但是，据我們所知，还从来沒有人能像路特·費舍一样，对德国共产党历史提供这样詳細、这样公正和可信的內幕报导。

第二条綫索是苏俄內部爭夺政治权力的斗爭。这一斗爭发生

于列宁生前的最后几年以及从列宁剛去世起到托洛茨基被流放为止的整个时期。这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以及其他許多人之間一場錯綜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和混乱的斗爭。它涉及到經济政策、組織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各式各样的概念，而作者也以眞正深刻的眼光对这些概念作了透徹的分析。她是根据內幕資料写作的，这是由于她曾經担任过許多官方职位，也是由于她本人熟識莫斯科的領袖們和許多像拉狄克那样在德国积极活动的俄国代理人。她閱讀过数量极其浩大的俄国人写的小册子和苏联官方文献，幷且时常援引其中的文字。也許在分析动机的时候，她有时候可能会更多地依据她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依据明确的历史证据。分析动机总是一件伤脑筋而又沒有把握的事。但是，她显然已經有意識地力图遵循严格的历史证据。不管怎么說，对于糾正苏联官方作家和历史学家圍繞着斯大林和苏联极权主义統治形成的年代編造的各种神話和故事来讲，她的解釋是有价值的。

第三条綫索是另外两条綫索之間的联接綫——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同苏联政治局和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內部斗爭之間的关系，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說，俄国人力图操纵德国共产党的政策，使它們不是为德国人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俄国內部派系或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服务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再加上斯大林的利用恐怖手段和秘密警察把那些妨碍他的人都殘酷消灭的做法，使得路特·費舍走上了和莫斯科以及亲苏的德国共产党人（包括她自己的兄弟格尔哈特·艾斯勒）决裂的道路。正是她对斯大林主义这一方面的初期表現所作的說明，对于今天的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正如萊翁·布魯姆时常指出的那样，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完全是在为他們的莫斯科主子的利益奴顏婢膝地服务，而不是作为正直的爱国者为他們祖国的利益服务。

正是在 1918—1929 年这段时期，恐怖极权主义的一切方面在俄国社会的广泛范圍內都得到了試驗和成熟，然后又傳到了共产国际各支部。后来的一切极权主义統治形式都不过是路特·費舍目睹它形成的典型极权主义的衍生物，它們在每一个国家中各有其特殊的民族特征，但是基本上都以斯大林树立的榜样为依据。

我认識路特·費舍已有好几年了，也讀了她的著作。她那种談起往事历历如在目前的惊人記忆力，那种不仅对德俄两国而且对世界各处的共产党領袖具有的广泛了解，都使我深为敬佩。那些她在其中記录了誰被斯大林消灭誰被斯大林提拔的无数脚注，讀起来就像一部过去三十年中的共产党"名人录"。以俄国政治局的內部斗爭和共产国际的內部斗爭为一面，以德国共产党內的混乱冲突和左右摇摆为另一面，两者之間的关系通过她的詳細叙述得到了空前清晰的再現。关于那些复杂微妙的意識形态方面的爭执和理論，她所作的透辟分析具有高度的启发性，对于那种把問題过份簡单化的普遍傾向(特別是在美国)，能够起到有价值的糾正作用。不論是对于研究过去三十年历史的历史学家，或是对于想了解目前这种侵略性的和恐怖主义的苏联专政如何形成的任何人来說，她的这本书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帮助我們很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来說，这部书作出了重要貢献。

悉尼·法伊

于馬薩諸塞州劍桥市

志　謝

在把这部书献給美国公众的时候，我要向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悉尼·法伊和哈佛大学图书館館长梅特卡夫表示衷心的謝意，沒有他們的同情和帮助，这部詳細的和非正統的俄国国家党历史是不可能写成的。在那些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到处都受到冷遇的年代里，他們不仅鼓励我进行这一研究，而且使我能够把它写完和出版。

在讀过本书部分手稿和提供了宝貴意見的許多朋友中，我要特別提到卡尔·科尔施博士、海因茨·兰格汉斯博士、卡尔·曼格斯博士和卡尔·奧古斯特·威特福格尔博士。艾伯特·盖茨和莫里斯·布赫斯檢查了关于二十年代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各章，阿道夫·魏因加滕和卡罗拉·魏因加滕帮助我搜集資料和克服了許多技术困难。

我所以能用英語写出这部书，大大得力于威廉·彼得逊，他担当了原稿的文字校訂工作，并且讀了校样。在这方面，我还要对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編輯部表示謝意。

路特·費舍

1948年4月28日

第一部分　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在所有的交战国中，德国是发生了声势最浩大和最有觉悟的反战运动的国家之一。掀起这一运动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在1914年，这个党拥有一百万名党員，工会会員达二百五十万人左右。人数仅次于德国党的意大利社会党，拥有的党員大約为它的一半。

在这个党逐漸成长起来的战前五十年中，它养成了一个坚定的反軍国主义傳統。人們指望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工人組織会成为粉碎德国开战可能的决定性因素；人們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将抵制动員——他們一定不会为德皇打仗。因此，当情况幷不像人們預料的那样，而是議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議員投票贊成軍費預算、工人們毫无抗議地应征入伍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陣营中就发出了一片譴責他們叛变的叫喊。但是，这些批評家們既沒有注意到俾斯麦帝国的力量，也沒有注意到外表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在继續以革命辞藻装飾門面的时候，党內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时，普通党員和一部分中下級領导干部潛在的反战情緒，幷沒有能立即找到一条适当的途徑表現出来，可是，这种情緒却的确起了一种使党的結构从內部生了銹的作用。后来，当事态演变得

更加迅速的时候，人們就可以看到党的威信同时受到了什么影响。被熏陶得相信他們本身的組織力量足以防止战爭的德国工人，在大战爆发的时候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在战爭进行期間，随着眼前出現越来越阴暗的战敗前景，他們懂得了更多的道理。

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时候，德国的党已經变成社会主义国际的中心，整个社会民主党世界的典范。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它的党員人数，而且是那种无与倫比的組織紀律的力量、那种把政治上的忠誠和对工会的忠誠合而为一的独特創造——合而为第一个現代化群众組織。納粹主义的一个哲学先驅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經贊揚这个党的創建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偉大的群众組織家，偉大的群众領袖，把他比成是率領着一支現代大軍的統帅。列宁曾在文章中說过，在把軟弱分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組更加有效地組織起来的斗爭中，将涌現出許多俄国的倍倍尔，把他們的干部訓练成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軍队。

然而，社会民主党既沒有参加中央政府，也沒有参加各邦政府。德皇帝国是一种介于俄国专制政治和英国議会政治之間的混合組織。俾斯麦按照西方的模样創立了一个德国議会，但是政府权力却操在联邦議会、即各邦諸侯的議会手中，他們继續以半封建的特权統治着德国。俾斯麦用暴力对付社会民主党人，他的继承者也只是在压力之下和很晚的时候才給了社会民主党人以完全合法的資格。

俾斯麦这种硬要人們不过問国家政治的做法，部分說来是自己給自己拆台，因为它使得工人格外忠实于他們的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类型的組織，它不仅仅是許多个人为了临时目的临时聚到一起的松散的組合，也不仅仅是一个保

卫劳工利益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架政治机器；它使德国工人有了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尊严和地位。工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党里面，党渗入了工人的日常习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都产生于他个人和他的集体的这种融合。

在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它的信徒相信他們掌握了一套独立于資产阶級世界政治科学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和完整的历史理論。在人与人之間一些最重要的关系上——在洗礼、婚礼和葬礼上，宗教典礼开始为社会主义的仪式所取代。有組織的娛乐、旅行和体育活动，帮助創造了新型工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說来，沒有参加組織的工人成了低一等的人；“不关心政治”这个形容詞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带有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間使用这个詞时那种特殊的輕蔑含义。一个人如果不爭取加入本阶級的优秀行列，从而在那里同那些已經肯定未来是屬于他們的数百万人結合在一起，他就会为人所不齿。

社会民主党和战爭

我們的祖父輩对待战爭的天眞态度，今天是难以理解的。在1914年以前的五十年中，不論是法国人和美国人，或者是德国人和英国人，都生活在一段相对稳定的工业扩張时期。在这段时期，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商路的开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繁荣，把社会不断向前推进。每一个西方文明的成員，都以某种方式分享了它的工业成就可以夸耀的东西。大家都觉得，正在成长的城市会永远屹立着，会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图书館、博物院、学校、教堂和医院。人类正在攀登进步的阶梯。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人們对多种多样的社会弊病进

行了研究：关于貧民窟和少年犯罪、关于对母亲和儿童的照顾、关于都市設計和教育、关于世界語、关于性和卖淫問題（这是一个人們特別爱談的題目）等等。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吸收了各种进步思想，并且按照正在社会中占有新地位的第四等級——工人阶級的需要，把进步思想并入一个单一的社会改革图式。当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家爱德华·伯恩施坦攻击馬克思的社会发展規律时，他不过是社会主义思想适应于普遍的乐观气氛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俾斯麦和成长中的工人組織之間的斗爭，使社会民主党获得了現存社会秩序反抗者的声望，但是，早年鼓舞着他們的革命前景这时已經退居为仅仅是口头上的宣傳。人們感到，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战术已經过时了。

1914年以前党的主要理論家卡尔·考茨基，在早期不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信徒，而且是启发了青年列宁的导师。后来，他在維也納和魯道夫·希法亭一起，对資本主义社会发展問題作了新的解釋。他們认为，自由市場的无政府状态将逐步消失，为壟断控制所取代。在这种有組織的資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工人的群众組織也将不可抗拒地获得发展。在不太遙远的未来，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就会把大多数人民包括进来。知識分子将愈来愈变得和体力劳动工人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并且最終加入工人的組織。最后，机器的使用将把农业改变成一种日益和工业相似的生产；农民将作为农場主进入新时代。資本主义壟断組織和国家机器将变得如此接近于完全融合，以致它們二者之間的界限很快就几乎消失。这时，通过变更統治干部，就有可能轉变到社会主义；劳动組織者将代替資本家。在世界范圍內，这样一种有組織的資本主义将促进和平进步。資本主义使之工业化的殖民地将获得独立；它們一旦打下相当的技术基础，就可以和宗主国脫离。

这实质上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欧洲伙伴的信条。根据这种分析，一个超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体系中，通过有理性的合作来和平地在世界范圍內划分势力圈、謀求更大更好的工业化将代替代价慘重的战爭和內战这些非理性的方法。

在奥地利的弗兰茨·裴迪南大公遇刺后最后几星期紧張的外交活动期間，党直到战爭爆发的那一天都始終保持着和平主义的抗議立場，然而也不相信战爭会立即爆发。宣战以后，党走到了一个岔道口。德国的有組織劳工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擇：一条是立即作出抵制战爭政策的大胆决定，而这将导致地下斗爭和暫时丧失党和工会的一切財产；另一条是和帝国政府进行有条件的合作。

包括总罢工战略在內的革命政策的种种問題，在此以前就已經被討論过；对于群众起义的可能性和危險，党和工会的組織者已經研究了几十年。在1905和1906年举行于耶拿和曼海姆的党代表大会上，工会領袖卡尔·列金曾頑固地反对举行总罢工的想法。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会后，为俄国、比利时和法国的群众罢工所鼓舞的罗莎·卢森堡，猛烈攻击了列金的理論。

指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从8月2日到8月3日的二十四小时之內就放棄掉实行了几十年的不越出帝国宪法合法范圍的政策，那是荒謬的。这些領袖們已經懂得一些粗淺而实用的政治常識，学会了不去自寻煩恼，不搞冒險主义，在8月，堅守以往改良主义政策的社会民主党，把德国工人的命运和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联到了一起。英法两国的社会党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法国杰出的反战主义者让·饒勒斯已經在7月31日被人暗杀。参加俄国杜馬的十三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其中六名是布尔什維克）分裂为护国主义和失敗主义两派；布尔什維克代表被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只是在一年以后，在最初的国际反战力量开始被感到以后，一个重要的群

众性合法政党——意大利社会党才反对本国参战。

在德国，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最有示威性的反战姿态就是在議会中投票反对軍事預算。8月3日，社会民主党議会議員单独举行了会議，商討是否支持軍事預算。在一百十一名議員中，十四人主張投反对票，其中有卡尔·李卜克內西、格奥尔格·累德博、奥托·吕勒和胡果·哈塞。少数派正式要求在这項問題上不受党紀約束，但是遭到了拒絕，于是，他們第二天在議会內一致投了贊成票。只是到12月，李卜克內西才違反党紀，投票反对追加的軍事預算。至于一般的社会民主党党員，就更难立即摆脫党紀的束縛，在德国战爭政策的迷宮中独自摸索出路了。

到1914年秋天，人們已經在散发反战傳单。卡尔·李卜克內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联名写信攻击党的战爭政策。在他們这一行动的带动下，党內的抗議运动有了发展，力量越来越大，开始使党的全国执行委員会感到不安。柏林五金工人反对战爭政策的情緒很濃，他們举行了好几次罢工。尽管这些罢工表面上只是为了实現工会的要求，事实上却是反战罢工。在所有工业中心——在汉堡、魯尔、不来梅和斯图加特，都发生了騷动。1915年，德国工业无产阶級、有組織的社会民主党各单位和工会的核心，已經露出了反抗的端倪。

这种情緒圍繞着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个人物具体化了，他們共同努力使这种情緒变得明确和成熟起来。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內西，是党的一个奠基者的儿子。老威廉·李卜克內西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曾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共同奠定了德国新的社

会民主党的基础。对于較老一輩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說，“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就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俄国那样出名。威廉·李卜克內西曾在1871年抗議对阿尔薩斯-洛林的吞幷；他把不反对战爭的知識分子、記者、教授和其他学者阶层的立場称之为“对文明和人道的背叛”。1872年，他由于宣傳反战被囚禁了几个月，但是，甚至在囚禁着他的普魯士城堡中他还继續宣傳反战，抨击政府，幷且和住在倫敦的馬克思保持密切联系。

在老李卜克內西入獄前一年，1871年8月13日，卡尔在来比錫誕生。作为柏林党組織的日报《前进报》的編輯，他的父亲的收入十分菲薄，因此卡尔和他的兄弟特奥多只是在党的帮助下才能在大学攻讀法律。出生在社会民主党家庭和由党扶植的卡尔，热情地继承了长輩的遺志。1905年，在俄国革命振动了德国党的情况下，他在反对帝国主义穷兵黷武的斗爭中、特别是在对将要被征入伍的青年人进行宣傳的工作中，变得更加活跃。1907年，他写的《軍国主义和反軍国主义》剛发表不久，他就在以这本书作为罪证的一次审判中被判十八个月徒刑。他还在獄中时就被选入普魯士議会，1912年成为帝国議会議員。可是，虽然他在党內很有名幷且本人也很勇敢，在1914年以前却沒有任何迹象預示他后来所起的那种独特作用。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爭的斗爭中和李卜克內西合作的另一个領袖罗莎·卢森堡，是从沙皇迫害下逃出来参加德国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之一。① 她在1870年出生于俄屬波兰某小城中一个富裕而

① 德国党內的这一部分东方人——包括卢森堡的一些密友，其中有列夫·梯什科-約吉契斯、尤利安·馬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和阿道夫·瓦扎夫斯基-瓦尔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識形态的形成上起了重要作用。就大体而論，他們都是极左派；他們带来了地下工作的經驗、毫不妥协的战斗性、比德国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一般情緒更为强烈的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憎恨。

有教养的犹太人家庭，是这家人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她小时臀部生过病，这使她在床上躺了一年，并且給她的身体留下了少許缺陷。卢森堡的父母把她送进了华沙大学預科学校，这对当时的犹太女孩子說来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而她也就在这所学校里卷进了革命青年的圈子。1889年，由于遭到入獄的威胁，她藏在农民馬車上的干草堆下面，“越过綠色边界”逃进德国，然后去苏黎世——那里的大学是被迫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聚会点。在涉猎了短时期的动植物学以后，她开始攻讀对她說来意味着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

从她流亡国外起，罗莎就滿腔热情地积极投身于波兰地下运动的生活和斗爭。她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濃厚的波兰民族主义进行斗爭，并在1893年和約吉赫斯等人一道組織了分裂，建立起一个新党，即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她过着双重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她在合法的德国党內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她仍然为地下党之間发生重大政治分歧时必不可免的那些无休止的爭执和毁謗所糾纏。坚决維护自己观点的罗莎，受到了各式各样意气用事的攻击。人們駡她是沙皇暗探局的密探，造謠說，她只是在华沙宪兵队馬克格拉夫斯基上校的帮助下，才得以逃出波兰等等。在1896年波兰社会党人倫敦会議上，一位奥地利議会議員达任斯基曾这样叫喊道：“让罗莎·卢森堡、烏巴赫之流的恶棍妨碍我們的运动，是不可容忍的……如果我們的国际队伍不摆

在这些避难者中，巴烏斯-海尔芬在許多方面都很出名。他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加入德国党，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理論报刊撰稿，奠定了牢固的声誉。1905年，他返回俄国，在革命失敗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从流放地逃出，在君士坦丁堡住了一个时期，并且在巴尔干战爭期間发了财。在1914年，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內主战派的領袖之一，同时是一个发战爭財的人。1917年，他企图使德国党和布尔什維克和解，后来又企图使独立社会党和艾伯特-諾斯克的領导妥协，但都沒有成功。

脫掉这伙要笔杆的报棍，他們就会毁灭我們的解放运动。”

尽管她終身从事波兰党的活动，罗莎却不满足于只是从国外的地下运动中进行具有代理性质的活动；她不願永远过流亡生活。她渴望参加一种能把她的全部精力投进去的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当她决心定居下来的时候，她选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龐大群众組織对她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最初一个阶段是充满困难的。她通过和一个同志古斯塔夫·呂貝克形式上的結婚取得了德国国籍，开始奔波于全国各地，在党召开的会議上演讲，为党的各种报紙写作。她受到过各种攻击，人們认为她是从东方闖进来的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个不能理解德国工人运动特点的人；就連老威廉·李卜克內西也写过一篇相当沒有好感的文章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在許多年中，她用德文写的文章都要送給她的密友、卡尔·考茨基的妻子修改，不过，她后来却能做到使路易絲在信中这样說，“你現在写的德文非常漂亮，眞是誰也比不上，我的修改已經变得完全多余了。”

1905年彼得堡爆发革命的时候，卢森堡赶到华沙，投身于那里的斗爭。經过短期囚禁之后，她重返德国，参加了德国党专心一志地进行的有关总罢工战略的长期討論。卢森堡为最近在波兰的經驗所鼓舞，攻击党的領导机构的改良主义态度是机会主义；1909年，她的立場使她和卡尔·考茨基决裂，在此以前，考茨基一直是她的知交，也許还是她的主要导师。正是在这些年代里，她的声譽傳播到了党外，使她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卢森堡也招引了德国当局对她的憎恨，因为她是一个反对帝国政府及其警察的危險的宣傳家、德国軍国主义的一个刻毒的揭露者、社会民主党政客的一个主要的反对人，这些政客虽然讲着和平主义的漂亮話，在她的眼中却是未来战爭的潛在的支持者。在她那种富于魅力的人格和她从东方带来的經驗的吸引下，圍繞着她形成了一个集团。这就

是未来的"斯巴达克团"的核心——其中包括后来写了一部馬克思傳及党史的弗朗茨·梅林和妇女組織家克拉拉·蔡特金。

大战爆发后，卢森堡的活动加紧了。她不倦地号召采取群众行动，实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1915年2月，她被拘禁起来，执行过去判决的两个月徒刑；此后，除去1916年初的几个月以外，她一直被关在布拉斯劳附近的烏隆克监獄里，在1918年11月才获釋。

最扼要地說明了卢森堡反战观点的，就是她那本所謂尤尼烏斯的小册子。在今天讀起来，她对于当时社会党国际和社会主义者团結的瓦解所发出的絕望呼吁是感人的。她說，如果各国工人不立即通过他們的統一行动，制止对自己无产阶級兄弟的屠杀，社会主义就注定要灭亡，欧洲就必然要雕落。"目前这場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正把成年劳动人口摧殘得只剩下妇女、老人和殘廢者。这是一种眼看就要放尽欧洲工人运动的最后一滴血的流血行为。再来一次这样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为帝国主义的野蛮破坏堆起的一片廢墟所埋葬……"①

卢森堡反对这样的幻想，即毋需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干預，交战国的政治家就会和解。然而，她关于战后世界的概念实质上却是一种有条件的維持原状；她沒有认識到欧洲社会不可能再恢复原状的崩潰前景。按照她的預測，德国将变成一个共和国，但是不

---

① 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柏林1916年秘密出版，第91頁。这本书的流行名称"尤尼烏斯的小册子"，借用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从1769到1772年，一个署名为"尤尼烏斯"（这个名字或許出自罗馬的爱国者路西烏斯·尤尼烏斯·布魯图斯）的人，向倫敦的《公众报》投寄了一系列信件，以惡毒的咒駡攻击格雕夫頓公爵的政府。当时，这些信获得了一定的名气，晚至1927年，还有人出版了一本书，再一次企图解决尤尼烏斯究竟是何許人也的秘密。卢森堡写这本战时小册子时，也用了尤尼烏斯这个假名。

会立即有結构上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将在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兄弟党密切合作的情况下，重新继續它的长期斗爭。和列宁相反，她幷不认为世界大战是一場将把社会主义引入欧洲的国内战争的前奏。

在战争爆发以前，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內西之間的关系一直是时断时續的，但是这时候，他們的反战努力把两人聚到了一起。1915年抵制运动开始发展；地方上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青年人，不顧遵循党的領导机构的爱国主义政策。这一年4月，出現了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反战刊物《国际》杂志，由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編輯，載有李卜克內西的一篇文章；《国际》杂志刚一出現就被沒收了。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战派两次聚会于瑞士，分别于1915和1916年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举行了会議。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沒有能出席会議，但是他們的追随者——这时自称为“国际派”——有代表参加。① 这些反軍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微弱表現，使德国的反对派在反对党的領导机构的斗爭中得到了新的动力和进一步加强。不滿情緒日益增长，建立新党的因素正在形成。

---

① 出席齐美尔瓦尔得会議的俄国代表是列宁、季諾維也夫、阿克雪里罗得、馬尔托夫、馬尔丁諾夫、納坦松、切尔諾夫、别尔津和托洛茨基；德国代表是格奥尔格·累德博、阿道夫·霍夫曼、約瑟夫·赫玆菲尔德、恩斯特·迈耶尔、貝尔塔·塔尔海麦、尤利安·博尔夏特；波兰代表是卡尔·拉狄克、瓦尔茨基和拉品斯基。下列国家也都有代表参加：意大利、荷兰、斯堪的那維亚、罗馬尼亚、保加利亚、瑞士。英国独立工党本来也准备参加会議，但是它的代表没有能取得出国护照。

参加昆塔尔会議的代表有四十人左右，他們所代表的国家和齐美尔瓦尔得会議上的情况大致相同。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議于1917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在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后，这个組織即宣告解散。

齐美尔瓦尔得派的主要立場是：通过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統一行动結束战爭。在这个少数派集团里，圍繞着列宁的集团是更小的少数，也就是所謂“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他們号召和社会民主主义坚决分裂，以革命的方式来反对战爭。

当时，对列宁的思想有一些模糊了解的，还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小撮人，这些人主要是不来梅和来比錫的知識分子，他們曾經在战前和主編这两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报紙的卡尔·拉狄克工作过。教师約·克尼夫在不来梅主編的《工人政治》和拉狄克的一个私人朋友尤利安·博尔夏特在柏林主編的《光綫》月刊，和列宁最为接近。从瑞士給德国报紙写稿的拉狄克本人，开始在反战派中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一般說来，列宁当时还几乎沒人知道，在德国肯定地沒有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一直继續到布尔什維克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后才改变。

1916年元旦，"国际派"在李卜克內西的柏林寓所里举行了秘密会議，决定采用卢森堡的論文《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作为該派的政策說明。和李卜克內西分不开的这一政策的公式，可以用他所发表的許多篇宣言之一的題目来說明，这就是"主要的敌人在国內"。

1月12日，李卜克內西被党的議会党团开除。两天以后，奥托·呂勒发表声明为李卜克內西辯护，随即也被开除。

建立一个新党的趋势不断加强。然而，使党分裂是違反四十年的团結傳統的。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領导的埃森那赫派（由于該党建党大会的所在地是图林吉亚的埃森那赫城而有此名称）和在拉薩尔領导下組織在"全德工人协会"里的来因区社会主义者联合了起来。自此以后，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心目中，任何可能导致分裂的政策就不仅是一种政治錯誤，而且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可耻行为——它簡直就像杀人那样引起人們的道德反感。对他們来說，沒有任何問題会重要到足以使党分裂：就像今天一样，阶級团結的概念是当时德国一切工人組織的教条。

纵然如此，1916年3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分裂了。4月6日到7日在哥达举行建党大会的少数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

党，很快就变成第二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

反战情緒这时已經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在5月1日，李卜克內西决定采取行动，希望他的抗議会引起群众的响应。当时，他已經被征入伍，編在一个苦役队里。他就穿着制服跑到靠近柏林各大車站的一个地方（車站里当时正挤满了等着被运往东西綫去的士兵），放开嗓子不断高呼下列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战爭！脫离軍队！社会主义万岁！"他被逮捕了，但是他的抗議絕不是一个狂人在孤独地手舞足蹈；孤零零地站在波茨坦广場上的李卜克內西，得到了数十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帝国政府非常清楚李卜克內西通过他的直接行动贏得了多大威信。在他受审判和被囚禁在西里西亚的呂考期間，发生了許多次要求释放卡尔的示威和罢工，这些行动虽然沒有能达到它們的主要目的，却使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注意到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緒。

9月20日署名"斯巴达克"（公元前73年起义反对罗馬的一位奴隶領袖的名字）的一系列政治信札的第一封出現了，它們很快就在党內被人們热心地閱讀着。使这些信札明确了政治方向的主要是卢森堡（她从獄中写出了一篇篇的文章），但这个集团中的其他人也有所貢献。由于这些信而获得"斯巴达克团"称号的"国际派"，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

好几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組織者进了监獄。斯巴达克派的所有領导人都受到保安羈押——被羈押的不仅有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后来还有弗兰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皮克和胡果·埃貝尔林。柏林五金工会的組織者——包括德国革命史的作者理查·繆勒① 在內——被送上了前綫。德国工人日益反战

① 理查·繆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世界大战期間革命工人运动史》，两卷本。柏林馬列克出版社1924年版。

的情况，卷进冲突中的一切力量都不免要予以考虑，协約国密切注意着这一动态，希望能同中央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者合作。魯登道夫和总参謀部对此的关心不下于协約国，因为恰恰在美国宣战前夕，工人的这种反战潜流挫伤了德国軍队的士气。党的官僚机构也非常注意它自己的話越来越沒人听的这一情况；这时，在战争进行了两年以后，党机构的权力能否保持已經和它同帝国政府的联盟能否成功分不开了。

和平宣傳在水兵中特別受欢迎。他們用“李卜克內西万岁！”这句口号作为互相間的問候，成立了若干小型的地下委員会。1917年3月，到处瀰漫的不安气氛具体表現为一次兵变的爆发；带头的两个人賴希施皮奇和克伯斯被处决了——这是战时的第一次政治处决，为的是杀一儆百，但是，海軍中的騷动仍在继續，甚至更为发展。数以百計的水兵被判处一年到十五年不等的徒刑。①

继李卜克內西的抗議之后，革命党人的小組——地下水兵委員会、柏林工厂中的地下委員会——紛紛产生。工会和党在工厂中一向是由它們的“心腹人”做代表的。这些人主要是工会干部，他們在党內具有举足輕重的影响。这时，就在这些人当中，发展了一种称为“工厂代表委員会”的地下組織。

和本身的工厂紧密联系着的工厂代表委員会，同工人士兵委員会有显著的差別，后者于1918年成立，代表着各种地方組織的松散单位。工厂代表委員会是傳統的党和工会机构以外的一种新的政治組織形式。全帝国境內的抵制运动在形式上并不都和柏林一样，但运动的內容在一切工业区却大体相同。工人代表定期集会，策划如何反对党机构，組織結束战爭的运动。按照当时的尺度来

① 参看伊卡路斯：《威廉港暴动》，倫敦自由出版社1944年版。

衡量，这些工人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許多中年工人由于从事軍事生产被豁免了兵役；从工厂中被迅速送进战壕，往往是进行战斗性活动所付出的代价。

普遍反战的情緒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派工人的身上。1917年，鲁尔、来因区和上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工人（他們是中央党的主要基础）也在鼓吹立即媾和——这是德国工人力图凌駕于威廉皇帝拥护者之上的另一个表示。

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在獄中，水兵的反抗在继續，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不可挽回以及党內反战派日益发展，不滿情緒瀰漫于全国人民的各大阶层中間，所有的工业区都发生罢工，到处人心惶惶——这就是1917年德国的政治景象。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和俄国的布尔什維主义无关的抵制运动日益高漲，成了終于使帝国崩潰的主要原因。它复活了社会民主党工人旧日的梦想——把德国变成一个人民共和国。“你們大家，坐在这里的全体代表，都会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奥古斯特·倍倍尔曾經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这样宣布。在德国工人的心目中，由于动員和战争而复活的国际主义重新具有了神圣的性质。①

卢森堡对列宁

列宁在监獄中度过一年又在西伯利亚东部住了三年以后，于1900年（比卢森堡晚了几年）来到西欧，这时候，他在西方社会主义

① 关于同时代人对德国抵制运动的記述，可参看艾米尔·巴尔特：《来自德国革命的車間》，柏林1919年（？）版。这本內容混乱的报导曾遭到同时代作家的严厉批評，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史料。另可参看海因里希·施特勒貝耳：《德国革命，它的产生和得救》，柏林1920年版；奥伊根·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史：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和发展》，柏林1922年版。

者当中还毫无名气。① 他带着笔記簿和鉛笔，挨次地在慕尼黑、倫敦、日內瓦和苏黎世的图书館里潜心研究，开始写出数量惊人的一本本小册子，可是，除去少数和俄国有特殊关系的社会主义专家而外，这些小册子在西方幷沒有讀者。

从表面上看，列宁的背景和卢森堡完全一样：他們都是逃避沙皇警察迫害的政治避难者。可是，列宁要比她成熟得多（罗莎来到苏黎世的时候，还不满二十岁）；他从事过更长时間的和更为活跃的地下工作，他后来具有的主要思想这时都已經在酝酿中。他不像卢森堡那样，絲毫也不打算成为西方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的一員。他住在瑞士就像住在避难所里一样；那是一个工作地点、一个組織崗位。不論他停留在什么地方，列宁总是生活在俄国。他的个人生活、他的旅行，都是根据党的需要来安排的。在布尔什維主义形成的十五年中，他到了那里，党的中心就跟着他到那里。他热心地研究西方，但这只是为了把欧洲社会主义的最新消息傳回他的故国；直到去世为止，他从来沒有丧失过对"高度文明的欧洲工人"的尊敬。

在本世紀的最初几年中，列宁建成了他的有关党組織的理論。他把一大批俄国社会主义流亡者集合在自己的周圍，这样就开始把这种理論付諸实踐。作为布尔什維主义中心学說之一的这种理論，在一切东方国家的党中間都引起了相当大的激动；在贊成与反对的爭辯上花費了几年时間的，不仅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本身，而且有波兰人、犹太崩得、列特人和高加索人。在 1903 年举行于倫

① 1911年米希耳斯写社会主义政党概論那部著作时（罗伯特·米希耳斯：《現代民主主义中政党活动的社会学剖析》，来比錫 1911 年版），他甚至沒有提到列宁或托洛茨基，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党組織。另一方面，卢森堡这个名字却在索引中出現了十次。

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圍繞着党章問題，代表們分裂成为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多数派和少数派。这次分裂以及圍繞着它的中心問題的无数文章和爭論，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中間很少引起兴趣，但是，作为波兰党一个积极成員的卢森堡，却从一开始就卷进了这場論战。通过出席那次会議的波兰代表哈涅斯基和瓦尔茨基（他們是由卢森堡作为其委員之一的党中央委員会选出的），卢森堡知道了这些复杂爭論的詳細情况，并且在德国发表了一篇攻击列宁观点的文章。这两种关于党組織的理論，在形成德国共产主义及其以后和俄国布尔什維主义的关系上都起了作用。

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是資本主义社会中阶級对立的产物，这造成了一种他所說的“工联主义的意識”①，也就是工人阶級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和資本家阶級的利益是冲突的。工人本身只能自发地形成这种工联主义的意識；他們永远不会自发地达到更高形式的政治觉悟。阶級斗爭不会自动地发展成政治形式、发展成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而且正如考茨基所說的那样，“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級，而是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② 列宁引证恩格斯的話說：“自从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以来，它就要求人們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③ 因此，工人阶級需要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那些站到革命运动一边来的人，带来了科学方法的知識，将被吸收到无产阶級政党中。

他认为，无产阶級的意識形态不可能自发地发展。把工人运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2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351頁。——譯者

③ 同上书，第339頁。——譯者

动局限于經济方面，局限于工会活动，放棄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斗爭，这不是要摧毁資本主义社会，而是要使工人运动适应于这个社会。工人必須对其他阶級的一切政治利益持有一定立場，必須領悟和了解它們的知識、道德和政治含义。社会民主党人必須对一切阶层的民众呼吁，而不只是求助于工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絕不能只是一个工会領袖，而必須是一个保民官。

他认为，在当代高度发展的阶級斗爭中，必須有一个紀律严格的党組織。党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作用因素；党干預这个进程，而不只是它的产物。俄国党旨在首先成为摧毁当时沙皇統治的一个有效工具。它的主脑，一小群优秀的領导人，根据对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析来安排党的政治行动，并且通过經常为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党的各項原則进行斗爭而保持党的純洁性。設置一个能够不受干扰地发展党的政治理論的中央机构，保证这个机构不断起作用，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步驟——这也就是何以需要一个流亡革命总部的理由。各支部服从中央，因为它們认識到中央的政治理論水平和眼光要高得多，这样，中央就能把地方的經驗提到整体的較高水平。中央通过职业革命家（这是一些把全部精力都献給了为执行中央命令所要做的工作的人）把它的指示傳达給各支部。这种革命团体是一种严密的密謀組織；加入这种团体不是表明一时的政治偏爱，而是献身于一个事业。列宁的这种組織思想得自雅各宾党人和他的俄国革命前輩，但它們是和对于无产阶級革命作用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在列宁看来，党是把最广泛意义下的工人运动发动起来的催化剂；党是无产阶級的先鋒队。党的中心人物是职业革命家，他們和党中央联在一起，把中央的思想、計划和决定傳达給地方党；他們是整个組織繞之旋轉的中樞。①

① 这里概括說明的思想，是由列宁在一篇发表于1901年5月的文章《从何着手》

在她答复列宁的文章中，卢森堡承认党組織这个問題关系到俄国“整个年輕一代的社会主义者”的問題，因为在俄国，沙皇专制造成了特别困难的环境。然而，她反对列宁的下列主張：必須用严格的紀律建立一个由少数优秀分子組成的中央，并使这个中央机构处于秘密状态；她反对这样一些規定，即中央委員会可以干涉地方党的生活，可以解散和改組地方支部，这样中央委員会就能影响选举它的代表大会。这些規定将使中央委員会成为唯一活跃的核心，使党的所有其他部分都变成了只是执行中央意志的工具，而这是和阶級斗爭的自然开展背道而馳的。

她认为，除去一般性的斗爭原則以外，沒有任何可以事先規定的、中央委員会能借以操练一般社会民主党員的成套战术。情况永远是变化不定的；党的領导、普通党員和群众之間并无严格界限。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工人阶級的組織，而且是工人阶級所固有的运动。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思想，是把布朗基的密謀团体生搬硬套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来的产物。①

(英文本《列宁选集》，紐約 1929 年版，第 4 卷，第 1 部，第109 頁以下)中首先提出来的。次年，这种思想在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同上书，第 2 部，第 91 頁以下)中得到发揮。这两篇都是論战性的文章，抨击的对象是經济派、一个想把新兴的工人运动主要导向工联主义道路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在近来的討論中，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已經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因为它使中央委員会掌握了莫大的权力；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列宁所說的职业革命家已經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密探等同起来。然而，尽管斯大林的国家党确实是以列宁的布尔什維克党为基础的，这一事实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使得一个謀取政权的革命地下組織在一旦取得政权后便发生变态的，还有其他种种因素——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

①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法国革命家，在 1839 年企图发动政变，从监狱中釋放出来时，剛好赶上参加 1848 年的革命。1871 年的巴黎公社时期，他正在獄中，公社的領袖大約有一半是布朗基主义者。他組織了不少地下“俱乐部”，主張必須通过“革命的专政”来打贏“穷人和富人之間的战爭”。

卢森堡說，俄国当时正处于資产阶級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級革命——的前夕。在德国則正好相反，我們已經有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領导阶层的坚强的无产阶級干部。不可能有什么防止“資产阶級化”和机会主义发展的組織規章；只有阶級斗爭的自发发展，才能最終克服一切障碍并使阶級斗爭走上正确道路。“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个眞正的革命工人运动所犯的錯誤，和一个最完美的中央委員会的永远正确相比，前者也要比后者无限丰富和宝貴得多。”①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卢森堡关于中央委員会专政会扩展到夺取政权以外的看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她是以西方群众运动的代表的身分讲話的，当时，这个运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还沒有出現任何衰退的迹象。列宁則是以封建国家的地下密謀团体的代表的身分发言的，这个封建国家在三年后就遭到一場革命的震撼②。

这一爭論的主旨表明，新的列宁主义政党和卢森堡主义傾向是背道而馳的。紧接着俄国革命者失敗后的一段日子里，双方有

---

①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問題》，載《新时代》（斯图加特1904年版），第22卷，第1部，第484—492頁和第529—535頁。当列宁送去答辯的文章时，《新时代》（德国党的主要理論刊物）的編輯以文章观点不明确为理由拒絕刊登。这篇文章后来在俄国印出，題为《寓言喂不了夜鶯》。即使到后来，这家刊物也从不发表列宁的文章。只是在他所写的《論专政問題》一文受到該刊評介的时候，他的名字才在1921年的索引中出現过一次。

② 列宁在保卫他的組織理論时，不仅要反对經济派和后来的卢森堡，而且要对付俄国运动中的許多反对者，在这些反对者中，我們在这里只提一下托洛茨基。但是，如果把事情說成是即使在这时候，在布尔什維主义的初期，民主派托洛茨基就反对专制派列宁，便未免过分簡单化了。列宁抨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具有反民主性质，提出他自己的工农民主专政論与之抗衡，托洛茨基則对党的集中化提出批評，为革命任务划定了更为狹窄的范圍，并且把立即实現这些任务的責任限制为主要由无产阶級来承当。

过暂时的和解。在1907年举行于斯图加特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和卢森堡曾联合起来反对欧洲社会党人普遍的乐观情緒，并提出了一項决議案，要求在战争时期恢复推翻資本主义的斗爭。①

在这一次合作以后，列宁派和卢森堡派之間的关系又变得冷淡了，如果不是敌对的話。布尔什維克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地位从来也不是十分肯定的；列宁及其集团只生活在这个国际的边緣。在西方群众性政党的領袖看来，列宁是一个无足輕重而又可能是很危險的狂热分子；卢森堡虽然在某些基本問題上比較接近于列宁，也趋向于同意他們的看法。

在世界大战快要爆发的前几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各党各派之間的斗爭达到了頂点；不仅孟什維克反对列宁，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几乎一切其他的派别都反对列宁。1914年5月，在孟什維克党呼吁社会党国际制止布尔什維克实行分裂策略以后，比利时人艾米尔·王德威尔得以国际代表的身分去圣彼得堡，調查是否有可能使这两派恢复团結。尽管当时战爭的阴云已經密布，国际仍然計划像通常那样于1914年8月在維也納开会，并且于7月16—17日在布魯塞尔召开了預备会議，会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員会听取王德威尔得关于俄国党的报告。

組成这个委員会的代表，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所处的

---

① 《1907年8月16至24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布魯塞尔1908年版，第152頁以下。获得通过的决議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話：

“如果出現了战爭爆发的威胁，工人阶級和他們在議会里的代表們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牢固的支持下有責任采用他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力設法防止战爭的爆发。这种方法自然应該随着阶級斗爭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張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战爭仍然爆发了，他們的責任就是設法迅速制止战爭以及尽他們的全力利用战爭带来的經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喚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資产阶級的統治。”（譯文引自福斯特著《三个国际的历史》中文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35—236頁。）

那种分崩离析的奇怪局面。委員們代表下列各派：以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維克，他曾在1912年和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德以及犹太崩得組成反对列宁的联合战綫"八月联盟"；以卢森堡为代表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一派；普列汉諾夫代表他自己的一派；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个左派集团"前进派"；以翁施利希特和哈涅斯基为代表的波兰另一派"华沙集团"（站在列宁一边）；此外还有列特社会民主党人（他們支持布尔什維克）。布尔什維克派遣印涅薩·阿尔曼德为代表；不論是列宁或季諾維也夫都沒有离开苏黎世这一事实，就足以說明他們对会議的目的所抱的看法。在布尔什維克及其支持者棄权的情况下，会議决定以国际局提出的一个綱領为基础团結一切派别，为执行这一决議，将召开一次全党代表大会。会議責成阿克雪里罗得和卢森堡"負責起草一份宣言，强調团結的必要性，反对布尔什維克的分裂政策。这样，列宁派就被完全孤立……然而，几星期以后爆发的世界大战，却使得如此开始的团結努力化成了泡影"①。这种团結如果成功的話，实际上会把布尔什維克从国际开除出去，因为列宁决不会同意让他的組織去受一个敌对多数的紀律处分——卢森堡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接受起草宣言的任务时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

这种組織冲突的尖銳性，反映了列宁和卢森堡之間的意識形态爭执的尖銳性，两人对于他們所处的时代的一般分析是一致的：他們都认为，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通过資本主义制度的逐步演变赢得胜利，而必須面临一个帝国主义竞爭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战爭的时期。但是，关于帝国主义眞相的这种一致看法，并不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有哪些主要特征或者怎样才能最好地以社会主义代替帝

① 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附有丹所著的附录：《1908年以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柏林1926年版，第268頁。

国主义的問題上，他們的观点有任何共同之处。卢森堡去世过早，未能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然而她的思想不仅大大影响了德国共产主义，而且一般說来对于和布尔什維克理論有所妥协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深深有感于德意志帝国的侵略精神及其对殖民地的追求，卢森堡认为二十世紀的主要趋势就是一切資本主义国家殘酷地寻找国外市場和新的投資地区。以英国把埃及和印度殖民地化为典型，她分析了在一种有利于資本积累的环境中、以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新工业的形成过程。只要世界还能向資本家提供这种剝削的可能性，竞爭者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內延緩它們的崩潰；但是，当一切非資本主义国家的民族都已經被吸收进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以后，資本积累就要达到終点，資本主义社会就要发生崩潰性的世界大战，这場大战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群众性罢工，动員整个工人阶級来加以抵制。不过，卢森堡并沒有把这种关于前途尙难确定的理論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現实联系起来。①

列宁不同意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以霍布森和希法亭的理論为基础，列宁发展了他們关于資本主义国家扩張欲望的思想，断言重新分割世界的斗爭已經开始。1872—1914 年的和平时期已經消逝；欧洲——列宁在1913年写道——成了“一个火药桶”。他认为，壟断資本主义力图控制一切生产因素和一切市場，而只有占有才能保证完全控制。唯有通过无产阶級有意識地干預，在伴随着一系列世界性战爭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夺取政权，才能結束这个腐朽的时代。世界大战——这在列宁看来已經迫在眉睫——

① 罗莎·卢森堡：《資本积累：关于帝国主义經济的一篇論文》，柏林 1913 年版。

是一切政策都必須据以作調整的基本現实环境。①

特别要提一提的是，列宁把自己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和自己的党的綱領跟俄罗斯帝国的扩張欲望——征服高加索边境各民族的企图、扩張到中国境內的計划、为統治巴尔干打掩护的泛斯拉夫主义等等——結合起来。沙皇俄国的內部矛盾变得愈尖銳，它就愈需要新的冒險、进一步的征服和更多的領土；因为只有战爭才能提供再次延緩国內变动的希望。从帝国主义战爭即将爆发的这种預測出发，列宁推論出他的民族自决权学說，他认为这是反帝斗爭的重要武器。

圍繞着这一自决权問題，特别是圍繞着波兰独立的特殊問題，列宁和卢森堡之間进行了許多年的爭执。卢森堡反对民族自决，认为它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現。卢森堡对于遙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决定了她对于目前許多問題的政治态度。在她的心目中，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以充分发展的計划經济为基础，在这样一种完美的社会里，民族仇恨将不复存在而只剩下文化上的差别，民族差異将不再是社会結构中的因素，社会結构将完全由一个个的經济区域来表現。在这种看法上，影响了卢森堡的不仅是那些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永远激动人心的学說，不仅是馬克思对資本主义制度下民族界限的人为性质所作的批評，而且，她作为一个波兰国际主义者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斗爭、对他們那种狹隘眼光的反对，也对她起了一定影响。在民族政治平等权这样一个关鍵問題上存在的这种分歧表明，我們如果像一般所做的那样，把专制社会主义者列宁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相提并論，那将是多么危險。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彼得格勒1917年版。并可参看瓦尔加与門德尔森合編：《关于弗·伊·列宁：〈帝国主义論〉的新材料》，紐約1940年版。

最能說明她的立場的是波兰党在战爭爆发两年后通过的对她的立場加以夸大的一項决議；① 在許多場合下，特别在战时表現得最明显，卢森堡本人都用較为一般的說法表达了同样的政策。波兰社会党人的前提是，金融資本主义扩張为更大的国家組合，即使在这样做时不考虑有关居民的民族特点，归根到底也是"在經济上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帝国主义压迫的这些野蛮形式，通过資本主义世界內的政治和經济集中，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所以，在充分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恢复过时的形式，即不能为重建旧的民族国家、也不能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斗爭。他們的口号必須是"廢除国界！"在目前，反对民族压迫的斗爭只能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总斗爭的一部分，而在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中，民族願望将不再成为問題。

"我們沒有理由认为〔决議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还会具有經济-政治单位的性质。根据一切預測，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实体——就这样一种东西还会存在而言——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疆界，民族到将来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和語言集团而已。因此，决定这一疆界划分的将不仅是充分发展了本身力量的个别民族（就像在'民族自决权'原則下将要做的那样）；一切有利害关系的公民都有权参与决定。把'自决权'的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做法，表明了对社会主义联邦的完全誤解。"②

在毫无商量余地地肯定了由世界經济委員会統治的世界联邦这一种前景以后，提綱的作者們进一步声称，民族自决权是得自第

① 《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提綱》，俄屬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員会通过，发表于該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1916年4月第2号；轉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19卷，維也納1930年版，第528頁以下。

② 参看《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結》。《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6頁。——中譯本編者

二国际的遺产，它的含糊性质可能导致保卫資本家的祖国。他們用自己的国家波兰做例子，說明民族主义的問題已經变得如何过时：

“世界大战证明，在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的时期已告結束……在被瓜分的波兰各部波兰資产阶級的态度，显著地表明民族国家的理想在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时代錯誤，证实了俄屬波兰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独立潮流的立場是正确的。波兰无产阶級从来也沒有把爭取民族独立当做自己的目的……在今天，从世界大战的經驗来看，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爭工具，将不仅是一种危險的烏托邦，而且是对于社会主义各項最基本的原則的否定。”

当列宁对这种观点展开論战时，他十分仔細地考虑到了卢森堡的国际主义，考虑到了她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者时具有的困难。但是在主要問題上，他是毫不含糊的；保卫少数民族是他的革命理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他反对封建俄国的斗爭中，他继承了十九世紀革命民主主义的傳統，并且把这种傳統化成了自己的东西。

在一篇总結了二十年来关于这一問題的爭論的文章中，列宁首先指出，放棄民族自决权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經济分析，完全忽視了国家和国家政权的問題；有組織的經济只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列宁引证了恩格斯的《波河和来因河》这本小册子里的話，指出欧洲事实上存在着自然疆界，这些疆界是在許多世紀中通过語言和民族感情形成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富有生命力的大国吞沒了許多較为弱小的国家，以致早期的自然疆界現在已經消失。

“反动的帝国主义資本主义要把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許多兼并的地方，留給代替它的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在恢复和

彻底实行充分的民主时，难道会拒絕按民主方式确定国界嗎？难道不顧意考虑居民的'感情'嗎？只要提出这些問题，就能使人看到，我們的波兰同事是怎样从馬克思主义滚向'帝国主义經济主义'的。"①

列宁举出的主要例子是他自己的国家：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57%，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紀性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还沒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絕对必須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俄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芬兰、波兰、烏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等等，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滿了帝国主义保皇派和帝国主义資产阶級血污的走狗的行动。"②

他們在民族問題上的分歧，显示了这两个革命偉人之間的本质区别——列宁总是注視眼前的問題、注視实际可能性和应該做什么；而卢森堡則总是超过現实向社会主义的未来眺望，然后再从这种远景中返回目前。③

---

① 参看《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結》。《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7—318頁。——譯者

② 参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和147頁。——譯者

③ 后来，列宁用下列一段話总結了他和卢森堡一生之間的分歧：

"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問題上犯过錯誤；在1903年对孟什維主义的評价上犯过錯誤；在資本积累的理論上犯过錯誤；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諾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張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联合的錯誤；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犯过錯誤(1918年底1919年初出獄后，她已經糾正了自己的大部分錯誤)。虽然犯了这些錯誤，但她始終是一只鷹。"

参看《政論家的短評》。《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頁。——譯者

第二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当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罗曼諾夫王朝于1917年2月宣告結束，在統治欧洲的各王室中第一个倒下去的时候，它的死亡是由形形色色的疾病(其中有的几十年来就一直在腐蝕着它的內臟)联合造成的。导致沙皇被推翻的多种多样的因素之一是人們对領导战爭的情况感到不滿，同时又愈来愈认識到沙皇——部分是由于害怕如果让德国敗得太不可收拾可能对帝俄发生不利影响——不可能进行一場有效的战爭。

俄国对战爭的貢献已經使协約国失望。在1912和1914年間，协約国的外交家們曾經向本国的首都报告，說俄国拥有一支"所向无敌"的軍队，但是他們作出这种判断的时候，未免过多地以那些每半个月在彼得堡檢閱一次、服装整齐漂亮的哥薩克部队为依据了。俄国的巨大人力資源幷无效用，因为他們把一般生活的腐朽社会秩序带进了軍队；不管士兵們怎样勇敢，許多将軍們如何韜略高深，俄軍仍然沒有能摧毀德国人。軍队变得不听話了。

1917年2月，也就是美国的参战使德国的失敗成为定局的两个月以前，俄国政治家中最傾向西方的人采取了使本国得以充分投入战爭的步驟。人們担心如果不除掉沙皇，他可能听从拉斯普庭的意見，正当战局就要发生决定性轉折的时候和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已經作了犧牲，这时如果不实行彻底的轉变，它在战后和約中的正当权益就会被剝夺。发动政变推翻"亲德"沙皇政府的革命家們得到了他們的法国和英国顾問的鼓励。

因此，继承尼古拉二世执政的那些人一致热衷于继續作战，他

們在这一点上得到一些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支持。这就是世界各地的俄国政治避难者陆續归来时的俄国。通过一項最大胆的交换条件，列宁得以乘坐一辆在鲁登道夫亲自护送下穿过德国領土的火車回国。在彼得格勒濃厚的反德政治气氛中，这种安排就像阴影一样籠罩着列宁参与俄国政治的头几个月——1905年以来第一次不是从流亡境地参与政治的几个月。人們时常談起他当时如何粗暴地責备布尔什維克党不坚定的立場，如何推动这个党前进。已經受到削弱的、从許多年地下活动中剛剛露面的布尔什維克干部这时茫无主見，提不出其他明确的方案来代替列宁的直截了当的綱領。他从别的社会主义派别那里遇到坚决的抵抗，但是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維克派却固着于虽然散漫可是强大有力的和平潮流之中。1917 年 3 月 10 日选出的工农兵代表苏維埃在彼得格勒开会，于 3 月 27 日呼吁立即結束战争："俄国民主派号召欧洲各国人民統一采取有利于和平的决定性行动。"

推动列宁准备发动布尔什維克政变的，是他对于下列情况的肯定，即革命正以更大的速度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发展；在每一个关鍵性的时刻，他拿出来的决定性論据总不外是零星几条关于德国反战运动的最新消息。他以李卜克內西在議会中投票否决軍事預算的事实为例說："我认为，宁可像李卜克內西那样一个人反对一百一十个人"，① 也不要同孟什維克和民粹派妥协。五个月以后，当列宁和他自己党內一个强大的反对派作斗争时，他再次提到了德国的反战运动。在 11 月 7 日事件发生前夕举行的中央委員会討論中，他說道："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把武装起义提到

① 参看《无产阶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2 頁。譯文是："宁可像李卜克內西一样只剩下两个人……也不能有一分钟同組委党、同齐赫澤和策烈铁里統一。"——譯者

日程上来了。"[①] 他在10月29日又說："既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也弄到海軍中发生起义的地步，这就表明那里的事情已經有了很大的进展。"[②]

布尔什維克政变在倫敦和巴黎引起了恐慌，人們主要害怕的并不是俄国的社会变革(关于这一点，当时还沒有具体了解)，而是担心列宁会謀求和德国立即媾和。当时，协約国总部仍然过高估計德国軍队的力量，把它的动員和未来的战役計划一直准备到1920年。

11月8日，当列宁在苏維埃代表大会上作有关政变(它的成功当时还完全不能肯定)的报告时，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了布尔什維克的和平政策。"首先要做的是采取实际措施实現和平。我們将根据苏維埃政府的条件——不割地、不賠款和民族自决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建議媾和。"[③] 布尔什維克幻想俄国一旦退出战争，就会使大战立即終止。他們希望，在精疲力尽的士兵們的压力下，各国政府将不得不接受他們提出的停战三个月的建議，而在这三个月中，一切基本問題都可以得到解决。

只有同盟国响应这一和平号召；1917年11月26日，德意志帝国表示願意媾和。[④] 在东綫作出安排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样，全部德軍就可以集中到西綫。在准备期間，布尔什維克加强了他們

---

①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会議》。《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173頁。——譯者

③ 遍讀列宁11月8日所作的关于和平問題的报告(《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7—231頁)，未見此段引文。与引文意思相似的字句有："和平問題是現时最紧急、最迫切的問題……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議……立即实現……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領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賠款的和平。"(第227頁。)——譯者

④ "霍夫曼将軍的参謀部当时印行了一种报紙《俄国信使报》，供俄国俘虏閱讀"

的和平宣傳。飞机把印着和平法令和特别向德国軍队呼吁的一篇宣言的傳单投到战綫后面很远的地方。以士兵为讀者的德文版报紙，印数之多在当时达到了駭人听聞的地步——例如《火炬报》的印数为每日五十万份——并且以专用火車运往明斯克、基輔和战綫上的其他地点，在这些地方以卡尔·李卜克內西的名义接近德軍。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中，托洛茨基就在外交部設立了一个新聞局和一个国际革命宣傳局。領导前一个局的是卡尔·拉狄克，他由于长期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被认为是德国問題专家；在后一个局的工作人員中有美国人約翰·里德。季諾維也夫被送往前綫，任务是到中欧去，但是被德国人赶了回来。

单独媾和

1917年12月2日，在他們取得政权还不滿一个月的时候，苏維埃政府的代表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德国代表举行第一次談判，并且作出了临时性的停火安排，这項安排在12月15日成为正式休战。这一走向和平的第一步，震惊了已被战争搞得疮痍滿目的欧洲；每一个外交家、每一个将軍和每一个普通士兵都注視着談判从12月延长到下一年的曲折发展。經过三年半的战争，好些帝国和无数生命处于危險境地，这时，出現了經过談判而媾和的前景——或危險——，它将使交战双方的巨大野心都完全落空。

布尔什維克并不指望德軍会大发善心，但是他們认为，和平情緒普及全欧，在同盟国各国人民中間尤为强烈，在这种情緒的压力

(托洛茨基:《自傳》,紐約查尔斯·斯克里布納兄弟公司1930年版,第363頁)。据托洛茨基說，在初期，德国总参謀部在这个宣傳刊物上談到他本人和其他布尔什維克的时候,“帶着称贊和亲善的語气”。

下，德国总参謀部将被迫接受妥协。如果他們这样做了，那么，一項不割地不賠款的結束战爭的条約就会顚复整个战爭大厦，使协約国的外交家們也不得不走进談判室来。托洛茨基代表苏維埃政府发表了一項声明，把单独媾和的責任推到那些继續进行战爭的人們的身上。他說，布尔什維克认为自己沒有理由为那些把俄国拖入战爭的秘密条約所束縛，苏維埃政府成立后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这些条約的內容公諸于世。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彼得格勒电訊社的广播这样說道，"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須了解：在俄国工农的綱領和德国資本家、地主以及将軍們的綱領之間，存在着一种不可調和的矛盾……德国、奧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工人們，必須以他們自己的綱領——各国工人之間团結合作的綱領，来代替本国統治阶級的帝国主义綱領。"

在1917年12月22—28日的一周間，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第一次举行和平談判期間，布尔什維克向慘遭兵燹、疲憊不堪的欧洲提出了一項簡单而使人充滿希望的建議：撤退一切軍队、保证避难者回国、在一切有爭执的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不割地、不賠款。出席布列斯特談判的德国代表理查·馮·屈耳曼說，他需要退席考虑一下这項建議，但又暗示建議不会立即被拒絕。在談判进行中途，同盟国对协約国輿論发动一次进攻，发表了它們著名的"圣誕节宣言"：它們贊同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只要战爭立即結束而且一切交战国都参加談判。协約国——的确如德国所希望的那样——沒有理睬这一呼吁。

与此同时，俄国一天天陷进了內战。沙皇的将軍們——卡列金、科尔尼洛夫、阿列克塞也夫——正在集結軍队。在烏克兰，拉达——二月革命后建立的立法机构——采取的綱領既宣揚烏克兰

民族主义，又激烈反对布尔什維克挑起的农民起义。11月20日，拉达宣布成立烏克兰人民共和国；在布列斯特会議上，烏克兰的代表霍魯鮑維奇宣布，經过二百五十年的时間，烏克兰共和国現在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他尽量利用德国人反对苏維埃政府的計划为自己剛成立的国家謀取好处。烏克兰日益紧張的局势逐步发展为一場錯綜复杂的外战和內战。12月17日，苏維埃政府向拉达发出最后通諜，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內得到滿意的答复。通諜"再次确认"①烏克兰和帝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有同俄国分离的权利，但是布尔什維克坚决要求它停止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的反革命軍队"。②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統提出了以民族自决权为中心的"十四点"計划。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議会議員发表了一篇宣言，攻击"已經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公开表明"的德国战爭目标：

"过去，我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担保：德国政府只是要保卫帝国的疆界，它无意于兼并别国的土地。現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再相信这种說法了。

德国想兼并俄国的領土……如果德国成功地締結了一項征服俄国人性质的和約，这对于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亚人来說，自然是一种不幸。但是，这对于我們自己来說将是更大的不幸。結果将会延迟普遍和平的到来，造成新的威胁和复仇願望，使我国的軍备更加扩張，反动势力更为加强……只有不割地、不賠款并且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締結的和約，才能挽救我們。"③

一月中旬，在維也納和柏林爆发了群众性罢工。在奧匈帝国

①② 参看《告烏克兰人民书并向烏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8、340頁。——譯者

③ 轉引自犹大·馬格尼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俄德談判》，紐約1919年版，第63—64頁。

境內人們的和平願望特別强烈。維也納两个最大的工厂、即戈尔茲工厂和兵工厂的工人們，因为已經有好几天沒有分发面包，在上班时停止了工作。他們从一个工厂走向另一个工厂，几小时內就停頓了全部軍事工业。这种“面包罢工”迅速变成了和布尔什維克团結起来的示威。不过，使布尔什維克大为失望的是，后来由于对面包配給进行了調整，这次运动不久便宣告結束。

在談判的第二阶段，托洛茨基代替阿道夫·越飞担任布列斯特的俄国代表团团长。以充分支持俄方的民族自决綱領为名，馮·屈耳曼和馬克斯·霍夫曼将軍要求在波罗的海沿岸諸国、在波兰和烏克兰成立独立政府——把它們都置于德軍的保护之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預备談判的意义在于，”苏維埃政府在1月22日广播的《告全体人民书》中說，“它們剝下了德帝国主义从民主衣橱里暫时借来披一披的虛假外衣，使它暴露出私有者和資本家企图吞并别国領土的狼子野心。”

面临着俄国要被宰割的現实，布尔什維克党內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布哈林和拉狄克建議对德国进行一場革命战爭，这样就会鼓舞德国工人，使他們和俄国同志携起手来，起义反对他們的政府。这一意見为当时还在政府中的左派革命社会党人①所支

① 社会革命党是由郭茨和切尔諾夫在1901年建立的，是民粹派农民革命团体的后継者，在反对沙皇統治的斗爭中沿习着民粹派的个人恐怖主义傳統。在战爭时期，从这个党中发展出一个左派，二月革命以后，这一派在瑪丽亚·斯皮里多諾娃、鮑里斯·卡姆柯夫和馬克·納坦松的領导下，拒絕和資产阶級政党进行任何合作。在1917年11月的第二次苏維埃代表大会上，193名社会革命党代表中，左派占169名，他們在好几周內力图說服占少数的右派和苏維埃政府合作，但未能获得成功。只是在这一政策失敗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才加入政府；按照在11月30日达成的一項協議，每一个人民委員会里都要包括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緊接着，在12月2日，这个派别就单独成为一个政党。

在布列斯特危机期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3月16日退出政府，并且在四个月后发动了一次反政府的暴动。他們被驅入地下后，党就逐漸瓦解，出現了革命共产主义派和民粹共产主义派等小集团。它們主張和苏維埃政府合作，后来被并进了布尔什維克党。

持；国內的許多反布尔什維克集团也欢迎这种立場，他們看到德国提出的媾和条件复活了俄国人的民族主义，希望俄国能站在协約国一边把战爭继續下去。

纵然如此，列宁仍然主張立即接受德国人的条件。在一段时間中，他在党內处于沒有希望的少数地位。他的論据首先是，根本不可能再用原来的俄国軍队继續作战了，这支軍队已經从前綫潰散下来——潰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布尔什維克宣傳的影响。这些穿制服的农民只关心一件事：赶快回家去，好得到自己那份当时正在分配的土地。对苏維埃政府肯定不怀有什么忠誠的軍官們則举棋不定，他們在民族主义感情的影响下想抵抗德国人，又想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来削弱俄国的新政权。“我們的軍队已經潰散和复員，”列宁宣布說，“而且根本拒絕作战。但是在迪納堡，俄国軍官又带上肩章大搖大摆了。”①

、托洛茨基利用了談判桌提供的讲坛号召欧洲起来革命以后，从布列斯特回国。这时候，他也认識到已經无法用俄国旧軍队进行任何战爭。托洛茨基的折衷口号“旣不和，也不战”，一方面同德国的条件在全国引起的民族主义的憤怒和頹丧情緒作了妥协，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采取另一种革命政策的道路。在1月21日的党积极分子会議上，“拥护革命战爭的人得三十二票，”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中写道，“列宁得十五票，我得十六票。”

“可是，这些数字〔他继續写道〕幷不能眞正表明当时党內的情緒。在党的上层，如果不說是在群众中的話，‘左派’甚至比在这次会議上的力量还要强大。正是这一事实使我的口号暂时占了上

① 此处系按原文翻譯，《列宁全集》的相应部分稍有不同，譯文是：“……我們退却的和复員的軍队根本拒絕作战……在得文斯克，俄国軍官已經戴上了肩章。”（《和平还是战爭？》。《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頁。）——譯者

風……

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領导机关中，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两百多个地方苏維埃……表明了它們在和战問題上的观点。在它們当中，只有两个大的苏維埃……从記录上看是主和的……除去通过党內分裂或政变而外，沒有其他办法可以实現列宁的主張。”①

2月9日，同盟国和拉达单独签訂了和約，第二天，俄国便根据托洛茨基的口号中止了談判。“在拒絕签訂割地和約的同时，俄国一方宣布对德战爭状态业已結束。”

2月15日，即休战期結束的前三天，德軍沿东綫推进。这使得党內的爭执达到頂点；布哈林派开始像一个独立的党那样行动。2月18日，托洛茨基在这一天改变了他的观点而支持列宁，并且提出了辞去外交人民委員职务的申請书，在这以后，中央委員会才投票表决接受德国的条件。

“我非常怀疑，即使付出了完全投降的代价，是否眞能获得和平。但是列宁决定把有条件投降的主張試驗到最大限度。他在中央委員会并不拥有多数，而我的投票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决定棄权，以保证他能得到一票多数。在解釋棄权的理由时，我明白地說出了这一点。我的考虑是，假如有条件投降还不能为我們取得和平，我們就将在敌人强加給我們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斗爭中，整頓我們党的队伍……

在2月22日的中央委員会会議上，我报告了一个情况，即法国軍事代表团轉达了英法两国願意帮助我們对德作战的建議。我个人表示同意接受这一建議，不用說，当然要以我們的外交政策完全保持独立为条件。布哈林堅持我們不可以和帝国主义者达成任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382—383頁。

何协定。列宁給了我大力支持，結果，中央委員会以六票对五票通过了我提出的决議案。就我現在所能記得的而言，列宁用这样的話口授了决議：'授权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助来对付德国强盗。'他总是喜欢用一些不給人以任何怀疑余地的詞句。

在我离开会議以后，布哈林在斯莫尔尼宫的长廊里追上我，抱住我开始啜泣起来。'我們在做着什么事啊？'他叫嚷道。'我們正在把党变成一个大粪堆！'布哈林一般是容易掉眼泪的，并且爱用生动的說法。但是，这一次形势确实变得很令人伤心。沉重的打击眼看就要落到革命的头上了。"①

德軍继續向前推进。布尔什維克政府宣布对"德国的資产阶級和帝国主义者"进行革命战爭，并且命令在撤退时銷毁一切财物。

2月23日，德国新提出的媾和条件在彼得格勒被接受。这些条件要求把得文斯克、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实际割让給德国，把阿納托利亚割让給土耳其，承认烏克兰政府，从芬兰和烏克兰撤退，立即使俄軍复員等等。而且，德方还規定"上述条件必須在四十八小时内被接受"。

就在同一天，中央委員会議决建立紅軍。从此以后，2月23日便作为"紅軍节"来庆祝。

列宁相信，要保持住年輕的苏維埃政府的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接受德国的条件。結果，这些条件被正式接受了。在德国的新条件被接受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在2月24日的会議上，中央委員会討論了去布列斯特代表俄国签訂条約的人选問題。格奥尔格·契切林和列夫·加拉罕被提名，同时，列宁說，② 为了继承上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389—390頁。

②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会会議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頁。——譯者

屆代表团的精神,他提議阿道夫·越飞——托洛茨基的密友、和約的反对者——也去。越飞坚决不肯去,于是列宁收回他的提名,建議越飞不以代表而以顾問的身分去布列斯特。托洛茨基指出,这次去布列斯特只是在和約上签字,那里幷不需要越飞。接着,索柯里尼柯夫提名季諾維也夫做代表,季諾維也夫于是反过来提名索柯里尼柯夫。列宁則建議他們两个人都去。針对这一建議,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不能去,如果命令他去,他就退出中央委員会。列宁請同志們不要激动。

会議討論了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員职务的申請书。列宁建議"中央委員会請托洛茨基同志把自己的申請书擱到中央委員会下次会議即星期二(修正: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国以后)再提出"。[①] 这一动議在三票棄权的情况下被通过。在表决以后,托洛茨基声明,他已經提出自己的申請书,沒有被接受,因此他感到自己只得不参加領导机构的会議。列宁建議托洛茨基在人民委員会解决外交問題时缺席,但是出席所有其他的会議;这項动議被通过了。

洛莫夫、烏里茨基、斯米尔諾夫、皮达可夫等——他們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派的成員——辞去了他們的党和苏維埃負責职务。列宁提出下列建議:"中央委員会請提出申請书的同志把自己的决定延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国以后再提出,幷請他們一起討論一下中央委員会这項决定。"[②] 列宁指出,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們可以在大会上使自己的观点获胜。通过对这一动議提出的修正案,列宁让中央委員会向这一集团保证,一定把他們的申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会会議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42頁。——譯者

請书在《眞理报》上发表。列宁的这些建議都被通过。①

1918年3月3日，契切林作为俄国代表团团长签訂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②但是，在保护当地人民不受匪徒騷扰的借口下，德軍继續推进，于是，布尔什維克党內的爭执再次达到高潮。3月5日，也就是条約剛签訂两天以后，布尔什維克把首都从容易受到攻击的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因为他們害怕德国人会攻占彼得格勒，把它作为保证条約得到执行的抵押品。到3月20日，在烏克兰推进的奥德軍队已經占領了基輔和敖德薩，土耳其人夺回了特拉布松和埃尔佐魯姆；同盟国完全控制了黑海。如果布尔什維克再次和德国人决裂，协約国打算和俄国重新联合。誰也沒有把布列斯特的条約当做最后的决定，德国和协約国双方都譴責苏維埃政府背信棄义。③

---

①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会会議上的发言》。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苏黎世1934年版，第306頁以下。

这一部分根据委員会会議速記記录整理出来的报导，可以和局外人的印象对比一下，譬如說，和当时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布魯斯·洛克哈特的印象加以对照："我記得契切林和我談过苏維埃內閣开会的情况。通常是：托洛茨基提出一項建議。建議遭到另一个人民委員的激烈反对。接着是无休止的討論，而在所有的时間內，列宁总是把一个本子放在膝盖上做着笔記，全神貫注在他自己的某項工作上。最后，有人会說：'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吧。'于是列宁抬起头来，用一句話說出他的决定，結果就万事大吉了。"（布魯斯·洛克哈特：《英国間諜》，紐約1933年版，第236頁。）

② 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割給德国，阿納托利亚諸省和埃里溫、卡尔斯、巴士姆等地区割給土耳其。俄国同意从烏克兰撤出自己的軍队并承认烏克兰人民共和国，撤出芬兰和阿兰群島，并把阿兰群島上的炮台拆毁。虽然条約規定"締約双方相互放棄对战費……与战爭損失的賠償"，俄国却必須付出三亿金卢布的"賠款"。此外还有各种附加条款，規定了俄国和四国同盟中每个国家的經济关系。

③ 协約国方面盛傳，有一个德国监察委員会駐在彼得格勒，从幕后控制布尔什維克的外交部。当貝特洛将軍率領一个法国軍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他向托洛茨基表示願意帮助訓练俄国軍队，因为他們如果不这样做，德国軍官就会担当起这項工作。另一方面，德国人也譴責苏維埃政府，說它欢迎英国軍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参看洛克哈特：《英国間諜》。）

在3月6日至8日举行于莫斯科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两个派别之間的斗爭以更为激烈的程度继續进行。在一篇語气尖銳的发言中，列宁說明了他的主要論点：对德国作战是否可取的問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俄国軍队的情况已經使这一战爭成为不可能。他指出，签訂和約虽然沒有能遏止住德国人的进攻，却挽救了彼得格勒免于陷落。"我們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續多久，我們要設法抓住这个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①

从二月以来，俄国革命一直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是現在却必須准备迎接——列宁說——"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失敗。"②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全苏維埃国家（即使它已經被大大削弱了），使它成为在一个更幸运的时刻重新前进的起点。必須把苏維埃政权已經潰散的軍队加以整頓和集中組織起来。建立紅軍的决定必須执行，因为这是欧洲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最終保证。时机对苏俄是有利的，因为欧洲正在一天天接近革命的大爆发，目前需要做的只是忍耐、坚持，直到那个时刻的到来。"任何人都不知道——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将要发生些什么，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約束，不得不在几条战綫上作战。霍夫曼将軍的行动是由三种情况决定的——他必須消灭苏維埃政权，他在几条战綫上作战，还有，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和增长。"③ 但是，霍夫曼"明天"就可能夺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列宁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不仅反对布哈林領导的左派共产

---

①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82頁。——譯者

③ 参看上引书，第95頁。——譯者

主义者对之完全拒絕的立場，而且反对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等人試图使之削弱的修正。列宁把自己的观点从党代表大会带进了几天以后、即3月15—17日召开的苏維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反对他的不仅有那些在党紀束縛下滿腔憤懣的布哈林派，而且有非常活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們激烈地反对批准和約，以致退出了联合政府。在他們看来，沒有比坐視德国人一步步推进更为愚蠢的做法了，因为这种推进不仅意味着苏維埃政权的結束，而且意味着一切革命組織都将被消灭。

左派共产主义者

根据和列宁所提的相同的基本前提，即欧洲正处于革命危机的边緣，时机对苏維埃政府是有利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結論。分析的主要差異之点，就在于对同盟国的实际力量估計不同。他們认为，即使霍夫曼夺取了莫斯科，这也将是曇花一現的胜利，因为装备精良的美国生力軍已經赶到战地，协約国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德国打敗。德意志帝国面临崩潰，奧匈帝国也瀕于解体。这些可以肯定預料到的历史事实，将在中欧造成一个空前未有的革命良机，而俄国的任务就是要助长这种机会，准备和那些将要从垂死欧洲的漫天烽火中涌現出来的革命者合作。强大的德国軍队——正是由于它可能向莫斯科推进，才使得这一討論趋于激烈——不过是外表吓人，明天就会在协約国的进攻下一敗塗地。

左派建議进行一种新型的战争——在敌軍的后方建立由工人和貧苦农民組成的游击队，他們将利用机关枪加《共产党宣言》进行战斗。让德国人向前推进吧，他們越深入俄国，越肯定要被消灭。包圍和騷扰他們的游击队将在战斗过程中壮大，从农村中吸

收新队員。布尔什維克可能失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但他們将以比过去无限强大的面目出現，这不仅是由于創建了流动的共产党軍队，而且是由于傳播了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終胜利的强烈信心，資产阶級即将遇到的巨大災难使这一胜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①

利用这一策略——左派共产主义者堅持說——就会使上述不可避免的轉折点最迅速地到来。同俄国单独媾和将使德国总参謀部得到暫时的稳定。如果不給它这种机会，就能打消德国群众中的一种幻想，即可以通过有秩序的和相对有利的談判結束战爭。这样，軟弱的德国革命干部就会得到鼓舞，更加努力地进行斗爭，更早地发动打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德国将軍們就会丧失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点自信，而对他們来說，如果想保持他們在战时树立起的統治地位，保持自信在战敗时比在战胜时是更为迫切需要的。

和所有的布尔什維克領导人一样，左派指望一切国家的軍队之間能普遍地化敌为友。"各国无产者，团結起来！"的口号，得到了"各国士兵們，团結起来！"这句口号的补充。当时，尽管交战国士兵之間有許多孤立的联欢事件，还从来沒有出現过群众規模的普遍友好；这一事实至少部分是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造成的。在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看来，如果沒有签訂这个和約，俄軍士

---

① 在另外一些环境下，左派的这些战术已經在許多地方奏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南斯拉夫，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希腊，在1931年以后的中国。毛澤东已經談过，通过把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結合，他怎样創造了一支新型的流动农民軍。"我們已經在一种可以称之为軍事共产主义的制度下面生活了二十年……根据这种制度，軍政人員都不領薪金，他們吃的粮食一部分靠捐稅、一部分靠共同生产来解决。'用这种方法，'刘說'我們可以养活两三百万軍政人員，而不会让老百姓負担过重。依靠这种制度，我們可以把战爭打二十年可以一直打到最后胜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澤东思想》，載《美亚》杂志，紐約1947年6月，第11卷第6期，第161—174頁。）

兵和东綫上正在瓦解的德国軍队的士兵普遍地化敌为友之后，就会产生由俄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組成的国际纵队，把革命带到他們各人的本国去。按照这种恢宏的想法，欧洲将从国际規模的內战中，作为一个由地方委員会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組成的联邦出現于世界面前。

卡尔·考茨基、魯道夫·希法亭和罗莎·卢森堡等人，早就預見到了布尔什維克的实驗将要带来某些弊端，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左派也曾表示过类似的忧虑，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布哈林曾担心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对新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会严重得使革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們一旦放棄积极的无产阶級政策，工农革命的成就便会僵化为具有小資产阶級經济关系的国家資本主义制度。那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事实上就会成为保卫受国际資本影响的小資产阶級祖国……

大工业不是从部分国有化过渡到普遍社会化，而是主要地組成为从外表上看像是国营企业、其实是由工业巨头領导的大托拉斯。这样組織起来的生产提供了向国家資本主义演变的社会基础，而且事实上就是走向国家資本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工厂是按照資本家广泛参与和半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原則进行管理的，所以和它們相联系的劳动政策自然会是采用劳动紀律（像右派布尔什維克所提議的那样）、計件工資制、延长工作日等等。

由此开头，国家管理形式的发展方向便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人民委員的統治、取消地方苏維埃的独立、事实上放棄自下而上治理的公社国家类型。”①

---

① 《“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綱》，轉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627頁以下。

虽然列宁在苏維埃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另一个胜利，事情絲毫也沒有得到肯定的解决。在德国人继續推进的情况下，党內外主張进行革命战爭的人变得越来越狂热了。外战和內战正在烏克兰熾热地进行着，在那里，德国人已經解散拉达，扶植了斯柯罗帕茨基統領。烏克兰谷仓中的粮食正被拿去喂养德軍的事实，使民族主义者憤怒万分，从而更加激烈地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面临着社会革命党人既代表不滿的农民又代表民族主义的憤怒情緒这一局面，共产党（这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采取的新名称）向一党专政摸索道路。

按照他們的悠久傳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以一系列的恐怖阴謀对苏維埃政府展开了斗爭，企图建立一个能够和德国重新开战的政府。他們說，列宁的政府不是无产阶級专政，而是米尔巴赫（德国大使）专政。6月20日，宣傳人民委員沃洛达尔斯基为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所暗杀，一个月来日益紧張的局势达到了高潮。

苏維埃政权的核心更加縮小了，在烏克兰、在頓河、在北高加索、在西伯利亚、在伏尔加河，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圍。莫斯科挤滿了难民，特别是来自烏克兰的难民，他們到处叙述着自己在德軍占領下的悲惨遭遇。

6月24日，在沙皇俄国最偉大的革命家之一瑪丽亚·斯皮里多諾娃的領导下，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議。会議記录上这样写道：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在研究了共和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后决定：为了俄国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必須立即結束布列斯

（此段系按原文翻譯。遍查中文本《列宁全集》有关部分，特别是第27卷第299—329頁《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产阶級性》这篇专門批判該提綱的文章，并未查出这段引文。但引文中的各个論点，如托拉斯問題、国家資本主义問題、劳动紀律問題等，列宁都有所提及，并对之作了深刻的批判。——譯者）

特-里托夫斯克条約造成的所謂'喘息时机'。

中央委員会相信，組織一系列恐怖行动对付德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切实可行的。考虑到这可能导致和布尔什維克发生違背我党意願的冲突，中央委員会特发表下列宣言：

'我們认为自己的政策只是对苏維埃政府現行政策的攻击，而不是攻击布尔什維克本身。由于布尔什維克可能对我党采取进攻性的反措施，我們决定在必要情况下以武力保卫我們已經采取的立場。为防止我党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起見，决定对我們的新政策作明确而公开的說明，以便此后在苏俄实行国际社会革命的政策。'"①

7月4日，九百至一千名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第五次苏維埃代表大会。馮·米尔巴赫伯爵和协約国的观察員們，一起諦听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維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問題上的激烈爭論，結果，和約終于在会上被批准。与此同时，建立紅軍的計划也得到批准。

"从一开始，空气就极度紧張。开幕那一天全是由次要的代表发言。这些发言都严格地遵循着党的路綫。布列斯特和約、貧农委員会和死刑，是受攻击的三大对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完全反对这三項措施。他們举出德国人在烏克兰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

① 轉引自斯坦堡:《革命恐怖主义者斯皮里多諾娃》，倫敦 1935年版，第208—209頁。瑪丽亚·斯皮里多諾娃出身于坦波夫省的一个中产阶級家庭，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6年1月16日，二十一岁的斯皮里多諾娃变成了举世知名的革命人物，这一天，她执行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对卢热諾夫斯基将軍作出的死刑判决。她扮成一个女学生模样，把手枪藏在皮手籠里，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車站暗杀了那个将軍。她当場被捕，并且遭到两个哥薩克軍官的奸汚和非刑折磨，但是，她立即变成了一切反沙皇集团所崇敬的女英雄，警方慑于她迅速增长的声誉，沒有敢判处她死刑。1917年，她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在革命初期具有巨大影响。她在1918年7月事件以后被捕；在1935年傳出的最后消息是，她在烏拉尔过着流放生活。

罪行，作为和約必須廢除的理由。布尔什維克则处于答辩的地位。"①

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执行了他們对威廉·馮·米尔巴赫伯爵宣判的死刑。在全俄肃反委員会("契卡")中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雅各·布留姆金（后来成了布尔什維克和托洛茨基的秘书），利用他的身份证混进德国大使館，借口要当面告訴大使一項暗杀他的阴謀見到了米尔巴赫。当米尔巴赫問他暗杀者打算怎样动手的时候，他回答說"就是这样！"說着便对米尔巴赫开了枪。他从窗戶里逃出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房間里擲了一个炸彈。②

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发动政变的信号；他們占領了电报局，向全国发出布尔什維克即将垮台的消息。捷尔任斯基在去該党总部就米尔巴赫遇刺事件表示抗議时被捕，在被拘禁了好几个小时后才得脫身。本来計划在第二天代表大会开会时把所有的布尔什維克領袖逮捕，但是布尔什維克代表到时候并沒有来，大剧院反而被列特部队包圍了。③这粉碎了政变的力量，但是在以后几周內，还断断續續地一再出現过零星的反政府事件。在布尔什維克采取反措施期間，沙皇及其家屬于7月17日在厄加特林堡被处决。7月30日，駐烏克兰德軍司令、陆軍元帅赫尔曼·馮·艾希霍恩被一个社

① 洛克哈特：《英国間諜》，第294頁。

② "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审判证实：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其他同謀者，企图用暗杀米尔巴赫这种办法来破坏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推翻苏維埃政府，逮捕并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維尔德洛夫，使資本主义在苏俄的国土上复辟。"（《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38年版，第39卷，第486頁。）

③ 从此以后，政治局便时常担心敌人可能通过逮捕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办法推翻苏維埃政权。在1938年的审判中，充当了十六年国家政治保卫局領导人的雅果达受到审判，罪状是他在这十六年中一直进行着推翻斯大林的活动。雅果达供认，他知道反斯大林集团曾准备发动政变，在1934年1月逮捕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参看英文版《关于反苏維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法庭审判記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570頁。）

会革命党人暗杀。

流产的社会革命党政变产生了一种和它的本意适得其反的影响：这一政变加强了列宁在党内的威信和党在国内的威信。随着协約国在西綫的进攻和德軍的潰敗日益逼近，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反对不断削弱。在布列斯特談判的第一阶段，从1918年1月至3月，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的时候，由布哈林領导的布尔什維克党內的多数，曾經在共同反对和約的基础上同社会革命党人协調行动。可是在7月，社会革命党人拙劣的政变促进了布尔什維克队伍的团結，同时扩大了在联合政府破裂时已經开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哈林派之間的裂痕。

社会革命党人继續他們的恐怖行动。8月30日，他們暗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員会主席米哈伊尔·烏里茨基，同一天，列宁在离开莫斯科米赫里逊工厂的时候，被一个曾經和斯皮里多諾娃一起坐过监獄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多拉·卡普兰开枪击伤。在发生列宁遇刺这一事件之后，报复措施有了巨大增加；紅色恐怖时期从这一天起宣告开始。

布尔什維克这时已經走得很远，再也不是那个曾經"向全世界工人"播送呼吁书的烏托邦集团了。他們和德国总参謀部签訂了和約；他們失去了孟什維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正在建立一个一党专政制度；他們建立了紅軍和肃反委員会。在踏入两年半的內战时期、当五六个外国的軍队在俄国国土上企图推翻苏維埃政权的时候，布尔什維克不得不日益走向鎮压措施和中央集权的道路。不过，革命第一年的幻想还依然存在；这时还认为，当他們的德国革命战友也挺身而起的时候，就可以恢复原来的种种打算。

斯巴达克派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对于在党內这一重大危机时期表現出来的德国革命形势，布尔什維克所作的估計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在这种估計中，我們看到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間的基本差别，这个差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又具有了首要意义。首先，列宁反对机械地依賴德国革命会及时爆发。他强調指出，德国革命的确是正在成熟，但是不可能指望它会按照固定的日程发展：

"我們知道卡尔·李卜克內西会胜利；我們知道他会来帮助我們，李卜克內西在德国的革命会把我們从一切国际困难中解救出来，使我們不致非进行一場革命战争不可。李卜克內西的胜利将勾銷我們的愚蠢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指望李卜克內西会馬上就取得胜利，这样刻板地依賴迅速得救的机会，那就是莫大的愚蠢。德国革命需要时間。它需要准备、宣傳，在战壕中組織联欢，需要一个发展阶段。"①

針对托洛茨基的論点，即他的"旣不和，也不战"的政策会加剧德国軍队中的反抗行动，从而使德軍总參謀部派不出可靠的部队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这一論点，列宁回答道：

"如果霍夫曼果眞沒有力量派出軍队进攻我們，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对这一点却不能抱什么希望。他会調遣經过特别挑选的、由巴伐利亚富农組成的部队来对付我們。那样一来，他

① 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3頁。

〔此段引文系按原文翻譯。中文本《列宁全集》只有上半段，而且不完全一致：

"当然，李卜克內西的胜利（德国革命成熟和迫近的时候，他的胜利是可能的，必然的）会使我們免除一切国际困难，也会免除革命战爭。李卜克內西的胜利会使我們避免任何輕举妄动的后果。"《論革命空談》。《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頁。

除此以外，遍讀《列宁全集》第26、27两卷中有关布列斯特和約的文章，均未見其他相同的譯文。——譯者〕

只需要用多少部队呢？你自己就說过，我們的战壕里已經空无一人。假如德国人重新打起来該怎么办呢？”①

列宁对布哈林-拉狄克派和托洛茨基的論点都不贊同，他坚持說，推翻德意志帝国政府要比在1917年2月消灭沙皇統治困难得多。俄国主要是一个农民国家，已經被战爭和墮落腐朽的上层阶級弄得民穷財尽，这个阶級甚至对一个沒有經驗的和軟弱的工人运动都无法抵抗。而在德国，革命需要对付的則是一个“以优越的技术装备起来的那种有組織的国家資本主义”，②領导它的是一个自信的和組織良好的上层阶級，它将不惜以极度野蛮的手段保卫自己的利益。

“这头野兽是不会放过任何东西的，”他在霍夫曼把德軍开回烏克兰，重新发动战爭时这样說。在以后的几星期中，当德軍愈来愈深入烏克兰和高加索，劫掠乡村和城市，就地处决一切布尔什維克和其他革命者的时候，不論是列宁、布哈林或任何其他布尔什維克領袖，都一刻也沒有动搖过他們和德国工人团結一致的立場。当机会主义者指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有引起德俄两国工人疏远的危險时，列宁的答复是：德国工人会理解布尔什維克的立場，因为“他們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因为他們已經习慣了文明的生活。”③

在布尔什維克的头腦中，德国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带来“帮助”，不仅仅是减輕俄国革命家正在承当的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負

① 轉引自托洛茨基：《自傳》，第381頁。

② 《論革命空談》。《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頁。——譯者

③ 参看《論疥疮》。《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頁。——譯者

担。在欧洲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中，德国革命对于那种在俄国社会中还有待进行的結构变革来說，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者先取得政权这一事实，并沒有改变这种关系。列宁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俄国的苏維埃还是不完善的，但是“由于我們有巴黎公社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多年发展的历史为依据，因此在建立苏維埃政权的时候，我們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①

社会革命的基地在德国，但德国革命发展速度之緩慢甚至超过了俄国最悲观一派的預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使德国軍队得到的稳定，对于革命来說确实是一个挫折，布尔什維克和德国总参謀部簽訂的和約，也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間引起了普遍的誤解和批評。

最著名地表示了这种批評的是罗莎·卢森堡——这是她和列宁之間很大分歧的又一个例子。卢森堡从来不认为布尔什維克的試驗能长久存在下去。她在1917年11月24日写給路易絲·考茨基的信中說，苏維埃政府单靠它本身是无法支持下去的，这不仅因为落后的經济将会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显得不倫不类，而且也因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些可悲的懦夫，他們会坐視俄国人流血致死。她还說，与其为保卫帝国主义的祖国而生，倒不如在这样一場战斗中死去；就連他們的失敗也会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产生有益的效果。

可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却使她这种同情的悲观主义，一变而为对列宁政策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猛烈的批評；就俄德两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而論，她的情緒这时是低沉的。

从1915年底或更早以来，卢森堡便一直指望德国在軍事上遭

①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頁。——譯者

到失败。她号召无产阶級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失败，可是认为如果要另换一种結局，最可取的一种就是协約国胜利。这是因为如果德帝国主义获胜，它就会奴役整个欧洲，或許还会扩張到别的大陆，这样就会使国际工人运动士气低落、四分五裂。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給了德軍以喘息时机，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的胜利現在又成为可能了。在1918年夏季，她甚至在《斯巴达克通訊》上推测，有可能出現反西方的苏德軍事同盟。

"最主要的是，罗莎害怕布尔什維克可能参与德国的外交把戏，于是，他們把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和約叫做'民主的和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从而博得德国总参謀部的垂青。这样一来，革命家就会堕落成为政客，破坏团結的不信任心理就会被带进革命运动中来。"①

可是，对于她的这种观点，連保尔·列維和列夫·約吉契斯这样亲密的朋友都不表示贊同，因此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卢森堡在獄中写出了她对布尔什維克政策各个基本方面的总評价，以廓清她自己圈子里的这些不同看法。在每一个重大問題上，她都和列宁有基本分歧，她在1918年出獄后所以和列宁合作，无疑是她的党組織对她施加压力的結果。

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旣反映了她从想像出发对无产阶級专政的缺点所作的批評，也反映了她由于身居獄中而未能把握住当时的現实；在这本她死后才出版的小册子中，卢森堡总結了她过去和列宁在一切主要問題上的分歧：土地政策、参政权、制宪議会、专政

① 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行动》，巴黎1939年版，第236—237頁。由于保尔·弗勒利希一心想抹杀列宁和卢森堡之間的爭执，硬說他們的立場基本上相同，他的这部研究作品受到了损害。参看卢森堡：《俄国的悲剧》，載于《斯巴达克通訊》（柏林，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1920年版），第181—186頁。

和民主。①最尖銳的分歧又一次表現在自决权問題上，她猛烈抨击了布尔什維克的“所謂民族自决权，或者叫做——它实际上在这个口号里明显表示了出来——俄国的分裂”。

“民族的分裂願望和趋向竟被带到了革命斗爭当中，甚至由于布列斯特和議竟被提到首要地位，成为社会主义政策和革命政策的口号，单单是这样的事实就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造成了最大的混乱，并且实际破坏了无产阶級在边境地区的立場。”②

卢森堡举出烏克兰作为主要的例子，說明布尔什維克怎样把民族主义冲动带进了阶級斗爭。她把烏克兰的民族主义願望，諷刺地和德国一个說低地德語的地区瓦塞康特相比：

“俄国的烏克兰民族主义和——譬如說——捷克、波兰或芬兰的民族主义都十分不同，其差别在于前者純粹是一种任性、是一小撮在这个国家的經济、政治或心理关系方面都毫无根底的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胡思乱想；这种民族主义是沒有任何历史傳統的，因为烏克兰从来也沒有組成过国家或政府，除去謝甫琴柯的那些反动浪漫主义的詩歌而外，沒有任何民族文化。这完全就像是住在瓦塞康特的人，忽然在某一天要求成立一个操低地德語的新国家和新政府一样！而少数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的这种可笑姿态，通过

①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英譯者伯特倫·沃尔夫，紐約工人时代出版社1940年版。这本小册子首先在1922年于柏林全文出版，有保尔·列維写的序言。在三十年代中期，在巴黎的“斯巴达克派”印行了一种馬塞尔·奥利維埃的法譯本。一般說来，这本小册子在左派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攻击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克拉拉·蔡特金和阿道夫·瓦尔茨基对它作了答复：前者写了《关于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立場》，汉堡1923年版；后者写了《罗莎·卢森堡在革命战术問題上的立場》，汉堡1922年版。蔡特金和瓦尔茨基都是卢森堡的密友，他們对小册子的答复旨在混淆卢森堡和列宁的不同論点，并且譴責列維不該把卢森堡如果在世必然要作根本修改的、匆忙写出的手稿发表，說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② 《俄国革命》，第27—28頁。

列宁和他的同志們关于'民族自决权等等'空論的鼓动，居然被夸大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他們硬給本来不过是一种滑稽剧的东西加上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使滑稽剧变成了一桩最最严肃的事——并不是成了严肃的民族运动(这方面，不論是以后或以前，都沒有任何基础)，而是成了反革命的招牌和幌子！在布列斯特，就是从这个臭蛋里钻出了德国人的刺刀。"①

以上这些天眞得几乎离奇的話是找不出第二段的，不过，她对于——譬如說——布尔什維克土地政策的批評，也表現了她分析問题时的僵硬特征。她說，社会主义的土改并不在于把土地分給农民，而在于把大地产国有化。

但是，当她非常反感地注視着新的专政国家形式从革命中出現时，她的政治分析上的弱点就变成了长处。由于环境使她养成了革命民主派的思想，由于她一生都在为反对专制和官僚統治而斗爭，卢森堡直觉地意識到了列宁的締造物所固有的缺陷。同一本小册子的最后一段話，是批評过布尔什維克試驗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預言它必将蛻化的最精辟的言論之一：

"当所有这一切都被消灭掉以后，实际上还剩下了一些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不需要由普遍的群众选举产生的代議制机构，而代之以苏維埃作为劳动群众唯一的眞正代表。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压制，苏維埃也必然愈来愈丧失活力。沒有普选、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結社自由、沒有自由的輿論斗爭，一切公共机关都将逐漸消失生机，只剩下一群官僚成为其中的活跃因素。公共生活将逐漸停滞，而由几十个具有无穷精力和无限經驗的党的領袖指揮一切、統治一切。在他們当中，事实上只有十来

① 《俄国革命》，第30—31頁。

个突出的首脑人物充当領导，此外再不时地邀請若干工人阶級的上层分子参加一些会議，专門替領袖的演說鼓掌和一致通过提出的决議——所以，这实质上是一种党閥統治，当然也是一种专政，不过幷非无产阶級专政，而只是一小撮政客的专政，資产阶級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統治意义上的专政（岂不見苏維埃代表大会已經由三个月召开一次，延长到半年召开一次了嗎！）。不錯，我們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說，这种状况必然要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阴謀、枪毙人质等等（参看列宁关于紀律和貪污的演說）。"①

① 《俄国革命》，第47—48頁。

第三章　1918年的德国

虽然布尔什維克盼望在德国发生的公开起事幷沒有立即展开，在签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以后的几个月里，不滿情緒在德国的一切社会阶层中都日益增长。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他們尽可能利用东綫的单独媾和在西綫上謀取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又指望将来有可能和他們目前的敌人在扑灭布尔什維主义的斗爭中合作。但是，由于美国生力軍的投入西綫和德国的日益疲敝，总参謀部手头幷沒有执行其宏图远略的足够力量。由于做得太过火，它到处都遭到了失败：它激起了德国东方势力范圍內那些受其統治不久的民族的反对；它加剧了布尔什維克的抵抗；它在西綫連一个僵持的局面都不能維持。

不过，德国总参謀部到底取得了和一个革命政府打交道的第一手經驗。先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談判桌上，以后是在德軍深入布尔什維克領土时經过的城市和乡村中，它面对面地接触过布尔什維主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德国軍官遇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完全不同于他們与之打惯交道的那些溫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最初这几个月中，紅軍还沒有成为一支力量，布尔什維克的手上只有一个武器——和平宣傳。人們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維克政权不会长久，可是革命很可能蔓延到德国这一点，却是一周比一周更令人害怕的梦魘。布尔什維克希望德国軍队会和俄軍普遍友好往来而趋于瓦解，发生这种局面的可能性使得在东方作战成了极危險的事。德皇威廉深为他的沙皇表弟的命运所震动，想到自己的統治也可能继罗曼諾夫王朝之

后而崩潰，感到十分惊恐。在总参謀部和內閣的討論中，人們认識到，如果东綫的同盟国軍队溶入已經冲刷着德国边境的紅色海洋，就会造成任何堤防也拦阻不住的高漲浪潮。

德皇写道："馮·加耳維茨和馮·穆德拉将軍在前綫向我作了报告。他們說明了軍队內部的形势——在战綫后面有大量士兵开小差，不服从上級的事屢見不鮮，从重返前綫的列車上出現了紅旗……"①

1918年2月，彼得格勒苏維埃选举卡尔·李卜克內西和弗里茨·阿德勒为名誉代表，前者是德国反战运动的象征，后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在1916年暗杀了外交大臣馮·斯图格伯爵，这时正在獄中。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写的第一批德文本小册子开始出現了，布尔什維克并且立即利用了无綫电广播他們的和平口号。布尔什維克使用的那种語言是"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圈子里从来沒有听到过的。它使得那些本来昏昏欲睡的市民禁不住心惊肉跳"②。德国总参謀部那些活跃的、受过政治訓练的軍官，对布尔什維克的傳单和小册子进行了研究，可是面临着这种新的語言、对于一切問題的进攻性态度、經过周密考虑的号召直接行动的建議等等，他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柏林-布兰登堡軍区司令馮·林辛根将軍尤为担忧。

通过建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基础上的正常外交途徑，越飞和布哈林被派到柏林的俄国大使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領导人——胡果·哈塞、魯道夫·布賴特夏德、奥斯卡·柯恩——

---

① 德皇威廉二世：《1878—1918年間的事件和人物》，柏林1922年版，第235頁。参看埃里希·魯登道夫：《魯登道夫自傳》，紐約1918年版，第2卷，第326頁以下。

② 赫耳穆特·提德曼：《1917—1919年的苏俄和革命德国》，历史研究丛书第296册，柏林1936年版。

出席了大使館的五一节招待会，哈塞在会上举杯为苏維埃政府祝福。帝国政府利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車站上的一項事件，破坏了大使館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間的合作。俄国大使館的行李被——表面上好像偶然地——打开了，发現了在俄国印刷的顚复性傳单。① 德国政府于是以此为借口，驅逐了俄国的使节。不过，对反战运动还是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李卜克內西获釋出獄，并且被允許回到柏林。

在基尔

在西綫的春季攻势中，总参謀部以已經难以駕馭的部队应付着新的联軍和新的武器——坦克，而德国的內地却生活在和平就要到来的希望中，一周比一周更为厌倦这場还在拖下去的战争。和德国一百九十一个师对峙的，是协約国的二百二十个师，其中有四十师美国生力軍，但决定性的因素則是源源不断运来支持这些軍队的物資。

8 月初，德国总参謀部丧失了軍事胜利的希望。同盟国的全部力量开始崩潰：奥匈帝国在謀求立即談判媾和；保加利亚不再可靠了；土耳其一心只顾在高加索追求自己的利益。总参謀部反复討論了駐烏克兰十二个师的調动問題；西綫非常需要他們，可是假如把他們撤走，布尔什維克是否会接踵而至？指望得到的烏克兰小麦，不可能通过一个正在发生內战的国家运出来；打算用来振作本国情緒的面包籃空空如也。

9 月末，局势变得再也撑不下去了。魯登道夫和兴登堡商談以后，一起和主要閣員們举行了会議。

---

① 参看奥伯斯特·尼古萊：《秘密力量：世界大战期間与目前的国际間諜以及对他們的斗爭》，来比錫 1924 年版，第 161 頁。

“革命正站在門口，我們只有两种应付的办法：或是厉行专政，或是作出让步。一个議会制政府似乎是最好的防御武器……作为会議的討論結果，我們在皇帝陛下面前提出了謀和的建議。我的任务是說明当前的軍事局势（其严重性已經为皇帝所认識），为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提供理由。”①

9 月 29 日，赫特林的首相职位为馬克斯·馮·巴登亲王所取代，人們认为不像普魯士政府那样穷兵黷武的南方人巴登亲王，以他的名誉和协約国打交道会比較容易一些。

10月 2 日，魯登道夫将軍在一份致民政当局的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說明軍队在西綫守不长了。在 10 月 5 日至 21 日，德国三次向威尔逊求和，它以为威尔逊不会提出像法国那样苛刻的条件。当这个最后希望也宣告破灭的时候，災难終于降临。

魯登道夫将軍提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继續打下去：放棄原来的战争目标，鼓舞德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的土地实行全民抗战。但內閣认識到，虽然革命力量还沒有明显的組織，却已經强大到难以抵擋的程度，因此拒絕了魯登道夫的計划，认为它根本行不通。为了扫清进一步談判的道路，魯登道夫被迫辞职，为兴登堡的密友馮·格勒納将軍所代替。② 三天以后即 10 月 29 日，政府下令大批征兵，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和协約国談判的本錢；这一措施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只是使工业中心的反战运动更为猛烈。

魯登道夫的立場鼓舞海軍部采取了它自己的行动，它希望能通过这一行动在当前的危急时刻使局势变得于德国有利。当时，

---

① 陆軍元帅保尔·馮·兴登堡：《往事回忆》，倫敦 1920 年版，第 2 卷，第 261—262 頁。

② 格勒納在全柏林到处張貼这样的标語：“在兴登堡需要枪炮的时候，只有狗杂种才会罢工。”从此以后，他在柏林的各工厂中就被称为“狗杂种格勒納”。

德国海軍还完整无損地停泊在基尔港，在海軍上将馮·希珀尔的領导下，海軍高級将領們拟訂出一个同英国舰队决一死战的計划。可是在10月29日，也就是这一次“死亡游弋”执行的前一天，有两三只軍舰上的水兵公开表示，他們幷不热心于分享他們的軍官正在寻求的光荣的死亡。后来虽然恢复了秩序，却不得不給这些水兵戴上鐐銬。到这一天的夜半时分，就連海軍上将希珀尔的旗舰“巴登号”都受到了影响，于是，希珀尔下令以特殊的机动演习代替原訂的作战計划。第二天，水兵們拒絕起航；他們在前艙口堆起障碍物，高唱社会主义的歌曲。31日，“提林根号”和“赫耳果兰号”上最糟糕的兵变者投降，从軍舰上被运往别处。第三舰队被送回他們在基尔的基地，当局以为在海港基地停留一些时候会提高士气，从而可以給予軍官們一个重新控制士兵的机会。

不料这一着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基尔当时正处于革命的气氛中；这个地方在1月已經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罢工。从水兵和工人們那天晚上聚会的会議厅里，德国革命开始了，它在以后几天中先沿着整个北部海岸蔓延，然后发展到中央和南部各邦。① 一場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爆发了，其規模为任何现代工业国所未見，不論什么人或什么措施都无法将其控制。当水兵們于11月3日和4日在基尔、汉堡和不来梅举行示威的时候，数以万計的工人参加了进来，他們高唱着先輩的社会主义歌曲，宣布成立共和国。好些水兵在基尔被捕，可是全付武装的士兵从駐扎在附近的各个团队里汇合到一起，打着紅旗冲进监獄把他們解救了出来。一艘又一艘战舰上升起了紅旗。

11月6日，政府派遣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員会委員古斯塔

① 参看哈里·鲁丁：《1918年的休战》，紐黑文1944年版，第244頁以下。

夫·諾斯克到基尔，他向水兵們保证已經在談判停战問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控制。可是，尽管如此，水兵和士兵們仍然夺取了火車向汉堡挺进。在这里，軍官团决定抵抗。他們在一个将軍的率領下集队走向火車站，打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基尔水兵进入汉堡中心。領头的这位将軍对自己的威信很有把握，习惯于自己的命令受到服从，因此认为只要拿一支手枪对着头一群水兵，耀武揚威地下一道命令就足以解决問題。可是，当一个水兵什么也沒讲，只是把将軍的手枪一掌打落地上的时候，士气低落的軍官們一枪未放，便抱头鼠窜了。

二十四小时以后，起义遍及汉堡、卢卑克、諾伊明斯特尔、不来梅、威廉港、不来梅港、倫茨堡、石勒苏益格、庫克斯港、布龙斯比特耳、什未林、吕內堡、汉諾威等地。溫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傳統統治中心，例如汉堡、不来梅和不倫瑞克，都被排除掉了。

暴动最后蔓延到柏林。李卜克內西在10月底到达柏林以后，就成为工厂代表委員会的权威和注意中心，通过互选方式，他和另两个斯巴达克团成員威廉·皮克和恩斯特·迈耶尔被选进了这个組織。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非常躊躇不决，拒絕了李卜克內西和皮克提出的在11月3日举行示威作为“革命鍛练”的建議。游行示威是毫无意义的，政治領袖們說。“总体革命”是議事日程上的一切，此外再也沒有别的了。11月2日，工厂代表委員会討論了起义計划，这項計划以二十二票对十九票遭到否决。李卜克內西和皮克提出的口号只得到五票，这些口号是：“立即媾和！解除戒严！德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

基尔起义的消息傳到柏林以后，李卜克內西召集了另一次委員会会議，提議在11月8日或9日举行起义。“組織者拒絕采納

这一时間表，因为这几天都是发工資的日子，工人們将不願意离开工厂。”①

在11月初，有一个瓦尔茨中尉和他的团队表示願意服从工厂代表委員会的指揮。瓦尔茨在11月8日被捕，这一消息使委員会决定迁移到警察不敢侵入的議会大厦去开会。在去議会大厦途中，計划中的起义的領袖之一恩斯特·多伊米希被捕。在他的公事皮包里，警察搜出了有关起义的詳細計划和一份密謀者名单。多伊米希是《前进报》的前編輯，这时已被推选为領导軍事行动的負責人，因为他曾长期在法国外籍軍团中服役，被认为是一个軍事战略专家。路易絲·齐茨，另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当时和多伊米希在一起，但她設法逃脫了警察的逮捕。她赶到議会大厦后报告的消息，使人們精神的紧張达到頂点；密謀者认識到，政府已經掌握了起义計划的一切細节，随时都有可能逮捕他們。对于11月9日被訂为起义日期說来，这一事件起了决定性作用。

11月9日的柏林

同一天，帝国首相馬克斯·馮·巴登亲王命令几团可靠的軍队开进柏林来保护政府机关。为执行这一任务被挑选出来的，都是知識最閉塞的部队，例如来自斯普里瓦尔特的团队、吕本輕騎兵等等。第二天，也就是11月9日的早晨，这些士兵离开了原来的营地。当天上午10时，新用手榴彈和軍火装备起来的第四猎兵营赶到了首都。可是这些士兵拒絕服从巡邏街道的命令，开始討論起

① 威廉·皮克：《1918年11月9日的柏林》，載《国际新聞通訊》，第8卷，第125期，第2475頁以下。皮克是在1918年10月27日从荷兰回到柏林的。

《国际新聞通訊》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期刊，有英、德、法文版。該刊英文版簡称为“Inprecor”，德文版簡称为“Inprekorr”。

是否要参加革命的問題。① 不知所措的軍官們也参加了討論，只是在宣布德皇业已退位（而这在当时还沒有发生）以后，才得以說服士兵們不和工人一道去示威游行。士兵們在軍营里集会，撕下了表明軍銜級別的一切标記，扔掉了奖章和十字勛章，选出士兵委員会。

皇宮对柏林来說是一块磁石。在大战剛开始的时候，德皇威廉曾两次站在它的阳台上，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地作战。在这里，历代普魯士国王习慣于从一层楼的大窗戶里檢閱御花园里一列列走过的軍队。这座城堡象征着霍亨索倫王族特权的神龕。

王室早在1914年8月16日就离开了皇宮，只有一些管理內廷事务的人員留在那里，但是柏林人預料皇宮周圍将是帝制派最后掙扎的战斗中心。皇宮卫戍司令弗賴赫尔·馮·里希托芬将軍决定作好防守准备。斯普里河的各座桥梁上都設置了武裝警察，在11月8—9日夜間，又增加几辆裝甲車充实防守力量。守軍得到了对騷扰者格杀勿論的命令。

11月9日上午9时，这位司令要求增援。上午10时，里希托芬在慌乱中命令部队撤离周圍地区。一小时以后，警察部队又接到相反的命令，要他們抵抗示威者。中午，民政当局报告皇帝已經退位逃走。皇宮守軍起先不以为这个消息是眞的，直到午后2时半从軍方听到同样消息后才相信。柏林-布兰登堡区的軍事首脑，軍区最高指揮官，命令里希托芬“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向示威者开枪。軍队全部自皇宮附近撤退”。下午3时，人們像潮水一样涌向皇宮。“守軍立即放下武器。一队士兵在群众的热烈欢呼下，

① 德皇威廉报导：“11月9日，陆軍大臣报告了若干部分柏林駐軍不稳的情况——第四猎兵营、亚历山大团第二連、于特博克炮兵第二中队都已經投到叛变者一边。沒有发生巷战。”（《事件和人物》，第243頁。）

打着紅旗从御花园中走了出去。”①

3时30分，在李卜克內西赶到的一小时以前，一个被征去服杂役的小店主施列辛格，爬上皇宫的阳台請求群众不要触动現在已經屬于国家所有的宮內財产。他把一条从僕人房間里找到的紅色毛毯悬挂起来(还有人說这是一块紅色的圍涎，或者甚至是一块紅色手帕)，这个象征革命的旗帜在德皇的阳台上飄揚了几个星期。群众虽然对于这样輕易地就拿下皇宫感到高兴，却以为警卫軍已經通过一条地道退到附近的馬斯托尔(以前的御馬厩)，打算在那里負隅頑抗。

到中午，人們已經像潮水一样从各个郊区向市中心涌来。人群中平民和士兵杂在一起；妇女的比例达到惊人的程度。示威者占領了发电厂有好几小时。一些电車和公共汽車的司机还想继續工作，也被迫把車辆开回車庫。不过，发生的事件都是小規模的。示威者从市中心又复散开，走向分布于柏林各郊区的帝国政府軍营，去向士兵們呼吁和解除軍官的武装。在迈克福軍营发生了开枪射击事件(这类事件在全市只有很少几起)，有几个人被打死。下午，整个柏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革命的兵营。汽車載着以李卜克內西为首的宣傳家們到处巡迴，鼓动群众。一个軍官不論在哪里露面，总要被人撕去肩章。“人們对于旧政权的倒台感到的喜悦，簡直大得无法形容，”一位革命編年史作者海因里希·施特勒貝耳这样說。

到四时左右，李卜克內西带着一小群水兵和工人赶到皇宫，从阳台上发表了下列演說：

---

① 魯道夫·罗特海特：《十一月革命爆发初期的柏林皇宫》，柏林1922年版，第9頁。并可参看皇宫图书館館长博格丹·克里格博士：《1918年革命时期的柏林皇宫》，来比錫1922年版。

“解放的日子已經到来。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霍亨索倫站在这里了。七十年前，曾經有一支志哀的行列抬着五十个鲜血淋漓的尸体从这里走过，这五十个人是自由事业的牺牲者，是在柏林的街垒旁边倒下去的。当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在这里向那支行列脱帽致意。今天，这里走过了另一支行列……今天，无数的群众站在同一个地点欢呼着自由的誕生……

我現在宣布：一个包括全体德国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我們要建立无产阶級的新秩序，这是和平与幸福的秩序，它将使我們的全体德国兄弟和全世界的兄弟获得解放。我們向他們伸出手来，号召他們完成世界革命。在你們当中，凡是贊成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和世界革命的人，請举起手来宣誓。”①

群众欢呼。举手如林。皇宫警卫队紛紛扔下了枪。武装着机关枪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加入了群众的队伍。

与此同时，馬克斯·馮·巴登亲王正在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談判，准备成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而可能由皇儲以德皇继承人的身分担任国家元首。可是，尽管有着保持君主政体的这种願望，共和国却在几小时后宣布成立了。对这件事的发生过程作了仔細描述的，是目击者菲利普·謝德曼的一篇报导。謝德曼是社会民主党的老領导人，曾在馬克斯亲王的內閣中任职，也是构成第一届共和国政府的六名人民委員中的一个。他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上午，議会大厦簡直成了一座兵营。工人和士兵們进进出出，許多人都带着武器。伴随着从首相府来到

① 这篇演說没有被記录下来，但是繆勒、施特勒貝耳等許多观察家关于它的介紹都大致相同。

議会的艾伯特以及别的朋友，我餓着肚子坐在餐厅里……接着，一群工人和士兵冲进了餐厅，直奔我們的桌子而来。

他們当中的許多人同时叫嚷道：‘謝德曼，馬上跟我們走。菲利普，你非得出去讲話不可。’

我拒絕了；我已經有多少次不讲話了啊！

‘你非讲不行，非讲不行，不然就麻煩了。那边有成千上万的人嚷着要你讲話呢。快点儿走吧，謝德曼。李卜克內西已經在皇宮阳台上演讲了！’

‘好吧，要是非讲不可，我就去讲一讲。’

‘走吧，你是非讲話不可的……’

‘李卜克內西打算宣布成立苏維埃共和国。’

現在，我完全明白他們想干什么了。我知道他的口号——最高权力归于工人士兵委員会。这就是要德国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变成苏維埃政权的一个分支机构。决不能容許这样的事，絕对不能，一千个不能！

事情毫无可怀疑的余地。那个能够把‘布尔什’从皇宫带到議会、把社会民主党人从議会带到皇宫的人得胜了。

我看到了俄国的那种胡干乱搞——那种以布尔什維克暴政代替沙皇暴政的局面——眼看就要重演。不，不，德国已經苦难深重，不能再加上这种災禍了……

我只說了很少几句話，但是这些話引起了人們如雷的欢呼。我說道：

‘工人們和士兵們，……該死的战爭已經結束了……皇帝已經退位，并且已經和他的伙伴們逃走了。人民已經对他們获得全綫的胜利。馬克斯·馮·巴登亲王已經把他的首相职位让給艾伯特。我們的朋友将成立一个劳工政府，一个将包括一切社会主义

政党的政府……

要团結一致，永不变心。陈旧、腐朽的东西——君主制度——已經垮台。新生的事物万岁！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下面爆发了經久不息的欢呼声，以后，人群便开始向皇宫那边移动。威胁着要吞沒德国的布尔什維克浪潮，这时已成为强弩之末。德意志共和国在群众的心中和他們的各种打算中，已經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我話剛讲完，就立刻赶回議会大厦的餐厅去吃完我的薄粥……跟着我一道进餐厅的几个工人和士兵……都爭先恐后地告訴馬克斯亲王：'謝德曼已經宣布共和国成立了。'……

艾伯特听到我做的事以后，臉馬上气得刷白。他用拳头砰地擂了一下桌子，向我大叫道：'是眞的嗎？'我回答說：这不仅是眞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听了这話，他便令我难以理解地大吵起来：'你沒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应該变成什么样子——是变成共和国还是变成别的什么东西——要由一个制宪議会来决定……'

今天，在那个翻天复地的日子已經过去許多年以后，我比較理解艾伯特当时的行为了，因为我們今天已經可以从許多书籍和报告中了解到，当时我毫无所知的关于君主制、共和国、代替德皇的元首等問題的秘密談判是确实进行过的。在一定程度上，艾伯特当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自主的人……"①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柏林警察总监馮·奥佩尔如何把他的职位让給革命者的經过，和皇宫的輕易被占領同样能說明旧政权不堪一击的程度。馮·奥佩尔当时在亚历山大广場的警察总署里，

① 菲利普·謝德曼：《新德意志的締造》，紐約阿普耳頓公司1929年版，第2卷，第261頁以下。

他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坐立不安，心里只盘算着一件事：怎样安全地逃出去。亚历山大广場位于无产阶級居住区的中央，周圍的街道和空場上都挤满了示威的工人和士兵，他們正在揮舞着小紅旗，喊声震耳地列队游行。警察們相当惶恐。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显然代表柏林工人的多数，奥佩尔便向德克逊街的該党总部打电話，請他們派一个人来接替警察总监的职务。預先被指定担任这一职务的是一个五金工人，名叫艾米尔·艾希霍恩，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員。他几乎被看成是一个布尔什維克，因为他曾經同俄国大使館里的越飞和布哈林很要好，甚至还在1918年8月参加过俄国設在柏林的第一个通訊社——俄罗斯电訊社（罗斯塔）——的工作。他接到馮·奥佩尔的电話以后，便步行到警察总署去，伴随着他的只有一个社会主义青年。他看到警察总署关閉着的門前圍着一大群示威者，守門的士兵正在和圍攻者热烈地討論着什么。他只簡单地說了一句："我是新到任的警察总监艾希霍恩，接到电話以后到这里来办接收的。"士兵們便向新总监敬礼，給他打开了大門。高級官員們已經从办公室中逃走；他受到了人們的热情欢迎。①

駐扎在这一区的团队中的士兵，圍着他們的上尉討論一个問題：我們是参加革命运动呢，还是安静地呆在一边？这些士兵都是来自麦克倫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他們觉得和大城市里的人格格不入，宁願守在兵营里不出去；他們要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保证他們的粮食和供給，这一点得到了滿足。他們在以后几天中都一个个地离开营地回家去了。

一群示威者跟着艾希霍恩涌进警察总署，釋放了六百五十名过去几天內的被捕者。在警察总署的后院里，柏林警察扔下的步枪、馬刀和手枪很快便堆积如山，这些警察都迫不及待地自願解除

① 艾米尔·艾希霍恩：《一月事件》，柏林1919年版。

武装，好赶紧溜走。

11月9日晚間，柏林許多地区的枪声变得密了一些，但是并沒有在任何地方发展成为眞正的巷战。在为大学生們占据的菩提树下街的大学和皇家国立图书館一带，发生了特别激烈的冲突。一群群士兵暫时占領了《前进报》和《地方新聞》报社、沃尔夫通訊社以及其他許多报社。《地方新聞》报社的人員作了頑强的抵抗，《紅旗报》第一期直到11月21日才出版。政府官員們惊慌失措了。他們丢下了正在办的公事，从侧門逃出机关。“在外交部的新聞处，所有的文件都还摊在桌子上。办公室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新聞处的官員是丢下了手上正在做的工作匆忙跑掉的。”①

第二天，柏林便落到了新成立的工人士兵委員会的手中。在全德国，各邦的君主和邦政府都紛紛退位，把政权让給由社会民主党領导的內閣。可是在这段时期，工人士兵委員会和看守政府形成了并存的局面，而且，它們的实际权力大于继承旧政权的合法政府，这些委員会发表了数不清的文告，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一願望的象征，同时也是作为对駐軍采取的反措施，各地的工人士兵委員会紛紛占領公共建筑物。看守政府夺回了这些建筑物，以后，它們又再次为委員会所夺取；政权的不稳定性便反映在这种反复拉鋸的局面中。

暫时夺取公共建筑物、报社、通訊社等等，是中欧各国在11月那几周动蕩局势的特点。② 这种自发地夺取政权机关的做法，部分是出于回国士兵的战爭經驗。軍队开进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以后，

① 1918年11月11日的《柏林日报》，轉引自理查·繆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15—16頁。

② 我当时住在維也納，在那里，組織严密的奧地利社会民主党內，沒有一个可以

总是先占領各座主要的建筑物。这种做法一部分也是模仿俄国的榜样：工人們夺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主要政府机关的事实，最引人注意地表現了布尔什維克少数派的胜利。数以百万計的人虽然还几乎不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虽然肯定沒有讀过一行馬克思或列宁的文章，却本能地接受了他們那种通过占領政府重要机关而夺取政权的方法。

当騷动的消息从全德国的四面八方傳来时，弗里茨·艾伯特

和"斯巴达克团"相比的組織。只有一群社会主义大学生和青年工人，設法同維也納和下奥地利的兵工厂联系，替布尔什維克宣傳。在发生"面包罢工"以后，这一群人自称为"左派激进派"（以区别于奥托·鮑威尔和罗伯特·丹尼堡領导的左派；丹尼堡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6年林嗣綱領的拟定者，1945年死在布痕瓦尔德）。我們这个小集团不久就收到了布尔什維克首先从瑞士、然后从莫斯科寄来的信。在他們的鼓励下，我們便驕傲地自称为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4日成立了奥共这个欧洲最早的共产党之一。我是第一号建党人。我們印了許多宣傳文件，但是在有組織的工人中却沒有多大影响。另有一个和我們的組織沒有关系的集团，是由所有奥地利团队打剩下的士兵組成的，夺取了西維也納的兵营。他們自称为"赤卫队"；他們的司令是著名的捷克作家埃岡·欧文·吉希，他在随同奥地利軍队出征后以中尉的資格回国。（吉希經历了許多冒險以后，于1941—1945年流亡在墨西哥城。他已經回到自己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現在是亲俄的新共和国最有名的官方記者之一。）

当奥地利共和国于11月12日宣告成立的时候，从佛罗里茲多夫区大工厂中来的人抬着其大无比的标語牌，上面写着："奥地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这是名副其实的空洞口号，因为在它們的背后并沒有任何組織。一群社会主义大学生朝奥地利議会門前的迴栏走去，准备向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呈递"維也納工人的請願书"。当时普遍的神經紧張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竟有人命令卫队用武力拦阻示威者接近議会——或者也許是卫队并未接到命令而自行开的枪。总之，事实是造成了一場大混乱。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員弗兰茨·科里乔納肚子上中了一顆子彈。（他后来在三十年代末期不名誉地死于俄国。）我被惊慌的人群踏倒，昏迷了过去。我醒来的时候，发現自己躺在維也納最大的一家日报《新自由报》总編輯的办公桌上。原来是赤卫队的士兵們发現我躺在人行道上，便把我抬进报館，夺取了这家报紙，并且宣布我为主編。报館全体人員都聚集到我躺着的房間里，向我保证他們的忠誠。那时我才二十岁左右，想到我們已經取得政权，不由得有些莫知所措。有两三天，我們发行了特刊，説明占領报社是出于示威目的。接着，我們都和平地离开了报社，《新自由报》随即复刊，此后一直順利无阻地出版到納粹上台。几天以后，我被新政府逮捕，并被控以背叛奥地利国家罪，但是在六个星期后获得了赦免。

认識到单靠他自己的党无法擋住革命狂瀾。这个党本身就正在被彼此冲突的潮流分裂着。普通党員紛紛和工人士兵委員会合作，一点也不願意和革命少数派断絕关系。艾伯特受到很大压力，以致不得不邀請李卜克內西入閣，而李卜克內西对于这种表示当然如所預料地拒絕了。

11月9日晚間，艾伯特打电話給格勒納将軍，請他支持新內閣。在卡塞尔附近威廉崗的兴登堡总部里，格勒納是一个中心人物。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領袖，艾伯特曾經在战时和軍方进行过友好合作，他現在希望至少从一部分軍队那里得到帮助来应付即将爆发的革命，这是很自然的。①

---

① 关于这一被人談論得很多的通电話事件，伏克曼（帝国档案館档案員）在他的著作中有所报导，見《德国的革命》一书第68頁，奧尔登堡1930年版。并可参看格勒納将軍的证詞，見貝克曼所著《慕尼黑的利劍襲击》，慕尼黑1925年版，第110—111頁，轉引自亚瑟·罗森堡所著《德意志共和国史》，倫敦1936年版，第324頁。罗森堡曾接触过法庭的审訊記录。

艾伯特和格勒納之間的合作問題，引起了一直继續到今天的无休止的爭論。替艾伯特辯护的人并不否认合作的事实；討論的癥結主要是艾伯特的动机以及这种合作的后果。格勒納的供詞是否可靠，特别受到了怀疑。在这一問題上提出了最詳尽資料的罗森堡本人，就坚持說艾伯特是忠于共和国的。"并沒有任何证据表明艾伯特曾和軍官們合謀反对革命工人阶級。艾伯特从来也沒有背叛过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事〔即他的同志〕。但是，他由于意識到德国政府正面临着巨大困难而深感忧虑。除去經济困难重重和对外政策棘手以外，还加上了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来因区，而且来自德国的其他許多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艾伯特希望把內訌的可能性减到最小限度，在各党各派之間充当調停人。如果最高統帅部向他表示忠誠，艾伯特看不出有任何拒絕的理由。不过，艾伯特过于信任最高統帅部，却是一个策略上的錯誤。"（罗森堡，第50頁。）

在我看来，这种討論是过时的和毫无意义的。艾伯特的动机，即他眞誠地相信通过和軍界的这一諒解他是在挽救德国，是不能怀疑的。至于他的行动，則需要根据对于整个內战时期的一般政治估价来衡量；討論之所以局限在艾伯特的行动和人品問題（这只是許多有关的复杂因素之一）上，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的宣傳造成的。然而，无論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不能否认下列一点，即：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領导人和軍队之間的暫时联盟，对于年輕共和国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工人委員会

在俄国，推动工农的力量是結束战爭与平分土地的願望。在德国,战爭已經結束,而农民并沒有被卷入革命；尽管还有許多殘余的封建特征，他們的处境仍然要比俄国农民好許多倍，在1918年11月,举足輕重的問題是：究竟要不要保存軍队，或者說，究竟要不要保持帝国能借以在欧洲东山再起的力量。对于一般士兵来說，資本主义只是一种不具人格的抽象的东西。在战敗前的艰难时期，士兵們天生的敌人，即他們每天直接碰面的統治阶級的代表,不言而喻是軍官。从这种根深蒂固的經驗出发,工人出身的士兵們痛切感到，如果要使德皇不致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以后复辟,要使德国不致再次投入战爭,就必須摧毁軍队的骨干。

德国这个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处于俄国和英法两大列强势力的夹逼之間,四面八方的疆界都易于受到攻击，因此，軍队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发展壮大。沒有保护力量，德国的工业便不可能向欧洲扩張。正如德皇威廉所說,只有用实力保护它的工商业,一个国家的福利才能够得到保证。

从帝国建立起，德国軍队便养成了作为一支政治軍队的傳統。总参謀部——一个野心勃勃的、还沒有被征服的社会阶层的化身——由于1918年11月的战敗而遭到損伤，但是并沒有因此絕望頹唐。这些人清楚地看到：由于革命的俄国这个天平中的未知因素严重地打乱了一切悬而未决的方案，德国在战后是有可能卷土重来的。所以,德国总参謀部和社会民主党暂时联合,只是为了挽救軍官团和軍队的技术基干力量不致为革命的風暴所摧毁，这种联合是出于战敗后万不得已的需要，从一开始就充滿了相互猜疑和憎恨。东部的大地主、西部的大工业家以及很大一部分中产

阶級，不能相信德国怎么可以沒有軍队。①

反对凡尔赛条約規定的軍事限制、为保持軍队的骨干組織而斗爭的最好論据，就是需要对付內部的敌人。由于周圍新成立的小国露骨地施加压力，帝国的疆界正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因此，保卫这些变动性很大的边境地区，成了使軍方发言人的論证具有分量的另一个因素。

“內部的崩潰摧毁了国家的权力，首先使敌視国家的成分占了上風，这意味着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反对帝国的各种力量——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阶級斗爭的鼓吹者和个人主义者等等——的胜利。国防軍就是在反对这一切力量的斗爭中創立起来的。最初，它同資产阶級的大多数和在社会民主党政治領导下的工人溫和派結成联盟，对这些力量作斗爭。……新的国家就是从这种合作中誕生的。”②

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即当时德国工人的大多数，都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是他們的組織却在糾纏不清的討論中丧失了时間。連那些最能干的領袖，也陷进了圍繞着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这一問題所进行的不可調和的爭論。走上街头的工人，回到了工业城鎮的还乡士兵，从那些躺在德国一个死港里的軍艦上下来的水

① 共和国軍队“德国国防軍”的締造者汉斯·馮·澤克特将軍，后来是出席凡尔賽会議的軍事代表。1919年5月26日，他向德国代表团团长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呈递了一份备忘录，抗議和約中的軍事条款，明白地拒絕共同負責。“我想說清楚，”他写道，“按照一切軍事权威的意見，一支軍官团人数有限的十万人的軍队，是不足以完成那些即使說成立了国联也还需要由德国負責的对外任务的，也不足以使它的对內政策具有必需的后盾……如果德国接受这些条件，它就会在对內对外两方面都变得无能为力。見埃里希·奥托·伏克曼著《回忆馮·澤克特元帅》中《德国国防軍的組織者》一章，德国国防政治与国防科学协会，柏林1937年版，第35頁。

② 馬克斯少校：《帝国、人民和国防軍》，載《科学与国防》，1931年第12卷第1期。馬克斯是总參謀部的一个成員，一月事件中曾作为柏林司令部的一个負責人和諾斯克合作，后来成为国防部主要专家之一。

兵——这些人都各自效忠于他們自己的政党。但是，在一个簡单的目标上，社会主义工人和天主教工人都越过了本党的組織界限，团結了起来，那就是一定要解除总参謀部的武裝，剝夺其軍队和設施，取消軍官团。在这个目标上，同工人們团結在一起的还有德国中产阶級的广泛阶层，特别是那些在战敗后变成和平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人。这些社会集团在寻找一种代替帝国主义扩張的政策。艾伯特和中央党左派的議会联盟，就是这一傾向的表示。

11月9日，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責成总参謀部把軍队遣散回乡。这一措施增强了軍官团的权力，因为他們的地位正在遭受士兵委員会的威胁。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德国軍队，有一部分还不知道国內的情况。但是，相当一部分士兵，特别是东綫士兵，对于俄国和柏林的事变都有所反应。軍官們的态度是随机应变的；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們便自动退位，把权力让給士兵委員会。有时候，他們主动下令选举士兵委員会，把这些委員会吸收进指揮机构。只要有可能做到，并且在可能做到的范圍內，总是設法保持住原来的紀律。

在1918年，德国士兵可能变成行劫盜匪的危險是比較小的。这些人完全能自己組織起来，返回他們原来的营地。艾伯特所以坚持軍官团是不可更換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后方勤务的考虑；他和軍官們都了解，他們的主要任务就是設法防止革命的破坏性影响继續蔓延。总参謀部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进行改組；艾伯特在11月9日晚間向格勒納求救，更于总参謀部有利。

和工人們那种巨大而无定形的群众运动相反，总参謀部从潰散的各师軍队中挑选出一些骨干，把他們組成了由帝国軍官領导的小規模精銳部队。騎兵近卫师——这个名称就强调了它对帝国傳統的继承——变成了这些反革命骨干力量中最有名的一部分，

他們主要都聚集在柏林周圍的小城鎮上。

軍队和革命者之間爭夺政权的斗爭在继續着。軍官們坚决认为，自己的部下旣然受到街上騷动的威胁，就应該和它正面較量一下，排成密集队形走上街头，一方面借以恢复自己的士气，一方面也以他們的紀律杀一杀民众的威風。

柏林駐軍的第一次游行早在11月23日就发生了。几天以后，指揮第十七軍的馮·穆德拉将軍下令禁止士兵佩带革命标徽，并且要仍旧穿着軍服的复員軍人继續向軍官敬礼。格勒納将軍公开頌揚最高总司令兴登堡是祖国的救星，因为他让軍队秩序井然地撤了回来。格勒納发表这篇声明的用意，是要使人們对那些散布于帝国全境、在日益发展的群众暴动面前惊慌失措的軍官干部恢复信心。

12月5日，主要由二千名軍曹組成的騎兵近卫师列队走过柏林的各条大街。第二天，在柏林市北部，当这些新組成的"志願团"企图逮捕工人士兵委員会的几个委員时，发生了一場流血冲突。12月6日，独立团开到首相府，要求艾伯特独断独行。而在此以前，格勒納剛剛警告了艾伯特，要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7日，柏林出現了大量傳单，号召人們暗杀李卜克內西，消灭革命分子。这种宣傳带有反犹太人的色彩："杀死李卜克內西！杀死犹太人！"街头出現了巨大的招貼，上面写着这样一些口号：

"工人們，公民們！

我們的祖国已經处于灭亡的边緣，拯救祖国！

对祖国的威胁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內部，来自斯巴达克团。

杀死它的領袖！

杀死李卜克內西！

这样，你們才会有和平、工作和面包！

一群前綫士兵。”①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工人士兵委員会于1918年12月16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大会代表是在烏烟瘴气的混乱情况下选出的，既沒有清楚的程序，也沒有明确的綱領。选举办法是根据1910年人口調查每二十万人选出一名代表；在代表和数目如此龐大的选民之間，自然不可能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③ 这样，最强大的政治机器控制了选举；在四百九十名代表中，社会民主党占二百九十八名。代表中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和工会专职干部，七十一名知識分子，十三名軍官，一百七十九名工人。大会拒絕給予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以代表資格。

和各个党組織內同样的討論相比，大会辯論甚至显得更加混乱和糾纏不清。会上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是必不可缺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宣布它由于經济混乱而不可能实行。当时，艾伯特本来甚至在自己党內也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对，然而，由于与会者的勾心斗角和个人之間的各种爭吵嫉妒，他反而在会上占了上風。但是，这种軟弱无力的表現却模糊不了大会的主要傾向——一致反对旧的帝国軍队。

---

① 轉引自保尔·費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行动》，巴黎1939年版，第266頁。

② 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19年4月15日，会址仍在柏林。这次大会沒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一期間，工厂代表运动已經在內战的一系列战斗中趋于沉寂。8月23日，諾斯克解除了大柏林市工人士兵委員会的权力。关于这两次会議的同时代人的报导，可参看《工人士兵委員会全国代表大会速記記录》，載弗里德里希·普利茨博士編《德国革命》（来比錫，出版年代不詳），第1卷第201—259頁，第2卷第186—201頁，《德国革命大事年表》部分；并可参看海因里希·舍弗著《一个来巴区社会主义者的日記》，波恩1919年版。

③ 理査·繆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203頁。

辯論有好多次被正在外面示威的一百万名工人派来的代表所打断，这些无穷尽的工人队伍来来回回地示威，要求成立一个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把全部政权交給工人士兵委員会。有一次，三十名打着本团軍旗的士兵闖进会議厅，圍住主席台。士兵費希納代表柏林士兵委員会登台发言，要求："(1)由全国各地士兵委員会选出的代表組成的士兵最高委員会掌握全部海陆軍的指揮权；(2)廢除一切軍銜；(3)解除一切軍官的武装。"他幷且补充說，"当一切从前綫回来的士兵在軍营里放下武器以后，这一决定就将立即生效。士兵委員会将为軍队的忠誠和紀律負責。"

以上各項要求典型地代表了帝国全境一切士兵組織的傾向。譬如說，主要由社会民主党員組成的汉堡士兵委員会，虽然非常溫和，制定出的綱領也和上述要求大体相同，幷且还提出禁止佩带各种勛章和綬带。长期的訓练使他們忠誠于自己选出的党的領袖，因此，代表們希望通过施加群众压力而又严守規章的办法，迫使上級实現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确是眞正讲民主的；他們在一切境况下都坚信民主程序的效率和价值。①

艾伯特为保存軍队进行了有力的斗爭，他强調指出必需有足够多的师团保卫德国边疆。"在德国和波兰之間的边境地区，非正規的部队、开小差和到处游浪的士兵造成了危急万分的状态。我們必須有一个有保障的边疆。艾米尔·巴尔特那个和士兵委員会的要求完全相同的建議，使得組織軍队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巴尔特坚持这一建議，我很怀疑我們是否还能继續合作下去。"② 在艾

① 后来，兴登堡宣布："我不承认中央工人士兵委員会关于軍事問題、特別是关于軍官和軍士地位問題所通过的决議……現在和以前一样，軍方支持艾伯特政府，希望政府实現它所許下的保存軍队的諾言。"(繆勒，第2卷，第222頁。)

② 《速記記录》(上頁注②所引)，第220—221頁。

伯特讲到这里的时候，另一个士兵代表团又拿着旗子和标語牌闖进来支持巴尔特。

大会在一片混乱和意見不一中休会。它所通过的指示并沒有束縛艾伯特的手脚，还准許他继續和軍界合作。大会刚一結束，总参謀部消灭革命分子的計划便立即开始执行。1918 年 12 月23日，艾伯特命令布兰登堡駐軍司令累庫伊斯将軍带兵开进柏林。他的第一項任务就是解散人民海軍师。

人民海軍师是当时一个奇特的和頗有意义的产物。它原来由大約六百名柏林籍貫的水兵組成，后来又有几千名其他地方的水兵和士兵参加了进来。由于基尔暴动的影响，做一个水兵在当时具有一种革命的魅力。在革命发生的头几天，水兵們占据了皇宫以及与之相連的御馬厩作为临时宿营地。他們不屬于任何政党，自願服从共和国新政府的指揮。可是，艾伯特却害怕这些不請自来的合作者，希望尽快地擺脫他們。

这种曖昧不明的地位导致了經常的爭执，水兵們感到自己完全有資格向新政府領取正規的軍餉，因为他們既是尙未正式复員的水兵，又是新的人民水兵师的成員。在 11 月 23 日，这些人占領了首相府和电报局有几个小时，抗議政府故意拖延发餉。在埃米尔·巴尔特出面干預，答应和內閣談判以后，他們便退出了。这时，累庫伊斯将軍插了进来。他的部队在一个馮·哈尔博少校的指揮下，包圍了皇宫和御馬厩，在发出一份限时十分钟的最后通牒以后，他們便开炮轰击。水兵們撤出了难以防守的皇宫，在御馬厩成功地筑起了障碍物；經过一天的僵持，馮·哈尔博終于被迫撤退。在此以后，政府只好承认水兵們有权继續以御馬厩为营地，但要他們遵守一項条件，即这个师不得再招募新兵。这一出人意料的結果加速了軍方統帅部和柏林革命者之間的攤牌。軍官們本来以为

革命者的軍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他們看来，只要有組織的軍队一露面，还怕这一群武器簡陋的烏合之众不馬上潰散嗎？所以，"当馮·哈尔博少校在御馬厩失利的消息傳到卡塞尔的总司令部时，人們中間第一次露出了垂头丧气和胆怯的迹象"①。

軍官們打算加剧冲突，使艾伯特和柏林革命者的关系完全破裂。他們試图让艾伯特把政府迁到卡塞尔去。"12月24日，我再次和艾伯特談話，"格勒納将軍报告說。②"他問我該怎么办。我告訴他，我們在柏林大約只留下了一百五十个人，因此，总参謀部打算继續駐在卡塞尔附近。"

这是一个明显的威胁，艾伯特也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作了相应的答复。"我也要回家去了，"他說。"我要回家去睡上三天觉。我需要这样做。我就是要总理府里看不到我的影子，同时想法让我的那些閣員先生們也全都离开总理府。我們打算只留下一个門房。要是李卜克內西集团現在就夺取政权，不会有一个人阻擋他。也許我們会在几天以后，或許是在波茨坦，重新建立我們的政府。"

艾伯特所以要留在柏林，是因为他认識到，如果他和格勒納联合的事实公开出来，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就会完全丧失，这样一来，革命分子便有可能获得成功。可是，当革命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几乎粉碎了看守政府的时候，革命的头脑斯巴达克团却由于迟疑不决和意見不协調而丧失了时机。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罗莎·卢森堡是在11月10日从监獄里回来的。她在《地方新聞》报社中受到她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列夫·約吉契斯(一个

① 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163頁。

② 根据他在1925年慕尼黑审訊中的证詞，参看罗森堡，第325頁。

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欢迎。他們对李卜克内西的态度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已經明确表示完全贊同工厂代表运动。卢森堡认为在当时就建立工人士兵委員会的政权还为时过早；在她看来，斯巴达克团的主要任务应該是喚起工人的社会主义精神和觉悟。在社会民主运动的两派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当时似乎包括了德国工人的絕对多数，因此，卢森堡和約吉契斯贊成斯巴达克团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內。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之間的冲突，在11月和12月趋于激烈。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建党大会上毫不含糊地說明了自己的观点。她就新党的政治任务問題所做的报告，非常扼要地表明了她对德国革命发展进程的看法。这是一个交錯着两种态度的报告，一方面热情地呼吁群众直接行动，一方面又提出一个政治棄权主义的綱領。

"現在就夺取政权将是一种犯罪性的錯誤〔她說〕。德国工人阶級还沒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准备。不用說，艾伯特和謝德曼政府当然不能被看做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些叛徒已經同帝国軍队和总参謀部的余孽勾結起来。和这样一个政府是不可能妥协的。工人們应該对艾伯特和謝德曼进行斗爭，在工厂里和大街上进行斗爭，但是他們却不应該以推翻艾伯特政府为目的。如果群众还沒有組織德国的准备和能力，把这个政府推翻和换上另一个是毫无用处的，是幼稚的。我們的战場是在工厂內部。"①

在卢森堡的想像中，罢工将得到发展，声势愈来愈大的一連串罢工将会逐步地把絕大部分工人都卷到运动中来。这些罢工将会把工人組織起来，教育他們，使他們充滿阶級斗爭的热情。在具有

① 《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柏林1919年地下出版。

了这一种阶級觉悟以后，他們就会联合起来反对資产阶級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官僚机构中的同盟者，到那时候，这些党的官僚就将完全孤立于普通群众之外。对于卢森堡来說，这一群众罢工阶段是組織一个革命政党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也是为一切进一步行动所必需的准备过程。根据这一前提，斯巴达克团的綱領以含蓄的文字和坚决的态度拒絕了列宁希望德国革命者采取的政策。

“斯巴达克团拒絕参加資产阶級的工具謝德曼和艾伯特的政府……斯巴达克团也反对通过艾伯特政府的垮台，或者是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勢难再和他們合作下去，而获得政权。

斯巴达克团只有在获得德国无产阶級絕大部分明确表示的支持以后，才願意掌握政权，而且取得这种支持的手段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依靠他們自觉地接受斯巴达克团的理想、目标和斗爭方法……

斯巴达克团的胜利不是在革命开始时取得，而是在革命結束时出現的。它的胜利就是千百万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群众的胜利。”①

这項决議实质上意味着，斯巴达克团将不参加任何种类的工人或民主政党联盟。如果現在的政府走进了死胡同，斯巴达克团既不打算給予它以支持，也不打算把它推翻；斯巴达克团既不参加继承旧政权的看守政府，也不单独夺取政权。实际上，斯巴达克团的綱領就等于有批判地容忍艾伯特政府，同时进行反对軍队和实現社会主义目标的战斗性宣傳。

綱領的另一段明确反对采取革命恐怖政策，这又是一个对于布尔什維克实踐的自觉而坚决的否定。斯巴达克团断然否认他們

① 《斯巴达克团的方針》，柏林 1918 年 12 月版。

将对敌人采取惩治措施；“社会主义革命厌恶和鄙视暴力与屠杀”。

这样，罗莎·卢森堡就拟定了一个不干预新共和国政策的綱領——对新国家的形成采取棄权主义立場，也就是說，虽然参加国民議会的选举，但只把它看成是宣傳工具。按照卢森堡的理解，德国正在进入一个阶級斗爭尖銳的漫长时期，而斯巴达克团将在这个时期成熟。目前还軟弱无能的革命力量，将通过罢工和政治教育的結合在組織上壮大起来。經过这样一段漫长的准备时期，革命运动就会几乎不必流血地把政权拿过来，并且在几乎用不着强迫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統治。在卢森堡还有机会申述其观点的几个星期里，她在自己的演說和文章中并沒有詳細談到德国改变了的地位和新旧德国之間的鴻沟。她不遺余力地和正在重新集聚力量的反革命进行斗爭，但却絲毫沒有分析欧洲的新的均势，德国夹在革命俄国和西方之間的形势。

在斯巴达克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和列宁之間这种隐蔽的冲突（她的密友都很清楚这一点），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影响了大会的各項決議。拉狄克当时以布尔什維克正式代表的資格出席了德共的大会；卢森堡甚至拒絕和他見面，只是在列維苦苦劝說，指出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以后，她才放棄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們两人会面时，态度是冷淡的和客套的。波兰党組織在“1912 年的分裂自然引起了罗莎·卢森堡对我的疏远”，拉狄克后来写道。①在所有重大問題上的这些基本分歧，使斯巴达克团代表大会产生了一种混乱和渙散的气氛。既然公开批評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維克策略是絕对禁止的（因为对于工人阶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在公开場合下只有贊揚），这些立場冲突的政策便不得不寻找其他比

① 《百科辞典》，俄国格拉納特图书学研究所，莫斯科 191？—1934 年版，第41卷，第 2 部分（附录），第 155 頁。

較迂迴的表現途徑。

李卜克內西的思想远比卢森堡接近列宁，但是他不能发展这些思想。他不想建立一批干部核心来支持他的政策；他甚至不能够把这些政策申述清楚。一大堆决議用模棱两可的詞句向苏維埃、列宁和托洛茨基欢呼，遮掩了政治上的基本分歧。就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們反对卢森堡的理論，认为这是对于德皇倒台后德国主要形势的一种十分不現实的解釋。他們攻击她的一个前提，即革命陣营的处境将继續不断地得到改善。針对这一批評，罗莎以一种伤心的語調，請求他們千万不要陷入冒險主义政策，不要陷入暴动主义。“同志們，”她这样說，“你們正在掉进称心如意的激进主义陷阱里去。”

这些爭执明显地反映了德国革命党人的混乱状态。他們沒有对当前的各种重大危險作全面分析；相反地，代表大会只討論了下列問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內的危机，报告人卡尔·李卜克內西；参加立宪会議选举的問題，报告人保尔·列維；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們的綱領，报告人罗莎·卢森堡；我們的組織，报告人胡果·埃貝尔林；經济矛盾，报告人保尔·朗格；关于国际会議，报告人赫尔曼·邓克尔。大会主席是威廉·皮克和雅各布·瓦耳歇尔；书記是弗里茨·赫克尔特和罗西·伏尔夫施坦。参加会議的有来自四十六个区的代表。

李卜克內西被推选出来为他們和独立社会党人分裂的行动申辯，因为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中的影响最大。提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1月9日参加艾伯特內閣的問題时，他建議斯巴达克团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組成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統一战綫。

卡尔·拉狄克代表布尔什維克党和苏俄致賀詞。代表大会发

出一份經过字斟句酌的电报向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致敬，而避免和布尔什維克党有任何直接接触。

保尔·列維作了关于参加立宪会議問題的报告。他为卢森堡的主張即斯巴达克派应該参加立宪会議作辯护，反对用暴力推翻政府。“只有等到我們，斯巴达克团，在工人阶級的支持下有能力接收政权的时候，才有可能那样做。但是在目前，我們却必須首先把无产阶級〔的大多数〕爭取过来。”

奥托·呂勒①，来自薩克森区皮尔納的代表，反对这种看法。“我們如果参加，就等于在政治上批准了立宪会議……这将是一种自杀政策……我們唯一的任务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員会。假如立宪会議由于害怕群众而迁移到希尔达②，我們就在柏林建立一个新政府。”

罗莎·卢森堡为参加选举的主張作了辯解。弗里茨·赫克尔特数說了社会民主党为获得选举权进行了“五十年斗爭”的历史，但是沒有引起任何反应；杜伊斯堡的罗西·伏尔夫施坦主張以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抵制立宪会議。

大会以六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否决了参加立宪会議的提議。“李卜克內西承认他头一天晚上睡觉时还贊成参加选举，第二天醒来时又反对参加了。”③

保尔·朗格說：“战爭破坏了小工厂，工业社会化的时机已經成熟。生产集中了。由于缺乏煤和原料，国家不得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干涉私人企业。社会化应該由工厂委員会負責执行。工会在理論上贊成社会化，实际上却抱反对态度。”

---

① 他写过一部馬克思傳，1943年死于墨西哥城。

② 一个以笑謔聞名的市鎮，这里象征自得其乐的中产阶級的愚蠢。

③ 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74頁。

对朗格的报告进行的討論，是和对工会問題的討論結合在一起的。“要为实現社会化而斗爭，”卢森堡說，“不可能不提出是否要取消工会的問題。”弗里茨·赫克尔特指望，随着革命的进展，工会能得到改造；他坚决反对脫离工会。在作总結时，朗格对工会能够轉变这一点表示怀疑。

罗莎·卢森堡說：“11月9日与其說是新思想的胜利，还不如說是旧思想的崩潰。随之而来的可以說是一場大混乱，一个沒有計划、沒有觉悟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具有統一作用的唯一原則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員会。这是革命誕生的标志，是一切力量圍繞着它聚集在一起的口号……人們有一种在所謂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結起来的幻想……艾伯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了……对艾伯特-謝德曼抱有幻想的第一个阶段已經过去……他們成了反革命，而革命現在正向前迈进。我們不需要改变政府，但是需要削弱它。革命只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济上的……”

大会通过了各項动議，譴責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軍队正在干着“背叛德国工人阶級”的勾当，反对英国工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議的建議，主張建立工人士兵委員会作为无产阶級阶級組織的“战略据点”。

在对政策問題进行了这些深奥的討論以后，大会开始研究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問題，即怎样和其他革命集团联合的問題。本来，明智的做法应該是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內，因为这个党的松懈組織允許存在巨大分歧；而在一旦决定断絕这种联系以后，最低限度也应該有一个和工厂代表委員会团結一致的綱領；可是事实上李卜克內西的促成这种統一的一切努力都落了空。工厂代表委員会提出五个条件：（1）参加选举，（2）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合决策委員会，（3）要能对街头示威的策略发出精确指示，（4）合

編宣傳文献，(5)取消“斯巴达克团”的名称。卢森堡和約吉契斯认为这些条件无法接受。大会决定断絕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①

在这次大会混乱的和糾纏不清的爭論中，主要的問題是对十一月事件的不同評价。大部分仍然穿着軍服的代表們，是剛从战壕中回来的。他們根据軍队在占領区的亲身經驗，学会了怎样直接行动。他們知道自己的敌人，他們知道被推翻的集团不会束手待斃，不会放过任何使霍亨索倫王朝复辟的机会。

古斯塔夫·諾斯克

在1918年底，柏林的局势变得于艾伯特不利了。继御馬厩事件之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名人民委員——胡果·哈塞、艾米尔·巴尔特和威廉·迪特曼——退出了內閣。在这一时刻，在看守政府朝不保夕的政权已經搖搖欲墜的时候，艾伯特再次向曾經挽回了基尔危局的諾斯克求救，让他負責联絡旧軍队共同对付革命力量。

古斯塔夫·諾斯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1868年出生于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哈費耳河畔的布兰登堡，他的家庭是无产阶級，他死后出版的自傳②里談到这种社会

---

① 参加过斯巴达克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格·弗先生告訴我，約吉契斯在开会期間曾問过他，让建党这一档子事都吹掉究竟好不好。約吉契斯的态度还表現在另外一件事上。已經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被选入瓦登堡地方議会的克拉拉·蔡特金，自从斯巴达克团脫离該党以后，在保持自己的議席时难以应付一般党員。約吉契斯写信給她，要她继續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議員，因为他怀疑当时建立一个新党是否适宜。

② 古斯塔夫·諾斯克:《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兴衰史》，苏黎世1947年版。該书完稿于1933年，諾斯克在序言中說，在1936年以前，他一直幻想这本书能够在納粹政权下出版。

地位曾如何使他感到耻辱。他想当一个林务官，但是家庭的貧困使这一項志願不可能实現，他只能跟一个附屬于一家儿童車制造厂的編篮工当学徒。他憎恨这种工作，但他在自傳中强調說，这是家里特地为他选擇的职业，好让他学到一行手艺——倍倍尔毕竟也当过木匠头呢。他被吸引到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內以后，很快就在当地树立起威信，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报紙的編輯，起先在布兰登堡，然后到哥尼斯堡，后来又到开姆尼茨工作。在这些年代中，"根本沒有人談起馬克思或馬克思主义"；直到1903年，当諾斯克在一次短期被拘禁于监獄中的时候，他才第一次讀到一些馬克思的淺显小册子，而那时，他已經当了六年社会民主党报紙的編輯。

諾斯克随着自己的党步步高升，他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把党的上升到全国性地位和他們自己的野心等同了起来。在党內討論中，諾斯克一貫站在右边，把对于党的民族主义的一切批評都譴責为愚蠢。他很不耐煩那些"东方佬"，即从沙皇迫害下逃来德国的俄国和波兰社会主义者，特别討厌卢森堡。在参加过1907年社会党国际斯图加特会議以后，他向自己的开姆尼茨党組織报告了关于卢森堡的情况，在报告中，他用挖苦的語气評論了"东方佬特有的那种曖昧不明的資格证明书"。为此，倍倍尔写了一封信对他大加申斥，批評他的立場并热烈地为卢森堡辯护。"有一段时期，"倍倍尔写道，"我曾希望你的思想会有发展。現在，我必須說，这种希望是落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他先后被捕两次，第一次是在战爭剛爆发的时候，只被拘禁了几天，第二次是在1944年7月22日，受到將軍謀叛案的牵連。他在1945年4月俄国人已經打到柏林郊区的时候，逃出了毛比特监獄。1946年11月30日，他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中，作为他的党在議会中的軍事专家之一，諾斯克博得了某些民族主义集团的贊揚，也引起了一般党員群众的反对。早在1907年，德国报紙就登过一篇拙劣的詩歌諷刺他的好战主义：

“在遙远的未来，总有这一天，
要我們大家当炮灰，走上前綫，
到时候，許多后备兵会临陣胆怯，
‘不，我还是跟着媽媽，守住家园吧。’
可是，虽然这些人怕上前綫，
却不会叫我們打敗仗丢臉，
因为有一件事可以保险：
諾斯克到时候准会在那边……

諾斯克挎上馬刀，
諾斯克冲鋒逞英豪，
砰，砰，砰，諾斯克开枪了，
諾斯克攻要塞、夺城堡，
冲啊，杀啊，諾斯克呼声最高，
諾斯克不怕累，来回放哨，
諾斯克打出了最后一顆子彈，
諾斯克一定会这样办到。”

但是，不論是公众的揶揄、倍倍尔的指責或是爱好和平的党員群众的激烈反对，都不能动搖諾斯克的民族主义抱負，特别是他那帝国一定要在非洲获得殖民地的信念。为了替自己的立場申辯，他写了一本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和殖民地政策》的书，这本书正好

在战爭爆发时出版，随即为战爭的洪流所吞沒。

在战时，諾斯克是最堅定的“爱国社会党人”之一，当人們需要挑选一个下层阶級的活动家来平定战爭結束时的革命騷乱时，他的历史使他成为最明显不过的合适人物。諾斯克是最优秀的党組織家；他生活在党內，即使在做了官掌握了大权以后，他在自己的言談举止中也从沒有失去无产阶級出身的風度。他懂得軍事（当他在回忆录中談到他曾打算在社会民主党的监督下改組德国軍队的时候，他夸口說，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托洛茨基的！）；他有組織手腕，但他在党的全国执行委員会中胜过其他同事的主要之点，在于他的更大胆、更敢作敢为的性格。他认为，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帝国之中，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生活才能改善，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努力使德国更为富强。党和軍队应該同时成为一个进行扩張的帝国的两大支柱。他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說，他所以沒有能实现这一宏图壮志，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領袖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特别是謝德曼，总是滿足于对討厌的左派采取姑息手段。但是在1918年底，諾斯克激昂到了极点，他相信只要来几次經过周密組織的小小鎮压，就可以把那些胡鬧的革命者驅散。

血腥的一月

12月25日，有五百来人再次占領了《前进报》社，如果艾伯特不願意自己在党內的威信遭到无可挽回的損失，就必須立即对这一行动进行反击。社会民主党的这份报紙是通过柏林党組織的努力創办起来的，該組織在几十年的日常工作中募集了必要的資金。从法律上說，这是柏林党組織的財产。当大多数柏林社会民主党人脫离艾伯特的党，帮助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他們认

为《前进报》的报社、印刷厂和其他設施都理当屬于他們所有。因此，在广大柏林工人的心目中，占領报社的行动是为了收回柏林党組織被窃取的財产。

当諾斯克担当起負責軍事的內閣职务时，政府手头沒有任何可靠的部队，形势似乎已經无望。决定性的冲突是圍繞着和平主义的警察总监艾米尔·艾希霍恩具体形成的。艾希霍恩那样輕而易举地当上了总监，可是并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权利。他已經組織了一支大約有三千五百人的保安队，这支队伍后来又得到扩大，补充了几千名复員士兵，本来可以增援《前进报》社的占領者。但是，艾希霍恩絲毫也沒有这种反政府的参战意图。与此相反，他在本党的同事迪特曼和哈塞的指使下，却力图逼迫占領者退出《前进报》社；他这种試图調解冲突的努力，連工厂代表委員会也願意参与。假如軍方沒有一直在伺机采取决定性的討伐行动，这种和平調解就有可能成功。可是，軍方得到了发动的机会。

在1919年1月初，新选出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中央委員会开会討論了当前的危急局势。卡尔·李卜克內西建議柏林的各派革命运动——人民海軍师、工厂代表委員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团——組成統一战綫。卢森堡反对李卜克內西的主張，她的立場得到列夫·約吉契斯的支持。約吉契斯提議在《紅旗报》上刊登一篇由卢森堡代表斯巴达克团中央委員会签署的激烈声明，宣布李卜克內西在工厂代表委員会中不再代表斯巴达克团。①

---

① 有关斯巴达克派两大領袖这一冲突的文件，現在还可以見到两份：其一是保尔·列維于1921年5月4日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中的声明，載于他的小册子《有何罪过？》，柏林1921年版，参看罗森堡，第330—333頁；其二是拉狄克的一封信，載《德国革命簡史》，柏林1926年版。

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柏林。柏林工厂代表委員会是“內部敌人”的最大化身，是一个战斗性組織的核心。他們比組織不明确的工人士兵委員会握有更多的实力。为此，艾伯特有意識地向工厂代表委員会挑衅，在1月4日命令艾希霍恩离开警察总署，由社会民主党人奥伊根·恩斯特继任他的职务。1月5日，諾斯克下令进攻警察总署和报社。工厂代表执行委員会认識到这一試探行动的重要性，决定进行战斗以保留艾希霍恩的职位。同日开会的斯巴达克团中央委員会通过一項动議，反对支持艾希霍恩，理由是这可能导致艾伯特政府的倒台。当他們后来一反自己这种立場的时候，他們仍然明确声明反对推翻政府。

这样一来，在反对德皇帝国主义复辟的斗爭中，第一个挺身而出的和最重要的集团工厂代表委員会，就不得不在一切党的領导机构和組織都与它疏远的情况下孤軍作战。他們向艾伯特內閣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让艾希霍恩复职，立即把軍队解除武装和全部遣散（此外并提出照例的一套社会主义要求）。不过，工厂代表委員会并沒有要求艾伯特內閣辞职；尽管口头上进行着种种爭論，他們在最后一刻到来以前，始終沒有认識到“艾伯特同志”眞是他們的敌人（当然也不知道艾伯特和軍队之間的协定）。他們希望艾伯特会在压力下最后屈服，接受妥协。

1月6日，发生了支持艾希霍恩的示威。这次示威的規模之大超过了任何人的預料。在柏林，数十万人列队通过凱旋大道。当时的群众情緒給同时代的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情緒在近几个月中得到了很大发展。只要有領导有組織，这些群众就是一支不可抵擋的大軍。

李卜克內西在威廉·皮克的陪同下去找工厂代表委員会，宣布艾希霍恩事件是向反革命发动决定性打击的起点。委員会决定

继續占領《前进报》社，并发出举行总罢工的号召。由五十三个人組成的行动委員会选出三名共同負責人——李卜克內西、格奥尔格·累德博和保尔·朔耳策。这个委員会——有組織地指揮德国革命者的第一次尝試——是由不代表政党而代表各个工厂的工人干部組成的，其中只有很少几个不顾其本党公开表示的意見而参加进来的政治家。不論是李卜克內西或累德博，参加这个委員会都沒有得到本党的批准。

当时的局势是混乱复杂的。工厂代表委員会感到自己的政治影响并不怎么可靠。他們和人民海軍师的关系是紧張的；水兵們也难以控制。可是，尽管有这些先天的弱点，工厂代表委員会仍然日益成为威胁軍队和艾伯特內閣的最大危險。古斯塔夫·諾斯克正确地分析了局势，指出它对于政府說来是严重的：

“由于威廉街〔政府所在地〕上可能有騷动，政府成員不得不在某个別的地方安排会晤〔也就是說，轉入了地下〕。在我听够了‘打倒諾斯克’的口号以后，我在那里遇到艾伯特和巴克……过了一会，来消息說斯巴达克派占領了《前进报》社，不一刻又占領了其他报社。我們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起，由于继續存在着威胁，回家是不相宜的。到外面飯店里去吃飯也办不到，因为服务員正在罢工。我給一个熟人打了电話，他給我們送来一些吃的。到了深夜，我又在他的寓所里見到謝德曼和巴克。我們談了很多事情，但是得不出任何結論。連明天早晨的柏林会是什么样子，这时都很难猜測。”①

軍方需要有时間为进軍柏林作好准备。“在1月6日，上校手头的軍队至多也不过几百人，而解救柏林所必需的軍队数目却要

① 古斯塔夫·諾斯克：《从基尔到卡普：德国革命的历史》，柏林1920年版，第67頁。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六（1月5日）晚上。

比这大得多。"①

如果迅速推翻艾伯特內閣，在柏林建立起一个工人政府，就会像風箱一样把德国正在冒烟的火堆煽旺。一旦各工业中心行动起来，已經士气涣散的軍方就无法重新聚集起足够的干部。他們就会丧失向柏林进軍的机会。这正是他們万分恐惧的事。在1919年，尽管工厂代表委員会存在着那么多弱点，它們只要作出最低限度的努力和牺牲，就能够粉碎反革命。在柏林工人和总参謀部之間持續不断的斗爭中，軍官团遇到了自从帝国成立以来再不好过的日子。

工厂代表委員会沒有认識到自己事实上是多么强大。內部的紧張关系蒙蔽了他們的眼睛，为政治家們所拋棄这一处境使他們惶恐不安，在已經由于无謂的辯論而丧失了最宝貴的时机以后，他們还不能一致同意采取这样一些具体措施，即号召全体柏林工人拿起武器，立即对柏林地区的少数軍队据点展开进攻，同时进軍波茨坦。不让重新聚集起来的軍队在柏林的各战略要点立定脚跟，具有攸关大局的意义。

諾斯克写道，凱旋大道上的群众等待着，等待着指示、号召和具体的計划。他們沉默地和有紀律地等待着，等待了好久好久，終于回家去了。

1月7日，柏林大学的学生們发表了一篇号召保卫"德意志神圣秩序"的宣言。大学生們号召当时仍然敌視艾伯特赤色內閣的保守派不記前嫌，和社会民主党并肩作战。

在这宝貴的两天时間內，馮·呂特維茨将軍得以在柏林近郊聚集起軍队。在累庫伊斯的直接指揮下，他們等待着进攻市区的

① 《从基尔到卡普》，第70頁。

命令。1月8日，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兰德斯貝尔格和威塞尔共同发表了反对斯巴达克团的声明，揚言他們要以暴力对付暴力。柏林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就是命令軍队进攻的信号。不再能置身事外的斯巴达克团，也发表了宣言宣布它和战斗着的工人团結一致。几小时以后，波茨坦团队开进城內。这是一支由旧軍队的殘余拼揍成的杂牌軍，其中包括軍官、二等上士、第一近卫团的士兵、第一猎兵营、一座軍曹学校的学員！騎兵近卫师和两个炮兵班。

軍队毫无阻擋地开进了市中心。郊区无产阶級以充滿憎恨的眼睛看着軍队占領这一战略要点，可是他們自己的战斗意志已經由于缺乏組織、領导和行动計划而瓦解了。

軍队的第一个目标是攻占《前进报》社，这一行动由于和革命者进行談判而推迟了几小时。与此同时，在报社的四周、友盟广場和附近的大街上都架上了迫击炮和大炮。1月9日早晨，軍队开火了。在这个人烟稠密、街道狹小的地区，一开火就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从柏林市中心响起第一枪的时刻起，革命者的失败命运便已注定。据守《前进报》大楼的一小群人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已經无望，派遣七名代表打着白旗去見軍队指揮官談判投降問題。于是，柏林見到了它的第一次納粹暴行。求降代表被带到龙街的一个哨所，先受到皮鞭和大棒的拷打，然后全被枪决。

柏林爆发了时断时續的巷战。柏林工人的最孚众望的領袖之一、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格奥尔格·累德博被捕。他的被捕粉碎了工人們对艾伯特內閣的最后一絲幻想；工厂代表委員会宣布成立一个李卜克內西-朔耳策-累德博政府——一个在波茨坦团队进攻后已經无济于事的步驟。

1月10日，斯巴达克团又一次試图中止它和工厂代表委員会

的联系。它再次禁止李卜克内西参加該委員会，但是并无效果。

革命者逐漸丧失斗志。到1月12日，波茨坦团队已經占領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建筑物，被軍队追逐的工厂代表委員会轉入地下。柏林的街头拦上了铁絲网。到处都是崗哨，到处都是这样的告示："此处禁止通行，違者格杀勿論！"

1月15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捕。他們本来很容易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就像列宁在1917年7月被迫逃往芬兰那样），可是他們并沒有立即离开柏林，而是躲在西柏林一个同情者的家里，而且連一支足够的卫队都沒有。不用說，这两个被追捕的最重要的对象很容易地就落网了。他們被带到設在伊甸飯店里的軍队临时总部，总部里的人觉得沒有必要把他們的被捕通知艾伯特，而艾伯特事先也沒有发出他們如果被捕应作如何处置的指示。在我个人以及其他許多同时代人看来，呂特維茨将軍的总部从一开始就打定了要杀害他們的主意。

沒有經过任何审訊，他們在当天夜里就遭到杀害。

經过特别挑选的态度野蛮的士兵把他們横拖竪拽地押过动物园，在一个地方枪决了。罗莎·卢森堡的脆弱軀体被扔进了国防运河，很久以后才被发現。"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野蛮而怯懦的暗杀……是这一动蕩时期最卑鄙的表現……凶犯后来受到軍事法庭的审判，但只判了很輕的徒刑。法庭接受了他們的辯詞：'受害者是在企图脫逃时被枪杀的。'这一句当时捏造出来的遁辞，在十五年后又可怕地借尸还魂了。"①

① 奥托·布劳恩：《从魏瑪到希特勒》，紐約1940年版，第84頁。布劳恩是普魯士內閣的社会民主党总理。

第四章 1919—1920年的内战时期

工厂代表委員会的失败以及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的遇害，标志着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結束。从德国的前提条件出发，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員会都曾試图发展一种旨在防止帝国派势力重新組織起来的社会主义政策，但它們也全都遭到了失败。郑重反对以恐怖为武器的人道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本人便被恐怖主义者杀害了。

在一个文明城市的中心，对社会主义領袖——其中有一个还是身带殘疾的弱女子——实行半公开的暗杀，是德国社会中的一个新特征。这一事件造成了巨大影响。工人們要为被杀害的斯巴达克派領袖报仇。他們产生了一种新的仇恨心理；他們摆脫了最初的天眞。这是一个最簡单、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使他們明白凡是反对复辟力量的人都会有什么遭遇。在1月15日以后，德国革命者原来的慈悲心腸大部分已成明日黃花了。作为年輕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領袖的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的去世，的确是一个悲剧。他們的死亡象征着一切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最优良傳統发展成熟，并使之适应于德国历史新阶段的努力宣告結束。

至于艾伯特——卢森堡的反面——的立場，也必須被置于1918年欧洲正在搖摆不定的势力均衡的背景上来考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些想像力不强的人，但好歹也算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們竭力为德国在凡尔賽和約签訂后的欧洲重新抬头

而斗爭。他們宁願和法英两国达成任何安排，而不願和俄国合作。艾伯特的坚决反对斯巴达克团，就如他的一心要保存德国社会旧結构一样，正反映了这样一种立場。

从他和德国軍队的合作来看，在社会民主党的空想家和空談家中間，艾伯特是一个現实主义的政治家。假如他的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巴达克派一致行动。就会为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打开閘門。他认为，这股洪流就会把帝国毁灭得干干净净，使它不再有任何复辟的可能（不論这种复辟采取多么温和的形式）。这种轉变为社会主义經济的局面就会把德国和革命的俄国联在一起，从而使德国脫离西方列强的范圍，成为俄德軸心的一端（这个軸心将沿着莫斯科-哥尼斯堡-柏林的路綫形成，包括华沙、布拉格、維也納、布达佩斯在內）。

因此，艾伯特和諾斯克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和使用一切手段来挽救帝国。而在挽救帝国的同时，艾伯特指望能实行一个逐步进行社会改革的长期計划，这个計划将会提高工人的地位和加强他們的影响。他的政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是战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新环境的适应。在巴黎和倫敦，人們都贊揚他能洞察新欧洲对德国具有的意义；他是德国的救主。“的确，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可以說是德国唯一受过政治教育的阶級，而目前到处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領袖，則可以說是德国各政党中唯一有經驗的行政管理人。”①

可是，德国介于俄国与西方之間的这种奇特的尴尬处境，解决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不光是把革命运动可以見到的部分、即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員会消灭掉就能完事的。帝国正处于

① 《經济学家》，倫敦，1918年11月16日，第87卷，第682頁。

分崩离析之中。它在欧洲的經济和政治地位已經一落千丈。德国社会的一切阶层都感受到了战敗的后果，不可能用假装什么事也沒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也不曾有过的办法抹杀掉这一切。

志願团和民族布尔什維主义

把帝国軍队的干部非法地重新聚集起来的志願团，①是由一些軍官領导的，这些軍官始終怀着的一个主要願望，就是消灭掉以任何形式出現的工人运动，包括消灭他們的暫时同盟者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們认为，在瓦解着的德国，整个工人阶級都有成为布尔什維克的可能。德国旧政权的瓦解，也反映在最热衷于保持它的那些集团的身上。被战爭夺去立足基础的青年民族主义者焦急不安，对老一輩感到不满。將軍們、保皇党人、前高級官僚的知交密友們，这时正在各自施展着纵横捭闔的手段，他們或則抗議凡尔賽条約，或則并无抗議表示；总而言之，他們的大声疾呼只是一种托詞，而不是行动的号召。年輕一輩的人則希望对战胜国展开积极的抵制，以恐怖主义的計划反对占領，消灭采取合作立場的共和派，使用示威性的暗杀手段等等。在他們的密謀組織中，这些年輕人展开了无休止的辯論，企图探寻出能够迅速解放德国的最佳計划。

志願团使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冲动和軍队干部的經驗与技巧結合了起来。革命者和志願团之間的鴻沟，可以从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馮·扎洛蒙的一件軼事上反映出来。扎洛蒙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他的自傳《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生动地写出了志願团和"費姆"②的历史，总結了他那一代人的感情。在发生11月事

① 参看馮·厄尔岑：《1918—1923年的德国志願团》，慕尼黑1939年版。

② 在中世紀德国，"費姆"（Fehme）是一种私自組織的秘密法庭，专門审判那些逃避了官方处罰的罪犯。先由志願团后来又由納粹实行的对政敌的暗杀，就是由一个自称为"費姆"的团体組織的。

件的那些日子里，他还是柏林-利奇菲尔德軍事学院的一个不滿二十岁的学生，当时，他在柏林各处游浪，为自己祖国的命运深感痛心。他到处都看到"叫嚷着的暴民"从每一个敢于佩着肩章上街的軍官身上撕下肩章，把这些德意志荣誉的象征品扔到地上任意踐踏。受到这种經驗的刺激，扎洛蒙参加了一个志願团，随着它在波罗的海战役中服役。

回到德国以后，他所屬的志願团被調到哈堡，这是一切生活都以橡胶工厂为中心的汉堡附近一个灰色的工人城鎮。第二天，扎洛蒙的一个伙伴霍夫曼和他有这样一段对話：

"霍夫曼：跟我到那边看一看吧。那里有多少我不喜欢的东西啊。〔他把扎洛蒙拉到讲堂一角的大窗子面前。〕看，操場上正对着我們架起了机关枪。这半小时里，我一直看着他們在堆积彈药。不但有男人，还有女人和小孩子。街上滿是武装了起来的工人。可是，这还不算，你再看看这边，看看学校背后的那片空地。那是正規的战壕！我們被包圍了，干脆是被包圍了。

扎洛蒙：我們的軍官知道这一切情况嗎？

霍夫曼：当然知道。可是他們在干什么呢？他們一直在談判呢！已經同工人自卫队、市民自卫队的委員会和代表以及軍队司令部談判好几小时了。

扎洛蒙：什么？这儿有正規軍嗎？那还不錯。

霍夫曼：正好相反。第九团在这儿，可是今天早上，这些猪玀把他們的軍官逮捕了。他們打开了仓庫，把枪支拿出来分发給工人。

〔扎洛蒙继續叙述下去：〕我們沉默地看着窗外，感到非常孤独。从学校周圍的群众中升起了一陣仇恨的浪潮。这是两个人种之間的仇恨：一种人对另一种人从肉体上感到厌恶，他們彼此憎

恨到这种程度，以致誰看到誰都觉得噁心。

我們瞪大眼睛瞧着群众——我們沒有瞧那些武装起来的个人，因为他們更危险。但是，使我們印象更深的，却是这一大群沒有眼睛的黑压压的群众。”①

这时，在同一类型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当中也在同一个馮·扎洛蒙的思想中——兴起了一股相反的潮流，即模模糊糊地希望德俄两国有可能結成反西方的联盟。只有在全体德国人彼此和解、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斗爭的情况下，凡尔賽的枷鎖才能被粉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才能恢复。內战使德国人分裂成了两个种族，而处于这样一种分裂之中，德国就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在这样的环境下，許多人开始向往一种能够把軍方和无产阶級力量团結在一起的专政。正在寻找着有效行动工具的共产主义知識分子，被吸引到了这种青年民族主义者的身边，对这些举止風度都大不相同于德国工联主义保守派的活跃青年发生了兴趣。

在汉堡，共产党的領导人是两个社会主义老战士海因里希·劳芬堡博士②和弗里茨·伏尔夫海姆。战时，在他們反对社会民主党官僚的勇敢斗爭中，他們曾譴責帝国以及替它的掠夺性扩張主义辯护的社会党人。1915年，他們曾发表一本譴責德国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但是到1918年，在汉堡这个面向世界的德国港口，人們先于别处幷且更容易地感到了战敗的后果。德国的对外貿易完結了，碼头閑下来了，汉堡工人最先体会到了后来由希特勒說出来的經济眞理：不是出口，就是死亡！

① 恩斯特·馮·扎洛蒙：《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柏林1931年版，第163頁以下。

② 劳芬堡（死于1932年）以他所写的汉堡社会民主党史这一淵博著作知名于世。一个鼓吹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尼基施在为他写的訃聞中說：“在1919年，劳芬堡已經从各大洲着眼来考虑問題。”

1919年10月，劳芬堡和伏尔夫海姆到柏林毛比特监獄訪問了卡尔·拉狄克（他从一月事件以后就一直作为政治犯被囚禁在那里）。他們向拉狄克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他們为之創造了“民族布尔什維主义”这样一个新詞）。他們的理論是：在签訂凡尔賽和約以后，德国将淪落到甚至比三十年战爭之后拿破侖統治时代还要悲惨的地步。如果我們現在不創造一种能够把全民族的精力結合为一个坚实整体的組織，德国人此后就将永无出头之日。我們必須致力于国內的复兴，挣断外国的枷鎖；而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无产阶級专政。虽然由于四年的战爭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无耻叛变，德国人民的力量已經被深深削弱，却还强大得足以——如果进行的是一場爭取維持生存的战斗，一場保卫全民眞正利益的战斗——实現俾斯麦的話，喚醒一个从波罗的海到康斯坦次湖都武装到牙齿的德国。①

拉狄克对此很感兴趣，和这两个来自汉堡的人討論了他們的建議具有的意义。他們的思想和拉狄克本人的政策有一些关联，这种政策是他和布哈林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期間发展出来的，其內容是：俄国应該把革命战爭的火焰延燒到欧洲。俄国加上德国，应該把布尔什維克的使命带到英倫海峽，把英美軍队赶下大西洋。可是在最近期間，拉狄克的这种雄心壮志已經变成了类似絕望的心情。他担心外国干涉軍会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发动进攻期間。他在牢房里心神不安地来回踱步，时刻等待着傳来最坏的消息。在他看来，和一部分德国軍队取得諒解，通过重大的政策轉变打开一个德国战爭的新阶段以挽救革命俄国，是一条大胆的出路。在1918年，拉狄克曾主張继續和俄

① 海因里希·劳芬堡与弗里茨·伏尔夫海姆：《革命人民战爭，还是反革命內战？》，致德国无产阶級的第一篇共产主义演說，汉堡1920年版。

国当时的主要敌人德国作战，也就等于是无声地站在协約国一边。而在这时，当法国、英国以及站在背地里的美国成了俄国的主要敌人以后，拉狄克則又感到有可能和战败的德国結成反西方的同盟。

最初，劳芬堡和伏尔夫海姆在斯巴达克团內贏得了很大一批追随者，这个組織在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被杀、它的其他杰出領袖大部分被捕以后，又一次处于混乱和瓦解的局面。在1919年，獄中的拉狄克和列宁的政治局之間是沒有正規联系的。当拉狄克在1920年1月返回莫斯科报告工作时，列宁断然拒絕了民族布尔什維主义，认为它簡直是荒謬絕倫。

列宁对民族布尔什維主义

凡尔賽談判震撼了年輕的魏瑪共和国，动搖了它的薄弱基础。在德国，沒有一个集团願意为签訂和約負責。艾伯特內閣担心，如果他們在和約上签字，对政府的支持一向都是半心半意的国防軍就很可能叛变，他們一想到波罗的海地区的部队会开回本国，把社会民主党政府負責人作为祖国的叛徒逮捕起来，便不由得感到心惊胆战。慌了神的艾伯特，秘密地征求軍方上层人物的意見。諾斯克认为如果签訂和約，将軍們一定会辞职，并且以他自己的辞职相威胁，他說："如果将軍們辞职，軍队就会瓦解。如果沒有了軍队，帝国的秩序就无法維持。"①

艾伯特向作为最高軍事权威的兴登堡呼吁。1919年6月17日。兴登堡回答說："如果战衅重起，从軍事上讲，我們在东綫无法夺回波森，守不住我們的边界。在西綫，考虑到协約国人数上的优

① 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301頁。

势和从两侧包抄我們的能力，如果他們认真发动一場进攻，我們就几乎不会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我們的作战能否胜利結束是非常成問題的，可是作为一个軍人，我必須这样說：我宁願光荣地战死，而不願耻辱地媾和。”①

兴登堡的空洞表示沒有能消除惶惑。包括梅克尔在內的好几个将軍感到，如果由社会民主党人諾斯克充当德国的独裁者兼軍队首脑，就有可能重新鼓舞起德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就有可能拒絕这个丢臉的和約而重开战端。作为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又一表現的这种意見維持了三天。到6月20日，格勒納終于打电报給艾伯特要他签訂和約，从而消除了形形色色的一切幻影。

毫无疑問，莫斯科政治局是知道德国国防軍中这种內部变动的。尽管內战持續不断，紅軍和德国总参謀部之間最初的薄弱联系已經在这一时期形成；不过，要把这种薄弱的联系发展成全面打成一片，以軍事联盟来遮盖住革命俄国和資本主义德国之間的对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列宁在毫不含糊地拒絕这一政策时，沒有以它在本党政治局中的鼓吹者，而是以比較不重要的劳芬堡和伏尔夫海姆为攻击的靶子。列宁把他的批評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德国革命工人阶級对外政策的一項积极建議，在这項建議中，他現实主义地分析了战敗的德国在欧洲所处的新的不稳定地位，并且以此为他的立論起点。他写道：

“末了，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不承认凡尔賽和約，这无疑也是他們的錯誤之一，这种見解像克·霍納所表达的那样，表达得越‘庄严’和‘郑重’，越‘坚决’和武断，結果就越发笨拙。在現时国际无产阶級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棄那种荒謬絕倫的、甚至主張同德

① 伏克曼，第282頁。

国資产阶級訂立同盟对协約国作战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劳芬堡等），是不够的。还应該认識到，不容許苏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苏維埃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話）在一定的时期內承认和服从凡尔賽和約的策略是根本錯誤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当謝德曼輩坐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維埃政权还沒有被推倒，維也納苏維埃革命还不是絕对沒有可能去援助苏維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訂凡尔賽和約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們多少替叛徒謝德曼輩分担了責任，多少离开了同謝德曼輩作无情的（和十分冷靜的）阶級斗爭的观点，而滚到了'无阶級的'或'超阶級的'观点上。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显然不同，現在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縛自己的手脚，不应当預先声明說，共产主义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要否定凡尔賽和約。这是愚蠢的。应該这样說：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甚至多少直接危害了）同苏維埃俄国和苏維埃匈牙利結成联盟的事业；而我們共产党人却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賽和約，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立刻加以否定。这个和約能不能順利地取消，不仅决定于德国苏維埃运动的胜利，而且决定于国际苏維埃运动的胜利。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阻碍了这种运动，而我們却要贊助这种运动。这就是問題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們的阶級敌人，剝削者及其走狗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維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維埃革命的許多机会，那末，这种罪过就应該由他們去承担。德国的苏維埃革命会加强国际的苏維埃运动，而国际苏維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賽和約、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极其

强大的国际堡垒)。一定要把解除凡尔赛和約的問題急不容緩地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获得解放的**問題之上**，这就是市儈的民族主义(这該由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鮑威尔之流去提倡)，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例如在德国，推翻資产阶級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賽和約存在一个比較长的时期**。旣然俄罗斯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約，那末苏維埃德意志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同苏維埃俄罗斯結成联盟的情况下，忍受为时更久的凡尔賽和約决不是不可能的。

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做好圈套来陷害德国共产党人，向他們挑衅說：'你們說，你們不願意在凡尔賽和約上签字。'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地对付詭計多端而且**目前**还比他們强大的敌人，不会回答敌人說：'現在我們要在凡尔賽和約上签字'，却像小孩子一样，果然上了这个圈套。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来。公开告訴那个目前武裝得比我們精銳的敌人說，我們是不是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要同他作战，这是愚蠢的，而不是革命的。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級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①

在凡尔賽条約于1919年夏季签訂以后，斯巴达克团內产生了反对汉堡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反应。政治問題上的派系斗争变成了恶毒的相互攻击，因为与此同时，劳芬堡和伏尔夫海姆还反对皮克領导机构的集权主义。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的继承人利用党的地下状态建立了一种官僚主义的統治，对这种統治的反抗几乎遍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58頁。

及斯巴达克团的所有支部。結果，劳芬堡和伏尔夫海姆被开除出党，他們那个分裂出去的集团很快便宣告瓦解。但是，这一最初阶段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在党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幷且在拉狄克继續对此感到兴趣和进行活动的刺激下延长了下去。

魏瑪共和国与共产国际的成立

然而，两个陣营的活动家之間的初步和解，幷沒有立即获得任何成果。軍界領袖們身上的反劳工傳統、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傳統实在太濃厚了，这种傳統使他們对內部的敌人抱有无法压抑的憎恨。因此，德国軍队再度开始了南征北討，不过这一次的战場幷不是敌国的領土，而是归共和国政府管轄的本国土地。它圍攻工人們进行抵抗的据点（例如，不来梅在被圍攻了三天以后才投降），在旧日的旗帜下像过去那样耀武揚威地穿过乡村，侵占城市和工业区，就像它侵占欧洲的許多城市和地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卡普暴动領袖之一梅克尔将軍，变成了出名的"城市征服者"。① 軍队完全按照战时的規則行事。士兵們行进时排成一列纵队以防止狙击者的暗襲，占据城市的主要建筑物，劫掠工人区，成百成百地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把他們几十人一批地就地处决，封閉工人报紙，对进占的城市和地区实行戒严。在他們的各种命令得到执行以后，軍队便开往别处，民政当局重新負起責任，可是气氛已經不同了。

这場內战进行了三年，和俄国的內战同时发生。每一个陣营都愈来愈了解对方，也愈来愈憎恨对方。工人們尽管不断遭受挫折，幷沒有眞正被打敗；志願团虽然不断占上風，幷沒有眞正胜利。

---

① 恩斯特·馮·扎洛蒙：《最近的历史》，柏林 1936 年版，第 89 頁。

在1918至1920年的內战时期，軍队同以前的帝国高級官僚和大企业結成联盟的情况，和老馬克思預料的完全一样。这种社会現实冷却了年輕一代队伍中第一陣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热潮。在一个充满經济矛盾的环境中，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意識形态受到了孤立。尽管在卡尔·列金和特奥多·来帕特①的領导下，德国工人联合会和厂主协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員会来保持国內和平，还沒有立定足跟的德意志共和国仍然被群众罢工的浪潮冲垮了。柏林起事不过是內战的一个重大插曲，用恩斯特·馮·扎洛蒙的話来說，这“是帝国的一种典型状况。德国变成了志願团的作战場所，在这里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战爭”②。从汉堡到康斯坦次湖，在不来梅、埃森、斯图加特、不倫瑞克、薩克森，工人委員会和重新聚集起来的軍队之間經常发生冲突。“各地的工人士兵委員会紛紛按照‘我既在此，我即为主’的原則，主动执掌起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③社会主义工人和革命者站在一起，但是不論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在政治領导中都只占少数。不論在什么地方，他們的領导都是軟弱的，組織都是松散的，并且由于內訌而削弱了力量。另一方面，軍界所能指揮的部队数量也少得惊人，而且装备比較低劣。

不論是軍队或革命者，都把艾伯特政府只当作一种看守政权，它取代了旧的制度，但是为其他的发展敞开了大門。因此，艾伯特急忙組織立宪会議的选举，以便使自己的內閣具有一个新的共和国政府的法律地位。于是，在1919年1月19日，就在这种內战和完全分崩离析的气氛中举行了选举。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票

① 来帕特在納粹政权崩潰后还在世，1946年，他在柏林鼓吹建立統一社会党。列金于1920年12月26日去世。

② 《最近的历史》，第28—29頁。

③ 路德維希·梅克尔少将：《从德皇軍队到国防軍：地方猎兵志願团的历史。德国革命史料之一》，来比錫1927年第2版，第109頁。

贊成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并盼望这个国家立即成立。艾伯特选擇魏瑪作为德国議会举行第一次会議的地点；尽管軍队在一月事变中获得了胜利，尽管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員会被击敗了，柏林仍是一个不够安全的地方。地方猎兵志願团的組織者梅克尔将軍負起保护魏瑪的責任，防止在那里发生革命政变。“部队在十公里以外把魏瑪包圍了起来；处在这一圓圈內的所有道路都由全副武装的軍官和軍士分头把守……因为图林吉亚的乡村和工业小鎭对我們的部队是抱有敌意的。”①

在1919年，德国的內战是最初阶段各种情况的不断重演：政府和志願团部队向工业区进軍，消灭工人士兵委員会的政权。“城市征服者”梅克尔将軍(他所指揮的志願团不过是許多同类部队中的一支)，在他的回忆录中記載了下列行动：2月17日占領哥达；2月27日至3月3日，在哈雷激战一周；4月9日占領馬格德堡；同日占領不倫瑞克，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澤普·厄尔特在当地的統治迅即結束；5月7日至30日，对来比錫采取軍事行动，突击埃森那赫和爱尔福特。

1919年3月，柏林重新发生了战斗。人們謠傳已經有六十名警察在列希登堡郊区被杀死。② 后来证明这个謠傳并不是事实，可是諾斯克却下令进行挨家挨戶寻找武器的大搜查。人民海軍师的营地被包圍了，水兵們經过短时間的战斗后被迫投降。有二十四名水兵遭到了拷打并被立时杀死。战斗中使用了大炮。飞机越过市区上空，到处流傳着它們将轰炸工人郊区的謠言。倫哈特团，特别是一个名叫馬尔洛的中尉，以野蛮地对待革命者出了名。有二

① 梅克尔，第91頁以下。

② 可参看《柏林巷战眞相》，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日报《自由报》，柏林，1919年。

百人以上被就地处决。

但是，尽管斯巴达克团失败了，1919年的春季仍然給欧洲带来了高漲的革命希望。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它的宣言最好地反映了世界共产主义十字軍的情緒、希望和幻想。共产党人认为他們是十九世紀一切革命傳統的合法继承人；他們把自己的組織淵源具体地推溯到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上。第一国际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爭中蛻化了，第二国际又在1914年的战爭中堕落。如果帝国主义社会不为共产主义所取代，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另一場更殘酷的新战爭。

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二名代表，但他們所代表的政党无法同旧的劳工組織相比。各国年輕的共产主义集团这时旣沒有力量，又沒有政治經驗。罗馬尼亚、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只由社会民主党內的同情分子充当代表。

在她遇难前不久，罗莎·卢森堡曾选出两名出席大会的代表，胡果·埃貝尔林和奥伊根·列維納。可是，只有埃貝尔林到了莫斯科，他在会上維护了卢森堡的观点，即认为成立共产国际的时机尙未成熟。由于奧地利代表斯坦哈特大吹大擂地宣布德屬奧地利即将爆发革命，①不了解奧地利形势的埃貝尔林发生了动搖；不过，他并沒有投票贊成建立共产国际，而只是宣布棄权。这样一来，在共产国际的成立宣言上，对于革命扩展起有最重要作用的国家竟沒有签字。

① 我个人很熟悉卡尔·斯坦哈特，他是汉堡的一个排字工人，1918年初来到維也納。在不来梅激进派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我們的大学生集团。1918年11月14日，在发生奧地利議会事件以后，我們一起被捕，并在坐了几星期监獄后一同获釋。斯坦哈特經过二十年受迫害的岁月仍然健在；紅軍于1945年开进維也納时，他被选进了第一屆市政府。

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

1919年4月7日，內战具体地表現为在巴伐利亚成立了一个德意志苏維埃共和国。在德国所有的“邦”中，巴伐利亚是帝国最不同心同德的一个。普魯士的中央集权主义在这里是被深恶痛絕的。位于战爭主要通道之外的巴伐利亚，受到的战禍比較小，但是許多中产阶級的龐大集团早就发展了一种和平主义的态度。巴伐利亚市民忠于他們自己的威特尔斯巴赫王朝，对霍亨索倫·威廉二世沒有多大好感。当战敗的命运把灾难带給帝国的时候，巴伐利亚便为一种离心傾向所震动。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庫尔特·艾斯納，以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統治着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大工业比較少；城市人口主要从事于手工业和小商业。屈指可数的是慕尼黑有一座大工厂馬法伊工厂，另有一座是克虏伯在战时兴建的，另外，在紐倫堡、富尔特、奥格斯堡和施魏因富特还有一些工业。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比德国一般的社会主义者軟弱，他們拥有相当多的知識分子和艺术家作点綴，但是和农民的联系却比較少。

在这些情况下，再加上德国其他地区的內战消息和中欧的危机正在激动着人們的时候，单单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存在就足以引起居民中重要阶层的仇視。2月21日，艾斯納在去邦議会途中被暗杀。凶手安东·馮·阿尔科–瓦列伯爵，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御林軍中尉，出身于巴伐利亚最古老的貴族世家之一，是排他性的保皇党俱乐部图勒联誼会的会員。一小时以后，艾斯納的同僚、社会民主党部长埃尔哈特·奥尔主持了邦議会的开幕幷致悼辞。不料，这时有一个工人委員会的委員、干屠宰行的林德納，在議会中当場开枪打伤了奥尔；他大駡“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凶手”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們要为艾斯納的遇刺負責。在随之而起的混

乱中，又互开了几枪，結果有两个人被打死——一个叫奥塞尔，是中央党的議員，一个是旁听席上的总参謀部成員馮·耶雷斯少校。

慕尼黑陷入了万分激动的状态。人們怀着满腔悲憤，为一貫主張和平的社会主义者艾斯納送葬。他遇刺的地点摆上了花圈；邦議会的大門上装飾了图片和鲜花。人們担心艾斯納的遇刺是一次有計划的保皇党政变的前奏，担心軍官和大学生会用暴力把社会主义者排除出政府，在慕尼黑宣布独裁統治。“在人們的心目中，艾斯納遇刺是由軍官和大学生的大資产阶級叛变阴謀造成的。”①在艾斯納下葬时，全巴伐利亚的教堂都鳴钟致哀。

几天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繆扎姆向慕尼黑工人士兵委員会建議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建議以二百三十四票对七十票被通过，斯巴达克派投的是反对票。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包括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府。尽管他們在議会中的席位不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工人中却很有影响，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和他們妥协。

第一届巴伐利亚苏維埃政府，时常被描繪成为学者阶层和知識分子半瘋狂的冒險。② 政府主要由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組

---

① 艾舍里希-赫夫特：《慕尼黑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三部分，《与布尔什維主义相对抗》，慕尼黑1921年版，第10頁。

② 参看保尔·弗勒利希用“保尔·魏納”的笔名所写的一本同时代的小册子。弗勒利希是共产党的右派領袖之一，在1929年由于傾向布哈林被开除出党。他把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說成是一場滑稽剧（斯巴达克团自始至終都反对这个共和国，认为它是冒險主义的胡鬧）。他很少提到邻国的事件；在斯巴达克团看来，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同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一样，也是一个該詛咒的东西，因此，斯巴达克团尽可能少地报导它們的消息。

“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以滑稽剧开場，而以悲剧告終。它不是共产党人創造的，它是政府中的社会党人、堂·吉訶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思想混乱和玩弄詭計的产物。”保尔·魏納：《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事实与批評》，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15頁。

成，領导它的是一些虔誠地相信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的空想家。这些人后来都证明是严肃的斗士，毫不动摇地为自己所选擇的事业受苦受难。

这个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古斯塔夫·兰道厄尔，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曾写过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賀德林①和法国大革命的文章。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是一种反专制的合作社。兰道厄尔是一个直言不諱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主义道德的卫士，不贊成对阶級敌人采用恐怖和暴力。內閣中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作家埃里希·繆扎姆，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工人中有不少追随者。②政府中的第三个作家恩斯特·托勒，在1919年还是个政治信仰沒有肯定的青年。他也是一个德国人所說的"倫理社会主义者"，一个由于重視社会主义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而拥护它的人。托勒在法西斯时代逃到美国，因为目睹共产党的現实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背道而馳，在精神苦悶中自杀。这一集团的第四个杰出人物，財政部长西尔維奧·盖塞尔，也是一个反官僚主义类型的人。他是亨利·乔治③的信徒，主張实行重农主义的貨币政策和土地改革，以便使农民获得一种新的自由和独立。盖塞尔在这个問題上写过一部书和許多小册子，用生动的語言表达了他对集权主义国家的憎恶。他說："給我們做一些送信、扫街、刷靴子等等的杂事，国家是很适合的。但是，除此以外，国家就不应該再干涉更高級范圍的人类生活。"不过，在慕尼黑当时特有的那种烏托邦气氛中，他倒是建議过在全国設立国家面包房，为每一个人生产

① 約·克·賀德林(1770—1843)，德国抒情詩人。——譯者

② 繆扎姆在蕭恩費尔特城堡被囚禁了五年，获释后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1933年，在霍亨斯坦集中营中，納粹冲鋒队强迫他唱《国际歌》，在他唱到一节当中时杀死了他。他的妻子逃往俄国，在那里被捕。

③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經济学家。——譯者

免費供应的面包，而且不仅生产面包，还制造酸面点心和做蛋糕用的奶油。

巴伐利亚农民同盟在內閣中的代表是屈布勒。另一个成員是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尼基施，他是公立学校的教师，后来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民族布尔什維克和作家。他发表了一部挑战性的反納粹著作①，为了这本书他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布兰登堡-高登监獄，直到柏林被攻克后才恢复自由。

这个政府的"外交部长"弗兰茨·利普博士分别拍发給柏林和莫斯科的两份电报，最富有特征性地表明了巴伐利亚革命者的精神。生怕失去本邦特权的巴伐利亚，在帝国成立后还保留了它派駐柏林的大使，在这一时期，担任大使的是馮·普雷格博士。利普打給他一封內容如下的电报：

"普罗伊斯先生关于德国宪法的第一部但非最后一部的著作②，决不是对巴伐利亚具有約束力的法律，因为我不能牺牲巴伐利亚人用洒在沃特和色当的鮮血贏得的巴伐利亚特权；因此，我命令你立即把辞呈递交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③

利普博士向莫斯科作了下列广播：

"上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級已經可喜可賀地团結起来。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团結一致，合成了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作为普魯士代理人的自由資产阶級已經被完全解除武装。逃亡到班堡的霍夫曼，带走了外交部密室的钥匙。以霍夫曼为走狗的普魯士政策，旨在割断我們同柏林-来比錫-紐倫堡以及同法

---

① 恩斯特·尼基施：《希特勒——德国的災难》，柏林1932年版。

② 胡果·普罗伊斯（1860—1925），德国法学家与政治活动家，是魏瑪宪法的起草人，这里所說的著作，就是指魏瑪宪法。——譯者

③ 轉引自魏納：《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第77頁。

兰克福和埃森煤区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协約国面前把我們描繪成强盗和嗜杀的暴徒。可是，与此同时，杀人魔王古斯塔夫·諾斯克的两只毛爪上却染滿了鮮血……我們需要永久的和平，需要实現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所著《永久和平論》一书中的第二至第五条論綱。普魯士要求休战，只是为了准备另一場复仇的战爭。"①

这个政府沒有能力采取必要的軍事措施，来保卫它的社会主义旗号。作为第一步，他們試图改組保皇党大学生的謀叛中心慕尼黑大学。4月7日被宣布为国庆节，以庆祝新政权的开始。城市被塗成一片紅色；群众喜气洋洋。德国革命尽管遭受了一次次慘敗，仍然朝气蓬勃和充滿希望，相信社会主义的即将胜利，相信德国大多数群众只要宣布一下社会主义的誕生，就能使两代人的願望化为活生生的事实。

这个內閣沒有打碎巴伐利亚的原有制度。公务人員仍被留用，并且得到了新政权将仁慈地对待他們的保证。为了防止新的阴謀和暗杀，建立了由二十八名法官組成的革命法庭。

然而，巴伐利亚和德国的现实形势，很快便向巴伐利亚的热心家們潑了冷水。德国工人阶級并沒有站起来，单靠它本身的重量把敌人压碎。摧殘着它的生命力的那些变乱仍在继續，4月5日，斯巴达克团要求它的成員遵守共产党人的紀律，不和新內閣进行任何方面的合作。②新內閣的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施內彭霍斯特，竟从慕尼黑逃往班堡（那里有一个宣布忠于艾伯特的反对派政

① 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223頁，引用了帝国档案館的一个文件。康德的論綱如下："2. 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不論是大是小，都不得由另一国通过继承、交换购买或作为接受礼品加以吞并。3. 常备軍在經过一段时間后应全部廢除。4. 貸借国債不得影响国家外交。5. 任何一国都不得以武力干涉另一国的宪法和政府。"

② 魏納：《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第144頁。

府)。这一出走深深震动了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七千名党員在4月11日举行秘密投票的結果是，拥护和反对苏維埃共和国的各占半数。

在最初二十四小时的热情消逝以后，慕尼黑工人中間产生了不安情緒，志願团在帝国全境的进軍使工人委員会感到惶恐。不过，工人們由于是巴伐利亚人，还认为柏林不敢侵犯巴伐利亚。但是，慕尼黑駐軍在4月13日叛变了，逮捕了好几名政府成員，并把他們送到埃尔巴赫的监獄中。这一事变深深改变了人們的情緒；兰道厄尔內閣倒台了，一个共产党內閣代之而起。

共产党文献中往往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党为什么让自己被拖入一种它从一开始就认为是災难性的政策呢？原因非常簡单：被駐軍的叛变激怒了的慕尼黑工人要求保卫慕尼黑，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抵擋不住工人們的这种强大趋势。

新集团的首脑是奥伊根·列維納、馬克斯·列文和維克多·阿克雪里罗得。列維納并不是謠傳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个人密使，而是从沙皇俄国逃到德国一个大学中来的許多俄国革命知識分子之一，他是一个接受了德国文化的俄国人，也是一个俄国血統的德国人。

列維納于1883年生于圣彼得堡，父亲是一个犹太富商。俄国的犹太人，就像1933年以前一切地方的犹太人一样，一向羡慕德国的文化。奥伊根起先在圣彼得堡的一所德国学校中求学，以后便去海德尔堡和威斯巴登，在那里，許多年輕的俄国人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团体。列維納在1905年返回俄国，参加了革命斗爭，遭到了逮捕并被送往肖路塞尔堡监禁。他設法逃到了德国，但又被引渡給俄国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一个鉛矿上做工。他再次逃了出来，通过西藏和土耳其斯坦回到他的第二祖国德国。他于1914

年夏在柏林取得博士学位，1915年作为归化的公民被征入伍。在軍队中，他先在俄国战俘营充当翻譯，然后在步兵中服役。战爭結束时，他被柏林的一个軍事机构雇用，在那里遇到了苏俄大使館的新主人。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員，他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参加了斯巴达克团。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列維納活跃于来因区、不倫瑞克和薩克森。他于1919年3月到达慕尼黑，当时，群众把他看成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化身。可是，列維納从来也不是列宁党的成員或列宁主义的信徒。

慕尼黑舞台上的第二个俄国布尔什維克，和他是一路人物。馬克斯·列文于1885年生于莫斯科，也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他也曾在1905年革命中被捕，后来逃往苏黎世，在該处攻讀科学。他在这里和列宁发生了联系，并且遇見了布尔什維克集团的其他成員，不过，他并沒有变成一个职业革命家。列文以后来到德国，入了德国籍，继續研究科学。战爭爆发以前，他被征入步兵，一直参加作战到1918年。他在这年11月去慕尼黑，以斯巴达克派的身份担任了士兵委員会的主席。

新集团中另一个有趣的人物叫魯道夫·埃格尔霍弗，是一个参加过1917年基尔兵变的青年水兵。他同賴希施皮奇和克伯斯一起被判处死刑，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他是在1918年被釋放后来到慕尼黑的。

新領袖們认識到，能够生存下去的一切机会都取决于立即組織軍事防御，只有这种防御才能把慕尼黑插曲延长下去，直到巴伐利亚境外的运动逐漸发展到席卷各个工业区。埃格尔霍弗負起組織一支紅軍的責任。可是，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的生命是过于短促了，因此，被他組成为一支支游击队的二万名工人始終沒有能

編成正規軍。来自附近普希海姆拘留营的俄国战俘，加强了埃格尔霍弗部队的力量——这一事实在柏林的宣傳中被广泛利用。

几天以后，严酷的現实便結束了短促的数日欢庆。当时出現了三个中心——由紅軍据守着的慕尼黑；設立着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班堡，这个政府不断地号召工人抛棄暴动主义者；最后是英戈尔斯塔特，这里聚集着諾斯克的軍队，准备向慕尼黑进軍。

在革命者的陣营中，混乱和分裂日甚一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受了斯巴达克团的領导，但完全是勉强的。特别是托勒坚决反对这种領导，为了同他协商丧失了很多时間；最后，他总算让了步，負起軍事指揮的責任。他在达豪打敗了国防軍——这一插曲显示了年輕的托勒身上出人意料的軍事才能，也鼓舞了慕尼黑的革命者。在此期間，馮·艾普上校組織了民防团、学生志願軍和志願团，从四面八方、特别是从海德尔堡和土宾根得到大量支援。而慕尼黑的革命者則始終处于孤立地位；事实上，根本就沒有出現过任何来自帝国别处的支援。不过，紅軍在起初却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有好几个飞行員脫离了政府軍。革命者滿怀希望；全德国都人心惶惶，特别是在邻近的薩克森地区。

但是，慕尼黑集团沒有能够把巴伐利亚的农民和中产阶級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最初，乡村地区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但是到这时，却由于慕尼黑-柏林战爭在他們的土地上进行而深为不安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开始动搖，托勒建議同社会民主党的霍夫曼讲和。可是，由于霍夫曼公开地站在諾斯克一边，而諾斯克又公开地和旧軍队站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和解。

4月13日，一群工人在路特波尔德大学預科学校杀死了十名被囚禁者，这些人都是被目为反革命密謀中心的图勒联誼会的会員。这十个人中有一个是妇女，海拉·馮·威斯塔普伯爵夫人。

政府并沒有下令处决这些人质，但是人們却紛紛傳說这是政府干的，結果，內战中的这一事件便被充分利用，作为指責苏維埃政府实行恐怖政策的证据。

5月1日，軍队以一营社会民主党志願軍为前导开进了慕尼黑。于是开始报复，其恐怖程度超过了巴伐利亚革命者的恐怖措施。埃格尔霍弗同其他許多紅軍俘虏一道被杀。兰道厄尔受到酷刑折磨，并在即决軍事法庭的审判后被处决。工人住宅区遭到劫掠，志願团的士兵照例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另一个同大学預科学校事件相对应的插曲。一个目睹了在斯塔德海姆监獄处决人犯情况的人，作了以下的报导：

“哪里有犯人在窗戶口露面，士兵們就立即向哪里开枪。他們不願让别人观看在监獄院子里进行的就地处决。有三十个人就这样被枪毙。我亲眼看到了这件事。这是在5月4日晚間7时半，那天正是星期天。在前一天，已經有好几个人被目为示威者在街上被枪杀。有两个妇女跑到尸体面前大声痛哭，哀号着‘我的亲人，我可怜的亲人’。这时，一个士兵喊道：‘抓住这两个女的，她們是同党，’于是，她們便披头散发地被带到斯塔德海姆；首先进来的是一个法兰西斯派托缽僧，接着是这两个妇女。就在她們喊着‘天哪，天哪’的时候；她們在士兵們的排枪齐射中倒了下去。那个托缽僧向士兵們說，你們不觉得害羞嗎？士兵們却哈哈大笑。他們把尸体剝得精光，特别注意剝下死者脚上的鞋子。他們从死者的手指头上褪下戒指，拿走手表。”①

慕尼黑插曲对德国中产阶級产生了强烈影响，增加了他們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憎恶。巴伐利亚变成了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一

---

① 阿尔科-瓦列伯爵的朋友威廉·克雷奥夫迪的报告，轉引自魏納：《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第110頁。

邦，这种情况阻碍了成立社会主义組織的一切企图。共产党轉入地下。沒有在最初几天被杀死的領袖們，也都被民事法庭判处了长期徒刑——他們当中包括第一届內閣的領袖托勒、繆扎姆等。列維納在6月3日被判死刑，几天后被处决。

对于每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說来，慕尼黑变成了反动的同义語。許多慕尼黑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逃离这个城市，在許多情况下，柏林的社会民主党警察保护了这些避难者，如果沒有德国內战，慕尼黑絕不会变成希特勒运动的发源地。

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

假如巴伐利亚的这段历史是在一个稳定的欧洲孤立发生的事件，它就会眞正是一場滑稽剧或悲喜剧，像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說的那样。但是，我們必須結合两方面的背景，即德国持續不断的內战和中欧、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島整个地区的騷乱，来考察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

从俄国革命一开始起，布尔什維克的宣傳就在奥匈帝国的战俘中間找到了一块特别肥沃的土壤，这些人甚至更盼望哈布斯堡王朝的傾复。归国的战俘发現，他們的新祖国无論在經济或政治方面都很不稳定。各个民族之間的仇恨——哈布斯堡王朝为維持自身的困难平衡而挑唆各个民族彼此相爭的結果——在王朝复灭以后仍然全部保存了下来。

从匈牙利战俘中产生了一群相当重要的新共产主义信徒，在他們当中，貝拉·庫恩迅速树立了声誉。庫恩于1886年出生在錫拉吉-彻，一个屬于匈牙利和罗馬尼亚之間引起爭执的多事边区特兰西瓦尼亚的地方。他是一个乡村公证人的儿子，从大学預科学校毕业后，开始当新聞記者，后来又在附近的柯罗澤瓦（克劳森

堡）做工人疾病互助会的雇員，并在那里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战争爆发时，他被征入柯罗澤瓦匈牙利軍第二十一团。他在1916年被俄国人俘擄，送往西伯利亚的托姆斯克战俘营。

在战俘营中，貝拉·庫恩以进行热烈的社会主义宣傳和坚持反哈布斯堡立場，很快在伙伴中出了名。革命爆发后，他到了莫斯科，和他的密友蒂博尔·沙姆耶里組織了一个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組。[1] 1918年11月，庫恩依靠一張化名尤金·塞巴斯提安的軍医护照返回布达佩斯。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駐在布达佩斯的俄国紅十字会代表团，在他最初的努力中給了他帮助。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一群前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尤利烏斯·阿尔帕里、符拉基斯拉夫·卢达斯、貝拉·桑托等。

匈牙利共产党于11月21日成立，在布达佩斯不安的气氛中，影响很快便越来越大。1919年2月21日，在发生了游行示威和街头騷动以后，共产党的領导人被捕，共产党的报紙被封閉。以后的几星期中，在要求匈牙利割让边境領土的罗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下，政府迅速瓦解。

3月21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領导人到监獄中訪問了貝拉·庫恩，邀請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在监獄中签訂了以下列三点为基础的两党协議：（1）成立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共同执政；（2）立即建立一支革命軍队，以保卫匈牙利不受罗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3）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統一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所以这样改变立場，是因为面临着貪得无饜的邻邦的威胁，他們感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已經无法維持匈牙利的独立。在他們到监獄中訪問庫恩的同一天，內閣接

① 1918年，英国社会党出版了一部貝拉·庫拉在那一年为《眞理报》撰写的論文集：《貝拉·庫恩革命文集》，倫敦1918年版。

到了法国維伊克斯上校送来的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軍队立即从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馬尼亚的边境地区撤退。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借助俄国軍队消灭他們的主要敌人罗馬尼亚。

在这一时期，尽管布尔什維克的政权还很軟弱并且为干涉軍所包圍，革命和反革命陣营两方面却都认为，紅軍出現于中欧是指日可待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二十四小时內的轉变震动了西方。巴黎、倫敦和柏林每天都在等待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采取类似的举动。和匈牙利相比，他們在各方面的处境都优越得多。奥地利既沒有本国的志願团，也沒有占領軍；它的新边界是稳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潰造成了一个社会眞空，使社会民主党成了其中唯一有組織的力量。它只要发布一下宣言，完全用不着恐怖手段就可以取得政权，而在欧洲能够这样做的工人党，除它以外还找不出第二个。

可是，在向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报告奥地利即将爆发革命的时候，斯坦哈特却未免有些根据不足。共产党人在奥地利的影响，比在德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坚决反对对他們所选擇的中間道路有任何偏离；和他們的紧邻意大利或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相反，他們代表溫和的一翼。这个党的普通党員以日益增长的热情注視着俄国革命的发展，要求在奥地利采取俄国的方法，但是，他們却能够通过在这些党員中間进行巧妙的活动，保持住中間路綫。全国都选举了工人委員会。和德国的情况相反，傳統的工人組織幷沒有和这些委員会展开斗爭，而是設法吸收它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領袖的每一篇演說，都以攻击諾斯克和艾伯特开始，以庄严地宣布同情列宁和托洛茨基結束。如果說布尔什維克的方法不适用于奥地利，那只是因为这

个国家太弱小，对外国援助的依賴性太大。①

以奥托·鲍威尔和馬克斯·阿德勒为首的奥地利馬克思学派，发展了一种关于何时可以用无产阶級专政代替民主方法的理論。他們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級已經通过議会程序取得多数，而占少数的反动派进行暴力反抗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这时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几乎一半选民的支持，因此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贏得多数。不过，在震撼了一切哈布斯堡继承国的政治动乱中，他們的溫和社会主义綱領实在是一种幻想。

匈牙利共产党人焦急地等待着奥地利革命的爆发。一群宣傳家和組織家被派往維也納。他們当中有一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奇怪人物。在这些人当中，前布达佩斯律师恩斯特·貝特海姆享有一定的名气；他是欧洲第一个企图以暗中破坏挑起群众暴动的人。4月18日，他的集团放火焚燒奥地利議会，同一天晚上，匈牙利共产党人企图发动政变，但是，就連大多数奥地利共产党人都反对这一行动，不用說，社会民主党工人更不会被这类方法引到暴动中去了。

当时，奥地利的工人运动正为一个問題而深刻不安：参加不参加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是否和匈牙利結成联盟，把被包圍的社会主义国土扩展到意大利和德国去。为了应付他們的溫和路綫在党內遇到的反抗，社会民主党的領导人已經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維也納进行的幼稚和冒險主义的干涉，恰恰給了他們再好也不过的帮助，因为对于促进奥地利工人的团結說来，这种干涉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大得多。

---

① 参看卡尔·托曼与埃尔弗里德·弗里德倫德尔〔即路特·費舍〕：《德意志奥地利是否具备了成立苏維埃共和国的条件？》，在1919年6月30日德意志奥地利工人协会全国会議上的报告，維也納1919年版。

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的生命非常短促，1919年3月21日成立，同年8月1日就宣告結束。經驗不足和缺乏干部的共产党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从而使中产阶級和农民都对它抱敌視态度——这些錯誤中尤以4月4日的法令最为严重，該項法令規定，凡規模在一百摩尔根①以上的地产，均須并入生产合作社。这种土地社会化后来被列宁看成是一个基本錯誤（他正在設法为俄国大多数农民找寻一种生活方式）。他忧虑地注視着新的匈牙利社会党动搖不定的政策，并且建議庫恩不要放棄共产党干部的独立組織。庫恩对之表示反对，这一爭执后来成了共产国际一次广泛討論的中心問題。

6月24日，在前匈牙利軍队的軍官領导下，布达佩斯爆发了一次反革命暴动。暴动很快被鎮压了下去，但是它削弱了抵抗协約国軍队入侵的力量。6月末，匈牙利人在对捷克人的作战中取得了局部胜利，在几个星期內，存在过一个斯洛伐克苏維埃共和国。通过在7月初达成的妥协，匈牙利軍队从斯洛伐克撤退，作为交换条件，罗馬尼亚軍队答应撤出占領的匈牙利領土。可是，在此以后，罗馬尼亚人却继續进攻。7月29日，他們在通向布达佩斯的門戶塞格德渡过蒂薩河。匈牙利軍队发动的反攻以慘敗告終，这一来，苏維埃政府便立即崩潰。8月1日，共产党人辞职，工会建立的政府在几天以后就轉移到資产阶級政党的手中。

貝拉·庫恩、尤金·瓦尔加、格奥尔格·卢卡奇、馬加什·拉科西等人逃到了維也納，被拘留在斯坦霍普瘋人院一座特殊的附屬建筑物中。1920年7月15日，他們乘坐一辆俄国紅十字会的火車离奥赴俄，在那里，他們作为欧洲唯一具有重要的本国革命經驗

① 一百摩尔根等于五十俄亩。——譯者

的共产党人集团，受到布尔什維克的热情接待。他們很快便并入了俄国党机器，并且在国家机关中担当起各种职务。①

---

① 特别是貝拉·庫恩，他积极地参加了內战，以后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个亲密合作者。他于1937年夏季大清洗的高潮中被捕。和庫恩一同关押在列福托沃軍事监狱中的另一个政治犯，曾經看見他在一次审訊后回来时，向天空沉默地揮着拳头发出絕望的抗議。維辛斯基的政策一向是，决不让非俄国的共产党重要人物在证人席上有人为他們作那怕是受严格控制的发言。最后，庫恩在1937年的某一天，于关閉着的門背后被枪决了。

尤金·瓦尔加，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的經济部长，变成了苏联首屈一指的經济学家，在以后二十年的期間一直为政治局分析資本主义經济的趋势。直到1948年1月，他始終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莫斯科《世界經济》杂志的主編。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結束时，尤金·瓦尔加接受"苏联共产党的委派，对于世界大战对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及其战后經济前景的影响进行了一次客观研究……他在一本不朽的著作中报告了自己的結論，可是，作为指导制訂外交政策的党的文献，这本书只流行了一年。从他的結論来看，客观分析使他在苏联战后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这一問題上，不得不采取在每一个方面都和目前共产党路綫的基本內容完全相反的立場"(《紐約时报》，1948年1月25日)。

尤利烏斯·阿尔帕里是現代第一个共产党新聞通訊刊物、著名的《国际新聞通訊》的創刊人。馬加什·拉科西、約瑟夫·波加尼、貝拉·瓦果和其他許多匈牙利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共产国际在西欧的代理人；波加尼曾化名为約翰·佩珀，在二十年代初期充当过共产国际派往美国的代表。格奥尔格·卢卡奇成了一个著名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特别是文学批評家。

苏維埃共和国的失敗造成了一种被毒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派系斗爭发展到了如此激烈的地步，以致使俄国政府当局不得不在1920年进行干預，逮捕了持反对意見的人。参看符拉基斯拉夫·卢达斯：《冒險主义和取消主义：貝拉·庫恩的政策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危机》，維也納1922年版。

在这場生存竞爭中，馬加什·拉科西——1945年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的中心人物——爬上了領导地位。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开始为共产国际在西欧奔走；在德国的列維危机和意大利的塞拉蒂危机中，他都以执行莫斯科指示时那种粗暴和直截了当的方式，聞名于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1925年，同前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的另一个官員貝拉·桑托一道，拉科西非法潜回匈牙利，在那里被霍尔蒂政府逮捕，判处十五年徒刑。他服滿了刑期，在1940年又要被再次审判，这一次是为了他参加过1919年的政府。但是，苏德条約当时已宣告生效，匈牙利政府于是以拉科西換回了帮助鎮压1848年科苏特起义的沙皇軍队虏获到莫斯科去的一組匈牙利軍旗。他从塞格德的监狱中被带到布达佩斯警察总部，在那里立了一份永不再回匈牙利的保证书，然后走下台阶，进入正在等着他的苏联大使館的汽車，赶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車去了。

墨索里尼的崛起

1919年，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次革命波动，这是战爭結束后的失望和經济困难以及俄国革命影响的結果。

1919—1920年，社会党拥有三十万名党員，工会会員达二百万人。党在議会中拥有一百五十六个席位，在二千零二十二个村議会和市議会——包括了大部分都市中心——中居于多数地位。[①]在战时的一場敗仗以后，社会党、合作社和工会获得了大量新的信徒；大大小小的市政机关都完全为社会党人所掌握。地方无产阶級专政日益发展，逐漸蔓延到乡間，即使在那些曾經傾向于改良主义的乡村地区，社会党人的运动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轉变。

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它在农民、特别是波河平原的农业工人中間具有巨大的影响。本来是保守的意大利中部的佃农，这时也參加了反对地主的斗爭。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一貫就存在着工团主义直接行动的傳統。社会党人所掌握的地方公社，继續向地主征收地方税。雇主被迫繳出保证金，以保证执行工会强迫他們签訂的协議。最后，許多地主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田庄，逃到城市去避难。[②]

在波倫亚，尼古拉·邦巴奇的地方专政引起了人們的惊恐。在都灵，撒丁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发展了一种关于工厂委員会的新理論。他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斗爭中，工厂委員会将是同时进行經济和政治斗爭的工具，以后，它們則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

① 伊凡諾·波諾米：《从社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当代意大利研究》，倫敦1924年版，第36頁。

② 参看波尔迪加：《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載《劳动月刊》，倫敦，1923年2—3月，第4卷，第93—99、172—183頁。

葛兰西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党，成为都灵《前进报》的編輯。作为社会党內共产主义派的一个領袖，他創办了《新秩序报》。都灵的占領工厂运动就是由他以及和他类似的一些人領导的。他于1926年11月在罗馬被捕，在监獄中渡过了漫长的岁月，最后在三十年代中期因肺病死于獄中。他的名字和生活已經变成意大利共产党傳說的一部分。

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由于缺乏有力的領导而逐漸消散。欧洲大家庭中最人道主义和最理想主义的党之一，意大利社会党，具有一种和平主义的傳統。所有的意大利社会党人都敬佩俄国革命及其領袖列宁和托洛茨基，鄙視諾斯克和艾伯特，把他們看作叛徒。但是，他們却沒有能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复杂問題。

在1920年，意大利党长时間地討論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問題，幷且形成了許多派別，意大利党的多数不贊成激烈派的主張，反对仅仅由于自己的同志是"改良派机会主义者"就把他們开除，而构成內部斗爭焦点的，正是这一开除問題。当社会党人正在不断辯論和左右摇摆的时候，出現了一个凶狠的社会主义叛徒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人把他在革命运动中学到的一切，都用来組織反革命运动。自信力很高、出身于平民幷对意大利工人阶級有广泛了解的墨索里尼，协調了那些十分不滿于老一輩領袖消极无为的激烈分子的行动。

在莫斯科，列宁对墨索里尼的出現深为不安。他立即察觉到这个叛徒是反革命的一个新信息、一个先兆。他火速給米兰、波倫亚、都灵、罗馬等地送信，請求同志們和騎墙派断絕关系，重新組織起干部准备迎接战斗行动。

意大利党內的各个派別都派遣代表出席了1920年8月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便和共产国际領导机构就接受"二十一个

条件”的問題达成协議。① 中派領袖塞拉蒂指出下列事实为他自己反对分裂的立場申辯，即右派嘴上的詞藻是够革命的，而目前还沒有发明出一种机器能用来判断他們的动机。列宁竭力想达成妥协，但是沒有成功；党內喋喋不休的爭論继續了下去。

在代表們回到本国的时候，意大利爆发了一种以新的出人意料的形式出現的自发性群众运动。1920年9月，大約有六十万名罢工者占領了工厂，特别是在都灵和米兰。意大利国內外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这种占領工厂运动、这种走向工人所有制的姿态发展为全面內战。为这种行动規模所吓倒的政府，沒有采取反对措施，而让运动慢慢地自行消声匿迹。政府依靠这种明智的政策挽救了自己。由于缺乏协調和更为基本的目标，罢工爭得的結果不过是工資略有增长，以及一个后来从未实現的由工人管理生产的含糊諾言。1921年4月，党在它的利伏諾会議上終于因为“二十一个条件”的問題宣告分裂，共产党略占多数。塞拉蒂仍然坚决拒絕批准把右派开除；后来，在1924年，他的組織通过并入共产党也加入了共产国际。可是，在这几个月里，党已經丧失了它的持久力；意大利北部工团主义工人的失败，鼓舞了正在形成的墨索里尼黑帮。

这样，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相继遭受挫折以后，欧洲革命便走向了低潮。假如組織强大而訓练有素的意大利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曾經跨越了宣布原則和投入行动之間相隔的一小步，匈牙利就会成为中欧革命的起点。在一个短暫的历史时刻，改变欧洲的主动力一度从柏林移到了維也納–布达佩斯–米兰，但終于未能成功。

---

① 参看本书第170頁及以下。

第五章　卡普--吕特維茨暴动

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的失败，并沒有結束德国的內乱。志願团和工人团体之間的斗爭在各个工业中心、特别是在柏林达到了如此熾烈的地步，以致在1919年的大部分时間內，艾伯特政府都宁願停留在魏瑪这个安靜的中产阶級城市。1919年8月11日，在这里通过了一部新宪法。

轉入地下的德国共产党

1919年9月，也就是匈牙利失败以后不久，斯巴达克团在海德尔堡举行了一次地下党会議。正如艾伯特选中比柏林安全的魏瑪一样，斯巴达克团也选擇了一个南方城市。即使是这样，代表們还不得不每天改变开会地址和他們的掩护組織的名称。这种情况既妨碍了討論，也妨碍了民主程序。

具有特征的是，斯巴达克团会議并沒有对中欧革命的失败及其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进行分析。这些剛剛来自柏林、慕尼黑和不来梅战斗中的代表們，看不到匈牙利事件必然会鼓舞志願团运动这一事实。

革命的失败使党分裂成两个互相冲突的派别。在整个图景中看不到一点积极性的特征。最优秀的領袖死去了，数以百計的其他領导人不是遭到逮捕，就是逃出了他們在那里最为知名和最能有效地組織群众的故乡。报刊都陷入了半地下状态。特别严重的是，党內普遍呈現出分崩离析、失去方向的混乱情緒。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关于德意志共和国发展前途的原則性爭执，在他們的继

承者中間以一种謾罵和歪曲了的形式继續进行。爭执圍繞着三个重大問題。第一个是消灭伏尔夫海姆和劳芬堡所代表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問題，这个問題实质上已經在会前解决，但是它的余波却使討論充滿了怨毒之气。第二和第三个問題是“工会問題”和“議会問題”，两个从此以后在德国共产党每一次发生危机时的議程上都少不了的項目。

这时由維利·明岑堡領导的左派反对派，提議抵制魏瑪議会——这是一个示威性的姿态，用以向工人阶級表明，在內战进行时选举的議会是沒有民主合法性的。参加选举就等于表示共产党人承认志願团造成的現状。就像德国共产党人常有的情形一样，这項政治問題被冗长的教条主义爭論弄糊塗了。

同样的論点在討論工会政策时也被提了出来。遵守工会紀律、維持麻煩的工会例行公事以及把工会政策限制于工資斗爭，这就无異于表示共产党承认了工人在魏瑪共和国中的新地位。列金和一般工会官僚曾經是战爭的坚决支持者，他們是和艾伯特一鼻孔出气的，而艾伯特又是和軍队站在一边。因此，不可能在工会內部发展革命干部。工人个人受慣了那种首先把他和工会联在一起的亲密联系的制約。共产党的信徒和同情者必須摆脫“工会迷”的窒息性影响，这种影响已經使德国工人运动陷入了目前的絕境。

对于工会官僚痛感失望的情緒是如此强烈，以致連斯巴达克团最溫和的領袖之一保尔·列維，一个熟悉德国議会政治的一切花招的人，也鼓吹抵制工会。8月，卡尔·拉狄克从獄中进行了干預，主張旣參加选举也参加工会。于是，列維便一反自己的立場，拉攏了一个贊成拉狄克政綱的多数。代表們甚至来不及讀一讀新綱領。在保密的借口下，沒有把举行最后一次会議的地点告訴反对派。这样，便以破坏党的基本民主原則而开始了“改良共产主

义”。实力强大的反对派被硬性地排出了大会。它从党内分裂了出去，另行組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簡称 KAPD），同荷兰共产党人赫尔曼·果特站在一边（果特曾經向列宁写过一封“公开信”，反对他关于党及其与工人阶級的关系的看法①）。在共产党員原有一万二千名的柏林，多数人脫离了党，他們大都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当威廉·皮克从海德尔堡回来，向剩下的忠实党員讲話时（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議），他数了数与会者只有三十六人。在汉堡和埃森，数字也差不多。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从批評傳統的政治行动出发，研究了組織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問題。它强調成立阶級組織的必要性，这种組織必須凌駕于党和工会系統之上，以遏止走向一党壟断和国家党独裁的任何趋势。他們提出“工厂代表委員会”和力图壟断政权的共产党相对抗。这种傾向沿襲了德国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傳統，那些人通过自身二十年的努力与牺牲，建立了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器，而后来却又对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机器进行攻击。

1919 年秋，柏林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对艾伯特內閣的反抗一遇有机会便爆发出来。柏林工人心头根深蒂固的仇恨，甚至圍繞着細小的事件化成了具体行动。

在他們当中一个名叫威廉·济尔特的人的領导下，电气工人举行罢工，切断了城市的供电。工厂和公共交通都陷于瘫痪。济尔特揚言不惜采用破坏手段——甚至要炸毁中央发电站。在德国工会运动的三十年活动中，工人們一直被他們的工会領袖訓练得很溫和，从来也不想使經济瓦解到这样的程度。柏林和普魯士当局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組織了由工科大学生构成的“紧急技术队”。

① 参看貝恩哈德·賴兴巴赫：《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历史》，載《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料》，来比錫 1928 年版，第 8 卷，第 117—140 頁。

在以后一段时期，这种紧急技术支援队虽然效力不大，却成了最被人痛恨的反劳工組織之一。

威廉·济尔特是一个沉默寡言和謹愼細心的人，一个聪明的和高度熟练的工人，他很快便树立起威信。在工厂代表运动冷落下去以后的几个月內，柏林工厂又从同样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典型。济尔特旣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演說家；他幷不热心于制訂公式，制訂九点、十点或十五点政綱，而是注意寻找对付軍队的有效措施。

电气工人再次提出了工厂代表和工厂委員会在新德意志共和国中的地位問題。魏瑪宪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只給了它們有限的"参加管理"权，以便刺激生产和維持劳資和平。1920年1月13日，議会大厦面前发生了一次抗議这一限制的游行風潮，結果引起了好几个参加者的死伤。在此以后，政府随即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示威的"轄区法"。工人組織曾經希望在新国家中能够和企业主平等分享政治和經济权力，但是，补充宪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工厂委員会法"結束了任何这样的希望。工会及其代表工厂委員会，要想起到保卫已經取得的权利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作用，事先必須存在着一种不断恢复和趋于稳定的自由企业經济。这項新法律旨在結束爭取工人管理工厂的風潮，使工厂委員会适应一种資本主义經济。

軍官暴动

这时，由于工厂委員会遭受了挫折，軍界希望进一步利用他們新占得的上風，来反对整个有組織的劳工，作为完全恢复战前德国状态的准备。一般称为"卡普-吕特維茨暴动"的軍队反对艾伯特的叛乱，是在政府的面前准备起来的。凡尔賽和約規定的一些条

件，給暴动提供了現成的刺激剂；条約限定德国軍队要从四十万人減到二十万人，最后，到1920年7月10日，要削減到十万人。在二万四千名旧軍官中，只有四千人可以参加新共和国的軍队“国防軍”，其余的人都必須到可恨的共和国的极不安定的平民生活中去找寻职业。①对軍官团这样大刀闊斧的削減，危及了总参謀部的計划，因此，他們一方面反对这种削減，同时又发动了一場反对将德皇和其他約八百人作为战犯懲处的运动，把这两种斗爭結合了起来。

从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天起，志願团軍官就企图一有机会便立即建立軍事独裁政权。1919年底，他們在自己的部队中散发了一本題为《論独裁》的小册子。1920年3月，总参謀部的一部分人和志願团指揮官們勾結起来，决定发动决定性的打击。3月10日，瓦尔特·馮·呂特維茨将軍出現于艾伯特的接待室，提出一份书面最后通牒，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立即把政权移交給中立的专家，也就是帝国的高級文官。通牒要求解散議会，在軍队建立的內閣的监視下选举一个新的国民議会。艾伯特必須辞职；通过公民投票选出新的德国总統。把軍事物資交給协約国的做法必須停止。另一点最重要的要求是，必須清洗国防軍：认为和社会民主党合作对軍队最有好处的一小撮将軍必須撤职。

叛乱分子建議諾斯克充当独裁者。有一天早上，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現了一本《論独裁》。其中有一章的題目是“人选問題”。“現在一个独裁者的任务就是要挽救还来得及挽救的一切，这样的独裁者必須是一个在最广泛的阶层中深孚众望的人物……不論是誰，只要数一数我国的杰出之士，就必然会想到一个名字——諾斯

---

① “〔凡尔賽条約的〕这項条款是給还沒有巩固的共和国带来危險的另一个根源。这一条款的实現意味着，有好几十万青年将流落街头，不能够在平民生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奧托·布劳恩：《从魏瑪到希特勒》，第85頁。

克。"[①] 在暴动发生前不久，帕布斯特上尉[②]（他被諾斯克称为騎兵近卫师的眞正組織者与領袖）代表叛乱者，再次口头提出了这一建議。在这种企图把复辟力量和一位无产阶級群众領袖联合起来的活动中，我們看到了德国反革命新趋势的一个最初的和最明显的例子——这一新趋势就是，要把工人和帝国继承者这两支力量合并入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諾斯克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因为他深知，如果和社会民主党組織断絕关系，单以他个人的身份参加将軍們的活动，他就起不了什么影响。諾斯克当时和以后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忠实党員；尽管它犯了种种悲剧性的錯誤，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幷沒有产生出一个墨索里尼。

起初，艾伯特幷不以为軍官們的威胁是很认眞的，仍然放心地留在柏林。3月13日早晨，馮·呂特維茨将軍指揮下的一个所謂"海軍旅"开进了柏林。这支軍队本来駐扎在市郊的道布里茲，率領它的是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一个在波罗的海边境战争中出了名的"雇用兵"領袖。[③] 士兵們在开进柏林时，唱着这样的歌曲：

"三色带，黑白紅，

卐字徽，鋼盔帽。

埃尔哈特旅，

我們的番号。"

埃尔哈特包圍了各座政府建筑物，宣布艾伯特內閣已被推翻。

---

① 古斯塔夫·諾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96頁。

② 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322頁。

③ 另一个由勒文費尔德指揮的"海軍旅"駐在西里西亚。虽然它們全是由軍官和軍士組成的，这些部队却自称为"海軍旅"，借用海軍在德国老百姓心目中的魅力为自己壮声威。按照凡尔賽条約的規定，协約国监察当局已經指出了把它們解散的要求；只准許有一万五千人的帝国海軍打算把这两个旅合并过来。参看魯道夫·曼：《跟随埃尔哈特轉战德国：第二海軍旅一个战士的回忆》，柏林1921年版。

"雇用兵"是十五世紀一种往往从事搶劫的粗野軍队。

屬于德国民族党的一个高級文官伏尔夫岡·卡普和馮·呂特維茨將軍,被宣布为新政府的首脑。

艾伯特要求馮·澤克特將軍和馮·施萊歇尔少校到总理府来,共同制訂一个驅除叛乱分子的計划。澤克特和施萊歇尔冷漠地拒絕了。他們决不会同意用国防軍打国防軍;这种自相殘杀将会毁掉德国。他們建議和叛乱分子妥协。最后,艾伯特終于认識到,如果他这时不离开柏林,就不会平安地渡过危机。于是,政府逃到了德累斯頓,但是,駐守該地的国防軍却考虑要把艾伯特內閣作为反对新政府的叛乱分子逮捕起来。因此,他們不得不再次逃亡,这次逃到了斯图加特;在南方,存在着比較好的抵抗柏林专政的机会。

卡尔·列金

艾伯特和將軍們的联盟反过来害了自己,在共和国面临极大危險的这一时刻,德国工人联合会决定进行干預,实行了一种同它过去的一切傳統和行为都根本相反的政策。他們号召举行反对叛乱分子的全国性总罢工。他們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員会,指导一切工人組織(包括共产党的)全都参加的大罢工。

这也許是現代工业国中一次最彻底的政治性总罢工。德国經济完全陷于停頓。从早到晚,日以继夜,沒有一列火車通行,沒有煤气和电力供应,只供应有限的自来水。叛乱分子拥有精良的大炮、机枪、飞机、訓练有素的和可靠的部队、考虑周密的征服德国的战略計划。但是,面临着有組織的工人的强大力量,他們变得瘫痪了;沒有任何軍队能够在眞空中起作用。

在暴动的第二天,格勒納將軍試图在艾伯特政府和卡普集团之間进行調解,但是沒有收效。卡普和呂特維茨在三天以后宣告

投降。当总参謀部认識到他們已經落入多深的失敗境地中时，他們便赶紧同艾伯特讲和。艾伯特重返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号召結束罢工；澤克特及其同事仍然留在統帅部的职位上——艾伯特不敢冒險同軍队力量决裂。

这次总罢工的中心人物是五十九岁的卡尔·列金，德国工人联合会的組織天才。3月13日那天，他还留在柏林；按照他的激烈批評，艾伯特內閣本来也应該留下来領导抵抗的。这位老合法主义者居然轉入了地下，并且不顾很可能丧失生命的危險，从他的地下总部里指揮总罢工。

卡尔·列金的个人历史最能表明德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在青年时代，同他的終生知交和傳記作者台奥多·列帕特一道，他在汉堡当車床工人。在創立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时候，他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其一是地方主义的傳統，这部分是由德国工业最初的行业結构造成的，其二是党領导人的野心，这些人在九十年代滿怀嫉妒地压制工会組織的竞爭；卡尔·列金只是在花了极大的气力以后，才克服了这些困难，通过"总委員会"的創立，列金把五零四散的地方行业工会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全国性团体。

在三十年的期間，作为一个漸进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先同倍倍尔和奥尔、后来又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进行了斗爭。他把經济罢工的技术发展成了一种极精确的討价还价的工具，一柄只能在最危急的情况下由熟练的医师万分謹愼地使用的手术刀。① 列金的政治信仰可以总結在一句口号、即他經常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这句口号里："总罢工完全是胡鬧。"

列金坚决支持战爭和帝国的各种雄心壮志。"他在1914年11

---

① 参看卡尔·列金：《德国工人結社权的理論与实踐》，汉堡1899年版。

月写給茹奥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战爭爆发以后，法国工人同德国工人一样站在自己祖国的一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① 魯登道夫和兴登堡由于列金的爱国主义而非常尊重他，曾多次邀請他到他們的总部去；他曾和他們合影留念。由于这些行动，他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刻骨仇恨。

列金曾主張把李卜克內西开除出党；对于数百万有紀律成員的組織者来說，李卜克內西破坏社会民主党党紀的行为是不可饒恕的。1917年，列金在五金工人工会会議上为他的主战政策申辯时，曾要求立即割去膿疮，以免养痈貽患，危及整个机体。他强調指出，如果党曾經听从他的劝告，把李卜克內西开除，后来的分裂就可以避免，"必須不惜任何代价維持党紀。"

可是到現在，这位年老的工会領袖突然认識到，同軍队的联盟正在导致劳工組織的复灭。正是这位民族主义的、謹愼的老工会运动領袖，在这一时刻提出了最大胆的政治建議。当艾伯特內閣回到柏林时，列金輕蔑地指着艾伯特和諾斯克說，如果沒有工会的干預，他們早就死了。他也向他們提出了他的最后通牒。

"在政府还都以后，列金代表中央罢工委員会，要求把諾斯克、海涅、奥塞这几个部长撤职，他并且要求让工会联合会在政府的改組中起决定性作用，掌握經济和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机要职位。② 所有曾經和暴动分子合作的人，都必須受到严懲；必須从中央和各邦的一切警察队伍中彻底清除反共和国分子和其他可疑分子。在上述各項要求实現以前，即使卡普叛乱分子已經投降，总罢工仍将继續。3月19日，列金的工会代表团与德国政府举行談判。这是一場激动人心的談判，整整进行了一夜，直到3月20日黎明才达

① 特奥多·来帕特：《回忆卡尔·列金》，柏林1929年版，第100頁。

② 即使在魏瑪共和国的第一阶段，社会民主党在內閣中一般也处于少数地位。

成那項著名的协議。”①

社会民主党領导人大罵列金的最后通牒是“訛詐”，最后，政治家們总算占了上風。当天晚上，工会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靠攏，問他們是否願意参加劳工联合內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进行了商談，考虑是否支持新內閣的問題。列金沒有能克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反对，他們担心这样一个劳工內閣会刺激起革命运动的新高漲。另一方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也反对列金的領导；民族主义同和平主义两派社会主义者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是不可能这样容易地就得到解决的。也是在同一天晚上，威廉·皮克和雅各布·瓦耳歇尔保证德国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劳工政府采取善意反对派的态度。

在卡普暴动时期，为海德尔堡的分裂所削弱的共产党，陷入了更进一步的被动状态。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領导的政治局，竟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罢工作了这样的分析，即认为它是两个反革命派别——卡普和艾伯特——之間的斗爭。共产党人接到政治局的指示，叫他們不要支持艾伯特政府反对卡普。当专

只是在1919年的三个半月中，也就是签訂凡尔賽条約、通过宪法和組織国防軍这一时期，它曾居于多数。在1919年初和1920年，它占有一半席位。

总理	組閣时間	部长总数	社会民主党部长数
1. 謝德曼	1919年2月13日	14	7
2. 鮑威尔(一)	1919年6月21日	13	7
3. 鮑威尔(二)	1919年10月2日	14	7
4. 繆勒(一)	1920年3月27日	14	7
5. 費倫巴赫	1920年6月21日	13	0
6. 維尔特(一)	1921年5月10日	13	4
7. 維尔特(二)	1921年10月26日	13	5

① 来帕特：《卡尔·列金》，第117頁。

門派出的信使把这一中央委員会宣言送給各个地方組織的时候，不少地方組織干脆把它燒了。保尔·列維当时正在獄中；他在几天后获釋，迅速調整了塔尔海默的路綫。但是，全国各地共产党組織的政策仍然反映了最初的这种軟弱和混乱。只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被开除了若干个月以后，塔尔海默的这一路綫才在党內产生了另一个反对派(他們由柏林和汉堡領导，自称为左派)。

卡普暴动作为复辟力量和德国工人队伍双方长期斗爭中的插曲，反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經走进死胡同。为时已晚的列金的提議是唯一合理和有效的政策；如果成立了一个战斗性的工会政府，就会在納粹得以发展其已經占据的据点之前把它扑灭。但是，列金的个人历史阻碍了他企图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性轉变的努力。

德国的紅色游击队

一切工人組織的統一行动使地下的革命潛流显露到表面。对于所有从1918年以来就相信工人与反动力量之間最后势必摊牌的激进集团来說，受人憎恨的国防軍的暴动是一針兴奋剂。但是，工人們这一次幷沒有討論关于如何解散軍队的各种政綱，而是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暴动分子。

在来因和魯尔区，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一地区，駐軍司令是弗賴赫尔·馮·瓦特中将；他所指揮的国防軍和志願团突击队紧密配合。1919年发生过一次典型的突然襲击，这一事件很有象征意义。在埃森附近的維登，志願团包圍了一群正在开会的工人代表，从外面向会議厅中开枪。代表們全都跑出了屋子，可是仍然沒有能逃脫枪彈的追击。志願团捉住了几十个人，把他們押着游街，对他們拳打脚踢，向他們啐唾沫，駡他們是“看猪狗”，幷且在行进中把他們枪决了。工人們有理由认为，如果卡普分子暴动成功，随着

他們的政权而来的，就会是千百桩上面这样的事件。正如澤弗林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說，“工人同士兵一碰上就要流血。”①

当列金号召总罢工时，这一地区的回答是成立了自称为“紅色魯尔軍”的工人战斗队。他們时刻等待着瓦特的进攻，因为他公开地同情卡普暴动分子，并且已經把部队調集到他的閔斯特尔总部周圍。澤弗林报道說，他在暴动那天曾試图使瓦特明确宣布他忠于艾伯特-鮑威尔政府，但是未能成功。志願团大批涌进魯尔区。3月14日，哈曾克勒弗上尉率領的志願团突击队，在一个叫做威特的小鎮上为工人游击队包圍，并且被他們解除了武装。战斗发展到全区，在多特蒙德进行得尤为激烈；斗爭迅速从魯尔蔓延到伍佩尔塔耳、萊姆夏特、艾尔伯費尔特-巴門。工人們在波鴻拿起武器，进攻埃森。

組成这些游击队的不是埋伏在森林中的农民，而是圍繞着自己的工厂組織起来的工人，他們按照工业区的无数工人村、小鎮和城市平行地建立起营和师。成立这些战斗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天主教工人都爭先恐后地投入运动，准备把瓦特和志願团赶出魯尔区，进軍柏林，逮捕卡普和呂特維茨，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一劳永逸地粉碎軍事叛变。几天以后，这支組織松散的游击軍开始拟訂加强紧密合作的措施，許多重要地点的地方領袖紛紛揭竿而起。事实上，全体居民都同情他們，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他們；最后，这支临时組成的軍队达到了——据敌方估計——五万人左右。

紅軍在魯尔区发展得最为成熟，但是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在

---

① 卡尔·澤弗林：《天翻地复的1919—1920年：記載与回忆》，比勒菲尔特1927年版。据澤弗林报道；普魯士議会的調查委員会后来指出，指揮官提耳中尉在行动中越出了自己的职权。

南德、在北部和波罗的海区的工业中心，都出現了类似的傾向。在卡普暴动期間，我正从杜拉赫开完一次党的会議回柏林，由于来比錫的铁路工人罢工被困在中途。来比錫的工人組織实行的政策和鲁尔的工人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机构更多地妨碍了組織者。城里面到处流傳着关于开姆尼茨工人組織的消息，說他們就要向来比錫进軍，然后联合起来包圍柏林。

开姆尼茨的共产党組織最为强大，但是和其他組織一样，它在暴动时期同柏林的中央委員会失去了联系。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領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在市內展开了迅速和有效的活动；工人委員会建立起来了，一切可能支持卡普的人都被解除武装和逮捕。工人委員会占領了市政厅，并且作了保卫城市的准备。但是，除去这些保安措施以外，并沒有采取其他行动；在市区以外采取行动的問题甚至沒有被考虑过。在开姆尼茨附近的一个小鎮密特維达，工科学生同情卡普暴动分子；但是，当他們在自己的学校里筑起防御工事的时候，并沒有受到攻击——这是为了避免流血。

在靠近开姆尼茨的法尔肯斯坦，馬克斯·赫尔茨組織了他的游击部队。① 他們怀着进攻的精神，不仅要在可能来犯的敌人面前保卫自己的家乡，而且試图主动出击，把影响扩大到全区。布兰德勒玩弄巧妙的手段，避免赫尔茨的部队侵入他那个和平地組織起来的开姆尼茨区。暴动結束几天以后，赫尔茨就被开姆尼茨共产党人以破坏党紀为理由开除出党。"本組織郑重宣布反对赫尔茨的活动，他企图以他个人代替群众行动。由于进行此类活动，赫尔茨及其同伙已經把自己置于党組織之外；只有在全体党員遵循党綱

① 馬克斯·赫尔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趣的領袖之一，在行动中完全抛开了通常的劳工傳統和紀律，他是一个农业工人的儿子，1889 年生于薩克森貧困的伏格兰，1914 年以前从未参加过任何劳工組織。他在战爭爆发前不久从英国回国，作为步

的情况下，党才能够生存。"①

事实是开姆尼茨共产党人躊躇不决，从而使薩克森的游击队沒有能够联合起来。在艾伯特返回柏林的同时，孤立的来比錫抵抗运动也被鎮压下去。3月18日，薩克森結束总罢工，曾夫特·馮·皮尔扎赫将軍同两个社会民主党部长施瓦尔茨和列平斯基簽訂了一項协定，使国防軍能够自由地解除那些还在抵抗的工人狙击兵的武裝。

暴动的影响

所有的同时代观察家都认为，卡普暴动不过是处于正规軍边緣的一小撮軍官干部的反抗，并沒有重大的政治或軍事意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次軍官暴动在魏瑪共和国的生活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大大促进了反革命力量以后的胜利。这是整个軍队反抗共和国的暴动，是一个分作两步走的战役。第一步是先由柏林的叛乱分子瘫痪艾伯特內閣。澤克特等待这一政变的結果，如果政变成功，整个国防軍参謀部就会按照第二步計划站

兵积极参加了西綫的战斗。1918年，他在故乡法尔肯斯坦把失业者組織起来，几个月后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通过他的活跃和主动精神，他很快便聞名于全区。在卡普暴动时期，他以才能出众地組織起工人旅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于1921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在獄中度过七年。1928年获釋后，他在一个时期內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宣傳家，以后去莫斯科。

在苏联，他很快便和当局发生严重冲突。1933年5月，他被一項党的命令派到下諾夫哥罗德，在那里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在他下葬时为他举行了党的追悼会；安德列·馬蒂和弗里茨·赫克尔特为他扶柩。杀害一个如此知名和被热爱的共产党領袖这一事件(这是共产国际圈子中最大的秘密之一)，对促成希特勒德国共产党干部的瓦解起了很大作用。(参看馬克斯·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紅旗：我的青年时代、斗爭和獄中經历》，柏林1929年版；卡尔·阿尔布雷希特：《被出卖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充当高級国家官吏的十年》，柏林1939年版。)

①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卡普暴动中西薩克森的行动》，柏林1920年版，第59頁。

到独裁者的一边。

另一方面，把鲁尔区的紅軍称做軍队只是一种譬喻。那里沒有軍事专家組成的参謀部，沒有正規的装备，甚至不能把所有分散的工人战斗队在政治上有效地协調起来。不过，尽管存在这些根本上的弱点，鲁尔区的“全民皆兵”仍然引起了在帝国軍队中久經訓练的职业士兵的恐慌。多特蒙德、波鴻、格尔曾基尔亨的鼓風炉和矿井，埃森的冶金工厂，艾尔伯菲尔德-巴門和克莱菲尔德的紡織厂，成了这支軍队的天然組織单位；但是，它的眞正力量却是热情、主动性和組織經驗。它以防御可恨的志願团的入侵开始，迅速变成了一支反对国防軍的有力的十字軍。总参謀部很快便认識到自己的失算。在此以前，当“大堆軍官手下已沒有一个士兵，大群士兵已經把紀律性完全忘却干淨”① 的时候，他們还滿以为可怕的时刻业已过去。

正是在鲁尔区展开的这种抵抗，使国防軍和艾伯特內閣重新携起手来。促成这一妥协的斡旋者是汉斯·馮·澤克特上将，1919年以后德国新軍队的創立者和保护人。澤克特在担任参加凡尔賽会議的軍事代表时，曾在一項抗議签訂和約的声明上签名。他曾这样別出心裁地来改組軍队：把国防軍分成“大”旅和“小”旅，大旅用于守卫边界，小旅用来鎮压国內的敌人。在澤克特的建議下，馮·呂特維茨将軍被任命为德国国內的卫戍长官。澤克特和志願团以及国防軍各“黑师”——沒有被凡尔賽条約批准存在的部队——都有密切联系。

艾伯特回柏林以后，澤克特在一切涉及到国防軍叛乱部队的事务上都占了上風。他万分謹愼地进行周旋，以求面面俱到，甚至

① 退役中将馮·迈茨施：《堪称士兵表率与完人的澤克特》，載《馮·澤克特上将紀念文集》，第63頁。

同埃尔哈特上尉都做到了不发生冲突；他在1920年3月22日写信給埃尔哈特說，他承认埃尔哈特的海軍旅紀律严明……"并且感謝您接受我的統轄。我深信，在我們面临的反对斯巴达克武裝恐怖的艰苦战斗中，我完全可以信賴第二海軍旅及其指揮官。我个人向您保证，只要海軍旅一天在我的統轄之下，据說是对您发出的逮捕状就一天不会生效。"①

澤克特提及的斯巴达克恐怖和魯尔区有关。国防軍在那里找到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把它的局部失敗化为胜利，继續进行內战，从而巩固它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一地位已經由于列金在总罢工中的政策而遭受威胁。国防軍在魯尔区的行动是一箭双鵰的反击，它堵塞了走向劳工政府的道路，不仅打击了所有的工人团体，也同样打击了社会民主党人。

几个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高級人士，企图使軍队和工人之間避免发生冲突。3月23—24日，在魯尔区的門戶比勒菲尔特举行了一次会議，发起这次会議的是工会、三个工人政党和工人自卫队。威斯特法利亚邦国家专員卡尔·澤弗林和普魯士政府总理奥托·布劳恩，作为艾伯特內閣的代表参加了会議，共产党的代表是威廉·皮克。②各个地方工人組織当时正打算把全魯尔区的工人自卫队合成一个单一的地区自卫軍团，以击退可能重演的卡普暴动，并且通过这个軍团的存在本身，同志願团、国防軍黑师以及其他无数反革命秘密突击队相抗衡。比勒菲尔特联合宣言遏止了这一主动措施。

---

① 貝托尔德·雅各布：《誰？来自議会纵火犯指使者的武庫》，斯特拉斯堡1933年版。

② 見保尔·梅尔克尔：《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1944年版。該书第1卷第64頁詳細分析了卡普事件，但是对皮克在比勒菲尔特协議上签字一事——这一举动引起了他自己那一派人的激烈反对——却只字未提。

工会代表說服了工人代表，使他們只限于組織地方性的工人自卫团，也就是一种輔助性的警察。艾伯特政府的代表庄严保证，如果达成妥协，国防軍一定不入侵魯尔。会議通过了称为“比勒菲尔特十点声明”的联合宣言。但是，艾伯特政府的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繆勒过于軟弱，經不住澤克特不断施加的压力。在柏林流傳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魯尔恐怖分子的故事以后，澤克特終于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政府派遣国防軍进入魯尔区的一道命令。3月28日，赫尔曼·繆勒撕毁了比勒菲尔特协議，向魯尔区的工人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一切工人自卫队立即全部解散，并交出所有武器。卡普分子瓦特将軍①和志願团突击队在埃森恢复了柏林政府的权力。卡尔·澤弗林作为民政顾問伴随在他身边。志願团这时的威風达到了頂点。

国防軍对采取这一行动是再热心不过了，因为这給了軍队一个机会，使它得以重新控制凡尔賽条約規定禁止駐軍的地区。巴黎的协約国委員会答应让軍队开进五十公里的中立地带，于是入侵便在4月3日开始。然后，作为对这一破坏凡尔賽条約举动的报复，法国軍队于4月6日占領达姆斯塔特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們的司令官德古特公开批評了瓦特手下軍官的殘暴行徑。

瓦特的部队充分地施行了报复。

“当軍队开进弗倫登貝格的时候，有人喊起皇帝万岁的口号，軍官和一部分士兵参加了这种欢呼……軍官和士兵都觉得自己好像又生活在德意志帝国之中。在布埃尔和博特罗普，被逮捕的工人如果拒絕唱‘万岁，你戴着胜利花环的人’〔帝国国歌〕，就要遭到

① “在明斯特，我們同国家专員澤弗林以及軍队指揮官瓦特将軍进行了談判。后者沒有給我留下好的印象。他說話模棱两可，很难让他說出明确、肯定的策略。”（布劳恩：《从魏瑪到希特勒》，第96頁。）

殴打……軍队对待工人阶級代表的这种态度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因为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不遺余力地帮助国防軍，使他們得以完成自己的困难任务。”①

国防軍建立起根本不重視法律程序的軍事法庭，把好几十名地方領袖判处了死刑或长期徒刑。一部分紅色鲁尔軍继續在战斗。在米耳海姆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員会，它的总部設在格尔曾基尔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員果特弗里德·卡鲁斯宰特，自封为西部紅軍总司令；在普鲁士議会中，皮克把他斥为瘋狂的小資产阶級。在整个区域——在威塞尔、格尔曾基尔亨和多特蒙德——都有小規模的战斗接触。到处都流傳着荒唐无稽的謠言：据說列宁在多特蒙德的市場上发表了演說。

最高法院对卡普暴动分子非常寬大。在所有的叛乱者中，只有前帝国柏林警察总监馮·雅果夫被判有罪；他被判处了五年“名誉”监禁。

对鲁尔区的进攻重新巩固了国防軍业已动搖的政权。总罢工使艾伯特內閣得以继續存在，但工会却沒有因此得到任何报答；軍队对艾伯特內閣实行了叛乱，結果却被派去蕩平鲁尔区。卡普暴动这本賬算到最后，对于軍队是有利的。

諾斯克曾經同呂特維茨如此亲密无間地进行合作，以致不得不——主要是在列金的压力下——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結束；这是艾伯特同总参謀部联盟的崩潰，它結束了社会民主党控制国防軍的企图。諾斯克的继任者是符騰堡社会民主党人奥托·盖斯勒，他在議会中加紧重新武装的努力，和澤克特的深謀远虑完全一致。

在国防軍內部，工人在总罢工中輕而易举的胜利引起了深刻

① 澤弗林：《天翻地复的1919—1920年》，第207頁及以下。

和持久的不安。軍界人士认識到，建立一个单純的軍事独裁政权是一种无法实現的目标。帝国将軍們对他們当中的激进派、即志願团的尉級軍官开始冷淡；澤克特尤其反对激进派打算把他推向軍事独裁者地位的趋势。另一方面，澤克特也从国防軍中肃清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当艾伯特問他国防軍眞正拥护什么人的时候，他回答說："艾伯特先生，国防軍拥护敝人。"澤克特的改組国防軍是在魏瑪合法地位的掩护下进行的，并且遭到了"黑师"的反对。在他于卡普暴动之后担任参謀总长不久，有好几个軍官曾經示威性地退出了他所主持的一次会議。

卡普暴动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有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斯巴达克派一直是一个孤立的少数。在建立百万人大党和百万人大工会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德国工人，对斯巴达克派抱着一种有經驗的組織家的輕蔑态度；他們是知識分子，是外人。在1920年3月以前，一直沒有多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員加入斯巴达克团。在德国工人当中，莫斯科布尔什維克的威望要比它們的德国追随者高千百倍。但是，卡普暴动激起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內的新潮流。在和呂特維茨、澤克特、瓦特、埃尔哈特打了两年交道以后，工人們认識到：单凭一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公式，是不能把这班人解除武装的；他們已經丧失了这样的希望，即社会民主党政府会采取行动，反对公开和秘密的复辟力量的重新武装。在1920年春天流行的情緒是："面对着組織严密的志願团及其在軍队中的同盟者，我們需要一个能够对付它們的組織"；而就在这个时刻，共产国际开始插足于德国。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尽管德国在布尔什維克的世界革命图景中居于首要地位，在

俄德两国内战期間，俄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这两个組織之間实际存在的关系却是不固定的和时断时續的。在越飞和布哈林被逐出德国、在拉狄克只参加了几周德共的活动就被逮捕以后，一直沒有一个布尔什維克要人直接参与过德意志共和国的早期发展。①

尽管它的后果是好是坏一时尙难断定，卡普暴动被工会平息下去这件事却重新使俄国人燃起希望，认为德国有可能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俄国的內战曾經在欧洲工人当中引起了普遍的同情，現在，战爭已經达到以沙皇將軍們的肯定失敗而告終的胜利結局，因此，这种同情便深入地趋向于更紧密的团結，并且在工人阶級更多的阶层中扩展开来；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中都兴起了亲苏的左派。而且，1920 年还是全欧洲的工会会員人数大为增长的一年。1920 年春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爆发了俄波战爭，这場战爭一方面是俄国內战的继續，另一方面反映了苏俄邻邦的决心——不让俄国革命像新的乐观主义情緒預言的那样向西扩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莫斯科梦想扫除掉这一反动的障碍以打通道路，走向剛剛重新显示了革命力量的德国。

三个压迫国家即沙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潰，使波兰获得了它將近一百二十五年来一直在追求的独立。在出現于 1918 年以后的新欧洲中，波兰主要关心的是保证它的永久独立。所以，它倒向

① 1919年，共产国际在柏林建立了一个西欧局，其組織者是托馬斯和他的助手布隆斯基，任务只限于宣傳。它出版了极好的文献資料，但是并沒有干涉德国党的內部生活。早在 1920 年，《苏維埃通訊》和《俄罗斯通訊》就用德文印行了所有的俄国重要文献。可是，信使往来是极不方便的。重要問題都通过书信（間或也通过电报）来解決；在柏林集团和莫斯科中央之間，沒有直接的电話联系。在这段早期的岁月里，这些技术困难使俄方对德国事变的政治意見只能在紧要关头过去以后才为人們普遍得知，而到这时，它便主要只具有理論上的意义了。

了协約国一边，依靠它們提供的保护来防范“东方巨人”，同时，毕苏斯基拟訂了这样一个計划，即：把布尔什維克政权最軟弱的側翼烏克兰拉出来，使它加入波兰領导的同盟，从而堵塞共产主义向西方扩展的道路。在战敗的德国和削弱了的俄国之間，在法国給予援助和烏克兰被它控制的情况下，波兰就将成为东欧的中心。于是，不安的俄波边界上的紧張局势突然爆发成为战爭；毕苏斯基向烏克兰发动了进攻，在1920年5月占領基輔。

毕苏斯基的跃向基輔激动了俄国；它复活了內战中产生的反对分裂的民族主义情緒。俄国軍队以远远超过总司令托洛茨基預料的速度夺回了基輔，波兰人被迫求和。这时，托洛茨基打算接受和議，这意味着紅軍将不会越过边界进入波兰領土；他所以如此主張，部分是由于他的部队力量軟弱，但另一部分則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軍事的考慮。他不願意让一支侵略軍的刺刀尖为布尔什維主义开道；他不想打乱在各邻国間勉强維持住的均衡，使它們走上反苏方向。但是，党內各个派別都群起反对托洛茨基，站在它們前面的是列宁。列宁使中央委員会跟着他跑，連李可夫这样的保守派都加入列宁一方，要求紅軍向华沙和华沙以西不断推进。华沙是欧洲的門戶；紅軍进入华沙就将标志着俄国孤立的結束。在支持列宁的情况下，布哈林和拉狄克复活了他們的“革命进攻論”。

开始于1920年6月的俄国反攻，震动了从德維納到俄国边境的战綫。一个波兰临时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它的本部設在比亚威斯托克，由尤利烏斯·馬赫列夫斯基、費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費利克斯·孔和約瑟夫·翁施利希特組成。法国派魏剛将軍率領軍队支援毕苏斯基，同时給予波兰更多的軍火和金錢援助。然而，紅軍所以在华沙城前失利，法国的这些支援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波兰工人、甚至波兰共产党人的态度。这些人事先曾接

到指示，要他們举行暴动，和进犯的紅軍里应外合，但是，他們对这种指示內心并不欢迎，在执行时非常躊躇。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一直消极观望，如果他們采取行动的話，也往往是站在毕苏斯基一边；他們满意于自己在新波兰国家中的地位，而不欢迎建立无产阶級专政，因为那样一来，实际上就等于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屈服于莫斯科，再次套上刚刚被打破的鎖鏈。

“战爭在〔波兰〕人民的广泛阶层中受到欢迎〔两个著名的波兰共产党人写道〕。这首先是因为通过这場战爭，波兰可以实現它在自己的历史疆界內复兴的梦想；其次是因为波兰的‘恩人’协約国需要这場战爭，并且給予武器、彈药、面粉、猪油和各种原料物資的支援；第三是因为战爭为文武官員、警察、商人以及他們的許多追随者提供了发財致富的机会。”①

在俄波战爭期間，全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对共产国际都重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間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共产党緩慢而痛苦的发展，同魏瑪共和国的严重危机提供的机会形成了鮮明的对照。由于缺乏有經驗的領袖，加上各个宗派主义小集团和派别把全部兴趣都放到了激烈的內部爭論上，使得原来就力量不足的干部更进一步被削弱，所以，当艾伯特和他的軍界盟友互相傾軋的时候，德国党并沒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活动。

在列宁看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德共的分裂就是这种不

---

① 布兰德与瓦列斯基：《共产主义在波兰：战斗在前哨陣地上的三年》，汉堡 1921 年版，第 42 頁。

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所以在华沙城前失敗得如此慘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向里沃夫方向进軍的南綫苏維埃部队的指揮不当。南綫革命軍事委員会的主要政治人物是斯大林。斯大林一心要在斯米尔加和屠哈切夫斯基进入华沙的同时攻进里沃夫，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自傳》，第 458 頁。）

成熟的象征。在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在这本著述中同时討論了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和凡尔賽条約)中，他把海德尔堡会議上的混乱爭执提高到对魏瑪共和国进行总的政治評价。他維护多数派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决議，但是，他的前提和結論具有不同于保尔·列維和卡尔·拉狄克的另一个着重点。当后两个人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暴动主义者”的时候，总暗含着一种强烈憎恨的感情。列維认为，通过玩弄巧妙的手腕，是有可能避免同軍队发生一切冲突的，因此他蔑視共产党人的軍事对应組織。在亲密的圈子里，列維集团从来沒有对咒罵工厂代表委員会和李卜克內西感到过厌倦，在他們看来，李卜克內西这类人中了軍事挑衅的圈套，因此要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失敗負責。在列維早一些时候的演說——譬如說，在1920年2月举行于杜拉赫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中，他认为內战已經处于最后阶段；按照他的分析，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幻想的最初阶段)过去以后，共产党就将通过它的正确政策，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爭取过来。他的目标是要在共产党人的合作下組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这个政府为議会中的多数所支持，就能够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通过宪法程序遏制反革命。列維意識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着德国工人阶級中的一个强大部分，这部分人认为他的政策是不現实的和不可能实現的；因此，他不仅力图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逐出共产国际，而且摆出一副要把所有的冒險主义者、暴动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一句話，要把所有不相信共和国稳定性的人統統排除于德国工人运动之外的姿态。在这一斗爭中，列維时常举出馬克思的先例，馬克思曾經进行了无情的斗爭，把偉大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逐出第一国际。

在列宁的贊助和列維的反对下，1920 年 8 月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創立了“同情者組織”这样一个特殊地位。該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得到了莫斯科干事会的接待。头两届世界代表大会对待工人运动中的其他积极分子、对待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类似团体，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保尔·列維和斯巴达克中央委員会始終不肯接受对待极左派的这一政策，他們經常要求把极左派开除，但总是遭到拒絕。

列宁决定有保留地支持共产国际中的极左派，是以下两大理由为依据的。第一，开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集团发生的影响，将促使各国共产党变为純議会主义性质的机器。第二，尽管他在俄国党內反对工团主义思想，列宁却不打算把同样的紀律制裁方法带入共产国际，因为强行使性质日益不同的各国共产党实行这样一种轉变，将会阻碍它們的成长幷使它們走上歧路。具体应用到德国党身上，列宁的观点具有格外大的理由；尽管存在着許多相同的提法，列宁对德国形势的理解却同拉狄克和列維有根本上的差別。

列宁所特有的那种建設性批評的态度，再清楚不过地表現在他对卡普暴动的評价、特别是他对列金的反措施的評价上。在批評德国党关于暴动的声明时，列宁首先指出，它表示願意支持列金所提議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論拿基本前提或其实际結論来說，都是完全正确的”①。列宁接下去說道，它的前提是当时还沒有可能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8 頁。列宁注明該书最初写成的日期为 1920 年 4 月 27 日；5 月 12 日，他又作了一些关于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后来事态发展的增补。增补二批評了刊登在 3 月 26 日《紅旗报》上的德国共产党关于卡普暴动的声明。列宁的这本小册子在 6 月 20 日同时以英俄德法四国文字出版。

实現共产党領导下的无产阶級专政。保证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善意反对派的态度将会产生这样的实际結果：把各資产阶級政党排除出卡普暴动被粉碎以后的新政府。毫无疑問，“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① 他写道，因为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可能扭轉德国的潮流。

列宁在这样說的时候，对列金作了妥协。同德国反革命进行战斗并不仅限于为一个俄国式的无产阶級专政而斗爭，也可以通过一个德国式的劳工政府来进行。此外，他們两人之間还存在着另一个共同点：两人都不信任社会民主党政客，都怀疑这些政客是否願意中断他們同軍队、同軍队的非法附屬品及其在議会中的保护者資产阶級政党的联盟。革命家列宁和組織家列金有可能共同宣布这样一个結論，即：单单把各政党重新組入一个新內閣，是不可能根本改变德国形势的。列金对政治家們感到的憤慨化成列宁主义的詞句，就变成了：“……謝德曼輩跳不出也不能跳出資产阶級民主制的圈子，而这种专政又不能不是資本的专政。”② 因此，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中占半数的共产党成員，不能够服从将会把他們局限在純議会方法上的社会民主党紀律。德国反革命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組織得非常严密，单靠这些方法是对付不了他們的。放棄对志願团和黑色国防軍的抵抗，就会束縛住工人的手脚，使一切反共和国的力量大占便宜，而这些力量在需要利用議会制政权来准备另一次政变的时候是会容忍这种政权的，但此后就会把它棄如敝屣了。

列宁对卡普暴动的分析本来有可能成为德国共产党一种独特政策的起点，这种政策既可以摆脫德共早年的不成熟性，又可以消

① 同上书，第89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89頁。——譯者

除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祖先的保守主义。可是，列宁的倡議始終沒有产生結果；在他这样提出問題的时候，正当紅軍在波兰大失敗之际，而这一失敗标志了革命扩張希望的結束和俄国党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的开始。正是在这种衰落前夕誕生的德国共产主义群众性政党，丧失了斯巴达克团的那种青春活力，并且在从未充当过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染上了走下坡路的俄国党的那些老朽守旧习气。

季諾維也夫在哈雷

1920年3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选出四名代表出席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商談該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問題。代表中的瓦尔特·施特克和恩斯特·多伊米希是贊成加入共产国际的，威廉·迪特曼和阿尔都尔·克里斯平則抱着相反立場。① 摆到他們面前的是对申請加入的新党提出的“二十一項条件”，这些条件毫不含糊地要求各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中心完全一致。各国党中央委員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关系，共产党报刊的控制，議会代表的提名，共产党各方面活动中一切重大問題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尽可能詳細地以条文規定下来，并且賦予了这些条文以最大的权威性。②

---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起举行于彼得格勒，7月23—8月7日举行于莫斯科）議事录》，汉堡1921年版，第781頁。提到的第五个代表席勒不起重要作用。文中所說的这四个人都是議会議員。施特克在納粹統治时期死于集中营。多伊米希于1922年7月5日去世。迪特曼在希特勒政权倒台后仍然健在，目前正住在瑞士。克里斯平于1947年1月在瑞士逝世。

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1) 日常的宣傳和鼓动必須具有眞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并且符合第三国际的綱領和各項决議。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須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級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一切期刊和其他出版物……都归党中央委員会掌握……(2) 凡是願意加入共

最近这些年来，各国共产党已經日益为莫斯科所控制，因此，人們通常总是机械地把后来的这种情况和早年建立在“二十一条”基础上的国际等同看待。誠然，后来的局面是由早先的情况发展

产国际的組織，都必須有計划有步驟地撤銷一切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負的比較重要的职务（在党組織、編輯部、工会、議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中的职务），提拔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們……（3）共产党人必須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責……（4）必須始終不懈地和有步驟地在軍队中进行宣傳鼓动工作……而且是〔如果必要的話〕秘密地进行……（5）必須有步驟有計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級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貧农的同情和拥护……那就不能获得胜利。（6）凡是願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假仁假义的社会和平主义，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資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減軍备的談判、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組，都不能使人类摆脫新的帝国主义战爭。（7）凡是願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須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許像屠拉梯、莫迪利揚尼、考茨基、希法亭、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納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自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員……（8）凡是願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須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9）凡是願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須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組織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10）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須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爭……（11）願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須审查其議会党团的人員成分……使議会党团服从党中央委員会……（12）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来的……（13）在共产党員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該定期清洗党組織的成員，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內的小資产阶級分子。（14）凡是願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須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維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勢力进行的斗爭……（15）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綱領的党，必須在最短期內修改这些綱領，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議精神的共产主义綱領……（16）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的一切决議，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須执行……（17）凡是願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該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18）每一个党的主要机关报刊，都必須刊登共产国际主席团一切最重要的文献。（19）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閉幕后，凡是已經加入或者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該在四个月內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来討論上述各項条件……（20）凡是現在願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沒有根本改变自己的以往策略的党，在沒有加入以前必須設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員会內，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張加入第三国际的……（21）党員如果原則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綱，应該开除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議事录》，第388—395頁。）〔以上譯文参考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187頁。——譯者〕

出来的，但是，把两者等同起来却是一种歪曲，因为这种态度忽略了列宁和斯大林性格上的差别以及他們两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不同。列宁对于一个起作用的共产国际的看法，是以下列前提为基础的，即俄国党壟断政权和意識形态的局面只是暫时的，很快就会为技术先进的国家中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代替。那时，不成熟的共产国际便会克服它初期的种种錯誤（造成这些錯誤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是由俄国发起成立的），成长为一个更高类型的国际工人組織。

然而，以魯道夫·希法亭① 为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重要集团，同列宁发生爭执的并不单单是集中制問題，而且还有由誰来領导新的群众性政党的問題。在一段时間內，动搖不定的希法亭集团考虑能否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法；他們希望留在联合共产党的

---

① 魯道夫·希法亭，1877 年出生于維也納，上大学时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奧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創始人維克多·阿德勒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到 1902 年，也就是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希法亭已成为考茨基的《新时代报》的重要撰稿人，特别是在馬克思主义經济学的問題方面。1906 年，他被奥古斯特·倍倍尔召到柏林，在党校讲了一年課；在警察干預了这一活动，威胁要把他驅逐出境的时候，他的工作为罗莎·卢森堡所接替。这以后，他成了《前进报》的外事編輯（1907—1915），并于 1910 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財政資本論：关于資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研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以这本书为根据的。

在党对帝国主义和战爭問題展开的討論中，希法亭屬于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义中派集团。1914 年 8 月 3 日，希法亭是十五名反对通过軍事預算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議員之一。在11月的那些日子里，他同考茨基、哈塞、迪特曼在一起，构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他变成了党的主要机关报《自由报》的編輯。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923 年秋季，他在施特雷澤曼的政府中做了两个月財政部长，拟訂了一系列通貨改革計划。从 1928 年 6 月到 1929 年 12 月，他又一次在赫尔曼·繆勒的內閣中担任部长，后来由于国家銀行总裁沙赫特的压力而被迫辞职。希法亭通常总是党代表大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他主編党的理論性月刊《社会》。1933 年 3 月末，他越过丹麦边界逃出德国，一直在瑞士住到 1938 年。那一年，他参加了从布拉格逃到巴黎的党的全国执行委員会。1941 年秋，他被維希政府引渡給蓋世太保，几天以后，就在巴黎的一所监獄中死去——不是被蓋世太保杀害就是自杀。

領导崗位上。但是，这恰恰是列宁所要防止的。他希望把希法亭-迪特曼-克里斯平路綫排除出革命的德国組織。有人問过季諾維也夫："要是他們接受了二十一条，你們打算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我們再提出二十二条。"

在这場討論中，俄国共产党的列宁和德国共产党的列維，尽管表面上意見一致，实质上針鋒相对地提出了根本不同的观点。列宁企图使俄国以外的革命努力继續下去，让各国年輕的党通过一段严酷和复杂的斗爭得到鍛炼，在这段时期，它們将不得不設法解决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和危險的問題，使自己变成本国的領导力量，担負起向反革命作斗爭的領导責任。当他劝告德国的克里斯平或意大利的塞拉蒂时，列宁从来也不忘記强調反革命政变的迫在眉睫。这两个国家都正瀕临着危机；墨索里尼正在积极地招兵买馬。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和暴力說了些什么呢？〔列宁問道〕。他說，'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許可以把二者这样区别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踐上，尤且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軍官，对司丁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們就非用暴力和恐怖不可。当然，沒有必要預先說我們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軍官和卡普派还是和今天一样，那末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①

列維企图縮小将要采取的决定的重要性，把"二十一条"說成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說来算不上負担的入会費。②

---

① 《第二次代表大会議事录》，第349頁。〔譯文引自《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218頁。——譯者〕

② 喜欢引用文学譬喻的列維，对他未来的同事們引用了下面两句詩：

但是，"二十一条"代表的是一种革命紀律的抽象标准，就連俄国党的現实情况都和它不相符合，更不用說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內的討論进行了好多个月；討論的中心点是如何組織一个战斗性的党。这不过是起点；俄国革命的一切問題都第一次在龐大的工人集会上被提了出来，拿来和1918年以后他們自己的經驗相比較相对照。这不是一种可以根据学究式的理由接受或拒絕一种立場的討論；作出的决定对爭論者本身的生活将造成重大影响。对于每一个人說来，接受"二十一条"与否都是一件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参与討論的工人們正确地理解到，对于是否加入莫斯科中心的問題作出决定，也就是对于要在改組他們的干部后立即实行的革命政策作出决定。

因此，尽管討論在形式上涉及的是俄国中心和各国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問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內部的斗爭实质上涉及的还是德国本身。这些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并不想牺牲他們的党內生活中那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旧习慣，而是要消除动搖不定的軟弱的領导。俄国党的內部发展，它那已見端倪的走向壟断国家党的轉变，还沒有为它的德国盟友以及它的俄国組織者所察觉；独立社会党人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此作为他們改編組織向复辟力量作斗爭的前提。

在1920年10月12—17日举行于哈雷的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告分裂。在此期間，贊成参加共产国际的潮流已經如此高漲，以致使德国政府竟不敢拒絕批准它的主席季諾維也夫入境。作为机器工业与化学工业中心的哈雷，成了季諾維也夫

恋上你的爱神使你受尽了折磨，
是要賜福于你，使你心灵純洁。

〔同上，第362頁。〕

和希法亭各显身手的战場，支持希法亭的有阿布拉莫維奇、馬尔托夫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剛在这一年定居于柏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則把这些人看作俄国革命的不可信任的敌人。在討論中，俄德两国的成分以奇怪而变态的比例相互交錯；涉及到的問題的复杂性，一般党員永远也沒有搞清楚。在当时的德国工人中間，对俄国的情况都还只是一知半解。

季諾維也夫在洛佐夫斯基的陪同下到达哈雷，当时，后者是共产党工会国际“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季諾維也夫讲起德語来很流暢，但也有些吃力；他在瑞士住过多年，但他从沒有在德国組織中活动过，或者用德語发表演說。当他踏上讲坛时，他发現自己面临着的是一个分裂了的代表大会。反对集团几乎包括有一半代表，正准备向他发出詰难。季諾維也夫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說；他开始讲話时声音很小，有些吞吞吐吐，努力搜索着适当的語汇，好像被激动的听众吓住了似的。但是，随着演說的进行，他把多数听众都爭取了过来。对那些为季諾維也夫的魅力所征服的代表們說来，关于組織程序的种种繁瑣細节一下子都无影无踪，消失于在德国实行革命政策这一重大問題的背后了。大会以二百三十六对一百五十六票議决参加共产国际。

在1920年莫斯科政策的大胜利中，强調的重点发生了一种奇特的轉移，这已經显示出俄国的蛻化。1918年，能够摧毁資产阶級国家机器并代之以地方苏維埃政权的布尔什維克，对德国工人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但是，到1920年，关于工人委員会的幻想已經消失殆尽。紅軍变成了革命的主要果实，而随着紅軍的兴起，国家計划也代替了由工人委員会管理生产的想法。不熟悉俄国生活状况的德国工人，怀着他們长期养成的对于有組織社会的偏爱，天眞而热情地接受了“有計划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实行国家計

划化对德国經济說来倒要比对俄国經济适合得多，但是在哈雷代表大会上，俄国被描繪成了这样一块乐土，在那里，由国家組織一种富足經济的社会主义理想正在实現，在那里，貧困的現象正在消失。

季諾維也夫感觉到了这一趋势，这一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席卷了进来的趋势。他在逗留期間写了一本題为《在德国的十二天》的小册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話："我們有出路、有希望。我們正在向完全廢除貨币的目标前进。我們用实物支付工資。我們实行了电車免費制。我們建立了免費的公立学校、供給免費的(虽然暂时还是菲薄的)膳食、免費的公寓、免費的照明。我們正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慢慢地实現这一切。我們必須不停地战斗，但是我們有出路、有希望、有計划。"① 这些都是富有魅力的詞句。

在这次哈雷会議上，恩斯特·台尔曼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露了面，他率領着汉堡代表团，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国际派讲話。台尔曼代表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这一党組織的下层，他們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掌握不够，抵不上訓练有素的党的政治家，但是充滿了精力和主动性，而且不信任那些党官僚。决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斯巴达克团合并为統一共产党的，正是这一个集团，而不是圍繞着希法亭和阿布拉莫維奇的党的理論家。分裂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带进了共产国际；剩下的少数在統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間观望了一年半之后，終于在1922年9月22日的紐倫堡代表大会上回到了社会民主党内。

在此后不复存在的斯巴达克团举行了最后一次短促的会議之后，統一工作便于1920年12月在一种含糊曖昧的气氛中开始了。

---

① 格雷戈里·季諾維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汉堡1921年版，第74頁。

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勉强容忍了斯巴达克派，把他們看作一种最討厌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附屬物。斯巴达克派知識分子則把独立党人当作一批原料接收下来，认为这批原料很值得欢迎，但是质地非常粗糙，需要經过大力加工才够得上水平，才能貼上他們的高級馬克思主义商标。因此，这两个集团各自怀着不同的打算走进了新党；德国共产党在1920—1923年間的生活，一直充滿了这两派之間的爭执。斯巴达克派領袖兴高彩烈，以为已經得到了长久盼望的机会，可以建立起一个有力量在宣傳和議会影响方面同社会民主党人竞爭的群众性組織。可是，来自这种群众性組織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却力求达到恰恰与此相反的目的，他們希望成立一个有能力組織斗爭的、由少数优秀分子构成的党。在1918—1920年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小的气力就获得了最大的議会影响；譬如說，在这几年中，拥护該党的选民百分比就由6%上升到17%。1920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議会中拥有一百零三席，而社会民主党也不过拥有二百七十八席，共产党則只有二席。然而，尽管輕而易举地取得了这些胜利，党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却总是被人击败。

統一代表大会的排場迥然不同于在此以前斯巴达克派开会时的朴素，这已經反映出莫斯科的那套新宣傳方法搬到了柏林。大会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場上的教师联合会大厦中举行，巨大的会議厅里用大量的紅布考究地装飾起来，悬挂着列宁和托洛茨基、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以及季諾維也夫的肖像。每一个門口都有共产党糾察队站崗。整个的景象显示出一种把古典音乐和革命詩歌結合在一起的矯揉造作的气氛。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們大都是来自工作台的工人，这种新的官方华丽排場使他們感到厌恶；他們原本希望从会上听到对德国当前形势的清醒分析，听到今后該做些

什么的具体建議。可是，保尔·列維却向他們大談其世界經济形势，他的讲演中堆砌了大量的統計数字，夹杂着亚洲和英美世界各式各样的新聞，最后还来上这么几句模仿圣經的結束語："进来吧，你們德国的工人們，走进〔我們的新党〕来吧，因为你們的神就在这里。"我注意到埃森和汉堡工人离开会議厅的情况；他們以无产阶級的作風向一些精美的装飾物上啐了几口痰，他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列維的那段花言巧語表示厌恶，这具体地表明了德国工人的某些阶层对領导日益鄙視的态度，这是俄国的"工人反对派"集团对領导表示根本怀疑的微弱反映。

第六章　走向新經济政策

在整个俄国內战时期和后来的若干年中，始終存在着一种傾向于地方政权、傾向于分权制度、傾向于由工人管理工厂及地方軍队、由各个独立民族单位組成联邦的强烈趋势。这是十月革命的原来潮流，体現这一潮流的“工人反对派”、“軍事反对派”、“工会反对派”的出現都发源于一个願望，即以地方为基础建立一种合作社社会主义，它們在党內掀起了长期的斗爭，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地被击败以后，这一潮流才逐漸消声匿迹。

工业国有化

正如他們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起先承认然后鼓励农民夺取土地一样，布尔什維克在革命后也对工人夺取工厂作了一段时期的让步。将在此后三十年中震动俄国的工业革命，早在1917年11月14日就已通过一道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法令緩慢地开始。法令规定，仍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占有他們的財产的旧业主，应該在工人委員会的监督下继續生产，工人委員会有权对生产計划和劳动条件实行监督。但是，这一方案始終沒有实現。一系列个别沒收的事件发生了；只要工厂上飄揚起一面紅旗，就标志着工人已經把这家企业夺取过来，并且正在自己經营管理。人們感觉到，沒收私人財产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一个基本前提；經理、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在工人組織的监督下进行协作，也不能被看做社会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經济的第一步，是由生产者本身实行集体管理。譬如說以铁路为例，这就意味着铁路应該由实际在火車

上和車間中劳动的那些人来管理，而不应該由一个从外面派来的专家来管理，即使这个专家是一个工会干部，甚或原来是一个铁路工人。

这种打算由工人管理工厂的尝試，很快就由于普遍的貧困和經济解体而受到阻碍。大型的現代化工厂，一个农业国中的孤立单位，不足以充当少数工人优秀分子恢复和指导生产的工业基地。1918年5月，經济委員会全俄代表大会反对自发地个别沒收工厂：瓦解了的俄国資本主义經济需要更加謹愼地向社会主义形式过渡。布尔什維克党把工人干預生产的任何企图都叫做"工团主义"。在烏克兰德軍的压力下，加紧实行了种种强迫措施。5月30日，苏維埃地区的城市中一律宣布戒严。6月11日，各地建立起貧农委員会，以便利于征收粮食；它們把較富裕农民的土地分給貧农，从而使土地革命继續了下去。不久，又有一批批武裝工人参加到它們当中来，这些工人大致分为七十五个人一組，每組武装着两三挺机关枪，开始征收存粮。对于农村說来，这些征粮队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具体化身。

6月28日，通过了一道规定工业普遍国有化的法令。凡是資本超过一百万卢布的工厂，以及某些工业部門——采矿、紡織、烟草、玻璃与瓷器、水泥等部門的較小工厂，都一律沒收。頒布这項法令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上的，旨在同得胜的德国施加的压力作斗爭；当时，烏克兰的德軍正在向頓河挺进，如果它继續获得胜利，俄国企业主就有希望恢复他們在自己工厂中的地位。因此，許多企业主都事先給自己的工厂挂上屬于某个德国公司的招牌，而有一些德国公司就是专門为这种目的成立的。

"拉林当时正作为一个商业代表团成員逗留在柏林，他在〔6月〕25日打电报通知列宁說，德国駐莫斯科大使很可能日内向苏

維埃政府提出一項声明，宣布某些俄国重要企业目前已經归德国公民所有，因此，它們应該不受任何国有化法令的約束。面临着俄国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落到德国人手中的这一危險，人民委員会在四十八小时內匆忙拟訂和通过了国有化的新法令，同时，国民經济最高委員会则連夜开会，拟出了一份适用該項法令的企业名单。其結果是，在米尔巴赫伯爵多半正在准备提出他的外交照会的那一天早晨，《消息报》上便公布了国有化法令。"①

因此，第一道普遍国有化法令是內战和对德战爭的联合产物，是一个沒有經济內容的强有力的政治姿态。当时，重要的工业区域大部分都同莫斯科隔絕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业中心，关系生死的粮食和原料、即煤铁和谷物的主要储藏地——烏克兰、頓河盆地、高加索，都和莫斯科失去了联系。一半以上的交通系統掌握在敌人手上，在俄国这样一个領土极其辽闊的国家，这种情况使得其余的地区变得雕零不堪。一切經济措施都是为了軍事便利而采取的，因此，随着紅軍的收复失地，在这些烂攤子上便建立起了一个集中經济管理的骨架。經济困难愈大，所采取的强迫措施就愈加严厉。

1919年是軍事上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些胜利是以粮食、原料和各种生产品的日益缺乏为代价而换取来的。② 1919年3月，粮食情况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更加紧实行了由合作社分配食物的强制措施。城市人口被强迫参加合作社，在口粮定量方面分为三类：工人、工人家屬和以前的統治阶級。对于国营企业的雇員和工人(包括軍屬)来說，可以依靠实物奖金和小卖部的补充配給品改善一些

① 莫里斯·多布：《革命后的俄国經济发展》，倫敦劳特列治父子出版公司1928年版，第59—60頁。

② 下列統計表所显示的，是1920年上半年各种物品的产量同和平年代1913或

定量情况；此外，他們还获得免費的住所和燃料，而且在理論上，使用煤气、电灯、电話、交通工具都可以免費。在这段时期結束时俄国經济分成了两个不均等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国营經济，它的工作情况极为糟糕，工人們只能得到勉强維持最低生存的工資，另一部分则是已經解体的龐大的农业經济。

取代了資本主义的幷不是一种計划經济，而是經济无政府状态，幷且就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

1914年六个月的产量相比較的百分比：

顏料、油漆等	2.2
紙与紙板（包括烏克兰）	15.2
橡胶产品	1.7
玻璃	13.0
火柴	16.0
烟草	17.7
40°酒精	10.0
糖（包括烏克兰）	9.0
煤（包括烏克兰和西伯利亚）	25.0
粗揮发油（包括高加索和恩巴）	33.0(?)
鉛	33.0
黄金（西伯利亚）	12.0
铁矿石（包括烏克兰）	12.0
鑄铁（包括烏克兰）	2.4
鋼铁（包括烏克兰）	4.0
棉綫	20.0
棉布	3.3
原麻	50.0
鉀鹹	0
硝酸	0
面粉	18.0
矿物肥田粉	0
肥皂与蜡烛	2.8
鉛笔	1.2

（摘自1920年11月14日《眞理报》上的拉林报告，轉引自利茨：《俄国最近的經济发展》，牛津1922年版，第146頁。）

关。苏維埃經济結构变化的根源直到新經济政策以后时期才发展成熟，但是早在內战时就都完全表現了出来。当时的两个主要特征——經济的完全解体，受控制的小市場和大得多的黑市之間的对比——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欧洲的特有景象。

到1920年初，內战大体結束。1月26日，协約国的封鎖宣告解除。然而，随着这一政治情况改善而来的，并不是放松而是更进一步加强了經济控制，向业已扩大的国营經济稳步前进。1920年11月29日，頒布了全部国有化法令，把一切利用机械动力、雇用五人或五人以上以及不利用机械动力、雇用十人或十人以上的工厂全部收归国有。

和国有化趋势同时发生的，还有廢除貨币的趋势。根据1920年4月30日的一項法令，一切工資都应該以实物支付；1921年2月，实行新經济政策的六个星期之前，廢除了以現金納税的制度。这一趋势部分表明了布尔什維克希望建立一种无貨币的經济，同时也是通貨体系崩潰和实物交换制度代之而起的結果。按照国家銀行公布的数字，在1917年10月6日，流通中的卢布共有一百六十二亿；到1918年5月，这个数字已經增加到四百十亿，而到1918年底，便高达二千三百亿以上了。①

紅軍和党

在这些艰苦的年代里，托洛茨基从革命者之一变成了一个在地位和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的全国領袖。正是他組織了紅軍，締造了这一在击退資本主义干涉和建立年輕苏維埃国家的最为有效的

① 在这些年代中，流通的卢布有四种：沙皇卢布、杜馬卢布、克倫斯基卢布和苏維埃卢布。随着通貨的日趋膨脹，这四种卢布的购买力和相对价值也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工具。从内战的烽火中崛起的俄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俄国。

1918年3月15—17日举行的第四次苏維埃代表大会，任命托洛茨基为軍事人民委員，而在一个月前，中央委員会已經指定他为紅軍領导人。在辛比尔斯克失陷以后，决定让托洛茨基到伏尔加前綫去。8月7日，托洛茨基在不知道喀山当时已落入捷克斯洛伐克軍团之手的情况下，乘坐一列在夜間匆忙装配起来的火車离开了莫斯科，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就从这列火車里把紅軍組織了起来。“革命軍事苏維埃主席”的火車开到“薩馬拉、車里雅宾斯克、維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朔夫、斯摩棱斯克，再回薩馬拉，然后开到頓河上的罗斯托夫、諾沃切尔卡斯克、基輔、日托米尔等等数也数不完的地点……我的軍事著作中的一条注釋提到三十六次旅行，行程总数达十万零五千公里以上。”①

在組織紅軍的过程中，托洛茨基时常和地方工人組織发生冲突。革命的最初阶段，在每一座城市里，在每一个部队里和在每一艘軍舰上，工人、士兵或水兵都发动起义，建立了自己的苏維埃政权。“这些战斗队經常难免要打一些小仗。由于具有群众的同情，他們很容易获胜。这样，他們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鍛炼，他們的領袖也获得了一定的威望。”这些地方武装部队是圍繞着本区工业单位組織起来的，它們和工人委員会一致行动。它們建立了一种以地方軍队为基础的地方政权，如果不加干預，这种政权就会自行采取一套甚至反对莫斯科中心的行政和組織方法。“最初，”托洛茨基写道，“不仅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人民委員会，都有自己的軍事人民委員。”

针对軍事組織的这种地方主义原则，托洛茨基为提高軍事效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414頁。

率进行了两年的斗爭。

“由于习惯了輕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游击队……暴露出种种重大缺点；他們沒有能够胜任的情报組，彼此之間沒有联系；他們也沒有能力执行一場复杂的軍事布置。因此——有不少次，在全国的不少地方——游击主义遭到了慘敗。要把这些单独的支队組織在一个集中化的系統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指揮官的軍事才能不高，他們仇視旧軍官，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們在政治上不信任旧軍官，一部分也是由于要掩飾他們本身的缺乏信心。”①

托洛茨基实行了最严厉的軍事紀律。

“我发布了一項从我的火車上印刷好以后分发給全軍的命令，这道命令宣布：‘我警告全軍，如果任何部队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該部队的政治委員将首先被枪斃，其次将枪斃指揮官，然后另派勇敢的士兵接任他們的职务。懦夫、胆小鬼和叛徒，都不会逃脫吃子彈的命运。’我在全体紅軍面前郑重宣布一定将上述措施付諸实行。”②

1918年末，一个名叫潘切列耶夫的共产党軍事委員，第一次根据托洛茨基的特殊命令受到軍法审判，以“軍事瀆职”罪被枪决。这一事件引起了猛烈的反对，几乎所有的党的領袖都反对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爭中利用了这一事件；布哈林，“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反对雇用‘将軍們’”，在《眞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托洛茨基“未經审判就枪斃了最优秀的同志……集中制的軍队被說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特有的东西，反对派鼓吹以游击队制度作为它的代替物”③。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的估价和他的影响》，查尔斯·馬拉穆思据俄文編譯（紐約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1941年取得版权，1946年发行），第298頁。

② 托洛茨基：《自傳》，第401頁。

③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99、303頁。

对托洛茨基的軍事措施的反对，导致了严重的党內爭执。列宁出来緩和了这場爭执，他使党认識到，正是托洛茨基的軍事天才挽救了革命和国家；另一方面，他又增强了党对指揮員的控制，以此和軍队的集中化相抗衡。党史作者們和托洛茨基都用来称呼这一派的名詞"軍事反对派"，不足以表明統一于列宁的領导之下的党和軍队两大力量之間的根本对立。这种矛盾是促成斯大林兴起的一个重大因素，因为在托洛茨基极端敌視他的情况下，列宁对他采取了保护态度。一个新参加布尔什維克的人白手起家，在最短的时間內天才地創造了一支現代化軍队，这一事实在新国家成立后最初三年的决定性时期，使正在形成的两支新干部、即紅軍軍官团和党的組織家之間，产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和危險的磨擦。

当布尔什維克党夺取到政权的时候，它的集中化程度比不上任何西欧社会民主党；組成它的是一些松散的单位，而这些单位中的人在組織、管理和政府工作方面也都沒有什么經驗。口头上大談而特談党的紀律，同革命俄国实际存在的党的生活状况形成了鮮明的对比。主要由新党員組成的地方党組織，被內战割断了同中央的联系，不得不大部分独立行事。长途电話、电报、飞机，只有党的最高阶层才能享用。依靠时常被战爭打断的铁路交通进行联系，往返一次要花好几天时間，对于边远的省份来說，要耗費好几个星期。由于紙張缺乏，連党的文献都无法多印。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布尔什維克組織存在着一种要求独立的热烈情緒，不断地反抗紧急状态强加于它們身上的軍事紀律。在同"小資产阶級无政府状态"作斗爭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用数以千計的、后来是数以万計的旧沙俄軍官建設了紅軍。这种把旧政权的軍官安插到革命軍队中的做法，在党的組織者中間引起了怀疑。脑

子里装着法国大革命教訓的布尔什維克，在注視着他們的总司令完成丰功偉績的时候，經常想起了拿破侖·波拿巴。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他从流动火車里指揮前綫軍务的两年半当中，莫斯科出現过种种反对他的謠言和阴謀；他所說的話无疑是眞实的。列宁力求彼此妥协，他不止一次地試图以可靠的党員来担任新軍队的較高級职位；这种冲突曾反映在托洛茨基談到的一件軼事上：

"当我們在东綫失利、高尔察克逼近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写給我一張便条：'要是我們把所有的专家統統撤职，任命拉謝維奇做总司令，你看会怎么样？'拉謝維奇是一个老布尔什維克，曾經在'德国'战爭中被提升为軍士。我在同一張便条上回答了两个字：'儿戏！'"①

这一步已經走得过远，势难回头了。后来，当托洛茨基某一次难得回到莫斯科，列宁和他再次討論起前綫形势的时候，托洛茨基对他讲了改組軍队的詳細情况：

"'你問我，'我說，'是不是最好把所有的旧軍官統統一脚踢开。可是，你知道目前的軍队里有多少这样的人嗎？'

'不知道。'

'連大致上的数目也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們至少有三万人呢。'

'多少？'

'至少三万。他們当中每有一个叛徒，就有一百个可靠的人；每有一个开小差的，就有两三个陣亡的。因此，我們怎么能把他們

---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447頁。

不分好坏，一律撤銷职务呢？'"①

作为紅軍的組織者，托洛茨基要求日益扩大他管理全部現有人力的职权，他也得到了这种权限。他負責管理铁路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改組是保证軍队机动性的唯一前提。他后来主張把工会溶入国家机关的綱領，必須放到这一背景上来考虑。在一切和軍队有关的生产部門中，都树立了严格的劳动紀律，这大大改变了工厂中的气氛。布尔什維克工人的先鋒队咬紧牙关忍受了这种轉变，他們把这看成是一种为爭取生存而不可避免的暫时状况，但并不承认这种軍事劳动紀律就是他們为之而推翻沙皇統治和資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經济。托洛茨基对交通运輸部門的改組也得到了列宁的贊同，列宁支持他击退了各方面的反对，特别是体現在党內的各种"工人反对派"，党內第一个有組織地反对国家党政权的派系。

民主集中派

这一派的一个早期集团自称为"民主集中派"，由瓦列里安·奥辛斯基和季莫菲伊·薩普罗諾夫領导(前者在1918年担任国民經济最高委員会主席)，他們向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份反对派政綱。"政府各級工作人員完全照旧作風办事，"他們声称。"党和苏維埃正在蛻化为一种官僚体系。列宁一个人独攬了大权。"他們的攻击矛头特别指向第八次代表大会成立的三个党組織。季諾維也夫——无疑是在取得了列宁的同意以后——建議中央委員会把它的一部分职权委托給三个較小的組織——政治局、組織局和书記处。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兼任政治局和組織局的委員。②

---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447頁。

② 参看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45—346頁。

奥辛斯基和薩普罗諾夫把他們对党組織的批評扩大为普遍要求苏維埃国家民主化。他們不但要求党和苏維埃內部的民主，而且要求国家机关和工业管理方面的民主。他們的关鍵性要求是党和苏維埃分离，这就等于要求使多党局面合法化。这个集团的另一个成員弗拉季米尔·斯米尔諾夫則集中攻击軍队的組織过于严格。

在內战时期，党內爭执在爭取生存的共同願望下被抛到了一边；从1919年3月到1920年3月，党員人数增加了一倍。① 新党員大部分是工人，他們带来了潛藏着的巨大精力和銳气。在这一时期，革命浪潮仍在高漲，这些工人甘心忍受的犧牲在战場上决定了苏維埃国家的命运。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漲，人們也愈来愈希望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1頁)和《联共党史》，对布尔什維克党的党員人数作了如下統計：

	《大百科》	《联共党史》
1905年初	8,400	
1917年初	23,600	40—45,000(第183頁)
1917年4月	40,000	80,000(第188頁)
1917年8月	200,000	240,000(第196頁)
1918年初	115,000	270,000*
1919年初	251,000	
1919年3月	313,766	313,766(第232頁)
1920年初	431,400	
1920年3月	611,978	611,978(第240頁)

*1918年3月举行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十六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五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这次大会代表着十四万五千个党員。实則当时党員总数至少有二十七万人。其所以有这样一种差别，是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带有一种非常的性质，許多組織都沒有来得及选派代表，而当时被德軍占領各区中的組織又沒有可能选派代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换党名称……的决議。从此时起，党就称呼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維克)——俄共(布)。"(見《联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8—289頁。)众所周知，沒有标明作者的《联共(布)党史》是由斯大林亲自編写的。这本书加上《列宁主义問題》，就是对問題的最后論断，所有的俄国学校里都以它为教科书，此外，这本书还被譯成多种文字散发国外。

有另一种类型的党和国家組織。

1919 年 3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否定了民主集中派的綱領，认为他們对問題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但是并沒有撤銷奥辛斯基和薩普罗諾夫在党和苏維埃政府中的重要职务。反对派領袖中包括若干內战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們作为工人布尔什維克的声望一直持續到和平年代。这个集团的力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竟能控制烏克兰——俄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莫斯科中央同烏克兰之間天生的对立，以及內战时期該地地方政权的迅速变化，使得无政府主义的、反中央集权的傾向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中最容易得到响应。由烏克兰本身的特点形成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願望打成了一片。納斯托·馬赫諾，几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农民領袖中最重要的一个，在烏克兰南部建立了一种农民公社，1918—1919年，他一直在那里进行战斗。他对克里姆林和紅軍統帅部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决不是白党的工具，也不打算屈从于莫斯科的控制；他希望能在两大力量的夹縫中求生存，維持某种程度的区域自治。二十年代初，紅軍粉碎了他的游击队，但是馬赫諾运动已經成为一直流傳到今天的烏克兰神話。①

在 1920 年 3 月召开的全烏克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集团在中央委員会內贏得了多数。烏克兰共产党人选举这个反中央集权派，是希望能把莫斯科的干涉減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民族主义的抗拒和布尔什維克党內反国家集团的結合，被政治局正确地理解为一种最危險的征象，因而迅速受到鎮压；薩普罗諾夫的中央委員会被解散了。②

---

① 参看阿希諾夫：《1918—1921年的馬赫諾运动》，柏林1923年版。

② 薩普罗諾夫及其集团把他們爭取工厂实行集体管理和苏維埃独立于党之外

另一个集团自称为“工人眞理派”，其領导人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諾夫，一个老布尔什維克和理論家。他进一步发展了薩普罗諾夫的分析，宣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經完全丧失。这个集团要求民主，照他們的意思来說，也就是要求政治組織的自由和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

第三个集团称为“工人反对派”，其綱領基本上同“民主集中派”和“工人眞理派”相同，① 它的領导人是亚历山德拉·柯倫泰和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这个集团在1920—1921年占有重要地位。②

的斗爭，同保护烏克兰农民不受莫斯科中央严格措施的束縛結合了起来。因此，在后来的党史說明中，布尔什維克工人薩普罗諾夫便被安上了富农代理人的帽子：

“在第四次全烏克兰会議上，以薩普罗諾夫为首的一群‘民主集中主义’的拥护者，表現了党內屈服于小資产阶級和富农分子直接影响的某些集团的思想，作为它們的政治代言人而出現。他們着重反对貧农的独立組織，反对在烏克兰成立貧农委員会。可是，如果沒有这种組織，就不可能沒收强大的烏克兰富农阶层的土地，就不可能在烏克兰农村中实現已經于1918年夏秋两季在俄国农村中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反对烏克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薩普罗諾夫便实际上变成了烏克兰富农的代理人。”（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簡史》，紐約国际出版社出版，第2卷，第87頁。）

① 亚历山德拉·柯倫泰：《工人反对派的政綱》，柏林1921年版。

② 参看西利加的报导，西利加在俄国的监狱和隔离所中度过了1929—1934年这段时期，在监狱中，他曾遇到过各种反对派的殘存者。（安东·西利加：《俄国之謎》，倫敦1940年版。）

二十年代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薩普罗諾夫，沒有在轰动一时的几件审判案中露面。他至少活到了1940年，那一年，他在巴黎的朋友們还时断时續地收到过他本人的短信。根据来自巴黎的报导，苏德战爭爆发后，他在1941年和一群反对派一同被杀。波格丹諾夫于1927年善終。斯米尔諾夫在三十年代清洗时期失踪。奥辛斯基在1938年的审判中作为維辛斯基控告布哈林的证人出現。

这些工人反对派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就是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他生于1884年，在1900年当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时便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参加1905年的革命后，他被判两年徒刑。1908—1914年期間，他住在国外。作为一个五金工人，他的工作是組織工会；1917年，他成了彼得格勒苏維埃的一个著名人物。1917年4月，他当选为五金工人工会的主席，并担任过短时間的劳动人民委員。1924年，为了把他排出俄国，

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列宁曾經把俄国同革命德国的合作，作为从战时共产主义經济过渡到改进国家技术装备上去的桥梁。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全国电气化加苏維埃政权”①的公式，意味着技术发展的高度水平同工人民主的充分展开这二者的結合。列宁非常关心技术水平，认为这是苏維埃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前提，因此他把这种电气化計划的第一步称之为“我們的第二个党綱”②。1920 年 12 月 22—29 日举行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和恢复工业的計划結合在一起的电气化計划。标志着內战实际結束的 1920 年，也是集中的計划經济趋势走上高潮的一年。

这个趋势的一个方面，就是建議大规模使用劳动軍。他們不打算把农民的子弟送回饥餓貧困的农村，而是使他們編成劳动营，哪里需要人力便开到哪里去工作。內战时期，在列宁的号召下，志

他被派往巴黎大使館工作；他从那里曾数次来柏林同馬斯洛夫和我会晤。1926—1929 年，他又回到了俄国，担任五金进口局局长。他在 1930 年清洗工会反对派时消失了踪迹。

工人反对派在国外最知名的成員，亚历山德拉·柯倫泰，和所有其他人的經历都不相同。她生于 1872年，1899 年参加社会民主党，曾数次担任該党参加国际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于 1915 年参加布尔什維克，列宁把她派到美国，在社会主义者当中組織人們支持他的观点。她在 1917 年 3 月回到彼得格勒，7 月示威事件发生后被捕。此后，她便当选为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会和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員会的委員，并担任社会福利人民委員。1920 年，她成为共产国际所属国际妇女书記处的副总书記。1922 年，为了把她排出俄国，她被派往奧斯陆大使館工作，次年担任俄国駐挪威外交代表。1926 年，在俄国国內声討工人反对派的高潮中，她被派到了更远的地方——墨西哥。她在去墨西哥途中，曾在柏林同我見过面，当时，她的情緒已經消沉，表示不願意再继續进行“这場毫无希望的斗爭”。从那以后，她就变成了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她所得到的酬报是，在很长时期內担任了一系列的外交职务，并在 1933 年被授与列宁勛章。

① 列宁的原話是“共产主义就是全国电气化加苏維埃政权”，見《全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68 頁。——譯者

② 同上，第 467 頁。——譯者

願劳动队(用俄文来說,叫做"义务星期六")曾从事于修复道路、維护铁路等各項工作。这时,决定把这种方法进一步扩大;解体的俄国經济还要依靠同一个人、即托洛茨基使用在击敗敌人时曾证明非常有效的同一种方法来恢复。当时計划使劳动完全軍事化(即使只是暫时的);紅軍不仅要保留和改編成劳动軍,而且要通过征发农民工人加以扩大。1920年1月15日,紅軍第三集团軍改編成第一支劳动軍,不久又有另外两个集团軍改編。

三个月后,托洛茨基以一个偉大的革命保民官的热情,为这項計划进行申辯。他指出,在一百十五万产业工人当中,只有八十五万人还在工作。"另外那三十万人呢?他們都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下乡了嗎?也許是改行了。也許正在忙着搞投机买卖。因此,从軍事意义来說,和八十万工人相对的就有三十万逃兵。"和对付士兵一样,也必須强迫工人去尽义务。工会担負着动員工人的巨大任务,但是就农民而言便是另一个問題,因为我們幷沒有实現农村軍事化的工会机构。

托洛茨基继續說,我們必須首先集中力量生产生产資料。"只有到我們拥有生产資料的时候,我們才能够进而直接为群众生产消費品。"一旦克服了初期的貧困,經济便会飞跃发展,赶上資本主义国家。譬如說,国內工业經济的重要部門便会不經过蒸汽时代而直接电气化。

认为强迫劳动效率不高的"資产阶級原理",只是在以自由的志願劳动同封建制度作比較时才是正确的。誠然,劳动軍目前的生产率是低的,最初甚至比現在还要低。十三至十五名士兵,有时候多达三十名士兵所砍的木材,才抵上战前三、四个人或是北方一个人的砍伐量。但是,第一批砍伐木材的劳动軍必須在交通运輸方面花去相当一部分时間;他們当中有許多人不懂得怎样才能砍

倒或劏起一棵树，而又沒有指导他們的內行和工具。“这些情况便足以解釋劳动生产率何以会如此之低。”

我們必須征发最低数量的一批农民，并且努力以劳动責任感来代替軍事化。但是，我們必須以軍事方法来对付开小差的人。“我們不能袖起两只手，坐待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农妇明白道理。我們必須强迫每一个人留在他原来的崗位上……如果党的意識和党的意志統一起来，我們就能够完成世界历史上最偉大的任务。”①

拉林、克里茨曼等② 經济計划工作者，热情地扩大了这項建議，把它变成了以一切劳动軍事化的办法来恢复俄国工业的普遍

① 托洛茨基：《論当前經济建設的任务》，1920年4月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載《俄国通訊》，柏林，1920年7月，第10期，第11—19頁。

②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維奇·魯里叶，生于1882年，1901年改名拉林加入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孟什維克派。战时，他流亡到斯德哥尔摩，在此期間对德国战时經济进行了研究；在发表于俄国国內外报紙和經济杂志上的許多文章中，他把德国的讲究效率和俄国乱七八糟的情况作了对比，认为德国的战时經济是建設一种集体經济的第一次实际努力。

拉林在1917年轉到布尔什維克陣营中，并且回到俄国。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組織俄国經济的新思想，对于成立国家計划委員会、国民經济最高委員会、把沙俄时代的旧行政区改成按經济划分的行政单位、由苏維埃壟断对外貿易等措施，都尽了一分力量。由于他是一个新入党的人，又由于他脑子里滿装着的那些互不一致的主張，都是以教条主义图式为根据的，很少考虑到俄国經济的現实状况，因此，拉林很快便被认为不够严肃。特別是列宁对他尤其沒有好評，把他和克里茨曼的經济計划称之为“枯燥到极点的煩瑣議論……有时像文人的煩瑣議論，有时像官僚式的煩瑣議論”〔見《論統一的經济計划》。《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頁。——譯者〕。对列宁来說，“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計划”才是唯一“科学的”計划；他在經济問題上最密切的合作者是老布尔什維克格列布·克尔日查諾夫斯基。在决定实行新經济政策以后，拉林便丧失了一切影响。此后，他继續写作有关經济問題的論文，1932年死于莫斯科。

这一时期最吸引人的較大著作之一，是克里茨曼的《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柏林1929年版，这部著作把經济理論提到了它的哲学含义的高度。另外可参看米柳亭的两部著作：《苏俄的国民經济組織》，柏林1921年版，《社会主义与农业》，汉堡1920年版；拉林与克里茨曼合著：《1917—1920年苏俄的經济生活与經济建設》，汉堡1921年版。

方案。这一以劳动軍复兴俄国的計划始終沒有实現。在实踐中，只限于利用一部分軍队担負了修复公路、铁道以及参加各种建設工程这样一些紧急任务。当新經济政策完全取代了这項計划的时候，它已經由于农民士兵的不断“开小差”而宣告垮台。

在这种国家經济的方案中，沒有工人管理和工厂代表的立足之地。每一个新的国营企业都实行“一长制”，設上一个大都是技术人員的經理。在初期，这些专家由共产党的政治委員領导，政委不仅負責劳动关系方面的問題，而且过問生产計划本身。战时經济的新时期是以大力反对工人干預生产宣告开始的；当时不得不賦与国家經理以指导企业的全权。在这一时期，硬性規定工人必須参加工会。

在布尔什維克工人对党的統治展开反对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大約拥有三百万会員的工会中也发出了反抗的声音。一旦貧困和战争使得一长制成为必不可免时，由誰来委派这个人——由党、由軍队还是由工会——便成了問題。工人反对派集团① 的綱領获得了广泛响应，但是人們已經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列宁和党肯定不贊成恢复革命初期的集体管理。俄国的工会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同托洛茨基和党的計划相抗衡。

和西方的工人运动不同，俄国的工会是一个年輕的組織。在沙皇統治下，它們的发展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而受到阻碍。可是，这并不是說俄国工人阶級投身于革命的时候不具有群众組織的經驗。从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以来，特别是在1905年前后这段时期，存在过大量的教育协会、医药互助团体、文化組織，尤其是合作

---

① 这里所說的“工人反对派集团”不仅包括施略普尼柯夫和柯倫泰的集团，而且包括以前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眞理派，以及其他許多部分表示了反对国家党壟断这一总思想趋势的小集团。

社——所有这些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了工会运动学校的作用。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工会便立即在全国范圍內紛紛組織起来，其会員达数百万人之多，在数目上远超过那几十万党員。在党員中，除无产阶級核心以外，还包括农民、知識分子和公务員；但是，工会会員的成分却要单純得多。工会的成长比俄国其他任何組織都更能表明工业中心的經济意識在这些年代中的发展。整个內战时期，工会都同党和軍队紧密地站在一起，但是，孟什維克的影响在工会中比在其他苏維埃机关中都要大。

工人反对派各集团的建議，是 1919—1921 年普遍討論的題目。工会組織者要求由他們負起管理工业的职責；在他們看来，这是工会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任务。工会已經有了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这一事实，可以避免地方主义的种种害处；另一方面，由于工会代表着比党要广泛得多的阶层，因此，它們在这个重要崗位上可以起一种同党的壟断欲望相抗衡的作用。虽然工会的这个綱領和工人反对派集团的綱領在党史中可以区别开来，实际上，支持这两个綱領的时常是同一个集团的人。

“这一派完全以1918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奧辛斯基、薩普罗諾夫、馬克西莫夫斯基、斯米尔諾夫等人为首。他們反对一长制、反对工业軍和个别工业部門軍事化时所提出的論点，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两年前反对在工厂中建立严格的紀律、反对取消‘地方当局的全权’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事实上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級专政时所提出的論点完全相同。”①

工人反对派和工会的綱領，都是針对托洛茨基的劳动軍和党专政提出的。当施略普尼柯夫建議召开将成为眞正政府的“生产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 2 卷，第 91 頁。

者代表大会”时，討論达到了熾烈的頂峰。置身于緩冲集团之中的布哈林，提出一个較緩和的妥协方案，即党必須接受工会参加經济和行政管理机关的人选。这个“工会問題”是1920年3—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討論中心；在11月的第五次全俄职工会代表会議上，討論达到了高潮。

工会的主要反对者是托洛茨基，他一心要把工会改变为軍事化經济的一个部門。

“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一切資源都由——至少在原則上是这样——政府下令收归国有和加以分配。在这种制度中，我并沒有看到工会起什么独立作用。如果工业需要依靠国家保证供給工人一切必要的产品，工会就必須包括在国家管理工业和分配产品的体系之中。”①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領导下的工会，向这种計划展开了斗爭。現在来追論往事，我們也許可以說，把工会消溶入国家机器这样一种办法，会使工会下降为国家党的一个工人陣綫，但是在托洛茨基当时的思想中，这样做的用意却在于——至少部分說来是如此——加强他自己掌握的机构，从而和党在国家机器中的統治地位相抗衡。作为一个兵工联合組織的領导人，托洛茨基就能占据党和国家的最重要职位。尽管托洛茨基和工人反对派之間这时爭执得非常激烈，所有的反对派集团却都抱着一个共同的願望，即把党所掌握的大权轉移給更广泛的組織。“‘工人反对派’的綱領和托洛茨基綱領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托洛茨基是要把工会变成国家机关，而‘工人反对派’則是要把国家工会化。”②

列宁維护党的壟断地位，使它不为这两个反对派所动搖。他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464頁。

②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116頁。

完全拒絕施略普尼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的工会管理要求，认为它是一种无政府工团主义偏向，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他們的意見不仅一般說来是錯誤的，而且特别不适合当前俄国已經解体的經济。过了好几年以后，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应当被看作工人阶級叛徒而无情地加以清洗这一主張，才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基本論点。列宁为党集中掌握大权而斗爭，但也总是完全意識到使用强制措施会給原来的苏維埃民主思想带来多大危險。他反对托洛茨基想把工会改变为国家劳工組織的計划，就再明显不过地表現了这一点。在列宁看来，工会的主要任务不是搞行政工作，而是在政府机关和广大群众之間构成一道桥梁，作为共产主义和經济管理訓练的学校。这种非常有限制的概念不容許工会分享国家政权，但在另一方面，列宁又維护工会在苏維埃国家中的独立作用，它們是工人阶級利益的代表者，而在当前的社会中，在无阶級工人国家这一目标的最初阶段甚至还远沒有实現以前，工会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观点产生自列宁終生坚持的一条原則，即工会运动是无产阶級斗爭的三个有机形式——經济的、政治的和理論的——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对問題的回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問題越来越大，达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受到孤立、动搖于內部的工人和行政官員两派之間、脱离了广大群众的国家党，越来越受到全国人民的仇視，一步步地走近了災难。

喀琅斯塔得叛乱

1921年3月1日，紧接着在彼得格勒显得最为强烈的一陣罢工浪潮之后，普遍的騷动在彼得格勒的大門口——喀琅斯塔得炮台达到了高潮。水兵和駐軍召开了一次有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加里宁发表演說反对会議通过的政綱，可是徒劳无益，这个

政綱变成了号召全国反对派的中心力量。喀琅斯塔得的水兵們对于每一个重大問題都提出了一种滲透着十月革命精神的新政策。他們代表着各种相互冲突的傾向和集团——不滿的农民群众、中产阶級、知識分子、有組織的反革命核心等等，但是也体現了工人对国家軍事組織化的反抗。

在經过二十五年一党专政以后，今天再来看一看喀琅斯塔得綱領便显得更有意义，这个綱領包含下列各点內容：

(1)通过秘密投票举行新选举，在竞选时有“在工农群众中”进行鼓动的充分自由。

(2)給予工农、給予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党人以言論与出版自由。

(3)給予工会和农民組織以集会自由。

(4)釋放被囚禁的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5)从一切苏維埃机关中取消党代表，任何政党在宣傳本党思想的活动时，都不得享有特权或国家的支持。

(6)与此相应的是，特别要取消軍队中的党政治委員。

(7)除去在有害于健康的部門中工作的人以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一律平等。

(8)取消工厂中的共产党卫队；在必須設置卫队的情况下，由本厂工人組織自行决定从軍队士兵和工厂工人中选派卫队。

(9)农民有处置自己土地的充分自由，只要他們用自己的力量經营而不雇用别人。

(10)个体劳动者有进行手工业生产的权利。①

布尔什維克党宣布，白卫分子柯茲洛夫斯基是喀琅斯塔得叛

---

① 恩瑪·戈耳德曼：《我对俄国所抱幻想的进一步破灭》，紐約1924年版，第67—68頁。

乱的幕后策动者，因此沒有任何妥协可言。3月7日，奉政治局的命令，托洛茨基开始轰击炮台。經过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間进行的十天战斗以后，喀琅斯塔得被攻克。3月1日至17日，好几团彼得格勒的駐軍和港口水兵被解除了武装，送往烏克兰或高加索。继此以后，俄国全境展开了逮捕和处决。在兵变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莫斯科庆祝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五十周年。

列宁固然发出了要托洛茨基用重炮攻取喀琅斯塔得炮台的命令，但他也认識到，在如此靠近俄国的工业和政治中心彼得格勒的地点，爆发了反对国家政权的第一次这样大規模的叛乱，这标志着旧路綫的結束。列宁曾經通过一系列的妥协，通过調停各个相互冲突的集团，維持住党的团結。他曾經在軍队結构問題上和托洛茨基妥协。他曾經緩和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組織工作者对托洛茨基的反对。他曾經容忍了主張实行国家計划化的人，但是并沒有允許把工会消溶入国家。他不能让喀琅斯塔得炮台落入一个敌視党的集团之手，但他也不再能容忍继續在俄国农民身上进行危險的試驗。到这一时刻，列宁不再和任何人讲客气了，他把控制党的繮绳重新拿到了自己手上。对于农民經济，不可能通过軍事的、也就是恐怖主义的措施使之工业化。俄国的专政是以两大阶級为基础的，列宁要維持住这种联盟。喀琅斯塔得叛乱以后，列宁便回到了他原来的改造俄国經济的方案上，这种方案既不同于战时經济的現实，又有異于国家計划化鼓吹者的綱領。

3月8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认識到党的地位已經如何岌岌可危，代表們在列宁的周圍聚集起来，把他当作也許能为他們找到出路的唯一救星。

列宁指出：在“恢复貿易自由”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反对布尔什維克专政的叛乱。农民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級希望，在推翻国家

經济的严格組織化之后，他們能够通过恢复城乡之間的市場关系，找到一条摆脫貧困的出路。这是小生产者对效率不高的国营工业的抗議。可是，这种叛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小資产阶級的反抗；它还深深影响了无产阶級，蔓延到了莫斯科和附近各省的工厂。列宁評論了非党工人中最近表現出来的“动搖和不滿”；从莫斯科最近举行的一些会議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把‘民主’、‘自由’变成了引向推翻苏維埃政权的口号。”①

列宁号召工人阶級不要在最危險的时刻抛棄国家党。他提出要对堅持不同意見的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規定此后禁止党內的派別活动，这便为斯大林实行他那一套措施提供了起点。

然而，就在这种全国騷动的情况下，列宁仍然对反对派的綱領进行了討論，他引用恩格斯的話为論据，駁斥了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而且，他所用的語气之緩和同客气，就共产党人的爭論而言，今天看起来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他认为，在当前的貧困状况下，在一个农民要在許多年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反对派的綱領是无法实現的，因此必須予以摈棄。他宣布，要組織起足以使工人成为俄国經济中心人物的大工业，最少也需要十年时間，但是他也认为，这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建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党員們能就有关的原則性問題交換意見。

“如果需要詳尽地討論，我們也非常欢迎，我們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詳細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話，我們还可以在国际范圍內提出这个問題，現在你們都听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你們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傾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頁。——譯者

向。我們現在所談的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无政府主义傾向是一样的，在上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同这个党作过尖銳的斗爭。”①

列宁請施略普尼柯夫耐心一点。

“只要有一两年不发生饥荒的休息时間，并且使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們就可以从工人阶級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們队伍中提拔出比現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②

列宁在总結这篇讲話时宣布，宣傳施略普尼柯夫的綱領是同共产党員的称号不相容的，但又說不应該放棄对这个問題的“科学探討”。

“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說）想在最近几个月內利用空余时間，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地下革命斗爭經驗的集子續写第二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請写吧！”③

列宁分析了产生危机的背景：农民軍队的复員抛出了千千万万“疲憊不堪的士兵”，使这些只习慣于战爭、以战爭为职业的人无事可做，往往淪为盜匪。“我們的軍队复員在全国产生了大量的暴乱分子。”④无产阶級是极少数，占絕大多数的是农民。“我們不可能实际地显示出大生产的一切优点，因为大生产已經被破坏了。”⑤播种面积、生产工具和收成都减少了；城市中存在着“完全饥餓”的状态。小資产阶級分子正在鼓动农民反对工人，这种情况比邓尼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9頁。——譯者

② 同上，第241頁。——譯者

③ 同上，第242—243頁。——譯者

④ 同上，第173頁。——譯者

⑤ 同上，第175頁。——譯者

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加起来还要危險。

列宁以一句簡练的話結束了他的报告："由于經济問題严重，苏維埃政权正在动搖。"

列宁建議"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綫电向全世界宣告，說明我們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經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給小农許多刺激，推动他們来扩展經济，增加播种面积"①。他提到了頒布于1918年10月30日而以后始終沒有实行的一項实物税法令。列宁的"新經济政策"的核心并不单单是实物税，甚至也不仅仅是保证农民能获得相当一部分自己的劳动产品，从而使他們安下心来，而且还包含别的內容，也就是恢复一种有限制的市場体系，从而在国內造成一种改变了的政治气氛。

空想主义的时期已經过去了。在欧洲，經过战后的危机，各国已經显然趋向于重新获得社会平衡；而就亚洲来說，尽管布尔什維克一再强調世界革命，他們当时也并不指望这里会发生迅速的变化。"三年来，我們已經懂得，指望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內爆发……因此，我們要善于使我們的活动同国內外的阶級关系相适应，以便长期保持无产阶級专政，逐渐消除我們遭受的一切災难和危机。"②

---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218頁。——譯者

② 同上，第169頁。

第七章　統一共产党

在1920年12月代表大会后的改組初期，新加入德国統一共产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就把他們大失所望的情緒带到了党的队伍中。他們在如此大吵大嚷地摆脫了改良主义的傳統以后，听到从俄国傳来实行新經济政策的消息，說是俄国共产党人从此要精明地做生意了，的确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德国党內的列維-拉狄克集团热烈欢迎这条新路綫。对他們来說，新經济政策就是允許德国的政策实行同样大轉变的口令。保尔·列維希望列宁批准把新經济政策应用于德国，这样，就可以通过把新的党发展成为压力集团的办法，使它得以参加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这項主張激怒了原来屬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新党員；在他們看来，这大大違背了党的任务，并且是对于德国形势的危險誤解。

卡尔·拉狄克在两党合并以后立即来到德国，以便使統一共产党走上这条新的道路。在一封发表于1921年1月6日的"公开信"中，他建議各工人政党采取統一行动，把賠款負担"从无产阶級肩上轉給資产阶級"。这封打算把共产党領袖直接引到部长席位上的公开信，完全背离了卢森堡的政治棄权主义。

建立党机器

統一共产党希望发展五十万繳納党費的党員，这是一个从未达到过的数字。到1921年3月，在新的分裂剛要发生以前，党員总数达三十万至三十五万人，在这次分裂以后，党員数目下降到二十万人。党的改組使傳統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特征同莫斯科那边

慢慢傳过来的新工作方式、以科学地控制群众为主要目的的工作方式結合了起来。

按照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的形式，一个特殊的工会工作部在共产党总部建立起来了。专門工作者密切地注視着所有各种工会的內部发展，組織起平行的专家集团指导各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另一个由埃德文·赫恩累①领导的新部，負責专門在农村中进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共产党在1922—1923年的心理状态，可以从这一时期印行的各种袖珍日历上很好地反映出来。有一种这样的日历②，一打开来，第一頁上就是下列表格：

(即时塡写)

本日历持有者：……………………

地址：……………………

证件号：党证……………………

工会会員证……………………

一年的每一天，都备有专供塡写下列各項內容的記事栏：

会議：……………………

干部(或委員会)会議：……………………

报告人：……………………

結果：……………………

对于一个暗中准备夺取政权的党来說，这眞是一种奇怪的出版物。

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項条件，对于建立一个与合法党相似的地下組織給予了特殊注意。在1920年，地下支部主要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老干部的战斗队加上党的同情者組成。他們自

① 在1947年，他是俄占区德国的农业改革部长。

② 《德国共产党袖珍日历，1923年》，柏林，1922年印行。

称为“机器”(Der Apparat)；他們的“总参謀部”由恩斯特·多伊米希和艾米尔·巴尔特領导。这个組織严密的集团的成員，很瞧不起他們后来与之合幷的斯巴达克团的軍事組織。可是，俄国专家却认为所有这些德国地下組織都不中用，对它們进行了改組；“机器”被打碎了，許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被清除了。不論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独立于党之外的抵抗組織，它們的活动都要受到正式譴責，幷且禁止党員参加。

在1918—1920年，斯巴达克团曾經主要是一个地下組織，但它是不同于新的“专职部門”的另一种类型。斯巴达克团的地下活动是在同志願团作斗爭时产生的；它們不受莫斯科国家机器和莫斯科顾問的控制。从技术上讲，它們是軟弱的和效率不高的，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說，它們在地下生活中依然維持了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切具体特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俄国代理人引进了新的成分，竭力使得那些为保护运动而建立的自卫团服务于俄国国家目的——这个国家要求在德国境內建立一个諜报組織。

新的机器是流綫型的；旨在訓练紅色軍队干部的軍事团(軍事机器本身)，組成了一支骨干部队。团員們接受各种基本訓练(有时是在俄国軍官的指导下)，进行秘密演习和夜行軍，学习怎样使用手榴彈和輕炮。只有領导者，那些由于和俄国秘密警察有联系而受到信任的人，才被允許接近暗藏的武器。

中央委員会的所有領导人都切望在这些軍事組織中取得个人影响，因此把很大一部分党的經費撥給它們，而且还經常答应再多撥一些。可是与此同时，在軍事机器和认为这些內战准备已經过时的中央委員会之間，也存在着剧烈的冲突。中央委員会逐步把軍事团改变为軍事理論研究組，使它們唯一能起的积极作用只是保护党的会議。这种做法遭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坚决抵抗，

他們的要求恰恰与此相反——他們要求在取得武器方面，在維护那些已經取得和隐藏起来的武器方面，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在这类地下演习过程中，难免要时常发生意外事件，而为保密起見，党是不公开支持被捕者的。另一方面，合法党的領袖則享有議員豁免权的保护，即使被捕的領袖不是議員，也可以由党发动大吵大嚷的运动加以营救。

在党內生活中开始占重要地位的，还有另一个秘密机构——情报团。这个机构的装备更好，拥有更多受过政治訓练的領导人，能够支配的經費数目也更大。情报团开始接替許多本来由軍事团担負的任务，例如保护党的重要会議，保护非法通过德国的俄国間諜等等。許多研究小組建立起来了。武装着手枪和手榴彈的五至十人小組，被派去执行种种特殊任务。另一个分支机构——潛伏团，专門負責打入敌对組織，他們伪装成这些組織的信徒混入內部，窃据要职和窃取情报。打入軍警組織的潛伏团員，通过极其秘密的途徑和党取得联系。恐怖团的任务是进行破坏和消灭叛徒。

这样一来，从統一共产党一成立起，党的各級之間就发生了尖銳的路綫冲突。在1921年的一系列事件中，上述四个組織第一次大显了身手，而这一系列被非常不恰当地称为"三月发动"的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也获得了一定的重要地位；它变成了关于革命策略問題和俄国間諜干涉德国工人运动問題的一場复杂討論的中心。列宁、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布哈林等人(但是沒有斯大林)都参加了討論，討論范圍愈来愈扩大，最后变成了对共产党战略的总檢查。

三月发动

在喀琅斯塔得叛乱以前的几个月、即在1921年3月，俄国党

內以季諾維也夫和貝拉·庫恩为中心的一群核心干部，策划在德国发动一次起事，以便使俄国工人忘記本身的困难。列維的报告大大夸張了德国新党的力量，按照这些报告，发动几次事件就足以造成同卡普暴动时期相同的力量配置。庫恩和古拉尔斯基携带着一份未必經过政治局批准的干部会議的秘密指令，于1921年2月被派到柏林。古拉尔斯基是前犹太社会主义工党[1]左派成員之一，一个具有波兰地下工人运动經驗的人。他們在德国中部的曼斯菲尔德产煤区发动进攻，在那里，矿工和普魯士警察之間本来就經常发生冲突。他們以为，曼斯菲尔德起事以后，总罢工的条件便会成熟；这将导致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出現，而单是这个政府的存在本身，就可以使灰心失望和不听話的俄国工人重新振作起来。

新建立的軍事团和恐怖团被派出去向志願团挑衅，以便把工会发动起来。在布拉斯劳和哈雷爆炸了几个炸彈；另外几个为柏林預备的炸彈沒有爆炸成功。曾經在上西里西亚搞过破坏工作的胡果·埃伯林，被重派为这項工作的負責人；在担当这一不幸的职务以后，一般党員群众便給他起了个外号叫“拖着炸药引信尾巴的胡果”。

只是在曼斯菲尔德以及图林吉亚和薩克森的部分地区，普遍举行了罢工。有几天功夫，曼斯菲尔德很像卡普暴动期間的魯尔。馬克斯·赫尔茨离开福格兰，加入曼斯菲尔德游击队，組織了赫尔茨近卫軍。分散的工人队伍沒有能結合成一个部队，这主要是因为拥有武裝、能够組成整整一个师的累納工人，却偏偏要关起大門守在工厂里等待国防軍的进攻。

在魯尔和柏林也有局部罢工。独立于曼斯菲尔德行动之外，

[1] 1901年在俄国建立的一个犹太社会主义政党。它的左派在1922年参加了共产国际。

整个德国好鬧事的地区都发生了地方性的罢工和騷乱。但是，曼斯菲尔德的起事范圍太局限了，因此不能使这些东零西散的活动汇合成全国性的总罢工。和卡普暴动相比，三月发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政府的鎮压要有效得多；国防軍在警察的配合下发起进攻。工人村遭到大炮的轰击。一列装甲車从符騰堡开来；来自哥廷根的学生軍对哈雷区的森格豪曾城进行了突击。游击队破坏了铁路、桥梁和車站，封鎖交通几乎达一周之久。許多乡村和小市鎮几經易手。在襲击工人住宅区过程中，有五六十名工人被杀。一些被捕者遭到了国防軍士兵的毆打，并且被迫在街上呼喊“国防軍万岁！”的口号。①

列維的某些朋友——柏林五金工人工会的組織者保尔·馬耳粲和保尔·諾伊曼——曾經走遍了全城的工厂，号召工人不要举行罢工支持曼斯菲尔德的罢工者。勃然大怒的党要求把列維和这些工賊立即开除。

在党內危机达到这一高潮的时候，列宁进行了干預。在1921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大力支持了列維；在这次大会的議程上，“德国問題”是一个重要項目。德国代表团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保尔·弗勒利希領导，提出了一份經过仔細准备的“革命进攻”問題論綱——所謂“革命进攻論”的意思就是，只有通过一系列进攻性的行动，才能推动工人阶級。列宁駁斥了这个理論。他沒有公开責备季諾維也夫-庫恩集团在德国的活

① 普魯士議会的一个委員会，再次調查了国防軍和警察的野蛮行为。按照共产党的估計（見《革命进攻的策略和組織：三月发动的教訓》，德国統一共产党，柏林1921年版），大約有七千人被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姑且不論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报复措施的确是严厉的。

动，但是列宁支持在爭論中攻击他們的列維，就間接而又明显地表示了对他們那套策略的反对。

列維把对于三月发动的譴責，变成了对共产国际主席季諾維也夫的猛烈进攻；这种要赶掉季諾維也夫的企图，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最初，代表大会支持德国代表团为三月发动所作的申辯。列宁同这种进攻主义进行了斗爭，并且使他的观点占了上風，虽然在态度上有某些保留。三月发动被宣布为“进了一步”——这个評語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看了这句話，都会想起列宁那本小册子的題目的后半句——“退两步”①。这种模棱两可的說法使党在反对列維的方面不致丧失威信，同时又試图把列維的批評納入党的政策。照列宁的理解，代表大会提綱的大部分都接納了列維的批評，但是，列宁对于魏瑪共和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完全不抱任何幻想，因此，他强調的重点有所不同。

在他就世界局势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托洛茨基闡述了政治局对世界革命前景的新考慮。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已經渡过战后危机，获得了恢复政治和經济平衡的能力。从这个前提出发，托洛茨基要求共产党的政策来一个大轉变，轉到巩固自己的根基、集中全力建立群众性政党的工作上去；世界革命扩展的时代已經肯定停頓。托洛茨基是以党的发言人身份作报告的，但他把資本主义稳定化强調到了极端的程度。虽然对于形势分析沒有基本差别，但以托洛茨基为一方，以列宁和季諾維也夫为另一方，在关于这种稳定的持續性和各国共产党未来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方面，存在着很大分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見之間所以会产生这种微細的区别，就在于他們对各种因素——不仅对有助于稳定的因素，而

① 指列宁的早期著作《进一步，退两步》。——譯者

且对不利于稳定的因素——的理解在細致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人們认为，同托洛茨基的分析更接近的是列維而不是列宁。

我出席了許多次党的秘密会議，在这些会議上，人們对列宁为列維所作的辯护表示极大憤慨。人們罵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右翼分子；預料中的对貝拉·庫恩及其集团采取的紀律措施被认为是沒有道理的。在这种对列宁感到憤怒的感情冲动中，他所提出的新策略的政治重要性，也就沒有能得到清醒的估价。党的左派对于这样庇护列維的行动愈来愈冒火。在此后热烈展开的討論中，三月发动以及列維对它的反对等問題很快就被抛开了，重心轉移到党的今后政策上。

列維的身边圍繞着一大批妥协集团；它們都接受列維的政策，但是責备他不該違反紀律。不久以后，事实便表明列維并不以批評三月发动及其流产的恐怖主义为滿足，他把这种批評发展成为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总的重新估价，很快就变成了布尔什維主义的一个原則反对派。他坚决反对暴动主义的根据在于，他相信如果工人不向敌对阶級挑衅，德国就能够恢复正常状态。他强調俄国和西方之間的不同，攻击布尔什維主义的亚細亚性质；他把俄国在德国的代理人称为“希瓦和波哈拉的高僧”①。列宁曾經贊同列維破坏党紀的做法，认为这是为糾正党的政策所必需的，但是，在看到列維总分析的要旨以后，列宁便像布尔什維克所說的那样，完全地和絕对地抛开了他。

三月发动对德国的新党产生了严重影响。曾經給統一的前景塗上最光輝色彩的保尔·列維，这时发表了一本题为《三月发动，过錯在哪里？》的小册子，攻击党內的暴动主义者。在党的其他重

① 希瓦和波哈拉都是旧俄烏兹別克斯坦的城市，該地居民多信伊斯兰教，这里所說的“高僧”指伊斯兰教的一种旧式学者。——譯者

要領导人中，有两个議会議員参加了他的抗議，他們是克拉拉·蔡特金和年老的阿道夫·霍夫曼，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若干年前，他曾經提出过“自由思想家十誡”，因此，他在党內有个綽号，叫“十誡霍夫曼”。）

1921年7月8日，克拉拉·蔡特金于出席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旅途中，在德俄边界上被普魯士警察沒收了她身边那些有关三月发动的文件，这无疑是得到了她的默許的。列維集团从列宁那里得到的部分支持，使他們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难以决定是留在党內設法重新掌握領导权呢，还是分裂出去另組新党。当他們断定自己的失敗已經肯定时，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在12月25日发表了六个月前从蔡特金那里搜去的材料。接着，又有两个議会議員庫尔特·盖埃尔和威廉·迪韦尔离开了党；过一些时候，另两个人也步了他們的后尘，这就是一度担任过工厂代表委員会領导人的恩斯特·多伊米希和馬里·瓦克維茨。①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盖埃尔住在倫敦，是德国避难者中一个和范西塔德有联系的亲英集团的領袖。

大約在保尔·列維的这些同事脫党的同时，左派的一个著名領袖恩斯特·劳伊特尔-弗里斯兰特博士也离开了党，但是和他們并不是一伙。劳伊特尔早年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曾經在东綫被俘；俄国革命爆发时，他站在布尔什維克一边；帮助組織了对他們的支持，特别是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德国人当中。在1919和1920年之交，他回到柏林，加入了斯巴达克团。在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12月合并以后，他被左派推选为新的柏林-布兰登堡党組織的第一政治书記。这段时期內，我和他同在錢币街二十四号工作，直接了解到他那非凡的組織才能。三月危机期間，劳伊特尔反对列維，并在列維退党后被选为中央委員会总书記。他精通俄文，因此在这个重要崗位上只处了几个月，就认識到日益增长的俄国影响是无法抵御的；所以，在1921年底，他便离开党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組織。

在一段时間內，他是《前进报》的編輯；接着，他成了柏林市議会的議員，以后担任市交通局长，在这个崗位上，他在使全市交通系統現代化的工作中显示了自己的行政才能。他在希特勒当权后离开德国，从1935到1946年，在安卡拉充当土耳其政府交通部长的顾問。他在1946年回柏林后当选为市长，但沒有被准許就职。在社会民主党和苏联占領軍当局进行的尖銳斗爭中，他变成了一个中心人物。

这些脫党者聚集在列維开始出版的《我們的道路》这一刊物的周圍，成立了“共产主义工作委員会”。①1922年1月，因为傳播《我們的道路》被中央委員会开除的二十八个党的高級干部，参加了列維的分裂集团。列維編纂了罗莎·卢森堡論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以此作为他反布尔什維克宣傳的基础。曾經鼓励过列維的蔡特金仍然留在党內，这时摆出一副自己是罗莎生前唯一密友、最能了解她內心思想的姿态，变成共产国际斥責这本小册子歪曲了作者原意的官方傳声筒。②

德国的新經济政策？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議，激起了又一陣关于資本主义稳定程度的热烈討論。列維退党以后，另一个老斯巴达克派恩斯特·

据《紐約时报》1947年7月10日訊，“俄国軍政府办給德国人看的官方报紙《每日評論》，今天刊登了很长一篇〔亚历山大〕柯提科夫将軍訪問記，在他对报界发表的談話中，这位将軍开了俄国人反对共产党脫党分子劳伊特尔博士的第一枪。柯提科夫将軍指責劳伊特尔博士一貫反苏，从1935至1946年在土耳其有过一段‘不可告人的可疑’历史，当时德国駐土大使弗兰茨·馮·巴本曾认为他‘于希特勒德国有用’。

此外，柯提科夫将軍說，劳伊特尔博士也沒有資格担任市議員。他說，选举劳伊特尔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知道俄方的立場，但却偏要选出这个人来制造本市危机。至于俄国当局是否有权否决一个当选官員的問題，柯提科夫将軍指出，这項原則是經过刘歇斯·克莱将軍同意的。”

① 共产党的青年組織特別受到了影响。“党保留着許多老朽的习慣。在党的会議上，他們又喝酒又抽烟。”

1922年底，青年运动中出現了一种不同的趋向。在柏林，一个共产党集团“觉醒的青年”建立起来；一份党的报告——《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議报告》，柏林1923年版，第118頁——把这一运动說成是“旨在成立若干由二十五名或三十名积极分子和勇敢青年組成的青年突击小队，对各个反动集团的会議和游行示威进行直接干涉”。

② 到1922年，列維集团参加了当时由希法亭領导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在同年9月随着它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內。列維当选为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区选出的議会議員，以这个身份协調了党在全国的左派，通过一种松散的方式把他們团結在一起。他愈来愈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将带来災难性后果，不断試图改变該党的路綫。1929年，他在一次发高燒时跳窗殞命，他的死亡引起了許多社会主义者的哀悼，他們都认为列維具有光輝的人格，是一位反对德国軍国主义的忠誠战士。

迈耶尔，前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編輯，成为德共政治局主席。迈耶尔也是一个紧密追随罗莎·卢森堡的門徒，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知識分子，对文学艺术深感兴趣，具有微妙而复杂的性格。他在党內各方面有很高地位的原因在于他对事业的忠誠，但他本人完全不能够和本党的无产阶級打成一片。

恩斯特·迈耶尔在卡尔·拉狄克的鼓励和支持之下，重新提出了列維所說的新經济政策标志着一个时代肯定結束的論点，用德国的話来說，也就是內战业已告終。他声称德国革命的潮流已經慢慢平息；德意志共和国将适应新的环境，为在凡尔賽和約签訂后的欧洲获得新地位而斗争；它的政策将以减少賠款为中心。德国共产党人必須改变自己的基本政策，集中力量同全体工人以及中产阶級集团組成統一战綫，把为償付賠款而征的税款从这些阶級的身上轉移到大企业和大地主身上。迈耶尔比列維更进了一步。他把俄国的公式应用于德国，建議推行"实物税制度"，他这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要由政府經营重工业以償付欠下的賠款。这首先将保证工人的高工資水平和广泛的社会保險計划，然后由政府把一切額外的利潤交給賠款委員会。共产党的口号"沒收全部实际价值的51%"，包括銀行資产、股票和证券以及不动产、工厂、矿山等等。为了償付賠款而实行这种国家控制一切重要工业的做法，最終就会造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經济，而毋需以暴力推翻政府。

迈耶尔把自己的綱領叫做"德国的新經济政策"①，这可以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前——也就是說，用不着夺取政权——便可

① 1946年在柏林，自称是一个資产阶級-工人政党的激进民主党复活了迈耶尔的沒收51%工业的口号，7月8日，它在向盟軍本部申請許可其活动时呈交了一份綱領，这个綱領表示反对馬克思主义，因而也反对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个党的領导人在1932年以前沒有完成任何进步改革"。通过中产阶級和工人的政治联合，激进民主党人希望造成这样一种經济制度，其中的重要企业都由国家控制，而让私人資本掌握

实現。他认为，新經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轉变的决定性一面；战时共产主义和剝夺都是决不应該重复的根本性錯誤。不仅是新經济政策的經济綱領理当效法，而且，恢复元气的种种社会和文化措施，也是对“1917年精神”的一种健康的和不可避免的反应。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召开前夕，大約有三千名柏林党組織的代表在克列姆斯宴会厅开会，拟訂了一个坚决反对恩斯特·迈耶尔的德国新經济政策的綱領。会議选我为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白地要求我在那里反对这一綱領。举行这次会議以及会上的討論完全在党章允許的范圍以內，但是由于会議对共产国际的政策采取了积极的攻击态度，迈耶尔便以此为把柄，建議主席团对不听話的左派实行紀律制裁。用中央委員会的話来說，左派領导人是反布尔什維克的；把他們开除就等于强调表明，共产国际的一切成員都有义务接受新經济政策。党內的恩斯特·迈耶尔集团自称为調和派，表明他們希望把列維集团拉回党內。作为第一步，他們揭发了左派在柏林和莫斯科同工人反对派集团的联系，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列宁同意把左派开除。

俄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施略普尼柯夫、卢托維諾夫和米雅斯尼柯夫以各种貿易代表团团員的名义被派来柏林，这主要是为了不让他們在一段时期內参加俄国党的生活。他們都同德国党內左派反对派的中心柏林共产党人以及背离正統的共产党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了联系。在柏林共产党人的領袖、原来是俄国人的阿尔卡迪·馬斯洛夫和他們之間迅速发展了良好的友誼。他們在后来写了德意志共和国史的亚瑟·罗森堡家里举行秘密会

49%的股权。他們宣称，有控制的資本主义已經在美国表明了它的能力。

这一綱領还列出了进行其他社会改革的要求，包括沒收六百二十英亩以上的庄园，发展不强制加入的工会，普遍提供九年学校訓练的机会，教会对青年进行宗教教育等等（《紐約时报》，1946年7月9日）。

議，由俄国来的人报告了俄国工人的处境。这些人要求柏林党組織继續不遺余力地同国家組織化、国家党和共产主义的蛻化作斗爭，尽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左派。关于俄国左派同德国左派之間的这些联系，地下組織肯定向俄国政治局作了大量报告。

調和派取得了局部胜利，他們終于使列宁向1921年8月举行于耶拿的德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建議暫时不要让馬斯洛夫参加德国党的生活。在这封信中，列宁在評論列維危机时力图抵制分裂党的趋势，希望把各集团重新組織进一个新的单位。"的确，德国党最好把这位馬斯洛夫和他的两三个同道者和战友送到苏俄两年，这些人显然是不願遵守'和約'〔这指的是共产国际在德国党的左右两派之間所作的安排〕……的。"① 右派希望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执行列宁建議的相应决議。但是代表大会以絕大多数票否决了这一建議，而針对代表們的意志，列宁也沒有采取进一步的相反行动。然而，右派仍然暗中想方設法，力图使左派領袖被送到俄国去，从而被实际排除出党；在他們看来，俄国对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的严厉措施，意味着德国党也要相应地排除自身的这一个工团主义派别。由于不能够通过党內的民主程序达到这一目的，他們便通过共产国际的途徑求救于俄国国家力量，要俄国当局为他們做到这一点。

列宁对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了严厉措施，并且作为党的杰出領袖替他們承担了責任，把反对派的憎恨吸引到自己身上。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变成了全世界左派共产党人攻击的对象。但是，尽管他猛烈反击了工人反对派，他仍然向他們敞开了党的大門；在喀琅斯塔得危机期間和以后，他的态度都反映了他的一种顾虑，也就

① 《給德国共产党員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7頁。

是他意識到了社会的和党的分裂的意义以及党对此应负的責任。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的暧昧态度，表現出是对于他所树立的严厉党紀的一种不够充分的緩和，不过在看待这一問題时，我們必須同时考虑到实行新經济政策第一年瀰漫于党和共产国际之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以及不断要求列宁对共产国际左派采取严厉措施的压力。

和列宁的討論

1922年11月，也就是墨索里尼向罗馬进軍的几星期后，我作为参加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柏林党代表到达莫斯科。从我到莫斯科的那天起，我就被扣上了反布尔什維克的帽子，人們认为我多半要被开除，因此在此期間也应該受到相应的待遇。拉狄克和布哈林想挽救我，他們劝我放棄反对中央委員会，承认他們对德国局势的理解。按照拉狄克的分析，德国內战已經以无产阶級的失敗告終。德国資产阶級的崩潰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与此相反，德国資产阶級的統治正在不断地和大大地巩固。同来自汉堡和魯尔的其他左派代表一道，我对提出的这种政策表示反对，要求开一次会听取我們的观点。

这样，在俄国代表——事实上就是政治局——和德国代表团之間便安排了一次会議。德国危机被如此看重，以致列宁尽管已經病得很厉害，不再积极参与日常事务，仍然率領了俄国代表团。除他而外，代表团中还包括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会議在克里姆林宮的一間会客室中举行，靠近举行代表大会的圣安得路厅。列宁的这次露面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轰动。外国共产党人的情緒趋向于在国外采取調和政策，德国左派代表在大会上是不受欢迎的。人們都期待着这次会議的一个結果将是我們被开除，事实上，假如列宁眞的提出了这样一項动議，他一定很容易获

得絕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斯大林当时不在場，那时，他还沒有插足于共产国际的事务。

疾病纏身、面色蒼白的列宁，坐在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間，凝神地傾听恩斯特·迈耶尔分析俄国的新經济政策对德共事务产生了什么影响。迈耶尔得到一个不来梅代表卡尔·貝克尔的支持，貝克尔是拉狄克的密友，原来是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的成員，而这个集团一向被布尔什維克党认为是他們在德国最亲近的一族。

迈耶尔和貝克尔用列宁主义的語汇說明了他們的德国新經济政策綱領，以这样一个要求总結了他們的政治結論，即立刻对左派采取懲治措施。最低限度也要把左派領袖放逐到俄国，用这种方法把他們撤职。同时，应該由列宁的政治局下令并且在該局特別代表的协助下，对柏林和汉堡的党組織作一次彻底的清洗和改組。对于党后来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斯巴达克派領导人眼看不能通过党內民主程序使他們的路綫得逞，便要求俄国政府違反当时共产国际的习慣来干涉本党生活，以这种手段展开了他們的改良共产主义运动。

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卢森堡曾經同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員会强加于党內的紀律进行了毕生的斗爭。但是在1914年以前，艾伯特和謝德曼能够对他們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也不过是把他們开除出党，而这一点如果未經地方支部的同意便不可能办到。作为党員，反对派分子有权接近报刊；譬如說，拉狄克就曾多年担任过党的各种日报的編輯。李卜克內西曾經是議会議員。反对派分子如果贏得党員群众的支持，都能够在党內占据重要职位。在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官僚不能把討厌的反对派分配到西伯利亚去工作；卢森堡用一种和一个德国本土人形式上結婚的簡单办

法就获得了永远住在德国的权利。当罗莎的学生恩斯特·迈耶尔以馬斯洛夫原是俄国人为理由，要求列宁把他从德国調走的时候，他便把一个新的因素引进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我为左派的論点作了申辯：柏林和汉堡的左派承认新經济政策对俄国說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調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使之适应于一种农业經济和欧洲目前的政治形势。但是，新經济政策并沒有消灭十月革命①提出的工人国家中的工人管理这一思想。如果这种把資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被斥責为根本性錯誤，需要在世界范圍內为資本主义和国家資本主义拼合而成的新經济政策所代替，那末，成立共产国际就是一个錯誤，应該把它立即解散。

在德国，接受这样一个鼓吹逐步改变的綱領将是不現实的和危險的。我們的任务不能仅限于爭取实現一系列的劳工要求，而必須集中力量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行动，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直不断地在重新聚集力量，現在几乎已經作好了另一次政变的准备。如果我們破坏了年輕的德国共产党組織的战斗精神，我們就等于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复辟鋪平道路。我們反对把新經济政策錯誤地和机械地搬到德国；它对我們当前的紧急任务并沒有任何直接关系。

这时列宁讲了話，使会議吃惊的是，他坚决駁斥了迈耶尔对列宁主义原则的維护。他說，使得新經济政策在俄国成为唯一正确路綫的种种具体条件，在更先进的西方并沒有同样出現。他强調了俄国无产阶級的不成熟，缺乏組織經济等等，并且再次指出，在

① 1918年2月8日，政府下令把旧俄的历法推前十三天，使它和西方通用的阳历相一致。按照这种新历法，以前所說的"二月革命"应該开始于3月8日；以前所說的"十月革命"应該算在11月7日。在整个这本书中，具体日期都用新历，但是"十月革命"一詞仍然沿襲旧称，一則为保持这个詞組的感情內容，二則为避免同德国的十一月事件混淆。

德国，和反革命分子作斗爭要比在俄国困难許多倍，而实現社会主义则要容易得多。列宁的分析中幷沒有什么新东西；他曾經多次以同样的話分析了德国的形势。但是使听众吃惊的是，他在这个时刻又一次坚决肯定了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反革命的力量和方法的評价。

列宁的这篇讲話意味着拒絕对左派采取任何紀律措施。这种拒絕由俄国国家干涉德共事务的态度，应該和他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共产国际問題发表的最后几篇演說之一結合起来考虑。在他总結俄国革命的五年时，他最后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作了一些評論。他說，我們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組織結构和我們的工作方法与內容的决議，几乎充滿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說，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样做有坏的一面。决議的俄国味道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而是因为它充滿了俄国气息。外国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决議的，也不能够实行。“我觉得我們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議而犯了很大的錯誤，就是我們自己給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①

继列宁之后，季諾維也夫也站在反对右派的立場上为柏林和汉堡的左派辯护，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拉狄克和布哈林也作了同他一样的发言。列宁再次进行干預，力求把德国党內的各种成分团結在一起。在他的倡議下，共产国际曾經在1919年认眞尝試过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合作。1921年，列宁曾力图把右派分子保尔·列維保留在党內。1922年，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列宁又第三次进行干預，反对把曾經好几次受到他本人严厉批評的左派开除。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列宁对德共事务的干預总是表現了一种和他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9頁。

的继承人斯大林截然相反的态度。列宁这样苦心孤詣地培养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是因为他极其重視德国反革命的威胁。而且，就和以往經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位首先提出党应該有铁的紀律的人，再次主張在运用这种紀律时要仔細考虑到一切可以用来代替它的革命政策。

列宁的妥协幷沒有在柏林起多大作用。它沒有能緩和左派和中央委員会之間的冲突，中央委員会在准备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时，仍然力求創造出向改良共产主义大轉变的条件，幷想方設法要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从党內清除出去。

第二部分　民族布尔什維主义

第八章　賠款危机

按照凡尔賽和約的規定，上西里西亚究竟是划归德国还是划归波兰，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公民投票定于1921年3月20日举行。1921年初春，柯尔芳蒂①領导下的波兰游击队滲入上西里西亚，在被认为是德国地区的格萊維茨和腊提博附近展开活动。得到巴伐利亚輔助軍援助的志願团，在德国政府的默許下也开进了該地区，②于是在这两支非正規軍之間展开了一場小規模的战争，而由于上西里西亚的矿工不断罢工，再加上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活动，形势便格外复杂起来。其中有許多波兰人的矿工不欢迎志願团；因此，反映了这种观点的当地共产党也不反对柯尔芳蒂。但是，公民投票的結果却是德国人以717,122票多数对波兰人483,514票不小的少数。在公民投票以后，协約国监督委員会把上西里西亚划分为三区，一区并入波兰，一区并入德国，另一区由該委員会管轄。

在倫敦开会的賠款委員会于5月5日通知德国政府，它已經变更了凡尔賽和約規定的償付方式。賠款总額定为一千三百二十

---

① 沃伊契克·柯尔芳蒂在1903至1918年期間，一直是代表上西里西亚波兰少数民族的議会議員。在发表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一篇談話中，拉狄克曾提到过柯尔芳蒂，认为他在德国議会中代表了眞正的波兰精神。（俄国外交部：《紅皮书》，外交人民委員会，莫斯科1920年版，第17頁。）

② 上西里西亚战役在志願团的心目中一直占有特殊的荣誉地位。具体例子可参看阿尔諾特·布朗能：《罗斯巴赫》，柏林1930年版。

亿金馬克，每年必須偿付二十亿金馬克外加对德国出口商品課取26%的税款。一切有关賦税的立法都要由賠款委員会审查，該委員会并将派一名代表常駐柏林。第一期賠款十亿金馬克必須在二十五天內付淸。如果这一項新的建議——它是德国和协約国代表之間进行了一年反复斗爭的高潮——在六天內得不到答复，魯尔区就要被占領；早在3月8日，也就是两个月前，法国軍队就已經占領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魯罗特三个城市。在德国，这項最新的建議被称为"倫敦最后通牒"①。

实物賠偿

志願团对柯尔芳蒂的作战，使得巴黎和倫敦对德国政府的不信任更为加强。这种情况再加上倫敦最后通牒，便引起了一次政府危机。中央党的总理費倫巴赫辞职，由約瑟夫·維尔特博士继任，維尔特也属于中央党，但是稍左一些。

5月11日，議会以二百二十五对一百七十二票通过接受倫敦最后通牒。反对派包括三个右翼政党——馮·威斯塔普伯爵領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施特雷澤曼領导的德意志人民党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这是中央党在巴伐利亚的名称——和共产党。共产党議員威廉·克能②斥責这一通牒是要德国人民餓死的判决书。他譴責德国工业家协会操纵日益严重的通貨膨脹，从中牟利以补偿他們为支付賠款而遭受的損失。

所有的左派都要求推行实物税制度，以便按照凡尔賽条約的

---

① 参看賠款委員会第五号出版物：《1920—1922年賠款委員会工作报告》，倫敦1923年版；約翰·惠勒-貝奈特和休·拉提默：《关于賠款协定》，倫敦1930年版；海因里希·施內和汉斯·德雷格編：《凡尔賽条約的十年》，柏林1929年版，第1卷。

② 在1947年，他是柏林統一社会党的一个領导人。

规定以实物偿付賠款。德国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党和已經分崩离析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議会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更公平地分配賠款負担的法案。所有这些建議中都暗含着一个要求，即加强国家对重工业的控制。德国工业家协会通过它的首領胡果·司丁尼斯，强烈反对这一工会方案，与此相反，他們要求取消国家对德国铁路系統的所有权，把它們仍然交給一个专門为此組織的私人公司去掌握。如果能这样控制住运費，工业家协会的手上就会集中更多的經济实力。工会对此以掀起一場运动作为回答，在这一运动中，要求推行实物税制度、把矿山收归国有和国家壟断外汇的口号，同要求国家控制托拉斯的口号結合了起来。动搖于这两个有組織集团之間的政府，企图通过向英格兰銀行貸款来摆脱困境，但是未能如願。千方百計拖延偿付賠款的德国政府宣布："首先給予貸款，然后才談得上偿付賠款和預算平衡。"

1922年1月11日，协約国最高委員会在戛納开会。外交部长瓦尔特·腊特瑙已經設法使倫敦同意延期支付賠款，但是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在戛納，他表示"願意在可能范圍內尽量履行賠款义务"，他这种引起一切民族主义組織嘩然反对的表示，是导致他后来于6月被暗杀的因素之一。不过，就連腊特瑙也沒有全部接受賠款委員会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貨膨脹急速发展；馬克和英鎊的比率达到了650比1。

一个冲突导致另一个冲突。共和国总理維尔特抗拒协約国提出的要控制賦稅的一切要求，认为这是和德国的主权不相容的。而在巴黎，总理普恩加賚和法国重工业界的一个主要发言人魯舍，則坚决反对德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在賠款委員会內部，不断同英国和比利时代表发生冲突的法国代表坚持己見，把賠款委員会照会中已經够严厉的措辞弄得更为尖銳。于是，賠款委員会发出了

一份份語气激烈的照会，德国政府也以一份份語气同样激烈的照会相回答。

在償付賠款上遇到的困难使德国亲近了另一个債务国俄国，由于它廢除了沙皇政府的債务，俄国也在不断地遭到协約国、特别是法国的攻击。1922 年 4 月 10 日，在英国的倡議下，于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討論战債問題的会議；德俄两国都被邀請参加。在会議即将举行期間，两个債务国的外交部更加靠攏。拉狄克在停留于柏林的这若干个月中，同布罗克道夫-兰曹这样的人以及同腊特瑙都建立了极良好的关系，前者代表帝制派中的亲俄傾向，后者則是德国共和派中同一傾向的代表人物。

去热那亚的苏俄代表团由外交人民委員格奥尔格·契切林、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和克里斯提安·拉科夫斯基組成。腊特瑙在柏林为他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在这次有拉狄克出席的招待会上，起草了两国間的一个友好条約。当热那亚会議正在举行时，腊特瑙和契切林到附近的一个小城拉巴洛秘密会晤，在这个条約上签了字。这一德苏結成同盟的消息，使热那亚会議失去了任何意义。

根据拉巴洛条約，两国政府保証以最亲善的精神相互协助解决經济困难。双方相互放棄賠償战費的要求和战前的債务。苏俄政府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在德国，拉巴洛条約几乎受到了一切人的欢迎，包括傾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在內，該党在議会中的发言人称这項条約是“德国外交政策跃向新的积极阶段的惊人一步”。民族主义分子感到高兴的是，德国又可以不征求战胜国的同意，自行和他国簽訂条約了。用施特雷澤曼的德意志人民党的話来說，“尽管不无可反对之处，我們毕竟要欢迎德俄条約的签訂，这是德国重新活跃起来的象

征。”

德国共产党的发言人则声称，“迄今为止，拉巴洛条約仅仅是一些漂亮話，目前沒有任何实际意义。”① 同参加热那亚会議的协約国代表一样，一般党員对这个条約大吃一惊。除去拉狄克的少数密友（也許有布兰德勒）而外，誰也不知道德俄之間的談判。党內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緒；共产党員們把德俄的这一联盟同喀琅斯塔得叛乱后革命的退步联系了起来。俄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太高了，因此不可能公开抨击它的外交政策，但是，当人們要求把这一条約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区别开来的时候，不信任的潛流便升到了表面。被开除的共产党左派，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公开指責这一政策是俄国向德国反革命投降，他們在共产党員当中迅速得到了响应。

在热那亚，德国被数次要求平衡其預算。6月24日，会議剛一結束，保民团② 的成員就在柏林-格倫瓦尔德大街上暗杀了腊特瑙——这是民族主义分子的一次强烈示威，表明他們在賠款問題上，除去完全廢除而外，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安排。德国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次抗議罢工和声势浩大的示威，共产党也参加了这些

---

① 弗里茨·施万：《从艾伯特到兴登堡：德意志共和国的十年》，来比錫1928年版，第29頁。

② 又名艾什里希团，是一个以从事“費姆”（秘密法庭）活动聞名的軍事密謀組織。凶手特科夫、克尔恩和費舍三人在图林吉亚落网。其中的两个人在被捕后自杀。帮助安排这次暗杀的恩斯特·馮·扎洛蒙和特科夫一同被捕，被判处五年徒刑。

在6月4日，这个保民团就曾試图以氫氰酸毒死謝德曼。1933年以后，它的首領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成为全德作家协会的領导人之一。他所写的一首詩是这样开头的：

> 恶棍的队伍每年都要檢閱一遭，
> 看看吧，从李卜克內西到腊特瑙，
> 这些伙伴已經吃了枪彈到了阴曹，
> 嘻嘻嘻，他們的賬算是查完了！

活动。为德国重工业界說話的司丁尼斯，反对同賠款委員会作任何妥协，力图使冲突达到严重地步。馬克和英鎊的比率这时已达到1,650比1；到7月1日，升到2,000比1，一周以后又增加到2,500比1。

同年8月，在倫敦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議。普恩加賚总算同意延期偿付，但他要求有进一步的生产抵押，这意味着要在德国的占領区和非占領区之間树立关税壁垒、由协約国监督委員会利用国家森林和国有田庄、占領煤矿并由协約国专家管理。結果，仍然沒有达成任何明确协議；英法之間的关系愈趋紧張。1922年秋，德国政府召集在柏林的协約国专家开会，想寻求出一种新的妥协方法。德国的一切建議中都包含着这样一句話："先給予貸款，然后才能偿付賠款。"

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罗馬进軍又給欧洲的分崩离析添上了一层强烈色彩。馬克和英鎊的比率上升到35,000比1。

1922年11月（正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开会期間），維尔特政府辞职。社会民主党拒絕和德意志人民党联合，因为这个党的領袖正在要求廢除工会政策的基础——八小时工作制。前汉堡-美国邮船公司总經理威廉·古諾继任总理。12月9日，在倫敦再次举行会議，出席的有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代表。德国政府提出的方案再度要求得到大量外国貸款。

1923年1月2日至4日，又举行了新的会議，进行了新的商談。早在1922年11月21日，法国內閣就已經拟定出占領来因-魯尔区某些部分的詳細計划，并且組織了一批保证把煤炭賠偿物資运出的法国行政官員。这項計划是一种更大的野心的一部分。法国原来已經控制薩尔、卢森堡、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工业，如果再加上魯尔区，就将成为欧洲最大的产煤国；事实

上，这种安排意味着，法国控制下开采出来的煤和铁矿石将超过英国的产量。

德国政府交付的赔偿物資一貫比条約規定量少10%，这种做法一直为賠款委員会所容忍，已經逐漸习以为常。但是，在1月的会議上，普恩加賚却就德国少交出10%的煤和电綫杆一事提出異議，再次要求立即占領波鴻和埃森，由协約国控制魯尔矿区。英国代表邦訥·劳反对普恩加賚的建議，他主張同时清偿賠款和协約国之間的債务，并大大削減德国的負担。法英两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見，結果，英国代表在1月4日退出会議。普恩加賚宣布，英国的这一举动恢复了法国充分自由行动的权利，于是在1月11日，法比軍队开始占領整个魯尔区。① 馬克和英鎊的比率原来已經是50,000比1，从这一天起，它的价值更是一落千丈；到1月末，馬克和英鎊的比率达到250,000比1。

1月12日，艾伯特总統号召德国人民抵制占領。同日，来因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知名領袖威廉·索尔曼在波恩向重新統一的社会民主党人讲話，鼓动他們尽一切力量抵抗对德国人民权利的这一罪恶侵犯。

議会在1月13日下半旗开会；共和国总理古諾在德国各邦总理的簇拥下出現于会場。議会議长社会民主党人保尔·勒貝和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領导人赫尔曼·繆勒-弗兰肯，以德国工人的名义抗議占領魯尔；施特雷斯曼代表所有的資产阶級政党发言。极端民族主义者要求立即和法国断絕外交关系，把賠款委員会驅逐

---

① 占領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进行的，即：一个工程师委員会要进入魯尔，监督煤炭賠偿物資的交貨工作，必須派兵保护該委員会。軍事行动的依据是凡尔賽条約的第248条和附录的第17和18条。后来，在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条文的問題上，英法两国法学家之間发生过长期爭执。

出德国領土。共产党議員沒有得到詳細指示，但是遵循着剛在一篇共产国际的宣言中規定的党的路綫，声称“在这个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刻，我們必須从内部攻击本国的資产阶級”。在庄严的仪式中，議会以284票对12票和16票棄权的表决結果，在共产党的反对下通过一项号召“消极”抵抗的議案。

十万名法、比联軍开进了来因-魯尔区。埃森和格尔曾基尔亨于1923年1月11和12日相继被占領，1月14日，德国政府发表白皮书，詳細公布了据說是占領軍犯下的种种暴行。一星期后，法国軍队占領了魯尔区的所有铁路和运河出口，到1月底便控制全区。其間发生过一些小冲突——在杜塞尔多夫和波鴻有开枪事件。于是开始戒严；多特蒙德市长在1月17日被捕。1月27日，若干煤矿管理人被捕，其中有弗里茨·提森，他在哈波恩的矿山被占領时发生过很大騷乱。古諾打电报給提森贊揚他的忠誠，并且抗議逮捕煤矿經理。政府答应补偿矿主的利潤損失；它宣布，如果矿工罢工反对占領軍当局，保证发給他們救济金，如果拒絕罢工，便是和敌人合作，背叛祖国，要被送进监獄。

民族主义分子作了强烈反应。1月26日，魯登道夫将軍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退役軍官开始对大批少年公开进行軍事訓练。活动已經减弱的民兵团和艾什里希团，又挑衅性地重新露面。黑色国防軍集团在共和国政府的鼓励下，把許多破坏队派进来因-魯尔区。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制派大肆鼓吹“全民皆兵”。

法国占領軍当局宣布采取下列措施：沒收一切煤炭和税款，在德国占領区和非占領区之間树立关税壁垒，对重要的铁路中心实行軍事管制。可是，在德国保安警察被逐出来因-魯尔区以后，英国报紙便开始議論起当地的共产主义危險，认为德国警察是一支訓练有素的反共別动队，如果沒有他們的协助，法国占領軍当局是

无法鎮压共产党的。柏林政府尽管和魯尔工人結成爱国統一战綫，也小心地强調了这种危险的近在眼前。

德国，一个工业殖民地

在德国共产党剛成立的头几年中，他們幷沒有一套詳細的对外政策，所想到的只是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同俄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盟中实行合作。作为一支德国生活中現实存在的力量，他們在制訂对內政策时，不得不使自己的原則适应于德国現实生活，但是他們的对外政策却往往局限于一些模糊的公式。就連沃尔夫海姆和劳芬堡在1919年提出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也以工人阶級夺取政权为保卫德国的先决条件。虽然他們强調軍队和工人联合起来，共同保卫祖国以反抗西方的侵略，无产阶級专政仍然是民族抵抗的基础。

然而，在1920年8月的俄波战爭期間，保尔·列維这个少数斯巴达克团議会議員之一，却宣布了一个新綱領；他提出了"和苏俄联合起来！"这个轰动一时的口号，幷表示共产党将支持任何願意接受这一政策的德国政府。事实上，他是在表示願意以国內和平換取同苏俄的联盟。这篇演說是在卡尔·拉狄克的直接鼓励下发表的，它受到柏林党組織的抨击。①

在列維发表这篇演說的同时，拉狄克一方面同当时俄国駐柏林代表維克多·柯普②、另一方面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进行了秘密商談。雷文特洛夫写道：

---

① 参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周刊《共产主义工人报》关于一次共产党会議的报导，柏林，1920年8月。

② 1918年，柯普曾在契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員会任职，他在1925年担任駐日大使，后来又做过苏联駐瑞典公使。参看格里戈雷·别謝多夫斯基：《一个苏联外交官的秘密》，倫敦1931年版。

"在当前形势的可怕压力下，群众的情緒似乎正在改变。今天的过激分子所主張的那种群众斗爭，决不应該針对着我們的本国同胞。这种主張应該加以改变，把矛头指向工人阶級的眞正敌人，指向把无产阶級束縛在奴役枷鎖中的协約国。表明群众的心理和思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朕兆，現在已經显現出来。"①

鮑威尔上校，魯登道夫将軍的助手和拉狄克的主要联絡人之一，这时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反布尔什維克政府商談，要求它在德俄两国結成联盟时保持中立。

为了解釋同德国軍队以及德国諜报机构所作的这些联系，莫斯科本部研究出了一种理論。这种理論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就是尤金·瓦尔加教授，他以巴甫洛夫斯基的笔名，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发揮了一种关于賠款問題的理論。

他写道，只有一种办法能使德国有力量履行凡尔賽条約的規定，这就是提高它的工业产量。因为，工业产量提高以后，德国便能够增加出口，出口增加以后，出超部分就可以用作賠款基金。但是，生产的这种提高唯有在取得外国貸款的情况下才能办到，而协約国却是不肯給予貸款的，除非它們能获得生产抵押。提出这些抵押的結果将是，协約国把德国所有重要的生产生命綫——铁路、預算控制等——都抓到手上，从而使德国完全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美国在1924年以前还沒有认眞干預德国事务；因此，瓦尔加的攻击对象只是英法。)德国工人将在德国經理的监督下为英法帝国主义劳动，而后者則和他們的外国上司共分利潤。这样一来，德国就将淪为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印度或印度支那一样替倫敦商业区和巴黎证券交易所創造利潤。迄今为止，殖民地都是工

① 《德意志日报》，柏林，1920年8月31日。

业很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国。作为不列顛帝国主要利潤来源的，一向是那些被迫以原料和农产品换取英国工业品的地区。德国将成为第一个新型的殖民地；它那高度发展的工业将被完全合并到英国的工业体系中。①

在瓦尔加-巴甫洛夫斯基的首唱之后，布哈林、拉狄克和塔尔海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大肆宣揚这种理論。共产党的工会国际，即赤色工会国际，也在洛佐夫斯基的領导下参加了合唱；它所出版的討論賠款問題的小册子，着重說明賠款負担大都落到了德国工人身上。②

这套理論中似乎并沒有任何同德国共产党人的利益相矛盾的东西。他們认为，德国工人正忍受着双重負担：一方面是本国的資本积累，另一方面是和約强行規定的賠款。誠然，工資和賦税都是同償付賠款联系在一起的；但对他們說来，唯一可以接受的政策只能是完全由工业家的利潤中而不是由工人的工資袋中拿出錢来償付賠款。因为事实是，在一片經济瓦解声中，重工业仍然有新的投資，利潤仍然有所增长。

大体說来，所以編造出德国变成西方工业殖民地的理論，目的就在于为拉巴洛条約制造根据。在1922—1923年，瓦尔加、布哈林和拉狄克发現了德国資产阶級的一个新身份，它已經不再是阶級敌人，而成了一个几乎同德国工人一样受苦的犧牲者。由一切阶級組成反对协約国的民族陣綫是当务之急。宣揚“德国是工业殖民地”的理論家們，力图把德国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右派、

① 1947年3月，苏联科学院的尤金·塔尔列教授复活了瓦尔加的理論；他把复兴西德工业的一切計划都說成是旨在使德国成为西方——“工业封建主义”的工业殖民地。

② 参看累德尔：《賠款問題、工会和工人阶級》，柏林1924年版。

左派、中派、工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引入新的途徑。但是，五年的內战已經使工人阶級的少数积极分子认識到，只有在那些准备把德国拖入复仇战爭的民族主义和軍国主义組織統統被清除以后，德国才有可能实現民主的社会主义。把阶級仇恨的重心从它的历史对象——德国資产阶級的一切化身——身上轉移到协約国身上，这些理論家們便使德国的、从而也就使欧洲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歧途。他們加重了德国人的思想和心理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极权主义的意識形态和組織获得发展的主要条件。

对列宁主义阶級政策的这种修正，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問題的范圍之內。按照列宁的理解，同敌对集团暂时結成联盟的必要性总是服从于欧洲革命的总战略的。列宁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以及后来苏維埃政府同資产阶級国家达成的协議申辯，指出它們是为爭取时間所必需的暂时妥协。但他从来也沒有认为，工人国家同資产阶級国家之間的联盟，可以代替全世界工人阶級的团結和国际組織。因此，认为德国資产阶級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論实际上取消了列宁的上述思想，而代之以一种完全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上的共产党外交政策。这种理論大力宣揚，对于俄国防备西方日后的侵略来說，俄国同德国資产阶級結成联盟是必不可少的；从可能发生战爭的角度来考虑，这样一种联盟要比德俄两国工人之間的联盟更現实一些。这样一来，列宁对德国阶級力量的对比所作的分析就受到根本性修正，也就是說，不仅在目前而且事实上是在整个凡尔賽和約签訂后的时期，都放棄了德国工人革命的思想。对于这种政策的含义，德国党的普通党員只能有模糊的理解。对年輕的共产党員，瓦尔加-巴甫洛夫斯基和拉狄克把他們的观点說成是更有利于宣傳的灵活建議。当时，党內討論是圍繞着民主共产主义或专政共产主义以及党同工会的关系問題进行的。

对于忠誠的党員說来，根本不容許对苏俄的外交政策作任何探討。一个在这方面提出尖銳問題的批評家，很快就会被勒令閉口。在党的內部小圈子里，在左派的干部会議上，工业殖民地論受到了尖銳的譴責；不过，根据一致同意，这些意見并沒有出現在当时正花費大量篇幅进行內部討論的共产国际报刊上。

第九章 卡尔·拉狄克

卡尔·拉狄克1885年生于加里西亚（奥屬波兰）里沃夫的卡尔·貝尔納多維奇領地。年輕的拉狄克在塔尔諾夫上学时，参加过波兰社会党(簡称PPS)，波兰工人运动的民族主义一翼。但是，他很早就被吸引进馬克思主义集团，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4—1908年間在这个集团中非常活跃。“从十四岁起，他便和工人运动各种派别发生联系——先是在加里西亚，然后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热情党員。”①

卡尔先后在維也納和伯尔尼求学。1908年，他离开故乡加里西亚去德国，在那里，他以帕拉貝隆的笔名为各种社会民主党报紙——《来比錫人民报》、《不来梅市民报》等——担任特約撰稿編輯。在不来梅，他团結一批年輕党員，組成了一个反对党領导机构的激进派小集团。格平根党报的編輯奧古斯特·塔尔海默发表了他的許多篇反民族主义文章。

1912年，在德国党的开姆尼茨代表大会議程上，出現一桩所謂“拉狄克案”。会上提出了开除拉狄克出党的动議，这表面上是为了个人原因，实际上却是由于他不断攻击民族主义政策，激怒了党官僚。他被說成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家伙。据說他曾經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向一个同志借去一件大衣（另一說是一条褲子），以后并未立即归还。人們就根据这一类瑣事，暗示他是一个賊。党內的小資产阶級对这种“非社会主义的”行为发动了一場夸大其辞的攻

① 卡尔·拉狄克:《肖像和小册子》，倫敦1935年版，第xii頁。

击；正是为了对这种誣蔑运动表示抗議，帕拉貝隆才在几年前换了一个新的笔名拉狄克，这和波兰文的“克拉狄茲”（意为“盜窃”）一詞的发音很相近。

卢森堡和拉狄克都是德国和波兰党的跨党党員，德国党的这一事件是同年波兰党发生分裂的反映，在分裂时，卢森堡領导了一派，拉狄克領导了另一派。卢森堡得到大多数全国領导人的拥护，拉狄克則为华沙組織——包括瓦列斯基、翁施利希特和哈涅斯基——所支持。列宁所袒护的是华沙集团。①

德国党的全国执行委員会宣布，由于拉狄克事实上从未被接受入党，因此开除他是一件多余的事。这种把他的地位降低成一个闖入者的做法，使得調查他所受的指責也就变得沒有必要，而根据党章，本来是必須进行調查的。在案件悬而未决之际，格平根地方組織补授給拉狄克一个党員資格，以保护他的地位。

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拉狄克的决議；用申訴审理委員会的話来說就是：

“不来梅的十五位同志反对接受拉狄克入党，但是根据党章，个別党員无权提出此类性质的申訴。因此，我們建議把这一問題提交全国执行委員会处理。无論如何，下列問題必須予以肯定，即：一个被国际局所屬另一个党开除的党員，是否有資格参加我党，我們是否可以考察他的被开除的理由，或者是，这項工作是否必須由国际局办理。”

大会代表安东·潘納科克为拉狄克申辯。在代表大会幕后操纵的罗莎·卢森堡，同代表大会一道譴責她所极端厌恶的拉狄克，克拉拉·蔡特金和卢森堡的几乎所有其他的同事也都采取了同样

①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3—478頁。

立場。党代表大会的主席諾斯克，在代表艾伯特的支持下，决定不討論拉狄克的地位問題。結果，問題被提交給了全国执行委員会，以后永远也沒有作出正式結論。

在开姆尼茨紧張地等待最后决定的拉狄克，写信給党代表大会說：

“由于沒有机会出席代表大会，不能当面回答人們在格平根事件上对我的攻击，我希望借这封信坚决表示，从1908到1911年，我一直是来比錫組織的一个成員，履行了党員的一切义务。所有与此相反的申述都是捏造；我欢迎有机会在不来梅地方組織的調查委員会面前澄清事实。”①

这件事在卡尔·拉狄克的一生中并不是一个小插曲。对于他来說，德国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組織中的最高典范，被剝夺掉这个党的党員資格是一种痛苦的侮辱。把他驅逐出党的不仅有右派諾斯克和艾伯特，而且有左派的公认領袖卢森堡和她的朋友。罗莎·卢森堡是一位到处受尊敬的人物，她被目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化身，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典范和表率；她也参与提出开除拉狄克的动議，便使得他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道德品质恶劣的人。

在拉狄克的性格結构中，这一事件对于他的不牢靠、他的政治立場閃爍不定等特点的形成有莫大影响。他曾多次对我讲过这个故事，虽然在細节上前后有些差異，但总是强調这件事的不公正，夸大了它的重要性，把它作为骯髒的政党把戏的实例介紹給較年輕的一代。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議事录》（1912年9月15—21日举行于开姆尼茨），柏林1912年版，第515頁。

在德国革命行列中

拉狄克继續在德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一直到1914年。1915年，他去瑞士避难以免被征召进奥地利軍队，在那里，他和列宁的集团发生联系。

1917年4月，拉狄克也列名于坐“密封車”假道德国返俄的布尔什維克之內。但当时达成了諒解，即拉狄克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能到当时还在对奥作战的俄国去。列宁及其集团继續向彼得格勒前进；而拉狄克在把他們陪到斯德哥尔摩以后，便留在那里为布尔什維克担負起組織国际联絡的任务。賦予他的使命是：同齐美瓦尔得集团中的反列宁主义傾向作斗爭，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組織鋪平道路。

当时，他曾和安吉利卡·巴拉巴諾夫一起工作，后来，巴拉巴諾夫在她的回忆录中談到这段合作的情况。“我們瞧不起拉狄克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庸俗的政客。”① 除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之間必然会产生的个人不和之外，她所以作出这一評語还有其政治分歧的根由。巴拉巴諾夫当时正力图組織一个独立于莫斯科中心之外的国际团体，而拉狄克則致力于相反的工作。

拉狄克沒有参加十月革命，但在革命后便立即去彼得格勒，第一次正式参加了布尔什維克党，用“維亚托”的笔名替《消息报》撰写各种文稿。他剛从斯德哥尔摩抵达俄国，就被契切林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員会中欧司負責人，当时，这个部門的工作主要是在战俘中展开宣傳。于是，第一批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战俘委員会在战俘营中建立了。他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德国人当中发起成立了一个李卜克內西旅，在莫斯科組織过若干次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

---

① 安吉利卡·巴拉巴諾夫：《一个叛逆者的自傳》，倫敦1938年版，第188頁。

在这些大会上，来自战俘营的代表們宣布他們和十月革命站在一边。

拉狄克是参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的俄国代表团团員之一，在代表团中，他是波兰問題的专家。德国一向把波兰人目为臣民，因此，波兰人拉狄克咄咄逼人的态度特别使霍夫曼将軍左右的工作人員感到恼火。这位革命新聞記者同德国将軍們形成对立。性格已經成熟的拉狄克变成了一个知名人物。他带着一种挖苦人的勁头，故意使自己的打扮和举止都夸大了他的体格特征；他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奇特使徒，这个头大身小的人，一張仔細刮过的面孔就像猴臉一样，长着絡腮胡子，突出两只招風耳朵，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鏡，被烟草熏黑了的牙齿叼着一柄烟斗，任何記者一見这副模样都会认出他是誰来。他时常头戴一頂英国便帽，夹着一卷外层是倫敦《泰晤士报》的报紙，匆匆忙忙地走过街头。可是，在这副外表下面隐藏着的，却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俄国的新社会而斗爭并努力把它向西方扩展的人物。

拉狄克回到俄国以后，同布哈林一道向列宁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发动激烈攻击。作为这一派的刊物《共产党人》的編輯之一，他提出了一个以革命战爭对付德帝国主义的綱領。列宁經常猛烈地抨击他，說他是一个不肯負責任的可悲的左派。同列宁的和平政策进行的这一斗爭，标志着拉狄克革命热情的頂峰。他后来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內战的經驗使悲观主义成了他的主要心情，这种心情只是在1920年波兰战役的几周中暂时中断过。这种对共产主义前途基本上抱悲观的态度，是拉狄克的所有密友都知道的性格的一个方面。

在俄国官方的外交代表团——越飞、布哈林和拉科夫斯基——于1918年11月被逐出柏林以后，拉狄克作为一个党代表

团的首脑被派往德国。在維尔那，由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的挑唆，代表团受到阻拦，只有拉狄克設法进入了德国。

在德国，他参加了1918年12月的斯巴达克团成立大会。在这里，他再次和罗莎·卢森堡会面；他們的关系是冷淡的和純官方的。他們彼此隔閡不仅是由于过去在波兰和德国长期发生过分歧，而且是由于他們当时对待李卜克內西、累德博和繆勒的态度不同——这些人参加工厂代表委員会的活动，被卢森堡斥責为暴动主义。

在柏林发生"一月血腥周"以后，拉狄克于2月4日被捕，但罪状只是冒名登記。有人企图杀害他。两个月后，当他依然在獄中时，为了使他能得到至少是有名无实的外交身分的保护，苏俄政府任命他为烏克兰派往柏林的外交使节；事实上，当时正在烏克兰进行內战，克里姆林宫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把握最終控制該地区。此外，俄国人还逮捕了好几个德国人做人质；1920年1月，作为放回格奥尔格·克莱諾夫、海因茨·施特拉茨①、布倫德尔博士等人的交換条件，拉狄克終于获釋。

拉狄克在獄中的一年并不是十分不舒服的。他被捕后不久，总参謀部就把他的案子抓到自己手上；拉狄克是他們和年輕的布尔什維克政府之間的宝貴联系人，当然不能让他被某个狂热的志願团領导人随意杀害。他們一再发出了不准伤害拉狄克的秘密指

① 参看海因茨·施特拉茨：《作为拉狄克人质的三个月》，柏林1920年版。在这本小册子中，施特拉茨报导了1919年7月29日他在基輔被捕的情况。德国占領該地期間，曾建立了一个"德国艺术工作者之家"，他就是这个机构的代理人，德軍撤退后他仍然留在基輔。他說，"当时很难把財产清理完毕，因为在实行房屋国有化的情况下，沒有人再願意訂立新租約。"他在1919年10月28日作为拉狄克的交换对象被釋放，这本小册子是他一回到柏林就立即写出的，所署的完稿日期为12月27日。

克莱諾夫在被交换釋放后也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市民們，工人們，拯救欧洲！在垂死的俄国的經驗教訓》，柏林1920年版。

示，他在监号中得到特殊照顾——同其他共产党人所受的待遇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譬如說，約吉契斯在1919年2月被捕，几周后就遇害，人們借口他企图脫逃从背后枪杀了他。正如拉狄克的被赦免是因为有特殊指示，这一謀杀同杀死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一样，也是經过精心策划的。拉狄克得到了一間特别大的囚室，他可以在里面接待朋友；他有一个秘书，甚至被准許同莫斯科政府取得联系。他和外界联系的信使是卡尔·摩尔。①

这时，我正在柏林上密謀技术的入門課。拉狄克听到我在奧地利的經历后希望和我見見面，派摩尔把我带到毛比特监獄去看他。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摩尔竟先把我带到本德勒街的总参謀部本部，在那里，好像有一只电眼似的，所有的門都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軍官給我一張护照，上面的姓名、身分和相貌說明一望而知都是伪造的；我就凭着这張护照每周到拉狄克那里去三次。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囚室成了我的課堂，在这里，我上了不少堂高級共产主义的課。本德勒街总部的插曲，摩尔和軍官們在德国內战方酣之际的友好联系，深深印入了我的脑际。随着时間的推移，我愈来愈看出了这些事情的重要意义，拉狄克来柏林的特殊使命也愈变愈明显了。

拉狄克从毛比特监獄里积极参与了德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他在自己的囚室里同所有的領导人以及許多积极分子会晤，接見数量惊人的来訪者，这一般是每周三次，每次从下午二时至六时。

---

① 1932年，卡尔·摩尔以八十高龄在柏林去世。他是一位奧地利高級官員的儿子，早年在紐倫堡受教育。他和家庭决裂，变成李卜克內西和累德博的朋友，后来去瑞士，在那里采用了卡尔·摩尔（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主角）这个名字。他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創建人之一，参加过許多次国际代表大会。

他在日內瓦遇到列宁，时常从他继承的大宗财产中拿出錢来帮助布尔什維克的組織者。他在1917年以后去俄国，从那里，他肩負着革命政府的特殊任务被送回欧洲。

他偏爱自己的老朋友，不来梅的《工人政治报》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夏洛蒂·柯恩費尔德（她的丈夫約翰·克尼夫是該集团最有才能的領袖之一，已于1918年患肺病去世）受到委托，負責把他写于世界大战前的文集出版。① 他非常急于想要重印这些用德文写的論文，以便重新树立他作为社会民主党老战士的声誉。

当最初出現的民族布尔什維克沃尔夫海默同劳芬堡的綱領在党內引起討論时，拉狄克从他的囚室里干預了这場討論。1919年夏，他又干涉了地下斯巴达克团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工会問題討論。我从监獄中私带出一封給保尔·列維的信，把它送到了代表大会上。

除去本党同志外，拉狄克还有其他来訪者。魯登道夫的副官鮑威尔上校总是定期訪問他，此外，来訪的不仅有其他軍官，而且包括費利克斯·多伊奇这类同瓦尔特·腊特瑙有联系的工业巨头。另一个訪問者是奥托·赫奇教授。②

关于拉狄克和总参謀部之間的这种联系，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幷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但是他的两三个密友，例如保尔·列維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无疑是知道个中底細的。魏瑪共和国的許多政界人物，都很高兴有机会看看拉狄克，和他討論討論德国的政策。他灵活地扮演着自己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俄国政治局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又儼然以担負着半官方外交和軍事使命、派来和德国政府联系的俄国国家使节自居。

拉狄克在俄国党內的地位是不稳定的。誠然，他是俄国党中

---

① 卡尔·拉狄克：《在1909—1919年的德国革命行列中》，保尔·弗勒利希作序，慕尼黑1921年版。

② 奥托·赫奇，东欧問題权威，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議会議員。他是德国东欧研究学会会长，兼《东欧研究》和《东欧——东欧問題綜合杂志》主編。1946年，他在柏林和俄国当局合作。

央委員会的委員，并且后来作为該党代表被列入共产国际主席团，但他幷不在俄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之內。他是一个对外問題顾問和新聞記者，一个有才能而沒有正式地位的外人。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都是比較无关紧要的，它們太不能滿足拉狄克的勃勃野心了。在政治局內，由党的各个重要部門負責人决定重大政策，而拉狄克所渴望的，就是能在这个决策机构中占一个头等地位。

为了改进他在俄国統治阶层中不能令人滿意的地位，拉狄克力图使自己成为德国共产党人的領袖。他非常熟悉德国工人运动；他坚信在俄国絕对找不出另一个比他更好的德国問題专家。可是，尽管他在早期往往是同德国党直接联系的唯一桥梁，俄国政治局的对德政策却幷不机械地根据拉狄克的报告来决定。他的缺点、他的新聞記者作風、他对人对事的印象主义估价，都是为大家、特别是为列宁所熟知的；拉狄克的建議时常不被采納，或者受到很大修改。他在1919年同德国軍官的談判，只被看成是执行苏俄外交政策的一个不重要的細节，对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幷沒有多大意义。

然而，在德共政策的一切細节方面，拉狄克却比任何俄国領袖都更直接身与其事。在1918和1921年間，他屢次到德国去。他认識了数以百計的共产主义斗士，在德国作过广泛旅行，撰写了許多党的文件。共产党設在汉堡的出版社一再重印了他的演說和論文集德文版。它們是当时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其他政治集团也用心地閱讀和重視这些著述，认为它們直接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因此要比德国共产党人的著作更有权威性。

在卢森堡死后，尽管他們两人之間长期存在过分歧，她的大多数好友却都投到了拉狄克的旗帜之下。克拉拉·蔡特金、保尔·列

維、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雅各布·瓦耳歇尔、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等人，都拥戴这时已經成为强大的俄国党的代表、成为同莫斯科的宝貴联系桥梁的拉狄克为領袖。

早在1919年10月，在致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信中，拉狄克便曾以悲观主义的語調写道：

“世界革命是一个非常緩慢的进程，中間必然要遇到不止一次的挫折。我毫不怀疑每一个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級都将不得不几次建立自己的专政，幷且在它取得最終胜利以前，几次看到这种专政的崩潰。”①

拉狄克坚信，在未来的一段漫长时期內，斯巴达克团可以做的工作只能是組織和宣傳。

“在1918—1919年，党是由好几千名工人組成的，斯巴达克团有責任遏制工人阶級，防止不必要的冲突。”②

在他早期所有的演說和小册子中，拉狄克都强調了他的主要思想：在1918—1919年，除宣傳而外不可能再做任何事情，不可能在公开的战斗中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德国工人对共产党的这种消极无为是怎样反应的；他常常不厌其煩地指出，工人們已經不再信任任何政治領袖，幷且在1919—1920年的失败后把他們都看成了叛徒。他感觉到了普遍存在于工人积极分子中間的那种危险的幻想破灭情緒。

“在德国革命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政党丧失了声誉。它使人看到革命詞藻是如何一文不値；共产党首先必須在革命斗爭过程

① 卡尔·拉狄克：《論共产主义战略：德国共产党十月党代表大会文件之一》，柏林1919年版，第5頁。

② 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的道路》，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演說，重印于《共产国际丛书》第XⅧ号中，第34頁，汉堡1921年版。

中赢回工人們的信任。"①

抱着悲观主义的拉狄克，强調俄国的无产阶級将經不起世界資本的进攻；他认为革命实驗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事件都是日益临近这种实驗的高潮。拉狄克建議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抵制賠款的共同斗爭，就是以这种分析为依据的。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团于1920年12月合并为統一共产党以后，他盼望工会的态度能有所轉变。

"社会民主党工人充滿民主幻想。他們仍然希望，他們能够在資本主义社会的結构范圍內改善自身的处境，并且认为共产党人有意識地分裂无产阶級运动。他們以为，假如共产党人不曾分裂工人阶級，假如无产阶級还保持統一，它就会在議会中赢得多数，一切事情就会順利进展……

显而易見，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不能指望德国自发的无組織运动，除非群众受到了外界事件极其剧烈的震动。現在有一千万工人是工会会員。他們唯自己的領袖馬首是瞻；他們听从自己領袖的口号……共产党的战略必須是說服这些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們认識到：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不仅拒絕为工人专政而斗爭，而且也沒有为工人阶級最基本的日常利益而战斗。"②

在一封注明日期为1921年1月8日的《公开信》中，拉狄克說明了同工会結成統一战綫的策略：

"过去两年內，我們已經在若干工厂小組、工会和地方組織中摸索出了这样的策略……

共产党人对其他政党的斗爭，永远不会变成无产阶級內部的

---

① 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的道路》，第44頁。

② 卡尔·拉狄克：《德国統一共产党打算做一个采取革命行动的群众性政党呢，还是做一个守株待兎的集权制政党？》，汉堡1921年版，第21—22頁。

鬩墙之爭。"①

在列維脫党以后，拉狄克贊揚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眞正体現了革命精神，有能力領导党走向更大的胜利。

同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联盟

俄国政治局的所有領导人都养成同某些經过挑选的外国共产党集团发生个人联系的习慣。列宁和季洛維也夫对德国特別感兴趣；托洛茨基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語，特別熟悉法国的情况，因此是法国和西班牙革命运动方面的专家。站在布尔什維克核心集团之外的拉狄克，热烈崇拜托洛茨基的杰出人格和軍事天才。1923年，在列宁在世最后一年的混乱时期，当托洛茨基和"三人小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間即将爆发的斗爭正在酝酿中时，拉狄克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他力图把布兰德勒集团拉进自己的圈子，使它成为欧洲各国托洛茨基派一連串坚强据点中的主要一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希望，一个緩和了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支持1917年以后并入俄国党的非布尔什維克分子，从而有助于同布尔什維克中央日益增长的势力分庭抗礼。托洛茨基地位的加强应該和拉狄克的德国政策相一致；如果在旧式工会中取得关鍵性职位并且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就会加强托洛茨基的地位，而随着他的地位的加强，拉狄克也就会列身于俄国政治局之內。

在1922年整个一年中，拉狄克奔波于柏林和莫斯科之間，集中力量劝誘人們同社会民主党結成統一战綫。他希望能在国际范圍內做到这一点，以便使这种联合更为全面。奧地利社会党人弗里茨·阿德勒响应拉狄克的建議，发起在柏林举行一次三个国际

① 卡尔·拉狄克：《德国統一共产党打算做一个采取革命行动的群众性政党呢，还是做一个守株待兎的集权制政党？》，汉堡1921年版，第25、33頁。

的联席会議。阿德勒領导着一个独立的国际集团，这个集团主要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組成，在大多数問題上的立場都介于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間。列宁把它称为"第二半国际"。从这种居間的立場出发，阿德勒希望能充当調解人，把全世界工人阶級重新統一进一个組織。共产国际派去参加这次柏林会議的人，除拉狄克外还包括以下代表：俄国党的代表布哈林、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法国的弗罗沙尔和阿尔弗雷德·罗斯梅、波兰的瓦尔茨基、南斯拉夫的斯托耶諾維茨、捷克的波希米尔-什麦拉里以及日本的片山潜。每个国际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了一个九人委員会，① 但是該委員会在几个月后便宣告解散。

西方社会党人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間这种恢复亲善的尝試，所得的收获不过是一場激烈的討論，而到1922年7月莫斯科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时，这种尝試便显然結束了。俄国問題专家、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王德威尔得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議会議員庫尔特·罗森費尔德，被准許出庭为被告充当辯护律师。結果，社会革命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共产国际开始发动一場討伐"社会党叛徒"的运动，而爭取劳工团結的努力也就在这片討伐声中被淹沒了。

对拉狄克說来，柏林会議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幷不怎么相信有可能立即恢复統一，但在他看来，世界工人团結的綱領是西方各国共产党合法化和稳定化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列宁和季諾維也夫則严厉地批評了拉狄克的立場。在他就共产国际問題所写的題为"我們付的代价太大了"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中，列宁指出：在柏林会議上，王德威尔得及其朋友們被給予了一个进行反对苏俄的宣傳的讲坛。

① 《第二、第三国际和維也納工会》，各方执行委員会自1922年4月2日起于柏林議会大厦举行的联席会議正式报告，倫敦1922年版。

拉狄克沒有放棄他的建立国际統一战綫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德国中央委員会发布了一个“召开一次国际性世界代表大会”的口号，同时故意含糊其詞，幷不說明这究竟是要再次举行第二、第三国际之間的談判，还是要把全世界的工会幷入一个新的組織。1922年底，在整个德国都展开了召开这样一次国际性世界代表大会的宣傳；来自法国、英国、捷克、瑞典、波兰、俄国的各党同志也参与运动，帮助宣傳这个口号。这是在世界范圍內实行新經济政策这种思想的另一面。如果一种共同的民主改革政策能行之有效，两个国际的統一便是正确的了。

1922年11月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企图澄清統一战綫的問題，回答每一个共产党存在的疑問——究竟什么是劳工政府？——使年輕的各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者能灵活地和現实主义地运用共产主义理論。但是，拉狄克对德国統一战綫的解釋却不应包括在內。

“共产国际必須考虑下列各种可能出現的情况：

I. 假劳工政府

(1) 奥地利目前存在的或英国可能很快出現的那种工党工人政府。

(2) 德国的那种社会民主党工人政府。

II. 眞劳工政府

(1) 可能在巴尔干半島諸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形成的工人貧农政府。

(2) 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3) 眞正的无产阶級工人政府，其最純洁的形式只能由共产党实現。”①

---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举行于彼得格勒

在这里，把“假”字加在英国工党头上并不表明它不应該得到共产党有保留的支持。英国同大陆工业中心的德国一样，在促使欧洲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方面将起重大作用，这一点在社会主义者心目中早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布尔什維克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英国，单单依靠有組織工人的群众压力，也許就能达到推翻資产阶級的目的。1923 年，在腊姆齐·麦克唐納成为英国第一任社会党首相后，列宁尖銳批評了他的政府，但列宁从来也沒有像第一批英国共产党人那样存着幻想，以为单靠英共本身就能消灭工党，夺得政权。在列宁的心目中，党在英国的作用应当是作为一种发酵剂，刺激英国工党的发展。两年以前，当英国党的超左派反对利用議会方法，把它們一概斥之为改良主义的时候，列宁便曾同这些人作过辯論。

“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須**参加議会，必須**由**議会**內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韓德逊和斯諾頓政府成立后的結果，必須帮助韓德逊輩和斯諾頓輩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①

但是在德国，給社会民主党政府加上“假劳工政府”的形容詞，目的却在于阻止共产党人参加。德国不是英国。这至少有两点原因。第一，德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搞搞宣傳、很少有发展可能的小宗派；它已經是一个不可忽視的大党，它的眞正重要性在于它在日益发展的危机中的潛能。第二，德国的反革命已經显示出——在卡普暴动和一般的志願团活动中——它不是能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击敗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正在发展，必須以一个同样坚决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对付它。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話来說：

和莫斯科)議事录》，汉堡 1923 年版，第 1017 頁。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 65 頁。

“德国采用議会制度已經为时过晚——这是資产阶級革命的流产，而这个革命本身又是历史的流产——这种議会制度在出世初期就染上了垂暮之年所特有的一切疾病。艾伯特共和国最民主的議会，不仅在铁血元帅稲煦面前显得軟弱不堪，就是在本国司丁尼斯之流玩弄的股票交易所手段之前、在好战集团的軍事密謀之前也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德国議会制度是两种专政之間的眞空地带。”①

显而易見，就抵抗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反动潮流而言，組織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指示并沒有禁止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只是在1928—1929年才出現。大会指示也沒有排斥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被禁止的只有一点，即共产党不得在消极的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少数派尾巴参加任何社会民主党政府。

拉狄克反对共产国际在德国問題上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德国广泛存在着两种发展前途：或者是軍事民族主义，或者是工会主义；他的主要計划就是要把这二者結合为一。他和列宁之間的地位过于悬殊，要公开表示反对未免太冒險了；因此，他走的是一条介于他自己和列宁政策之間的曲折路綫。

1922年11月，拉狄克偕同恩斯特·迈耶尔回到柏林后，便和自己的斯巴达克团老朋友們設謀划策，打算用某一个和他更亲近的人代替迈耶尔，以便实行他的統一战綫政策。因为迈耶尔服从列宁的干預，他和季諾維也夫在代表大会上会过面以后便似乎不願意在德国建立一个有組織的拉狄克派系。

① 《資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莫斯科1924年，第16頁。

拉狄克选中了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一个老斯巴达克派和开姆尼茨支部的領导人。布兰德勒1881年生于苏台德区的瓦恩斯多夫。他一生都在开姆尼茨工作和生活，但是从未加入德国籍，因此不能被选入議会。作为一个具有长期工会运动經驗的建筑业工人，他参加了属于左派的开姆尼茨城社会民主党，成为卢森堡的信徒之一。他在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团反对派，并被认为是这个集团的創始人之一。布兰德勒在开姆尼茨两党工人中都很出名和深受爱戴，但他的政治經驗只局限于这个偏僻小城。他瞧不起那些沒有通过許多年日常的艰苦工作挣得地位的新入党者。在布兰德勒的眼里，一个沒有在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內受过若干年訓练的共产党人，都是不足取的和不可信任的。在他看来，战后年輕一代喜欢进行破坏的趋势，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可理解的現象。他为自己所熟悉的德国工人阶級感到极大驕傲，为充当这个阶級的一个領导人而自豪。新俄国的强大力量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同时认为，俄国人是沒有办法理解德国工人、理解德国政治的种种特殊因素的。德国革命将避免掉俄国革命的某些特征；它将是非暴力的，不会出現由俄国工人的落后性造成的那些恐怖、破坏和混乱。德国的社会主义經济将会立即顺利地发揮作用，表現出极高度的生产效率。新出現的那批积极分子如布朗基分子、巴枯宁分子和暴动主义分子，所起的作用只能是破坏党組織工作者稳扎稳打的工作，应該不惜任何代价把他們从运动中排除掉。

布兰德勒要比文雅的知識分子恩斯特·迈耶尔坚决果敢得多。同布兰德勒在一起，拉狄克就能够把一批工会主义者安插到党的各个重要职位上，就能够彻底实行他自己的政策。把布兰德勒扶植到領导崗位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在党內的声誉受到了許多人的攻击。他曾經在卡普暴动期間反对过馬克斯·赫尔

茨，人們并且认为，开姆尼茨党組織在粉碎这次暴动的总罢工中消极无为，主要也应該由他負責。此外，当他在暴动后被法庭审訊时，他以法律术語而不是以政治詞句为自己辯护，这也被党內那些思想家們长期嗤之以鼻。①

与此同时，拉狄克把来自格平根的老友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安置在布兰德勒身旁，塔尔海默是专門研究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拉狄克希望他充当布兰德勒的智囊。蔡特金被安排为这个集团的闖将，而弗里茨·赫克尔特和雅各布·瓦耳歇尔这两个精明强干的工会活动家，則充当布兰德勒的副手。拉狄克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联合陣势，給予爭取继承列宁位置的托洛茨基以有力支持，并且在共产国际內部进一步削弱季諾維也夫。

在1923年，拉狄克串通布兰德勒反对季諾維也夫的活动狂热化了。他一再变更自己的德国政策，按照苏联外交部不断变化的需要調整它的曲折路綫。革命活动在德国的挫折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党內的失敗，使拉狄克被排除出了共产国际。

在1925年7—8月召开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諾維也夫总結了“我們和拉狄克之間的十点分歧”：②

(1) 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对保尔·列維的叛党行为持有不同的估价。

(2) 对德国的左派脫党分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抱有不同的态度。

(3) 拉狄克和列維在1921年1月6日写給工会的公开信。

① 可参看布兰德勒在审訊后发表的小册子《1921年6月6日柏林特别法庭对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叛国案的审訊》，柏林1921年版。

② 格雷戈里·季諾維也夫：《对討論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答复》，1924年6月26日发表的演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印刷局印行，莫斯科1924年，第20—24頁。

“包括布哈林和我在内的某些同志反对这封信。后来，列宁出面干預，才解决了这一場爭論。”

(4) 关于三个国际柏林会議的政策。

(5) 关于挪威問題和馬丁·特朗美尔案。①

(6)对待德国党內左派的态度。“我十分肯定，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和左派达成协議。”

(7) 关于工人政府問題。

(8) 关于来比錫代表大会的提綱。

(9) 关于实物稅問題。

(10)关于1923年9月会議以前准备在德国夺取政权的問題。

从德国革命一开始，在他的布列斯特政策失敗以后，拉狄克就不贊成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下列观点：在事变的压力下，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会形成一支足以改造德国社会的强大力量。按照拉狄克的估計，必須訓练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人操纵社会民主党多数——通过合作、滲入、瓦解、重新結合。通过这些措施，內战便可避免或者被化为一些小冲突，从而为一場由上面指导的革命构成发展背景，这样，工人政府就能一步步地独占合法地位。这种在策略上讲究权术的做法（它后来成了共产国际的标准），受到拉狄克注意的时間要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早得多。对于列宁或托洛茨基說来，无产阶級政党公开宣布自己的綱領并公开为之而斗爭，是革命策略的基础。

拉狄克在德国工人政府問題上所作的冗长解釋表明了一种轉

---

① 挪威問題涉及挪威党內的联邦主义傾向，这一派人反对莫斯科执行委員会干預党內事务。它的領袖之一特朗美尔，对于要他去莫斯科的邀請和命令充耳不聞，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参看布哈林关于这一問題的报告，《第四次代表大会議事录》，第955—956頁。

变，这就是：布尔什維主义的黄金时代（认为革命会扩大到欧洲这一假設是一切政治考虑的基础的时代）已經轉变为以玩弄权术为主要战略的过渡时期。季諾維也夫对各种劳工政府所作的同样冗长的解說，正是企图以一个公式把两个互不相容的时代調和起来。这場討論奠定了共产国际以后政策的基础；拉狄克等人的这种小小开端，到三十年代中叶便发展成为人民陣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又发展成为民主陣綫。德国共产党人支持拉狄克，并不是希望由俄国政治局来統治德国党，而是由于他們相信，改造德国社会是他們的母党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而不是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的責任。

1922 年 9 月，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派回到社会民主党內时，拉狄克认为这些左派社会党人虽然在共产党自身的組織中无所裨益，却可以通过他們打入德国工人群众政党的心臟。但是到 1923 年，当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通貨膨脹和法国占領魯尔的双重压力下迅速被削弱时，拉狄克便把他的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别处，考虑是否有可能操纵日益高漲的民族主义力量。1922 年的統一战綫政策和 1923 年的謝拉盖特政策①，是同一块伪币的两面——希望把任务推給另一个組織，而由自己在背后操纵以赢得共产党胜利的两个打算。

从 1924 年起，拉狄克便不再怎样过問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他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热心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在托洛茨基 1923 年的失敗和 1926 年斗争再起之間的平靜时期，拉狄克仍然忠于自己的派系，和布兰德勒不同。② 到 1926 年，当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攻击日益得势的斯大林时，

① 参看下文第 13 章。

② 参看拉狄克給蔡特金的信，見本书第 565 頁注。

拉狄克便同季諾維也夫和解，并在此后两年內成为托-季联盟中最富有进攻精神的領袖之一。①

① 拉狄克在1927年12月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他在被放逐后向斯大林投降，于1929年回到莫斯科。他被恢复了党籍，再次作为外交問題专家从事工作，并为《眞理报》写稿直到1937年。这一年，他是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之一，被判处十年徒刑。此后不时傳出这样的謠言，說他还活着，并且仍然在暗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在审判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将在另一本书中加以分析。

第十章　共产党的来比锡大会

德国共产党代表着欧洲的一种新型組織，并且是这类組織中的第一个，因为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他許多类似的組織才发展成熟。它把俄国国家党操纵机构的許多特点，带进了一个欧洲劳工組織。这个党在1922—1923年的組織体制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一身兼具两种特色，既有点像原来的民主工人組織，又有点像后来的警察式政党；当时，这两种形式都不占統治地位。党的結构非常不同于列宁那种职业革命家的雅各宾組織。它的专职干部和社会民主党的領薪干部表面上似乎一样，但是，由于和俄国党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德国工人官僚也开始变成了俄国式的党务人員。

1922年的組織报告

1922年的党的报告反映了德国党中央委員会的野心，表明他們想使自己的工作范圍同俄国党一样广泛。党建立了許許多多的特殊工作部，分别負責市政机关、合作社、妇女、青年、儿童、教育和娱乐、农业工人和农民工作、援助苏俄、为被捕者及其家屬提供法律与物质援助等各方面的工作。

党拥有一所印刷局和三十四家日报（其中有十五家是仅仅更换一下报头的他报翻版）。它办的許多杂志包括：《国际》、《德国共产党通訊》、《共产主义工会会員》、《共产主义合作社社員》、《共产主义农业工人》、《犁》、《共产主义妇女》等等。① 在1922年，中央委

① 由于銷路不广和缺乏資金，办給农民看的《共产主义农业工人》和《犁》两杂

員会散发了十三种傳单，它們的政治傾向可以从几种傳单的題目上看出来：3月，《不实行实物征用制，国家就要破产》；4月，《热那亚、俄德条約和世界工人代表大会》；7月，《是建立无产阶級統一战綫，还是同資产阶級联合？》傳单的印額分大小两种，大印額为四百万份（1922年9月减为一百八十万份），小印額为一百四十万份（后来减为五十万份）。书籍和小册子都以較粗糙的开本形式印出。譯自俄文的书籍还刚刚出現；在1922年，党出版了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說集。

在三月发动以后，大約有六千名党員被捕，其中有一千五百名左右被拘禁一两星期后，未經审判便被釋放。在四千五百名受审判的人当中，五百人被宣布无罪，其余四千人被判的刑期加起来总共为三千年。党通过“中央法律代办所”給予这些被捕者以法律援助，并且通过“紅色互助会”組織对被捕者家屬的贍养。紅色互助会在1922年一共募得九百八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八馬克捐款，支出总額达八百四十四万四千八百馬克。

支援苏俄的工作也单独由一个机构負責。1922年，有二十七个自治区捐助了大量金錢，或者在苏联举办了儿童之家。青少年搜集了价値八百万馬克的工具和衣服。发行的一种“工人公債”筹得二百万馬克。这个組織拥有自己的每周画刊《鐮刀和錘子》，該刊第一期印數便高达十三万份。放映了俄国电影，所得的收入全部送往俄国。俄国小提琴家索耶穆斯，伴随着一个时常表演政治性朗誦的合唱团，在德国各地巡迴演出。

在农民中間进行的宣傳，效率比較不高。在这一时期，农业工人和1918年11月以后創立的工会分裂，另行組成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独立工会。党的农村工作部組織了許多农业委員会，并且

志，已在1922年停办。

发布了一种标准合同。党利用一种把农事和宣傳結合起来的特殊日历，向小农进行鼓动工作。

妇女书記处組織了家庭主妇委員会来控制物价，特别是合作社的貨价。每年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是这个部門的工作高潮。

办給青少年看的杂志有两种，都由埃德文·赫恩累主編，一种是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无产阶級儿童》，另一种是以青年人为对象的《青年同志》；后者每一期发行三万份。1922年9月16—18日，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共产主义儿童組織的国际会議。

青少年組織的专門工作之一，就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傳統，筹备各种典礼和仪式以代替宗教的按手礼、洗礼、婚礼等等。一本题为《火焰》的小册子，是献給“达到行按手礼年龄、即将跨入生活的共产主义青年”的。这本供十三岁的年輕人閱讀的小册子，載有馬克斯·巴特尔①的几首詩，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肖像，以及从他們的著作中摘出的下列这类語录：

“长途漫漫，需要走千百年之久，但是摆在我們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因此，我們高唱紅色的自由之歌，这歌声就像千軍万馬的奔騰一样使敌人心惊胆战。”

教育文娛工作部包括以下各分支部門：对党員本身的教育；在工人的教育、体育和文化組織中的宣傳鼓动；在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当中的工作，以及对党的会議和代表大会的艺术表現〔已經有这种画了！〕；学校工作方針和教师的运动；青少年；知識分子。党在教师中特别活跃，既組織了一个独立的教师联合会，又在官方的教师公会中建立了共产党小組。大学中的学生党員組織在“共产

① 1933年以后，巴特尔投降納粹，在希特勒統治下继續写詩。他和拉狄克交情很好，曾在1919年去毛比特探监，并把自己的一卷詩《烏托邦》献給了他。巴特尔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創建者維利·明岑堡的朋友。

党大学生支部"里面。

对教育方面的工作有极仔細的安排。莱姆夏德和波鴻支部受到批評，因为它們創办了一所自由人民大学，而沒有参加本地市議会組織的学校。另一方面，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該市組織的工人学校受到否定，被宣布为不宜由馬克思主义者参加。

中央委員会組織了两所党校，共有学員七十四名。課程包括經济史、德国革命史和俄国革命史、土地綱領、馬克思主义等。此外还有七所地区学校和四名流动党課教員，为十六个区和七十八个地方党組織服务。

在1922年下半年，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党員人数都在上升。在1922年的第三季度，它拥有党員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人；①这和一年前三月发动剛結束后的党員数字十八万四百四十三人形成对比。而在同一段时間內，尽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派和它合并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然有所削弱。

不言而喻，这一部分受有訓练的党員核心并不足以全部显示出党的影响。有許多地区，据中央委員会訴苦，在那里是找不到一

① 其中男党員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人，女党員二万六千七百十人。这些数字只是按繳納党費的人数統計的，可是在通貨不断膨脹的当时，有些人往往并不按时繳納党費，因此，党員的实际人数要比这稍为多一些。1922年9月，党在二十八个最重要地区的情况如下：

	支部数	党員数
柏林-布兰登堡	220	24,908
西薩克森	73	11,610
东薩克森	73	3,580
哈雷-梅澤堡	235	23,374
图林吉亚	243	15,147
瓦塞康特(汉堡区)	90	23,206
北来因区	159	18,525
南来因区	138	19,309

个共产党員的，可是尽管如此，党在这些地区的选举中仍然得到了极大支持。一般說来，党在一个地区所得的选票，时常是該地党員人数的二十至四十倍。

党在柏林、汉堡和来因区最强大有力——这表現在党員人数上，也表現在它的追随者具有影响的程度上。在这些以及其他关鍵性的工业中心，人們仍然存在着內战的情緒。另一方面，德国中部的气氛則与此不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組織原封不动地轉到了共产党方面，他們感到自己是党的主人。这些工人分散在遍布于本区許多工业村的小作坊中——分散在薩克森的机器和紡織工厂中，分散在图林吉亚的玻璃、光学仪器、玩具和紡織作坊中。在許多这样的小村鎮上，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地方影响，在鎮議会和其他許多地方机关內拥有很多代表。由于在一个小生活范圍內的亲近接触，他們和社会民主党人紧密地联在一起；在地方工会、在許多地方委員会以及体育和文化俱乐部中，两党党員毫无磨擦地彼此合作。在这个地区，共产党人有一种自信感；內战已成往事，諾斯克和謝德曼的罪恶也可以随着內战一同被忘却了。

在全德国的八十个市議会中，共产党的席位占絕对多数；在另外一百七十个市議会中，他們也拥有过半数的議席。有六千名以上的市議員是正式共产党員。党有一个殊特的市政工作机构（市政工作部）統一指导这方面的活动。

同議会中的情况比較起来，地方上的胜利便显得更加重要；在議会內，保尔·列維及其追随者脫党以后，共产党的正式議会党团只剩下十三人，連提出議案所必需的十五个法定名額都无法湊足。因此，每当德国共产党要向議会提出一項議案时，便不得不疏通敌对的列維集团中的两名議員，請他們补足必需的法定人数。

在工会中，共产党拥有九百九十七个有組織的集团；有四百名

工会干部是共产党員；共产党在六十个地方工会理事会中占多数。但是从全国范圍来看，共产党的影响是比較小的。在1922年6月的来比錫工会代表大会上，六百九十四名代表中只有九十名共产党人。①

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紅色集团

党的領袖想把地方上的胜利从市級机构发展到邦政府，为了討論这項政策，1923年1月在来比錫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②来比

① 共产党代表有半数以上都来自五金工人工会，其余的来自建筑业、公务部門、铁路和运輸部門。党統治着几个从傳統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分裂出来的較小工会。譬如說，在开姆尼茨，大約二万二千名被开除的建筑工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会。有一万六千名左右的海員，也就是說，一切可以組織起来的德国海員的半数以上，組織在共产党領导的"德国海員工会"中，对于在国外从事密謀工作說来，这个組織于党特別有用。《走出黑夜》一书的作者揚·法尔廷就出身于这个环境。

另一种不同的組織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工人联合会"，这是按照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傳統，想把体力劳动工人和职員联合在一个大工会中的尝試。該組織的十万名会員，有四分之三在鲁尔。这个工会是赤色工会国际的成員，莫斯科使尽了一切手段同它的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作斗爭；在1922年10月举行于埃森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指名譴責了这些"特別危險的"傾向。

② 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核心干部作一番考察，倒是十分有趣的。他們当中有不少目前都还活着，并且成了德国苏占区內的官員。

馬尔塔·阿倫德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員会委員，目前在柏林的統一社会党內。

保尔·伯特歇尔，1929年被开除。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929年被开除。

弗里茨·赫克尔特，1935年死于莫斯科。

伯恩哈德·克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員会的成員，目前在柏林的統一社会党內。

阿尔卡廸·馬斯洛夫，1926年被开除，1941年在可疑情况下死于哈瓦那。

威廉·皮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員会的領导人之一，目前在柏林，是統一社会党的領袖。

魏納·朔累姆，参看下文第493頁注。

瓦尔特·烏布利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員会的領导人之一，目前在柏林，是統一社会党內仅次于皮克的領导人。

錫的共产党日报編輯保尔·伯特歇尔，在一年前就扼要說明了这种政策的可耻之处。[1]在他的指导下，来比錫党組織着手为代表大会創造一种合适的气氛：工人代表团将来到大会上，要求党加入邦政府；任何新的选举胜利都要在会上宣布；要以党在地方工会中的胜利和党在大工业中心缺乏影响的事实相对比。

在柏林，卡尔·拉狄克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一道，共同起草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策說明。这份报告必須仔細拟就，因为共产党人参加邦政府担任部长，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所闡明的一切政策与理論背道而馳的。在本世紀初，当法国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参加資产阶級內閣时，曾引起整个国际的軒然大波，現在，拉狄克必須避免出現一种类似的局面。

出席来比錫大会的代表共二百十九人。代表右翼的地区是哈雷-梅澤堡、图林吉亚、厄尔士貝格-福克兰、西薩克森、东薩克森、符騰堡、南来因区、下来因区和巴登；代表左派反对派的地区是柏林-布兰登堡、瓦塞康特(汉堡区)、黑森-法兰克福、中来因区和路薩提亚。党在政治上的分裂为二具有一种地理政治背景。在德国中部城乡"执政"的共产党人，低估了反革命的力量；对于社会主义的图林吉亚和薩克森两地本党同志的"民主幻想"，大工业区的共产党人都嗤之以鼻。

胡果·烏尔班斯，1926年被开除，1947年1月死于斯德哥尔摩。

雅各布·瓦耳歇尔，1929年被开除出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紐約，积极参加了一个爭取成立民主德国的委員会，現已回到德国，活跃于統一社会党內。

恩斯特·沃耳韦伯尔，設在德国的苏联軍事情报处工作人員，多半在1936年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于莫斯科。

克拉拉·蔡特金，1934年死于莫斯科。

[1] 保尔·伯特歇尔：《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权》，載于《国际》第4卷第21期(柏林，1922年5月4日)，第471—476頁。

討論共产党人是否应該参加薩克森和图林吉亚政府的問題，实质上就是对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討論。难道說这个党已經和德国反革命結下不解之緣了嗎？还是說，这个党或是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左派，仍能够被爭取到"实行工人政策"这方面来；如果可以爭取，又如何来达到这一目的呢？

按照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理論，社会民主党是資产阶級联合陣綫的左翼。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他們爭取过来，使他們組成工人联合陣綫的右翼。这可以通过同埃里希·蔡格納博士①这样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結成統一战綫来做到；这位薩克森政府的部长反对柏林社会民主党領导机构的政策，将会贊成同共产党人組成联合內閣。作为一个开端，他們决定这个联合陣綫的政策应該是：采取大刀闊斧的社会改革措施，建立工会委員会监督生产，組織"无产阶級百人团"(紅色百人团)武装保卫工人阶級。

出現于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紅色集团将成为全国的典范，成

---

① 蔡格納博士在納粹政权崩潰后仍然在世；他在1946年当选为来比錫市长。他已經完全和俄国占領軍当局合作。一般說来，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各地，并入統一社会党的前社会民主党干部，都构成了目前政府的主体。

"今天，統治着来比錫的是这样一个領导机构，其組成部分为主席二人、执行书記十人、工作部长二十人、另有党的雇員約六十人……在特別成立的各工作部中，有政治部、文化部、宣傳鼓动部、人事情报部（这是保安部門，拥有一个特殊的諜报网）、經济部、財政部等等，这些部沒有一个比它們的前任——暴虐的納粹机构逊色。在全市三十二区的每一区里，党都建立了一个街道和住宅代表系統，由一名专职书記統一領导……在来比錫的八万名統一社会党党員中，有二百人以上是党的雇員，在两座党的中央大楼和二十个区支部中工作……

蔡格納以及薩克森、麦克倫堡和布兰登堡政府中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都沒有任何实权。內政部长、經济部长、两个邦以及其他行政区的警察机构領导人，都是共产党員。在杜魯門演說〔建議貸款給土耳其和希腊〕以后，警察机构中殘存的几个社会民主党人也都被撤职，例如犬維考的警察总监庫尔特·克里普納、开姆尼茨的副总监埃格尔、来比錫的副总监赫尼希、格里瑪的警察局长顺費尔德等，所有这些人在工人运动中都有三十年的历史，并且都是受过法西斯主义迫害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情报汇編》，社会民主党，汉諾威，1947年5月13日。

为全体德国工人的視綫焦点。然而，这种建立“中德紅色集团”的打算——当时共产党报刊上風靡一时的口号——却不是以共产党本身的力量为基础的，而是依賴共产党滲入和操纵社会民主党的能力。在“紅色薩克森”的两座关鍵性城市来比錫和德累斯頓的市議会中，社会民主党人都占压倒多数，而共产党的力量則很薄弱。①

在柏林和其他主要工业区，共产党选民与共产党員的比例数在薩克森要高得多。此外，党在这些地区的工厂委員会中也拥有雄厚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它在选举中的相对劣势。

共产党左右两派之間的主要分歧之一，就在于他們对工厂委員会和工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在左派看来，工厂委員会是一种具有眞正独立价値的运动，应該支持它們和工会机器展开竞爭。而在右派看来，它們則主要是一个压力集团，应該用来迫使工会不得不向共产党人敞开大門。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建議組織“监督生产的工厂委員会”，但要通过正常的工会途徑。一个統一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运动，将成为德国工人政府的基础。当时流行的共产党口号，往往以“工会領袖必須……”这样一句話开始。

不过，尽管党內不同集团之間的这些分歧非常重要，从主要方面来看，整个討論却有意識地迴避了左派认为是当前最迫切的問題。悬而未决的鲁尔危机竟未被列入議程；它只是在一般的对外政策項下被涉及。在拉巴洛条約签訂以后，德国軍政界的民族主

① 在1922年11月5日的薩克森选举中，共产党得二十六万八千票，在邦議会中占十席，可是社会民主党却得到了一百万票，在邦議会中占四十席。和这五十席所謂无产阶級多数相对立的，是共占四十六席的資产阶級少数（民主党八席，德意志人民党十九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十九席）。

在1921年10月16日的选举中，柏林丧失了无产阶級多数。左派联合起来才有一百一十席（共产党二十一席，独立社会民主党四十三席，社会民主党四十六席），資产阶級集团則有一百十五席，其中拥有席位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义集团已經使德国和賠款委員会之間的关系尖銳化，这时，該委員会正在施加压力和挑衅之間举棋不定。出席来比錫大会的代表充分意識到，那里正在酝酿着某种决定性的步驟。

在大会举行預备会議期間，法国和比利时軍队占領了魯尔和来因区。左派建議把魯尔危机列为大会的主要議題，从而承认德国政治舞台上的这一根本变化。他們的建議以相差不多的票数被否决，結果，党幷沒有对这一問題展开认眞討論，而只举行了一次由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党发言的公众集会。这一事件加深了左右两派之間的恶感：布兰德勒集团声称左派利用魯尔事件推行它的冒險主义政策，而右派坚持拒絕对党所面临的最迫切問題进行充分研究，也使少数派感到气憤万分。

多数派硬使代表大会的重点返回到这样一个問題上，即共产党人是否应該参加图林吉亚和薩克森邦政府。当克拉拉·蔡特金正在就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作报告的过程中，傳来了薩克森邦政府已在共产党压力下辞职的消息。为了提高代表們对共产党这一局部胜利的欢欣情緒，大会执行主席阿尔伯特·施托尔岑堡安排了一个有关这一事件的幻灯节目，幷在放映时亲自朗讀說明：

“德累斯頓，1923年1月30日。薩克森邦議会正在开会……部长列平斯基譴責共产党从事非法活动……伯特歇尔同志提出下列要求：在薩克森組織政府应当成为全体工人阶級的任务。‘我們要求举行工厂委員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决定組織工人政府的問題。’”

同施托尔岑堡和皮克一样，伯特歇尔也是代表大会的三个共同主席之一。在“重新响起的暴風雨般的掌声”平息以后，施托尔岑堡继續說下去：

“同志們，你們已經表示了对这一事件的热情。現在，我請你

們和我一道高呼三声口号。薩克森的革命无产阶級万岁，德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代表們热情欢呼，”大会議事录继續說道，“重复高呼了这些口号，然后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可是，这种自我陶醉的場面剛一結束，馬斯洛夫就提出了撤消施托尔岑堡大会执行主席职务的动議，这項动議被否决时，双方的票数相差无几。

蔡特金的报告显示出，那种将成为共产国际風土病的不良表現——奴顏卑膝地认俄国为祖国，这时已經开始有强烈的表現。蔡特金是这样描繪她在进入俄国国境时的感情的：

“脫下你的鞋子！踏在你脚下的是一块神圣的土地。这里已經由于革命斗爭、由于俄国无产阶級的革命牺牲而成为圣土（暴風雨般的掌声）……

你或是战胜成为主人，
或是被击敗，变成奴隶，
不是凱旋，就是受难，
不是铁錘，就是铁砧！”①

〔像这类引用歌德詩句的做法，是党的演說結尾时流行的一种修辞术。〕

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国际的傳統一直是：任何一国共产党內的少数派集团，在党中央委員会中都有适当比例的代表，而且，这些代表要由每一个反对派集团自身选出。可是，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却打破了这种傳統，他們不顾左派的抗議削减了他們应有的代表名額；不仅如此，他們还自行选擇那些在他們看来最容易妥协的左

① 《德国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923年1月28日—2月1日举行于來比錫）議事录》，柏林1923年版，第268—277頁。

派作代表。在党沒有对入侵鲁尔事件发表声明以后，現在又采取这种行动，代表大会几乎因此走向分裂。为了抗議对他們的組織权利的侵犯，左派决定不參加选举中央委員会。而如果沒有他們參加，选出的中央委員会就不能得到最大的几个地方党組織——柏林、魯尔和汉堡党組織的信任。

卡尔·拉狄克明白他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在夜間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議上（关于这次会議，代表大会議事录上沒有記載），他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答应让四名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員会。在华西里·科拉罗夫[①]的支持下，拉狄克摆出一副共产国际仲裁人的中立姿态，但他运用手段成功地阻止了左派領袖台尔曼和馬斯洛夫的当选。

只是由于左派的忠于共产国际，分裂才被避免。少数派代表坚信右派一定会再次坐失时机，把党領向另一次失敗。在夜間的秘密会議之后，公开进行了新中央委員会的选举，但左派以投票时棄权的方式表示了他們的不滿。多数派投了少数派候选人的票，他們所得的票数大都接近于二百十九名代表的总数；但是多数派代表当选的票数却少得多，自党的新領袖布兰得勒得一百六十六票至烏布利希得一百十二票不等。拉狄克选擇的少数派代表阿尔都尔·埃維特，只获得一百六十三票，因为左派相信他一定会很快

① 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派来参加大会的兄弟党代表。科拉罗夫生于1877年，上世紀九十年代參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他參加了“緊密派”——后来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左派集团；他在两年后被选入該集团的中央委員会，1919年成为总书記。在战前和战后，保加利亚党派出參加各种国际会議（包括齐美尔瓦尔得和斯德哥尔摩会議）的代表，一般都由他担任。1920年，他和季米特洛夫一同被捕。1921年，科拉罗夫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个成員；翌年，他被选为保共駐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是保加利亚1923年暴动的領导人之一，暴动失敗后去莫斯科，在那里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45年，他重新在保加利亚出現，目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主要的領导人之一。

轉到多数派一边。①

在此以前，拉狄克已經接到通知，知道苏俄外交部希望以一种和共产国际政策相違背的方式利用法德矛盾。可是，談到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德国政府合作反对法国，即使是暂时的合作，也会引起人們——不仅包括共产党人，而且包括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員和无組織的德国工人——的强烈反对。在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这样一种政策，将无異于引誘人們起来反抗。可是，如果討論占領魯尔的問題，只能导致两种結果：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就是使党被一种相反的政策死死束縛住。苏俄外交部特别希望的，恰恰是要在德国有一个灵活的助手，这个助手要能够在占領魯尔問題上同德国政府进行它所希望的任何程度的合作；而拉狄克除去起其他作用以外，正是它同德国政府的联系人。

因此，必須使代表大会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問題上，例如工会策略問題、参加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邦政府問題等等。在它們同欧洲政治的主流这样隔絕以后，这些問題便降低到地方主义的水平上。当时，左右两派都沒有充分认識到他們所討論的是枝节問題，也沒有清楚地理解何以不允許提出党所面临的主要問題。这样，拉狄克就集中力量对統一战綫和工人政府問題作了闡述：

“为統一战綫而斗爭的結果，将使旧式的无产阶級群众組織，如工会和合作社等被我們爭取过来。这些已經被改良主义者的策略化为資产阶級統治手段的工人阶級工具，将通过这一斗爭再次

① 埃維特果眞在1923年轉入右派陣营。1928年，作为調和派的一个領袖，他同胡果·埃貝尔林和格哈特·艾斯勒(别名汉斯·貝尔格)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結果被排除出德国。他被派到巴西，在那里参加了卡洛斯·普列斯特斯領导的暴动。以后，埃維特被关进瘋人院，1946年获釋，被送入一家私人医院。他的妻子入了納粹集中营，据說已在那里死亡。

变成无产阶級的斗爭武器。现在，必須为击敗資产阶級而进行阶級斗爭……

工人政府既不是无产阶級专政，也不是通过議会道路走向这种专政的和平过渡。它毋宁說是工人阶級的这样一种尝試，即：在資产阶級民主的框框內，最初以这种民主制度的方法，通过无产阶級群众組織推行一种工人政策。另一方面，无产阶級专政則是要有意識地粉碎这种民主結构；它要打碎民主的国家机器，完全代之以无产阶級的阶級組織。”①

来比錫大会剛一結束，俄国党的政治局便进行干預，宣布来比錫提綱是“不正确的”。通过两个工人阶級政党的联合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被正式斥責为“右傾”。然而，尽管这一批評涉及的范圍很广，其用意却主要在于緩和党內危机，而不是要认眞地研究德国政策的重大問題；事实上，它是以俄国党內的冲突为轉移的。

季諾維也夫以怀疑的目光注視着德国右派；它通过拉狄克和托洛茨基有联系。另一方面，布兰德勒集团继續想开除少数派，指責它們是党的破坏者。可是，如果发生分裂，俄国政府同德国民族主义集团之間的秘密联系就有被暴露的危險。另外，有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它可以作为替俄国施加压力的集团，作为在未来可能改变路綫时的后备力量。随着中央委員会和左派之間的冲突日益发展，政治局力图充当一个調解爭执的仲裁人。

因此，政治局的干涉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使德国党保持一个灵活的政策，其一是防止分裂。魯尔区共产党人提出的夺取地

① 《来比錫党代表大会議事录》，第417、420頁。

方政权的建議被否定，但他們的革命热情也受到了几句夸奖，这种态度似乎不同于柏林中央委員会对冒險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声討，但也仅仅是强調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騷乱、示威、饥餓暴动在全德国都反映了正在加深的經济危机；显而易見，德国左派是一部分德国工人阶級的代言人。中央委員会应該学习怎样更巧妙地去对付反对派。

第十一章　俄国党內爭夺继承地位的斗爭

在1921年3月的喀琅斯塔得叛乱以后，列宁希望在俄国党[1]和国家內部各种冲突力量之間找到一种有效的妥协办法，但是未能如願。工人反对派集团的影响，可以从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的大規模清党上最好地得到衡量。“由于清党結果而被开除出党的有十七万人，即約占全体党員百分之二十五。”[2]

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結束后，新当选的党中央委員会便着手更换一年前上届代表大会选出的三人书記处人选，免去了克列斯廷斯基、謝列勃里亚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书記职务（第三个人曾和布哈林合作編写过許多共产主义教科书）。中央委員会认为他們对待党內的反对派集团过于仁慈；后来，这三个人都加入了反斯大林陣营。新的书記处由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組成；正是这个三人小組，执行了清洗工人反对派的工作。在喀琅斯塔得叛乱后，斯大林后来的副手——安得列也夫、基洛夫、古比雪夫、烏格拉諾夫等人——开始第一次发揮

① 本书从現在起，凡是提到俄国党的地方，“党”这个名詞概用大写〔指外文写法。——譯者〕，以表明它已經成为这个国家中独一无二的权力工具——国家党。

② 〔約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319頁。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150頁）記載的数字甚至更高：“有二十万人——如果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員按七十三万人計算，这个数字便几乎达到党員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开除出党……在外省的清党工作中有某些过火的地方。”

重要作用。

在国内战爭結束后，軍队在苏俄生活中不再占主导位置，党机器的地位加强了。不过，軍队的組織者托洛茨基已經在俄国广大人民中間成为最知名的領袖，甚至比党的領袖列宁还要出名。他奇迹式地挽救了俄国，使它避免了被入侵的列强瓜分和毁灭的命运。在群众的心目中，他是“常胜的托洛茨基”、“救主托洛茨基”。在俄国，青年人的热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局外人看来，他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他对俄国軍队和經济的控制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党內，托洛茨基的地位却并不如此巩固。在他乘坐着总司令火車周游前綫的两年半中，他的統治經常和党发生摩擦；他对党的干涉抱着不耐煩和瞧不起的态度。可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把党內反对莫斯科中央的一切力量都吸引到了自己周圍，因为他是最有希望继承列宁位置的候补人。

列宁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复杂而变化不定的。他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托洛茨基这样一个有力量的人物容納进党和国家的領导机构，在許多政治問題上，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往往联合起来，打击反对他們的較小人物。可是，与此同时，他却不願意让托洛茨基在党內或共产国际內占据中樞职位。

斯大林担任总书記

中央委員会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党內各集团調和一致，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就以此为主要議程。大会决定加强党的书記处，其方法是設立一个总书記，把三人中的另两个人降为总书記的助手。約瑟夫·斯大林于1922年4月2日被任命为总书記。这时，斯大林无疑是列宁看中的人；这部分因为斯大林也是党官僚們看中的人，这些官僚不仅要求有一个坚强的人来打击阶

級敌人，而且要求有这样一个人来对付工人反对派，防止托洛茨基对党机器的任何侵蚀。

1922年，斯大林在俄国党內有一个良好的名声。他是列宁的亲密学生和朋友，一个“老布尔什維克”；他来自下层；在党的領导人流亡国外期間，他曾經留在俄国；他既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理論家或演說家。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組織工作者，彻底讲究实用主义，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完全不同于那种欧洲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斯大林是党內干部的代表，是布尔什維克組織家，在这一点上，他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或布哈林都要高出一筹。他是上层領导干部熟悉的人；在中央委員会中，他熟练地处理着繁杂的党內事务，同时力求（而且往往能成功地做到）使地方和中央党組織之間融洽相通。既然党的干部要他担任总书記，列宁并沒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或个人理由硬要另选别人。

5月26日，列宁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发作；党領导机构把这件事瞞着一般党員。經常关心同志健康的列宁本人，一直具有无穷的精力。現在，他竟病得如此严重，以致很难断定他是否再能視事。于是，一場爭夺继承权的纵横捭闔的斗爭便立即开始了。正因为托洛茨基是当然继承人，党的上层才联合起来反对他，而这也就变成斯大林获得成功的历史性机会。

加米涅夫接替了列宁的政治局主席职位。他和他的另一个自我，季諾維也夫，共同担任中央委員会的政治头脑。在这段时期，他們对待斯大林有一些傲慢，打算把他变成替他們协調党內工作的工具。在較年輕的領导人中，布哈林支持季諾維也夫，拉狄克拥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是彼得格勒党組織的領袖，加米涅夫則領导着莫斯科党組織；控制着俄国两个首都的党組織，他們相信自己在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都肯定会居于多数。

在短时間内，斯大林似乎也甘心服从政治上的长子继承权法則，让季諾維也夫去决定政策。他只全力集中在两項組織工作上：第一，充分利用首都和外省之間天然存在的矛盾，把地方党組織团結在自己的周圍；第二，把組織局、中央监察委員会和“契卡”①都置于自己的統一掌握之下。

中央监察委員会是监督、懲罰和清洗党員的机构，它的职能同契卡的工作是互相交錯的。每一省都有自己的监察委員会，它們直接向中央监察委員会負責；这个监察网和党分庭抗礼，而且比党本身还要危险，因为它的工作是保密的，并且利用警察方法。一个监察委員会可以用党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任何它所不滿意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并且剝夺他的苏維埃法律地位。斯大林利用喀琅斯塔得以后的清洗，揮舞着党和监察委員会这两个权力工具，終于把党領导阶层中一切和他不一致的人都压服或驅除了。中央监察委員会七人团中的四个人，变成了斯大林掌权的基础。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斯大林本人，自我委任的組織局代表，另外三个人是什基里亚托夫、柯罗斯捷辽夫和穆拉諾夫。

斯大林的所有这些活动一部分是瞞着其他領袖进行的，被人們看到的那些活动也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他不断无情地指出托洛茨基的危險，在其他領袖的眼前，他就以这种方式巧妙地进行活动，使自己采取的步驟得到贊同。在1922年，托洛茨基的参加政

---

① “契卡”这一名称是由俄文“非常委員会”一詞的开首字母拼成的。它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以后数次改組，相继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簡称GPU)、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簡称OGPU)和内务人民委員会(簡称NKVD)。后来到1946年，它又被分为内务部(簡称MVD)和国家保安部(簡称MGB)，前者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强迫劳动的工业化事务，后者則負責苏联国内外的諜报和反諜报工作。国家警察这种經常改变名称的情况，既反映了它的周期性改組，也怀有故意要乱人耳目的目的。它的名称从“非常”委員会到“总”局，最后到“内务部”，所显示的傾向是值得注意的。

治局变成了仅仅是一种形式。一切問題都是在政治局成員背着托洛茨基召开的秘密会議上决定的；在地方上，則借口为了防止可能的政变必需采取一种安全措施，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1922年8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举行后隔了几个月，又召开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檢查党对工人阶級的关系。列入議程的有修改党章、工会任务、合作社任务、新經济政策下的反苏維埃政党等問題，在每一个問題上作出的决定都以加强党的壟断地位为目的。“經过考驗的、可信任”的共产党員应該被安插到工会中，以消除“共产党工会領导人和企业經理之間的彼此疏远和敌視”。党內几乎已經被完全打垮的工会反对派，再次企图至少在一个領域中获得有限的活动自由。他們主張工人的合作社同国家合作社的中心組織——苏联消費合作社中央联合社——分离。

党对工厂食堂、卫生站、幼儿园、疗养院这类机构的控制，是控制工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因为分配給一个工厂的食物数量，是同它拥护党的热情、对党唯命是从的程度成正比的。在全面退却的情况下，工会在这样一个小問題上作了最后一战：至少使工人的吃飯問題脫离书記处的严格控制。斯大林认識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一种自治，也会妨碍他的执掌大权，因此作了坚决反对的回答。“我們必須加强国家貿易組織，”会議答复道。在保护新經济政策的虛伪借口下，自治的工人合作社遭到反对，其理由是，它們将会疏远农民合作社，而根据当时流行的邏輯，“这就会便利各种資产阶級反苏維埃分子的活动”。

工会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不信任国家組織，你就是不信任党。如果你不信任党，你就是国家的敌人，你就参加了資产阶級反革命。

"利用目前影响了工人阶級处境的国家經济困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政党企图进行这样一种反苏維埃的宣傳鼓动，即誣蔑苏維埃政府已經不再是工人阶級的政府，正在蛻化和倒向資产阶級一边，因此，工人阶級必須实行一种独立于苏維埃政府政策之外的自己的政策。这种反苏維埃的宣傳在党內个别軟弱和不堅定的分子、特别是前"工人反对派"分子中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①

身体不能很快好轉的列宁认識到，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再不能全部担当起以前的工作了。在处于他自己的政治控制之下时还可以用得的斯大林，現在却成了一个問題。他在臥病期間体会到了清党的影响、喀琅斯塔得以后危机时期的痛苦；他开始修正自己对国家党壟断的看法。譬如說，他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警告欧洲同志不要机械地效法俄国的那篇演說，就是由于清党有感而发的。在对斯大林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列宁消除了他和托洛茨基的疏远。这两个最高領袖——一个由于患病，另一个由于党內的纵横捭闔，都被夺去了权柄——就在这种情况下和解了。

关于党領导人的列宁遗囑

列宁曾短期恢复視事，但在12月16日，他的病又二次发作，这时大家都很清楚，列宁积极活动的生活已經完結。爭夺继承权的斗爭进入了尖銳阶段。在他臥病的最后阶段，列宁注意到了党領导机构內危机的发展；在他看来，继續实行集体領导具有无上重要的意义。

在1922年，感到深切忧虑的列宁曾經就誰来继承他的問題，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169頁。

和他所有的政治密友討論过許多次。对政治局的每一个成員都进行了仔細的分析，权衡了他的长处和缺点。分裂的危險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和共产国际的毁灭，是作出一切决定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托洛茨基在候补继承人的名单上列居首位。他在国家行政官員、軍队上层和党內知識分子中深受拥护；在共产国际中，法国党贊成托洛茨基为候补人。不过，他在共产国际中也面临着强大的反对派；在1922年，当拉狄克吹噓托洛茨基是未来的全党領袖时，他在欧洲得到的是一种不冷不热的反应。人們害怕托洛茨基那种过分严格的紀律，害怕他从上面进行毫不容情的干預；当时，还沒有人把他看成党的民主派。

列宁旣不希望托洛茨基或斯大林、也不希望另外某一个人在他死后成为俄国党的領袖。他不希望实行个人領导；在他看来，沒有一个布尔什維克最高級干部有能力单独領导党。他尤其担心季諾維也夫会被撤消共产国际領导人的职务。

在一般党員們的眼中，季諾維也夫有許多短处。他对待十月起义的态度，尽管在这时期从沒有被提出过，却仍然有損于他作为“坚定革命家”的声誉。① 在列宁格勒，工人反对派的力量特别强

① 1917年10月20日和23日，在中央委員会筹划发动政变的两次决定性会議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反对列宁的主張，即布尔什維克应該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他們的反对根据两点理由——第一，布尔什維克不应該打算单独夺取政权，因为他們如果在这样狹隘的基础上获得成功，就只能依靠恐怖手段保持政权，从而也就会破坏无产阶級民主的发展；第二，国际形势还不够有利。10月24日，他們向党的最重要的几个区委会宣布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于10月31日在孟什維克的报紙《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鼓吹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成立联合政府。列宁建議把这两个破坏党紀的人开除，但这一建議始終沒有实現，因为他們的观点受到党內很大一部分人的拥护，其中包括另外好几个中央委員，如李可夫、諾根和米柳亭等。

11月17日，也就是起义十天以后，这五个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諾根和米柳亭——宣布退出中央委員会，同时发表了一篇抗議新政府政策的声明：“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会在11月14日通过一項决議，廢除了它和参加工人士兵苏維

大，因此，他在該地的統治給他自己招来了許多来自下层党員的批評。最后，共产国际組織在俄国党領导阶层中是普遍不得人心的，共产国际的經常失敗和无休止的內訌使他們感到厌倦，他們对它在政治局中的代表所抱的态度，便反映了这种情緒。在共产国际中，对苏維埃国家的命运、俄国党的事务等等，討論起来比較自由，而且可以进行无知的、天眞到粗暴地步的批評；与此同时，負責的俄国領导人、地方上的党內首領、企业經理和行政官員，却身受紀律的严格束縛，对許多問題都不能置一詞。共产国际的不良声誉沒有提高季諾維也夫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一个不完全受俄国机器控制的国际組織，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內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就是由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造成的。从一开始起，斯大林便害怕季諾維也夫会組織他的“外国人”反对总书記。

列宁在第二次发病一星期后，口授了一封就領导人問題致中央委員会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列宁遺囑”。据托洛茨基說（他

埃的其他政党就成立苏維埃政府問題达成的协議……我們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得以使中央委員会通过一項經过修正的决議。这項新的决議本来可以成为建立苏維埃政府的基础，但是在此以后，中央委員会領导集团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經清楚地表明，它坚决不容許各苏維埃政党共同組織政府，而要維持一个淸一色的布尔什維克政府，为此，它不惜让工人和士兵付出任何代价。絕大部分无产阶級都渴望各民主集团之間的血腥斗爭迅速結束，可是，中央委員会目前却違背他們的意志，硬性实行这种災难性的政策。我們不能为这种政策負責，因此，为了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見并請求工人和士兵支持我們的口号，我們特辞去中央委員会中的一切职务。一切苏維埃政党的政府万岁！”（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616頁。）〔查中文本《列宁全集》第26卷有关部分，并未附此原件，上文均系譯者自譯。——譯者〕

几星期以后，这一分裂得到克服，上述五人都回到中央委員会中。不論是列宁或季諾維也夫，都沒有因为他們在布尔什維克历史上的最重要关头有过这种重大分歧而介介于怀；他們的和好是徹底的。可是在1923年，托洛茨基在反对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們和斯大林組成了三人小組，参看下文第17章）的斗爭中，却利用了这一事实。在三人小組破裂后，斯大林也采用了这种論战手法，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斯大林主义者所編造的重要神話之一——即早在1917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开始背叛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

的記忆无疑是最准确的)：

“所謂的遺囑是分两次写的，中間相隔十天：第一次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在1923年1月4日。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份文件：为他的口授做記录的速記員沃洛季契娃和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宁还有一綫好轉的希望时，克魯普斯卡婭始終秘藏着这份文件。”①

直到一年多以后，1924年5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克魯普斯卡婭才把这封信交給中央委員会书記处。当时，克魯普斯卡婭和季諾維也夫最为接近，因此，他至少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后就知道了这份文件。遺囑对他的支持最大，因此，他希望把它公布出来以打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当时这两个人正在和季諾維也夫作斗争，在政治局內从不同的角度排挤他。他最怕的就是軍队的組織者托洛茨基和党的組織者斯大林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他本人——共产国际的組織者。但是斯大林——在这类事情上玩弄阴謀詭計的大师——阻止了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讀这封信；作为一种妥协，这封信在各地代表团領导人参加的代表大会高級人員会議上宣讀了，只是在这个会上，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內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員，才第一次听到它。②

遺囑的全文如下：

---

① 托洛茨基：《被隐瞞的列宁遺囑》，紐約先鋒出版社1946年版，第14頁。

②. 直到1926年10月18日，馬克斯·伊斯特曼把这份遺囑的全文送交《紐約时报》发表以后，广大公众才第一次知道有遺囑的存在。伊斯特曼在他的《列宁死后》一书中轉載了这一文件，当时，托洛茨基正在为反对派取得党內合法地位而斗爭，因此同意斯大林集团的要求，駁斥伊斯特曼在这一問題上的攻击。不过，他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发表声明，以致肯定了伊斯特曼所談的事实，即的确有这样一封信存在，而且这封信經过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某些代表的討論。托洛茨基写道：“伊斯特曼的书里有几个地方談到中央对党‘隐瞞了’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許多极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問題的书信、著名的‘遺囑’等等），这无非是对我們党中央的誣蔑……列宁同志沒有留

“我上面說到的中央委員会的稳定性，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这种措施一般是可以采取的。因为，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謝·費·奥尔甸布尔格）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說得很对，第一、在他們反对苏維埃政权的阴謀中他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党內极严重的意見分歧上。

我們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級，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級不能协調一致，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一般地来議論我們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是我希望，这是极遙远的未来的事，也是极难以置信的事。

我說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鬧分裂，我打算在这里

下任何‘遺囑’；无論就他对党的关系来說，还是就党本身的性质来說，都不可能有这种‘遺囑’。資产阶級和孟什維克的报刊上通常提到的‘遺囑’，就是列宁同志的一封关于党对組織問題提出的建議的信（已經被〔伊斯特曼的文本〕歪曲得面目全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像对待所有其他书信一样，也非常重視这封信，并根据这封信做出了适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結論……不管伊斯特曼的动机如何，这一本拙劣的著作总是反革命的工具，它只能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凶恶敌人服务。”（《国际新聞通訊》，英文版，維也納，1925年9月3日，第5卷，第68期，第1004—1006頁。）〔参閱《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0—151頁。——譯者〕

两年以后，当俄国党內的斗爭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斯大林感到有义务回答人們再三提到的列宁遺囑这一問題时，他也在《国际新聞通訊》上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大喊大叫，說党中央委員会‘隐瞞了’列宁的‘遺囑’。……事实已經证明并且再三证明了，誰也沒有隐瞞过什么，列宁的‘遺囑’是給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遺囑’已經在代表大会上宣讀过，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宁本人不願意而且沒有要求把它公布……有人說，列宁同志在这个‘遺囑’里建議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記职务的問題。一点不錯。”（《国际新聞通訊》，1927年11月17日，第7卷，第64期，第1428—1434頁。）〔参閱《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9、151頁。——譯者〕斯大林在他1929年反对布哈林的斗爭中，也提到甚至引用了遺囑中的話；参看他在中央委員会四月会議上的演說（《斯大林选集》英文本，紐約国际出版社1942年版，第116頁），在这篇演說中，他引证了1926年七月全会速記記录（俄文版，第4卷，第66頁）〔参閱《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1—62頁。——譯者〕。

分析一下对純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問題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員。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該是把中央委員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到一百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記，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謹愼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对中央进行的斗爭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許他还是現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負，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現时中央两位卓越領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們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評述其他中央委員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們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維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輕的中央委員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談几句。在我看来，他們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对他們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論观点算作完全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論观点里面有一种煩瑣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沒有学过辯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辯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信賴他的。

当然，对两人的評語只是就現时来說的，同时假定这两个卓越而忠誠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1922 年 12 月 25 日。

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記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調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記，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說，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 宁

1923年 1 月 4 日。"①

写这封信的目的仍然在于以"一般是可以采用的措施"来防止分裂——《俄国思想》杂志所体現的反苏維埃力量把希望寄托于其上的分裂。以工农两个阶級的联盟为基础的党，有一天也許会由于这种联盟的破裂而分崩离析。不过，列宁在这里所討論的，主要是"純粹个人特性"引起的更近的危险。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关系构成的。

首先使列宁感到不安的，是总书記掌握的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謹愼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沒有把握。"十天以后，这一評語更为加强了："我建議同志們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調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記，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但是在列宁看来，托洛茨基从另一

① 参閱《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16—618 頁。——譯者

个角度代表了同样的危險。"現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却"过分自負，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列宁认为"現时中央两位卓越領袖"全都是——如果不是同等——危險的人物；不論是由他們中間哪个人来領导，組織权力都会过分发展，从而有可能蜕变为个人独裁。作为一种反措施，列宁建議把中央委員会扩大到五十至一百人，强調扩大集体領导的必要性。①

在遺囑的最后几段中，列宁对政治局的其他重要成員作了品評，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个人沒有因为他們的目前表現而受到批評。他提到十月事件，只是为了再次强調不应該利用这件事攻击他們。这最能表明列宁在1922年对待他們的态度。

早在列宁去世前，已經建立了預定要继承他的領导集团——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組成的三人小組。②这种由于害怕托洛茨基而勉强結成的联盟，始終沒有能搞得很順利，在此后的几年中，季諾維也夫将一直摇摆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妄費心机地謀求政治領袖的这样一种結合，能够抵制各种危險的趋势和潛流。对他这个列宁的学生来說，无产阶級优秀分子的继續統治，是和布尔什維克領导的延續分不开的。

列宁最后的政治声明

在1923年的头两个月，列宁以极大的努力連續口授了五篇文

① 在第六次和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之間——也就是說，从革命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起到列宁提出建議时止——中央委員人数增减很少，一直都在二十五人左右。同一时期，候补委員人数从一人增加到十九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9—540頁。）

② 原文为"Troika"，是党的語言中常用的一个譬喻；原意为构成一組的三匹馬，或是由它們牽曳的車子。

章，对苏維埃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最后忠告。列宁最后的这几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为人注意的，这一部分由于它們是用党的語言写給党員看的东西；列宁不希望挑起非党工人来反对党。

这些文章之一，題为《怎样改組工农檢查院》① 的一篇，建議把新近成立的、由俄国普通工人农民組成的檢查院，同党的最高法庭中央监察委員会合并起来。这种合并将会削弱該委員会同秘密警察的联系，使非党的“厨子們”能对党員的政策和作風实行监督。

在第二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② 的文章中，列宁指責臃肿的官僚机构既浪費錢又沒有效率：

“我們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記住，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被搗毁，但是还沒有消灭，还沒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

列宁所关心的，不仅是权力日大和日益腐败的国家官僚对工人阶級的关系，而且担心苏維埃国家和农民之間可能发生分裂。

“我們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們对农民的領导，保持农民对他們的信任，并厉行节約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痕迹鏟除干淨。

我們应当使我們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約。我們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資本主义官僚机关遺留在我們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費現象的痕迹全部鏟除干淨。”

这两篇文章中的批評，在另一篇題为《論合作制》③ 的文章中

---

① 《列宁选集》英文本，第 9 卷，第382頁以下；完稿于1923年 1 月17日。〔参閱《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36—440 頁。——譯者〕

② 同上，第387頁以下；完稿于1923年 2 月 9 日。〔参閱《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41—455 頁。——譯者〕

③ 同上，第420頁以下；完稿于1923年 1 月 6 日。〔参閱《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

得到詳尽补充，在后一篇文章里，列宁实际上重复了刚在几个月前被宣布为非法的工人反对派的批評，并且使这种批評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认为，单是由下而上地建立壁垒来防范契卡侵犯党的职权是不够的；需要做的乃是以其他組織形式来代替国家党。

“未必每个人都会了解，現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們已經推翻了剝削者的統治，因此，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許多曾經是幻想的、甚至是浪費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經成为毫无粉飾的現实了……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資料，无产阶級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級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結成联盟，无产阶級对农民的領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們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們从前鄙視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嗎？”

这样，在国家党統治时代方兴未艾之际，在人民和国家官僚之間的疏远和敌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苏維埃社会应該以全体生产者的合作社为主要基础的要求——这是工团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喜爱的一个老公式，照布尔什維克党一向的观点来說，它不过是另一个世紀的可笑要求。列宁的这些表述也是对半合法的工人反对派——在这一时期，其主要人物为加布里耶尔·米雅斯尼柯夫①——綱領的反应。

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22—430 頁。——譯者〕

① 在1922年 3 月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米雅斯尼柯夫已經被开除出党。他的綱領基本上和薩普罗諾夫-施略普尼柯夫集团的綱領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要求的政治民主更为广泛。“米雅斯尼柯夫……竟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主張让一切人——从保皇党直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波波夫：《苏共簡史》，第 2 卷，第 156 頁。）

在被开除后，他随着一个貿易代表团被派到柏林，在那里，他会見了馬斯洛夫以及

列宁和斯大林决裂

到1923年初，也就是列宁第二次发病以后，斯大林便加紧了他的統治。在把监察委員会和契卡合并的过程中，他更重視后者。在这几个月中，他开始为党的領袖設置个人档案，記下他們的种种缺点、錯誤以及对革命斗爭曲折过程的反应。对于每一个党的干部和共产国际的知名人物，斯大林的秘密档案柜里都給預备了一份詳細的档案，正是这个秘密档案柜，成了斯大林逐步控制住全党

德共左派和左派脱党集团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其他領袖。他向这些領袖介紹俄国工人阶級的状况，在他們面前描繪了一幅非常令人沮丧的图景。斯大林发觉了这些情况，他认識到，俄国左派和德国左派之間的这种联系，是一种非常危險的征兆。被契卡在1923年驅入地下的米雅斯尼柯夫集团，继續組織一个全国范圍的工人反对派。1927年，米雅斯尼柯夫本人越过波斯边界逃到国外，1933年以后抵达巴黎。

米雅斯尼柯夫生于烏拉尔，原来的职业是五金工人。当我在1939年最后一次見到他时，尽管他的法語程度很低，他已經能很好地适应一家巴黎工厂中的生活。在战爭开始时，他参加了进修学习，并以工程师的資格毕业。

在1928—1929年期間，米雅斯尼柯夫写过一本反对俄国国家党的书，題为《俄国无产阶級的胜利和失败》，但这本书并未出版，只有很少几章曾发表在一个左派小杂志上（《欧罗巴月刊》，巴黎，1939年2月号，第12—16頁）。他写道：在內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間，当苏俄处于最危險境地的时候，存在着好几个苏維埃政党。这种多党制絲毫也沒有削弱苏俄的国防，而是相反地加强了它。通过他們的各种政治組織表現出来的俄国大多数人民的合作，产生了为度过这一困难时期所必需的热情。外国干涉的危險过去以后，官僚們便摧毁了国家机器的可替换部分，建立起自己的一党統治。他继續写道，但是工人阶級并不只包含一种成分，单单一个政党并不足以代表它。它是一个包含多种成分的阶级，需要一种多党制来代表。在它們的少壮时代，資产阶級以多党制度順利进行着統治；資产阶級社会給予人們以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当权的人經常更换，政府和反对派政党之間的显著的不同使这个制度更为灵活。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从来不能克服被推翻的危險，而从經驗上看，这只能依靠統治艺术来消除。資产阶級懂得，它能在多大限度內給予人們以民主权利，不利于它继續統治的危險发源于何处。党的专政排除了工人阶級参加政府的机会；这是一种走向权力壟断的蜕变形式，最終将会对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致命的后果。

1946年，在巴黎的朋友們力图探听出米雅斯尼柯夫的下落。在此以前，他已被一架苏联飞机带回俄国——据謠傳，这是出于自愿。但是，他的法国妻子迄今还沒有收到他的任何信息。

的基础。

病情严重的列宁，对于党内这种新的警察控制，一时还不能够领会其全部意义，但他所知道的东西已經足以使他万分吃惊了。列宁一天比一天衰弱，斯大林便一天比一天大胆，而当斯大林以他那“粗暴”的方式这样爭夺个人权力的时候，列宁也修改了自己在“遺囑”中对他的看法，即基本上认为他应該同托洛茨基平分統治权。1922年底和1923年初，在那些使列宁和斯大林之間的关系达到分裂地步的問題中，最重要的是格魯吉亚問題。

格魯吉亚共和国原来由孟什維克統治，它的独立已經在1920年5月被莫斯科承认。但到1921年2月，紅軍便占領了格魯吉亚，这完全出自斯大林个人的意見，因为对他說来，自己的故乡被孟什維克統治是不可容忍的；同年7月，斯大林以征服者的身分进入梯弗里斯，孟什維克被逐出政府和流放，但是，乡村中的农民以及梯弗里斯的工人和知識分子，都頑强地抗拒莫斯科的苏維埃化。就連格魯吉亚的布尔什維克，都建議让格魯吉亚仍然作为一个独立共和国，只是通过友誼和莫斯科联在一起，而不是屈居于它的統治之下。这种分离主义的傾向，遭到了斯大林在格魯吉亚的代理人奥尔忠尼启則領导下的契卡人員的无情鎮压。格魯吉亚的布尔什維克打算向莫斯科的中央委員会申訴，但又受到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阻撓，他們設法不让列宁听到全部眞相。可是，列宁感觉到了分歧是如何深刻，因此自行搜集資料，决定站在格魯吉亚布尔什維克方面出面干預。他打破党的一切慣例，在3月6日越过政治局直接向格魯吉亚支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給麦吉凡尼、馬哈拉澤等同志（抄发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們：

我在这件事上完全支持你們。奧尔忠尼启則的跋扈以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使我极端气憤。我正在为你們的事起草演說和准备材料。

敬礼！

列宁”①

据托洛茨基說，列宁还在同日写了一封信給斯大林，宣布和他断絕一切个人关系。

“加米涅夫剛去看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是她要他去的。她非常惊慌地告訴加米涅夫：‘弗拉基米尔剛剛向他的速記員口授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說是要和他断絕一切关系。’引起这一举动的直接原因是半个人性质的。斯大林一直在設法使列宁和一切消息来源隔絕，在这方面，他曾經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夫娜表現得非常粗魯。‘不过，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的，’克魯普斯卡婭接着說。‘他如果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粉碎斯大林，他一定不会作出断絕个人关系的决定。’”②

在口授了这两封信三天后，也就是3月9日，列宁的病第三次发作，这次发病比以前几次都要严重，使得他不可能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在政治局突然陷入的慌乱状况下，格魯吉亚問題被草草处理完毕，每一个人的注意力这时都集中在一个主要問題上：由誰来继承列宁？

在列宁第二次和第三次发病之間，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中的处境愈来愈困难和复杂。列宁一天还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三人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1頁。

② 托洛茨基：《自傳》，第485頁。托洛茨基在这里关于这封信的說法，同他在其他著作中的說法是一致的；参看《斯大林》，第374—375頁，以及《俄国眞相》，紐約1928年版，第308頁，在这两本书中，他引用了列宁的妹妹烏里揚諾娃的证詞和季諾維也夫的一篇演說作为旁证。

小組便一天保持着看守政府的性质。可是，当情况表明他們的統治多半不会因为列宁的康复而結束时，他們在列宁死后政治局組成人选的問題上就彼此各怀異心了。季諾維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拥护，托姆斯基給予他以消极支持，而斯大林支持他的态度則一天比一天暧昧。“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束縛了斯大林……他們从来不逾越某种界限。”①

列宁不能积极参加活动后，托洛茨基的地位有了提高。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剛要召开时，政治局采納了他关于工业任务問題的意見，同时作了强調党有必要領导国家机器的某些补充。連斯大林都表現出对托洛茨基新地位的承认。当时曾討論由誰来代替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員会政治报告的問題，“斯大林第一个这样說：‘政治报告当然由托洛茨基同志来做。’”②托洛茨基客气地拒絕了，并且提議由总书記做报告。被他們两人紧紧夹攻的季諾維也夫，好容易才湊成选他做报告人的多数。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1923年4月17日于莫斯科召开，这是第一个由斯大林的书記处控制选出的代表組成的大会。当季諾維也夫做报告时，圍繞着他的——用托洛茨基的話来說——“是一片阴森森的沉默”，这表明：从此以后，党的統治者不再是政治領袖而是組織工作人員了。

在他的組織报告中，斯大林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无产阶級专政机器的必要性上。毫无疑問，发动机必須是党，它必須通过苏維埃、共青团、合作社、工会等“杠杆和傳送带”来带动国家机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由于和斯大林有联盟关系，对于他这样解釋党的作用未置一詞，但托洛茨基对此提出異議，一个工人反对派集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94頁。

② 同上，第366頁。

团散发的一份匿名政綱也反对这种解釋。为了实現这一报告，重新划分了全国行政区，使党在地方上得到更多权力。作为一种諷刺性的补充，大会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議，把工农檢查院和监察委員会合并，以古比雪夫担任改組后的中央监察委員会主席。在这种安排下，工农檢查院便連思想带組織都被消灭了；沒有任何东西比这种表面上接受列宁建議的做法更能表明，日益飞揚跋扈的党机器是如何不把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放在眼里。中央监察委員会的人数从七人增至五十人，另有候补委員十人——所有的人都是斯大林的亲信，而根据为它新規定的任务，这个組織变成了一个专門对付党員的"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剛剛結束后的一段时期，工人反对派和工人眞理派这两个反对派集团遭到譴責，說他們胆敢和国外建立联系，图謀組織一个第四国际。工人眞理派的領袖波格丹諾夫散发声明，指出无产阶級专政目前只是徒有其名，它已經在內战后被国家党摧毁。1923 年夏，这两个集团都被正式开除。

在代表大会上，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之間暗中进行的斗爭，在关于格魯吉亚問題的論爭中公开暴露出来。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支持格魯吉亚代表希望扩大地方自治权的要求，但却遭到斯大林的粗暴斥責，他在会上大談特談"地方沙文主义"的危險。随着党的权力日益增长，民族抗拒在一切边区都变成了一个重大問題；在主要代表工人組織的大俄罗斯中心和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間，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抗，总书記就利用这种状况来排除異己和树立个人統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結束后不久，中央委員会召开了一次特別会議，专門研究怎样来对付各地的民族叛乱。早在这一年年初，基洛夫已被派往阿塞拜疆，以加强那里的中央控制。会議认为，新政策的执行在土耳其斯坦最沒有成果。其次是烏克兰。

“‘我认为烏克兰是苏維埃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斯大林同志說。”①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表面上沒有变更政治局內的均衡形势，但却把斯大林从三巨头之一提上第一把交椅。季諾維也夫回到了他的共产国际崗位上，他明白党內危机并沒有过去，深深为此担忧，但竭力不让共产国际知道这种情况。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同来到莫斯科要求指导和仲裁的德国同志們商談。正是在俄国党內爭夺权力的角逐日益展开的这种环境下，德国代表們由于本国已面临一个决定性关头而来到莫斯科求助，以便向德国資产阶級发出最后的打击。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190頁。

第十二章　占領魯尔

法国占領軍当局在哈姆和多特蒙德之間設立一座哨所，以标明德国占領区和非占領区之間的界綫。所有的火車都要在这里停留，让全体乘客下車受檢查。进入占領区是不难的，乘电車或公共汽車、騎自行車或者步行都可以，但是越过这座哨所，一个德国警察或一支德国軍队便沒有任何权力。在占領区內，有几十万名矿工和冶金工人失业，德国政府发給他們的少量失业津貼，购买力一天比一天下降。居民們的大部分时間都花費在开会和示威上。

消极抵抗

柏林政府以号召消极抵抗来回答占領。在1923年1、2两月，魯尔-来因区的工业大部分都陷于癱瘓。火車被送进了車庫，电綫被割断了；法国人則以向城市課征罰金和逮捕市长相报复。不过，几星期以后，政府鼓动起来的这些活动便迅速减少。早在1月，当好些煤矿經理被捕时，柏林方面就已經无法組織群众性的抗議罢工。这一次和以后好几次，政府都威脅着要把继續工作的矿工关进监獄。3月4日，艾伯特总統宣布，凡給予法国人以任何援助，包括在矿井或铁路上工作者，政府均将予以严懲。3月18日，他在通向魯尔的門戶哈姆发表演說，敦促人們继續抵抗。

上漲的生活費用推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救济金，3月末，一群群失业者在来因-魯尔区到处示威，要求控制物价。他們的队伍一再开进市政厅提出要求：增加失业救济金，用煤免費，发給儿童牛奶，供給寒衣，免費医疗，发給特别津貼以补償房租的上漲，等

等。柏林政府深为吃惊；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中央理事会也受到震动。法国軍队不断和騷乱者发生冲突；在布埃尔-雷克林豪森，竟出动坦克对付他們。

工业家們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一般說来，他們欢迎民族主义者的宣傳，这些民族主义者告訴工人們說，法国的占領是对工人切身利益的威胁；但是，矿主們对工人的民族紀律性却缺少信心。1月底，柏林股票市場要求把該地区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在工人被迫进行消极抵抗的同时，許多企业主却改善和扩大了自己的工厂。在工人中間，关于魯尔区工业家同法国冶金工业委員会进行秘密談判、关于古諾內閣同英国政府达成秘密諒解等等的謠言，从来沒有中断过。3月20日，对这种騷乱感到不安的矿工工会，吁請內閣迅速找出解决办法。

巴黎希望：通过成立一个独立的魯尔共和国，也許可以使来因-魯尔区永远同德国脫离。因此，凡是反对德国政府的文献，即使是煽动性的，也都受到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欣賞。法国軍队的德古特将軍同分离派領袖合作。但是，分离派的組織很薄弱；它們的領导人——約瑟夫·馬特斯、阿达姆·多尔滕和約瑟夫·施梅茨等——并沒有被人們认眞看待。不过，在民族主义集团和分离派之間的无数次冲突中，有一次，施梅茨竟被民族主义分子打成了重伤。一般魯尔工人对法国发起的来因区“独立”抱着某种怀疑，但是对德国民族主义者也沒有更多的热情。志願团和瓦特将軍指揮下的国防軍当年的討伐，留給他們的印象太深刻了。尽管法国人不受欢迎，一般魯尔工人由于对国防軍是如此憎恨，以致宁願让法国人占領，而不願意在他們所說的“德国占領”下过日子。

而且，在魯尔工人中間已經发展起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这种

精神同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宣傳是格格不入的。在战前的二十五年中，采矿业的发展要比当地人口的增长快得多。矿上經常派人到东欧和德国的农业地区去招募工人；許多貧雇农的儿子都离开家乡，涌进了魯尔，从1895到1900年間，他們的人数达一百万人。在格尔曾基尔亨左近，可以看到东普魯士人、波兰人、①俄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这个多民族的集团对民族主义宣傳完全无动于衷。民族主义宣傳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黑色耻辱”（指法国的有色軍团进駐魯尔），可是工人們却并不为此所动。

国家政权在占領区內被削弱了，占領軍也沒有建立自己的政府。德国的警察和行政机关已經撤出；柏林尽管一再发出威胁和宣言，却幷沒有实現它們的手段。

埃森路綫

在这一时期，柏林党組織派我作为联絡人到来因-魯尔区，我在哈姆和科隆之間的地区非常活跃。党的战士对馬特斯和多尔滕这类分离派的領袖根本瞧不起，拒絕和他們进行任何合作。党員們的兴趣都集中在沒收重工业的可能性問題上，这是把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工人团結在一起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剂。“让我們立刻把工厂主和矿主撵走吧！让我們建立起工厂委員会，統一管理来因-魯尔区的全部工业，結束掉腐敗的柏林政府这种騙人的消极抵抗吧！用不着柏林的指揮，我們也能够产煤。让我

① 1913年，魯尔区大約有一千一百七十七个波兰人社团。在波兰移民达到最高潮的1905年，格尔曾基尔亨有一万名波兰工人，为他們服务的有一所波兰人銀行、若干波兰人教堂、百貨商店中的讲波兰語售貨員，此外还有若干波兰人合作社和一家波兰文报紙《波兰擲彈兵》。見埃伯哈德·弗兰克：《魯尔区与东普魯士：东普魯士人的迁入；历史、范圍及其意义》中《魯尔区的民風》一章，第1卷，埃森1936年版，第20頁。

們建立一个独立的来因-魯尔区經济单位。”对他們說来，革命行动的中心是在来因-魯尔区，而不是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如果我們不是呆在坑口，而是走下矿去，自己动手进行管理，全区的居民一定会支持我們。我們将重新建立起我們的无产阶級民兵，而一个坚强地組織起来的来因-魯尔区，将会成为德国革命的領导者。”

因此，三年前的計划正在复活。一个来因-魯尔工人共和国将成为革命的基地，从这里，一支工人大軍将开入德国中部，在柏林夺取政权，一劳永逸地粉碎一切民族主义的反革命力量。这項計划部分是在党外发展起来的，当前的时机、饥餓以及对卡普暴动那些日子的記忆，促成了它的产生。它的形成部分地也是由于魯尔共产党人的推动，在这方面他們得到汉堡、柏林、上西里西亚的支持。最后，經过許多次秘密会議的研究，决定于1923年3月25日在埃森召开一次全区党代表大会，来拟訂占領工厂和夺取地方政权的綱領。

埃森大会分成了力量几乎完全相等的两派。来自克虏伯工厂和埃森冶金工厂的代表是右翼；来自瓦內、格尔曾基尔亨、波鴻、多特蒙德、布埃尔的代表（其中有許多矿工）则急于夺取地方政权。在德国，魯尔是存在着工团主义强大集团的唯一地区。

代表大会的爭論焦点，是党与之暗暗配合的古諾的消极抵抗政策；左派建議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根据德俄結成反西方大陆联盟的政策同民族主义分子携手，其結果只能是使反对德国工人的反革命力量重新結集起来。这样，拉狄克的綱領——“坚决不服从占領軍当局，在一切被軍事占領的工厂停止工作”——便遭到左派的反对，但沒有人敢因为他的政策而公开批評俄国政治局。

左派要工人接管矿山的主張，是在到处風傳法国軍队将占領

它們的气氛中提出的。在此以前，普恩加賚已經揚言要在4月1日——埃森大会开过七天后——接管魯尔工业，这一威胁使会上的討論变得格外热烈。当时，德国內閣和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对这件可能发生的事也正在不断討論。在古諾內閣的鼓动下，工会領袖已經几次宣布，万一发生这种情况，他們将发动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这次罢工的声势将比反对卡普暴动的那次还要浩大，而且一定能得到全国的大力支持。对工会領袖保证的总罢工感到怀疑的左派宣布，共产党不应該参加这种由政府指使的使魯尔財产保留在資产阶級手上的罢工，而应該把它变为无产阶級罢工，“以粉碎一切法西斯流派，推翻古諾政府，并建立一个革命工人政府”。左派在一篇声明中闡述了自己的观点，这篇声明旨在把党团結在魯尔区共产党人的周圍，从而根本改变党的政策：

“魯尔的占領已經如此加重了德国資本主义經济的瓦解过程，以致使德国資产阶級目前淪入了絕望的处境。古諾政府采取的消极抵抗政策，把最沉重的經济負担加到了德国无产阶級身上，它必須承担魯尔被占領的全部損失。……考虑到德国資产阶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軟弱，民族主义集团鼓吹的积极抵抗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宣傳和准备是一种反革命部署，通过这种活动，他們正在为反对无产阶級的血腥战斗作准备。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是資产阶級用以束縛无产阶級的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势下，我們的历史任务应該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从而把德国无产阶級从永无止境的和悲慘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这样，就能够保持无产阶級德国的团結，齐心协力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①

① 在1923年3月25日埃森大会上反对派提出的决議案。《德国共产党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議事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举行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柏林1924年版，第132頁。

这时，在拉狄克和中央委員会的指派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委員克拉拉·蔡特金赶来进行干預。她在一篇庄严而伤感的演說中，警告魯尔共产党人不要重蹈过去曾給党带来很大災难的冒險主义复轍。照她的說法，魯尔工人处在相互竞爭的德法帝国主义的夹攻之下，輕举妄动是不会有成功希望的。千万要避免冒險主义。党应該集中精力同扶搖直上的通貨膨脹进行斗爭。可是，尽管蔡特金声望卓著，左派的立場仍然在党內得到相当大的支持。慌了手脚的拉狄克急忙給莫斯科打电报，在他的請求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正式表示反对左派的綱領。它声明，来因-魯尔区任何反对古諾內閣的起事，都将遭到共产国际的公开否认；它将指示其余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和起事者合作。

埃森路綫开始在全国范圍內爭取支持者。柏林和汉堡支部已經对它表示拥护，其他支部也有可能被爭取过来。俄国政治局担心这会打乱它的外交政策，于是要两派在5月到克里姆林宫去开会。

克虏伯事件

3月31日，即埃森代表大会召开过六天后，在該地的克虏伯工厂发生一次事件，这在法国軍队同德国工业家之間的一系列冲突中，是鬧得最凶的一次。当工程师委員会到达工厂时，迎接他們的是預先安排好的消极抵抗仪式。在工厂气笛的召喚声中，五万三千名工人被命令停工半小时，到院子里集合。这些工人一向依靠工厂的卡車运送他們的食物和工資；当他們听說委員会打算征发这些卡車供法国軍队使用时，他們便开始举行示威，紛紛聚集在阿登多弗街工厂車庫的周圍，或是爬到附近建筑物的屋頂上。民族主义鼓动者发表演說，煽起工人反对法国人；他們試图使工人們

唱起爱国主义的歌曲，但是沒有成功。在示威者和軍队发生的冲突中，有十三名工人被打死，四十二人受伤。①

几天以后，这座工厂的所有者古斯塔夫·克虏伯博士，同他的一群經理一起被捕。柏林政府把克虏伯捧成民族英雄，吹嘘他为德国的荣誉采取了勇敢的立場。有人散发了这样的傳单，傳单上画着普恩加賚坐下来进餐，上的菜是盛在銀盘子里的一个烤熟了的德国嬰儿。民族主义宣傳达到了新的高潮，但是，鲁尔区工人对黑色国防軍的刻骨仇恨还沒有消退，它們的1920年討伐队在工人的头脑中記忆犹新。国防部长盖斯勒不得不在議会中发表辟謠声明，否认他正在主使志願团密謀在鲁尔发动反法武装起事。发生克虏伯事件几天后，埃森各工厂委員会联席会議断然拒絕同工业家联合行动，議决独立进行抵抗。

4月13日，梅尔海姆的工人在圍攻一天以后終于占領市政厅，接管了当地的政府。城里的形势是如此紧張，以致連法国人都不敢立即进行干涉。梅尔海姆的共产党地方組織不理睬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始組織"工人政权"。他們开仓散粮，組織工人民兵，派遣联誼代表到附近的工业城市去。梅尔海姆起义的消息激动了全区。

柏林譴責法国人容忍甚至保护共产党的暴动。內閣正式要求从柏林遣回保安警察，这一要求被法方接受。共产党民兵队退进議事厅，坚持到4月21日被德国警察逐出，死十人，伤七十人。

党中央委員会再次向埃森地方組織发出指示，要他們停止这种暴动主义的冒險。党中央威胁要把参加暴动的党員开除，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果眞实行了这种制裁。但是騷动的浪潮仍然继續增

---

① 《在法国軍事法庭上的克虏伯》，載《南德月刊》(慕尼黑，1923年)，第20卷，第9期，第88頁以下。

漲，并且在5月发展到最高峰。

5月9日，克虏伯被解到杜塞尔多夫监獄，民族主义者的宣傳大肆頌揚他的殉道精神。一个破坏組炸毁了埃森的一座桥；民族主义鼓动員布滿全区。法国向埃森市課征了一笔罰金，并且向柏林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强硬抗議。最后，柏林警察不得不逮捕了保民团的一个領导人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

民族主义英雄之一是利奥·施拉格特。他对占領軍当局进行的破坏活动，在炸断杜塞尔多夫附近的一条铁路时达到最高峰。他終于被法国人逮捕，經过軍事法庭审判后，于5月26日被处决。像他这样的人有几十个，他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値得注意，是因为拉狄克后来頌揚过他，曾称他为"値得我們革命战士眞誠尊敬的一位勇敢的反革命战士"。

5月底，在魯尔爆发了激烈的战斗。27日，在波鴻和格尔曾基尔亨，"法西斯分子"和"赤党"发生冲突，結果有十三人死亡。在多特蒙德和格尔曾基尔亨，粮食仓庫被占領。格尔曾基尔亨的矿工攻下警察总署，并且把警察档案架成一个大营火堆統統付之一炬，作为他們对柏林作斗爭的欢乐象征。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法方准許保安警察开去鎮压，德古特将軍也再次答应这一請求。指揮保安警察的是一批国防軍軍官，他們都曾在研究过1918—1920年經驗的专家指导下，受过打內战的訓练。經过好几天战斗以后，保安警察把工人赶出了格尔曾基尔亨的据点。在波鴻，經过激烈的战斗后，他們把共产党委員会成員全部逮捕。

到5月末，已經有五十万名矿工和十二万名鋼铁工人罢工；他們仍然留在矿上和工厂中，因此，連經理都无法再执行自己的行政工作。5月30日，罢工者宣告复工；他們的工資增长了50%，但别的要求都遭到拒絕。

这一連串的騷动和罢工，表明当时达到了如何不安定的程度。由于缺乏任何指导力量，这些大部分是自发性的运动，始終沒有越出地方性事件的范圍。

莫斯科会議

我肩負着鲁尔共产党人的委托从埃森回到柏林，准备向中央委員会施加压力，要他們改变政策。在《紅旗报》本部，我見到拉狄克，他正在等待着最晚的消息，以便亲自給第二天的社論作最后潤色。在一次有赫克尔和皮克参加的政治局非正式会議上，我再次为鲁尔共产党人的主动精神申辯，并且再次建議对他們发出新的指示。拉狄克大发雷霆。他用最阴暗的色調描繪了一幅党即将被消灭的图景，而且威胁着要把一切反对他支持消极抵抗的人开除。

5月，我作为左派代表之一去莫斯科，参加由俄国政治局召开的德国党內各集团会議。其余的代表是：右派代表保尔·伯特歇尔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左派代表阿尔卡迪·馬斯洛夫和恩斯特·台尔曼。俄国代表团由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組成。

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員会本来是不願意开这样一次調解会議的；它曾經希望在莫斯科能够干涉以前就把左派开除。但是，对莫斯科的邀請却不可能拒絕。經过一星期的討論，俄国政治局取得了一种妥协。“把資产阶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爭取过来，使之成为工人运动右翼”的来比錫綱領，受到了严厉譴責。各集团都大致同意：德国的革命危机正在发展，有必要“加强”夺取政权、特别是在来因-鲁尔区夺取政权的斗爭。

莫斯科的政治家們发現，操纵左派并不是那么困难，在会上，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不让布兰德勒把他們开除出党，而不是联合

宣言中的实际問题。于是便出現了这样的情况：虽然来比錫提綱被否定，布兰德勒主張共产党部长加入薩克森和图林吉亚邦政府的建議，却为俄国政治局所贊同。对来因-魯尔区的占領問题作了討論，但是并不彻底；而且，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問题这一次又沒有被提及。不过，布兰德勒的另一要求，即要俄国人借口党內审查不放馬斯洛夫回德国，却被他們拒絕了。作为和解的表示，通过互选在中央委員会中增加了四名左派，但这是一种不为任何人所喜欢的妥协。

德国党內危机絲毫也沒有因此而被消除。德国党所以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别，表面上好像完全是由于对德国当前形势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更深入地看来，它却是俄国党內爭作列宁继承人这一斗爭的反映。在举行5月会議时，这一斗爭正处于最高潮。当时，列宁已經奄奄一息，斯大林也还沒有巩固他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权力。

拉狄克把希望寄托于国防軍政变

在占領魯尔期間，德苏两国政府之間的关系是如此友好，以致拉狄克能够在菩提树下街七号的柏林大使館正式安頓下来。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接見記者和政界人士，而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或监視；在苏联貿易代表团的办事处，也有一个供他使用的房間，他往往利用这个地方同国防軍代表会談。① 拉狄克往来于菩提树下街

① 在1923年，尤里·卢托維諾夫被派来領导苏联駐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他是工人反对派的領袖之一，派他出国是为了割断他同俄国其他反对派分子的联系。据別謝多夫斯基說(《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100頁)，卢托維諾夫被派来柏林，任务是檢査被維克多·柯普搞得一塌糊塗的财务。有一天，一群德国軍官来到商务代表处，要求会見拉狄克的继任者进行照例的談話；他拒絕接見他們。同年晚一些时候，当卢托維諾夫回莫斯科时，拉狄克竟恬不知耻地指責他同法西斯分子寻求联系。卢托維諾夫一直鬧到政治局会議上，对拉狄克进行威胁，在这么一鬧以后，事情才被擱起不談。

卢托維諾夫早在1904年就参加了布尔什維克党，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是一个五金

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二百二十五号《紅旗报》社之間，就像他习惯于从克里姆林宮办公室步行到《真理报》社去那样自由自在。对他說来，在1923年初春的这些日子里，柏林几乎成了另一个莫斯科。

国防軍为同法国发生武装冲突所作的准备，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的反軍国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馳的；这些工人对国防軍的“心怀恶意”，由一个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政客作了如下描繪：

“在德累斯頓的警察总署，多年来一直設有一个特殊的邦情报处，其职責是对国防軍进行心怀恶意的偵查。不仅是铁路或公路上的部队調动受到偵查，而且連最偶然的小事也在被偵探之列。在这种偵探工作上，官方或非官方的铁路工厂委員会和工会組織者，都同特派的警察官員(他們和薩克森境內外的部队有联系)合作。

就这样，举凡調动中的部队力量、武器类型、調动的性质和目的，以及特殊訓练科目等等，都受到了偵視；他們暗中监視单独旅行的軍官，偵探不論是穿軍服或是穿便衣的国防軍人員。他們檢查火車票，注意其目的地，幷且檢查行李。他們注意軍队信鴿的飞行，記下它們的飞行时間。火車时間表的更动也受到审查，以断定这些更动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防軍。軍官的餐厅乃至俱乐部都受到偵查。軍营日以继夜地被监視。就連停在軍队总部門前的民用汽車，也被記下牌照号碼，然后对車主的姓名进行审查。”①

圍繞在德意志自由人民党周圍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正在組織秘密軍事活动，而且据蔡格納对邦議会报告，他們还得到古諾政府的支持。他揭露了馮·澤克特将軍和普魯士內閣中社会民主党

工人，把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工会工作，1917年以后成为五金工人工会理事会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理事。1924年5月，他由于对党的蜕化感到絕望而自杀。

① 《社会民主共产主义者》，德意志人民党第46号小册子，柏林，1924年，第13—14頁。

部长卡尔·澤弗林之間的一項秘密协定。①

蔡格納和另一个薩克森社会民主党人理查·列平斯基，一再向共和国总統艾伯特致送照会，对日甚一日的秘密重整軍备表示不安。

“在1923年7月7日至8月8日的議会休会期間，薩克森和共和国中央之間的紧張关系，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地步。蔡格納博士发动了一个反对鲁尔抵抗的挑衅性运动，并且——这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猛烈譴責国防軍。当时确实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薩克森邦的首脑进一步加剧了他自己的政府同資产阶級共和国总理古諾博士的政府之間的敌意……

蔡格納博士竭尽咒罵国防軍之能事，觉得无論罵多少次也不为过。这些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的譴責……造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形势。”②

拉狄克对黑色国防軍活动的了解，要比蔡格納这样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多得无可比拟。在一群专家和使館武官的协助下，他能够看到紅軍軍事情报方面的各种报告，而这些材料当然是德国共产党領导人无法看到的。当古諾政府开始打击鲁尔共产党的时候，拉狄克便对古諾政府施加威胁，强迫它采取他所主張的国內和平政策：

“政府深知，由于法帝国主义造成的危險，德国共产党已經对許多事情保持沉默。可是，要为其代理人的行动負責的政府，正在由于这些行动而变得不适合于进行国际談判……如果政府不停止

① 关于黑色国防軍的法庭記录，轉引自保尔·梅尔克尔：《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城 1944年版，第1卷，第87頁，以及庫尔特·卡罗和瓦尔特·厄梅：《阴謀者的发迹：德国反革命史料之一》，柏林1933年版，第156頁。

② 阿尔布雷希特·菲利普：《薩克森与共和国中央》，德累斯頓1924年版，第63頁以下。菲利普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議会代表。

它对共产党的挑衅性进攻，我們就要打破我們的沉默。”①

这种間接地公开承认同古諾合作，在党內造成了惊慌和混乱。反布尔什維克派共产党脫党分子的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人报》，在一篇指責拉狄克同民族主义分子打交道的文章中，建議共产党人把他們党的名称改为“德意志民族布尔什維克人民党”。

有一期《紅旗报》印了下面两句报头：

“在魯尔河同施普累河，

打倒古諾和普恩加賚！”

第二天早晨，拉狄克来到报社，认为两个負責人（一个是格哈特·爱斯勒，又名汉斯·伯格）“玩忽职守”，把他們攆走了。于是，报头改成了：

“在施普累河反对古諾，

在魯尔河打倒普恩加賚！”

在軍队和黑色国防軍中，同俄国可能結成联盟是无休止地討論复仇战爭問題的基础。紅軍和国防軍总參謀部之間的这些秘密联系，在1938年最后一次做样子的公审中，通过一种被歪曲的方式得到证明。长期担任过苏联駐柏林大使的克列斯廷斯基是被告之一。在供认他曾經于1921年参加非法的托派集团以后，他继續說：

“一年以后，我犯下了一桩罪行……我奉托洛茨基的指示，同代表国防軍的澤克特将軍締結了一項协定，他答应以金錢援助托派組織，作为交換条件，我們在这方面有义务为国防軍做若干諜报性质的工作……托洛茨基的理論是：我們的外交路綫在当时同德国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处于破产状态，考虑到德国对英、法和波

---

① 《紅旗报》，1923年5月27日。

兰等国所怀的复仇情緒，德国和苏俄在最近的将来絕不可能发生冲突……1923年以后，同澤克特締結的协定主要在莫斯科、有时也在柏林执行……

維辛斯基：……我想更精确地弄清楚一个問題。据你說，你开始想到利用德国国防軍，是在1921到1922年間的冬天。

克列斯廷斯基：为托派的罪恶目的利用德国国防軍的計划，出現在1922年春季。

維辛斯基：是否在1921年以前，你們的托派組織就已經同澤克特保持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当时存在着一种我不想在公开审判时說明的联系〔这也許指的是1920年俄波战爭〕……这不是一种托派性质的联系。

維辛斯基：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們在公开审判时将不触及这方面的任何問題。但是，有一些事情也許是現在就可以談一談的。首先，柯普是什么人？

克列斯廷斯基：大致說来，柯普是一个老孟什維克……

維辛斯基：据你說，这一个柯普在1920年7月同澤克特建立了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是澤克特同柯普挂上了鈎……

維辛斯基：……柯普在1920年担任紅十字会代表的时候，就同澤克特将軍建立了联系。是这样嗎？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①

---

① 《反苏維埃"右派与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判記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262頁以下。

在审判克列斯廷斯基前一年，拉狄克在受审时并未被准許在这个問題上作证。"把你过去的托派活动簡单地告訴我們，"是維辛斯基的严格命令。同其他被告相反，在同样多的证詞中，拉狄克对头十年談得很簡略，只是談到他在三十年代的托派活动时才

藏在这种捏造后面的事实很簡单。1922—1923 年間，两国軍队总参謀部之間的联系，是根据当时紅軍总司令托洛茨基的命令建立的。可是，进行这种活动是遵循政治局、首先是总书記拟訂的外交路綫。而且，国防軍本身还往往主动同紅軍建立联系。然而，維辛斯基所說的澤克特曾以大量黃金資助托洛茨基，却是使审判显得这样官冕堂皇的彌天大謊之一。

在亲俄的德国外交官烏尔里希·馮·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于 1922 年末被任命为駐莫斯科大使以后，关于締結德-俄联盟的秘密討論变得更具体了。布罗克道夫长期以来一直同情苏維埃政府。1917 年 4 月，他贊成让列宁假道德国自由返俄。在布尔什維克的 11 月胜利以后，他很快便看出德俄結成反西方大陆联盟的可能性。1918 年 12 月，人民代表委員会任命他为外交国务秘书。两个月后，他成为謝德曼內閣中的外交部长，但他辞去这一职务，以表示他对签訂凡尔賽条約的抗議。他从公共生活中引退，暗中为德国实行亲俄的外交政策而努力。在 1922 年，同他的朋友外交部东方司司长阿果·馮·馬尔仓男爵一道，他草拟了拉巴洛条約，两人都把这个条約視为他們的主要成就之一。

拉狄克同接近古諾內閣的人直接討論了俄国对待德法重启战端的态度，保証他这方面将保持善意中立，包括德国共产党人支持战爭在內。他絞尽脑汁写出許多篇社論，組織中央委員会开会，干預組織局的人事分配。对拉狄克說来，魏瑪共和国的瓦解是一个千載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大大积累政治資本，把自己变成俄国

詳細起来。这样，1925—1927 年的托派主要成員拉狄克，对这段时期的情形竟未能置一詞，而充其量也不过是該集团同情者的克列斯廷斯基，反而必須在供詞中追溯到 1920 年。照維辛斯基的安排，拉狄克所起的作用不同，他不願意让拉狄克过深地牵涉进一桩叛国活动。"参看《反苏維埃托派中心案审判記录》，莫斯科1937年版，第 82 頁以下。

的最高領袖之一。他指望德法两国之間将完全决裂，国防軍同来因-魯尔占領軍将发生一場局部战爭，而英国由于許多原因将不会进行干預。他考虑到，在法国如此被孤立的情况下，德国軍事力量将能够击退法軍，而在战爭过程中，一个国防軍-共产党联盟便可以占取优势。

第十三章　施拉格特路綫

在1922年4月热那亚会議举行期間，为了替俄德两国間的可能合作奠定基础，拉狄克开始在俄国报紙上发表文章，攻击法国是英国資本的走卒。在柏林，他常以半官方的身份拜訪威廉街的外交部，并且去过一次布拉格，在那里，他同捷克政府的官員接头，力图削弱它和法国的联系。

“前些时候〔恩斯特·特勒尔奇写道〕，我在一次招待会上同拉狄克先生談过話；当时，他正来往于热那亚和莫斯科之間，以保证不进行宣傳为条件，在这里〔柏林〕作短期逗留。他强調了苏維埃政权的民族主义，他說，苏維埃政权认为所謂的彼得大帝遺囑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强調德国的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有必要联合起来，对西欧資本主义作最后的斗爭。他談話时无拘无束，以一种敢于开誠布公的国务活动家風度，把似乎有些粗魯的新方式带到政治中来。他邀請德国最优秀的反革命作家去訪問他，和他討論这个問題，但是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也和保安警察(德国警察集团)的官員談过話……

我听到一位屬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教授和拉狄克談話时，完全同意他的見解。在他們两个人看来，这才是通向未来的道路。他們都斥責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小資产阶級，为乞取和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①

在这些年代中，拉狄克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間的談判是保密的，

---

① 恩斯特·特勒尔奇：《观察家通訊：論1918—1922年間的世界政治与德国革命》，图宾根1924年版，第269—270頁。

尤其对党保密。因为它們如果公开，恐怕会遭到各方面——社会民主党方面和工会方面、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陣营內部各集团等等——的反对。当然，这方面的消息总难免要漏出来一些。譬如說，在后来，当我有一次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一同坐在議会外交委員会中时，我假裝同意拉狄克的政策，他便对我讲了許多他們如何合作的細节。

当他在民族主义批評家面前为他自己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申辯时，雷文特洛夫本人公开承认了他和拉狄克的联系。1924年，在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由于道威斯計划的实行而暫时消退以后，他发表了一本題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团結?》的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1918—1919年期間，曾經存在过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同共产党結成統一战綫的危險，当时假如出現这种局面，就会把一切民族主义組織都一扫而光。在这段时期，他是反对斯巴达克团的，但是到俄波战爭时，情况便有了改变。

"当紅軍向华沙挺进的时候，从我們德国的角度考虑，我主張同它合作，以便共同把波兰国家摧毁。当时，我們拥有足够的物資和有組織的部队。"①

施拉格特演說

在同德国民族主义者秘密商談了好几年以后，拉狄克終于公开建議在他們之間、也就是在軍队和共产党之間建立統一战綫。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扩大执委会的一次莫斯科会議上，拉狄克

① 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团結》，来比錫1924年版，第10頁。在他于1924年以后、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所写的书中，雷文特洛夫便不再多談他的德俄合作政策，但也并沒有把它全部抛棄。在他的著作中，国家社会主义带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級社会主义"的强烈色彩。

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賽条約和資本家进攻的斗爭》的演說。① 作为对寇松勛爵最近在倫敦的一次演說的答复，拉狄克的談話蓄意加剧英法之間的矛盾；必須孤立普恩加賚，以便使德国有机会在重新发生的冲突中战胜法国。

“英国害怕法国日益增强的空軍〔拉狄克宣称〕。它正在巴黎試行一种挑撥政策，鼓励法帝国主义拿脑袋去硬碰德国的抵抗铁壁。德国的煤矿加上布里約的铁矿石，便会构成法国称霸欧洲、势力范圍直达别烈津河的基础。”

另一方面，拉狄克責备德国資产阶級不明白自己的眞正利益所在。俄国政治局和拉狄克当然知道德英两国在魯尔問題上的秘密試探活动，俄国外交部最担心的，就是在那里可能重新作出安排。

“德国資产阶級就像是一群鬣狗，为了一块死人肉而互相爭斗。作为一个阶級整体，从世界政治上来看，廢除凡尔賽条約和他們有巨大的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德国資本主义各集团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整个阶級反而在帮助普恩加賚取得胜利。”

拉狄克哀叫道，如果德国資产阶級向法国屈膝，你們就完了。德法两国托拉斯的步調一致，同法国資本主义的这种团結，就是把你們的祖国送給敌人宰割。

“所有資本主义列强的政策，都将把欧洲引向毁灭。这块古老的大陆不是走向稳定，而是走向大战……

德国資产阶級在魯尔的失败已經肯定，但是还沒有正式完成。他們連有条件投降都无法做到。”

在拉狄克看来，欧洲可能会发生长期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普

---

① 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賽条約和資本家进攻的斗爭》，汉堡 1923 年版。

遍的破坏将粉碎一切可能出現使局面稳定的趋势。在这种土崩瓦解的气氛中，拉狄克担心各种力量会重新組成反俄統一战綫。“战爭的威胁比 1914 年还要大。苏俄目前正处于极大的危險中。”

“苏俄在危險中”这句話，是拉狄克的中心思想。他坚决认为，各国共产党不可能再采取任何独立行动；目前，各国党必須放棄一切其他任务，在一个主要目标上团結起来，这就是保护工人阶級已經在那里取得政权的国家。根据这一分析，在德国展开革命运动将是危險的，是違反苏俄利益的。为了在苏俄周圍建立一个保护带，必須同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德国軍队合作，德国党一定要限制在这个目的上。

“德国政府力图挑起共产党人在魯尔暴动，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头脑冷靜，这項計划未能得逞。”

为了使德国共产党人肯接受这种政策，拉狄克委婉地提到內战的慘败，摆出一付希望德国党不致重蹈复轍的导师面孔。

“德国資产阶級企图借魯尔罢工造謠生事，把它說成是魯尔暴动。它希望德国工人阶級再遭受一次慘败。”

拉狄克继續說，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沒有力量推翻德国資本主义。它的任务应該是按照当时的需要支持苏俄的外交政策。在布尔什維克党的領导之下把欧洲組織起来，以德国軍队的軍事技能同西方作斗爭——这就是前途，这就是唯一的出路。

“我們过去和現在都深信，只要工人阶級取得胜利，欧洲大陆一定有能力同盎格魯-薩克逊的封鎖作斗爭，甚至同盎格魯-薩克逊資本主义世界的潜艇和飞机作斗爭。”

几天以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的同一届会議上，克拉拉·蔡特金就“法西斯主义”这一新現象发言；自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得政权以后，它一直是共产国际深切关心的問題。这种新型的

群众运动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因为墨索里尼曾經能吸引工人阶級中的很大阶层。在蔡特金演讲以后，拉狄克发言歌頌民族主义英雄利奥·施拉格特，称他为"走入虚无的浪游者"①。他以一种很有感情的語調开始发言：②

"我們尊敬的領袖蔡特金同志已經就国际法西斯主义問題作了內容丰富和使人印象极深的报告，关于这篇演說，我不能作任何补充……在她演說时，我甚至不能清楚地听下去，因为我的眼前跳动着一个又一个的尸体，它們是我們的阶級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被我們的另一部分阶級敌人、即法帝国主义那个强大組織的走狗处死和枪决后的形象。在蔡特金同志談到法西斯主义內部矛盾的整个过程中，施拉格特的名字和他的悲剧性命运始終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施拉格特，反革命方面一个勇敢的战士，有資格受到我們革命战士的眞誠尊敬。"

拉狄克接下去介紹了利奥·施拉格特的生平，凡是他在其中同革命工人运动作过斗爭的反革命軍事集团，拉狄克都細心地一一举出。他回忆說，施拉格特曾經在攻打里加的波罗的海志願团中当过兵。

"我們不知道这位青年軍官是否理解他自己行动的意义。社会民主党人文尼希和波罗的海軍团司令馮·果尔茨将軍，是明白他們在干着什么勾当的。他們志願充当反对俄国人民的走狗，打算以此来取悦协約国……施拉格特的領导人梅德姆后来承认，他通过波罗的海走进了虚无世界。难道所有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都理解

---

① 《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是当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薩一部小說的题目。主人公是一个志願团士兵，他在反对斯巴达克团的斗爭中被杀死。

② 这篇演說的所有引证都摘自共产国际原来的譯文，这些譯文发表于英国共产党半官方的机关刊物《劳动月刊》，倫敦，1923 年 9 月，第 5 卷，第 3 期，第 152 頁以下。

这一点嗎？”

施拉格特也参加了瓦特将軍指揮下的魯尔战役，而对于矿工来說，瓦特則不啻是恶魔的化身。拉狄克介紹了施拉格特曾經如何在瓦特的討伐队中作战的情况，以便强調这样一点，即：哪怕是內战时期鎭压过斯巴达克团的屠杀队成員，共产党人現在也将和他們合作。

“德国人民打算以誰为斗爭对象：是反对协約国資本家呢，还是反对俄国人民？他們打算同誰联盟：是同俄国工农結成联盟，以摆脫协約国資本家的枷鎖呢，还是要使德俄两国人民都遭受奴役？

施拉格特已經死了。他不再能作出回答。他的战友們曾經在他的墓前宣誓，保证继承他的遺志。他們必須作出回答：他們究竟反对誰？究竟和誰站在一边？”

这篇演說在共产国际中、特别是在德国共产党內树立了一种新趋势。在他們同卡尔·考茨基这类社会民主党理論家进行論战时，列宁和托洛茨基曾认为，以紅色恐怖对付反革命白色恐怖将是不可避免的。必須把反革命突击队、把杀害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卢森堡、暗杀数以百計的工人的凶手完全淸除，已經成为流行的“新”思想之一，使傾向于合法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变成了革命者。

而現在，拉狄克却发現这些白党原来是由正直的爱国群众組成的。

“对那些急于同法帝国主义的入侵作斗爭的正直的爱国群众，我們要問一問：你們打算怎样进行斗爭，依靠誰的支持？要知道，反对协約国帝国主义的斗爭是一場战爭，即使大炮幷沒有轰鳴……假如德国的爱国集团不决心以全国大多数人民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从而形成一条旣反对协約国又反对德国資本家的战綫，

那么，施拉格特的道路就只能是一条走入虚无的道路……”

如果正直的爱国群众不理会拉狄克的团結号召，如果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工人結成統一战綫，那么“德国……就会变成一个进行血腥內战的战場，結果，敌人将坐收漁利，毫不費力地把它打敗和消灭”。

拉狄克提到1806年德国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当时，在耶拿战役以后，面临着排山倒海而来的拿破侖大軍，年輕的普魯士国家只能束手待斃。他提到早期德国民族主义的英雄，志願团組織者的先驅格奈澤瑙①和夏恩霍斯特②。这些德国民族主义者及其領袖克劳塞維茨和馮·施坦男爵，曾經在沙皇俄国找到避难所，并且以俄罗斯国土为根据地进行了解放战爭。在扛出这些受人尊敬的德国自由英灵做招牌时，拉狄克大力鼓吹苏維埃国家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間必需結成联盟。

“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能沒有朋友，更不用說一个被敌人包圍着的战敗国了……如果人民的事业成为国家的事业，那么，国家的事业也就会成为人民的事业……我們相信絕大多数傾向于民族主义的群众都不屬于資本家陣营，而屬于工人陣营……我們深信，有数以百計的施拉格特会听到〔这一眞理〕并且理解它。”

共产主义路綫发生这样惊人的轉变，自然不是由拉狄克一个人决定的；他的演說表明了政治局內部討論的結果。这时，俄国政治局的严格紀律在共产国际中还沒有被削弱，有关这些秘密討論的消息很少泄漏出来。通过同季諾維也夫和卢托維諾夫的个人接触，我在这件事情上比别的德国共产党人要知道得多一些，但也只

① 奈特哈德·馮·格奈澤瑙（1760—1831），德国陆軍元帥，軍事改革家。——譯者

② 格尔哈徒·馮·夏恩霍斯特（1755—1813），德国将軍，軍事改革家。——譯者

有局部的了解。

拉狄克所以被派出来发表施拉格特演說，是因为英苏之間的关系在近东日益紧張了。

土耳其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

在最初阶段，布尔什維克在1917年11月的夺得政权，似乎有利于英国利益在近东的进一步扩張。

在1919年，英国控制着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当时，邓尼金将軍正要从他在里海的保皇党据点向外扩張；他的战斗队配备着英国水兵。在庫班和捷列克哥薩克的支持下，邓尼金的志願軍逐步巩固了它在北高加索的陣地。德国崩潰后，法国舰队装載着支援邓尼金的物資开进黑海。好几师法国軍队在克里米亚和奥德薩登陆。但是，两年以后，所有这些入侵企图都失败了。英国对苏維埃政策在近东的进展特别关心，在那里，局势越来越显得紧張。波斯、阿富汗以及其他邻国，都处于一种劍拔弩張的气氛中；土耳其正在发生革命。

1919年5月，土耳其領土为英法和意大利支持下的希腊軍队所占領，国家眼看就要有被瓜分的危險。这时，穆斯塔法·凱末尔将軍把很大一部分軍队团結在一个民族解放綱領的周圍，在他的部队得到起义农民支持的情况下，号召全国人民推翻奥斯曼王朝。他的軍事政变很快便扩大范圍，变成一次反对老朽的压迫政权（它的苛捐杂税和貪污腐化早就臭名远揚）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声势是如此浩大，以致使凱末尔能够在安卡拉設立一个革命議会——大国民議会，同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王朝相对立。从安卡拉出发，凱末尔胜利地进軍君士坦丁堡，苏丹宣布退位。

最初，凱末尔派革命分子同俄国共产党人进行合作；苏俄第一

个承认了安卡拉政府。早在1917年，当列宁刚从苏黎世流亡地归国时，他就对克倫斯基政府继續奉行沙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譴責：

“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包含掠夺內容（瓜分波斯，搶劫中国，搶劫土耳其，夺取东普魯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資本联結在一起的秘密条約。它承认了沙皇政府締結的这些条約；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不仅压迫大俄罗斯人，而且使大俄罗斯人腐化堕落，成为屠杀其他民族的劊子手。”①

苏維埃政府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宣布廢除关于瓜分波斯和土耳其的英俄密約。

在当时担任民族人民委員的斯大林的贊助下，一个主要由俄国的土耳其战俘組成的土耳其共产党，于1918年7月25日宣告成立。这个党始終沒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因为凱末尔不希望土耳其有共产党。他更喜欢的招牌是自己的革命民族主义；在他的倡議下，1920年在安卡拉成立了一个民族共产党，这个党强調伊斯兰教的社会內容，认为这是一种比西方馬克思主义更完美的社会主义。凱末尔告訴农民，大国民議会将在解放土耳其民族的同时实現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人們根据这种新型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作了种种推测，认为在整个近东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日益高漲的民族独立运动将和农民共产主义結合起来。拉狄克对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尤为热心。早在1919年，当他在毛比特监獄的

① 列宁：《无产阶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也就是所謂“四月提綱”，这是列宁回国后一篇扭轉了布尔什維克政策的政治方針总說明），参閱《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頁。

时候，他已經接見过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塔拉特，1920年1月，他又曾邀請另一个土耳其領袖恩弗尔①到莫斯科去。

1920年，当这类希望中东发生农民革命的想法最为風行的时候，共产国际在巴庫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派遣季諾維也夫、貝拉·庫恩和拉狄克出席会議。代表大会討論的中心是凱末尔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們这样希望）英帝国的削弱。拉狄克后来向他的德国朋友描繪开会仪式时，半驕傲半諷刺地回忆起当时的盛况：两千名穿着彩色服装的代表，如何把他們手上的刀高高举起。季諾維也夫向他們发表了一篇曾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間傳誦一时的演說：

"首先，我們号召你們进行一場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圣战。我們要向它的統治者高举起斗爭的火把；我們要让那些騎在土耳其、波斯和印度人头上的厚顏无耻的英国軍官們受受罪，要让他們大吃一番苦头。"②

由土耳其代表苏菲同志签字的一份大会宣言发出下列号召："起来，安那托尼亚的农民們，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参加圣战吧！"

从此以后，巴庫便成为苏俄在穆斯林中間进行宣傳的中心。拉狄克以能够在共产国际中代表土耳其人发言而自豪；在他的慫恿下，不仅在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議中，甚至在德国党的来比錫代表大会提綱中，都插有几段关于"年輕的土耳其农民"的文字。③

---

① 恩弗尔，最早同布尔什維克发生联系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一，自有一套不同于凱末尔的政策。在俄屬中亚細亚几次試图組織泛土兰主义运动以后，他于1923年在塔吉克斯坦（上布哈拉）失踪——多半是被杀害。

② 参看《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議事录》，1920年9月1日举行于巴庫，汉堡1921年版。

③ "在凡尔賽条約和其他和約中，世界資本妄想双管齐下，既通过加强剝削把战爭費用和資本主义复兴的負担加到无产阶級身上，又尽量为战胜国的利益压榨'战败'

在伊斯坦布尔——旧都的新名称——立定足跟的凱末尔，建立了一种新的独裁。在全国各地，他把共产党的結构与紀律同他自己的条件結合起来，組織了主要以軍官集团为基础的人民党，这个党对一切反对新国家和反对它本身的人都进行殘酷鎮压。他实行了一系列著名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旨在使国家行政現代化，使教育和風俗习慣西方化；只是到后来，到三十年代才鼓励工业化。凱末尔在自己的政权巩固以后，对莫斯科便逐漸冷淡，曾經由于两个革命运动之間的合作而暫时消失的俄土旧仇，这时又冒出头来。共产党經常被驅入地下，在共产国际的圈子中，凱末尔很快就以他的殘酷鎮压手段而臭名远揚。

由于凱末尔的叛乱，土耳其和协約国签訂的色佛尔条約始終未得执行，达达尼尔海峽的地位仍然沒有肯定。1922 年 11 月 20 日，英国在洛桑召开会議，同土耳其新政府以及其他有关国家討論一切悬而未决的問題。土耳其代表在 1923 年 2 月破坏了会議；几个月后，前駐君士坦丁堡高級专員安东尼·朗博耳德爵士重新召开会議，提出了一份更符合于土耳其要求的建議草案。土英之間的这种和解，特别是因为英苏关系与此同时却进一步僵化，使克里姆林宫非常吃惊。

从布尔什維克夺得政权以来，俄英之間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張，这反映在一系列事件上，而这些事件又往往加剧了紧張关系。早在 1923 年，两国外交部就在几桩这类“事件”上开始頻繁的照会往还。4 月 10 日，寇松勋爵在要求了解俄国如何劫夺英国拖网船“詹姆斯·約翰逊号”时，罵苏維埃政权是“海盗”。5 月 6 日，一个負責

国。这种愚蠢的打算是不会得逞的，这部分是因为在实际上不可能办到，部分也是因为它遭到被压迫民族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土耳其农民用手中的武器摧毁了色佛尔条約，因为这个条約威胁着他們的民族生存。”《德国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議事录》，第 409 頁。

护船的英国使館人員海·斯洛盖特，被正在追捕盗匪的苏联警察枪杀（据說是出于无意）。这一事件成为下院中一場激烈辯論的題目。在一份抗議照会中，英国限俄国十天內滿足它的賠偿要求并停止敌意宣傳和政治侮辱。事件继續发生：另一艘英国拖网船"阿斯托勛爵号"又在摩尔曼斯克海岸附近被一艘俄国炮舰劫夺；于是，英国派出一艘軍舰护航，防止俄国在三浬以外的公海上干扰英国船只。

5月10日，俄国出席洛桑会議的代表沃罗夫斯基被一个白俄逃亡者莫里斯·康拉迪暗杀。此后好几年中，这一暗杀案一直是俄国和瑞士之間爭訟的緣由。

在克里姆林宫，每一个人都等待着同英国正式决裂。5月11日，拉狄克发表了一篇紀念沃罗夫斯基的激昂演說；托洛茨基严斥英国的挑衅行为。政治局不安地等待着事件的进一步复杂化。克里姆林宫同英国內閣之間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部分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俄国答应削减它派駐近东的使館人員。另一方面，英国則否认它一直在干涉俄屬亚細亚。

承认了新土耳其地位的洛桑条約，在1923年7月24日由十二国签訂，解决了达达尼尔海峽的地位問題。以前被拒絕的土耳其的一切要求，在这里实际上都得到了滿足，特别是它的領土被允許以1914年的疆界为准，这便把士麦拿、伊斯坦布尔和东色雷斯都包括在它的版图之內。

俄德联盟

拉狄克发表施拉格特演說的用意在于，向英国政府摆出威脅姿态，表示俄德两国可能結成足以抵制英土和解的联盟，在土耳其抛棄俄国、不再同凡尔賽战胜国作斗爭以后，苏联支持正在設法打

破条約的德国的政策，便由于这种情况而更形重要。

拉狄克幷沒有把他的秘密指示傳达給德共党中央，而是对德共政治局首脑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以及他的心腹集团作了指示。布兰德勒的政策也要求遏制德国革命运动，因此，从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他和俄共政治局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当一年以后季諾維也夫譴責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在1923年危机期間消极无为，譴責他們沒有为夺取政权的斗爭作准备时，他們理直气壮地答复道，在入侵鲁尔的这一最初阶段，他們从政治局接到的一切指示都强調謹愼和統一战綫政策，布兰德勒忠实地遵循了这个綱領，因为这是他所贊成的路綫。

俄共政治局在施拉格特时期对布兰德勒所作指示的詳細內容，不論是布兰德勒或塔尔海默都始終沒有泄露。当已經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在1931年指責德国党犯了“民族共产主义”錯誤，指責它和新兴的納粹运动携手合作时，他提到布兰德勒在1923年的政策。塔尔海默作了以下答复：

“我們在1月当然預料到了鲁尔占領可能造成一种革命形势。但我們也考虑到另一个可能性，即德法两国資本家可能妥协，而当时也实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第二种可能性特别由拉狄克在《紅旗报》上作过論述……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月幷沒有預見到会发生夺取政权的革命斗爭，甚至到6月都沒有这样估計，在扩大执委会的一次6月份会議上，沒有一个字談到夺取政权的革命斗爭就要发生。这次会議的中心問題是英俄緊張关系（拉狄克为正式报告人）和英苏两国之間战爭危險的增长。共产国际主席季諾維也夫作了有关統一战綫政策的报告，他也沒有談到立即为夺取政权而斗爭的問題。”①

①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是革命錯过机会嗎？德国十月傳統和1923年

拉狄克得到“布尔什維主义的大脑”尼古拉·布哈林的支持。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党內具有一种独特的地位。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記者，因此毋需承担責任。布哈林是理論家，是列宁死后的列宁思想傳播者。他那些把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通俗化的著作，是青年共产党人的教科书，他們从他的《共产主义入門》学起，到高級阶段再接触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所有的俄国共产党人中間，布哈林最为第二国际的領袖、特别是那些具有“中派”或“奥地利馬克思主义”傾向的人所尊敬。在青年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季諾維也夫是党务操纵者，拉狄克是一个頗为可疑的政客，托洛茨基是紅軍和俄国国家領导人，斯大林是党的行政工作者；但布哈林却是抽象共产主义理論方面的开明領袖，一个在整个共产国际中沒有私敌的人。

作为一个理論家，布哈林比拉狄克更大胆更露骨地闡述了民族布尔什維主义。早在1922年11月——也就是說，在德国发生魯尔危机的前夕——他就曾提出同資产阶級結成联盟的政策。

“在貸款和軍事联盟之間并无原則区别。我敢肯定，我們〔也就是苏維埃国家〕現在已經强大到足以和一个資产阶級国家結成軍事联盟，以便利用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帮助来打垮另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在一个已經締結这样一种軍事联盟的国家中，帮助这种联盟获得胜利是我們同志的責任。”①

除很少几个人而外，在出席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看来，布哈林的这篇演說似乎都是对遙远可能性的抽象推測，几乎沒有一个人把这些理論同德国的实际形势結合起来。不过，在三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布哈林提到“苏維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发

的眞实历史》，柏林1931年版，第20頁。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議事录》，汉堡1923年版，第420頁。

表公开宣言，对“已被战敗和征服”的德国表示同情。布哈林强調說，为保卫德意志祖国不受协約国帝国主义蹂躪，根本沒有排除共产党和資产阶級結成民族統一战綫的可能性。

“当已被战敗和征服而淪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德国抵抗战胜者协約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維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通过发表宣言、声明等等，公开表示它对德国的同情。当时，共产党考虑过保卫德意志祖国不为战胜者协約国帝国主义所蹂躪的問題。”①

这种論調得到布哈林的追随者尤金·瓦尔加的应和：

“有两条不同的斗爭路綫存在。一条是无产阶級革命路綫，另一条是資产阶級路綫。德国共产党竭力为革命路綫而斗爭。如果实行了这条路綫，消极抵抗就会由一个工人政府来領导。这个政府通过向法国的工人群众和小資产阶級群众呼吁，就会粉碎法国的反德联合陣綫，使民族抵抗成为全体德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級的共同使命……

德国战敗后不久，协約国便迅速使它殖民地化，或者像《巴黎回声报》正确地描述的那样，使它‘巴尔干化’。”②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当討論到共产国际綱領（布哈林是这个問題的主要报告人）时，这种苏联-資产阶級联盟論又被提出。

在俄国政治局的所有成員中，对于实行这种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政策，以季諾維也夫表現得最迟疑、最不热心，态度也最不明朗。他写了許多有关1923年各种問題的文章和小册子，但他从沒有走得像布哈林那样远。他对凡尔賽条約签訂以后德国形势的分析，当然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綫是一致的，但他并不想重新解釋德国

① 《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1月，第130号。

② 巴甫洛夫斯基（瓦尔加）：《市民德国在鲁尔冲突中的失敗》，載于《共产国际》，彼得格勒，1923年，第26期，第96—106頁。

資产阶級的作用。他所强調的主要是爭取中产阶級和农民的必要性。

可是，对于年輕的德国共产党人来說，布哈林和拉狄克的干預却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使共产国际早期代表的傾向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轉变，恢复了曾导致工人阶級在战时支持德皇的工人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以前，德国工人阶級內部的民族主义潮流已經为国际共产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所打断。对国际共产主义者来說，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协約国，而是德国軍界、总参謀部、志願团、黑色国防軍，以及他們在大企业中的主要支持者司丁尼斯、提森、克勒克納之流。現在，拉狄克和布哈林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却打乱了这一过程，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內部造成了一种德国民族主义的新潮流。

新政策在党內引起了爭执。在左派的亲密小圈子里，这种政策受到斥責，被认为非常有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德国党公认的理論家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受拉狄克委托，負責向党員們介紹新政策。热心的塔尔海默甚至比布哈林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讲的还要过分。他埋葬了已經在1918—1920年內战中被最后击败的德国无产阶級革命。他居然說古諾政府是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博学的塔尔海默对古諾作出这种惊人評价的根据是，古諾同俾斯麦据說有相似之处。

“在違背它自己意願的情况下，德国資产阶級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是革命的，至少暫时說来是如此，如果打个比方，可以說同它在俾斯麦时代(1864—1870)的情况很相似。德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在1848年的失败，曾迫使霍亨索倫王朝承接德国資产阶級革命的任务。”①

---

①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鲁尔冲突的基本問題》，載于《共产国际》，1923年，第

在俾斯麦这块金字招牌之下，塔尔海默向年輕一代的共产党人解釋了德国大企业的双重作用。得到古諾、司丁尼斯一伙人支持的魯尔战爭具有双重性质。就它是一个被解除武裝和被剝削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者、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范圍而言，它在“客观上是革命的”。

德国能否被当作一个“未来的帝国主义强国”看待呢？“今天是不能这样做的。”德国已經被战敗和解除武裝，目前正面临着被瓜分、在政治和經济上被奴役的威胁，只有从“純理論的角度”出发，才能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帝国主义强国。“今天，德国幷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主体，而是这种政策的对象。”

塔尔海默的文章譯成其他文字以后，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引起了騷动。同德国反对派合作的两个捷克共产党人，批評了对共产主义理論的这种修正。阿洛伊斯·諾伊拉特提出的問題，“塔尔海默同志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塔尔海默忘記提到从他的命題应該得出的結論了。”諾伊拉特給塔尔海默留下一个台阶，好像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似的。

“这种命題必然会导致什么結論是显而易見的〔諾伊拉特写道〕。德国无产阶級必須首先支持德国資产阶級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爭。它必須同古諾、司丁尼斯之流‘暫时’締結一項国內和平条約，也許口头上幷不这样說，但事实上却是这样做……目前，已經有一部分工人阶級开始为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潮流所影响，这是向他們这部分人的情緒作让步的危險开端。”①

除这篇文章以外，季諾維也夫还刊登了另一篇討論同一問題

26期，第107—110頁。

① 阿洛伊斯·諾伊拉特：《一个可怀疑的論据》，《共产国际》，1923年，第26期，第110—113頁。

的論文，它的作者是另一个捷克人約瑟夫·索默尔。正是他鼓励了諾伊拉特和索默尔著文攻击塔尔海默的。这样，同一杂志的两位編委，俄国的两大領袖便下起一盘棋来，拉狄克用塔尔海默当小兵，季諾維也夫則以两个捷克人做小卒。

納粹的先驅

拉狄克論施拉格特的演說在德国得到巨大反响。年輕的共产党人、年輕的民族主义者、軍官、民族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等等，都开始討論"施拉格特路綫"。共产党人組織了若干討論小組，让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聚会一堂，討論在德国組成反法統一战綫的必要性。

同拉狄克意見一致的德共政治局，对党的組織工作者发出如何实現施拉格特路綫的指示。它的一份关于如何在民族主义軍官中展开宣傳的傳閱文件这样写道："和軍官們讲話时要非常有礼貌，非常和藹，要称呼他們'閣下'。"各地党支部接到指示，要組織学生小組、① 民族主义青年小組，和"資产阶級"建立各式各样的联系。"把宣傳火力集中在施拉格特路綫上，"这就是党的命令。一个共产党議員雷梅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說，"法西斯主义者和工人都热烈鼓掌"欢迎。② 共产党发言人宣称，"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团結起来的日子已經不远了。"③

---

① 在柏林党支部組織的一次柏林大学学生集会上，我担任讲演人。会上討論到民族主义者反对資本主义的态度，我不得不对某些反犹太言論作回答。我說，只有在一切資本家，犹太的和非犹太的都包括在內，成为同一攻击对象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才贊成向犹太資本家作斗爭。在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版物中，这个插曲曾被多次引证和歪曲。

② 《紅旗报》，第183期，柏林，1923年8月10日。

③ 《柏林日报》，第69期，1924年2月9日。

拉狄克亲自带头，在1923年7月編排了一期以“德国的道路”为题的《紅旗报》专刊，在这期专刊上，他本人、雷文特洛夫和阿尔图·默勒·布魯克討論了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前途問題。拉狄克論施拉格特的演說刊登在头一版。雷文特洛夫主办的周刊《德国前卫》发表长文回答拉狄克的建議。默勒·布魯克在他的杂志《良心》上討論了民族布尔什維主义。一个月后，也就是8月22日，《紅旗报》发表雷文特洛夫另一篇题为《道路之一段》的文章和保尔·弗勒利希的回答。“无論什么人向我們靠攏，只要他不是别有用心，”弗勒利希写道，“我們都乐于同他并肩前进。”雷文特洛夫郑重地問弗勒利希，俄德两国是否有可能合作——他曾經认为这种合作在俄波战爭时最有可能。“你是否认为这种机会已經永远消逝了？”“不，我不这样想。”

1918年的大崩潰标志着一种类型的德国民族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保守派和帝制派的民族主义。1918年的革命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它在若干年后，将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称震撼全世界。納粹的先驅多得难以計数，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已經試驗了其他許多种德国新民族主义。在这些前国家社会主义的和无組織的思想流派中，救世狂人們的种种不着边际的想法，开始停留在泛欧亚主义上。

默勒·布魯克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納粹先驅，特勒尔奇所說的“知名的反革命作家”。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的主要兴趣是美学和文学，曾經翻譯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918年以后，他在自己的周圍聚集了一批年輕的民族主义者；正是他創造了“第三帝国”这个名詞。根据他的政治見解，世界各国可以分成貧富两大类。德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无产者。他宣称，如果德国能赢得可以使其人民进行总体战的革命，它就能把大战中的失敗化为胜利。

对默勒·布鲁克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其他鼓吹者說来，年輕的俄国苏維埃政权这一“神秘”現象具有不可思議的吸引力。1918年战败的俄国，曾在德国的逼迫下签訂同凡尔賽条約十分相似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它退出了协約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孤立。但是，尽管如此，俄国現在却已經从苦难深重的境地中站起来，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現于东方，正在組織一支新的軍队，展示一种进攻性的战斗精神。

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件事实十分敏感，即共产国际和国联相反，它所使用的官方語言是德語。他們并且拿欧兹伯格部长在凡尔賽的温順态度，同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寸步不让的大无畏表現相对比。

1919年，在进軍里加討伐布尔什維克恶魔的时候，志願团的青年“雇佣兵”恩斯特·馮·扎洛蒙突然感到了怀疑：

“在这种痛苦的黑暗处境中，我們在干着什么呢？在我們身后，沒有人民，沒有帝国。在我們前方，一支巨大的新兴力量正在形成，那里的人們意志坚强，同心同德，一种独特的信仰加上铁的手腕，已經把那些目不識丁的农民和工人从烏合之众訓练成士兵，使那些堕落的亡命之徒有了一个宗教和灵魂……在国境綫那一边，兴起了一支尚未定形但已日益强大的力量，它擋住了我們的去路，使我們又佩服又憎恨。”①

① 恩斯特·馮·扎洛蒙：《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第66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恩斯特的兄弟布魯諾·馮·扎洛蒙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員会”的墨西哥城支部中非常活跃，这个組織在1943年成立于莫斯科，其創建人有共产党人埃里希·魏納特、俾斯麦的曾孙馮·艾因济德尔男爵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軍軍长瓦尔特·馮·辛德利茨将軍。墨西哥城委員会的两个著名領袖，是共产党工会活动家保尔·梅尔克尔和出身于德国封建世家的阿尔諾德·維特·馮·果尔塞瑙，后者以路德維希·雷恩的笔名著称于世，是一个共产党作家。他們两人都在1946年返回东德。

內战在德国人中間造成的分裂是如此深刻，阶級仇恨是如此剧烈，以致德国不可能重新組織起一支得民心的軍队和准备复仇战爭。如果說民族得救取决于一場反西方的战爭，这也只能在緩和国內社会矛盾和德苏关系以后才能实現。因此，拉狄克从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出发对雷文特洛夫提出的建議，在这种形势下得到了热烈响应。要反对帝国主义，軍队必須同人民合作；要反对西方，德俄两国政府必須达成諒解。拉狄克对德国民族主义的这种为难处境非常了解，也非常清楚他所要打动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在自己的一篇报告中写道："德国国土上所呈現出来的，是一幅进行着形形色色內訌的图景：……秘密組織、地下法庭、政治暗杀团、从消极抵抗——这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典型行动——到公开的內战……德国是一个杀人犯的魔窟。"

1918年以后，从杀害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开始，暗杀政敌成了德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长期性特征。当秘密法庭把两名部长列入它的牺牲者之中时，它的恐怖統治达到了猖狂的頂峰。他們是签訂凡尔賽和約的財政部长馬蒂阿斯·欧兹伯格和力图执行条約規定的外交部长瓦尔特·腊特瑙。秘密法庭把他們两人都暗杀了，欧兹伯格在1921年8月被害，腊特瑙在1922年6月遇刺。①

① 欧兹伯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議会批准凡尔賽条約的那一天，"若干国防軍成員企图暗杀我，可是未能如願。几天以后，有人向我在財政部的办公室扔炸彈。一顆手榴彈炸坏了行刺者认为我正在里面睡觉的房間。第三次行刺我是在毛比特，当时我显然有上帝保佑；我只受了一点輕伤……"見馬蒂阿斯·欧兹伯格：《世界大战見聞录》，柏林1920年版，第383頁。可是，1921年8月26日的第四次行刺却成功了。这一天，当欧兹伯格正在黑山林作徒步旅行时，他在十二顆子彈下——这是懲治叛徒的一种傳統方式——殞命。

1946年11月25日，在布莱斯戈河上的弗賴堡，暗杀欧兹伯格的凶手海因里希·提雷森，为二十五年前的这桩旧罪行在德国法庭上受审，結果根据各种法律理由被宣布无罪，其理由之一就是1933年的大赦也对他适用。法庭在宣判时宣称：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提雷森已經同他以前的行为断絕关系，現在是一个道德品质很高的公民。归根

秘密买卖軍火之風在大多数德国組織中都很流行，国防軍拥有許多处于赔款委員会监督之外的秘密仓庫，黑色国防軍和共产党都买卖和私藏枪枝彈药。这些“旅行步枪”流通于整个德国。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常熟悉黑市供应武器情况的专家便应时而生。这些专家有的是民族主义者，有的是共产党人，但时常在同一个咖啡館院子里碰头，在最能避开赔款委員会和警察耳目的小村鎭上一道搞非法活动。在全国各地，施拉格特路綫促成左右两派搜罗步枪和机关枪的专家建立了許多私人間的联系，发生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同时代的观察家瓦尔特·措伊彻尔談到过共产党方面的这样一位专家：“他通过法西斯集团中的各种关系和朋友弄到武器，他們以比較低廉的价格把大量武器卖給他。”① 同样一批步枪时常被卖給党中央好几回；如果只是草草檢查一下，步枪总是步枪，又能看出什么破綻来呢？②

消灭叛党分子的組織——共产党的一种秘密法庭——便从这种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措伊彻尔还讲到过这样一項計划，按照这个計划，将利用一个姑娘把叛徒誘入陷阱——柏林弗里德里希森林公园附近的一座小教堂里，用一个沙袋把他打昏，再給

結柢，他之所以要暗杀欧兹伯格，是出于一种——用法庭的話来說——爱国主义的激情，希望能使德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法占区的司法监督机关，即設在腊斯塔特的总法院，对这一判决提出抗議，要求重审。（参看《新苏黎世报》，1946年12月4日。）

①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組織工作》，柏林1931年版，第71頁。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也普遍流行私藏武器的买卖。发生于法国的一个插曲，可以典型地說明这种情况。內政部长爱德华·德普勒承认，人們时常謠傳的秘密武器庫确实存在。1947年3月初，一个拥有四十挺机关枪、大批手榴彈以及其他武器的人被捕；他既是戴高乐派联盟的成員，又属于共产党的一个游击組織“义勇軍与游击队”。他的这些武器卖給出价最高的人；而在各式各样的假文件、各种不眞实的控告和反控告的一片迷雾中，要探寻出它們的下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参看《紐約时报》，1947年3月18日。）

他注射一針毒药。

另一方面，共产党地下組織继續进行它的傳統的秘密活动：在軍队和警察中搞破坏，对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恐怖突击队施加恐怖主义的报复等等。这些活动同拉狄克和德国反革命分子之間的外交活动互不相关。在街角上，德国的普通工人用匕首和手枪，有时也用步枪同“法西斯匪徒”作战。在德国各地，到处都发生騷乱和冲突，許多无名的牺牲者在这种內战环境中倒了下去。这些共产党工人并不太明白党的上层領导者正在干些什么，虽然領袖們的那些奇怪理論使他們有些感到不安。党的所有支部都向布兰德勒委員会施加压力，要求它更有力地向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爭。关于納粹集团日益加强武装、关于这些組織正在紧張地进行准备、关于必須更有力和更有效地向它們作斗爭的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23年这一年，一般的下层共产党員都本能地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反对新兴的納粹主义这一斗爭上。他們对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議会联合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对于有关俾斯麦的历史分析、有关古諾和司丁尼斯之流在客观上的革命作用的历史分析等等，則完全漠不关心。

布兰德勒开始写文章猛烈攻击法西斯主义者，并且以同样的精神指示党报編輯。“只要遇到法西斯分子，就給他們一頓痛击，”他在《紅旗报》上写道。1923年7月29日被預定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日”，根据季諾維也夫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該項决定是在克服拉狄克的反对后作出的。在季諾維也夫的发起和鼓励之下，这是下层党員对党和法西斯主义者合作和采取消极被动态度日益感到不滿的結果。

第三部分　1923年的共产党暴动

第十四章　古諾罢工

1923年春季和初夏，魯尔危机越来越接近高潮。通貨膨脹使經济生活完全解体；外汇官价銀行每星期只挂牌两次，黑汇交易空前活跃。企业家要求政府批准他們印发本单位“救急通貨”的申請书，成千上万地堆在德国財政部长身边，而不少市議会則已确实开始发行这样的通貨以支付公务人員的薪金。在6月，一英鎊値五十万馬克，到7月便增至一百五十万馬克，到8月，一英鎊竟可換取一亿二千万馬克。

中产阶級的下层受到的打击最重，紛紛破产。“生意照常”是一句莫大的謊話，就小商人和农民說来尤其如此，因为他們卖出的是有价値的商品，拿到手的却是无价値的紙币。因此，尽管这一年丰收，农戶仍然死抱住他們的收获物不放，从而加重了工业区已經危險的粮荒。

經济生活的这种解体危及魏瑪共和国的法律結构。公务員同国家丧失了联系；他們的菲薄薪金絲毫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日常需要；他們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条失去方向舵的船上。同情騷动者的警察，失去了鎭压反饥餓示威的战斗精神；对于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破坏小組和秘密軍事組織，他們也熟視无睹，不加过問。汉堡是如此紧張，以致警察都不敢对饥民搶劫食物进行干預。8月，汉堡港碼头工人的大規模示威导致騷动。措伊彻尔写道，“不小一部分警察被視为不可靠；他們同情工人阶

級。"[1] 古諾政府由于支持黑色国防軍和挑唆魯尔的破坏活动，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法律地位。

內战在酝酿中

来因-魯尔和巴伐利亚的脫离运动有了新的高漲。魯登道夫將軍感到决定大局的时刻即将到来，在慕尼黑非常活跃。他继續給予帝制派以有条件的支持，另一方面則开始同正在兴起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者軍事組織"——納粹运动当时的名称——結成联盟。从1918年以来，逃亡到荷兰的霍亨索倫王室第一次眞正有了希望，有可能在魏瑪共和国崩潰后复辟。他們派遣数以百計的信使分赴德国各地，加紧同軍队和实业界搭上旧关系。

在1923年夏季的这最初几个月中，希特勒的名字开始傳播到慕尼黑以外。巴伐利亚邦政府公开反抗中央政权，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宣布独立。巴伐利亚的这种分离主义得到法国政府贊助；某些法国联絡人甚至和希特勒的組織取得联系。[2]

7月間，来因-魯尔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也达到新的高峰。到处謠傳分离派領袖之一約瑟夫·施梅茨将要求国联承认魯尔共和国。工会(包括来因区的工会在內)揚言：如果魯尔宣布独立，它們就将以另一次总罢工相抵制。魯尔和来因区的天主教士吁請庇护教皇用他拥有的一切手段阻止来因-魯尔脫离德国。

7月13日，以参加卡普暴动叛国罪等待受审的埃尔哈特上尉逃出来比錫监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庆祝了这一

---

①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組織工作》，第10頁。

② 这类联系的某些細节，在7月初审判戏剧評論家格奥尔格·富克斯和作曲家-音乐指揮胡果·馬赫豪斯的叛国案时被揭露，参看富克斯：《我們这些囚徒：2911号单身牢房的回忆》，慕尼黑1931年版。

件“民族功績”，接着又举行了一系列向旧軍队致敬的示威。魯登道夫宣布了他的新口号，“跟着上帝，为了人民和自由！”。这同帝制派的口号“为了上帝、德皇和祖国！”大为不同。他并且开始发动一个为“民族殉道者”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树立紀念像的运动。

在这种謠言蜂起，到处風傳德皇即将由荷兰归来、巴伐利亚即将叛变、来因区即将脫离德国等等的气氛中，工人阶級的反抗日益加剧。工会領导者大为恐慌，害怕出現一种他們无法控制的局面。他們不断地（例如在5月25日和6月1日）催促共和国政府同法国达成协議。社会民主党在每周一次的声明中一再指出通貨問題“必須解决”，政府也总是作出解决它的保证。但是，德国全国进出口貿易协会却反对一切有計划地控制外汇的企图，认为这会危及自由企业精神。

工資与薪金同經济現实完全脫了节。古諾政府要按黃金征税；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对“实际价值”实施資本特别征税；工人則继續要求把重工业收归国有，从而威胁到政府本身的存在。共产党人当眞把次維考附近的一个煤矿占領了几天。他們宣布将自行經营煤矿，但很快便被党中央委員会逐出。在柏林、德累斯頓、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曼海姆、科隆等地，搶面包騷动已成为司空見慣的事。

与此同时，法国人加紧了他們对来因-魯尔的控制。巴門市被課以巨額罰金；波鴻的化工厂被占領；埃森附近的矿山和来因河-易北河运河旁的炼焦炉被夺取。8月初，协約国最高委員会在賠偿煤未能照規定运出后，下令夺取占領区的矿山。民族主义破坏团加剧活动。在8月头几天，当有人向杜塞尔多夫的法国軍队投擲手榴彈时，法国人把該市的德国警察局长逮捕。民族主义者于

是以重新在城內投彈相回答。法国人大肆逮捕，对被捕者判处重刑，但是并不能制止破坏者的活动。在同几周內，埃森和許多其他城市也发生类似事件。

到7月末，古諾內閣便已瀕临崩潰边緣。国內外都认为它即将辞职，并且不认为它的继任者将只是另一个議会組合。人們期待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人們认为这种变化早就該发生了。

改良共产主义对党的下层已不再有任何吸引力。1923年夏季，地方組織紛紛为更激进的分子所掌握，这是一些十六岁就被送上前綫的青年工人。他們从前方归来，結了婚，始終囊空如洗。他們在十六岁便扔过手榴彈，十七岁参加和平示威，十八岁投入罢工和內战。巴伐利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向紅色的薩克森进軍，是一种眼看就要发生的危險。法西斯組織每天在工人居住区进行的襲击，使工人的憤怒情緒达到頂点。工人們愈来愈感到难以忍受，每天都有可能爆发大規模的冲突，各工业中心对所有負責領袖消极无为的危險态度极其不滿。

一般共产党人开始越来越致力于建立軍事編制。党的保安机构已經为“紅色百人团”即一种由精力旺盛的斗士組成的突击队所代替；对于党的下层来說，当前的任务就是立即扩大这种軍事計划。紅色百人团的組織旨在把非党同情者拉入支持党的行动中。工会主义者、中央党党員、共济会会員和热情的天主教徒，都为它們所欢迎。它們按照各自所屬的工厂取名——例如西門子百人团、鮑西格百人团等等。

在組織百人团的問題上，党內的冲突发展得十分激烈。对党員群众来說，紅色百人团是1918年的工人委員会在新形势下的再現，他們意識到，通过这类地方組織的武装部队，他們也許能找到

摆脱柏林和莫斯科紀律束縛的方法。布兰德勒的“A B 政府”(即工农政府，在德文中，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名詞的开首字母分别为A和B)口号，在左派共产党人中得到的响应很有限。另一方面，中央委員会則力图把百人团变成仅仅搞一些宣傳活动的机构。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右派共产党人試图树立一种改良共产主义政策的范例，把他們的活动集中在“限价委員会”、家庭主妇与失业者委員会、消費者委員会等組織上来和通貨膨脹进行斗爭。这些委員会同工厂委員会統一行动，他們打算使这两类組織都成为邦政府的永久性經济諮詢机构。在組織这两类包括了全体工人并且可以吸收中产阶級和农民的团体时，右派希望能为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議会制工人政府創造出群众基础。通过这种积极措施的实际后果，这个示范性地方政权将会吸引大多数工会主义者实行同样的政策，从而为全德国的議会制工人政府創造条件。他們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发性委員会合法化；工厂委員会将合并成一个“雇員委員会”，这是一个专門处理劳工問題的常設諮詢机构，它的地位以后要通过立法手續固定下来。由此看来，改良派共产党人也打算使旧的工厂委員会概念适应于新的环境，但却是按照他們对鲁尔危机的理解来这样做的。

社会民主党人对警察的控制，妨碍了紅色百人团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发展。地方政府不想由于容忍激烈的百人团运动而加剧它們同共和国政府的冲突，因此，在这几个邦里，百人团变成了正規警察的輔助組織，配合他們同黑市商人作斗爭。在这些地区，百人团从沒有达到过它們在已被占領和沒有了法律的来因-鲁尔区那样的声势。

1923年3月末在薩克森成立的第一届蔡格納政府，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多数为基础，但并沒有共产党部长入閣。商

店主們經常担心发生搶劫和騷动，不断呼吁邦政府为他們这种成天提心吊胆的处境設法。企业組織向共和国政府抱怨薩克森的情况，訴說工厂面临威胁，将会由于破坏活动而受到巨大损失。限价委員会和蔡格納政府定期举行会議，但是从沒有取得任何成績，因为薩克森政府无权过問共和国的經济。这些委員会担負的任务、即想控制脫繮野馬似的物价，是不可能完成的，它們所能做的頂多是組織一些抗議集会，以及通过对杂貨商个人采取联合行动，試图对上涨的物价作某些限制而已。委員会的全部狂热活动只收到一个成效——大赦政治犯和小偷。

汉堡和柏林的左派共产党人，认为蔡格納政府同限价委員会和工厂委員会之間的这种合作，只会对工厂委員会运动的革命潜能起一种抑制作用。在他們看来，共产党人支持的薩克森社会民主党政府，与其說是帮助、还不如說是阻碍了工会同共产党工人結成反对古諾內閣的統一战綫。在柏林和汉堡，百人团和限价委員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两个主要工业区，政府甚至对由下而上进行干預的形式都表示反对。在这里，“有組織的无組織群众”的自发活动，时常发展为小規模巷战。

在东普魯士，由共产党領导的一次农业工人罢工迅速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規模，参加罢工者达十二万人。这次罢工使得过渡中的德国已經够复杂的局面又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在此以前，农业工人一直是沉默的，对事件不发生影响。1918年以后，正式的农业工人工会經历了一次重大危机。艾伯特政府首批通过的法令之一，就是宣布农业工人有权組織工会，而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們并沒有这种权利。农业工人工会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在1920年，它拥有八十六万名会員。可是，到1923年，其会員数目已經下降为十五万人。各种反对派的农业工人工会相继成立——例

如德国农林业工人工会，在此期間就曾举行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种民族主义集团也开始为它們在农业工人中的影响而斗爭。

在馬里恩威德和皮尔卡倫地区，罢工特别激烈，派去保护大地主的警察和"特諾"① 輔助部队遭到枪击。产业工人对这些农业工人表示极大同情；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一道开会，成立联合小組。在东普魯士的罢工以后，麦克倫堡、波美拉尼亚、布兰登堡、馬格德堡、黑森-卡塞尔和来比錫附近，也相继发生規模較小的类似运动。在馬格德堡，当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逮捕了罢工委員会全体委員时，他遭到社会民主党下层党員的反对。馬格德堡的农业工人号召該地区的工人声援他們，产业工人以自己的罢工作为回答。在麦克倫堡的戈德貝格，农业工人夺取了民族主义者暗藏的武器，向大庄园主的住宅进軍，威胁着要逮捕他們，并且进一步搜索民族主义分子暗藏的武器。

在市議会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議員处于失业者和最貧苦工人阶层的强大压力之下。人們掀起了申請的浪潮，要求供应儿童免費牛奶、設立公共食堂、分发衣服和煤炭、延期繳納房租等等。有三百个以上的市議会——其中包括大約七千名共产党議員——通过了批准这些請求的議案。共和国官員干預这些地方性活动的企图，一般都沒有效果。靠近埃森的一个小市鎮罗特豪森，为它的居民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內容无所不包的救济措施，結果，普魯士政府急忙派遣一个代表到那里去防止"社会主义"；邦政府代表通过把該鎮并入埃森市的办法，才算除掉了这个共产党政府。

工厂委員会对工会

通貨膨脹使德国工会发生了它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一般

① 原文为"Teno"，可能为"民族主义恐怖組織"的縮写。——譯者

工会主义"的一切工資政策，都由于經济解体而变得毫无意义。

1918年以后，德国发生过的罢工有两种：一种是內战时期所特有的自发罢工，另一种是工会領导的正式罢工。后一种罢工只是在經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开始，并且謹愼地恪守合乎宪法的路綫，遵循着卡尔·列金在十九世紀末发展起来的傳統。工会通过周密的准备，領导这类罢工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1918年以后，这些胜利主要是依靠它們同共和国中央和邦政府协調行动而取得的)，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可是現在，工会在漫长的年代中贏得的地位，却由于1923年的通貨膨脹而在几个月內全部丧失。

通貨膨脹对工会的一个特殊影响，涉及到地方上的工会組織者，保守的劳工政策在工厂中的支柱。这些地方領袖都是来自工作台畔的工人，以他們本行的特殊技术出人头地，但在行为和思想上却能代表一般工人。他們的报酬不多，但是在疾病和殘廢保險方面得到某些照顾，并且有希望在做了几十年工作后得到退休年金。然而，通貨膨脹不仅使他們的工資丧失了购买力，而且粉碎了他們那种生活可以无忧无虑的幻想，因此，大多数工会下級干部本身这时都开始鼓吹革命变革。1924年初，在風暴已經过去以后，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官方公报对这段时期的情况作了以下总結：

"德国政府拥有鎮压暴动的非常权力，但它只用这种权力来对付左派暴动主义运动。共和派工人感到气憤的是：一方面，軍事机器被用来撤換薩克森政府，封閉社会民主党的报紙，在图林吉亚建立独裁政权；另一方面，埃尔哈特的武裝匪帮却逍遙法外……在1918年以后被我們爭取过来的这数百万人中，已經有好几十万人离开了我們，因为貧困和匱乏摧毁了他們对工会的信仰。"①

① 《黑色的一年》，《工会新聞》社論，1924年，柏林，第34期，第1頁。

对工会来說，工厂委員会的地位問題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他們过去尽量縮小这类委員会重要性的努力中，工会官僚曾經設法使工厂委員会从属于官方工会組織，从而赢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委員会和工会組織者之間的斗爭从来也沒有完全中止过。随着通貨膨脹的发展，工厂委員会开始在代表工人向企业主提出要求方面再次带头。工会方面領取工資的专职干部力图把这种活动包攬在自己手上，但却被志願出面的委員会領袖代替了，因为工人更信任他們。

在同工会公开进行的竞爭中，工厂委員会开始組織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代表大会。这种冲突在选出十五人委員会时达到高潮，該委員会由全国各地的工厂委員会代表組成，总部設在柏林。

一个値得注意的特征是，人們有意識地避免了“苏維埃”这个字眼，这样做部分是由于1918年德国苏維埃組織的軟弱和沒有效率，已經使它名誉扫地，部分也是因为人們对俄国苏維埃的批評和不信任日益增长。每当共产党人試图提出德国苏維埃的口号时，他們在工人中間总会遇到强烈反对。工厂委員会有意識地以下列方法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方面，它們把自己說成是眞正德国式的工厂組織“工厂代表委員会”的后继者，另一方面，它們又使自己和那个曾在世界大战最后一年为推翻帝国政府作准备的运动傳統結合起来。

从1918年以来，一个处于政党和工会之外的工人組織第一次变得越来越得人心。与此同时，工会的势力削弱了；德国工人联合会到1922年年底还拥有七百八十万人，1923年間便下降为五百七十万人。①

① 《工会新聞》，第34期，第400頁。

在1922年底被列为雇員的一千八百万德国人当中，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万人是根据

紙币印刷厂的罢工

通貨膨脹使得平常要求增加工資的罢工变得毫无意义，通貨危机大大减少了工会的一切斗争。① 在通貨膨脹的紧急时期，斗爭时間必須很短，因为一过几天，它們的目的就会失去实际意义。1923年間，沒有取得結果的罢工次数要比前一年高得多；許多次斗爭不得不在达成协議以前被放棄。

集体合同被雇用的。在这些人里面，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分别組織在下列各工会中：德国工人联合会（簡称ADGB）、基督教工会、希尔施-邓克尔工会（由两个名为馬克斯·希尔施和弗兰茨·邓克尔的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会竞爭而建立）以及白領工人的全德自由工会。

1922—1923年德国工人联合会（ADGB）会員人数

年度	季度	会員数	增减	百分比
1922	I	7,810,133	+ 58,544	+ 0.8
	II	7,883,906	+ 73,773	+ 0.9
	III	8,068,938	+ 185,032	+ 2.3
	IV	7,821,558	− 247,380	− 3.1
1923	I	7,427,638	− 393,920	− 5.0
	II	7,287,049	− 140,589	− 1.9
	III	7,039,059	− 247,990	− 3.4
	IV	5,749,763	−1,289,296	−18.3

① 通貨膨脹时期罢工和閉厂停工的情况如下：

年度	次数		参加人数（以千为单位）		損失工作日（以千为单位）	
	罢工	閉厂	罢工	閉厂	罢工	閉厂
1899—1913*	1,885	229	406	61	5,291	2,716
1919	3,682	37	2,725	32	32,464	619
1920	3,696	114	1,916	91	15,444	1,311
1921	4,093	362	1,818	202	22,596	3,278
1922	4,348	437	2,241	220	23,383	4,351
1923	1,878	168	1,752	119	11,014	1,330

* 每年平均数（《工会新聞》，第34期，第392頁。）

随着通貨膨脹的日益发展，国家印刷局印发紙币的速度赶不上形势需要。为此，特地設立了輔助印刷工場；国家銀行保证到8月4日供应給所有的人以足够的紙币。同一周內，国家印刷局中的共产党小組使紙币危机达到最高潮。这些印刷工人平日本来是有节制的保守派典型，这时却决定把德国的命运掌握到他們手上，从它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紙币印刷机方面打击古諾內閣。他們举行了罢工，成心要推翻古諾內閣，为全国范圍的叛乱点起信号。正如印刷工人們所預料的那样，他們的行动瘫痪了国家机器。紙币儲备在几小时內便全部告罄；不論是对公务員或其他任何人，都付不出任何工資。

印币工人的行动激起了8月10日的一次群众性罢工，罢工迅速呈現出內战形式。柏林的交通全部停頓；有限的煤气和电力只供应紧急用途；发电厂关閉了，切断了供应德国重要工业部門的电力。

在柏林工人的压力下，該市工会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議，討論是否批准已經在柏林地区全部实現的罢工。假如首都的工会理事会批准罢工，德国工会联合会和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就会給予罢工以全力支持，从而使人們早就盼望的工人阶級統一战綫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但它当时却沒有作出批准。理事会开会时邀請各社会主义政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第一次在被邀請之列；这一非常步驟本身就表明了工会主义者当时的情緒。奥托·韦尔斯、保尔·赫尔茨和魯道夫·布賴特夏德代表社会民主党；奥托馬尔·盖什凱、弗里茨·赫克尔特和作者本人代表共产党。这是一次戏剧性的会議；德国工人阶級和德国的命运，又一次被放到了天平上。討論是熾烈的。古斯塔夫·扎巴特，一个典型的柏林老工会領袖，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全部老工会官僚，几乎就要支持罢工，但

是受到了政治領袖、社会民主党人韦尔斯的抑制。这样，就和卡普暴动时期一样，工会領袖再次表現出他們比社会民主党更能判明局势和采取有效行动。卡尔·列金的这些学生和信徒固然继承了他的缺点，但也具有他的政治常識和行政才能。假如工会領袖曾經支持罢工，古諾的继任者就会是一个工会活动家；那样，德国就会有一个工会政府，支持着它的工人战士有能力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8月10日，共产党人在議会中提出一項不信任案。11日，古諾辞职。这时，柏林的罢工已經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发展到了德国中部、瓦塞康特、来因兰、斯图加特、上西里西亚、图林吉亚和东普魯士，其規模只有1919—1920年的大罢工可以相比。許多城市中发生騷动；8月11日，在汉堡、格尔曾基尔亨、克勒菲尔德、阿亨、来比錫、德累斯頓和腊契布，有三十五名工人被杀，一百名受伤。8月12日，哈諾威、罗特豪森和格尔曾基尔亨发生反饥餓騷动，有三十多名示威者被杀。同一天，古斯斯夫·施特雷澤曼組成新內閣，閣員中有四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中由魯道夫·希法亨担任財政部长。

外国观察家一致认为：社会革命的威胁在德国指日可待，几天以后就会最終决定大局。显得最荒謬的是，相信德国不可能走向革命的唯一集团，竟是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决心向前挺进的工厂委員会，从它們的共产党領导人那里遇到頑固反对。布兰德勒中央委員会被运动的气势吓倒了，它那套在魏瑪宪法范圍內有組織地謀求进步的改良共产主义时間表，已經完全为这一运动所打乱。假如罢工继續下去，它就显然会发展成为內战，而結果就不会仅仅是以另一个仍然保存議会制的联合內閣来代替施特雷澤曼政府。

罢工开始以后，中央委員会便离开党在罗森特尔街的总部，只

留下几个不重要的工作人員在那里負責看守，它本身則轉移到了一个地下本部。这一愚蠢行为——在罢工当中，本来是誰也不敢触犯共产党中央委員会的——只能妨碍首都和外省之間的联系。中央委員会派弗里茨·赫克尔特从柏林指导罢工，指示他必須把罢工限制在經济要求上，并且要尽可能快地使之結束。布兰德勒堅持停止罢工，因为它并沒有得到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正式批准。柏林党組織和布兰德勒截然相反，要求把許多地方性的罢工統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反对古諾內閣的运动。左派的理由是：在最初阶段，工会領袖可能不肯正式批准，但以后将不得不在事实上贊同和屈服。关于如何爭取工会正式支持的这一討論，是以对整个政治危机的相反理解为基础的。

地方党委会等待来自柏林的命令。它們希望避免同軍队孤立地发生冲突，准备等到被认为是掌握在中央委員会手上的武器分发下来以后再行起事。这种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統一行动和遵守軍事紀律的观念，在下层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是根深柢固的。全党相信，中央委員会在俄国金錢和俄国国家机器的帮助下，已經暗中儲备了大量武器彈药，只要莫斯科和柏林的最高总部一声令下，他們立刻便可以接近这些秘密武庫。布兰德勒集团曾經就已經获得的武器数量問題在党內頒布过令人难忘的統計数字，并且散布过革命爆发后紅軍保证立即支援等等这类想入非非的謠言。可是，在1923年8月，布兰德勒派往全国各地的信使所傳达的，并不是要大家放手干的信号，而是完全相反的密令。对柏林委員会，他以最阴暗的色彩描繪了全国的形势，强調了一些次要的困难。

8月13日，中央委員会正式下令第二天結束罢工，理由是它的主要目的——逼古諾政府辞职——已經达到。在不顾大多数柏林工厂委員会反对的情况下，党的这一干預使首都的罢工逐漸結

束。在别处，在下一个星期內，罢工从德国的一个角落跃向另一个角落，地方規模的猛烈反抗继續了相当一段时間。譬如說，不倫瑞克工人就曾揚言要“夺取政权”，而在魯尔和来因兰，8月20日重新掀起的罢工浪潮使得矿山和冶金工业再度停工。

艾伯特总統指定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博士組織一个新的四党联合政府，目的在于遏制德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施特雷澤曼就职以后，立即警告共产党人說，他的政府将以全部力量反对暴力行为。他要求新聞界帮助政府同布尔什維主义作斗爭。普魯士內政部长澤弗林下令解散十五人委員会，因为它“曾經枉費心机地企图发动总罢工”。

对于拉狄克的政策說来，罢工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結果；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試驗突然中止。施特雷澤曼同英国人商定，結束了魯尔的消极抵抗，并且在英国仲裁人的帮助下，重新組織了賠款的偿付。莫斯科政治局立即得悉这一消息。一年以后，施特雷澤曼在他本党的代表大会上說，一年多以来，他始終遵循着同一条外交路綫。“这条路綫开始于魯尔斗爭时期，它一直通向倫敦。”

德国外交政策所以有这种轉变，是由于政府担心在无法控制的通貨膨脹螺旋形进展的情况下，魯尔的革命形势可能影响全国其余地区，推动潜伏的內战危机，而在內战中，共产党人則可以輕而易举地推翻政府。施特雷澤曼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估計，要比布兰德勒的估計更接近于現实。施特雷澤曼总的态度的特点，反映在他对“民族解放妇女协会”一次集会的描写上。这个妇女协会是德意志帝国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組織，它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一两个星期后举行过一次集会。施特雷澤曼写道：

“在这次集会上，人們并沒有认識到11月9日革命的意义。在那次会上，我坚决反对当时普遍缺乏公民勇气的情况，反对把直

到那天为止还被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全部破坏。会上，我們举杯为古老的德意志祝福，我們高唱德国国歌，而且我們是在一个人民委員統治的革命城市中这样做的。”①

害怕布尔什維主义是削弱第一届古諾內閣亲俄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在莫斯科，英德联合在欧洲所起的影响看来是如此严重，以致使政治局領导人不惜中断他們在高加索的休假而赶回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会議。政治局的政策发生大轉变，它决定在德国組織起义，为德国党提供好几千名軍事专家，并且給予它以无限制的財政援助。一个明确的时間表被拟訂出来。总书記斯大林第一次以他的新职权干預了德国事务。

① 《民族現实政治》，施特雷澤曼在德意志人民党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24年11月14日，多特蒙德，載《德意志人民党宣傳册》，第56号，1924年柏林版，第36頁。

第十五章　暴动的准备

在1923年攸关大局的7、8两个月內，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大部分时間都不在莫斯科，像往常一样，他們以电話和书信交换意見。暫时負責共产国际事务的庫西宁和拉狄克，按照政治局的秘密指示，执行了向德国共产党人潑冷水的政策。在夏季，古諾罢工加强了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在理解德国形势方面的分歧。季諾維也夫以及支持他的布哈林，建議走上街头举行反法西斯示威。俄国政治局在这个具体問題上存在分歧的消息傳到了布兰德勒耳中，正是这一存在意見分歧的事实鼓励了他，使他敢于力排众議，坚决执行他自己的謹愼政策。

在来自德国的消息影响下和德国左派不断施加的压力下，季諾維也夫越来越不敢肯定政治局在德国問題上作出的决定是否理由充足，是否充分把握住了德国的形势。在俄国駐共产国际代表团中，他向布哈林、庫西宁和皮亚特尼茨基展开游說，試图把他們爭取过来，使他們也支持改变政策。(庫西宁是一个芬兰人，他并非俄国政治局委員，但在共产国际中，他却是事实上的俄国代表团成員，在决定重要政策方面具有同——譬如說——拉狄克或布哈林一样大的影响。) 然而，德国的任何进展都会有利于俄国党爭中的季諾維也夫，因为他担任着共产国际主席，德国的进展会把搖摆不定的党內上层集团吸引到他的身边。于是，斯大林采取了行动。在一封写給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坚决反对給予德国战斗者以任何鼓励：

“共产党人是否应該（在目前阶段）丢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单独

夺取政权呢?在我看来,問題就在于此。当我們夺取政权的时候,我們在俄国具有下列条件:(1)和平,(2)把土地給予农民,(3)絕大多数工人阶級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德国共产党人目前并沒有任何这类条件。当然,他們有一个苏維埃国家做邻邦,而我們当时是沒有的,可是,我們目前能給予他們什么帮助呢?假如在今天的德国,政府——好比說——崩潰了,共产党夺取到政权,他們最后也得稀里嘩啦地垮台。这还是'最好的'結局。弄得不好,他們很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难抬起头来。整个的問題不在于布兰德勒希望'教育群众',而在于資产阶級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会把他的所謂上課——游行示威——化为一場总决战(而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們方面),从而把他們消灭。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沒有睡觉,然而,让他們先动手对我們是有利的;这会把全体工人阶級都团結在共产党人周圍。(德国不是保加利亚。)而且,根据一切情报,法西斯势力在德国是薄弱的。依我看,对德国人必須加以遏制,而不应該給予鼓励。"①

毋庸置疑,斯大林的这封信准确地說明了政治局的官方路綫——在斯特莱斯曼轉向英国以前的路綫。

保加利亚不是德国

斯大林提到的保加利亚危机,表明巴尔干的形势在政治局看

① 《工人政治报》,来比錫,1929年2月9日;轉引自托洛茨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紐約1936年版,第322—323頁。这封信是由布兰德勒反对派在1929年剛被开除后发表的,用以回答对他們的这样一种指控,即:在1923年,他們曾不听俄国政治局的忠告,有意識地破坏德国革命。1927年,在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員会的联席全会上,季諾維也夫在向党提出的正式报告中引证过这封信。当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替自己辯护,因为人們要他为1923年10月德国的失敗負責。

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中,对这封信是略而不提的:譬如說,波波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都說斯大林集团对德国共产党人是給予鼓励的。

来是如何不同于德国。在1923年5月的洛桑会議上，寇松成功地削弱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和苏联之間的联系。这一灵活的外交杰作結束了俄国对近东的进一步滲入，土耳其政治局面的这种变化反映在巴尔干半島、特别是保加利亚的形势上。

当时，保加利亚政府首脑是农民党領袖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曾在德国攻讀农艺学。1915年，当他在保加利亚国民議会中担任議員时，由于反对斐迪南国王的亲德态度而被判无期徒刑。保加利亚在世界大战中失败后，斯塔姆博利斯基成为首相，同协約国在1919年签訂納伊条約。他是在保加利亚的恐怖主义傳統中出生和长大的，因此用铁腕統治着这个国家，冷酷地歧視城市居民。他公开宣布："索菲亚，那个所多瑪、那个蛾摩拉，[1]毁灭掉也罢，我是不会为它哭泣的。"他組織了一支奥倫治农民近卫軍，以便保护他的綠色专政而鎮压暴动。共产党像其他所有工人組織一样处于半合法状态，但斯塔姆博利斯基却同苏俄保持着亲热的关系。遵循着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1922年11月制訂的路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領导下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加剧不安定的地区同政府之間的冲突。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出生于索菲亚附近。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后来成了工厂工人。这家人一共有六个孩子，他們都参加了本国的革命运动。他的一个哥哥康斯坦丁，在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牺牲；另一个哥哥尼古拉在奥德薩地区参加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結果被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在那里死去。第三个兄弟托多尔于1925年死在保加利亚的一所监獄中。他的两个姊妹也同样活跃；在有必要时，連他的老母亲都出現在共

[1] 据《圣經》，所多瑪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由于居民作恶多端而被天上降下的硫磺与火毁灭，見《創世紀》第19章。——譯者

产国际的活动中。

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者，一个被土耳其統治了五百年的国家中的人們，同俄国恐怖主义者的关系相当密切。在两个世紀交替时期，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所謂"广泛派"或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者，以及"紧密派"或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者。1903年，也就是发生全面分裂的那一年，季米特洛夫建立了一个印刷工人工会；从1904到1923年，他一直是保加利亚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記，在这項职位上，他經常到各地旅行，彻底考察了国情。他也在其他巴尔干国家旅行，特別是在罗馬尼亚，并且从远处帮助組織保加利亚人和馬其頓人移民美国。从1913年起，他也是索菲亚市議会、区議会和国民議会的議員。

党的分裂反映到工会中，托洛茨基、克里斯提安·拉科夫斯基和卡尔·列金都曾去保加利亚斡旋，想使两派恢复团結，但他們沒有一个人能打动季米特洛夫。他决心对广泛派集团寸步不让。改良派向工会国际呼吁，后者于1913年在布达佩斯同保加利亚人举行了一次特別会議，但是并未获得任何結果。

1919年，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維克对这个經过很好鍛炼、其背景和发展情况同它本身相似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尊重，在早期建立国际的工作中，他們給了保加利亚人一个几乎和布尔什維克完全平等的地位。从一开始起，在被派到其他国家充当代理人和使节的許多保加利亚人当中，季米特洛夫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身材高大，外貌英俊而心腸冷酷，被认为是一个第一流的組織家，而在政治理論問題上則毫无可取之处。①

①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經历，是共产国际历史最富于启发性的方面之一，許多困难問題都可以透过他的經历找到答案。在二十年代，他成为共产国际在巴尔干半島(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經常关心的一个主要地区)的主要組織者，从南斯拉夫到維也納和柏林，他的总部定期迁移。在这些年代中，他树立了自己的声望，最后成为很少几

1923年6月9日，斯塔姆博利斯基內閣为一次軍事政变所推翻，为这次政变点火的是馬其頓的恐怖主义者，但領导政变的却是

个执掌大权的非俄国人之一（庫西宁是另一个），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权力几乎和政治局委員相等。

在納粹政权剛建立时，1933年3月9日，他在柏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被捕。他同他的保加利亚助手布拉哥伊·波波夫和华西里·塔涅夫、德国人恩斯特·托尔格勒和荷兰人馬里努斯·凡·代·勒貝一起，被控以纵火焚燒議会罪。戈林和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舌战，是在全世界轰动一时的事件。納粹和斯大林两方面都开动了全部宣傳机器，而在各种想入非非的謊言和眞眞假假的一面之詞使人眼花繚乱的情况下，当时是很难弄清楚眞相的。可是，在高潮中，一件赤裸裸的事实却戳穿了精心編造的表面文章：經过納粹法庭三个月的审訊，季米特洛夫最后被引渡給俄国。

当审判正在进行时，我在巴黎遇到了两个重要的证人——威廉·皮克和瑪丽亚·雷澤。皮克当时很希望同我和馬斯洛夫談一談，雷澤则是共产党議会議員和托尔格勒的密友。（她后来回到德国，成了納粹的同情者，但这并无損于她所談情况的可靠性；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和托尔格勒的律师联系，从他那里打听到全部詳細情况。）他們两人在各不相謀的情况下向我透露了相同的內幕消息，即季米特洛夫在走上法庭勇敢地发表他那长篇大論的演說以前，已經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之間的秘密安排，知道他自己过庭后将获得自由。另两个保加利亚人也在商定的釋放者之列，但是托尔格勒和凡·代·勒貝却未包括在內。皮克和雷澤对这件事都非常关心，可是出发点各有不同。皮克知道托尔格勒已經被政治局抛棄，害怕他也許会看破眞相，在法庭上揭露两国政治警察之間的秘密交易。所以，当我看到他时，皮克正在忙着給一个将要到达倫敦的德国地下活动者准备安身之处，这个人将带来一項惊人的消息，說托尔格勒是出卖反法西斯事业的叛徒。瑪丽亚·雷澤的反应当然是十分不同的；她后来写了一本小册子宣布同共产主义决裂，但对这桩事只含糊地影射了几句，因为她还希望挽救托尔格勒的生命，不願意得罪盖世太保。皮克的信使果然到倫敦去了，用故意让人听見的方式散布了他的所謂秘密消息，但由于托尔格勒始終沒有泄露季米特洛夫賴以得救的幕后安排，他們也就让这項对他的指責慢慢平息下去。凡·代·勒貝結果被处决，另外四名被告宣告无罪。"托尔格勒声色不动地諦听了并沒有带来自由前景的无罪判决，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旣沒有表示輕松也沒有表示高兴，只是安靜地坐了下来。"見道格拉斯·里德：《德国議会纵火案》，倫敦1934年版，第331頁。当保加利亚拒絕接納它的三个本国国民时，俄国使他們成为苏維埃公民，于是，一架飞机把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送到他們新的祖国。

季米特洛夫在这样凱旋返回莫斯科以后，便成了第一号反法西斯殉道者，在共产国际中同德米特里·曼努伊里斯基分居領导地位。在决定人民陣綫政策的1935年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受到的欢呼几乎和斯大林本人一样热烈。在俄国战胜納粹以后，他回到了保加利亚故国，从那时以来一直以最高明的恐怖主义傳統方法进行着統治，但他的未来并不仅限于巴尔干半島的这一隅。他一直同德国共产党人以及他們所有的自由德国衍生組織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假如有朝一日能成立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欧洲合众国，这个国家的主要官員之一也許就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亚历山大·贊科夫教授，他在某些英国顾問用心良苦的鼓励之下，組成了一个包括城市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社会民主党、現役軍官联盟（这个組織特别为国王鮑里斯三世所支持，鮑里斯三世一向以他的亲德和反布尔什維克态度聞名）在內的“民主协約”集团。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党继續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贊科夫和斯塔姆博利斯基的斗爭中保持中立；任何不同于这种袖手旁观的立場都会被认为是“冒險暴动主义”。数以千計的斯塔姆博利斯基分子被捕，他本人也在三天的搜捕后被暗杀；发生了一系列騷动以及反抗的农民和新政府之間的小規模冲突。共产党日益受到迫害，季米特洛夫不得不轉入地下。

透过表面現象可以显然看出，保加利亚政治景象的变化是同土耳其政局密切相关的，俄国政治局感到英国安全地带愈来愈收紧的压力，在对待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問題上，立刻扔掉了反对“冒險暴动主义”的一切原則。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朋友被召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一次六月会議上，一方面，拉狄克向德国正直的民族主义群众发出感动人心的呼吁，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却由于他們的机会主义錯誤而受到严厉批評。同一个拉狄克，一方面反对在柏林举行反法西斯示威，认为这对于强大的德国共产党說来是过于危險的，另一方面却大力反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华西里·科拉罗夫的消极态度。据他說，保加利亚党低估了农民的力量，曾經主張在巴尔干联邦范圍內让馬其頓自治，因此要为严重的失敗負責。

“我們认为〔拉狄克說〕，保加利亚的政变是我們党的一次严重失敗。我們当然希望这不是一次使党永难再起的失敗。但它肯定是共产党曾經遭遇过的最大一次失敗。……保加利亚党并沒有努力去理解这次失敗，反而企图为它粉飾。我們面前放着一堆保

加利亚党的呼吁书；它們是整个失敗中最令人难过的一面。我們这里有6月9日的呼吁书、15日的呼吁书以及长长一系列文章。我們看到党在維护下面这种立場：两个資产阶級集团正在斗爭；我們工人阶級可以袖手旁观，我們希望并要求获得出版自由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好处。"①

沒有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商量，俄共政治局便命令保共准备一次軍事反击。由紅軍情报处选出的一批軍事顾問，化装成各种人物被派往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党得到一大笔資金，以便組織初秋暴动。据拉狄克——这項保加利亚計划的发起人之一——看来，斗爭的目标不应該是成立一个保加利亚苏維埃共和国，而应該是让农民党重新执政。在同贊科夫政权进行过一場血腥的战斗以后，在保共帮助下重新执政的农民党将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这个政府将被迫对苏俄采取友好态度，从而遏制住英国在巴尔干半島和近东的影响。对俄国政治局来說，保加利亚暴动并不是一个新的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开始，而是对俄国在巴尔干势力的一种支持。

8月中旬，季米特洛夫向莫斯科报告，說他預見到在9月底有可能采取明确行动；他的这份报告和柏林出乎意料的古諾罢工消息同时傳到莫斯科。在审閱关于德国各地日益扩大的騷乱和罢工运动的报告时，政治局拿它們同有关保加利亚政变筹备情况的报告作了对比。

莫斯科的秘密会議

柏林共产党总部只听到了俄国党內危机和保加利亚即将行动

① 卡尔·拉狄克：《保加利亚的失败》，載于《共产国际》，第27期，汉堡，1923年，第115—120頁。原文是这样說的："我們这里有2月9日的呼吁书，15日的呼吁书……"；但这显然是一个錯誤。

的微弱回声，它的注意力已經完全放在德国的当前形势上，几乎忘却了其他一切問題。布兰德勒害怕俄国政治局內的尖銳分歧一旦在德国党內公开后，会妨碍他执行自己的政策，因此把拉狄克送給他的全部情报都小心地隐瞞起来，只让他自己的一些亲信知道。左派对托洛茨基不感兴趣，在他們的心目中，他主要是左派的最大对头卡尔·拉狄克的一个密友。

在1923年夏天，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員——其中有施略普尼柯夫——来到柏林，同柏林反对派举行了秘密会晤。他們以最阴暗的語調报告了俄国党內和共产国际內部的情况。这些俄国反对派认为有必要作好分裂准备；在俄国政治局的領导下，德国不可能有任何革命行动。左派并不想在发生普遍危机的当时分裂党，但是拟訂了共产国际內部各个左派集团密切合作的計划。波波夫在这方面的闡述是十分正确的。①

关于俄德两国左派之間的秘密会晤，布兰德勒集团自然得到了消息。他們把这件事报告俄国政治局，要求把柏林党領导人、組織这种秘密接触的馬斯洛夫立即排除掉。沒有了馬斯洛夫，就比較容易控制柏林党組織。

在莫斯科，由于施特雷澤曼正在同英国进行談判，所以斯大林轉而支持德国共产党改变政策。这时，每一个俄国領袖都爭先恐后地鼓吹德国革命了——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都是如此。只有拉狄克沒有放棄自己的路綫。根据政治局的一項决定，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諾維也夫邀請德国領袖們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特別会議。这次主要是研究軍事战略而非政治战略的会議，在9月間和10月的头一周举行——和中央委員会

① 参看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192頁。

內部的托洛茨基危机正好发生在同一时間。除俄国外，只有法国、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和德国五个党参加会議，而且代表們大都是原来就在共产国际总部的工作人員。这并不是一次为宣傳目的而召开的会議；在密室中，俄共政治局同德共代表团辯論了暴动計划的各种細节。

当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发現莫斯科到处都貼着欢迎德国革命的标語。市中心飄揚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旗帜上写着这样一类口号："俄国青年們，向德国学习——德国的十月革命就要来临了！"在每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都可以看到克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內西的像片。所有的工厂都开会討論："我們如何能帮助德国革命？"

布兰德勒在8月底先到，以后，他領着的一班人也相继到来。可是，布兰德勒这伙人却不得不等待好几个星期，因为俄国人正在忙于应付他們自己党內的危机。在庫西宁和拉狄克的支持下，布兰德勒利用这段时間为成立一个針对馬斯洛夫的調查委員会作了准备。只是在布兰德勒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以后，才把左派領袖也召到莫斯科来，这部分是为了让左派領袖参加辯論，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了让拉狄克有可能在会后把我和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

布兰德勒来俄国的时候，曾以为他的政策一定会继續下去。他准备好的建議內容，全是旨在进一步利用經济危机展开共产主义宣傳，同社会民主党左派結成統一战綫，特别是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这种政策发展到最高峰，甚至有可能让共产党人加入联合內閣担任部长。

可是，布兰德勒一到以后，拉狄克便把政治局已經改变立場的情况告訴了他。布兰德勒感到自己陷入了窘境；在他最亲信的一小群朋友中，他討論了是否有可能公开反抗这种"愚蠢的冒險主义路

綫”的問題。可是，在他本国，党所以能被遏制在布兰德勒的溫和政策上，只是由于布兰德勒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一旦党知道他已經不再有这座靠山，他就不会有继續控制住党的希望。如果他敢于公开反抗，他将会被他自己的朋友驅逐；他的中央委員会是由一些不坚定的人組成的，这些人虽然和左派作斗爭，却受到左派的很大影响。他們經常批評布兰德勒，阻撓他企图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盟的計划。布兰德勒明白，如果他敢于反对俄国人的建議，他的追随者就会馬上把他扔开，另外組織一个新的集团。

因此，布兰德勒决定妥协。他“一般地”接受俄国人的路綫。他幷不反对把德国的形势說成是“革命的”。与此相反，由于他一貫的性格和野心的驅使，他甚至对德国形势作了歪曲的和不精确的描繪，以此来进一步渲染俄国人所分析的那种政治局面，同时有意識地把薩克森和图林吉亚两地追随他的人說得比别人更革命。他的行为与其說像一个全党領袖，不如說像他那一个小集团的头目，他把这两个邦的状况吹得天花乱墜，以致使俄国人产生了共产党已經在那里居于支配地位的印象。

据布兰德勒說，薩克森和图林吉亚已經完全为紅色百人团所控制。而且，百人团都已武装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譬如說，在发表于《眞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布兰德勒描写图林吉亚工人住在分散的工业村里，就像一种高加索的原始部落一样。他暗示图林吉亚工人的每一家炉灶后面都藏着步枪。只要党一声令下，他們在一分钟內便能組成一支支軍队。他說，薩克森的工业几乎已經全部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消費者团体网，这些团体由各阶层居民組成，已經有效地組織起全邦的經济生活。这套想入非非的說法得到了野心勃勃的图林吉亚組織工作者瓦尔特·烏布利希的热烈支持。

这些报告今天在我的脑海中还栩栩如生。究竟是俄国政治局对他的这套歪曲，信以为眞了呢，还是故意装做相信布兰德勒所說的一切？左派被迫采取比不上布兰德勒那样“革命”的态度，用比較清醒的分析来修正他所描繪的图画。我今天回想起来，連季諾維也夫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布兰德勒那套有声有色的吹嘘迷惑了，不了解德国詳細情况的托洛茨基自然更不必說。作为一个德国的工会活动家和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旣有革命銳气又注意脚踏实地的人，布兰德勒在俄国人当中是具有一定地位的。

总而言之，俄共政治局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德国存在着一个武装核心，只要从外界进行有力干預，就能使这个核心发展壮大。由于暴动已經被明确批准，所以是否存在願意战斗的武装核心的問題就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当时，是不会有人提出在沒有有組織的武装队伍願意打前陣的情况下举行暴动的。

关于鲁尔形势，大家的看法一致。“紅色百人团的口号只是在鲁尔区有效，在那里，这个口号已經如此化为現实，以致紅色百人团正在如雨后春笋般飞快地发展起来。”①

布兰德勒集团关于国防軍中日益呈現出严重分裂迹象的报告，就国防軍和共产党机器之間的关系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当他們把这种联系說成是国防軍反对派已經願意让共产党領导时，他們对現实情况又作了一次歪曲。事实是，国防軍中的亲俄各集团絲毫也不想接受德国共产党的領导，他們同俄国的共产党政治家联系，主要是为了在反法战争中同俄国結成軍事联盟，或者至少是得到俄国的政治支持。国防軍幷不想让自己被改造成德国紅軍；它对共产党人許下一些含糊的諾言，保证党的地位在一个軍人統

---

①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为时已晚？》，第19頁。

治的德国会有所改变，成为联系苏維埃政府的傳送带等等，其目的只是想以这种方法来利用共产党。而且，国防軍中的这种亲俄政策还受到另一个更强大的集团的反对，这个集团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建立一个不为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詭辯家所扰乱的軍事独裁政权。可是，在九月会議上，布兰德勒的报告却暗示一部分国防軍将願意在共产党的指揮下作战，另一部分国防軍则将保持中立。他們幷且认为，在以俄德两国結成反凡尔赛条約同盟为交換条件的情况下，这部分中立的国防軍也将接受共产党的更大影响。

此外，他們还认眞考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事变过程中，很大一部分軍官会站到共产党方面来。出生于保守家庭的汉斯·馮·亨提希，是布兰德勒中央委員会和国防軍之間的一个主要联系人。通过他的兄弟，一个在希特勒执政后仍然继續供职的外交官，亨提希能弄到有价值的內部情报。作为图林吉亚共产党軍事机器的組織者，他被授以购买武器的重任。同俄国专家斯柯布列夫斯基等人一道，他拟定了暴动計划。亨提希兄弟两人代表保守分子的两个不同典型，但他們都通过德国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受到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

像往常一样，共产党宣傳总是以“德国資本主义体系完全崩潰”的字眼来描繪經济形势。可是，在九月变动以前，俄国党內的主要思想流派却傾向于认为欧洲資本主义正在走向复兴。就在共产党加入薩克森政府的那天，共产国际的首席經济学家尤金·瓦尔加表示了下列看法：

“德国經济稳定化的第一阶段开始于8月15日。通过群众运动，工人已經爭取到把他們的工資調整得适应于上漲的物价。……由于总罢工的威胁而实行的滑准工資制，使得继續实行馬克膨胀政策成为多余。因此，8月底便出現了一系列发行一种新的稳定

通貨的計划。

社会民主党工人抱着等待态度，他們期待着稳定。"①

9月11日，德法談判已經开始的确实消息傳到莫斯科。这起了决定性作用。季諾維也夫得以立刻使政治局通过一項决議，决定同时推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暴动。他仍然为拉狄克和瓦尔加所反对，但是得到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支持。国际主义者托洛茨基相信，欧洲的变化也一定会反映在俄国党內生活的有利变化上。

他們送信給季米特洛夫，要他在9月底发动起事，为德国提出的日期则是10月初。但是，当他們要求布兰德勒定出具体发动日期时，这一建議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政策改变以后，布兰德勒还曾这样希望：他得到的将是一般性的指示而不是明确的命令，而利用这类指示的含糊用語，他依旧可以有足够的迴旋余地。季諾維也夫是不願意違背德国代表团的意願硬向他們发出具体命令的，这既是由于違反当时共产国际的慣例，也是由于他本人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維克革命以前的态度。

于是，开始了一場学究式的討論，引进德国事件的一种最奇特的前奏曲。討論的問題是：馬克思主义者能否事先規定出举行革命起义的日期，尤其重要的是，目前就德国而言能否确定这样一个日期。正在俄国党內进行政治斗爭的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至11月7日或9日达到高潮的日程表。他并未过分强調这些历史性日期，但也指出了这种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在动員群众方面的价値。布兰德勒对托洛茨基的建議感到十分恐慌，以他要立即离开莫斯科要挾政治局。当然，他沒有說他反对整个行动；他再三声明定出

---

① 巴甫洛夫斯基〔瓦尔加〕：《在德国发生決战以前》，汉堡1923年版，第42、47頁。

日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随意确定的日期将給党、将給他自己同左派的关系带来災难性后果。力求妥协的季諾維也夫找出一条解决办法。他郑重詢問布兰德勒是否“在原則上”反对起义。这一点布兰德勒当然否认。在原則上，他是“贊成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关于确定日期的建議被否定，但并非“出于原則理由”，而是因为起义日期应該让德国共产党人本身去决定。但是，由于大家希望很快就要发动的保加利亚起义将大大推动德国革命，因此作出了这样一項决定：暴动应該在今后四至八星期內举行。

在这桩公案完結以后，又开始了另一場糾纏不清的討論。德国同志是不是应該組織“苏維埃”呢？左右两派都一致同意，应該把在古諾罢工中起过关鍵性作用的工厂委員会发展成中樞組織。两派抱这种态度各有其不同的理由，但暫时說来，他們在字面上总算取得了一致。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都主張选出苏維埃，因为它的活动范圍要比已經存在的工厂委員会更广泛。拉狄克激烈反对这一建議，从他的立場来考虑，他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苏維埃运动的发展将由于其性质本身而使他不得不把共产国际的决議执行到超出他所願意的程度。最后作出的决定是支持工厂委員会，这便使他和布兰德勒得到了多得多的避免受束縛的机会。

在此期間，季米特洛夫和科拉洛夫已經离开索菲亚，在保加利亚西北部建立起秘密总部，他們所以选中这一地区，是因为在这里更便于同莫斯科联系。他們組織了一个“革命軍事委員会”，向农民和工人小队分发武器，并且同紅軍总参謀部的专家共同制訂出行动計划。按照共产国际編造的神話，暴动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內部出現了叛徒，使得政府事先得到警告，得以作好应变准备。可是，事实却是保加利亚人不願意被并入苏維埃势力范圍。而且，保加利亚党沒有能够很快地从統一战綫政策轉到武装行动上来。在

被政府軍击溃以后，大約有一千名游击队慢慢退进南斯拉夫。尽管暴动未能成功，对季米特洛夫来說，这仍然是帮助他日后在共产国际中飞黄騰达的重要的一步。①

在莫斯科，保加利亚的失敗消息加深了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悲观主义，但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却认为这只是一种暫时挫折，会由于德国革命的有利发展而好轉。这时，会議的討論轉到技术性的准备工作上；在小組委員会里，拟訂了德国暴动的总战略計划。按照这一計划，經过短时間大力展开宣傳的預备阶段以后，共产党将加入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邦政府。在这两个政府中，共产党人将集中全部精力来武装工人；他們的任务将是組織一支以各工厂和工业村紅色百人团为基础的无产阶級軍队。經过这一短促的預备阶段之后，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紅色政府将宣布总起义，立即以武装力量支援其他地区同反革命进行斗爭。薩克森的紅軍将进軍柏林，图林吉亚人則向反革命中心慕尼黑挺进，而在他們的进軍途中，中德的紅軍将会把一切希望推翻政府的力量团結到自己的周圍。

新政府并不全由共产党領袖組成，而将包括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主义者和信奉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軍官。它的对內政策只限于把重工业立即社会化；国家将不对小企业主和农民进行干預，

---

① 共产国际从未否认过它在1923年保加利亚暴动中的作用。恰恰相反，在斯大林主义的光荣革命史中，很有几頁是用以記述在巴尔干的这一行动的。“在共产党的領导下，9月23日爆发了保加利亚工农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建立工农政府的起义。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全权代表，季米特洛夫起了首要作用。”見斯台拉·布拉哥耶娃：《季米特洛夫，一个革命家的生平》，莫斯科1934年版，第50頁。

在1933年11月23日的議会纵火案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吹嘘过他在保加利亚事件中的作用。“我为英勇的九月起义而驕傲。我唯一的遺憾是，我和我的党当时还不是眞正的布尔什維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們才沒有能够成功地組織和領导好这次由无产阶級带头发动的历史性群众起义。”同上，第51頁。

以免引起他們的反感。东普魯士、波美拉尼亚、麦克倫堡和上西里西亚大地主的土地将被沒收，在貧农中进行分配。

德国紅軍的建軍計划

会議决定，为了执行这一計划，要在技术上和軍事上作好最周密的准备。政治方面的問題似乎都退居次要地位了，人們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建立起紅色战斗組織，以便粉碎部分国防軍和反革命軍团預料会进行的抵抗。就执行这一任务而言，德国党中央委員会甚至它的政治局都被认为过于龐大了。一个七人委員会将独攬大权，有資格委任人选去指揮經过选举产生的各区委員会的領导；基金被交給布兰德勒支配，皮克和埃貝尔林做他的助手。

在实际的軍事力量中，紅色百人团将得到党的軍事工作部和紅軍情报处的支援。由于紅色百人团处于半合法地位，并且只有初步联絡关系，因此，它們的干部被认为不适合于担任指揮工作。另一方面，德国党的秘密軍事小組人数虽少，却是一群頗有訓练的突击队，其領导人員都具有一定的軍事經驗，他們不是在帝国軍队中服过役，就是在俄国受过短期訓练。不过，在1923年以前，外国共产党人在俄国接受軍事訓练的情况还是时断时續和效率不高的，因此，会議作出的主要决定是派遣几百名紅軍軍官去領导德国党的这些秘密軍事小組。这些軍官有許多都不是俄国人，而是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塞尔維亚人、波兰人或者其他参加过俄国內战、后来加入紅軍的外国共产党人；会議感觉到他們作为中欧人，更适合于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些軍官完全通过俄国的門路潛入德国；他們接受任务后，便化装成各式各样的人混到目的地，然后只向他們的俄国上司——俄国大使館內国际联絡科的工作人員报告情

况。①1923年9月派进德国的这批多民族共产党人，同十三年后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十分相似，事实上，这就是国际纵队的一种流了产的形式。

最后，还有一批俄国軍事情报人員。他們同德国党的軍事工作部保持联系，但并不和它混在一起，他們直接受莫斯科紅軍参謀部的指揮。他們的主要任务是同国防軍中的反对派軍官联系。瓦尔特·克里維茨基就是这个部門的領导人之一，他被派到柏林，在那里給德国党組織了三种特工机构。关于自己的使命，他是这样写的：

"当法国占領魯尔的消息傳到我們的部門以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五六名軍官便被立刻派赴德国……

我們立即在德国共产党內創立了三种类型的組織；一种是党的情报处，它在紅軍第四厅的指导下工作；另一种是作为未来德国紅軍核心的軍事組織；最后一种是由少数人組成的'武工队'，其作用是打击国防軍和警察的士气。"②

---

① "共产国际的核心是很少为人所知和从来不被宣揚的"国际联絡科"，这个机构按它的俄文开首字母簡称为"OMS"。在进行大清洗以前，領导OMS的是〔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一个老布尔什維克，在沙皇統治期間受过散发違法革命宣傳品的实际鍛炼。……作为OMS的領导人，他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財政部长和人事室主任。"見克里維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內幕——一个前苏俄西欧情报处領导人对俄国秘密政策的揭露》，紐約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1939年版，第51—52頁。

柏林国际联絡科最重要的負責人之一，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在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曾把当时国家政治保卫局領导人雅哥达給他的大量金錢轉送給托洛茨基。事实上，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并不是托派；作为一个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者，他知道的东西未免过多了。

② 瓦尔特·克里維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內幕》，第38—39頁。克里維茨基对恐怖組織特别感兴趣，并对它們怀有一定敬意。这和他几乎輕視所有合法的共产党組織形成了鮮明对比。据他說，这些小組全是由具有狂热信仰的优秀战士組成的。

"我还記得一个这样的小組一次集会的情景，这是9月的一天晚上，共产党暴动前

以这个軍官团为中心，在計划中便建立起一支正規部队的骨干組織，它不仅拥有总参謀部，而且拥有炮兵軍官、机枪手、信号兵队等等。軍事机器的特殊委員会接到任务，負責在存貨充足的德国黑市上购买一切能弄到手的軍火。这些武器囤积在各区的秘密总部中，将在政变前几天分发出去。人数較多的各个德国共产党人小組将接受四至五星期的基本軍事訓练，訓练項目中包括进行好几天长途夜行軍和游击战的演习。在这种演习計划中，通訊部門——包括一个自行車和摩托車联絡綫、許多报务員和信鴿——将发揮作用，把若干基干小組迅速变成一支集团軍。

任何国防軍軍官願意参加草創中的紅軍，这种表示都会被最愼重地考慮。他将被立即派到实际战斗中去，并担任較高級的指揮职位，但他的周圍有可靠的同志进行监視。如果一个国防軍軍官表示願意出力，除去有肯定的证据表明他是奸細以外，他都会在經过俄国专家的訊問后被納入本区指揮部；而且，这一事实将对国防軍中他的同志們公布。計划中难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德国国防軍的問題。軍队将怎样反应呢？軍官們是否又会主动带头，糾集起各种非法的軍事組織，把它們联合成一支粉碎工人軍事組織的队伍呢？在柏林，国防軍在最初阶段将会拥有一切有利条件。計划所以把薩克森和图林吉亚作为发动斗爭的起点，部分就是因为在这两个邦沒有强大的国防軍分遣队。在这里可以迅速組織起一支群众性軍队，看来是一望而知和毋庸討論的。柏林，德意志共和

不久，地点在埃森市內。我記得他們是怎样聚集到一块来接受命令的，他們的态度非常安靜，几乎近于庄严。他們的指揮員簡短地宣布：'我們今晚动手，'

于是，他們沉着地掏出手枪，对它們作了最后一次檢查，以后便一个接一个地魚貫而出。第二天，埃森报紙就登出了发現一名警官被暗杀、凶手不知何人的消息。接連好几个星期，这些小組在德国各地神出鬼沒，把一些警官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其他敌人干凈利落地收拾掉。"（同上，第43頁。）

国的象征，为布兰登堡駐軍所包圍，被看成是最难占領的地点之一，但也是举足輕重的一个地点。决定对全国各地的一切党組織发出严格命令，要它們等待薩克森的发动信号。

托洛茨基完全同意和衷心支持德国革命的軍事准备。他提供了不少技术性的意見；他对許多次要的細节都感到兴趣。他好几次同布兰德勒討論了即将到来的这場斗爭的复杂軍事問題；至少是在一段时間內，托洛茨基认为布兰德勒正是适合于領导暴动的人。在这几个星期中，他們两人之間存在着一种良好的、几乎是亲热的关系，他們都不喜欢季諾維也夫——布兰德勒在共产国际中的对头和托洛茨基在俄国的敌手。

左派領袖堅信所有这一切軍事准备都毫无价值。他們知道党的軍事机器是一种半瓶子醋的組織，許多脫离党的眞正生活的党員都以此为藏身之所，而这些人一到緊急关头就会暴露他們的弱点。而且，左派領袖还认为：在古諾罢工之后，有利时机业已过去，工人們現在感觉到，同英国的妥协会帮助德国經济走出困境。即使說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要加剧冲突，重点也应該放在政治行动上，应該强調的是扩大工厂委員会的活动，加强由共产党解决危机的群众宣傳和群众組織工作。我肯定，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联合政府决不会推动柏林或鲁尔，除非在成立联合政府以后，继之以——譬如說——工人委員会占領工厂，在一切工业中心公开組織武装，举行武装示威，最后建立平行政府——工厂委員会的地区性或全国性委員会，宣布它們从此要統治全德国的願望。国防軍只能够通过革命工人組織的这种陣势被粉碎，而党的各种秘密机构则只能对之起輔助作用。脫离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展开，这些軍事小組所能造成的，不过是很容易被当局鎮压下去的孤立騷动而已。

在討論过程中，布兰德勒一直在考虑一个可行的反計划。他心中明白，左派領袖比任何俄国观察家都更能看穿他的邪門外道，他的政策只有在消除左派領袖的批評后才能实現。因此，布兰德勒接受共产国际計划时提出一項条件，即我和馬斯洛夫这两个著名的左派必須被留在莫斯科。圍繞着这个問題，在俄国政治局的一个小組会內发生冲突。托洛茨基願意接受布兰德勒的条件；据庫西宁說，① 經过激烈的斗爭以后，季諾維也夫才給他的妥协性建議拼凑起一个微弱多数，按照这一建議，将放我回德国而把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根据德国共产党党章，是不能違背柏林党組織的意願而硬把馬斯洛夫留下的，該組織派他来仅仅是作为参加会議的代表，这时正在叫嚷着要他回去。扣留他的最方便办法是，要他向一个調查委員会解釋他个人历史上某些不清楚的問題，同时答应在調查完毕后立即让他返回柏林。对于这样一种安排是很少有方法推脫的，因为对党的高級干部提出这类性质的怀疑，必須交由国际监察委員会审理。

在布兰德勒的坚持下，又决定了另一个奇怪的安排。政治局选定华西里·施米特——工会主席托姆斯基的一位密友——担任我的个人顧問，在柏林共产党人即将同反革命进行的战斗中帮助我。施米特的出面，目的在于保证柏林党組織服从軍事紀律；在我們发生分歧的一切場合，他都可以用俄国政治局的名义把我压下去。他是革命暴动时期共产国际派到德国的四名代表之一；另外三个人是拉狄克（他領导着其余代表）、奥古斯特·古拉尔斯基-克萊恩和阿列克西斯·斯柯布列夫斯基“将軍”。

布兰德勒在10月9日（也許是10日）离开莫斯科。我在离开

① 《对‘德国革命’的歪曲描繪》，《托洛茨基主义的錯誤》一书中的一章。英国共产党編，1925年倫敦版，第350—351頁。

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看見托洛茨基正在向布兰德勒道别，他从克里姆林宫內自己的住处，一直把布兰德勒送到三一門——这是一种极其有礼貌的特殊表示。他們在那里站下来，在秋日午后的明亮阳光中，矮胖的布兰德勒穿着沒有熨过的便服，風度翩翩的托洛茨基穿的是一套合身的紅軍軍装。在談过最后几句話以后，托洛茨基按照一般俄国习惯，亲切地吻了布兰德勒的两頰。由于对他們都很了解，我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这时的确感动了；他感到，他在发生翻天复地事件的前夕正在为德国革命的領袖祝福。我以一种年輕人的蔑視观望了这場深情的告别。我怀着最恶劣的心情穿过大門，坚信我們正在奔向災难。

施米特和我利用假护照，通过埃特古倫一起进入东普魯士。我感觉到拉脫維亚、立陶宛甚至德国的边防軍都好像得到了通知，知道有一位俄国要人将从那里匿名經过，应該对他加以特殊照顾。

在旅途中，我們当然討論到德国的形势。施米特是一个純朴可亲的人，一个俄国工会活动家和优秀組織家，但是在一切外交政策問題上却都天眞到了极点。他对德国的事情并不特别感兴趣，从来也沒有研究过这个国家，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在最近一些报告中談到的东西。他特别向我問起工会状况。当我向他作了一般的党內报告，搬着指头数起工会中共有多少反对派的时候，他不禁搖起头来。“不好，太不好了，”他說，“工会可不应該分裂。”他还以同样令人心軟的天眞态度打听德国的其他情况，甚至包括地理，但最使我吃惊的問題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柏林-肖恩堡的霍普特大街上有一家小牛奶店，这座店鋪的里間就是党的各种秘密机关之一，在这里，柏林党組織的书記汉斯·普斐弗尔（綽号“卡片科維奇”，因为他爱摆弄卡片）坐在他的文件夹旁边，忙着繁瑣的日常工作。我把施米特在这个地方舒舒

服服地安頓下来，以后，他在柏林的大部分时間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然，他出席了柏林委員会的一切会議，但他的德語水平有限，只能勉强听懂会議內容。①

全党总动員

我在10月中旬到达柏林后，发現党的态度已經完全改变。德共政治局并沒有等待莫斯科会議的决定送来后再行动。早在9月中旬，已經有一大批俄国顾問和技术专家抵达德国——在他們当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斯柯布列夫斯基将軍。②当时，总指揮

---

① 华西里·史米特生于1886年，1905年参加布尔什維克党，主要致力于組織圣彼得堡的五金工人。从1918到1928年，他担任劳动人民委員和全俄工会理事会书記；在一段时間內，他还担任过人民委員会副主席。1930年，由于同托姆斯基有联系，他被免去工会負責工作，降为农业人民委員会副主席。1933年，由于继續同右派集团互通声气，他被免去一切职位，从事經济工作。1938年，維辛斯基在审判布哈林时提到他，說他曾帮助托姆斯基进行反对派的阴謀活动。不过，他并沒有在审判时或以后露过面，多半是在清洗中被处决了。

② 同两个德共党員馬尔吉斯和費利克斯·諾伊曼一道，他是1925年2—4月在来比錫开庭的所謂"契卡审判案"的被告之一。在筹备1923年的暴动时，"德国契卡"曾計划暗杀馮·澤克特将軍和胡果·司丁尼斯等人。

海因茨·諾伊曼（他并不是費利克斯的亲屬，但也和这类暗杀計划有牽連）曾带着孩子气的驕傲告訴我，他有許多天早晨曾如何观察过慣常在动物园散步的澤克特，想找出最合适的埋伏地点。甚至像澤克特这样一个至死都鼓吹同紅軍合作的人，竟然也变成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暗杀目标，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德国活动的俄国特工人員都很有政治头脑，他們当中肯定有人反对同国防軍合作，而澤克特則被认为是最能給予共产党政变以有效抵抗的一个軍官。柏林支部也許受到了組織一次挑衅行动的鼓励，因为在秘密机构成員中，以恐怖手段来解决政治問題已經成为他們爱用的一种方法。不过，費利克斯·諾伊曼組織的恐怖团，只眞正暗杀过一个人，即加入过党的一个理发师、"叛徒"約翰·劳施。

1925年，紅軍和国防軍之間的关系非常友好，共产党暴动的危險似乎已經过去。所以，审判与其說是一次严肃的审問，倒不如說是一場鬧剧。法庭和报紙串通把問題攪得稀里糊塗，故意强調德国契卡方面那些使整个事件显得很可笑的不重要的細节。斯柯布列夫斯基被控以这样的罪名：为了购买炸药、达姆彈、毒菌、炸彈和其他軍火，他收

部表面上由德国党的七名中央委員組成，他們被授以領导革命的全权，可是，斯柯布列夫斯基却是总指揮部的一个幕后成員。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是汉斯·基彭貝尔格，在軍警和帝制派組織中进行破坏工作的負責人。

党的政治活动同軍事活动是严格分离的。凡是适合于参加軍事組織的党員，都被本地党支部抽調出来，被賦与各种特殊任务。为了保护党的工作人員不致在暴动爆发前被捕，党命令上万名干部离开家住进地下軍营，只許隔些日子回家探望一次。一部分紅色百人团突击队住在集体宿舍里；暗藏的軍火紛紛轉移到各地的秘密武庫，从那里可以很快地分发出去。軍事工作部搜罗了一切被认为有重要意义的地区的軍用地图，在上面标出了預备夺取的建筑物。制訂了对警察和国防軍兵营进行突然襲击的計划。此外，总指揮部还規定了柏林、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紅色百人团的集合地点，从而使計划达到周密完备的地步。

当然，这种准备工作并不是在全德各地都同样紧張。可是在工业中心和共产党組織的据点，它們的确开展得如火如荼，把許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吸收了进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一个問題上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他們都要求对帝制派、希特勒分子、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共同采取軍事防御。从1923年夏季以来，德国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巴伐利亚早晚就要发生帝制派或法西斯分子的暴动，这一事实增加了人民对共产党准备軍事抵抗的同情。魯尔占領、通貨膨脹和这种每天担心巴伐利亚发生

到过二十万美元。

这次审判是很少几件客观证据之一，表明一批重要的俄国軍事专家曾在1923年被派到德国。在这次审判中，一般德国公民把大部分证据都当作平庸的鬧劇，可是事实上，就連某些看来最荒唐的細节也都是非常眞实的。海因茨·諾伊曼曾和我讲过他同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朋友們試驗霍乱菌的故事。他們拿感染过細菌的白菜叶喂兎子，

法西斯政变的心理，大大冲淡了人們对已經存在四年的宪法程序的記忆。群众要求建立一个軍事組織，以便同敌人的軍事专业技术相对抗。

对这些准备工作，一般党員都衷心拥护，給予了它們以热情支持。在德国共产党人中間，要求行动的願望还从沒有过像現在这样普遍；在以前，当每一次要求他們投入軍事行动时，下层党員总要呈現分裂状态。譬如說，在1921年3月，就有相当一部分最优秀的德国共产党人反对过“冒險主义”政策。在1923年以前，由于害怕同由軍事专家領导而又殘酷的反革命最后摊牌，德国工人运动中最优秀和最有觉悟的分子都不敢輕举妄动。可是到1923年9、10月間，情况却完全改变了。俄国政治局正式保证支持德国暴动，被人們热情地认为起有决定性作用。来到德国的許多俄国同

可是，由于他們在技术上不內行，細菌全死去了，結果，兎子吃了菜叶竟长得很肥。写給敌对者的恐吓信确实署名“紅猫团”；这种荒唐作風在深受“无产阶級迷信”影响的毛孩子中是很流行的。参看阿尔图·布兰特博士：《契卡审判》，柏林1925年版。

馬尔吉斯和費利克斯·諾伊曼被判长期徒刑。馬尔吉斯变成了党的殉道者，但是諾伊曼由于供出了某些組織細节，被共产党机器斥責为奸細和叛徒。他获釋出獄后，便永远隐姓埋名。斯柯布列夫斯基被判处死刑，但始終沒有执行。在审判德国契卡的同时，莫斯科也举行了一次审判，被告中有两个德国大学生卡尔·金德曼和特奥多·伏尔施特，以后，俄国用这两个人換回了斯柯布列夫斯基。

这两个年輕人曾經同另外一个大学生、爱沙尼亚人馬克斯·馮·迪特瑪一道，带着写給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魯普斯卡婭的介紹信去俄国，写这些介紹信的有律师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員奥斯卡·柯亨、特奥多·李卜克內西等人。在一封写給捷尔任斯基的信中，金德曼承认他們曾策划暗杀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捷尔任斯基本人。据起訴书宣称，三名被告（以及一个叫鮑曼的第四名被告，这个人在审判时沒有出庭）都是保民团团員。当时才二十三岁的海因茨·諾伊曼，在审判时以一个熟悉保民团和德国其他法西斯組織的专家資格出庭作证。

在这次莫斯科审判后，金德曼度过了一段惊險生活。在他同伏尔施特作为斯柯布列夫斯基的交換品回国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莫斯科的經历的书，题为《在莫斯科停尸所中的两年：莫斯科大学生阴謀案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方法》，柏林1931年版。1938年，他作为納粹間諜去东京，1945年10月29日在那里被美国占領軍当局逮捕。

志、取之不尽的基金（大部分是美元）、內行的准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們信心十足，相信这次一定会获得俄国的援助。

連恩斯特·托尔格勒这样一个标准的白領工人，一个謹小愼微的保守分子典型，都抛下自己的亲人，离开他在柏林中产阶級郊区卡尔霍斯特的住家，在一个公共宿舍里睡了好几个星期，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看到托尔格勒这一类人对待"暴动主义"的态度的变化，我感到大吃一惊。这些清醒的德国工人已經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感情迷住了。

总指揮部总是担心他們的准备工作会被国家的武装干預突然打断，其实在通貨膨脹达到高峰的当时，这种担心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当左派要求大力支持全国各地自发举行的示威和罢工时，党的領导却回答說，我們首先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間，以便在軍事上作好准备。例如汉斯·普斐弗尔就曾这样說："同志們，我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該宣布总罢工。因为那样一来，資产阶級就会发現我們的計划，在我們发动以前把我們消灭。与此相反，我們应該使自发性运动緩和下来。让我們遏制我們在工厂中的組織和失业者团体，从而使政府相信危險已經过去。然后——在他們麻痹下来，誤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再让我們在一天晚上打他們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发动决定性的打击，逮捕政府成員，进攻国防軍軍营，敲起最后决战的丧钟。"我把这种战略称之为"密謀革命"，这种革命是由一小撮人去进行的，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出其不意地拿到劳动群众面前。

布兰德勒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第一項决定就是把他的总部从柏林迁移到薩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頓。他向党解釋說，这个步驟是为号召薩克森工人团結在党的周圍所必需的，但实际上，党中央委員会撤出柏林的目的却在于，使布兰德勒能方便地执行自己的政

策，把共产党的行动限制在地方实驗的范圍之內，避免它发展成为全国規模的起义。

这时，党內已經不再有任何人反对加入薩克森政府了。現在，党已經接受“共产党入閣主义”，认为它有助于为軍事組織建起一座堡垒，在柏林支部中，只有很少几个組織干部不相信这些俄国計划会行之有效。左派的头面人物恩斯特·台尔曼，在1923年9月以前本来一直是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却态度大变，对暴动战略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

俄国政治局的顾問小組正确地估計了敌方力量，据他們推测，薩克森革命者必然要与之冲突的国防軍部队，将不会超过十万国防軍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些部队会从地下的黑色国防軍那里获得多少支持，将取决于全国騷动趋向于何种結局。如果工人的部队首先发动，得以迅速控制住各个重要地点，民族主义力量的許多潜在支持者就会慑于声势，不敢出头，甚至会被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因此，共产党部长的任务就是要武装五万至六万名薩克森工人，布兰德勒則保证把装备这些人的武器迅速分发出去。

第十六章　德累斯頓、汉堡、慕尼黑

在1923年，德国政府一直秘密地鼓励德国軍队重新組織起来，并且給予各种民族主义团体以金錢支持。重新成长起来的軍队用劳动营的名称聊以避人耳目，一直在东普鲁士和布兰登堡的大庄园上进行着操练，这已經成为德国公开的秘密之一。这些黑色国防軍部队拥有包括大炮和飞机在內的現代化装备，在这方面，紅色百人团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在德国社会走向总崩潰的情况下，莫斯科认为許多施拉格特之流也許会参加德国革命队伍，因此不惜冒險一試。

黑色国防軍的青年軍官同总参謀部的一部分人有冲突，因为該部的許多成員傾向于接受施特雷澤曼和英法的妥协。就連馮·澤克特这时也在考虑同西方妥协，以便制止共产党人的总进攻，虽然在1923年前后，他一直是德俄合作的大力支持者。

在巴伐利亚，同邦政府部长古斯塔夫·馮·卡尔合作的国防軍，正在公开为武装反抗柏林作准备。他們准备首先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动手，粉碎那里的社会主义者，然后把部队开到柏林，逮捕內閣全体成員，为了挽救祖国而建立一个軍事独裁政权。对于馮·卡尔及其集团来說，如果巴伐利亚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独立，他們也就滿足了，但魯登道夫为之奋斗的却是一个"更大的德国"，他把慕尼黑完全当成了他的演武場。他的計划并未从澤克特的总部得到正式鼓励，但国防軍內若干重要的政治家趋向于贊成这一計划。

薩克森政府中的布兰德勒

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既害怕共产党暴动，又对自己下层群众的反抗情緒深为担心，这些群众不相信他們所說的形势必然要稳定下来的保证。在共产党領袖看来，社会民主党領导阶层好像是一个鋼铁般的方陣，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德国一切社会阶层所感到的惶恐和动摇，也同样存在于这些人的身上。是否眞有可能稳定通貨呢？令人望眼欲穿的外国貸款是否眞会得到呢？英国能允許德国作为它的竞爭者重新进入世界市場嗎？是否有可能找到一条可行的同法国妥协的办法呢？

希法亭的財政政策尤其为社会民主党領导集团所反对。关于这一点，奥托·布劳恩写道：

“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財政部长希法亭停止了印刷鈔票。他有許多稳定馬克和发行新貨币的計划，但是他沒有很快作出决定。有一天，施特雷澤曼在完全絕望中跑来見我，一再要求說：你一定得对你們党內的那位朋友希法亭想点办法，让他在通貨問題上赶快作出决定。他始終在那里考虑来考虑去，却不管我們正在一天天垮台。……当斯坦弗談到‘希法亭无疑是德国所曾有过的最博学的財政部长’时，我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当时，这种长处反而成了一桩致命的災难。因为正如歌德所說，光是有知識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須应用知識；光是有願望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須投入行动。”①

每一个实业家或政治家集团都有它自己的打算。譬如說，以科隆銀行家路易·哈根为中心的集团，就想发行一种被某些自作聪明的人称为“金路易”的来因区通貨。

---

① 奥托·布劳恩：《从魏瑪到希特勒》，第126—127頁。

9月26日，共和国总統正式宣布結束消极抵抗，同时答应按黄金支付工資。可是，这个諾言并未兑現；通貨继續膨脹，发展到越来越令人瞠目咋舌的地步，要成百上千亿的馬克才能換到一块美元。① 在这几个月中，报上每天都登有反饥餓罢工中死伤人数的报导。9月29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从而使它能通过国防軍干預平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部門。

10月1日，駐在波兰边境附近庫斯特林地方的黑色国防軍，在恩斯特·布赫魯克尔少校的領导下公然叛乱，政府不得不派出普魯士警察部队进行鎮压。正在准备中的新暴动这一为时过早的爆发，是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們所认为的"叛变"的答复——这指的是政府結束了对魯尔占領的消极抵抗，并且同包圍着它的法国进行談判試探。也是在10月的头一个星期里，杜塞尔多夫的警察和有法国人做后台的来因区脫离派之間发生了冲突。德国政府預見到即将爆发更大規模的內战，因此加紧設法同英法专家們达成协議。

10月3日，施特雷澤曼-希法亭內閣改組，社会民主党財政部长为德意志人民党的一名代表汉斯·魯特博士所代替。11月底，中央党的威廉·馬克斯接替施特雷澤曼担任总理，但后者仍然保有外交部长职位。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队伍龐大、而且背后有莫斯科巨大靠山

① 在10月21日这天，整个德国达到了行将崩潰的危急关头，官方挂出的外汇牌价是四百亿馬克值一块美金；在非官方买卖中，馬克与美金比率更高达六百亿比一。稳定馬克的努力經过好几个阶段。8月份，不顾財政部长希法亭的抗議，內閣采納了銀行家兼議会議員卡尔·海尔弗里希（在米尔巴赫被暗杀后不久，他曾出任过德国駐俄使节）的建議，发行了一种所謂"黑麦馬克"，其价值以谷物价格为基准。以后，在9月初，馬克价值又以不动产的价值为基准，而这种所謂的"不动产收益馬克"便一直流通下去，直到实行道威斯稳定計划、恢复了金本位时才被廢除。

的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已經如此分崩离析，以致共产党举行一次成功的暴动似乎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在旧德国和新社会之間，只横梗着社会民主党的抵抗。通貨膨脹已經使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家逐漸失去自信心；他們每天都担心着反动政变，这种政变一旦成功，他們就不会有任何出路。在德国的所有政治領袖中，很少有人比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对稳定的可能性更抱指望的了。

在薩克森，蔡格納政府的处境极其为难。它要負責維持治安和秩序，但是在9月份，失业者和警察之間的冲突有好几次已經发展成大規模騷动。薩克森的警察部队中有許多社会民主党員，在某些地方甚至占大多数。許多社会民主党工人希望，薩克森的警察最終将帮助他們同巴伐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作斗爭，但是，每当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社会民主党人打伤或杀死一个破衣烂衫的失业同志时，社会主义者对这类事件总感到极大憤慨。这样一来，蔡格納政府便接到了像雪片样不断飞来的申訴书，而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則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些要求是：不准妨害示威群众，釋放被捕者，肇事警官应予免职，另行委派社会主义战士接替其职务。

在这种压力下，蔡格納政府辞职。駐在庫斯特林的黑色国防軍发生叛乱以后，巴伐利亚暴动显然已迫在眉睫的形势，使得蔡格納願意接受共产党加入政府。10月10日，三名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保尔·伯特歇尔和弗里茨·赫克尔特——加入薩克森新政府，几天以后，卡尔·科尔施和阿尔宾·藤納也加入了图林吉亚政府。作为邦政府的新总理，布兰德勒委用格尔哈特·艾斯勒做自己的秘书，因为艾斯勒希望通过担任公职取得德国国籍。

随着共产党人的加入政府，每一个人都以为他們一定会立即采取各种激进措施——国家控制大工业、严格限制物价、組織公共

工程、沒收大庄园、給予失业者以充足的国家救济，并且——这是最重要的——建立工人战斗队。可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共产党部长竟竭尽一切力量来限制本党的綱領。布兰德勒希望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主义者爭取过来——爭取的对象主要并不是下层成員，而是保守的和鼠目寸光的中等阶层，社会民主主义賴以立足的基石。整个德国工人运动內部結构所特有的这个小干部阶层，在社会主义激进主义的老据点薩克森最为典型。这些可敬的工人官僚迷恋于合法程序，因此目光短淺，看不到必需进行的大变革；由于局处一隅，他們沒有看出德国自1918年以来已經发生的变化。他們还死抱住一个"力量均衡"的概念不放，仍然希望一个組織严密的工人运动会在这种均势下据有其明确的地位。

布兰德勒和他的朋友好像被这个阶层迷住了；首先，他們竭力要表明共产党部长也会如何令人起敬。布兰德勒钻通了公事，开始起草增加失业津貼和改善劳資关系的法令草案。赫克尔特和伯特歇尔則召开各种会議討論經济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严格保持在例行公事的范圍之內，例如增加救济金、限制物价、改善劳动市場等等。赫克尔特建議把御苑湖中的鯉魚分发給失业者，可是魚少人多，这項措施只在饥餓的工人中間引起了嘲笑。在图林吉亚，滕納发起了一場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所反对的并不是納粹，而是危害当地农夫的麝香鼠。

当柏林接到共产党人已被接納进薩克森和图林吉亚政府的消息时，德国热在施特雷澤曼和澤克特的胸中又上升了好儿度。蔡格納試图打消这种反应，他向共和国政府、特别是向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博士发出公开呼吁。蔡格納要求对軍队中的帝制派"叛徒"采取措施。"我們在这里所爭取的并不是地方目标，"他概括地說。"薩克森正在为德意志共和国本身的存在而奋斗，因为巴

伐利亚的反动派一旦出动，就会粉碎共和国。”和德国其他一切机构相同，社会民主党也在分崩离析，但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悠久傳統，因此，当該党最知名的代表之一埃里希·蔡格納发出这种强有力的呼吁时，它便被推到了左边；民族主义陣营內部同样反映了这种振荡，它的社会激进主义趋向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日益发展的通貨膨脹中，民族主义运动已經摆脫了保守的資产阶級战前民族主义遺留給它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它对左派激进主义始而模仿，继而与之融会貫通——就是在这几个月，也就是在这段对魏瑪共和国政权下德国社会的发展关系极大的时間內开始形成的。

薩克森的企业家向柏林呼吁，要求在騷动和赤色威胁下得到保护。[①]10月14日，共和国总統艾伯特援引宪法第48条規定，[②]命令阿道夫·繆勒将軍在薩克森和图林吉亚建立“共和国执行委員会”，这意味着这两个邦将由国防軍占領，民选的地方政府职权将为国防軍的統治所代替。繆勒估計会遇到当地居民的激烈抵抗，在开始集結必需的部队以前，几乎躊躇了整整一个星期。艾伯特对一个社会民主党同志蔡格納采取这种鎮压手段，不仅在党內遭到反对，甚至在政府的高級官員中也引起了不滿。当时担任普魯士总理的奥托·布劳恩，就談到过他是反对这一措施的，他认为

① 薩克森企业家协会編：《关于工人强夺生活資料与强制提高工資的恐怖行动之回忆》，德累斯頓1923年版。

② “如某一邦未能履行共和国宪法与共和国法律規定之义务，共和国总統有权借助于武裝部队使之就范。

如公共治安与秩序已遭严重破坏或面临此种威胁时，共和国总統有权采取为恢复治安所必需之措施，必要时得使用武装部队。为此目的，总統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第114、115、117、118、123、124、153諸条規定之宪法权利……

此等措施在議会要求下方得廢除。在紧急情况下，邦政府可采取地方性措施……〔但〕共和国总統或議会有权廢除此等措施。”

这样做破坏了宪法。

"在我看来，以这种方式援引宪法第48条来反对依法选出的邦政府部长，首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恶例，这会在将来带来災难。我的朋友艾伯特——我同他私下討論了这个問題——不同意我的看法。……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从一开始起就应該恪守宪法程序。艾伯特很不高兴，于是我們便彼此有些疏远地分手了。"①

地方警察被置于国防軍的領导之下，于是，国防軍命令他們对示威者采取"强硬"行动。由此造成的冲突，特别在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頓，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致使柏林动摇起来，考虑是否把繆勒召回。

政治局从莫斯科密切注視着德国的发展情况。拉狄克感到他无法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掌握局势，不得不向莫斯科請示。季諾維也夫以执行委員会的名义发出回电，命令他們坚决以武力抵抗国防軍的侵犯：

"我們对形势是这样理解的：决定大局的时刻将在不超过四、五、六个星期的时間內到来。因此，我們认为必須立即占領一切有用的据点。我們认为，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必須把我們加入薩克森政府的計划付諸实行。如果蔡格納集团願意有效地保卫薩克森

① 奥托·布劳恩：《从魏瑪到希特勒》，第133頁。布劳恩接下去还說道："在共和国执行委員会于1932年夏末排挤开普魯士政府以后，我从兴登堡的嘴里听到的几句話，证明我在1923年竟不幸而言中。'你还有什么可說的呢？'他說。'你那位去世的朋友艾伯特当年对待薩克森政府的手段，不是比我采取的措施还要严厉嗎？'这在事实上并不正确……但从法律方面来說，我不得不承认二者表面上的相似。"

在帝国政府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的长期斗爭中，德皇威廉曾夸下海口，說他只需要用一名中尉和十名士兵，就能驅散社会民主主义这一鬼影。这种被事实粉碎的豪言壮語，一直是两代社会主义工人的笑料。可是，到1932年7月20日，德皇的吹牛竟变成了事实：卡尔·澤弗林，最后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魯士政府首脑，果眞被两名警官赶出了政府。

不受巴伐利亚法西斯分子的蹂躏，我們必須加入政府。必須立即武裝五六万名工人。不用理睬繆勒将軍。在图林吉亚也应該采取同样态度。"①

开姆尼茨会議

繆勒从柏林发出一份由盖斯勒、艾伯特、施特雷澤曼和澤克特共同签署的告薩克森人民书。艾伯特的签名表示了他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領导机构的支持 繆勒正在厉兵秣馬，准备向薩克森进軍；納粹集团时常从巴伐利亚越过薩勒河侵入图林吉亚；随着整个經济到处为通貨膨脹所震撼，示威、反饥餓騷动和罢工达到高潮。第一枪将在什么时候响起来？又由哪边先开这第一枪呢？在"帝制派"同共产党人之間的最后摊牌中，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脫离艾伯特加入战斗。就在这一时刻，在10月21日，工厂委員会于开姆尼茨举行了一次会議。

社会民主党派出的代表比規定的人数要少，因为追随着艾伯特的右翼分子想尽量縮小会議的重要性。正如代表的成分所示明，②这次会議的目的主要是处理日常的劳工問題，选擇代表时也是着眼于他們对經济事务的了解，而并不重視他們有无政治头脑。

---

① 《党代表大会議事录》，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第30頁。

② 与会代表的組成情况如下：

工厂代表	140
地方工会理事会	102
合作社	26
行动委員会	15
失业者委員会	16
共产党	60
社会民主党	7
独立社会民主党	1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为时已晚？》，第26頁。）

共产党組織家在幕后进行了狂热的活动。拉狄克在开姆尼茨，斯柯布列夫斯基以及他手下的一大批技术专家也到了那里。就在会議召开前夕，总指揮部集体討論了季諾維也夫的电报、繆勒的軍队即将开进薩克森以及計划武裝六万名薩克森工人的問題。这封电报戳穿了布兰德勒的牛皮；現在是拿出他一直在談論着的武器的时候了。警察营房中儲藏的大批武器，很快就会为国防軍所控制；到那时，重武器甚至机关枪都要凭武力才能夺取到手。共产党将只能分发它自己儲藏的武器，而党手上拥有的武器数量事实上是很有限的。这样一来，工人能获得多少武器就要取决于行动的規模，取决于組織行动时的大胆和銳气，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成功地鼓动群众夺取敌人的武器。但是，那正是布兰德勒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作出的决定。因此，总指揮部决定先在薩克森举行一次抗議国防軍入侵的总罢工，看看在整个德国会引起什么反应。

布兰德勒以共产党出席开姆尼茨会議首席代表的資格，要求会議宣布举行总罢工。他的演說一点也不能鼓舞人心；从他那号召拿起武器的漂亮話中，明显地流露出他认为这时举行总罢工不过是一場冒險賭博的眞正看法。布兰德勒的背景和他对莫斯科会議的反应，是为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事們所熟知的。俄国政治局的分裂、托洛茨基权力的削弱、列宁的病势垂危，最后还有保加利亚失败的阴影，这一切都沉重地籠罩着在德国一个偏僻角落举行的这次不幸的会議。

布兰德勒演說結束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陣冷冰冰的沉默。每个人都知道，針对繆勒宣布总罢工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內战阶段。当时，至少有某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抱有幻想，认为繆勒不会采取反对蔡格納的行动，他只是要假道薩克森开到巴伐利亚去打击法西斯主义者。会議动搖不定。本来幷不是沒有可能引导代表們

摆脱这种恐慌情緒，可是单单說些漂亮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每一个重大的轉折关头，总会出現这种需要克服的犹豫。而且，社会民主党人在开姆尼茨的怀疑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把同国防軍斗爭的重担完全压在薩克森工人的肩上，是一个愚蠢的計划。只有在无产阶級力量的重要中心——汉堡、柏林、鲁尔的領导下，发动斗爭才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在那些地方，从他們的力量动員起来的时候起，社会主义者就可以占据上風。在每一个那样的区域，共产党的力量都要比在薩克森强大，而社会民主党代表則认为，共产党所以要选中这个邦起事，目的在于保存共产党的干部。

在布兰德勒演說后人們犹豫不决的时刻，蔡格納政府中的一位部长恩斯特·格劳普站起来威胁說，如果布兰德勒的建議被接受，他同另外六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就要一起退出会議。这是一个决定性关头。即使說沒有格劳普作梗，布兰德勒能够取得贊成总罢工的多数，也等于是通过全薩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支部进行战斗——而这并不是內战最适宜的开端。会上选出一个小組委員会来討論总罢工的可能性問題，于是，布兰德勒的动議便在这个二等会議的送葬下被埋进了坟墓。

10月23日，也就是开姆尼茨会議結束两天后，繆勒将軍的队伍輕而易举地开进了薩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頓。在迈森、次維考和皮尔納，他遇到一些抵抗。人們对士兵开枪，在軍队行进的道路上設置障碍物。在弗賴堡，群众赤手空拳地进攻国防軍，結果十三人被杀，許多人受伤。軍队占領了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和一切战略据点。共产党报紙被封閉，数以百計的下层党員被捕。这还不是納粹恐怖，但被捕者都遭到了拷打，被戴上手銬监禁起来，吃的只是面包和水。

10月27日，柏林方面要求蔡格納政府立即辞职，但它坚持自

己的合法权利，拒不听命。于是，施特雷澤曼內閣任命德意志人民党的卡尔·海因澤博士为薩克森民政专員，繆勒将軍把蔡格納逮捕。共产党部长迅速轉入地下，离开当地去柏林。打算組織抗議罢工的自发企图失敗了，国防軍毫不費力地占領了薩克森的其余地区。仅仅过了一个月，在11月13日，图林吉亚也被保尔·哈澤将軍占領。

海因澤博士一接任薩克森行政长官，便开始同卡尔·費利希博士領导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集团談判。海因澤在薩克森邦議会发表的一篇讲話中，亲自保证一定撤出軍队。可是，繆勒将軍仍然留在那里，費利希新內閣一直在国防軍占領下工作到11月底。

蔡格納被控以受賄罪：他的妻子曾經接受过某个崇敬他的乡下人送来的一头鵝。蔡格納本人甚至不知道他在某一个星期天吃到的烤鵝是別人送的，但是在一場恶意的誹謗运动中，这件可笑的事竟被夸大成为“国家官吏的貪污”。几天以后，蔡格納被釋放，但到11月21日又再次被捕，这一次被控以叛国罪。

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工人政府”就这样可悲地結束了。經过九个月热烈而复杂的討論，經过莫斯科的三次会議以后，共产党对薩克森和图林吉亚政府作出的貢献，不过是一些軟弱无力的宣傳和徒劳无益的改良措施而已。当时，共产主义运动要比納粹組織强大許多倍，納粹的主要活动地盘仅限于巴伐利亚，党員才一万五千人。① 斯巴达克起义战斗傳統的继承者，在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这些有經驗的顾問指导下，本来应該能够在德国的多难之秋走在前面。可是从內部来剖視，共产党人的組織是不够严密的，并且由于派系之爭而四分五裂，他們惊慌失措，拿不定主意，沒

① 参看康拉德·海登：《国家社会主义史》，倫敦1934年版。

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在俄国革命过去六年以后，斗爭的火焰已經如此瀕于熄灭，以致連一个紅色的薩克森都点燃不起来了。

汉堡大失敗

10月22日，也就是开姆尼茨会議开幕和繆勒进入德累斯頓的同一周內，在汉堡爆发了一場暴动，一場由少数战士进行的孤立斗爭。在开姆尼茨会議开幕前夕，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把德国各地的信使召到那里，等着发出暴动的信号。莫斯科的决定是明确的，中央委員会已經接受这一决定；季諾維也夫的电报是同样明确的，布兰德勒也沒有表示反对。布兰德勒后来竟完全以开姆尼茨会議的决定作为党以后行动的基础，这是等待着的信使們沒有預料到的一个发展。布兰德勒作出取消暴动和必須退却的宣布以后，他們惊得目瞪口呆，但仍然服从了命令，把这件信息分头带給正等待他們回去的各地党組織。

可是，有一个信使在此以前已經回去了。中央委員赫尔曼·雷梅累已經搭上去汉堡的火車，和他在一道的是出席会議的汉堡代表恩斯特·台尔曼。[①] 他們带着行动的时間已到这一指示，在晚上近六点时到达汉堡，命令整个党組織立即动員。不一刻党的所有建筑物都对非党員封閉了，門口安上了崗哨。紅色百人团被召到集合地点。集会是靜悄悄进行的。沒有任何长篇大論，沒有任何演說。

以台尔曼为总司令的指揮委員会，下令当晚举行一次迷惑敌人的示威。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所有众所周知的共产党据点四周，

---

① 雷梅累的結局很不幸。他在1932年写过頌揚苏俄的文章，但莫斯科在1933年把納粹的胜利解釋为共产党“有秩序的退却”，他却不能接受。他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

誘使警察赶来巡邏，借以分散他們的注意力。按照党在过去两个月中所作的准备，汉堡共产党人把力量完全集中于軍事行动。沒有号召罢工，沒有草拟关于政治目标的声明。計划的中心是取得武器的問題。預定在黎明时襲击警察营房，逮捕警官和警士，然后把他們的武器分发給紅色百人团。

紅色百人团在夜間集合起来；他們带足了两天干粮。以前当过兵的人負起指揮責任。这些人的装备很差，五十个人才有三把手枪和两支步枪。虽然共产党人几个月来一直听着領导上的吹嘘，說什么这次大規模政变发动前将在軍事上作好充分的技术准备等等，而这时的情况幷非如此，他們仍然服从了命令，始終沒有散伙。

在預定的时刻清晨四点十五分，大約有十个警察派出所遭到襲击。有几个哨兵被杀死，但整个說来幷沒有怎样流血。大部分派出所都被共产党人出其不意地攻占；他們逮捕了警察，分发了几十支步枪。可是，主要目标——邦貝克区馮·埃森大街上的派出所却未被攻克，这个营房里儲藏着一批机关枪，为了襲击它，特地派出了一支由前軍官汉斯·博岑哈特率領的較强队伍。沒有能攻克这个据点是一个重大挫折。

与此同时，中央委員会的相反命令由另一个信使送到汉堡，但是台尔曼和其他共产党領袖都出去参加战斗了。信使跑了二十四小时也沒有能和他們联系上。

战斗开始展开。被紅色百人团攻克的派出所的警察，带着总局的援軍赶了回来。在工人住宅区希夫貝克，他們企图以装甲車突破暴动者的防綫，但起初幷未能得逞。他們在邦貝克遇到同样的抵抗，这里是一个貧民窟郊区，到处都是阳台和院落，弯弯曲曲的小街和奇奇怪怪的轉角，居民們是堅决站在共产党暴动者一边

的。警察沒有进入这一危險地区，而是以一支上千人的部队圍住了它。

“人們自发地砍倒树木，掘起鋪路石块，挖出战壕……在一小时內，邦貝克便筑起了五十多个街垒。如果沒有工人居民的帮助，共产党是无法和警察对抗的。革命者的武装从沒有超出八十来支步枪和一百六七十把手枪……每一个窗戶、每一个屋頂、每一个角落对于警察都是危險的……每一个阳台、每一个突出的墻角、每一座房屋、每一条通道，都为革命者提供了掩护。”①

汉堡工人对共产党暴动者并不敌視；这一次，警察只能孤軍作战，得不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支援了。在造船所和港口，人們都在怠工。

汉堡暴动者抱着幻想进行战斗，他們以为全德国都正在战斗，俄国很快就会插手干預。許多由于逃避德国警察搜捕而移居俄国的汉堡共产党人，这时都回来了。

“人們爭先恐后地問这些同志：‘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他們能給我們援助嗎？同志們准备好了嗎？’他們的回答是：‘总参謀部已經拟好了越过波兰的計划。边境駐軍已經得到增援。后备队也已經秘密动員……只要一声令下，紅海軍便可以出海。滿載着武器彈药准备开来德国的运輸船，正在升火待发。’”②

---

①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組織工作》，第23頁。

② 同上，第26頁。

措伊彻尔的这本小册子，是亲身参加过汉堡暴动的人写出的很少几本报导之一。在1923年10月，他才二十岁，是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他以布尔迈斯特的化名参加了德国党的地下机构。作为博岑哈特手下的一名組长，他参加了进攻馮·埃森大街派出所的战斗。

1924年，措伊彻尔被普魯士警察逮捕，因为有一个农业工人据說曾把暗藏的武器交給了法西斯分子，結果为恐怖团所暗杀，而措伊彻尔和这件杀人案有牵連。他在所謂“小契卡案”中被判刑，服刑四年后遇赦出獄。他为共产党的日报《汉堡人民报》做了一年特約撰稿編輯，以后便脫离了党。

在莫斯科，共青团成立了专門去汉堡的特殊輔助队。①

第二天，在共产党人中間流傳开了形形色色鼓舞人心的謠言。据說紅海軍正在进港，俄国軍队已經开进波兰。共产党敢死队的士气旺盛；他們相信自己一定会在汉堡占上風。

在此期間，第二个信使終于找到了博岑哈特、台尔曼以及其他領袖。他們听到了眞情，得悉开姆尼茨会議不过是虛張声势，汉堡正在孤軍作战。既然退却的决定已經得到拉狄克和斯柯布列夫斯基的批准，一直談論着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武器当然是不会发下来的了。台尔曼周圍的一群人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傳达給共产党步兵，于是战斗便继續了好几天。

暴动虽然流产，汉堡共产党人在几小时內夺取到的武器，却要比他們許多天来从中央委員会那里領得的为多。布兰德勒委員会购买和儲存了大批武器，但由于害怕地方組織不能把它們保存好，一直沒有把这些武器发下去。

战斗到第二天晚上，紅色百人团的高級領导人接到秘密命令，要他們在次日退却。第三天，巷战仍在继續，但暴动者的抵抗和勁头已漸趋低落，到当天晚間，他們便被驅散了。人們把枪支紛紛扔掉或隐藏起来。几百名共产党人被捕；另外有几百人逃走了——大部分逃到了柏林。

在日后編造的斯大林主义神話中，竟說什么这次暴动表現了汉堡共产党人的非凡能力和清醒头脑。誠然，他們表現出了勇气，

《为共产党的恐怖組織工作》一书，草率地罗列了他亲身經历过的一些事件，同时夹杂着若干自怜自惜的感想和古怪的政治見解。在1931年該书出版时，他对党的主要不滿还仍然是这样一点：党没有公开承认恐怖团的活动；他抱怨說，恐怖团团員遭到了党官僚們的遺棄。

① 事后，在11月7日，莫斯科的学生們举行了示威，他們的旗帜上写着尼古拉·布哈林的話："我們把书本抛开，拿起枪来去帮助德国兄弟！"

但他們的行动却是准备不足和領导无方的。这些局处一隅的巷战同党的复杂决議中那些豪言壮語、同党为准备德国的十月革命投入的金錢和人力形成了鮮明对比。在这三天中，汉堡无产阶級等待着进一步的发展，在那里也像在薩克森一样，一切都取决于旣大胆而又考虑周到的主动措施。在德国第二座最大的城市汉堡发生的事件，其重要性本来应該是开姆尼茨这个偏僻小城的一次会議作出的决定无法比拟的。

卡尔-魯登道夫阴謀

到8月，莫斯科为德国党拟訂的政策已經开始明显轉变，在此以前一直被遏制着的德国共产党人，今后可能会受到鼓励，放开手来大干了。施特雷澤曼还沒有找出克服总崩潰的任何方法，不得已邀請了四名社会民主党部长入閣，企图以此来稳定自己的內閣，为对付这种預見中的共产党行动作好准备。他的这一措施在本党內部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中間(特别是在巴伐利亚)都引起了强烈不滿。几个月前去慕尼黑的陆軍元帅馮·魯登道夫注視着正在成熟的危机，断定举行另一次暴动的时机已經到来。

自1919年夏天以来，慕尼黑已經成为一切最仇視“十一月共和国”的人的聚集地。埃尔哈特上尉于1923年春在来比錫越獄后，他所逃亡的去处便是慕尼黑；結果，柏林政府竟不敢在那里把他再次逮捕。正是在慕尼黑，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在德国的地平綫上出現。

早年的这个希特勒是一个奇怪的产物，他的头脑里汇集了新旧德国一切互相冲突的思潮，它們在动蕩的1923年开始逐漸具有明确形式。他一只脚跨在战前保守派旧的陣营里，另一只脚又插在社会激进主义的力量中間，就这样摸索着道路，設法把这两支力

量联合成一个强大得足以推翻十一月共和国的政党。在这些草創基业的日子里，我們已經看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日后一切特征的端倪——把德国工人的雄心壮志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結合起来的政策，以及由此而对一切阶級，对工人、工业巨头、軍队、农民和中产阶級都普遍发出热烈呼吁等等。在他夺取政权的斗爭中，希特勒参照布尔什維克国家党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組織，这是通过墨索里尼——在欧洲傳播这种病菌的媒介——的例子学来的；幷且，他还把旧普魯士軍队的特点移植到这个組織的身上；他一向崇拜普魯士軍队的紀律傳統，认为它們体現了德国生活方式。

尽管他的声誉迅速增长，希特勒这时还不过是魯登道夫的附庸。魯登道夫不打算步卡普和吕特維茨的后尘，再去发动一次純軍事性的暴动，而希望在巴伐利亚先能有一个友好的政府，然后再利用这种条件举事。他同一个老派保守分子古斯塔夫·馮·卡尔結成联盟，这个人最关心的就是使巴伐利亚摆脫柏林——它在旧德国象征着普魯士，在新德国象征着赤党——的統治。

9月26日，巴伐利亚政府宣布全邦处于紧急状态，任命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务专員。巴伐利亚国防軍駐軍司令馮·洛索夫将軍对他公开表示同情。慕尼黑和柏林都密切注視着工人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总部会有什么反应。經过好几个星期，共产党仍然沒有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于是洛索夫便宣布效忠卡尔政府，这一行动也就构成了对施特雷澤曼政府的叛变。

这幷不是巴伐利亚的分离运动；① 与此相反，“受德国人民委托的”魯登道夫和卡尔宣布慕尼黑正在保卫着共和国的眞正利益。

---

① 然而，就在这决定命运的几天中，一个来因共和国宣布成立了；这个由法国人一手造成的軟弱的傀儡政权，仅仅存在了几天。

但是，他們这时仍然举棋不定，不敢貿然迈出最后一步——通过图林吉亚和薩克森进軍柏林。他們害怕遇到紅色分子的抵抗，因此，他們在等待着来自柏林国防軍的援助。他們认为在北部能得到支持的这种希望并非沒有根据，因为澤克特等人已經发生动搖，正在考慮是否公开支持魯登道夫，而如果事情发展到国防軍要互相殘杀时，他們肯定会站到巴伐利亚这方面来。当施特雷澤曼派繆勒进入薩克森、派哈澤开入图林吉亚时，他曾暗怀着这样一种微弱的希望，即：共和国一旦面临严重危險，也可以用这些国防軍来鎮压巴伐利亚嘩变的軍队。可是，假如这些軍队眞的被派去打洛索夫，那就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他們将不会和洛索夫作战，而会和他联合起来进軍柏林。这样一来，魯登道夫就掀起了另一个卡普暴动，但規模要比它大得多，而民政当局則会再次为軍队所抛棄，在他們的进軍面前束手待毙。蔡格納政府的輕易被解散，对叛乱密謀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柏林国防軍向慕尼黑更靠近一步。通貨膨脹、經济解体、德国在欧洲經济中丧失地位，这一切都在国防軍中（就像在德国其他組織中一样）引起了思索，总参謀部也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境地。同 1918—1920 年的事件相比，薩克森和图林吉亚的象征性抵抗显得是那样軟弱无力，这使澤克特受到了震惊；魯登道夫酝釀着的計划看来是那样容易实現，簡直容易到了誘人的地步。

“本周內将决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否敢于举事〔施特雷澤曼在 11 月 5 日宣称〕。共和国政府在科堡駐有足够的国防軍。假如国防軍不起作用，这些极端分子就会取得胜利。那时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就可能实行独裁。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如果这些匪徒竟能冲进柏林，我可不願意逃往斯图加特〔就像共和国政府在卡普暴动时做过的那样〕。我将留在我有权留在那里的地方，他們高兴的話可

以把我枪毙。”①

11月8日晚間，还沒有拿定主意的卡尔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店里对他的追随者发表了演說。希特勒是这个集团的急先鋒，他的作用在于打消同事們的动搖情緒，推动他們前进，这时率領着他的冲鋒队闖进会場，强迫卡尔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員(包括希特勒)被匆促选定后，立即发表了出来。洛索夫将軍将担任国防部长；巴伐利亚警察首脑宰塞尔上校将担任德国內务部长；魯登道夫将指揮向柏林进軍的部队。这个硬逼着卡尔宣布的政府在勉强产生后毫无进展，同一天夜間便宣告死亡。卡尔决不願意承认自己是这个啤酒店棄儿的父亲，他离开示威队伍回来以后，立即同他的亲信商談，决定对希特勒极端分子采取行动，必要时不惜使用警察进行鎮压，而不让两派国防軍之間的分歧趋于激烈。这样，卡尔便成了民族主义分子当中的布兰德勒，他束縛住极端派的手脚，阻撓他們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已經劍拔弩張、一触即发的內战，又一次平息了下去。

在民族主义分子当中，也发生了一次相当于汉堡暴动的事件。11月9日，魯登道夫和希特勒发現他們已經被卡尔出卖以后，决定以直接向群众呼吁的手段把他排除。他們带領自己的追随者向紀念旧軍队光荣功勛的司令堂进发，在那里，警察部队毫不費力地把他們驅散了。②

就这样，共产党人的淡漠无为便利了施特雷澤曼和巴伐利亚

---

① 轉引自亚瑟·罗森堡:《德意志共和国史》，第215頁。

② 納粹执政后，这个发动民族主义暴动的地点便成了全国景仰的圣地。在随着这一事件而来的审判中，魯登道夫获釋(法庭判定他的在場只是出于偶然)，希特勒被判处九个月“名誉”监禁，他在这段时期內写了《我的奋斗》一书。

希特勒上台后对这次出卖他的人报了仇。卡尔在1934年6月30日的血腥清洗中被杀，他的尸身被扔进了达豪荒原。

国防軍叛軍之間的妥协。不仅施特雷澤曼和澤克特在危机結束后威信陡增，就連艾伯特那种江河日下的地位一时也有所恢复，因为他曾經不顾自己最亲密的社会民主党同事的劝告和抗議，支持了前两人反对共产党人的主張。直到最后一刻，艾伯特和施特雷澤曼都不能肯定是否会得到澤克特的支持。于是，德意志共和国的命运又一次被提到夜間紧急会議上来决定。在11月9日，也就是德皇退位五周年紀念日的夜間，艾伯特第二次作出冒險决定，让澤克特負起維护共和国和鎮压国防軍兵变——这一次是鎮压巴伐利亚的洛索夫——的責任。

“11月9号夜間〔奥托·布劳恩写道〕，柏林內閣一接到来自慕尼黑的消息，便立即召开会議。非常奇怪的是，尽管我的住处和总理府只隔着一条威廉街，却在开会好一陣后才把我叫去。当我赶到激动的会場时，他們已經作出决定：根据已經宣布的紧急状态，把行政权交給武裝部队总司令澤克特。

施特雷澤曼不理解我何以要反对这种做法。艾伯特也被我的話刺恼了，因为我提醒他們，我們之間曾經商定，在宣布紧急状态后，行政权力依然应該由民政机构掌握。他答复說：在普魯士，軍方只应該和民政当局一致行动，可是在巴伐利亚，只有像澤克特这样一个有軍权的人才能使国防軍就范。他这种說法也許幷不完全錯。但我仍然忍不住提醒他注意一个事实：正是这位馮·澤克特先生曾以他的‘国防軍不打国防軍’立場，使得政府对卡普暴动分子束手无策。”①

11月22日，在薩克森的共产党人和慕尼黑的希特勒暴动均被击敗以后，澤克特下令在紧急时期內解散共产党。形势已經非常

① 布劳恩：《从魏瑪到希特勒》，第135頁。

平静，足以使他能在同一天命令国防軍从薩克森撤退。共产党在全国范圍內被宣布为非法，这还是第一次；在以前的內战年代中，它也曾一再处于半地下或地下状态，但是这种状况一般总是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特别是巴伐利亚），或者是仅仅持續几天或几周而已。澤克特的命令在許多地区是由社会民主党警察执行的，他們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比較寬大。党仍然进行活动，不过在开会和示威时要使用某些一望而知的掩护名义。它在議会和邦議会中的代表继續任职；他們可以会見选民，举行干部会議。沒有人认为紧急状态会超出几个月；这道禁令只是临时性的。

尽管有这种寬大（这同我們今天的类似措施形成了对比），澤克特的命令仍然是魏瑪民主政权中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特征。这是一种檢驗独裁方法的效率以及工人运动对它們有什么反应的試紙。德国共产党的下层党員在大多数工会主义者当中都得到了很大同情，尽管他們之間还存在着許多分歧；因为共产党人为继續保持自己的組織而进行的斗爭，符合于俾斯麦时代德国工人运动的傳統。党的被宣布为非法加深了共产党人中間的痛苦情緒；这一事实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結束，表明他們在內战中业已失敗。

第十七章　德国革命的失敗对俄国党的影响

在汉堡暴动失敗和德国党被宣布为非法以后，一切秘密軍事活动都停頓下来。来自东方的軍事顾問們不見了，中央委員会开始圍繞着“通常的”鼓动工作重新組織党的生活。它那道取消全党秘密动員的命令，引起了人們的强烈蔑視和滿腹怀疑。有好几个月之久，党內的小人物們脫离了他們的正常生活环境，对他們的这样的信念作出了牺牲：到明天或后天，自己就可以在一个完全改变了的德意志共和国內得到合适的崗位。平日的教育使下层党員們了解到，缺乏“正确領导”是妨碍工人共和国建成的原因，因此，他們这时都異口同声地对党的領袖布兰德勒发出了責难。俄国远在天边。对俄国党的問題可以进行理論性探討，但是它們同日常的德国問題却沒有关系。因此，唯有拿近在眼前的人来問罪了。在过去几个月中，布兰德勒及其同僚曾不断地鼓动党員，說服党員，对他們下保证，向他們发命令；所以，他这时成了众矢之的。

德国革命的失敗也难免要危及季諾維也夫本人的地位，因此他从远处竭力鼓励这种攻击。在一些語气含混、沒有指名道姓提及布兰德勒的政治声明中，季諾維也夫尽量促使布兰德勒在党內的核心干部趋于分裂。在布兰德勒担任薩克森部长的决定性日子里，就逐漸形成了一个“中派集团”。他手下的人不断地批評他，譬如說，他們曾在 10 月 17 日写信給他說：

“像現在这样长此下去不是了局。你正在浪費着宝貴的时間，

同政府里的那些社会民主党混蛋躲在屋子里爭論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加入政府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使群众新产生的革命勇气增漲十倍，把我們的力量組織起来。”①

于是，布兰德勒就这样成了替罪羊，对他的政策和对他本人的批評被夸大了，和他实际起过的作用相去甚远。虽然在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解釋德国十月革命的失敗原因时，布兰德勒一直是他們的主要嘲笑对象，而他也攻击过共产国际，特别是攻击过季諾維也夫，但是甚至直到今天，他都始終沒有揭露过俄国政治局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失敗应負的責任。他完全有理由感到自己受了委屈。

布兰德勒在为自己申辯时正确指出，他从来沒有眞正接受过莫斯科的暴动計划。

“直到最后一刻，我始終反对加入〔薩克森政府〕的决議。……在沒有作好我在这里概括說明了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以前，是不应該加入政府的，可是，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議，这些准备工作都沒有做。我很后悔的是，我終于同意了这項决議，以为我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安排。在我看来，在 11 月根本就沒有起义的基础，甚至連抵抗国防軍的基础都沒有……我們将不会像在汉堡那样便宜，牺牲少数人便能脫身；我們将会失敗得不可收拾。因为要是起义的話，那些非共产党工人尽管同情我們，却不会参加薩克森的巷战，就像他們在汉堡表現的一样。不錯，过去曾有过这样的情况：甚至在形势看来比 10 月远为沒有希望的时候，我們都敢发动战斗。可是那是在 1918—1920 年，同現在是两回事。”②

在政变失敗后发表的这篇外交辞令式的声明，并沒有能够平

① 《党代表大会議事录》，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第 276 頁。

② 同上，第 246—247 頁。

息党員群众的不滿。德国工人对自己的領袖以及对工会干部和共产党人經常感到的失望，后来終于被納粹在他們掀起的反对工人官僚——“反对工头”的运动中巧妙地加以利用了。“麦克倫堡支部要求柏林的同志把布兰德勒吊死在最近的一棵树上。东普鲁士的共产党人威胁說，如果他敢到那里去，他們将使他遭到同样的命运……”①

托洛茨基和政治局决裂

德国革命遭到慘敗和德国党反抗布兰德勒的消息，恰恰在一个最严重的时刻傳到了要为共产国际的政策負責的季諾維也夫耳中。在1923年的这最后几个月中，許多复杂因素使得政治局內的相互摩擦达到了分裂的地步。由于列宁长期臥病，其余几个政治領袖之間的关系变得日益錯綜复杂(而对于这种复杂性，迄今还沒有人作过足够明确的分析)。党的內在弱点以及它同俄国其他一切社会阶层之間的紧張关系，使全党領袖的吉凶問題——是从此一病不起了呢，还是能恢复健康，重新視事——成了一切算計和权謀、一切纵横捭闔中的主要考虑因素。季諾維也夫及其同伙加米涅夫的地位，在德国共产党人有希望成功的那几个星期里曾变得不可一世。而到这时，对他們的反应也十分强烈。季諾維也夫甚至不得不认眞考虑，在德国的行动由于計划不周和执行不善而引起普遍憤怒的情况下，他本人是否能經得起这陣浪潮的冲击。

①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組織工作》，第25頁。据揚·法尔廷(《走出黑夜》，紐約1941年版，第58頁)說，路特-費舍曾經找过一个恐怖团組織，要他們把布兰德勒痛打一頓。就牽涉到我个人的部分来說，这个故事是不眞实的。瓦尔丁提到的两个姑娘路易絲和埃娃·施內勒是布兰德勒集团的成員；在1923年秋天，我只掌握着柏林支部，当时，我假如眞提出这样的建議，他們連听也不会听一下的。不过，这件趣聞倒很能說明他們的情緒，当时，全国的恐怖組織都在酝釀着类似的計划。

經济状况已經为新經济政策所改善，但还沒有好到足以平衡工农业生产，这时，工农业生产之間仍然呈現出不一致現象，用党的术語来說就叫做“剪刀差”。战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曾經继續保持下来，特别是在1921年夏收荒欠、伏尔加河流域发生饥饉时严重到頂点。（当时，列宁曾吁請美国給予援助，美国也响应了这一呼吁，派出了胡佛委員会。）当然，随着新經济政策的实行，以及1922年的丰收，情况也有了相当改善。不过，工业的恢复依旧是緩慢的，而不利于农民消費者的通貨膨脹更加重了这种失調現象。

1922年底，国家銀行发行了一种称为“丘逢尼茨”的銀行券，以黃金为保证，一丘逢尼茨等于战前十卢布硬币。不过，丘逢尼茨卢布只是以大票面金額发行的，在一切小額交易中，还得使用已經貶值的紙卢布。这样，全国便同时流通两种貨币，一种是有保证的，另一种則由于通貨膨脹而继續貶值。在1923年，紙卢布的通貨膨脹不仅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且影响到丘逢尼茨的价值，从1月到10月，丘逢尼茨貶值了大約四分之一。这种物价飞漲的情况剝夺了农民市場上的工业品。而且，国营托辣斯还囤积商品，不願意用这些实际价值去換取不值錢的卢布。这样一来，在新經济政策下增加的农业生产便得不到补偿，农民再次縮减耕地面积。“农民又开始淪落到像‘战时共产主义’那时的艰苦处境中了。”① 許多农民，例如土耳克斯坦的棉农，开始要求支付給他們丘逢尼茨卢布。

即使抛开貨币困难不談，工业也沒有能力滿足农民对农具和消費品的要求。手工业和小企业的进展产生了一些有限的結果，但是重工业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而全国人民却迫切需要各种各

---

① 莫里斯·多布：《革命以后俄国的經济发展》，第233頁。

样的商品。据俄国党的官方历史学家說，“因为国民經济增长得迟緩的緣故，所以无法把失业現象消灭。”①

对于如何克服这种經济危机的問題，党內有两派意見。一派傾向于把所有的缺点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家控制和国家計划，情况才能改善。另一派則感到国营托辣斯和辛迪加的集中控制已經太多了，要求对国营組織加以限制，以便使农民市場能够較自由地呼吸。这种意見受到了已經形成一个龐大集团的企业經理們的反对，他們看到对国家控制的任何削弱都会直接威胁自己的領导地位。于是，业已由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1923年提出的工业集中化計划，这时更变本加厉地实行起来。

事实上，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对新經济政策的結果都感到不滿：党是不滿的，它担心自己会失去对經济机器的掌握和对农民的控制，正在一切方面竭力保持自己的独裁統治；农民是不滿的，他們曾希望不仅有更多的消費品，而且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国家官僚和苏維埃知識分子是不滿的，他們对新經济状况下的生活方式感到不自在，也要求从党机器那里得到更多的自由；最后，工人也是不滿的，他們憤懣地看着党和工会中的紀律越来越严，而耐普曼却比較自由。

从党的高級領导集团中被清除并受到严厉压制的工人反对派各集团，在下层队伍中获得了新的力量。随着列宁的不能視事，托洛茨基便成了一个单枪匹馬反对統治阶层的威風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各种反对派全都聚集到他身边，希望像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能够同党的壟断作一番斗爭。虽然他仍旧是紅軍司令，托洛茨基这时已經日益失去軍权。俄国人日益看出，独裁的危險

① 〔約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25頁。

并不单单来自軍队方面，党的統治阶层已經表現出更大的危險性。托洛茨基是一个非布尔什維克革命政治家，他参加党的历史很短，并且几乎是以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身分加入布尔什維克党的，虽然他是新国家的締造者之一，却受到統治阶层的排挤……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有利于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出面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政治局。民主集中派集团同他正式結成联盟，其他各种集团——包括許多曾經在軍队和工会組織問題上反对过托洛茨基的人在內——也都支持反对派。

这一新的抵抗运动在它的最初阶段，主要注意的是如何来医治俄国已經解体的經济。它的政綱中包括一系列提高国营工业組織效率的建議。"这种政策的主旨就是要实行最庸俗的資产阶級商业核算……而不顾及任何政治考虑。"① 但是，立即在党內引起一陣抗議風暴的，还是那項被称为"商品干涉"、即同資本主义世界进行自由貿易的建議，事实上，这也的确是一項会对党的壟断产生深远影响的大胆主張。它所举出的理由是：俄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营工业太軟弱了，不足以担当起这項任务，而如果不大量进口机器和消費品，俄国的經济就无法平衡。廢除对外貿易的国家壟断，鼓励同資本主义世界进行新經济政策的貿易，这样做就能緩和俄国国內的紧張形势，并且最終将削弱党的壟断地位。首先，这将能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提供工人不能供应給他們的商品——从而用不着实行强制方法便能推动俄国經济变成农民合作社經济。在他后来同斯大林暫时联合的时期，布哈林发展了有关农民經济的类似理論，因为党和全国人民之間的关系癥結，恰恰就在于使农民經济工业化的这样一种方法。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196頁。

在执行新經济政策方面，1923年9月的托洛茨基集团更进了一步，要求扩大党內民主。为了证明这种要求的合理，托洛茨基竭力戳穿所謂“老近卫軍”永不会犯錯誤的神話。他特别向那些对党的老一輩滿腹不滿的大学生和青年組織呼吁，在論战中把“老近卫軍”的蛻化明显地比作第二国际。然而，他所要求的仅仅是一种得到更新的党內民主制度，而实現这种制度的方法幷不是通过对党机器下一些法律性定义，而是恢复“集体主动性，恢复毫无顾忌地自由地展开同志式批評的权利——組織自决权”。他希望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从此以后誰也不敢再把党恐怖化了。这种要求是工人反对派以前那些口号的翻版，但是內容却冲淡了一些；它同这个集团創造的名詞“工人民主”是分不开的，但本质上却有所不同。

在1923年，托洛茨基联盟、工人反对派和举国上下的不滿起了推动作用。相当大一部分国家行政官員的离心离德，更增大了这种推动力。这些行政官員中虽然有許多人是党員，他們对党机器的权力越来越大的現象却深感不滿。在革命时期由苏維埃和工会实行的工人民主的一切理論，这时已完全被抛到了一边。現在，人們产生了一种新的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它将使党变成自己的一个执行部門，而不是与此相反。“必須更新和洗刷党机器，使它感到自己不过是执行集体意志的工具而已。”① 国家組織干部对党的这种反抗，反映在各种反党集团的形成上。

接着，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发生了，对于这些事件，只有托洛茨基死后出版的著作作了初步探討。列宁在这一时期同斯大林的决裂，象征着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心，即：有可能成为屠杀布尔什維克雅各宾党人的反革命波拿巴的，幷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斯大林。

① 托洛茨基：《新方針》，新国际出版公司，紐約1943年版，第93頁。

季諾維也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已感觉到这种危險，在这次大会上，他虽然是政治报告人，却第一次意識到了斯大林机器的新权力。

“季諾維也夫……动摇于两个計划之間：（1）取消书記处擅自扩大的用人权力，从而使它重新降为政治局的一个附屬机构；（2）使书記处“政治化”，这意味着在书記处內部建立一个特殊委員会，作为它的最高权力机构，該委員会将由三名政治局委員組成，具体人选是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三人当中的任何一人。他感到，要想抵消斯大林过于龐大的势力，这样一种联合是必不可免的。”①

季諾維也夫在1923年9月重新展开了这种努力，他在高加索著名矿泉疗养地基斯洛沃德斯克附近的一个避暑山洞里召集了自己的干部会議。除其他人外，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奥尔忠尼启則也在被邀請之列，季諾維也夫請他轉告斯大林，如果书記处能同政治局更好地协调行动，它保证不会被触动。作为妥协（在这方面，后来始終也沒有进展），季諾維也夫建議在組織局內安插三名政治局委員以領导书記处。回莫斯科后，季諾維也夫出席了好几次組織局会議，但托洛茨基却不在那里，这表明他当时拒絕支持季諾維也夫反对斯大林。

1923年9月，托洛茨基示威性地退出了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10月8日，他向党提出了“四十六人声明”，宣称由于中央委員会的錯誤領导，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在声明书上簽名的党內高級人物有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奥辛斯基和薩普罗諾夫等。几天以后，在他动身去德国以前，拉狄克单独向中央委員会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7頁。本文是該书編者査尔斯·馬拉穆斯抄自托洛茨基笔記的一段話。那几个月中，我正在莫斯科，可以证实这段报导。

写了一封信，宣布他贊同“四十六人声明”，但对政治局的語气要恭敬得多。所有这些事件都隐瞞着共产国际。

就在这一时刻，俄国接到了德国革命失敗的消息。

“德国事变的即将来临使党兴奋不安……由于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似乎即将爆发的德国总决战，对党內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工作便被擱置下来。等到事实表明这場总决战已經由于环境的影响而被推迟时，党便把‘新方針’問題提到了日程上。”①

与新方針相对的老方針就是喀琅斯塔得暴动后的党內制度，这种制度是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建立起来的，在第十一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被規定得更为严格。对工人反对派进行的打击，正在剝夺下层党員参加决策的一切机会。斯大林的书記处在压力之下答应恢复党內民主，这实质上意味着同反对派妥协。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巴庫和基輔，政治局的控制表面上的这种削弱起初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俄国的和共产国际的失望情緒汇集了起来，这不仅迅速危及季諾維也夫，而且威胁到新担任总书記的斯大林，他对自己躲在幕后是否就能平息党內的反抗，是一点把握也沒有的。

11月7日，季諾維也夫发表了一篇贊成党內民主的声明。与此同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爭开始了，人們引經据典，使出了反对異端分子的全套教条主义解数。在这場斗爭中，斯大林誘使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头担当干系，而他自己却謹愼地躲在幕后。但他們双方只是由于都害怕托洛茨基才組成三人集团的，每一方都竭力想拉攏托洛茨基来打击另一方。托洛茨基那篇以《新方針》为題发表的論文，在党內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以致看

① 托洛茨基：《新方針》，第13—14頁。

起来他只要登上讲坛振臂一呼，就能成为党內反政治局力量的領袖。在他的答辯中，托洛茨基接触到了他同死啃教条的列宁主义者論战的核心，这就是：不管人們怎样引证1917年以前的党史来攻击他，他在締造新国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表明他对党忠誠的更有力的保证：

"誠然，我是在同列宁进行过一番斗爭后才皈依他的，但一旦皈依了他，我便全心全意、始終如一地跟着他走。我为党所做的工作是证明这种忠誠的唯一保证，此外我再提不出別的保证了……难道整个列宁主义的精神就在于溫良恭順嗎？"①

这些已經够大胆的話，使所有党支部都在托洛茨基問題上分成了两个营垒。譬如說，莫斯科組織便分裂成人数大致相等的两边，而在开始时，拥护反对派的人无疑占多数。不过，在斗爭达到高潮时，托洛茨基却从战場上突然消失了，他宣布自己病得很厉害，不能再继續参加討論。反对派陣营中由此而产生巨大混乱；党官僚們更凶狠地进行斗爭，通过把反对派从莫斯科大批調往別处，狡猾的党組織工作者集团終于获胜。在这一期間，托洛茨基写道：

"斯大林显然正在考虑一种牺牲自己的同盟者与反对派讲和的策略……他向我明显地求和，完全出乎意料地关心起我的健康……不用說，斯大林并沒有和他的同盟者决裂，但他同时又謹愼地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和反对派妥协的退路。"②

据托洛茨基說，季諾維也夫对付斯大林的威胁只有一手：到彼得格勒去求援，把他自己的冲鋒队带来参加党內斗爭，这些冲鋒队的机动性很大，可以用汽車运到托洛茨基获得多数的任何地方。从这段話里可以明显看出，假如托洛茨基多获得一两个地方組織的

① 托洛茨基：《新方針》，第57頁。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87頁。

支持，斯大林就可能改变立場。

托洛茨基的《自傳》是在1930年发表的，教条主义的色彩要比他后来的著述濃得多，在这部书中，讀者們会遇到一段奇特的插笔。当他正在报导决定大局的1923年危机时，托洛茨基突然雅兴大发，用三頁篇幅描写了猎打野鴨的乐趣。他描繪了某一个打野鴨猎人的形象，这个人唯一的兴趣就是在沼澤地里猎取飞禽。就是因为这个人，托洛茨基的脚在水里受了寒，回来以后便患起重感冒，接着"总是有些潜热"，这使他有好几个月不能参加党的生活。

可是，尽管发起了攻击托洛茨基的运动，当时还沒有人想到把他排除出国家領导人的行列。他們的全部要求只是防止他成为国家独裁者，强迫他同别人分享权力。

"加米涅夫問那些'老布尔什維克'(他們大多数人都曾一度离开过党十年或十五年)：'我們能让托洛茨基一个人大权独攬，把党和国家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嗎？'……很久以后，在1925年，在我批評党內存在压制現象的时候，布哈林答复我說：'我們沒有民主，是因为我們怕你。'"①

在反对派实际被粉碎以后，向托洛茨基秘密提出过的妥协建議得到公开证实。12月5日，在一篇关于新方針的空洞声明中，中央委員会重申它保证实行党內民主。12月18日，政治局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于《眞理报》上发表声明，否认曾有任何不让托洛茨基十分积极地参加党和国家事务的企图，并指出这种說法是恶意挑撥。好像是出于巧合，季諾維也夫的彼得格勒支部也在同一天发表了一封內容相似的信。②

---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488—489頁。

② 鮑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布尔什維主义簡史》，巴黎1935年版，第322—323頁。

托洛茨基沒有在1924年1月16—18日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議上露面，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断然拒絕了反对派的两个中心要求：一，“向国际帝国主义”作經济让步，以加强同外国資本的貿易关系；二，容許党內有派别存在。会議认为托洛茨基的政策背离了列宁主义，但并沒有对他采取組織措施。这时，托洛茨基觉得自己的重感冒久不痊愈，有必要到阳光充沛的南方小住一段时期，于是在1月18日启程去苏呼米。由于列宁在最近一两周內随时可能去世，这趟旅行是整个复杂图景中最令人不解的事件之一。最簡单而且最可能符合事实的解釋是：托洛茨基遵循着党的一般慣例，特地离开进行派系斗爭的現場，以便使对手有足够的便利安排和解。

1月21日，列宁去世了。在这里，研究这段时期历史的人难免要发生怀疑：托洛茨基是否已經同政治局秘密約定他将不回莫斯科。因为按照一般情理，他本来是应該立即赶回莫斯科的，这不仅是为了參加葬礼(在列宁的葬礼上，托洛茨基的身影应該让俄国人民看到)，而且是为了以后分配重要职位和参与制訂列宁死后的第一批政治决議。托洛茨基的两本书都把他的缺席說成是势不得已，但显而易見的是，他本人并不想回莫斯科。他在梯比利斯車站接到了列宁在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他打电报問斯大林何时举行葬礼，在接到葬礼即将在本星期六举行的答复后，他断定已不能及时赶回莫斯科，于是继續去苏呼米。

在結束关于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始末的这一节时，不可能不提一下托洛茨基的一个怀疑，即列宁也許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在1938年的大审判中，雅果达供认他曾經用毒药害死过預定要清除的同志，而托洛茨基那本死后才出版的著作是在这次审訊后写出的，书中对下毒問題作了广泛的討論。雅果达的职业是

药剂师，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工作过十六年，包括列宁患病的整个时期在內。斯大林在 1933 年授予雅果达以列宁勛章；1935 年，他又任命雅果达为国家保卫总局局长——这些荣誉都表明了这两个人之間长期保持着的亲密关系。雅果达同四名克里姆林宮医生一起受审，其罪名是謀杀了馬克辛·高尔基和另两名苏維埃政府首长。托洛茨基认为雅果达有可能眞地毒害了高尔基，但这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因为，假如那位世界聞名的俄国詩人曾經反对过处决如此众多的老布尔什維克，用这种方式消灭他将是再便当不过的了。就这样，托洛茨基根据几次审判推測了以下的一系列事件：列宁在痛苦难忍时，曾好几次要求毒药。作为党的总书記，斯大林控制了对列宁的生活安排，特别是控制了派去保卫列宁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因此，从具体环境来說，斯大林是有可能把毒药下在列宁吃的药或食物中的。而另一方面，即使已經奄奄一息，列宁仍然是斯大林执行其計划的一个障碍。托洛茨基这段話的有趣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究竟眞实与否，而在于它所傳达出的气氛。两年以后，反对派領袖都变得像中了魔一样，时刻担心他們会被毒死，或者被党的医师暗害。

馬斯洛夫委員会

仍被留在莫斯科的馬斯洛夫，出席了好几十次党的重要会議。在 1923 年 12 月初，正当党內乱成一团时，德国代表到莫斯科来向世界革命的領袖們請示了，他們来到以后，馬斯洛夫便向他們报告了自己看到的情况。大学生、青年們、来自莫斯科各工厂的許多重要集団，都猛烈抨击政治局，指出在党、工会或苏維埃机关內已毫无民主可言。在反駁他們时，政治局发言人公然以国家措施威胁反对派。时常可以听到人們私下說：斯大林的书記处又把这个或那

个反对派送到俄国中部或北部遙远的角落里去了。这不是逮捕，而是无法推辞的工作分配。如果不服从工作分配，就会被开除出党，在被开除出党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逮捕和流放。在最后危机发生前的夏季这几个月里，我們同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談話时，时常天眞地认为俄国同志們有些夸大其詞。我們觉得，他們所說的一切苏維埃民主都已在喀琅斯塔得暴动后被摧毀的話，不过是由于党紀太严、个人的希望破灭而发的一些牢騷。不过，我們承认他們对党的評論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因为反对派在党內的地位显然正在削弱。

出于許多理由，我和馬斯洛夫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他在民主問題上的一切看法都被人为地局限在党內派別活动自由的狹窄圈子里了；他忽視了党和其他苏維埃組織之間的关系这个主要問題。工人反对派集团同托洛茨基之間的暫时联盟，是在他們对他的专制方法仍旧怀有戒心的情况下結成的。当时，表面上討論的是新老两代党員的关系問題、十月革命的教訓、在解釋1917年以前党史方面的各种微細差別等等，但眞正的問題却是究竟要不要坚持恐怖措施，当时，这类措施已經超出了打击反革命的原来目的。

馬斯洛夫的好几个俄国朋友，特别是卢托維諾夫，认为托洛茨基的突然隐退是一种最可惊的征兆。托洛茨基的“苏呼米逃亡”（这是反对派中間的流行說法），被正确地理解为旨在避免党对他采取激烈措施。人們在討論中开始談到了应該采取哪些最巧妙的步驟，来避免被开除出党和被剝夺苏維埃合法地位。旣然連托洛茨基都到苏呼米去了，他的同党也就不得不担心起自己更坏的命运——会被硬調到别的地方去，而且不会是那么有利于健康的地点。他的逃走、他的沉默好像是在对人們說：“注意，危險就要来

了！"因为他本来能够而且应当比他那些更容易受攻击的支持者冒更大的風險。

俄国党內各派系之間这种翻云复雨的气氛，在共产国际內部也有同样的反应。德国党內反对布兰德勒的人越来越多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不論是季諾維也夫或斯大林都担当不起同共产国际最大的党决裂的風險，尤其是在这个时刻，因此，他們两人都改变了对待德国左派的态度，从家长式的殷勤一变而为眞正的关心。不过，季諾維也夫感到怀疑的是：同一个显然正在改变着的俄国国家党联在一起的共产国际，究竟还能把左派共产党人保持住多少时候呢？

在9、10两月，人們把馬斯洛夫几乎当一个被遺棄者看待；他眼看就要完全丧失他在党內的地位。可是到11月，气氛却突然改变了。共产国际司庫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来看他，客气地問他是不是缺什么；馬斯洛夫同志在莫斯科过冬的衣服够嗎？馬斯洛夫已經在苏哈列夫卡市場买了一件羔皮大衣，因此在解决个人問題方面謝絕了国家的帮助。

阿尔卡迪·馬斯洛夫所以成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有趣人物，理由說起来很簡单：他是一个出身于俄国的共产党人，但却不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一个俄国人沒有先加入布尔什維克党和經过該党中央委員会的批准，居然能对德国党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已經不仅是一件反常的事；在俄国領袖們看来，这是对紀律規章的一种不可容忍的違背，这表明德国党的独立性未免太大了。因此，从他开始在德国党內活动的时候起，馬斯洛夫就比德国本国的領袖更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

在9、10两月政治局內爭执不休的同时，負責調查馬斯洛夫历史的委員会进行了工作。委員会主席是約瑟夫·翁施利希特，一

个同捷尔任斯基有交情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重要領导人。其余的委員是：彼得·斯土契卡，一个列特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員；費利克斯·孔，国际监察委員会委員；阿道夫·瓦尔茨基和薇拉·柯斯特采娃夫人，两个波兰人，都是布兰德勒的密友；此外还有蔡特金。另外有几个欧洲共产党也派遣了代表；例如鮑里斯·苏瓦林就参加过最初阶段的調查。托洛茨基的代表是皮达可夫。柏林党組織按照指示，选派了两名为馬斯洛夫辯护的代表——魏納·朔累姆和馬克斯·赫塞来莫斯科。大多数委員都是馬斯洛夫的政敌。因此，經过这个委員会的摆布，馬斯洛夫最低限度也要被弄得选不进德国党中央委員会；弄到最坏的地步，他就会被送到俄国北部去。

在我于1923年9月离开莫斯科以后，委員会便立即开始工作。它并沒有什么材料可以調查：沒有文件可供研究，沒有证詞可供听取，沒有证据可供审查。委員会甚至不能够正确地提出他的罪状；根据一些捕風捉影的謠言提出的罪名，說得非常含糊。因此，委員会决定对馬斯洛夫的历史从童年时代起詳詳細細地作一番研究。由于馬斯洛夫年紀很輕，1923年以前的經历相当簡单，这种調查也陷入了僵局。經过三个月的工作，委員会終于定出了馬斯洛夫的罪名，这就是：他在1922年被捕时，曾向柏林警察供认他是从丹麦乘帆船来德国的，这便給人以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从而也就損害了俄国党的名誉。为了这种錯誤，他被撤消了党内职务，并被派到俄国北部去至少居住一年。假如他在这段时期内表現出对共产国际領导机关的忠誠服从和工作热情，国际监察委員将重新考虑他的案件，到那时，他便有可能被送回德国。

于是，在暴动时期的决定性几周内，不仅德国左派的主要領导人这样被排除到一边，而且他和他所代表的政治流派都受到了誣

蔑。从暗示馬斯洛夫受澤弗林雇用，到推論整个左派都是社会民主党警察所組織的挑撥运动，这中間只差一小步。虽然俄德两国最高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从馬斯洛夫的历史中找不出絲毫可以安上这种罪名的根据，人們却仍然板起面孔来搞所謂調查，正如后来进行一些遮人耳目的莫斯科审判一样，其目的无非是要帮助实行一种政治路綫。但是在这时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操纵活动还剛剛开始，与此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內愧，特別是拉狄克，因为主要是他提出了“假如我們能打开澤弗林的秘密档案……”这样一种論点。他来看过我十几次，一再向我保证他的友誼和他对馬斯洛夫的信任，他說，馬斯洛夫只要洗刷清楚人們对他的历史所抱的无根据的怀疑，就可以完成他注定要投入的党的大事业。

柏林、汉堡和魯尔方面对馬斯洛夫被扣留在莫斯科一事都相当关心，而且感到极大憤怒。同老一輩的領袖——布兰德勒、赫克尔特、塔尔海默等相比，馬斯洛夫和一般党員的关系要好得多。他曾在德累斯頓音乐学院学过音乐，在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教导下学过物理。他是一个有特出才能的作家，懂得五六国的語文。他的口才很好，但极其朴实平易。他懂得机械，能够以內行話同工作台畔的工人談論他們的工作，好像就是他們当中的一員。和那些領导党的知識分子不同，他能够把一辆汽車拆卸开来（如果有必要的話），然后再把它安装好。在汉堡，他借助于自己的海上知識，和水手們处得很好。在一个决定性时期把这样一个人粗暴地硬性排除，对于一般的德国工人說来，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明白地显示了束縛着他的俄国机器的一个方面。

調查委員会的人选是由斯大林的书記处决定的，季諾維也夫沒有敢冒險插足，只是在共产国际內部执行了决議。季諾維也夫以友好的态度对待馬斯洛夫，时常同他商討德国的政治問題，但却不

敢催促把他的案件快些了結。当布兰德勒的吹嘘——說什么只要排除掉馬斯洛夫，暴动就可以稳操胜算——在事实面前破产以后，曾經一手制造了馬斯洛夫案件的斯大林这时却摇身一变，跑在别人前面平反冤獄，摆出了一副决不能容忍不公正事件的領袖姿态。

在政治局內，斯大林建議由他自己代替翁施利希特担任委員会主席来結束調查。他把委員会变成了一个政治論坛，德国左右两派在委員会中对流产的暴动进行了討論。在搭好这座戏台以后，他便登場发表了一篇为德国共产党左派和馬斯洛夫辯护的有力演說。“馬斯洛夫是我們能够在德国找到的最优秀的分子，”斯大林說。“他的身上結合了一个眞正的革命領袖应有的一切品质。假如我們在德国曾經有五十个馬斯洛夫，胜利就一定会屬于我們，德俄两国也就不会受到反革命的进攻了。”

我出席了調查委員会的最后一次会議，在会上，希望得到共产国际領导职位的斯大林发言为馬斯洛夫辯护。对于共产国际（应該讀做季諾維也夫）处理問題的方式，他充满了道义上的憤怒。他是贊成扩大党內民主、贊成共产国际所屬各党更多地保持独立，不受莫斯科中心的支配的。他暗示这种目的不可能在現有的共产国际領导机构下达到。在会前和会后，他邀請馬斯洛夫私下談了好几次，就这些問題說了許多漂亮話。在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說后，委員会实际上就等于宣告解散。馬斯洛夫現在不再像人們暗示过的那样，是什么“澤弗林的代理人”了。他不仅可以自由地返回德国，而且重新成为有資格选入德共政治局的人，甚至可以被选出来代替布兰德勒。

斯大林对馬斯洛夫委員会的干涉，是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們曾指望共产国际会由于沒有主見而貫彻他們自己的观点。像往常一样，斯大林的这一手是一种机智的势

力均衡政策，这是仔細地研究了党內各种力量和人物特点的結果，也是表明他灵活多变的一个良好例证。在德国党內人們曾认为，不让馬斯洛夫参加决定性的十月暴动，清楚地表明布兰德勒受到了俄国政治局的支持。

促成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国內对德国失敗的反应。显而易見，政治局和总书記处犯了致命錯誤，低估了德国发展状况的重要性及其对俄国党和俄国国家的影响。在1923年秋天的莫斯科，人們明显看出了德国的災难是战后欧洲的一个重大轉折点。德国党的正式被解散加上了最后一笔，表明长期內战已經以所有的王牌都掌握在敌人手上而告終。俄国的一般群众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是意外强烈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理解到，列宁关于欧洲十月革命的思想已經遭受到最后的和无可挽回的災难。德国共产党人的被动和俄国內战的傳統形成了对照，在后一种傳統中，个人的勇敢、主动精神以及对往往占絕对优势的敌人展开游击战，曾經起了决定性作用。俄国共产党人和俄国工人感到自己孤立在一个敌对的資本主义世界中了；因为事实已經证明，連德国党，一个曾經在他們面前被說成是革命效率典范的党，原来都是个不可靠的和愚蠢的盟友。

因此，俄国的每一个政治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德国政策。托洛茨基集中攻击季諾維也夫对德国的慘敗应負的个人責任；季諾維也夫則以分析“托洛茨基主义”历史背景的复杂教条为自己申辯。斯大林鼓励这种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爭，因为托洛茨基暫时仍然是他在政治局中最危險的竞爭者，同时，他也在为反对季諾維也夫作准备。他們三个人都明白，德国的災难已經使俄国革命注定要孤立很长一段时期，現在必須实行一种新的退却政策，共产国际已經变成一具死尸。不过，面子还得要挽回。

1924年1月，俄德两国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开会，以便从德国事件中“吸取教訓”。季諾維也夫在同斯大林的周旋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耗尽了精力，这时，托洛茨基的地位已經如此危險，以致为了不使他和政治局的关系进一步尖銳化，他又一次选擇了逃会的方法。不过，支持布兰德勒派的拉狄克代表了他的意見。会議的准备工作做得旣慢且笨。所有的代表都在12月底赶到了，但却不得不等待俄国政治局先决定它的德国政策。

我在去莫斯科途中，看到了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和俄德两国国家机关继續保持联系这种不协調現象的另一个例子。当时，警察正在搜捕我，我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外出旅行。我在全德各地发表过无数次公开演說，逮捕我的命令（上面也許还貼着我的照片）已經送到一切边境。我同俄国大使館內的国际联絡科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吵了好几次，因为我害怕国家政治保卫局会故意給我一份有毛病的假护照，好使我落网。不过，尽管有这种怀疑，我却在埃特庫能安然无阻地越过了边境。米罗夫特地派一名俄国外交信使陪我一起走，以保证我的安全，到边境时，柏林政治警察的特工人員和这个信使交談了几句話以后，連我的假护照看都不看便放我过去了。共产党的被解散并沒有打破警察与警察之間的联系。

同斯大林的談話

我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邀我私下去看看他。我同馬斯洛夫一道見过他几次。他們以俄語交談，不用翻譯（这是馬斯洛夫胜过其余德国人的一个长处）。而在我同斯大林談話的时候，馬斯洛夫則充当翻譯。

使我們惊訝的是，斯大林对德国党組織的情况竟了如指掌，但

他在理解德国政策的意义方面便差多了。这个人的态度也使我們感到惊奇，他的作風是如此不同于我們見过的其他俄国領袖。譬如說，当时即使同季諾維也夫私下交談，双方所說的也大都是一些外交辞令；他显然正处在压力之下。当时，我們对俄国党內危机还比較缺乏了解，因此，馬斯洛夫和我在离开季諾維也夫的克里姆林宫住所时，时常对他那些用来掩飾自己眞正观点的廉价手法交换几句諷刺性的評論。可是，我們仍然感到，被党紧紧束縛着的这个人对于不断增强德国工人組織是眞正关心的，他和我們同样希望德国的共产主义胜利会为俄国党的更新創造气氛。我們认为季諾維也夫的方法是不高明的，但我們承认他眞誠尊敬德国工人阶級，并且同样眞誠地关心德国的未来。同拉狄克或布哈林的討論經常具有另外一种特色。拉狄克总是談到外交政策方面最近的曲折发展，而和布哈林在一起，我們則多半会被拉入一場有关馬克思主义复杂理論的討論。

斯大林和上面这些人全都不同：他所触及的完全是党的內部組織問題，并且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的全部經驗都是組織方面的；他的整个精力都投入了組織工作。他在組織部署方面的討論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同一种中心思想——如何安排得最有利于取得权力，什么样的阶层結构达到的地位最高等等直接有关的。在当时，我們还只能看到这种态度的表面現象，但那已經足以使我們大惑不解了。我們对他那身軍装、那双雪亮的长筒靴，以及那种一心想博得軍事領袖名声的样子，也同样觉得不顺眼。

当时，我本人主要就从事于組織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所提供的如何在党內抓权的意見格外使我震惊。在 1921 年 11 月的列維危机中，我当选为柏林党支部主席。让一个年輕妇女来領导德国境內最大的党組織，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步驟，而柏林共产党人

把我选上这个崗位，部分正是由于我年輕，因为他們不信任老一輩的領袖，希望使党組織不致于成为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工具。我不仅年輕，不仅是个女子，而且是一个1919年才来柏林的奥地利籍公民。我的被提名引起了很多人反对；中央委員会竭尽一切可能阻撓我当选。当时，我的“机器”由一群热心拥护馬斯洛夫政策的人組成，我同柏林的下层党員之間极良好的关系增强了它的力量。

在我从維也納来德国后的头几年中，我一直为党做文字工作。我决沒有料到我会在1921年11月被提名，这是代表們反对中央委員会的自发表示。但是，一旦在錢币街二十四号的柏林党总部就职以后，我便开始热情地工作，我的一小群助手包括六名党的专职組織干部和另外六名办事員，他們指导着几千名志願把一切业余时間和精力都投入开展党的工作的人。除非他是被群众选出担任专职工作的，否則，任何領薪干部在区委会中都沒有投票权，因此，他的薪金与其說是帮助倒不如說是妨碍了他的被选举权。柏林組織的基金完全来自党員繳納的党費和偶尔举行的募捐，但总是有足够的結余供我們向中央委員会上繳摊派的款項。一般党員不仅坚持严格的会計檢查制度，而且一絲不苟地維护着他們监督志願工作人員的权利。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全区党代表大会，至于較小地区的党代表会議則举行得更經常。为了促进一种使領袖們能准确代表集体意志的工作制度，存在着各种章程規則。在1921—1923年期間，整个柏林党組織是如此有机地打成一片，以致只需要使用最低限度的策略就可以保持它的团結；不是我指导着整个組織，而是整个組織指导着我。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会見了斯大林，他是一个有經驗有手腕的老练組織家，領导着包括国家警察在內的数以万計的領薪雇員，而我只是一个民主工人組織的天眞的和毫无經驗的代表。斯大林宣

称，各国領袖的任务不是向下层群众屈服，而是要在可行的妥协基础上参加共产国际領导集团，这将使我們大家都能够更容易地掌握党員群众。

馬斯洛夫和我在1月初又去見了一次斯大林。我們沒有談到共产主义事业已經在德国遭受最后挫折的事实，也沒有談到在这种改变了的环境下，今后应該采取什么政策。我們所談的完全是重新組織地下共产党干部的問題，在談話中，斯大林表現了一种惊人的能力，即：他能够掌握住德国党在組織方面的一切細节，而不管它們表面上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他强調指出，党的地下机构必須同每一个合法分支組織，同工会中的支部、工厂中的核心小組等結合在一起。他并且强調了妇女、青年和儿童組織的重要性，他非常关心各种秘密机构和党之間的关系。他严厉批評了党在密謀工作上的缺乏經驗，他指出，必須不惜一切代价来改进地下工作的技术，并扩大那些即使在党恢复合法地位后仍将保持秘密的組織。他提醒我們，秘密支部和俄国党之間的联系要特别注意保密。

1月8日，洛佐夫斯基作了关于工会問題的报告。这是一个沒有人真正听讲的那种会議，因为发言人在有关問題上不会談出什么新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同意：我們理当在工会中具有影响，可是我們并沒有这种影响。在会議正在举行时，一个送信的人走进来，客气地請我和馬斯洛夫跟他出去一下。

我們被領到克里姆林宮內一所朴素的屋子里，这是分配給斯大林的一所平房；在此以前，他都在党的总部里接見我們。我們在餐室里会見了他，餐室的布置透着一种粗陋的中产阶級气派，放着一張大桌子、五六把椅子和一架电話机。我們都明白，在这样一个不寻常地方的这次秘密会見，决不仅仅是为了继續前几次的討論，个人之間的摩擦和不信任的气氛，濃厚地籠罩着这个房間；斯大林

起初吞吞吐吐地談着,不知道他的話能談多深。以后,随着他一步步地加强他那党机器中的私人机器,这間屋子的墙壁在1923、1924和1925年間还要听到許多次同高級党官僚进行的密談。斯大林在党內和国家机关內有用人大权,能够給人在俄国国內外找到有影响的职位,而担任"党的負責工作"經常是同优渥的物质待遇結合着的——能得到寓所、汽車、別墅、特殊的医疗照顾,亲屬可以找到工作等等。另一方面,我們所需要的却是他不能給我們的东西——共产主义事业在德国的胜利。

斯大林发展了一种关于"布尔什維克紀律"的論点,他认为,这种紀律就在于党組織的領导成員之間应該彼此絕对信任。因此,他接着表明,他已經試图克服托洛茨基危机在党內引起的分散状态,尝試着重新建立一支領袖的铁卫軍,这些領袖将默默地进行合作,他們不是以一个政綱为合作基础,而是由利害关系、由难以变更的自卫需要团結在一起的。我們很快就要回德国去,他希望知道我們是否可靠到足以被接納进核心集团。当斯大林继續談論到人性中的某些弱点,明显地影射季諾維也夫(因为托洛茨基問題似乎已經通过党內討論解决了)的时候,再想想这套关于布尔什維克紀律的插話,其含意便显得非常明白了。我們力求思索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一种旣不会得罪斯大林,又不明确答应抛棄季諾維也夫的回答,正在这时,我們的談話却突然被打断。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出現了,他們是随便来看看斯大林的。

后来我們才知道,在我們去看斯大林的那段时間內,书記处曾派他們去出席党的某一个会議。可是,他們不願意让我們和斯大林单独在一起,因此,当他們一听說斯大林約我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便立刻离开了会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笨拙地談論起会上的情况;他們的笑声是勉强的,空气变得很紧張。馬斯洛夫

和我尽快地告辞了。

走到外面，我們交換了几句意見，总結了我們的印象：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再继續屈从于俄国政治局，一定会带来更多災难，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我們两人都认为，我們必須建立一个独立的党組織，这个組織一方面不正式割断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又能够制訂出一种独立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国际主义将不仅仅是用来掩飾无穷尽的牺牲，将不仅仅是让俄国国家党一时的策略来决定德国党的方針。

在这几个星期中，馬斯洛夫和我在較为正常的状况下同所有别的俄国領袖、特别是同布哈林和拉狄克，談过許多次話。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們全都神色不安，全都避免对德国失敗的重要性作任何肯定結論，只把它說成是另一次挫折；他們认为或者暗示說，經过一段时期后，党就会东山再起，继續它以往的斗爭。列宁是习慣于大轉变的，他的轉变往往是如此突兀，以致使有关的每一个人都能深深意識到轉变的程度，可是現在却与此相反，人們一致同意不揭明眞相，在德俄两国的群众面前故意把失败的意义說得含含糊糊。

我們最有兴味的討論之一，是同俄国工会領袖米哈伊尔·托姆斯基进行的。托姆斯基有些超然于派系斗爭之外，旣不傾向于托洛茨基，也不明确追随季諾維也夫或斯大林。在进行过工会問題的爭論以后，他被派到土耳克斯坦住了一段时期，这为的是把他排除出中央的活动圈子。他回来以后，忍住了他对党的劳工政策感到的不满，但却在身边团結了一批工会領袖，继續爭取改变工会和党之間的关系。他們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地要求摆脱党的壟断，要求加强工会的独立地位。

托姆斯基特别对德国的工厂委員会組織及其在古諾罢工中所

起的作用感到兴趣。他十分醉心于这方面的德国經驗，因为他料想无产阶級在这个工业国中所具有的影响，比在他本国——农民俄国——的作用大得多，在俄国，苏維埃已經逐漸变成了党这架政治机器上的一个齿輪。①

我的俄国顾問施米特在我来之前的早一些时候回到莫斯科，他在拉狄克的指使下，写了一篇不利于柏林党組織的报告。但是在俄国党內，施米特是同托姆斯基的工会集团站在一边的。由于他同馬斯洛夫的友誼日益增长，托姆斯基劝說施米特撕毁了他的报告，另写一份新的給柏林党組織說好話，同时，他还組織了一次会議，馬斯洛夫在会上說明了工厂委員会运动的潜在能力。在他就这种新的无产阶級組織形式談过話以后，好几百名莫斯科工会領袖討論了他的报告。斯大林的政治局采取了反措施，派洛佐夫斯基和雅各布·瓦耳歇尔出席会議，发言批評馬斯洛夫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并且为正統的共产党理論、即工会必須受党控制的理論辯护。

共产国际总部中的"死后解剖"

最后，在1月1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举行了正式会議。出席会議的有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皮亚特尼茨基和俄国党的几个技术人員；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三个保加利亚人；来自波兰党的瓦尔茨基，瓦列斯基和柯斯特采娃；在德国党这方面，布兰德勒、瓦耳歇尔和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右派，雷梅累、皮克和克能代表中

①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从1905年以来便是党員。他被沙皇政府判处若干年苦役，后来被流放，二月革命后才回来。从1917到1929年，他一直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在1919年被选入中央委員会。从1920年起，他是工会反对派領袖，这个派別在1928—1929年站在布哈林和李可夫一边。由于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在消灭富农时期达到頂点，他在絕望中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

派，朔累姆、克尼希、馬克斯·赫塞、馬斯洛夫和費舍代表左派。已經草拟出五份关于德国事件的声明供大家討論，它們是：季諾維也夫的声明、中派集团的声明、由季諾維也夫代表他本人和这个集团拟就的另一份声明、拉狄克为布兰德勒提出的辯护，以及左派的政綱。

拉狄克在以共产国际执委会駐德代表的身份作报告时說，像他这样的代表一共有四名（拉狄克、古拉尔斯基、斯柯布列夫斯基和施米特），他們在一切問題上都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則采取行动，所有的报告都由四个人联合署名。这四个代表都沒有参加开姆尼茨会議，但是在幕后参加了中央委員会的几次会議。“我們在1923年10月的德国发現了什么情况呢？”拉狄克問道。

“在这里的9、10月会議上由执委会批准的战略計划，在实践中宣告失败。这个計划是以下列基本思想为出发点的：无产阶級将在薩克森进軍，以保卫我們将要加入的工人政府；在薩克森这样一个組織严密的无产阶級地区，处于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和北部的法西斯主义之間，无产阶級将設法利用国家权力筑起一道墙壁。与此同时，党将在全国各地进行干预，动員群众。……可是，政府中的同志們却沒有能力武装无产阶級；他們在薩克森只有八百支步枪……我同意放棄在薩克森暴动的計划，因为无法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結成統一战綫。不过，我提出了宣布总罢工的建議。”①

他补充說，拉狄克不同意路特·費舍的建議，即在柏林既举行总罢工，又动員当地的紅色百人团和党的武装机构。“我建議举行罢工而不暴动，”他說，“可是，我的建議在1923年10月26日被中央委員会七人小組否决了。”

---

① 《德国事件的教訓》，汉堡1924年版，第5—6頁。

事实上，几天以后，总指揮部又完全改变了主意，实质上接受了拉狄克的建議。它决定党应該号召举行全国范圍的抗議罢工，同时避免武装暴动；可是，党的地方組織幷沒有号召罢工，或者即使这样做了，也是局部的和效率不高的。拉狄克建議举行和平罢工云云幷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为自己开脱責任的口实，因为連他本人也明白，在1923年10月，要共产党人号召举行純示威性的总罢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据拉狄克說，法西斯主义已經战胜了十一月共和国。“在德国，十一月共和国已經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死去。沒有一个懦夫会站起来保卫它。”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在替施拉格特路綫辯护。他采取一种介于他的朋友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之間的中間路綫，声称在莫斯科定下一个暴动日期是錯誤的，但日期也是应該定的。在随后的討論中，我指出瓦尔特·烏布利希9月曾經在莫斯科报告說，武装图林吉亚工人是多此一举，因为在图林吉亚，每一个人都已經有了一支步枪。我还提到九月会議上的中央委員会代表古拉尔斯基，他在从莫斯科回去的路上曾經吹噓說，三天以后我們便能在薩克森取得政权，把我們的軍队开向柏林。

爭論的中心轉到誰要对一份电报負責的問題上，这份电报是由共产国际拍发給德国党的，建議它不要理睬繆勒将軍，只管武装薩克森工人。季諾維也夫遭到了拉狄克、波兰人和德国右派的圍攻，他們竭力要使他本人为这件“政治蠢事”負起全部責任。季諾維也夫是按照俄国政治局的决定采取行动的，但他在替自己辯护时却不能說出这一点，因为他表面上还必須維持一种欺人之談，即共产国际代表着各国党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一个党的支部。参加会議的每一个代表都明白俄国党內的斗爭，那些攻击他而不攻击政治局的人希望用这种办法从斗爭中为自己撈些好处。

“季諾維也夫：电报是当着布兰德勒的面拟定的。

瓦尔茨基：多么大的錯誤，多么主观的幻想啊！

季諾維也夫：德国党的代表給了我們这些数字——五万到六万〔在薩克森很容易动員的已經武装起来的工人〕。

皮克：党从来也沒有听說过这个决定。

季諾維也夫：拟定电报的时候，分别有三位德国同志和三位俄国同志在場。关于这項决定的执行問題，我們当时是如何估計的呢？这只不过是內战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我們在电文里也强調了这一点……

布兰德勒：我当时并沒有同意这份电报。

季諾維也夫：在加入政府的問題上，我要負最大責任。布兰德勒有些犹豫。他說，‘我不知道这方面是不是已經有了充分准备，’可是他还是屈服了……可以拿我們的电报同部长們的演說对照一下……一个由季諾維也夫、科拉罗夫和克拉拉·蔡特金組成的委員会，在提出的修正被接受以后，向中央委員会写了一封信〔补充电报中的建議〕。”①

季諾維也夫然后企图回到政策討論上。他对拉狄克所下的法西斯主义已經战胜十一月共和国的結論提出质疑。可是，这种企图未能得逞，他的談話一再为别人的詰問所打断；他的对手們感到，討論共产国际主席的責任时，要比討論德国的政策愜意得多。瓦尔茨基替不在場的托洛茨基作辯护，他提到一封波兰中央委員会写給俄国政治局支持托洛茨基的信。不过，在这个重大問題上，德国右派却沒有参与爭論；布兰德勒希望，通过抛棄托洛茨基，他也許能求得一种妥协。另一方面，拉狄克則咄咄逼人地攻击季諾

① 《德国事件的教訓》，第60—62頁。

維也夫，为托洛茨基辯护。季諾維也夫在答复时提到拉狄克对莫斯科大学生发表过的一篇演說，他的話被一陣喧囂声打断，几乎再說不下去了。討論就这样离开本題地继續下去，成为政治局內激烈斗爭的反映。

当季諾維也夫开始分析德国党的发展状况时，皮克大叫道："党的发展有什么談头？誰不知道那是个强迫拼凑起来的群众党！"季諾維也夫为布兰德勒热烈辯护；他可不应該被犧牲。从今以后，領导党的应該是一个中派多数，同时，左右两派有少数代表。蔡特金代表右派回答說，在最后表决时，他們将接受季諾維也夫的决議案。

波兰代表拿出了他們的党写給俄国政治局的另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24年1月21日，也就是列宁逝世的那天，信中为拉狄克辯护，同时对列宁去世和托洛茨基的地位受到威胁以后的执委会状况表示关心。波兰人要求俄国党作出保证，决不把托洛茨基同志排除出党和国家的領导崗位，宣布連这样一种可能性都是不可想像的。蔡特金、皮克和布兰德勒再次在这个問題上保持沉默，以此換取他們在德国党的新中央委員会內的位置。在拋棄他們一直公认的共产国际領袖托洛茨基时，右派給斯大林的暗中操纵創造了便利条件。

德国革命的失敗問題，在俄国党內和共产国际中一直討論了二十年。① 虽然西方人的头脑很难弄清楚这类糾纏不清、扑朔迷离

① 在官方的党史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的暫时联盟。例如，波波夫写道："最广泛的工人和小資产阶級群众都充满了革命情緒，但是，以卢森堡分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为首的德国共产党机会主义領导集团，却表現出完全不能够利用已經产生的形势，只是一味跟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屁股后面，这就使德国資产阶級得以摆脫尖銳的政治危机。

尽管托洛茨基分子同布兰德勒集团保持着派別联系，他們却企图把布兰德勒分子犯了机会主义严重錯誤的責任推到中央委員会头上。"（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196頁。）

的教条主义爭执，可是，只有把俄德两党事务的相互关系先剖析明白，才能理解俄国領导集团中爭夺权力的复杂斗爭。当德国的命运在1931年又一次悬而不决的时候，塔尔海默否认德国右派曾經在1923年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边，企图以此重新获得斯大林的恩寵。他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直到1923年**12月**，才对德国党重新估价。只是在今天，我們才得以說明这种改变态度的原因和发生轉折的日期……季諾維也夫和执行委員会在基本上同意了我們的策略以后，怎么会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轉变的呢？

事情的前后始末是这样：1923年12月13日（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一次人数众多的党員大会上发表演說，参加关于托洛茨基問題的爭論。他公开宣布，假如俄国中央委員会的多数反对托洛茨基，不仅他本人，**而且西方主要的两个党，德国和法国共产党的所有領袖，都要反对中央委員会的多数**。这是在12月13日說的話。几天以后，季諾維也夫便向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送去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促成这种轉变的眞正原因在于，俄国共产党的領导集团、首先是季諾維也夫**惊慌失措**，对拉狄克的話信以为眞，相信德国中央委員会将支持托洛茨基反对俄国党領导机构中的多数。改变态度的原因就在于此。它和德国、法国或共产国际本身发生的事件都毫不相干。这完全是**俄国党内派系斗爭中玩弄策略的結果**。我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拉狄克的这篇演說。当我們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間得知改变政策的眞正原因时，声討运动、对我們的攻击等等已經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間。而且，拉狄克的声明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誰也沒有授权拉狄克发表声明，說我們将在托洛茨基受攻击时站在他一边。当我們最初听到圍繞着托洛茨基进行斗爭

的消息时，我們說：在我們作出判断之前，我們必須弄清楚这場斗爭背后的事实。在我們一了解事实以后，我便立即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文章。因此，造成这种轉变的并不是我們对俄国党內危机所持的眞正态度，而是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凭空臆想。”①

这些粉飾之詞是他在危机过后为了替自己辯护而編造出来的，在同一篇文字中，他还阿諛斯大林对德国政治的分析是如何清晰等等。事实上，1924年1月在莫斯科参加过馬斯洛夫委員会的每一个人，都完全明白他当时正在做什么买卖。在1924年，塔尔海默及其集团希望：即使大多数党員都反对他們，在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的建議下，他們也許能被互选进德共中央委員会。因此，德国右派向斯大林的政治局和季諾維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出卖了托洛茨基，得到的酬报是右派干部受到鼓励，在党的特工部門和赤色工会国际中获得了工作。

托洛茨基和政治局之間的斗爭，在最初阶段主要是由于“老近卫軍”希望保持自己的統治特权而引起的斗爭。尽管他在十月革命中和他后来担任各种国家要职期間取得了光輝成就，托洛茨基却一直被排斥于党的統治集团之外。这种关系是由列宁首先造成的，但他同时也力求在“老近卫軍”和托洛茨基这两极之間找出一条中間路綫。当党的老領袖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联合起来反对托洛茨基时，拉狄克支持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拉狄克和他比起来更是一个外人。

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联盟，似乎控制住了由于列宁行将去世而引起的党內危机。在这一时期，用来解释历史的馬克思主义

①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已为时过晚？》，第11頁。

被化成了煩瑣的教条。在1924年攻击托洛茨基的运动中，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內容：布尔什維克党史的神話。正如一个专制帝王认为君权神授，自己的統治是天經地义一样，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的权力从布尔什維主义的永远不会犯错誤而来。

不論是季諾維也夫或布哈林，他們在参加反托洛茨基斗爭时，都无意于剝夺他的苏維埃合法地位。不过，許多托洛茨基分子却被分配到远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政治中心的地方去了；托派高級領导人——例如拉科夫斯基和皮达可夫——被免去党內职务，另行分派到政府或外交部門的高級崗位上，下面的小人物則被无情地一脚踢开。这給斯大林提供了大好机会，他也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季諾維也夫用一張嘴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所用的則是組織手段。书記处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了党的一切重要崗位上。

《十月的教訓》

1924年8月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結束后，托洛茨基认为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必須进行回击。于是，他出版了《十月的教訓》① 一书，一本攻击三人集团但火力主要集中在季諾維也夫身上的小册子，从而再次掀起了一系列討論。托洛茨基否认十月革命以前的布尔什維克傳統和目前党的关系；他說，十月革命的經驗开辟了一个嶄新的发展时期。在对德俄两国十月革命所作的这种分析中，他抛棄了自己不可靠的德国朋友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

据托洛茨基說，认为党是一成不变的、前后一致的等等，完全

① 这本小册子最初出現于1924年10月，当时，預定要把托洛茨基在革命第一年写的文章編纂起来，以《一九一七年》为题出版一部两卷集，《十月的教訓》就是为这本文集撰写的序言。

是无稽之談。在1917年以前，党是由几千名优秀的工作人員組成的；由于列宁具有作为一个領袖的独特品质，因此，尽管他实行高度集权的原则，党仍然是一个民主的和生气勃勃的組織。到1923年，党已經发展成一个拥有五十万党員的組織；从来还沒有一个国家由这样龐大的一个有紀律的群众組織領导过。这个群众性政党同新国家机器的熔合，是一种应該不带敎条主义偏見来加以分析的嶄新现象。这个五十万党員的集体在一个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壟断着政治和經济大权，并且以恐怖措施維持着这种壟断地位。到1923年，創造苏維埃民主政权的尝試已經失败。在1917—1919年这一短促的最初时期，在內战的条件下，苏維埃曾經是代議制机构和政府的一个負責部分。到現在，它們已經蛻化为国家党的行政部門，变成供政策报告人做做样子的讲台，进行宣傳活动的装飾，或者如斯大林正确表明的那样，是把党的話傳达給群众的輔助組織。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禁止党內存在派别，反映了党內民主的逐漸消亡。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中认为，在喀琅斯塔得暴动的危急关头，暂时采取这种紧急措施是有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自此以后，反对派别活动的斗爭已經加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窒息了党內的全部生活。

在一年前所写的《新方針》中，托洛茨基曾要求派别和集团能合法存在，同时特别要求給予青年以更多发揮影响的机会。富有反抗性的青年将給国家党带来一种反对派因素，从而可以抵消“老近卫軍”的权力。不过，《新方針》并沒有触及苏維埃民主这个重大問題。在那篇著作中，他接受了国家党实行极权統治的前提，只把他的斗爭局限在更换党章上，这样一来，他便疏远了各种工人反对派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认为，必須剝夺国家党的壟断权力，而要抵制极权主义专政的发展，只有多党制才能形成必要的条件。

《十月的教訓》矛头所指向的問題范圍甚至更为狭窄——关于党領导机构的問題。托洛茨基首先想破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威信，在他看来，他們是有关列宁傳說的最有害的化身。旣然列宁是1917年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便不能让这两人把他們自己和“十月的列宁”相提幷論。他把这两人在1917年的“逃兵行为”和季諾維也夫在“德国的十月”中領导不力联系了起来。但是，托洛茨基证明“老近卫軍”幷非不会犯錯誤的用意太明显了，誰都看得出他是在借此抬高自己，因此，在1924年，老布尔什維克們都一致对托洛茨基展开反击。在这一时期的反托洛茨基論战中，不仅三人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写了文章，而且連索柯里尼柯夫、庫西宁以及很少参加党內討論的列宁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也都发表了論文。①

托洛茨基的反神話是：判断目前政策的标准，就是提出这种政策的人在1917年的表现。因此，《十月的教訓》虽然对党內結构有一些中肯的分析，却忽略了当时的最重要問題。在俄国，布尔什維克已經取得政权，这时的問題就在于：如何能做到旣反对布尔什維克党的壟断，又不致于把这个国家再次导入破坏、瓦解和崩潰；如何能在不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消除农民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抗拒。深刻探討在《新方針》中已經談到的各种問題，拟出一个取消党的壟断和建立民主社会新形式的綱領，把列宁在1917年的含糊建議发展为让工人民主起作用的具体公式——这些才是1924年这一代人的任务。

談到1924年的德国問題，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訓》也是同样不中肯的，因为他助长了德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危險的幻想，即：只

① 《托洛茨基主义的錯誤》，英国共产党編，倫敦1925年版。

要他們能使自己的党彻底"布尔什維克化"，他們就能够很快夺取到政权。事实上，毋宁說他們在1924年所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帮助他們认識到举行雅各宾式政变的时刻已經过去，在一段时期內，他們的任务只能是重新組織一切力量来积极保卫魏瑪共和国。

在反对斯大林崛起的斗爭中，《十月的教訓》不是一件有效的武器。然而，作为对1923年德国事件的剀切解釋来說，它一直具有很大价值。对于德意志共和国历史中的各个轉折点，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同时代人都理解得更清楚。他对于1923和1933年德国的分析都是如此；在希特勒快上台以前，他在伊斯坦布尔写过三本討論德国形势的小册子，① 它們对1932年德国危机所作的正确而簡明的分析，已經完全为希特勒的胜利及其后果所证实。

但在1924年，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对形势的估价，看来却要比托洛茨基事后的大胆解釋更現实得多。在右派共产党人这一边，不少人是有常識的，脚踏实地的。工人运动的分裂，頑固地拒絕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和德国最强大的組織力量——工会——参加暴动的准备工作，似乎使共产党人有理由退却。当时举行暴动，就等于以一个有組織的少数投入群众自发行动的激流，而把希望寄托于有組織的劳工会参加暴动。尽管布兰德勒和季諾維也夫之間存在着个人矛盾，他的观点却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1917年起义的观点相似。拉狄克和布兰德勒不仅对于开始內战时革命者居于少数地位这一点表示忧虑，而且正如季諾維也夫在1917年11月所說的那样，也担心起事后会"以政治恐怖維持一个清一色的布

① 《德国——国际形势的关鍵》，1931年12月版；《下一步該怎么办？——德国无产阶級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問題》，1932年9月版；《德国的唯一道路》，1933年4月版。

尔什維克政府”。

針对着这些顾虑，托洛茨基强調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并且肯定共产党人如果采取主动，起义就完全有可能扩大成为全民运动：

“我們在德国看到了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它显示出人們可能怎样坐失时机，把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罕見的革命形势白白放过。”

（在共产国际的一月会議上，上面这种說法遭到了斯大林的质难——不是由于它的內容，而是由于它同托洛茨基的朋友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声明有矛盾。）托洛茨基暗示，政治局从来也沒有认眞地准备由苏俄全力支持德国革命：

“提出一份載明詳細事实資料、說明德国去年发展經过的具体报告，对我們說来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为这場最慘痛的历史性失敗的原因提供具体解釋的报告。”

反对暴动的人列举了占压倒多数的反共力量，强調所冒的風險之大，以此证明共产党应当退却。他們特别提出，共产党也許会被完全消灭，这是一种必須不惜任何牺牲加以避免的巨大災难。托洛茨基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比較分析駁斥了以上的論点。十月暴动的所有反对者都曾異口同声地說，“你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力量夸大了。”彼得格勒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要地。这里集中了五千名装备精良、組織严密而且斗志旺盛的士官生。彼得格勒是軍队的大本营，駐軍有哥薩克联队的增援，此外，在城市四周还架設了大炮。前綫上的大批部队也可能赶来支援彼得格勒駐軍鎭压革命者。托洛茨基写道，所有这些力量都可以在事先以这样的方式来估計，以致使发动起义看起来成为不可能。在他們的計算中，德国同志“〔在資产阶級的力量上〕又战战兢

兢地增加了国防軍和警察的力量；然后，他們把全部数字化成一个整数(五十多万)，从而断定敌人是一支密集的、武裝到牙齿的大軍，絕对有力量粉碎他們自己的努力。毫无疑問，德国反革命的力量比起我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来，在数量上要强大得多，或者是，至少組織得更为严密和更有准备。然而，德国革命的有效力量也是同样强大的”。

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俄德两国之間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无产阶級中心在德国所占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在整个欧洲大陆是无与倫比的；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級人口才有类似的分布。

“无产阶級占德国人口的絕大多数。在我国，問題——至少是在发軔阶段——是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决定的。而在德国，暴动之火会立即在几十个强大的无产阶級中心燃燒起来。在这个决斗場上，敌人的武裝力量将不会像它們在化成整数的統計数字中那样显得可怕。无論如何，我們必須断然反对那种为了替导致失敗的政策申辯而有意玩弄数字的做法，过去有人那样做了，在德国十月革命失敗后的今天，还有人正在那样做……从沒有在暴动的烈火中經受过考驗，这些部队看起来会比它們在实际行动中的眞正力量可怕許多倍。……事实上，消极宿命論不过是优柔寡断、甚至是沒有行动能力的掩飾，但它却以一种安慰人的預測为自己塗脂抹粉，說什么我們的影响正在越来越大等等。……多么荒唐的幻想啊！一个革命政党的力量只能增长到某一个时刻，在此以后，就可能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

托洛茨基先知式地預見到，德国党在1923年的这种消极宿命論将会造成若干重大后果：

“由于党消极无为，群众的希望变成了失望，而敌人則从惊惶失措中恢复过来，利用了这种失望情緒。我們在1923年10月的

德国，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轉折。”①

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敌人大大利用了德国激进分子的失望情緒。因为，共产党領导机构的消极宿命論只有在下层党員中沒有得到反映；当时德国曾經有好几百万人期待着共产党的主动带头。在德国，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已經超出工人阶級的范圍。知識分子和大学生、被通貨膨脹搞垮因而无产阶級化了的中产阶級龐大阶层、青年軍官集团、甚至深为通貨膨脹所苦的很大一部分农业工人和小农，都一半害怕一半盼望着发生翻天复地的大改变。只是在后来，在斯大林的俄国明确地轉向国家社会主义以后，德国人才最終选擇了他們自己的国社主义。

德国革命的失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利影响，无論怎样强調也不为过。这种影响在意大利表現得尤为深刻。在当时的意大利，墨索里尼剛剛开始巩固他的政权，假如意大利工人不曾由于德国的失敗而失去主动，他們还是有可能擺脫墨索里尼的統治的。

在德国，不滿情緒反映在紧張的党內斗爭中，这种斗爭对下层党員起了瓦解斗志的作用。德国工人并不像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描繪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墨守成規的、在决定性的轉折关头过分謹愼的人。誠然，他們当中有保守的、思想迟鈍的和受傳統束縛的社会主义工人，这些人成长于战前的群众性政党中，在那里学会了謹小愼微、一步一步前进的活动方法。但是，除他們而外也还有年輕的一代，这些年輕人大都当过兵，同战前的历史沒有什么联系，对一般的民事法律抱着軍人的蔑視，希望把德国社会从上到下彻底加以改变。老一輩政党領袖（包括共产党領袖在內）的軟弱无能，使納粹得以利用工人阶級的这种两极分化，建立起一个下层阶級

① 本段以及与此緊接着的前四段引文，均摘自托洛茨基所著《十月的教訓》英文本，英譯者是約翰·賴特，紐約先鋒出版社1937年版，第23、69—72頁。

的群众性政党。

德国复辟力量的干部来自一切阶級，最初主要由軍界人士、地主和扩張主义企业家組成，在通貨膨脹时期，失意的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阶級参加了他們的队伍，到最后，在1929—1933年的大蕭条中，又有很大一批工人参加了进来。复辟运动就这样席卷了一切阶級的重要阶层，但它的推动力量却是旧帝国集团中一批鋌而走險的中坚分子，他們一心要恢复德国失去的地位，为此，他們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和使用任何手段。这个目标同德国的地理政治与人口資源是有矛盾的，只能以特别强調統一行动和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实現。納粹恐怖的作用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它的特殊形式是內战和德国高度技术水平共同造成的結果。

假如在德意志帝国的这种复辟力量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德国工人就曾采取行动把它扑灭，便会为欧洲机体割去最危險的毒瘤，而不致于养痈貽患。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党人的警告是正确的，这样一种敌人决不会为民主方法所粉碎。

有人认为，站在1923年德意志共和国前端的德国工人如果那样做，就将面临一种危險而复杂的任务。如果在那一年发生內战，便难以避免恐怖措施。那样一来，复辟力量固然是不会发展成熟，产生那种叫做“納粹主义”的現象了，可是，在击败一个組織严密而又野蛮的敌手的过程中，德国工人恐怕也将建立起一个独裁政府。不过，我却有这样的看法：在1923年，当德国工人还沒有失去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傳統以前，当他們的組織还沒有从內部被腐蝕以前，他們的专政将只是一个历史插曲。德国将会发現，恢复民主政体就可使局势平衡。

在同时代的观察家看来，希特勒的暴动甚至比汉堡的共产党暴动更不成熟和更为冒險，但是它抬高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地位。

在1923年11月以前，希特勒的名声一直沒有越出巴伐利亚，他不过是一个偏僻地方的狂人而已；帝制派保守分子，甚至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都沒有把他当成一个严肃的政治人物。可是，他企图在政治和經济危机达到頂峰时夺取政权的这次尝試，却使他在全国声名大振；因为他打算根本改变德意志共和国的进程，他变成了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希特勒宣揚的民族主义披着无产阶級的外衣，因此吸引了群众的想像力和精力。在1923年，国家社会主义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斗中打贏了第一个回合，而后者則明确地表現了它的軟弱无力。到1929年的大蕭条降临时，納粹已經远远地走在前面了。

第四部分 轉变时期

第十八章 左派共产主义和道威斯計划

在凱綏·珂勒惠支的著名石版画中，有一幅題为《德国——在1923年和1925年春天》的作品。这幅画的前半部画着一个德国工人阶級妇女，两手托着头极度忧伤地坐在那里；由于疲憊不堪，她的眼睛紧閉着，瘦伶伶的嘴边的縐紋，显示出她的滿腹辛酸和絕望。画的后半部是同一个妇女的同样姿态，但是她的眼睛睜开了；她又怕光地眯着眼显出一半惊異一半好奇的神色；她的嘴丰滿了一些，嘴角上的縐紋也少了几道。凱綏·珂勒惠支本人始終沒有参加共产党，但她是共产党推崇的人民艺术家之一，上面所說的石版画便代表了人們当时的情緒。

尽管柏林政府在反对两种极端分子——汉堡的共产党和慕尼黑的納粹——的行动中表面上取得了胜利，它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处境仍然是复杂而不稳定的。希特勒暴动的平息并沒有把民族主义分子和黑色国防軍鎮压下去。随着澤克特和巴伐利亚国防軍之間的重新妥协，慕尼黑依然是反魏瑪别动队的演武場。在軍队及其不合法的外圍組織中，有无数渴望实行軍事独裁的人，他們把澤克特-卡尔协定給予柏林的喘息时机，只看做是一种暫时的停战，他們将利用这段时間来准备另一次政变。民族主义密謀分子拥有許多身居高位的同情者，他們頗可以认为自己的失敗只是一

种战略退却，在这一点上，他們比共产党人具有合乎邏輯得多的理由。

柏林政府在同英国人举行的談判中获得成功，英国同意了賠款問題应該通过預备談判来商定，同意对来因-魯尔的占領应該結束。可是，这种成功只是解除了对德国的最大压力，因为法国人仍然賴着不走，并且施加压力企图永远控制魯尔。法国打算成为东抵維斯丢拉河的欧洲大陆的霸主。英国的賠款建議一方面是旨在遏制法国的这种野心，另一方面則是要把德国拉向西方，防止它可能和苏俄結盟。在这种英-法-俄三国角逐的情况下，德国企业界感到又有可能提出先貸款后賠偿的要求；它希望通过这种利益冲突的迷雾，能够寻求出一条恢复德国力量的道路。

美国的建議

1923年底，战后欧洲英国政策的一个眞正强大的竞爭者第一次登上了舞台，这就是美国。随着1918年以后孤立主义浪潮的席卷全国，参議院否决了威尔逊总統主張加入国联的建議。美国曾經承当了向协約国提供战費的主要負担，战爭結束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了它的債务国。对美国来說，德国賠款問題直接关系着协約国的偿还战債。

德国尽管被战敗了，仍然是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在外国貸款的帮助下，它的經济是可以在短时期內恢复过来的。从1920年以来，德国經济学家就曾在无数备忘录中强調过这种情况，这些备忘录都是根据調查研究写出的，在結尾时总是提出加强生产的建議。德国只有在得到外国貸款以后，才有能力向国外购买原料和恢复工业，从而才有可能生产出必要的贏余以偿付賠款。而且，德国专家还不断指出，賠款的偿付必須是灵活的，要随着德国經济情况的

变化而变化。根据正当的經济理由提出每年賠款額不作硬性規定的这种要求，成了德国政府修改凡尔賽条約的一个重要武器。

1923年秋，在汉堡、慕尼黑和德累斯頓政治危机达到高潮时，柯立芝总統接受国务卿休斯的建議，同意把賠款問題交給不管政治的专家去研究。12月7日，选出了这样一个专家委員会，委員会主席是后来的副总統查尔斯·道威斯将軍。到同年年底，便已經着手拟訂"道威斯計划"的初步方案，其內容大体上和許多德国专家在过去几年中所提的建議相一致。它的主要原則是，賠款应該以經济利潤、特别是出口赢余来支付，而不应該以让与資本作为賠償。賠款总額不作明确規定。原来硬性規定每年必須償付的巨額賠款，将改成按照德国經济的产量作增减的滑准償付制。在第一阶段，将让德国經济得到相当的休养生息，使它得以生产需要运交国外的剩余物資，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第一批巨額貸款将为以后的償付創造基础。从1924年9月1日到1925年8月31日，德国必須筹措两亿金馬克，此外，美国将提供一笔八亿金馬克的貸款。在第一个賠償年，德国的賠款将以十亿金馬克开始，按年償付，到1928—1929年，将增加到每年二十五亿金馬克的"正常"(而不是"最高限度"或"最低限度")償付額。在重新发生經济和財政危机时，駐柏林的賠款总署有权停止向德国的債权国償付賠款。另一方面，如果德国經济繁荣，协約国每年則可以多获得一些賠款。这种滑准賠償制給予了德国工业以直接刺激，但是，道威斯計划也使德国經济为美国商业盛衰的周期性所束縛。

美国专家接受了普恩加賚的生产保证思想，但他們是按照美国方式来理解的。因为对法国政府說来，生产保证就是夺取和吞幷德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地区的另一种說法；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求把魯尔区国际化，就是重复了法国在1923年的政策。

另一方面，美国的建議则完全是根据經济考虑提出的。生产保证是一种同时牢牢控制德国經济的保护制度。作为第一个抵押担保，成立了一个由各債权国代表控制的独立股份公司，負責經营政府的铁路系統。各債权国在国家銀行理事会中的代表，也把国家銀行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德国政府之外的机构。圍繞着这两項关鍵性措施，建立起一系列相当于控制国家預算的担保制度，例如以关税收入和运輸税为抵押等等。

在德国，道威斯計划遭到了少数人的猛烈反对；这些人振振有詞地說，实行这个計划的結果将使德国"殖民地化"和"巴尔干化"。(控制銀行和铁路确实是担保土耳其、巴尔干諸国和中国归还貸款的典型方法。)直接干涉內政引起了民族主义的抗拒情緒。国家机关中的工人和雇員害怕外国专家会削减他們的薪資。可是，除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右派和圍繞着极右翼政党的大小集团以外，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对不过是虛張声势而已。大企业和德国政府中的高級人物都接受道威斯計划，认为这是回到世界市場中的最好方式。既然欧洲各种力量之間的对比不可能立即改变，既然德国工业的复兴是保证德国未来的前提，因此大多数保守派政党和組織都同意接受道威斯計划。

道威斯計划的最坚决支持者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他們只批評了計划中影响到工会或該党工人工資的那些部分。一般說来，他們是欢迎美国資本干預的，因为他們要求得到保障，不致再为1923年那样的經济和政治危机所苦。

道威斯計划給了莫斯科政治局一个强烈的印象。包括尤金·瓦尔加在內的俄国专家研究了它的一切細节，认为这个計划证实了他們的"德国已淪为工业殖民地"的理論。美国对德国經济的这一直接干預，对苏俄說来具有莫大的关系。在道威斯計划可能在

德国产生的一切后果中，俄国政治局只关心一点——它将对苏俄的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他們幷沒有召开会議，根据道威斯計划使欧洲产生的深刻变化，研究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共产国际政策。对凡尔賽条約一个重要部分的根本性修改，要求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有相应的改变，旣要考虑到沒有被粉碎的复辟力量，又要考虑到德国在欧洲与美国之間的新均势中所处的境地。由十月失敗而引起的滔滔不絕的左派革命詞句为莫斯科的政策帮了大忙，正好使它避免在德国承担义务，不去分析道威斯計划的意义。

这样，道威斯計划便被单純理解为一种包圍俄国的新工具，旨在为英国指使下的德国干涉作准备。他們指示德国党要无保留地反对这个計划。可是，这些指示都是多余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德国共产党本身就上下一致反对来自西方的任何干涉。俄国政治局担心它同德国軍界以及傾向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关系会被削弱或中断，于是陈說利害，不仅强調稳定化的經济后果，而且强調它对德国前途的更广泛影响。难道德国要变成一把供英国人用来对付莫斯科的匕首嗎？德国可以走哪条路呢？是走向倫敦，还是走向莫斯科？德国不能在路当中停步不前，如果不能及时作出选擇，它就会被粉碎。道威斯計划的規定尽管比較有伸縮余地，它却仍然是經济方面的一个凡尔賽条約，将使世世代代的德国人为华尔街和倫敦商业区做奴隶；另一方面，同俄国联合則可以使德国最后摆脫西方的統治和殖民地化。共产党的小册子、傳单、宣傳大会、在議会中的演說，以及在国防軍軍官和民族主义集团中进行的更专門化的宣傳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总的口号下进行，这就是“要倫敦，还是要莫斯科？”①

① 参看《要倫敦，还是要莫斯科？》，恩斯特·台尔曼和路特·費舍在議会中的演說，柏林1924年版。

曼努伊里斯基代表团前来柏林

1924年3月1日，自1923年10月以来据以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紧急状态宣布解除，澤克特将軍为内政部长卡尔·耶雷斯——在后来的1925年选举中，他是民族主义分子提出的总統候选人——所接替。随着形势的这一轉变，党开始能順利进行活动，为恢复原有的地位准备了条件。

共产党的党員人数已經由1923年9月的二十六万七千人下降到1924年4月的十二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主要反映了由于党的漠不关心而遭到排斥的革命干部的損失。党报的印数也許达到了党員人数的两倍。在地下时期，往往把党的文献伪装成其他物品，通过邮局以小包裹寄給各个地方組織。[①]获得最大成功的是一种歌本，印刷总数达三十万册。在埃森，法国占領軍当局沒收了共产党书店中的全部书籍。"在好几个城市，例如在不来梅，警察在市場上公开焚燒党的文献。"[②]

在这段地下时期，俄国政治局关心地注視着德国党內日益增长的反莫斯科傾向。1922年季諾維也夫曾經把奥古斯特·克萊恩-古拉尔斯基派到柏林。他在仍然受俄国党党紀約束的情况下，在来比錫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德国政治局。1923年10月，他抛棄布兰德勒，成为建立中派集团的推动力量——这个集团主要包括赫尔曼·雷梅累、威廉·克能、瓦尔特·烏布利希和瓦尔特·施特克。一个主要由这个集团組成的中央委員会，将是便利于莫斯科

① 例如，1923年12月寄出154个包裹和380个小包裹；1924年1月寄出364个包裹和639个小包裹；2月寄出377个包裹和74个小包裹。在这段地下时期，紅色互助会請了120名律师，干预了6,600个案件。軍事当局时常对共产党的組織工作者采取保安羈押措施。

② 《关于德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議情况的报告》，1924年4月7—10日举行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柏林1924年版。

控制的极好的名誉領导机构。作为中央委員会的实际主席，同时又一身而兼跨两党，古拉尔斯基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实現莫斯科对德国党的操纵。让古拉尔斯基成为德国党的实际領袖，是季諾維也夫在这一时期很想实現的一个主意，但是，当情况表明这种打算已无法实現时，也就不得不考虑控制德国党的其他措施了。①

在斯大林书記处的建議下，政治局任命了一个果断的人德米特里·曼努伊里斯基协助季諾維也夫工作。这項任命是斯大林借以渗入季諾維也夫共产国际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以前，曼努伊里斯基只做过俄国党的工作；他沒有参加对外活动的資格。截至1923年为止，被派到共产国际中来的一直都是声誉卓著的——或是在理論上、或是在国际經驗上——俄国共产党人。只有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才享有眞正的威信；被容納进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共产党人，往往遭到各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就像在塞拉蒂-列維危机期間，拉科西·馬加什在意大利所遭遇过的那样。

斯大林怎样把俄国党的工作方法带进了共产国际，可以从曼努伊里斯基这个人身上看出来。他是一个烏克兰乡村神父的儿子，1904年在圣彼得堡大学求学时，便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維克派。他参加了1906年的喀琅斯塔得起义，遭到逮捕和流放，以后从俄国逃出。1917年以前，他一直在欧洲浪游，特别是在法国，在那里，他当了好些年推銷員。他在1909年参加了一个反对派集团，在《前进报》上写过几篇反对列宁的論文（这件罪行也就成了日后总书記控制他的武器）。他在1917年回到彼得格勒后，最初参加了一个介于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之間的集团；他当时同托洛茨基頗为亲近，曾警告——据托洛茨基說——他不要同列宁联合。

① 經过在党內的若干盛衰荣辱，包括短时期附和季諾維也夫反对派，古拉尔斯基在三十年代中叶被派往拉丁美洲（大概是巴西）。

可是后来他本人也在同一年参加了布尔什維克。

1919年夏，党把他派到烏克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3年。在存在着民族主义和工人反对派特殊問題的烏克兰，曼努伊里斯基站到党机器的一边。在这个空气紧張的地区，这位組織局的干部学会了一种随机应变的本領，因此，当他从自己的极有利的地位观察到斯大林书記处的权力与日俱增时，他便設法参加了正在得势的一方。

他在1920年曾作为共产国际代理人被派往法国，官方身份是烏克兰紅十字会会长。他从法国被驅逐出境后，成为烏克兰农业人民委員和烏克兰党的书記。1924年，他率領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德国，組成这个代表团的，全是名义上受共产国际管轄但实际上为斯大林所秘密控制的秘密支部的成員。①

当我最初在莫斯科后来在柏林遇到曼努伊里斯基时，我看到了一种从未見过的新型俄国共产党人。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种直言不諱的犬儒主义。他对共产主义理論的兴趣，只限于它們在玩弄权术方面的应用。他領着手下那般人住在柏林，就像是一群波希米亚人，在个人生活方面相当逍遙自在，只对阴謀詭計感到兴趣，对于每一个由于信仰共产国际公开表明的宗旨和原則而皈依它的人，都抱着一种冷酷的蔑視。德国共产党人之不喜欢曼努伊里斯基，正如他之不喜欢他們一样；他們那种拙劣的但也是认眞和热烈的献身精神，和他那种冷嘲玩世态度之間的鴻沟，不可能給友誼留下任何余地。他对待德国共产党人就像是对待一群过

① 在斯大林統治共产国际的二十年中，曼努伊里斯基始終居于領导地位。他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最熟諳这个世界性机器各种复杂阴謀的人；据可靠消息，曼努伊里斯基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仍然是它的領导人。在1945—1946年，他是俄国中央委員会委員，并曾担任烏克兰代表出席过旧金山和紐約的联合国会議。

分热心的和討厌的小孩子，他們总是要过問大人們的問題——这些問題，他是只同自己那一伙俄国特工人員討論的，而这个集团，任何外国人都休想置身于其中。

比起他的前任拉狄克，曼努伊里斯基手下拥有更多的工作人員。他在柏林安頓下来，占了許多房屋，派遣秘密观察員到所有的地方支部去，把看到的情况写成报告交給他，由他轉送莫斯科；德国党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訪問他的人川流不息，代表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派别；他們同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討論党的危机問題，他仁慈地傾听着他們的訴苦。他使自己成为党內知識分子的知心朋友，帮助他們解决个人困难，其方法是聘請他們从事报刊或情报工作，由他发給薪金，或者是把他們推荐給莫斯科总部，到俄国或国外担任政治工作。不过，在曼努伊里斯基来德国活动的这个第一阶段，做出的成績很小。德国党当时仍然为下层党員的情緒和願望所統治，对莫斯科依旧桀驁不馴，虽然它从沒有能足够明确地表示出它的反抗。曼努伊里斯基的报告描繪了这样一幅图景：德国党正在一步步离开我們；如果容許左派掌握党的領导权，他們就会領导党脫离共产国际。但是，如果立即采取过于严格的措施，又只能加强反莫斯科的傾向。因此，他要求有一段时間先滲入德国党，从組織方面进行工作。

共产党的法兰克福大会

对曼努伊里斯基的第一次重大考驗，在德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到来了，这次大会于1924年4月初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法兰克福的警察当然知道，所謂体育俱乐部会議或者胡果·埃貝尔林那天所用的别的什么名义，实际上是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但是，共产党方面也不傻，因此，会議平安无事地进行了下去。

不过，即使发生紧急情况也不要紧，因为負責保护会議的技术工作部門配备着突击队，能够把警察襲击的危險通知大会，使討論及时中断。

这次法兰克福大会的精神，在下层党員对工会的敌視上最好地体現了出来。人們认为工会应該为1923年的失敗負責。正如在1919和1920年一样，又一次討論了共产党是否要参加工会的問題。許多代表认为工会已經永远失去德国工人阶級的信任，感到党支持这些腐朽的机构是在浪費精力，最好是建立由共产党領导的独立工会。在代表大会进行的同时，着手組織了一个革命工会代表全德委員会，由独立的工会和一般工会中共产党集团的代表組成。尽管它們拥有的会員人数比較少，这些独立工会却使共产党的合法組織和地下机构都得到了巨大的帮助。

要求党集中力量組織独立工会的建議，給了俄国領袖一个求之不得的干涉德共事务的机会。按照傳統的列宁主义学說，脫离工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錯誤。在一封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季諾維也夫警告大会要防止这种极左派的貨色，并且提到了党內有反布尔什維主义的危險。他指名攻击了鮑里斯和薩木什。

鮑里斯和薩木什是两个年輕人在党內所用的名字，他們都是革命后从俄国迁居德国的。在党报《紅色信使报》上，他們对苏維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示怀疑。同另外一个青年理論家罗夫·卡茨一道，他們研究了革命低潮时期苏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之間的关系。使私人企业部分地复辟的新經济政策，把俄国經济同世界市場联系起来；苏俄外交政策迫于要适应俄国的經济，便不得不尽力使俄国同它的資本主义邻国之間保持和好关系。这样一种妥协政策必然要和俄国以外其他革命政党的利益相冲突。因此，鮑里斯和薩木什得出結論，认为共产国际組織应該同苏維埃国

家断絕关系。它的总部应該迁离莫斯科；二者之間应該断絕一切政治的和組織的联系；各国共产党应該拒絕莫斯科的財政援助，独立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用去考虑苏俄外交政策变化无常的需要。俄国党应該是共产国际的一員，同其他党享有平等权利，而不应該借助于国家力量統治共产国际。

鮑里斯和薩木什这两个影响很小的年輕人提出的这些建議，引起了莫斯科政治局的抗議風暴。如果德国左派竟然容忍这种色彩的反布尔什維克思想，季諾維也夫說，那它“对世界革命来說就将是不可救药的了”。季諾維也夫指出了他們的民族根源；每一个不是俄国党党員而加入另一个共产国际支部的俄国人，都是极其可疑的。季諾維也夫的这封信，俄国政治局的若干幕后干涉之一，激怒了左派代表。莫斯科政治局和德国共产党人之間的疏远，当时很容易感觉出来。显而易見，政治局不会容忍德国党內的任何独立傾向，它宁願使党分裂也不願看到这样一种发展。鮑里斯和薩木什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幷沒有得到响应，因为一般的德国共产党人过于糾纏在內部爭吵和各个派系夺取权力的斗爭中了，以致不能对俄国的政治方針、新經济政策或它們的意义作一番徹底的研究。不过，在左派的秘密会議上，来自柏林、鲁尔、汉堡和帕拉廷耐特的許多代表，都建議抗拒莫斯科自封的領导。在給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的秘密答复中，左派駁斥了季諾維也夫的指責，幷且对俄国政治局敌視德国左派的問題表示关心。德国左派領袖，这时是台尔曼、馬斯洛夫和費舍，受到代表們的委托，要他們对这种干涉大力展开斗爭，使党擺脫俄国政治局的控制而取得独立。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項政治決議，完全不足以应付由道威斯計划引起的紧急政治任务。党所集中研究的，是从夺取政权的斗爭中吸取教訓，幷且寻求出一种最簡单明了的公式，以保证

这次暴动中的消极被动永远不再重演。代表大会文件中一再重复的詞句，所涉及的都是如何夺取政权以及为夺取政权作組織准备的方法。考虑到俄德两国情况的变化，这些口号很快就变成了荒唐可笑的东西，因此，法兰克福决議是理当受到批評的。但是，左派的这个严重缺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这就是，党的发展动向还有另外一面。重新活跃起来的干部們，热情蓬勃、精神飽滿地投入了組織党、重申共产党政策的工作。在一段时間內，德国共产党人相信他們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曼努伊里斯基集中一切力量，希望控制中央委員会的組成人选。按照党章，中央委員会必須根据代表中間各派力量的对比組成。左派多数让中派在中央委員会內得到了超出其代表人数应得的名額，并且把右派的克拉拉·蔡特金和威廉·皮克也吸收进来。①但是，曼努伊里斯基沒有能使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或瓦耳歇尔当选为中央委員——他需要这些人，并不是由于支持他們的政策，而是为了布置更合适的瓦解中心。左派多数控制了全党及其在法兰克福的机器——从中央委員会到地方組織干部統統换了人，这是自斯巴达克团成立以来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动。党的财产、报紙、建筑物、基金都换了主人。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結束后，曼努伊里斯基和他的屬員回到莫斯科，报告他們此行的不佳收获。在莫斯科，人們大失所望；后来，季諾維也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說：

---

① 在出席大会的一百十八名代表中，布兰德勒右派只有十一人，在新的中央委員会內連一个名額也分配不到。这一百十八名代表中，有八十一名在战前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有十八人是在战时入党的，革命开始后入党的有十九人；在代表当中，一共有十二人参加过斯巴达克团，八十四人参加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九十六人在1919年以前是工会会員。（《关于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法兰克福会議，第394—400頁。）

“首先，我必須坦白承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已經在違背执委会意願的情况下征服全党。在我們这个国际的全部历史中，据我所知，出現这样的事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种情况证明，德国左派的力量在当时相当强大；至少是在最初阶段，它夺取了党的領导权，而置共产国际的意願于不顾。执委会无法可想，只有承认这一事实，并且依据这样一种指望、即在左派內部能形成一个更靠近我們的核心来采取行动。除此以外，便别无道路可走。要布兰德勒还是要左派，这就是当时的选擇。一切比較健康的无产阶級分子都倒向了左派，因为右派領导已經破产。不幸的是，我們想建立一个中派集团的尝試也沒有成功；这个中派集团很快便消声匿迹了。”①

法兰克福会議加剧了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之間的摩擦。政治局通过了反对德国左派的决議，把它們交給身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諾維也夫去执行，而这些决議的部分目的，也就在于离間他和德国党——当时共产国际在俄国以外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党——的关系。在俄国的高級領袖中，季諾維也夫被认为是国际主义的代表。一个由左派領导的德国共产党是一个搗乱的东西，将会給俄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不少麻煩，而且，尽管季諾維也夫公开批評它，这样一个党的存在本身可能加强他在政治局中的影响。不过，由于德国党的絕大多数都支持新的領导，斯大林决定先等待一下，看看情况再說。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曾通过馬克斯·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議記录》，1926 年 2 月 17 日—3 月 15 日举行于莫斯科，汉堡 1926 年版，第 501 頁。参看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領导人洛米納澤 1926 年 7 月 4 日在《紅旗报》上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討論了德国、波兰和意大利极左派的力量：“德国共产党的領导权，在違反共产国际願望的情况下落到了极左派——馬斯洛夫、路特·費舍、朔累姆、卡茨——的手中。可是，共产国际在当时无可选擇。”在后来的党內討論和报刊文章中，人們却常常說莫斯科在 1924 年“扶植”了左派的領导。

列文①給馬斯洛夫和我分别带来他們的亲笔信。列文把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之間的紧張关系告訴我們，并且强調他們两人都非常希望同德国党的左派領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不論是馬斯洛夫或者我本人，都沒有对斯大林的私人信作答复，也沒有理会曼努伊里斯基要我們最好和俄国总书記合作的多次暗示。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认識到，在拒絕斯大林的这些表示时，我們便使自己陷进了危險。在他的权力机器向前滚动的过程中，斯大林决不能容忍两个这样不肯合作的人控制着柏林——共产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鍵性地区。馬斯洛夫特别引起他的痛恨，因为斯大林感到馬斯洛夫受过他的深恩，理当对他永远感激，不料馬斯洛夫反而恩将仇报，竟对他表示不信任，并且鬧起了独立性。按照斯大林巧妙玩弄的政治法則，当一个强大的对手主动要做你的保护人时，你竟敢这样公然表示輕蔑，这是一种不可饒恕的行为。当时很难用再一次調查的名义把我們召喚到莫斯科去；要把我們排除出德国党的領导崗位，必須想出某种别的方法。

1924年5月4日，举行了通貨膨脹以后的第一次議会选举，选举的結果表明，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极大增长，在它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以前的1920年，它在議会中只有十五个席位，这次却一跃而增加到六十二席，获得选票三百七十万張。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則受到警告——从一百七十一席减少到一百席，这是1918年11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民主党人也很慘，从三十八席降为二十八席；施特雷澤曼自己的党，德意志人民党，从四十四席增

① 在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垮台后，列文在莫斯科找到藏身之所，在那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工作，把他的大部分时間都用来研究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关系。1937年，在經过几年秘密监禁以后，他在沒有受到正式起訴或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他和季諾維也夫之間的私交就是他的罪状。

至四十五席。与此同时，海軍上将馮·特皮茨領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从原来的六十七席增长到九十五席；加上德意志人民自由党这样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小党派的三十六席，它体現了通貨膨脹危机发生后德国的一个重大傾向，这一事实表明，共和国对希特勒及其信徒取得的胜利并不巩固。选举揭曉后的那天上午，国內外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极端分子的这种得势——不論是左是右（“特皮茨和路特·費舍是胜利者”），而德国继續动蕩不安的这种征兆，正好成了支持道威斯計划的另一个理由。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

选举剛結束，我便被派去参加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各国党在举行一切重要的会議和代表大会时，一向有一种彼此互派兄弟代表的习惯，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官方干涉的日益独断独行，这种做法已經越来越流于形式。当时，新的德共政治局不知利害，开始在独立于莫斯科的情况下同西方其他国家的党建立联系；德国左派开始締造欧洲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了。

我化名去倫敦，在那里遇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彼得罗夫斯基，他当时正用貝奈特的假名在英国共产党內工作。他手下也有一批顾問和技术人員，不过比曼努伊里斯基的要少一些。我还遇到剛剛脫离共产党的埃倫·威金逊，以及約翰·华尔頓·紐博耳德，后者同我討論了德国的政策。我和哈里·波立特、帕姆·杜德以及威廉、加拉赫都見了面，他們都表現出对德国党比对貝奈特的忠告更感兴趣。貝奈特和我同路去曼彻斯特赴会。不料我剛向代表們打了几声招呼，警察便赶来逮捕我，而且只逮捕我一个人。貝奈特一点沒有受到打扰。不过，警察还算客气，只在走廊上等着我，这便給了我一个机会，穿上我的一个英国朋友的衣服，幷

且借用她的证件逃了出去。經过这次事件，我便同共产国际的代表断絕往来，瞞着他旅行到利物浦，从那里取道回国。我在坐上科隆的火車时，从报上看到馬斯洛夫已經在几天前于柏林被捕。

我立即打电报給一个可靠的同志，让他在哈諾威接我，繞道把我带回柏林。我在柏林一直居于地下状态，直到議会开幕、我可以享有不受逮捕权时为止。

在从哈諾威到柏林的火車上，我們討論了馬斯洛夫的被捕問題。我們断定，莫斯科机器已經开始严厉执行共产国际的制裁，不再像以往那样松懈无力，这一次准是他們同柏林警察串通搞的鬼。馬斯洛夫是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开完会回去时被捕的，尽管有特工人員保护着会議的参加者。他是唯一被捕的人，虽然柏林警察当时还不太知道他。一个偵探借口馬斯洛夫这群人中有扒手，故意制造了一陣小小的騷扰。于是，馬斯洛夫便被带到警察局，以曾在1923年10月（当时他正被扣留在莫斯科）阴謀推翻德国政府罪被捕。

192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由于共产国际的活动和欧洲的发展前景是如此一蹶不振，以致共产国际已經对俄国共产党人失去吸引力，季諾維也夫需要大吹大擂一番，以便恢复他在俄国政治局中的地位。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反映了当时籠罩着共产国际的犹豫、不安和詭秘的气氛。共产国际沒有在任何国家取得任何进展，而代表大会也就反映了这种困境。当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举行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种部队平息了格魯吉亚的一次暴动，关于这件事，一点消息也沒有对代表們泄漏。波波夫就这次暴动事件写道：

“农村人口中个别阶层日益不滿的情緒，已經在1924年初秋通过一系列严重征兆表現出来。

这些征兆中的第一件就是格魯吉亚的八月暴动。这次暴动在

几天內便被平息，它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挑唆起来的。暴动組織者是得到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金錢援助的孟什維克。暴动的支持者是过去的貴族和一部分小資产阶級。但是，一小部分农民也对暴动显示了同情的态度。特别危險的是下列事实，即这种态度是在格魯吉亚貧苦的半无产阶級地区（古里亚和明格雷列亚）显示出来的。"①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欧洲形势作了不精确的解釋；一种关于資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模糊概念阻碍了共产党政策的坚决轉变。在对工人政府的性质問題展开的复杂討論中，工人政府一詞作为无产阶級专政的"同义詞"被接受下来。玩弄这种語义学花招的目的是，在不必明确說破的情况下，为最終参加巴尔干或中欧各国政府开辟道路。

通过"工农政府"向巴尔干諸国扩展的这种新企图，是对"工业主义者"展开論战后形成的。其理由是，革命已經在德国这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遭到失败，而英法两国目前显然并沒有面临革命危机。可是，难道我們不能在不稳定的巴尔干諸国夺取政权嗎？在那里，农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数，这些巴尔干农民显然不会为无产阶級专政的前途所吸引，但却可能支持一个对苏俄友好的工农政府。所以需要說什么"同义詞"云云，旣是为了使这种政策有别于最近

---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225頁。

几星期前，季諾維也夫曾在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了国內危險的紧張形势：

"外国观察家非常关心我們是否还預备继續实行新經济政策。英德两国报紙已經表示它們的不安。在貝尔格萊德，白俄逃亡分子的报紙《新时代》写道：'假如 NEP（新經济政策）停止了，我們就要建議組織一个 VEP〔即全俄大屠杀〕。'把投机分子逐出莫斯科，严格管理国营貿易，扩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基輔、列宁格勒和斯塔夫罗波尔的政治审判，拒絕新的让步，按照'阶級路綫'分配住房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孟什維克的伤心。"（《国际新聞通訊》，1925年6月9日，第91期，第1240頁。）

在薩克森的不愉快經驗，又是为了掩护政策的改变，硬把它說成同原先的革命思想完全一样。这种执意要維持一种永不間断的傳統，这种从不把轉变說成是轉变的做法，是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一个主要特征。

然而，在巴尔干諸国建立农民政府的想法，也反映了共产党人正在摸索着同俄国农民达成妥协。在新經济政策下——也就是說，在一个存在有限自由市場的农业国，农民需要一种比共产党給予他們的政治权利更加直接的参政权。貧农委員会曾經是农村中一种阶級斗爭的工具，在內战期間，它曾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以城市为根据地的共产党的代理人。富农和貧农之間的斗爭，一直沒有得到解决，难道不能由一个日益独立于党之外的貧中农委員会，既在农村中完成这一斗爭，又在地方和全国机构中充当农民的代表嗎？这項新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早在1923年，为了把各种农民組織联合在一个受莫斯科控制的国际中，已經成立了农民国际，这时，人們正在筹备举行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24年，季諾維也夫建議在各級苏維埃中組成非党农民集团——作为将来可能成立的苏維埃农民党的核心。

“莫斯科的气氛不是欢愉的。德国革命的失败造成了一种和絕望相去不远的頹丧情緒。人們认識到，一个历史时代的最后一張牌已經打了出去。誰应該受責备呢？共产国际的首領〔！〕拉狄克当然是替罪羊。托洛茨基的党徒使用了‘胆小鬼’这样的形容詞；他們說，沒有把早就准备好的騎兵派出去，让他們通过波兰走廊开进德国，这完全是一种懦夫行为。……党已显然走上严重內訌的道路。

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策略。在德国大失败以后，‘工业主义者’似乎已失去很大陣地。他們回到了关于社会革命的討論上，这种革命将通过巴尔干諸国和意大利实現，它的中心是农民阶級。人

們又一次提議成立农民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輔助組織。”①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議題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爭。所有兄弟党的代表都效法季諾維也夫的声明，一个个登台表示他們始終如一和不可动搖地忠于“列宁主义原則”。这場檢閱旨在支撑季諾維也夫的共产国际搖搖欲墜的地位，以反对那些“取消派”，也就是說，那些希望取消这个无用机构、取消这个妨碍同資本主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組織的人。因此，季諾維也夫就这样部分地利用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爭，来保卫在俄国党內遭到反对的共产国际。

这些討論并不能反映共产国际中托派集团的眞正力量。俄国党內各派都彼此担心另一派会同托洛茨基集团結成联盟；政治局的全体成員都警惕地注視着，使每一个人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爭中都表現出足够的积极性。通过共产国际中俄国代表团的决議，斯大林从幕后把季諾維也夫推到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爭的最前端。季諾維也夫也回敬一枪，希望通过各国共产党“最高世界权威”对他的反托派提綱的批准，使斯大林-托洛茨基联盟成为不可能。

于是，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便成了政治局內各种集团的斗爭舞台；它此外别无其他意义，也沒有什么威信。

6 月 14 日，当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在列宁陵墓上出現的时候，他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但是，由于他这时的政策是沉默隐退，他并沒有参加爭辯，耐心地容忍了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高談闊論。② 托洛茨基过去和現在背离列宁学

① 格里戈雷·别謝多夫斯基：《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 68 頁。

② “托洛茨基接到邀請，要他出席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看法，但他却假惺惺地以党紀为理由而拒絕参加大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个兽医代表大会上却作了一次其內容根本不同于党和共产国际路綫的国际形势报告，显然表現出他并沒有把党紀放在眼里。”（波波夫：《苏共簡史》，第 2 卷，第 213 頁。）

說的各种錯誤受到了指責，而所有这一切关系到的，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 1917 年革命以前的分歧——在国家党执政的新情况下已經失去現实意义的分歧。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爭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正如俄国人所說的那样，是“飯后才送上的芥末”。指責托洛茨基具有“反革命”或“資产阶級”傾向，当时还是不可想像的。斗爭的目的只在于不让他在政治局內坐第一把交椅，而不是要把他永远排除出党或共产国际的集体領导机构，或者是对他的“革命荣誉”表示怀疑。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出現时，具有他在夺取权力的这一阶段独有的特征。他让代表們徑自去举行他們的无数次会議和发表滔滔不絕的演說，自己从不参加。他只是仔細观察着代表們的举止和性格，选中某些人到俄国党的总部——这个地方一般是不容共产国际代表踏入的——去私下談話。他組織了同欧洲各国党內观察員的亲自通信，他以俄国政治局組織者的身分，将直接听取这些观察員的报告。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代表团，沒有一个成員对季諾維也夫有一句批評；那样做将是对俄国党內約法的破坏，按照这种約法，在“外国人”面前对俄国党的表面团結有任何破坏，即使是最輕微的破坏，也将是一桩莫大的罪行。不过，斯大林仍然在人們当中成功地創造了一种季諾維也夫并不是眞正領袖的印象。

在这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第一次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們所知悉。他靜悄悄地、几乎是鬼鬼祟祟地溜进圣安德魯大厅四周的会客室和走廊。他口銜烟斗，穿着一身独特的軍服和一双威灵頓长靴，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翻譯的协助下，同一小群人溫和而有礼貌地談着話，摆出了一付新型俄国領袖的姿态。他的这种姿态給年輕的代表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們面前，他表現出是一个瞧不起空洞革命詞藻的革命家、脚踏实地的組織工作者，他的机

敏果断和现代化的工作方法，将能够解决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上的各种問題。而圍繞着季諾維也夫的，則都是一些年老的、爱小題大做的、过了时的人。

我有充分的机会来观察这种籠絡人心的效果。我率領的代表团大約有四十名德国代表，他們几乎只关心一个問題，即如何才能最好地保卫本国的革命利益。他們当中的大炮是德国党的新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他特别攻击季諾維也夫对德国革命的失败应負的責任；他以一种幼稚的执拗，在每一个問題上都要挖空心思提出最左的口号。由于我接受了前面提过的所謂“同义詞”論，他感到万分气憤，认为这是背叛了我們的党以及我們的干部会議遵循的原則，因此，在以后的会議中，他都一直对我背着臉坐着。可是，俄国党內的每一个人都大捧台尔曼，认眞地考虑他提出的每一个淺薄建議。年輕的代表之一，海因茨·諾伊曼，对斯大林特别热心。在馬斯洛夫被关进毛比特监獄以后，他就成了我們当中少数几个懂俄語的人之一，每当斯大林露面时，他都像一头找到新主人的小狗似的，恭而敬之地跟着斯大林的屁股轉。斯大林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利用他在代表們中間做宣傳——不仅是在德国人中間，因为諾伊曼通好几国語言，能够同大多数欧洲代表用他們的本国語交談。

在代表大会結束时，台尔曼、馬斯洛夫（缺席）和我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新委員。

参加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們回去了，他們的口袋中塞滿了关于工人政府問題的决議，而在他們要返回的德国，当前的問題却是要不要接受道威斯計划。

議会接受道威斯計划

馬克斯-斯特雷澤曼內閣的一些声明把道威斯計划称为“作出巨大牺牲的道路”，从而迎合了民族主义經济学家海尔弗里希的“第二个凡尔賽”的說法。另一方面，斯特雷澤曼也强調指出，道威斯計划提供了解决賠款問題的唯一方法，而且，如果議会批准这項計划，它将最終导致“来因和魯尔同胞的解放”。德国的所有民族主义派别都明白他說的是眞話。

社会民主党也热烈支持同美国合作。社会民主党人对民族主义分子强烈反对道威斯計划的宣傳是如此关心，以致打算在議会万一否决它以后，建議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計划。阿尔都尔·克里斯平——一个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員，言談举止上表現激进，以善談“科学社会主义”知名于世的人——欢迎道威斯計划，說它是資本家对群众的有条件投降。① 工会給这类漂亮的詞藻加上了一些比較清醒的評論，指出了公平分配道威斯負担的必要性。

在德国的所有政党中，以共产党对道威斯計划的抨击最为猛烈。德、法、比三国共产党都举行了示威性会議，强調反对这个包圍苏联計划的西方共产党統一战綫。在1924年春天，斯特雷澤曼对自己的政策能否在議会中取得必要的法定票数沒有把握。在一次外交委員会会議上，他甚至向共产党隐約表示，如果他們投票贊成道威斯計划，他就可以頒布特赦(当时还有数以千計的共产党人被关在监獄里)。

澤克特害怕俄国的这种激烈宣傳会产生不良影响。5月29日，他作了一篇关于俄国阴謀和共产党顚复活动的演說。社会民主党

① 《社会民主党1924年党代表大会記录》，柏林1924年，第43—50頁。

人也加入合唱；6月3日，議会議长保尔·勒貝发表了一篇譴責“共产党阴謀分子”的声明。

我和亚瑟·罗森堡博士当时是議会对外关系委員会的共产党委員。在委員会的意見听取会上，一大群总参謀部軍官强調說，道威斯計划既不会削弱俄德之間的傳統友誼，也不会削弱两国反对凡尔賽条約的精神联盟。这些話主要是說給共产党委員听的，以便让他們报告給莫斯科。但是，在公开場合，像雷文特洛夫伯爵这样的民族主义分子都竭力想模糊他們过去同共产党人的勾結。

1924年8月，道威斯計划終于在議会中以248对175票被接受；投反对票的包括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及其追随者和共产党。

賠款总署署长帕克·吉耳伯特把他的总部設在柏林。有五年之久，道威斯計划一直值得称道地起着預期的作用。从1924年9月起到1931年7月胡佛提出延期偿付时止，德国一共偿付了一百零八亿二千一百万金馬克。債权国对賠款能迅速和如数偿付感到滿意；保护制度效果良好；每年偿付数額总是規定得很慷慨，有利于德国的債权国。当然，出口应該成为德国复兴基础这一点是計划中所固有的。沒有出口，就不可能有偿付賠款的剩余产品。

“德国履行賠款义务的能力取决于这些外国貸款。……这些外国貸款使德国在1924—1929年期間得到如此巨大的刺激，以致有能力課取巨額賦税并籌足賠款。……整个計划的用意只是过渡性的，在德国能重新自力更生以前先扶它一把。但是，賠款的继續偿付却有賴于外汇的不断流入和不发生危机。”①

布魯克继續說道，道威斯計划“以美国的偉大榜样”鼓舞了德国，加速了已經成为德国工业特征的合并为少数几个巨大企业的

① 华尔納·弗雷德里克·布魯克：《从威廉二世到希特勒的德国社会經济史，1888—1938年》，倫敦1938年版，第174頁。

过程。德国工业“比英国工业的兴起要晚得多，因此从一开头就适应于更大規模的生产(熔炉少而产量多)”。

尽管賦稅沉重，工农业生产仍然同购买力一起增长。德国銀行在儲蓄数字增加和人們普遍感到經济繁荣的基础上，鼓励实行扩張政策。随着出口额的不断增长，国家岁入逐漸增加，外債逐漸减少。出口貨物主要是煤和铁矿石，化学产品(染料、鉀碱、氮气等)和工业品(光学仪器、紙張、机器等)。在生产上升的情况下，交通运輸事业也相应改善。运河同其他水道工程都大为扩展；出現了新的輪船和火車头；全国公路系統也得到扩建。汽車生产和运輸量都突飞猛进。最能表明这种普遍傾向的現象之一，就是公用設施——发电厂和煤气厂、交通綫、公共住宅工程、学校、运动場、游泳池、公园、戏院——的发展。

道威斯計划带来了一个具有空前規模和强度的复兴时期，它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公司发起人时代有些类似。工业的合理化，德国經济和技术方針的决定，都是按照美国方式安排的。这是美洲的再发現，是一次走向“美国經济奇迹”的朝香历程。①

在德国的財政方面，特别是在国家馬克的稳定問題上，駐在柏林的賠款总署署长掌握着决定性大权。单是这一事实便鼓舞了資本主义世界的信心，使德国成了欧洲一切国家的主要投資場所；除去滾滾而来的美元之外，英国、瑞士和荷兰的資金也相继涌来。美国銀行家往往更喜欢投資于公用事业，因为他們认为市政府和邦政府的財产要比私人企业更安全。这样，在道威斯計划之下，美国私人企业便主办了德国的集体和社会企业。

10月20日，在进行过一場爭取多数的困难斗爭以后，馬克斯-

① 古斯塔夫·施托尔帕：《1870—1940年的德国經济》，紐約1940年版，第176—178頁。

斯特雷澤曼宣布解散議会，承认这样做是为了粉碎极端分子。共产党議員只有在議会开会时享有不可侵犯权。7月5日，警察曾違反这項法律，搜查了議会和普魯士邦議会中共产党議員的橱柜；議会一休会，他們便接到逮捕路特·費舍和恩斯特·台尔曼的命令。① 我們不得不轉入地下，但我們认为柏林的地下住所是不安全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知道它們，而这些人和柏林政治警察又有勾結。因此，一部分政治局委員暫时避居到布拉格。

在这段时期，德国党內討論中一种受欢迎的消遣，就是比較革命前景的长短問題。在夺取政权之前，在把魏瑪共和国变成一个德意志苏維埃共和国之前，需要的准备时期究竟是长是短呢？用共产主义的教条科学武装着的天眞的下层党員相信，他們能准确地預言他們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时間。当下一次机会、当共和国即将面临的新危机到来时，人們便会看到，德国共产党人已經有了一个經过改組的、“布尔什維克化”了的党，而在这样一个保证能夺得政权的前提条件下，他們就能胜利地結束长期內战。如果有人提出比較現实的分析，就会遭到下层党員情感上的反对，在他們眼中，每一个悲观主义者都可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所有的俄国領袖，不論左中右，都以“短期革命前景”論来迎合他們的德国追随者，虽然他們建議德共采取的政策各不相同。认为革命危机永久存在着的这种理論，使得党有必要实行更严格的紀律，从而大大便利于政治局直接干涉德共事务。

在德国，道威斯时代是以“資产阶級联盟政府”的口号开始的。資产阶級政党当时已分裂成两个营垒：中央党和民主党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其他政党則依旧居于反对派地位。“資产阶級

---

① 参看《紐約时报》，1924年10月22日与29日。

联盟”口号的用意在于打破这种阶級間的联盟，划清資产阶級政党和工人陣营之間的界限。当时，大多数文官仍然是1918年以前君主政权机关的留用人員，因此，提出这种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粉碎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中、特别是在普魯士政府中的据点。

在4—10月的几个月中，欧洲政治舞台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倫敦的麦克唐納內閣主动出面，在仲裁国际事务、逐步裁减軍备等問題上同德国进行协商。在法国，和平主义者赫礼欧接替了普恩加賚。国际联盟由于英法政策的这些变化而重新具有生气。欧洲又把脸轉向西方——轉向英、法，并且日益轉向美国——希望复兴西方和保存西方文明。

在1924年趋于結束时，战后危机似乎已被克服。通过接受道威斯計划，欧洲显然已开始逐步修改凡尔賽条約，这一方面将使德国工业得以恢复，同时又能使德国調整它和全世界的政治关系。德国还沒有加入国联，但是，一旦道威斯計划收效，它当然就会采取这一步驟。有些热心家已經写文章大談起“和平时代”来了，据他們說，在这个时代里，欧洲各国将会逐步合并为一个同英美和諧合作的联邦。

俄国在欧洲的影子越来越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海洋到海洋”，反苏国家列成了一道壁垒，而俄国被孤立于这道壁垒之后的現象，似乎已成为战后欧洲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德国共产党在1924年12月7日的道威斯选举中遭到惨敗，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共产党几乎丧失了一百万張选票，德意志人民自由党的議席也由三十二席降至十四席。可是，馮·特皮茨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却获得五十万票。出乎意料的是，社会民主党竟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从5月选举的六百六十万九千票一跃而增长到12月选举的七百八十八万六千票)，这样，它就几乎恢复了它在1923年以前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的这次胜利使莫斯科政治局就像触电一样受到极大震动。对莫斯科来說，道威斯計划的成功和德国的即将加入国联，体現了一种新均势，一种英德的反苏联盟。假如政治局时刻担心的“新干涉”、即英德对俄作战果然成为事实，在政治局的估計中，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帮助动員德国工人阶級为干涉出力。因此，俄国加强了反对凡尔賽条約的运动；只有那些一直坚持反对凡尔賽条約、反对同西方妥协的德国政党或政治家，才是被拉攏的对象——而且不管他們在德国内政問題上持有什么观点。这种在反資本主义詞句掩护下继續实行1923年施拉格特政策的做法，同一种新的指示、即通过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結成統一战綫来瓦解它們的指示結合了起来。这两个莫斯科指示是彼此矛盾的，并且趋向于相互抵銷；莫斯科被社会民主党的优势气得发了狂，要求这两种办法都能立竿見影。可是，德国共产党人这时仍然有他們自己的願望，他們反对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指示，畏畏縮縮地試行着一种在他們看来是适应于德国形势的自己的政策。因此，如何更好地对德国党进行調节，使之完全服从它的政策，就成了莫斯科最关心的問題；于是，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維克化”問題便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第十九章 兴登堡选举

在道威斯稳定的最初阶段，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边是进攻性的右派，他們的突击队正在每一个工业城市的街道上进行战斗，他們的压力集团正在政府中大力排挤新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另一边则是怀着滿腔痛苦的工人阶級少数，在一場即将失败的斗爭中同右派展开搏斗。

帝制派的复活

民族主义分子加强了他們的帝制派宣傳，这主要幷不是为了使霍亨索倫皇室复辟，而是为了在群众中复活关于一个强大德国的意識形态。"共和国"表示的是軟弱，帝国表示的却是力量。霍亨索倫皇室的亲王們出現在紀念陣亡者的各种典礼集会上；老兵协会一个接一个地庆祝德国历史上的光荣节日，頌揚德国过去在世界列强舞台上的地位，哀叹它今天这种可耻的沒沒无聞的境地。这些复活的帝制派宣傳很受欢迎，由帝制派同情者組成的各种联盟、俱乐部和帮会的成員日益增多就是证明。

1918—1923 年間公开的內战逐漸停止，化成了一种暗藏的內战，化成了工人組織和反动分子之間的小規模冲突。"鋼盔团"这时站在各种超軍事組織的最前端，它是 1918 年11月 9 日在馬格德堡成立的，是一个前綫士兵"反对兵变和革命"的联誼会，其发起人弗兰茨·澤尔特，是一个在柏林休假的預备役軍官。兴登堡和陆軍元帅馮·麦肯森是該团名誉团員。整个鋼盔团分为小組、大組、青年組和儿童組；它的特别具有軍事性质的部分，称为"夏恩霍

斯特团”，以紀念那位反对拿破侖入侵的游击队領袖。帝国主义思想最强烈的旧軍队团体，“全德軍官联盟”，以及“德国軍官同盟”，都隶屬于鋼盔团。①

在魏瑪共和国存在的所有年代中，圍繞着德国国旗問題发生过許多无謂的紛扰。議会以1848年革命时期的黑紅黃三色旗，代替了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紅三色国旗。商船的旗帜还是用黑白紅旧国旗，只把新旗帜放在一个角上。通过另一道法令，艾伯特总統又增設了十面共和国旗帜，旗色是两种三色旗的顏色的不同組合，再加上铁十字，以紀念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武功。1926年5月15日的最后一道法令，竟打算让国外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只使用旧帝国的国旗。在通过这項法令以前进行的議会斗爭，是伴随着一場“旗战”同时进行的，对立的政党彼此毁坏对方的旗帜，而这場圍繞着象征品进行的斗爭，在組織反共和国干部方面起有相当大的作用。在“帝制派”和“共产党人”之間經常发生的冲突中，极右派拥有更多的武装突击队，左派常有众多死伤。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同对帝制派分子展开斗爭，所有的組織都有成員牺牲。

1924年5月11日，在共产党的一个据点，工业中心扎勒河上的哈雷，发生了一次整整持續一天的巷战。共产党在民众大厦中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遭到鋼盔团組織的襲击。警察直到冲突結束时才进行干涉，向挤滿人的会議厅中开枪。結果死六人，重伤九人。

被利用来进攻社会民主党人的問題之一是“巴尔馬特事件”。巴尔馬特兄弟五人是移居荷兰的波兰籍犹太人，在那里，他們通过各种企业进行钻营，力图同欧洲的每一种新兴力量做生意。譬如說，他們曾在1917年向托洛茨基表示，願意派一个救济委員会到俄

① 赫尔曼·馬丁：《鋼盔团的十年》，来比錫1929年版。

国去；在1918年，他們曾試图同烏克兰的拉达做买卖。1919年3月，他們和許多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拉上关系，特别是同普魯士議会代表恩斯特·海尔曼挂上了鈎，他們为他在荷兰安排了一些撰稿工作（順便提一句，每篇文章总是只付給十五盾稿酬）。通过这些門路，他們搞到了来德国的护照，同各种国家机关，特别是普魯士国家銀行和普魯士对外貿易协会，建立了正規的商业关系，向他們进口食品。作为打通这些門路的代价，他們向社会民主党报紙捐贈了大約一万五千到两万馬克，在皮尔納成立了一所儿童疗养院，并且付給各个有关的人以一笔佣金。社会民主党議会議員、短期担任过共和国总理的古斯塔夫·鮑威尔拿了这笔佣金的較大一份；共和国总統的儿子小弗里茨·艾伯特、柏林警察总监里希特尔以及上面提到的海尔曼，分到了这笔佣金的較小一份。这些事实終于在普魯士議会的一个調查委員会面前被揭发了，結果使鮑威尔不得不辞去議員职务，并且被开除出党。①

于是，人們以巴尔馬特兄弟这些其中大有文章的买卖为起点，掀起了一場攻击社会民主党貪污腐化的恶毒运动。事实上，党派到各个文职部門担任行政官的党員，一般說来都是廉洁奉公的人；社会民主党的眞正优点之一，恰恰就是这种为政廉洁，而且这个优点还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党的軟弱。

在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共和国的运动中，另一个事件也占了很大地位，一个叫艾米尔·甘塞尔的人，在一家民族主义小报《中德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責艾伯特总統犯有叛国罪，因为他曾参加过1918年1月破坏战争的罢工。艾伯特向法院起訴，要求对

① 柏林《前进报》，1926年1月7日。并可参看約瑟夫·考夫霍特博士：《巴尔馬特行賄案》，柏林1925年5月版；卡尔·拉狄克：《巴尔馬特兄弟与社会民主党》，汉堡1925年版。考夫霍特是普魯士議会調查委員会委員之一。

这种誹謗加以追究，最后，在1924年12月9日，也就是大选剛結束两天后，几經延期的审判終于在联邦大法官貝韦斯多夫的主持下，于馬格德堡开庭。在为自己的行动辯护时，艾伯特声明他所以参加罢工的領导委員会，只是为了限制那次罢工。一群证人证明，他的政策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他眞正希望不遺余力地支持战爭。可見法庭认为，决定他有无責任的是他的行动而不是动机，作为审判的依据，法庭援引1889年的一項判例，該項判决是，有一个人虽然用意在于救火，仍因纵火罪而被判刑。当时的一本匿名小册子报导說，"調查結果表明，在罢工会議上，当工人群众向艾伯特发出侮辱性詰問时，他曾以要求继續罢工作为答复。"①

結果，《中德报》主編被判决犯有誹謗罪，但这項判决只是在形式上开脫了艾伯特的罪責；事实上，判决书等于在法律上承认了他的有罪——必須注意的是，他的所謂有罪，是因为支持了一次被霍亨索倫帝国认为非法的罢工，可是，那个帝国却早就被由他担任总統的魏瑪共和国所取代了。假如霍亨索倫皇室复辟，艾伯特就将成为罪犯，而这一案件表明，即使他們并沒有复辟，这些原来大都是旧帝国官吏的法官在解釋法律时，所依据的也仍然是魏瑪共和国以前的标准。

对共和派的另一个警告，是奧托·布劳恩內閣在普魯士議会中搖搖欲墜的地位。在社会民主党政府只得到中央党和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布劳恩仅仅拥有不大的多数。假如共产党人曾經在反帝制派的斗爭中参加支持政府，共和派多数就会得到可观的扩大，社会民主党內閣也就会稳定得多。

这个"普魯士問題"特別使共产党感到棘手。一方面，它譴責

① "阿"〔阿道夫·斯坦〕：《艾伯特审判》，柏林1925年版。

指揮普魯士警察的社会民主党部长澤弗林，认为警察在街巷冲突中保护反动分子、鎮压共产党人的示威、杀害示威者等等，都要由澤弗林負責。对下层共产党員来說，“社会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毆打他的警察，而不是他的工人弟兄。另一方面，普魯士議会中的共产党代表原可以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使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割断他們同民族主义伙伴的联系，通过在普魯士的这一政策作为起点，就有可能在各地工会和市議会中結成一个政治联盟，最終把社会民主党人推上更具有战斗性地保卫他們的党和保卫魏瑪共和国的道路。

可是，实行这样一种轉变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必須公开摆脫莫斯科外交政策的羈絆，清醒地分析已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形势，但共产党人并沒有这样做，他們所关心的是党的布尔什維克化問題，是对革命前景长短問題的討論，是进行革命宣傳。在向开姆尼茨支部发表的一篇演說中，当时德共政治局的領导成員之一亚瑟·罗森堡宣布，党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失敗后，爭取議会影响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說已經毫无意义，党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間的唯一任务，就是維护革命的精神和組織。罗森堡說，在这場議会选举的胡鬧中，对德国共产党人来說，丧失一两百万張选票一点也沒有关系。

“保卫共和国”

正是在党內的这种气氛中，仍然在獄中候审的馬斯洛夫提出了实行“保卫共和国”新政策的建議。就当时——1925年初——来說，这是从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革命詞藻轉为現实地估計德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大胆轉变。面临着資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和德国民族主义的猖狂进攻，馬斯洛夫主張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議，表示願意

在它的势力中樞，共和国政府和普魯士議会中，彻底調整各派社会主义力量之間的关系——这个建議同傳統的共产国际統一战綫政策的內容，即打入工会內部进行工作，有深刻区别。

按照馬斯洛夫的建議，共产党保卫共和国政策的基础应該是，爭取解散黑色国防軍和“費姆”恐怖組織，爭取消除共和国和普魯士政府中的威廉派影响。最后，共和派必須解除国防軍的武装，并把他們完全解散；为了保卫魏瑪共和国和防止复辟，将以經过几个月訓练的武装公民来代替国防軍，代替职业軍队和警察的职責。在他从獄中写給中央委員会的好几封信中，馬斯洛夫一再指出，国防軍对民兵的問題应該成为調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党关系的基础。可是，这种目的只有在經过好几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以后才能达到，而第一个阶段便是共产党根本改变态度。①

这个建議不是在三十年代中叶提出的，当提出它的时候，納粹运动还沒有得到充分发展，納粹会大获全胜的事实，正如斯大林的国家党政权一样，还完全沒有被人們考虑到。在魏瑪共和国这一危急关头提出一种积极保卫它的政策时，馬斯洛夫抛开了一切党派偏見，竭力想把共产党推到保卫共和国的最前端。对德共政治局說来，共产党一般的統一战綫运动是同党的威信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須首先停止攻击他們，然后，共产党人才願意討論条件。馬斯洛夫的建議不仅毫不考虑这种威信問題，而且比一般要求共同罢工的范圍广泛得多。馬斯洛夫不仅要求向社会民主党建議結成政治联盟，并且要求向天主教工人和天主教小資产阶級的政党中央党提出同样建議，而在他的政綱中，这一越出工人陣綫范圍的步驟既是最有独創性的一点，也是最遭人反对的一点。

---

① 参看阿尔卡迪·馬斯洛夫在1925年3月25日柏林《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列宁的《火星报》为名的这份报紙，是一种党內公报。

曼努伊里斯基对馬斯洛夫的政策很感不安。如果德国党接受了这套想法，就可能发展起一种独立的德共政策，那样一来，也就会干扰俄国的外交政治活动，特别是影响到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計划。俄国的主要利益是建立一道反西欧联盟的壁垒，而德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則是团結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这二者是彼此冲突的。因此，德共中央委員会遇到了一个非常难办的問題。那些革命詞句已經越来越失去意义，党的政策不可能再是重复这些詞句了，但是，坚决改变政策又遭到了一部分下层党員的反对，莫斯科政治局用心良苦地給予这部分人以鼓励。在亚瑟·罗森堡和魏納·朔累姆的領导下，形成了一个“极左派”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得到了柏林的維丁区、魯尔、德国南部和西部許多无产阶級团体的支持。它譴責馬斯洛夫犯了机会主义“联合政策”的錯誤，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語言中，这种政策就是越出阶級界限的合作，例如在投票表决軍費預算案时同帝国政府的合作。

德共內部和整个德国內部的分裂力量，都集中到了总統选举問題的焦点上。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統弗里茨·艾伯特的七年任期即将届满，在竞选新总統的运动中，道威斯稳定的薄薄幕布被拉开了，德国各派实际力量的新配置暴露到了人們的眼前。

帝制派打算提出的总統候选人，显然是陆軍元帅保尔·馮·兴登堡，但他們对于采取如此大胆的进攻步驟，还有一些迟疑。德国帝制派的典型人物海軍上将馮·特皮茨，在1924年以他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起了带头作用，他的手段是如此高明，以致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当所有的极端主义政党都严重失利时，他的党却获得了五十万張选票。根据魏瑪宪法，如果在第一輪选举中，沒有一个总統候选人取得絕对多数就要在得票相近的人当中举行复选；在这一次，由于有六至八个候选人竞选，第一輪投票肯定不会

决定选举結果。因此，帝制派想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先提名內政部长卡尔·耶雷斯，因为他是一个带有溫和帝制派色彩的文官，比較容易为工业中心的反軍国主义情緒所接受。不过，提出他来显然只是为了試探輿論，因为替兴登堡竞选的运动已經在积极进行。

社会民主党打算第二次为艾伯特竞选，但是在2月28日，正好在选举前一个月，他突然去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損失，因为党提出的另一个候选人，普魯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在全国的威望远抵不上他。

总統候选人台尔曼

共产党推出恩斯特·台尔曼为它的候选人。威廉·皮克最初曾代表右派，胆怯地建議提名克拉拉·蔡特金。这一建議遭到了党內絕大多数人的反对，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蔡特金是一个直言不諱的右派。在此以后，台尔曼便显然成为被看中的人。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他出身于无产阶級，在党內深孚众望。德共政治局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在党內有着德国革命工人化身这样的地位。

馬斯洛夫根据他的保卫共和国总建議，要求撤回台尔曼的提名，全党支持一个共和派候选人，但該候选人必須接受下列綱領：沒收一切皇室財产和通过战爭与通貨膨脹获得的暴利；把一切前皇族成員逐出德国；把一切帝制派軍官、法官和文官全部撤职，法官和文官由选举产生；国家和教会完全分离；廢除对工資預扣所得税，改为对高額收入征收所得税；更严格地規定和实行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保护；給予人民以出版、結社、集会、罢工和示威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所有这些要求的內容都很明确，以致能够在魏

瑪宪法的范圍之內加以实現；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綱領，而是一种完成資产阶級革命和彻底摧毁帝国殘余的手段。极左派指責这套綱領是布兰德勒主义，事实上，它們同1923年的布兰德勒綱領也确实相似；但它們不是在前五年的革命高漲时期，而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須考虑防御問題的失敗时期提出的。

預选在1925年3月29日举行，选举結果如下所示。（候选人按照由左及右的政治傾向排列，并且分别組成了在复选中展开竞

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	1,871,815	7.0%
奧托·布劳恩（社主民主党）	7,802,497	29.0%
威里·海尔巴赫博士（民主党）	1,568,398	5.8
威廉·馬克斯（中央党）	3,887,734	14.5
人民联盟	13,258,629	49.3%
海因里希·海尔德博士（巴伐利亚人民党）	1,007,450	3.7%
卡尔·耶雷斯博士（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	10,416,658	38.8
埃里希·魯登道夫将軍（納粹）	285,793	1.1
帝国联盟	11,709,901	43.6%

爭的联盟。）乍一看来，这張統計表的明显特征似乎是，人民联盟三个候选人所得票数的总和，肯定超过了最大竞争对手的票数，并且几乎可以說是居于多数。但是，选举中令人吃惊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耶雷斯的得票特多，甚至超过了得票次多者二百五十万張左右。人民联盟的得票总和固然較大，但是，帝国联盟內部的团結——他們在这次預选中，已經有三名候选人出来竞选——却要紧密得多。

在竞选結果公布后，帝制派断定对他們有利的时机显然已經到来，因此，他們在复选中便抬出了兴登堡做候选人。在这种极微妙的均势中，共产党的立場可以起决定性作用。馬斯洛夫再次要求撤回台尔曼的候选人資格，他的建議也再次被斥为机会主义。

当兴登堡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消息傳来时，我正在莫斯科参加

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次会議。季諾維也夫大吃一惊：如果他們竟有可能提名兴登堡，德国帝制派力量的重新聚合一定已經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同馬斯洛夫沒有关系的情况下，季諾維也夫自行建議共产党支持布劳恩反对帝国制度的候选人。哈諾威极左派的領袖，議会議員伊凡·卡茨，这时是德国党常駐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卡茨追溯往事說，从斯巴达克团开始活动的日子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就一直是屠杀工人阶級的劊子手；在帝制派和社会民主党警察的合作下，許多共产党員遭到了杀害，因此，如果現在要求共产党支持奥托·布劳恩，那簡直是一种侮辱。

在长时間激烈爭执的一个空隙当中，我同季諾維也夫作了一次討論。他指出，預选結果使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須彻底改变。如果我們在选举中支持奥托·布劳恩，我們所支持的并不是他本人，也不是他的政策；我們是在保卫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和国，不使极右派的凶恶企图得逞。“这不是成了两害权取其輕的政策了嗎？”我問道。这个傳統的社会民主党口号，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笑料。“为什么我們总要两害权取其重呢？”季諾維也夫回答說。

尽管这个問題对俄德两党都具有重要意义，斯大林却沒有表示态度。把問題提交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是季諾維也夫，在1925年4月2日討論兴登堡竞选問題的主席团会議上，他作了下列发言：

“季諾維也夫：我要代表俄共政治局和德共代表团，为以下的策略建議辯护。我們完全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共和政体还是君主专制这一选择对我們的关系不大……对于我們的阶級斗爭来說，資产阶級民主一般要比君主专制有利得多，即使这种民主非常有限。……我們最初曾认为，无产阶級就要对資产阶級民主立即展开斗爭。……可是，革命一旦轉入低潮，資产阶級民主和君主专制之間的差別，就具有比較重要的意义了。德国的帝制派候选

人已經得到一千一百万票。……帝制派的危险主要并不在于霍亨索倫皇室的可能复辟；它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帝国复辟’危險，也是一种眞正的危險。

我們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帝国复辟的严重障碍；它本身就是半帝制性的。在謝德曼发表于11月革命时期的演讲中，我們曾經看到过这一点，現在，在他的回忆录中我們又看到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最不像是会抛棄君主专制的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很糟糕的共和派——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共和派，非常糟糕的共和派。他們是多半不会保护共和国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得到八百万票，我們得二百万票，民族主义分子得一千一百万票。所謂的共和联盟得一千三百万票，帝国联盟得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一百五十万票；局势犹如千鈞之系一发。假如帝制派候选人当选，社会民主党人和資产阶級就会把責任推到我們身上……

最大的危險是，工人阶級的广泛阶层将会疏远我們。……我认为我們的口号必須非常簡单；只应該提出最受人欢迎的要求。……在初选中，我們試驗了自己的力量；在复选中，我們必須考虑最后的結果。……你們可以通过閱讀列宁的著作学会这些策略……

从感情上讲，人們会反对选举那个該死的奥托·布劳恩。假如艾伯特还活着，我們会投他的票嗎？我們当然要投他的票——为的是反对耶雷斯。作为一个工人政党，我們可以說：在每一个我們必須表示政治态度的問題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資产阶級都是同等的敌人。我們必須判明，摆在我們面前的是否眞是資产阶級民主和君主专制的选擇問題。……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

你們对我說：那样一来，《前进报》就会拍手称快，叫嚷起革命已經完結了等等。……我們可以清醒地回答他們：你們說世界革命已經宣告停止，那么你們也就能够更容易接受我們的共同行动建議了。

路特·费舍：我认为季諾維也夫的建議完全正确……〔虽然〕我并沒有低估我們党实行这些策略的困难。……在德国，立即发动革命斗爭的时期已經結束；我們的同志所不了解的，正是1923年和1925年之間的这种差别。

卡茨：在我們的同志看来，艾伯特-巴尔馬特党是工人阶級最凶恶的敌人，是一个腐敗的資产阶級集团。……目前，帝国复辟的危險并不比过去更大。去年，帝制派的影响比現在大得多；如果在去年举行选举，希特勒和魯登道夫会得到几百万票。耶雷斯是一个典型的大企业代表。……实行这些策略的后果将不堪設想；党将会全盘瓦解。

季諾維也夫：我們生活在被敌人包圍的环境中。我們需要有头脑；如果我們失敗了，工人阶級就将不得不再被資本主义奴役二十五年。在英国，我們投了麦克唐納的票；为了在英国找到一条道路，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人曾經研究了几十年英国問題。你們不了解我們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敌人……"①

在柏林，季諾維也夫和馬斯洛夫主張在复选中撤回共产党候选人的建議，被台尔曼影响下的德国中央委員会拒絕了，就台尔曼而言，他对担任总統候选人的角色是很感兴趣的。台尔曼在許多方面都有資格充当这个角色。他的家乡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海港，因此，在当地工人中产生了許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

---

① 《帝制派的危險和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柏林1925年版，第6—11頁。

在这里，在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間，“台蒂”(台尔曼的别名)一直在碼头上当粗工。他以积极反对德皇征服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迷梦而在工人伙伴中获得声誉。內战时期，他的名字在德国北部沿海地区瓦塞康特的反軍国主义工人当中流傳开来。1920年，他率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代表团出席哈雷代表大会，是分裂的最热烈鼓吹者。在共产党內部的左右两派斗爭中，他很快便成为左派的領导人之一。

恩斯特·台尔曼和一般的社会主义領袖不同。在社会民主党內，不熟练工人是很少被选上重要崗位的；像台尔曼这样的人，通常总是被压在下层，即使在斯巴达克团內，情况也是如此——它的領导集团只由两种人組成，一种是知識分子如保尔·列維，另一种是青年时代便脫离車間的工会干部如雅各布·瓦耳歇尔。

台尔曼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青年时代在商船上当过海員，所以一直保留着那种踉踉蹌蹌的步态。他的文化程度不高，馬克思主义的术語和外国名詞經常使他很头痛；但是，从他一开始投入政治活动的时候起，他的广泛經驗和非常突出的政治本能便給了他很大帮助。他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演說家，时常大喊大叫(有时候几乎語无倫次）和扯掉他的白色衣領——这是一个总会博得喝彩的姿态。不过，他之所以能打动听众，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仰眞誠和讲演內容的热情洋溢。他对“将軍們”——兴登堡和魯登道夫——的憎恨，以及他不可調和地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力量重新聚集的立場，都是无可怀疑的。

俄国政治局早就看出台尔曼性格的长处和弱点。精通政治心理学的俄国領袖們，完全懂得如何去利用他的个性，利用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級出身所怀有的虛荣心，他对知識分子的猜疑，他的野心等等。汉堡党組織的另一个左派領袖胡果·烏尔班斯，乡村教师

出身——大个子，黄头发，倔强，古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德国北方人。在"有学問的"烏尔班斯和"无产阶級出身的"台尔曼之間，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拉狄克也就最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矛盾，奉承大老粗台蒂，使他反对知識分子烏尔班斯。① 譬如說，在1923年9月，俄国政治局和德国党駐共产国际代表团，难得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議討論暴动的准备問題。在会上，台尔曼作了一次使我和馬斯洛夫臉紅的报告；他就像在大街上遇見熟人一样对俄国領袖直呼其名，以平日进行鼓动时的粗魯方式大嚷大叫。俄国人不动声色地忍受了一个多小时，始終沒有打断他的滔滔雄辯；在他报告完以后，拉狄克站起来，表面上好像深受感动，感謝德国无产阶級最优秀的儿子做了一个极好的报告。

成立于1924年底的紅色陣綫战士同盟，选举台尔曼做它的第一任"元首"。成立这个同盟有着双重目的：其一是保护工人的組織、集会、俱乐部和住所，使它們不受民族主义恐怖团体的襲击；其二是帝制派分子当时正通过鋼盔团和其他許多遍布全国的退伍軍人組織，鼓动起所謂"前綫精神"，成立紅色战士同盟可以对之加以抵制。在1924年，还不存在国家社会主义派工人；工人是反对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主义者也反对工人。經过开头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紅色战士同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組織；不論是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喜欢穿着軍装参加檢閱和接受軍事訓练。給紅色陣綫战士选擇一种合适的制服，一时成了台尔曼和他当时的亲信之一維利·果奥夫② 爱好的消遣。往往不喜欢从事党和工

---

① 从1933年起，胡果·烏尔班斯便一直住在斯德哥尔摩，他于1947年1月在那里去世。

② 果奥夫在长时間內一直是紅色陣綫的一个杰出領袖，1934年，他在莫斯科因为貪污和盜用党的基金被判处死刑。

会日常工作的积极分子，更容易被这样一种組織吸引过来。

俄共政治局帮助創造了圍繞着台尔曼的神話，把他这个德国无产阶級革命家捧上天去，使他成为同老領袖和新知識分子对立的一个形象。1923年斯大林第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他的时候，就特别对他有了好感。台尔曼被授予紅騎兵軍官的荣誉称号和軍服，在穿起这套軍服时，他像小孩子一样感到驕傲。許多俄国組織、儿童之家等等，很早就以台尔曼的名字命名。台尔曼的被提名为总統候选人，特别給圍繞着他的神話大做了一次广告——这个神話的許多特点和希特勒神話有共同之处。在此以前，台尔曼只是一个党內人物；在此以后，他便成了德国最著名的共产党領袖。即使到后来，当事实已經表明这种政策是如何有害时，党沒有在1925年选举中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也从来沒有受到过强烈的譴責，因为斯大林袒护着台尔曼，掩盖了要他負責的任何行动。

台尔曼的参加总統竞选对党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显示了領导集团操纵的局限性。台尔曼現在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声望的共产党要人了，連俄国政治局也不得不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在此后发生的共产国际危机中，斯大林花很大力量把他爭取了过去。后来，随着他的弱点日益暴露，他的权威地位成了党的一个負担。可是，神話仍然在流傳着，而由于他的名气太大，許多反对派打算摔开他的尝試都沒有能获得成功。①

共产党的竞选运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往往以同帝制派大打出手而告終的竞选集会，参加的人很多，气氛也很热烈。选举前夕，在哈雷发生了一次特别激烈的騷乱；同一天，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

① 1933年初納粹一上台后，台尔曼便被逮捕，在許多監獄和集中营中度过了以后的十年。1944年9月，他在布痕瓦尔德被害，据官方报导，他是在集中营工厂遭到空襲时被炸死的，但是据他在集中营中的同伴說，他是被納粹們自己杀死的。

柏林被杀死。在极右派和极左派彼此敌視和各不相让的形势下，共产党的下层群众斗志昂揚；他們感到自己在領导着反帝制派运动。不用說，党并不指望台尔曼会当选总統，但是，它居然能使数目相当大的一批人紧密地团結在未加冲淡的共产主义口号的周圍，这种成功使党非常兴奋。在許多党員看来，这种成功要比选举中可能获得的任何胜利都更有价值，在一段时間內，全党的情緒是如此之高，以致可以不把选举中的失利放在心上——在預选中，台尔曼获得的票数比1924年12月的选举結果又减少了一百万張。

另一方面，在耶雷斯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以后，社会民主党人陷入了窘境。如果候选人是艾伯特，作为魏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統，他的威信还足以号召中央党支持他，但是，普魯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却沒有这种威信。社会民主党人不願意冒險投入一場敌强我弱的战斗，决定在复选中支持中央党候选人威廉·馬克斯；在出現这一情况以后，台尔曼便更感到有理由坚持保留共产党候选人的資格。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沒有設法打破工人陣营中的这一僵局。

因此，在1925年4月26日举行的复选中，就有了三名候选人——兴登堡、馬克斯和台尔曼。选举結果如下：

兴登堡(帝国联盟)	14,655,641	48.3%
馬克斯(人民联盟)	13,751,605	45.3%
台尔曼(共产党)	1,931,151	6.4%

这样，人民联盟和共产党得到的选票加在一起虽然占多数，但兴登堡是第二輪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于是就成了德国总統。①

① 人們认为，共产党在复选中硬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从而为兴登堡的上台打开了大門。保尔·梅尔克尔在反駁这种論点时，笨拙地举出了下列事实为他的党辯

帝国联盟的稳定

总統选举以后，共产党内的情緒轉为失望。1925年5月9—10日，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員会扩大会議(中央委員会加上各地方支部选出的代表)，在会上，各派之間圍繞着选举后的政策問題展开了激烈冲突。左派建議在議会中、特别是在普魯士議会中支持人民联盟。右派反对这一建議，但是贊成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結成沒有資产阶級中央党在内的統一战綫。极左派反对同任何集团結成联盟。曼努伊里斯基正式支持季諾維也夫-馬斯洛夫政策；經驗丰富的曼努伊里斯基看到左派已經分裂成好几个派别，便想出了一套利用这种分裂的計划。在关于机会主义路綫危險的复杂討論中，明显地反映了下层群众对共产党政策的不信任心理。

"恩斯特·迈耶尔〔代表中央委員会右派反对派；他通常是一个謹愼的发言者，在提出建議以前总要經过仔細斟酌，可是在这次会上，他却大发了一通完全是蠱惑人心的議論〕：馬斯洛夫的建議是机会主义，太接近資产阶級民主的概念了……譬如說，我們必須問一問，我們是否应該通过选举苏維埃来取消反动的文官。

护，即：中央党的右翼，巴伐利亚人民党，抛棄馬克斯轉到了兴登堡方面。"假如这些天主教徒曾經忠实于他們的兄弟党主席和教友，馬克斯就会稳操胜算……

为了防止兴登堡当选，共产党……宣布它願意在复选中撤回自己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参加竞选的話。这是一項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决定，表明德国共产党希望在它和社会民主党群众之間的鴻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奥托·布劳恩在得到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以后，就会获得胜利；而他的胜利也就会排斥兴登堡的当选。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員会沒有接受这一建議，虽然他們的党，最强大的左翼政党，完全有資格提出布劳恩参加竞选。它同中央党和民主党組成了所謂'人民联盟'，这个联盟提出前帝国首相威廉·馬克斯博士为总統候选人。"(《德国，生存还是毁灭》，第1卷，第118—119頁。)

事实是，直到社会民主党已經和其他党約定支持馬克斯的时候，共产党才提出他們願意支持布劳恩的建議，因此，这个建議便成了毫无現实意义的空話，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保全自己面子的一个姿态而已。而梅尔克尔并沒有提到这一事实。

路特·费舍：兴登堡参加竞选是資产阶級实行新方針的征兆。說什么德国資产阶級只是犯了一个錯誤，他們搞糊塗了云云，都是不正确的。提名兴登堡是一个綱領，是一种在新基础上实行复辟的深謀远虑。資产阶級希望同协約国勾結起来反对俄国。

党中央扩大会議决議：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統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一部分資产阶級对賠款政策采取了反抗态度；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正是要鎮压小資产阶級的民族主义反抗，把資产阶級反对派拉攏进道威斯計划的圈子。……德国的稳定完全依賴美国貸款。因此，帝国联盟各党也主張兴登堡仍然接受道威斯計划。……同时，資产阶級显然想通过选举兴登堡，对工人阶級增加压力，使他們更多地承当賠款負担。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新的恐怖措施，例如哈雷的流血冲突，来比錫审判中的死刑决判〔契卡审判〕，法西斯活动的重新抬头，甚至对'国旗团'① 这样的組織都要审訊等等。

資产阶級暫时投靠了协約国帝国主义，但它絲毫也无意于永远放棄它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它将力图恢复一种积极的外交方針，重新树立德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地位（加入国联、托管殖民地、締結保证公約）。……这种'民族政策'事实上是一种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左右翼政党之間并沒有划清界限；各党之間的壁垒不是很明显的。帝制派反革命正在进展……

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时代，相应于資本的集中和自由竞爭的普遍消失，在政治方面，国家政权也集中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手中，这个政府的反动傾向将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而日益增长。这种傾向……造成了一系列我們可以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現

① "国旗团"全名为"黑紅黃三色国旗团"，是在社会民主党領导下由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24年成立的一个組織，旨在保卫共和国，但是拒絕和共产党合作。——譯者

象。”

在主要的爭論点，也就是共产党在普魯士議会中該采取什么政策的問題上，反台尔曼的力量得以凑成了一个不大的多数，使他們的观点被会議接受：

“在我党成为右派和所謂左派之間的仲裁人的形势下，实行左派联合政策以反对右派联合是可以允許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非这样做不可。”

代表們对这項决議案有过以下的討論：

“路特·費舍：兴登堡选举是1923年10月以来的轉折点；对于沒有表明自己有能力完成本身任务的党来說，这是一个考驗。……共产党工人对任何策略轉变都怀着不信任，是改进我党活动的一个严重障碍。

兴登堡是英国的候选人；道威斯計划是一种为英美服务的計划，但对于法国資产阶級也足够有利，以致同时也是一种为法国服务的計划。帝制复辟傾向——这种傾向并不是始于最近几个月，而是早在1918年11月9日便萌芽了——从1923年10月革命失敗到現在，已經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亚瑟·罗森堡：这两个集团完全是一丘之貉；他們都代表大企业，因此，共产党人如果保卫一个大企业集团来反对另一个，就肯定会丧失他們的革命斗志。假如通过了在普魯士議会中支持左派內閣的决議，共产党就将不得不投票贊成警察的經費預算。那样，我們就等于是贊成給予哈雷市警察局长皮茨格中尉以薪金。这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中从来沒有見过，有背于它的历届世界代表大会和执委会通过的一切决議和决定。‘农民不是玩物’，共产党也一样。必須首先割断联結着資产阶級的臍带，然后，我們才能够把小农和知識分子团結在我們的周圍。但是，要使工人阶級和資产阶

級合作是不可能办到的。

汉斯·韦貝尔〔来自帕拉廷耐特，另一个极左派集团的領导人〕：假如这种政策继續下去，最后就会有人要求共产党投票贊成黑紅黃国旗。

魏納·朔累姆〔代表另一个极左派集团〕：共产党不能在普魯士議会里接受警察經費預算。”

其他欧洲党的代表支持季諾維也夫的建議。奥地利代表声明，奥地利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德国党的一部分。法国代表指出，德国党的政策已經給法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带来很大危害；兴登堡选举加深了法国对德国的猜疑。

有人报告了工厂中极其激动的反应。兴登堡当选是出人意料的；工人們尖銳批評共产党沒有认識到局势的严重性。接着，台尔曼向会議宣布，社会民主党人明天将在全德国到处貼起一种宣傳画，表明兴登堡踩着台尔曼的肩膀爬上了总統宝座。（到1932年，当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兴登堡反对希特勒的时候，这次选举后的“兴登堡踩着台尔曼肩膀当权”的口号，便成了被用来攻击他們自己的話柄。）

“路特·費舍：不論是誰听到这里的討論，都会以为这次会議是在空間和时間以外举行的呢！”①

兴登堡当选标志着內战的終止和德国反革命三个形成阶段中第一阶段的結束。在第二阶段，从这次选举到1928—1929年，存在着恢复德意志帝国、使霍亨索倫皇室或其代表复辟的企图。而到第三阶段，从美国經济大蕭条到納粹上台，則是强权政治的新形式代替了君主专制。

---

① 《帝制派的危險》，第44頁以下。

1918—1923年軍队总参謀部和社会民主党之間的联盟，是以共同的恐惧和相互猜疑为基础的。在这段时期，由于艾伯特政权軟弱无力，志願团——反革命派的雅各宾党人——在革命或反革命发展过程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无論是在組織形式或行为表現方面，納粹的党卫軍(SS)和冲鋒队(SA)都同志願团有直接联系，也只有刨一刨这个老根子才能对它們有所了解。在卡普暴动以后，志願团运动便停頓下来；1921和1923年的共产党暴动，主要是被警察部队鎮压下去的。正如扎洛蒙所說，“志願团的力量已經耗尽；澤弗林的警察以及站在他們背后的国防軍，接替了志願团的工作。”随着兴登堡的当选，志願团暫时說来更加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他們退居到德国生活的幕后，在一旁等待着道威斯稳定时期的結束，然后以党卫軍和冲鋒队的新形式重新登上舞台。

到1923年，革命暴动的危險已經消失，民族主义分子不再需要进行防御性战斗了。他們集中力量于重新控制政府，把在困难时期暫时借給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的权力拿回来。在1923年以后，民族主义分子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經十分强大，足以通过合法程序来改变国家；他們发起了一种爭取群众普遍支持的統一行动，以便有足够的群众基础通过公民投票来实現这一改变。

1925年的选举是德国第一次公民投票，誰也不知道德国人民对这次直接訴諸他們的行动会如何反应。兴登堡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被抬出来的：他在德意志帝国四十年太平年月中的光輝建树，将保证德国此后能获得同样的稳定。現在，这位帝国的忠臣和儿朝元老成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最高权威。兴登堡是一个神話；他是德国人民的父亲和救星。他体現着超党派的德国，超出政治組織紛爭之外的德国。

兴登堡从来也不否认他对霍亨索倫皇朝的絕对忠誠。他的书

斋中摆满了霍亨索倫統治时代的各种紀念品：旗帜、腓德烈大王时代的古玩、金桂冠、德皇的大理石雕像等。

“每年1月27日，兴登堡总要向皇帝祝寿。……在总統竞选中，兴登堡收到了大量信件。有人問他下一次欧战将在何时爆发，对付空襲和毒气最好用什么方法。”①

由于兴登堡意外順利地在选举中获胜，軍队方面感到自己的威望已經有巨大增长。根据宪法，总統具有足够大的权力和足够长的任期，完全可以为軍界政策的深远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一时期，每个人都指望道威斯稳定所带来的繁荣会持久下去。在經济继續稳定的情况下，兴登堡就有可能逐步改变魏瑪共和国的制度，恢复曾經被它們部分代替的旧制度，从而使威廉帝国——不論是否有威廉——复辟。这样，在司法、行政、教育和哲学等各方面，兴登堡的当选使旧的思想和力量都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們有了重新战胜新事物的新勇气和新希望。德国工人在共和国的七年中沒有来得及发展新的組織形式，这时越来越被驅向防御地位。現在，兴登堡这位陆軍元帅成了德国元首，軍队也就跟着他一起領导制訂国家政策。

兴登堡选举在德国国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法国，普遍不安的情緒增加了，軍队方面加紧为扩充軍备进行斗爭。在英国，同德国合作的傾向进一步加强，因为德国現在已經显然在中間道路上稳定下来。凡尔賽条約签定后新成立的德国邻邦感到恐慌。在已經对复兴德国（在道威斯主持下）发生强烈兴趣的美国，經过几年民主共和国政权以后又出現了德皇的陆軍元帅，这在人們看来是一个謎，是表明欧洲政治已經乱得不可收拾的另一个证据。一

① 格尔哈德·舒耳策-費耳策尔博士：《兴登堡如何当选为德国总統》，柏林1925年版，第23、14頁。

方面，作为革命浪潮已經肯定被遏制，一个新的稳定时代已經开始的象征，兴登堡到处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他的当选也加深了世界列强之間的矛盾，成了新战争危險的預兆。

第二十章　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

兴登堡选举对德国共产党人說来等于是当头棒喝，使他們有了新的认識。左派中央委員号召在7月就紧接着举行党代表大会，以决定是否采取馬斯洛夫的保卫共和国政策。在各地支部于代表大会召开前进行的討論中，馬斯洛夫的支持者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多数，因此，原来的領导机构显然将打破慣例，連續当选。左派只有在这样重新受到全党委托的时候，才得以实行保卫共和国的政策和收到成效。

与此同时，德国左派继續在独立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政治局以外的情况下，同其他欧洲党寻求联系。他們向英国、挪威、法国和波兰派出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党商量共同的問題。斯大林的书記处以怀疑和憤怒的眼光注視着这些交往。后来，在給德国左派加上反布尔什維克罪名时，莫斯科举出了这些商談活动，說是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馬斯洛夫亲西方的产物——第四国际的核心。

这时，即使是俄国以外的人也已經明显看出，不仅托洛茨基和政治局之間进行着斗争，而且，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之間的斗爭也在日趋尖銳。德国共产党是俄国以外共产国际的最大支部，并且地居欧洲中央，它的态度对俄国的所有敌对派系都具有举足輕重的意义。斯大林担心，假如德国左派通过重新当选而获得巩固，季諾維也夫失去的威信就会恢复到如此程度，以致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甚至对他自己的党的控制都将有所削弱。

俄国人的插足反对馬斯洛夫——他在1923年10月曾被扣留

在莫斯科，現在，人們又怀疑他在柏林的被捕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搞的鬼——反而提高了他在德国党內的地位。德国共产党人感到他受了委屈；他們觉得，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虽然从經驗和教育方面来讲是德国人，但是在俄国也能应付裕如，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击退莫斯科政治局的經常干預，因此贊成由他来領导党。馬斯洛夫在毛比特监獄中度过的几年，也許是他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通过广泛的通訊，他密切地注視着党的生活，不停地写作，送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来解釋和維护新政策，这些文章不仅送給党的一切报紙和地方支部，而且送給德国国內外的其他組織。他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这种影响的增长，德国党取得独立并且以它为中心組成西方各国共产党独立集团的可能性也就愈来愈大。

从曼努伊里斯基和他設在德国的其他观察員那里，斯大林接到一份又一份說明情况不利的报告。它們的含义是明显的：应該立即行动！如果让德国党继續目前的发展，不用多久就休想再把它赶回俄国的羊栏了——因为我們必須記住，在这一时期，就連斯大林一般也得受共产国际各种正規程序的限制。

因此，斯大林盘算着不是把馬斯洛夫制伏，就是毁掉德国左派。它的工会政策又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德国左派也认为，在德国采取任何群众性行动时都必須以工会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和俄国政治局并沒有分歧；它們的分歧主要是在对待德国党內不同意这一点的許多极左派集团的态度上。俄国政治局要求把这些集团开除，但是遭到了馬斯洛夫的拒絕；他认識到，有几万人之多的这一批斗士，是党在工业中心所拥有的最优秀分子的一部分。

对斯大林来說，共产党工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秘密党組进行滲入，秘密党組不仅是操纵工会的主要工具，而且可以进

行更有价值的工业間諜活动。极左派意識到通过秘密党組进行工作将会走进死胡同，要求組織独立的工会同德国工人联合会公开决一胜負，打破它对工人的壟断控制。①馬斯洛夫认識到，这种政策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現的，但他也不贊成对秘密党組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决定德国工人命运的将不是运用得最巧妙的秘密党組制，而是創造一种适当的政治气氛，使得人們可以公开为德国工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俄国国家的利益采取統一行动。馬斯洛夫对滲入工会运动的价值所抱的这种怀疑，使自己在长时期內遭到誣蔑，被加上了反工会的罪名。

斯大林向馬斯洛夫解釋布尔什維主义

1925年2月初，也就是大选前两个月，斯大林在接見一个共产党自由記者威廉·海尔佐克时，对德国左派发动了攻击。在事先准备好的若干問題中，海尔佐克請斯大林談談他对德共政策的看

① 在1925年人口統計所列有收益就业的二千一百零三万三千人中，53.3%是产业工人，但在他們当中，只有四百十五万六千人組織在还没有从1923年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見路德維希·海德編：《国际工会手册》，柏林1932年版，第1卷，第27頁；第2卷，第1553頁以下。

在1925年8月29—30日举行于布拉斯劳的第十二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宣称："在1918年的雄心未能实現以后，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級都深深感染上了失望情緒，工人們曾經熱烈希望过有一个社会主义劳工組織，現在，这个希望已經化为云烟。11月的美梦并沒有变成現实。"

工会主义者的这种失望情緒在积极分子当中尤为普遍，因此，共产党人这些年来在工会內部很难展开活动。"在整整一系列党的地区中，仍然有大量共产党人沒有組織在工会里，在某些地区，这样的人竟达总数的20%以上。譬如說，在雷姆夏特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中……我們的同志只有30%加入了工会。"（見弗里茨·赫克尔特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关于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埃森〕会議情况的报告》，柏林1927年版，第358頁。）經过許多次分裂，一系列由共产党控制的所謂独立工会成立了起来，会員总数达三十万人（見《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記录》，汉堡1921年版，第810頁；1921至1925年間，会員数目的变动不大。）参看本书第261頁注①。

法，于是，斯大林便利用这个机会对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失利和工会中的困难处境表示深为关切。这种家长式仁慈关怀的言論在全世界报刊上披露了出来；人們理解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为总书記进行反对季諾維也夫和馬斯洛夫的干預作好准备。德国党駐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还不懂得后来的那套礼节，提出了强烈抗議。馬克斯·赫塞，一个柏林的机械工人，以粗魯而刻薄的柏林土話大吵大嚷，反对莫斯科的这种干涉。他大罵海尔佐克奴顏卑膝、甘願充当这种操纵的工具，由于他罵得太凶，結果竟打起架来。曼努伊里斯基报告說，海尔佐克干預只起了激怒德国党的作用。

馬斯洛夫从毛比特监獄的单身牢房里，給斯大林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說，他同意有必要改变政策，但他强烈反对斯大林个人干涉德国党組織的內部事务。由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級国家党”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即一个多成分社会中的集团之一的生活，就会破坏兄弟合作的基础，导致災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作答，在这封用党的語言写成的信中，他再次向馬斯洛夫提出更明白的建議，要他轉到自己这方面来。这封信是由馬斯洛夫的律师庫尔特·罗森費尔德送到毛比特监獄的。它是一份值得在此全文刊載的文件，因为它非常典型地說明了俄国党当时干涉其他党內部事务的方法。还沒有出版的一卷《斯大林选集》，內容将完全是这一类写給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領袖和前途有望的領袖們的信件。①

“1925 年 2 月 28 日

敬爱的馬斯洛夫同志：

你 2 月20—25日的信收到了。首先請接受我的問候和希望你

① 俄文原信已在1933 年納粹劫掠馬斯洛夫的住所时失落。这里轉載的是馬斯洛夫所譯的德文，原載于德国左派月刊《行动》，第16卷，第 9 期，1926 年 9 月。

很快获釋出獄的热烈祝願。

現在就来談本題。

（一） 你（而且不仅是你）过分夸大了和海尔佐克談話这件事。我所以不能并且不想把他赶走，不仅因为他是党員，而且因为他是拿着盖什凱同志的信来見我的。盖什凱同志在信中恳求我和海尔佐克談一次話。我現在将这封信的抄件寄給你。德文原信我已經寄給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了。我在盖什凱同志的书面請求下同海尔佐克談了一次話，仅仅根据这件事就得出結論說，俄共中央正在改变或者打算改变对布兰德勒的态度，这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无中生有，胡說八道。

如果俄共中央，特別是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知道你或者德国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員怀疑俄共中央同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怀疑俄共中央从左派轉向右派，那他們是会捧腹大笑的。这一次你又太多疑了，因此也就看錯了問題。

（二） 你說德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完全正确。毫无疑問，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属于旧式領导者的类型，他們已經过时了，非让位給新型的領导者不可了。在我們俄国，許多旧的文学界領导者和'旧領袖'也陆續衰亡了。这种衰亡过程在革命危机时期加剧起来，在积聚力量时期則减緩下去，但它是始終存在的。卢那察尔斯基之流、坡克罗夫斯基之流、斯特罗也夫之流、罗日柯夫之流、哥里登伯尔格之流、波格丹諾夫之流和克拉辛之流等等，——这就是我首先記起的过去的布尔什維克領袖中的典型人物，他們后来都退到次要地位了。这是富于生命力和日益发展的党的領导干部更新的必要过程。順便談一下，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同上面这些同志之間的差別，就在于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背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貨色，而上述同志

却沒有这种貨色。可見，这种差别不是有利于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而是不利于他們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把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排挤出去，把他們逐出舞台，单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說明德国共产党在成长，在前进，在接連取得胜利，至于德国共产党的那些明显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說了。关于这些成就，你在信中写得完全正确。如果現在有人认为〔俄共〕中央委員会有人打算扭轉德国共产党发展的車輪，那就未免把俄共中央想得太坏了。

馬斯洛夫同志，請你慎重些。

（三） 你讲到德国共产党的路綫。毫无疑問，你們的路綫——我指的是政治路綫——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俄共和德共之間才有你在信中所談到的那种密切友好的（而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但这是不是說我們应該掩飾德共或者俄共的政治工作中的个别錯誤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說，德共中央或者俄共中央沒有个别的錯誤呢，能不能断定說，批評德共中央的部分活动（沒有充分利用巴尔馬特事件、普魯士議会共产党党团在选举議会議长問題上的人所共知的投票，同道威斯計划有关的稅收問題等等）是和完全贊同德共中央的总路綫相抵触的呢？显然不能。

如果我們，比如說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里見面时，閉眼不看自己党的个别錯誤，而热中于炫耀完全一致和平安无事，并且在一切問題上都彼此附和，那末我們的党将成什么了呢？我认为这样的党永远也不能成为革命党。这将是木乃伊，而不会是革命党。

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們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从来信看，你也是反对这样做的。这对德国共产党会更好。

（四） 我坚决反对对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采取排斥政策。我反对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我怜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

因为这种政策会在党內造成恐吓制度、威胁制度以及窒杀自我批評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制度。如果对党的領袖害怕而不尊敬，这并不好。只有党內不害怕党的領袖，而是尊敬他們，承认他們的威信，党的領袖才能成为眞正的領袖。造就这样的領袖是困难的，这件事情是长期的，不容易的，但这是絕对必要的。因为沒有这个条件，党就不能叫做眞正的布尔什維克党，党的紀律也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紀律。我认为德国同志違反了这个无須論证的眞理。

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我們俄国布尔什維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原则性的解釋运动来捍卫布尔什維主义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基础，虽然按俄共中央当时的力量和威信来說，我們可以不必展开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是絕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們用布尔什維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几十万新党員(和非党員)。非常可悲的是：我們的德国同志沒有感觉到有必要在懲罰反对派以前先展开广泛的原则性的解釋运动，或者用这个运动来补充对反对派的懲罰，这样就不大容易用布尔什維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員和党的干部。驅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并不困难，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战胜布兰德勒思想是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这里单靠懲罰只能損害事业，这里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和认眞地启发党員。

俄国共产党一直是在矛盾中，在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的斗爭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是在这个斗爭中才日益壮大并且不断培养出眞正的干部。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同样是一条通过矛盾，通过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特别是同社会民主主义傳統、布兰德勒思想等等进行眞正的、严肃的和长期的斗爭而发展的道路。但是要进行这种斗爭，单靠懲罰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德共中央的党內政策应当灵活些。我相信德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改正这方面的缺

点。

你对工会工作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德国工会的作用和俄国不同。在俄国，工会是党成立以后产生的，它們实际上是党的輔助机关。在德国和整个欧洲就不是这样。那里党是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工会对群众的影响胜过党的影响，并且往往成为党的沉重的絆脚石。如果問一問德国或者整个欧洲的广大群众，他們认为哪个組織对他們更亲近，是党还是工会，他們一定会回答說，工会比党对他們更亲近。欧洲的非党工人认为工会是帮助他們同資本家作斗爭（工資、工作日、保險等等）的主要堡垒，而把党看做某种輔助的和次要的（虽然是必要的）东西。不論这种看法是好还是坏，但这是事实。这也就說明为什么广大的工人群众把极左派从外面同現在的工会进行的直接斗爭，看做同他們的主要堡垒进行斗爭，这个堡垒他們建設了几十年，現在'共产党員'却要来破坏。不考虑到这个特点，就会断送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由此应当得出两个結論：第一，在西方，不在工会內部进行工作，不在工会內部加强自己的影响，就不能掌握住工会。正因为如此，应当特别注意我們的同志在工会中的工作。

暂时就写到这里。

請别見怪我的坦白和直率。握手。

約瑟夫·斯大林"①

仅仅过了一年半，在馬斯洛夫被开除出党以后，这封信——說明斯大林如何同各国共产党領导阶层中有可能和他联合的人打交

---

① 譯文基本上轉引自中文本《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2頁。在《斯大林全集》中，这封信題为"給麦—尔特同志的信"，除收信人的名字以及个别字句外，內容与本书所載完全相同。在遇有和中文本內容不尽相同之处，概按原文作相应的增删和更动以求忠实。——譯者

道的范本——就被公諸于世。这是一种拉攏表示，也是一种威胁。信中沒有指名攻击季諾維也夫，但是关于旧領袖已經过时的那段話，其含义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斯大林以家长自居，对一切共产党人摆出仁慈关怀姿态的最初几次表現之一；斯大林滿以为在他亲自作出这样一种姿态以后，馬斯洛夫一定会立即对他本人以及他的政策表示忠誠拥护。

通过同一个罗森費尔特，馬斯洛夫把这封信的原本連同他的譯文送給我过目，并且对这种愚魯的拉攏作了几句諷刺性的評論。当时，我可以每周两次到毛比特监獄去看他，而且能够和他相当自由地討論时事問題，只要話鋒不要过分密切地触及德国政局。我們觉得，斯大林的这种拉攏对于季諾維也夫是一个不祥之兆，决定給予他以支持，因为我們一致认为，季諾維也夫如果被排挤出共产国际，代替他的准会是一个极端傲慢和排斥外国人类型的俄国人。我們一点也不滿意他的共产国际政策，但他終究是防止共产国际俄国化的最后一道薄薄的障壁。

在有曼努伊里斯基出席的情况下，德共中央正式討論了斯大林的信。在这种場合，对于来信中那套客气的党八股背后的含义，是不便过于公开地道破的，但是全体中央委員都能領会到信中的弦外之音，他們一致支持馬斯洛夫反对斯大林。

在1925年4月举行的俄国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議上，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矛盾以不可調和的形式表現了出来。季諾維也夫不再是他自己的共产国际机构的主人了，这个机构中已經滲入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員，他要費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他的国外支持者收到他的信。曼努伊里斯基接到秘密指示，要他在柏林进行干預，必須不惜一切代价把左派从領导崗位上排除。这是在正确批評左派錯誤的幌子下进行的，而正在等待时机的季諾維也夫迫

于党紀，也不得不支持这种干涉。

曼努伊里斯基对德国左派

在即将举行的德国党代表大会开幕以前，曼努伊里斯基为斯大林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把最积极支持独立工会的人开除了。但使他不知所措的是，在馬斯洛夫的大力支持下，党仍然同那些被开除的人保持着极良好的关系，而且继續在地方性范圍內同他們合作。除此以外，党內的极左派也还在柏林、魯尔和帕拉廷耐特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們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足以使他們有資格在領导机构中分配到两个名額。他們选擇魏納·朔累姆为参加組織局的代表，选擇亚瑟·罗森堡参加政治局。

魏納·朔累姆是一个杰出的組織家，曾数次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見过斯大林。俄共总书記极端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于任何以超布尔什維主义名詞为掩飾的拉攏表示，都一概以柏林人的粗魯和冷嘲态度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以自己曾参加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自豪，他一直认为該党是一个标准的工人組織。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因为反对德皇战爭而离家，成为一个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他在1914年被征入伍，当时，他已經参加德国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不久以后，他以侮辱威廉二世罪被判处一年徒刑。战后，他成为哈雷党报編輯和普魯士議会議員。他很快便作为一个口才犀利的优秀演說家而聞名全国。①

① 朔累姆在1926年由于反对斯大林被开除出党；他继續在党外进行反斯大林的斗爭，直到1933年被納粹监禁。他在許多集中营中被囚禁过，1940年夏，在經受了納粹和一同被关在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两方面的折磨以后，他終于被党卫軍头目布兰克在布痕瓦尔德杀害。参看貝奈迪克特·考茨基：《魔鬼和被詛咒的人》，苏黎世1946年版，第116頁。考茨基报导了集中营犯人私設法庭的情况，这类法庭往往在党卫軍的眼前公然把政敌判处死刑，并且执行这一判决。"共产党內的異端分子比社会民主党人还要遭殃，他們的人数相当不少，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兰德勒分子、工会反对派等等。"（考茨基，第131頁。）

曼努伊里斯基暂时把正在由莫斯科領导的重要的原則性解釋运动擱在一边，对左、极左和右派三派不加区别，統統許下願来，保证共产国际支持它們的彼此矛盾的政策。特别是极左派集团反对馬斯洛夫热衷于議会政治以及同資产阶級中央党結成联盟的不滿意見，曼努伊里斯基对之表現得尤为同情。他两面三刀地承认，这种机会主义傾向对德国革命事业构成了巨大危險。同时，他也支持右派的要求：在党內选举中丧失了大部分支持者的右派，这时要求增加領取薪金的党的工作人員，錢的問題可以由莫斯科帮助解决。党在議会和邦議会中的議員則发現，曼努伊里斯基了解他們对共产党日益丧失选票一事感到的焦虑，他还把責任归咎于左派的关門政策。最后，他又对我表示，在反对极左派的原則性斗爭中，他保证斯大林给予我們以无条件的支持。

不論哪一派党官僚都发現曼努伊里斯基同情他們的訴苦。1923年的暴动給党留下了一个臃肿的机构，只有在莫斯科的大量金錢援助下，党才勉强維持住了这个組織。由于左派下层党員一心要摆脫这些領取薪金的干部而代之以选出的志願工作者，由于他們坚决要求党在財政上做到不依賴莫斯科，他們不断要求朔累姆精簡党的机构。于是，每一个被免职的人都向曼努伊里斯基和斯大林提出連篇累牘的申訴书，这些申訴书的內容总是說他們由于政治理由遭到了打击。这样一来，曼努伊里斯基便得以把維护这些前官僚和捍卫共产党的万应灵药、即滲入工会的政策結合起来。

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員会曾經組織了一个特殊的工会工作部，由弗里茨·赫克尔特和雅各布·瓦耳歇尔領导，直接向赤色工会国际主席洛佐夫斯基定期呈交报告；通过这一途徑，斯大林不仅知道了关于党的許多詳細情况，而且非常了解德国工业和德国經济

的一切特征。这个部的几十名雇員过着一种不受德共中央管轄的生活，虽然它在成立时規定由德共中央正式領导，而且表面上一直保持着这个名义；它的办公室里总有着三四名来自赤色工会国际的俄国专家。曼努伊里斯基坚持这个机构不仅不应該精簡，而且应該不断扩大。

这場爭論涉及的主要并不是工会和如何在工会中工作等等，而是莫斯科給予德共以經济輔助的微妙問題。事实上，按党的龐大規模来說，它在經济上是足以自給的。略高于社会民主党傳統水平的党費，聚集起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此外，議会和各邦議会中的几百名共产党議員，他們虽然是党的干部，却領取国家津貼，而且还得把每人收入的一部分捐給党。可是，由于莫斯科始終坚持有必要把宣傳工作扩大到德共本身的經济力量无法負担的地步，因此使莫斯科的活动离开正途，完全走上了操纵的道路。德共的年度預算虽然是在柏林編制的，却注意到要取悦于将在莫斯科批准它的人；需要撥款的各項必要开支总趋向于符合俄国的当前政策。在1921—1930年期間，負責把經費交給德共的是共产国际駐柏林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

德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1925年7月12日于柏林举行。大会代表一百七十名，其中有一百四十二名是来自工作台畔的工人，此外还有許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包括一个姓夏的中国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曼努伊里斯基，以薩繆里的名字被列入大会公报。代表們是在充分討論了馬斯洛夫的保卫魏瑪共和国綱領以后选出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支持这一綱領的委托。

在中央委員会和政治局內按比例分配各派名額时，最困难的問題就是寻找出一名适当的右派代表，因为威廉·皮克即使在他自己的拥护者看来也不够格。最后，終于选擇了恩斯特·迈耶尔，

从而使問題获得解决。迈耶尔曾經在布兰德勒之前担任过政治局主席，而在更早的时候，則是罗莎·卢森堡的朋友和学生。迈耶尔曾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力爭把左派开除，現在把他接納进党的直接領导机构，是一种謀求調和的朕兆。不过，虽然他这时仍旧維持着自己的基本立場，并且始終忠实于他的集团，經过1923年的事实教訓以后，迈耶尔已經改变了他对左派的估价，同情左派摆脫莫斯科控制的意願。

从一开始起，代表大会的結果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大会将在政治問題上发生分歧，但是馬斯洛夫的政策将获得强大的多数支持，而反对派由于得到充分民主的代表名額，他們也将感到滿意，願意同多数派友好合作。这种发展趋势使曼努伊里斯基大为吃惊，因为馬斯洛夫对莫斯科的批評获得了全体代表的一致支持。如果說現在已經不再能操纵德共，那么，它原来的操纵者就只能設法不让它团結成更强大的組織。因此，他的任务是明显的：一定要利用某种方法，不让德国党的三个主要派别合并成一个工作单位。

要为破坏代表大会找到一个发动借口，对曼努伊里斯基来說并不太容易。他仔細审查了大会的提綱，但是沒有一句話能給他抓住把柄，好让他借口捍卫馬克思主义原則而进行干預。但是，在正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員会以前，他終于創造了必要的紧张气氛。大会主席是奧托馬尔·盖什凱，① 一个铁路工人，他以工会干部平日的那种快活勁头主持着会議。在辯論时，当主席已經让另一个人发言以后，曼努伊里斯基要求发言。盖什凱請曼努伊里斯基稍等一下，于是，这件平平常常的事便被共产国际代表戏剧化了，被扩大成为对共产国际紀律的破坏。他宣称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刻打断

① 这就是那个請斯大林和海尔佐克談一次話的盖什凱。在布痕瓦尔德被囚禁十二年以后，他于1945年担任了柏林市議会福利部負責人。

党代表大会。他要求大会停止进行，立即召开中央委員会会議，在后一个会議上，他声明他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和俄国党遭到了大会主席的侮辱。他并且借題发揮，大肆批評这一事件所体現出的德国党不服从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情緒；他还认为，这种反布尔什維克病毒的另一种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种表現是把极左派容納进党的領导机构，因此，他要求把罗森堡和朔累姆从領导机构的候选人名单上划去。在一次秘密会議上，代表大会毫不动搖地拒絕了共产国际代表的这种干涉，仍然按照原来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了領导机构。战斗在进行着；显而易見，党現在要公开和莫斯科发生冲突了。在秘密会議上，代表們在决心反抗俄国政治局的問題上，表現得就像一个人一样，下层党員甚至怀疑左派領袖台尔曼和費舍的态度过于調和。党員們要求寸步不让地保卫德共选举本党領导人和决定本党組織原則的权利，要求对俄国的干預进行毫不妥协的斗爭。

致德国党的一封公开信

在这次代表大会結束后，曼努伊里斯基回到莫斯科，向俄国政治局的一次会議报告了德共情况。他报告說，共产国际中最重要的党德国共产党，有从国际中分裂出去的危险。他声称，在德共領导下由西欧各国共产党联合組成一个“第四国际”的計划，业已經过长期准备，很可能不日就化为現实。据他报告，为了实現这一目的，德国左派从1924年以来就一直在积累基金。他的这种說法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反对季諾維也夫的武器。在受到这种暗示他串通外国人反对政治局的攻击后，季諾維也夫无可选擇，只能参与譴責德共左派和策划采取懲治措施，以表明他自己的忠誠。

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左派司庫阿尔图·克尼希，但是共

产国际給德共的基金仍然掌握在威廉·皮克和胡果·埃貝尔林的手上，他們拿到外鈔津貼(主要是美元)以后，按月付給党一笔經常费。这些錢是不可能存在銀行里的，直到这一时期为止，它們都是被藏匿在某个地方，要用多少就从中拿多少。在埃貝尔林的鼓励下，克尼希企图使这笔閑放着的資金发揮作用。他打算用这笔錢来投資，为党牟取相当利潤，但是，由于只能把这笔資金交給同情党的实业家，因此計划的效果不佳，最后以財政上的明确失败而告終。在这些由共产党投資的企业中，有开姆尼茨的一家小紡織厂(該厂厂主奥里希是紅色陣綫制服的承制者)、一家留声机唱片制造厂和康斯坦次湖边的一家出版社。在同各种买卖人談生意的时候，不免要有許多次請客吃飯的应酬，而那些认識埃貝尔林和克尼希的飯店侍者，便在全柏林傳开了一系列荒唐无稽的謠言。①

俄共政治局責成共产国际监察委員会調查德国党內的这种情况。可是，調查結果证明，尽管克尼希不善于理財，他却是淸白的，因为在調查中找不到严重材料，不足以用它們来攻击他們这一批干部的領导人馬斯洛夫和我。馬斯洛夫还在监獄里，我同党的財务工作毫不沾边。季諾維也夫可以說明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威廉·皮克是从苏俄大使館領取基金的經手人，党的財务只由他以及他的朋友胡果·埃貝尔林掌管。

"1923年暴动失败后，国际联絡科的駐德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以及莫斯科的皮亚特尼茨基，为了选擇他們可以信任的共产国际經費保管人，很伤了一段时間的脑筋。当威廉·皮克在新中央委員会里被留下以后，他們两人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不論是皮

① 共产党搞这次自由企业冒險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是弗里茨·卡兰姆，他当时是党在埃森的一个行政工作者，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他是保尔·梅尔克尔設在墨西哥城的自由德国委員会委員。

亚特尼茨基或者是米罗夫-阿布拉莫夫，都信任这位老資格的劳工領袖。”①

在发生上述事件的这一时期，海因茨·諾伊曼成了斯大林在德国的主要拥护者之一。

諾伊曼的父母很富有，但他在十六岁时便脫离資产阶級的家庭和环境，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組織。他一半作为流浪汉一半作为社会主义傳道士走遍欧洲，很快便学会几种外文，能讲流利的法語、意大利語和俄語。1922—1924年間，他作为共产国际会議的翻譯員常去莫斯科，他的几个共青团朋友介紹他和斯大林見了面。斯大林很喜欢这个聪敏而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在德国党內，諾伊曼的名字逐漸傳到柏林以外，人們都知道他是左派集团的青年領袖之一，是馬斯洛夫的一个忠实而热心的追随者。諾伊曼是一个无法改变本性的浪漫主义者，因此不可避免地为党的秘密工作所吸引。②斯大林知道諾伊曼的这些活动，也知道这个年輕人崇拜他。

柏林大会剛一結束，斯大林便把諾伊曼召到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到一項任务——写一本小册子譴責馬斯洛夫的西方共产主义。③到这时为止，他虽然为党做过重要工作，却还沒有被选上領导崗位；斯大林答应把他提升为德共中央委員。这部旨在帮助改变德国党內情緒的“懺悔录”，曾在共产国际中轰动一时。④

---

① 瓦尔特·克里維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54頁。

② 見本书第367—368頁注②。

③ 海因茨·諾伊曼：《馬斯洛夫对列宁主义的进攻》，汉堡1925年版。

④ 海因茨·諾伊曼，許多年內斯大林的一个特殊亲信，是当时会讲俄語的很少几个德国人之一。他是斯大林和自己的亲信飄飲时的一个座上客，由于他特別聪敏和具有广博的国际知識，他所掌握的斯大林如何上台的秘密，超过了任何人应該知道的程度。1927年12月，他和一个共产党青年組織的領袖“別索”·洛米納澤被派往中国，去組織所謂“广州公社”。回到德国后，諾伊曼勇敢地反对正在兴起的納粹，时常参加街

这时，对德共财务的調查还悬而未决，諾伊曼又写出小册子，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傳聞，說德国人正在脫离共产国际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便得以逼迫季諾維也夫作出妥协——写一封致德国党的公开信，批評德共左派的政策，建議撤消馬斯洛夫和我的領

头冲突。

1931年夏，諾伊曼由于憤激地反对德共容忍納粹的政策，被免去了为台尔曼充当书記的职务。1932月2月，再次由于莫斯科的命令，他在德共政治局中的工作也被解除；5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在这里，他同斯大林就德国政策問題进行了长时間的討論，他后来关于这些談話的报导，是說明斯大林这一时期德国政策內容的最重要证据之一。1932年8月，为了完全不让他参与德国党內的事务，諾伊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員被派往西班牙，这个代表团的另两个团員是阿根廷人梅迪拿和波兰人扎尔茨曼。同年年底，对柏林傳来的消息感到忧虑的諾伊曼，写信給他在德共政治局中的朋友赫尔曼·雷梅累說，为了把党从即将来临的毁灭命运中挽救出来，必須在德国大力反对党当时的路綫。接着，納粹在下一个月便上了台，1933年3月，在雷梅累逃往莫斯科以后，这封信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所发觉，送到了共产国际总部。于是，諾伊曼被命令离开西班牙，前往苏黎世，在那里，他过着屈辱的生活，不能和共产国际的高級領导人联系；他通过党的出版社分配給他的一些零星工作，挣点錢聊以糊口。在納粹政府要求下，瑞士警察于1934年12月借口护照問題把諾伊曼逮捕。納粹政府要求引渡諾伊曼，以便对他在快离开德国前向一个党卫軍行凶的罪行进行审判。經过几个月的交涉，他最后被准許去俄国；1935年6月，他在勒阿弗尔登舟。回莫斯科后，諾伊曼和他的妻子被分配做翻譯这样一种不重要的工作。皮亚特尼茨基打算利用一个加拿大工程师的护照把他送往巴西，使他不致遭到迫害，但是到最后一刻，这个安排却被取消了。共产国際监察委員会对他进行了两年时断时續的訊問，到1937年4月，諾伊曼終于以在德国党內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被捕；具体事实是，他曾經在1930年让弗里茨·大卫(1936年审判中的一个被告)当了《紅旗报》編輯，从而便利了暗杀斯大林計划的进行。諾伊曼无疑已經死亡，但他是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死去的却不得而知。(保尔·梅尔克尔曾在一段閃爍其詞的文字中，提到过諾伊曼进行的反对派活动；参看《德国，生存还是毁灭?》，第1卷，第256頁。)

1946年，一家小杂志(《德国新聞》，智利，圣地亚哥，1946年9—10月，第30—32頁)刊載了一篇未署名的报导，提到在1940年有一群德国妇女——他們都是斯大林的政敌的家屬——被国家政治保卫局交給了盖世太保，后者把她們关进了雷文斯布魯克集中营。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海因茨·諾伊曼的未亡人，格雷特·布貝尔-諾伊曼，她目前住在斯德哥尔摩。諾伊曼夫人曾慷慨允許我讀了她尚未发表的非常有趣的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她詳細描述了她自己于1938年被捕后在卡拉干达犯人营中的生活，以及她在被移交給盖世太保后在雷文斯布魯克集中营中的經历。

导职位，但仍旧保存左派中央委員会。斯大林以无与倫比的技巧，想出了一箭双鵰的安排。在他的提議下，俄共政治局命令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諾維也夫发出这封公开信，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让人看到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权力正在削弱，另一方面又剝夺了他在欧洲共产党人中唯一有实力的支持者德共左派。由于季諾維也夫还沒有决定他什么时候可以公开攻击斯大林，他只得服从党紀，他这样做的时候抱着一种徒然的幻想，以为他能够通过玩弄手腕减輕損失。

作为預备步驟，季諾維也夫让德国党派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議，一起討論这封信的草稿。德共代表团包括：恩斯特·台尔曼、路特·費舍、菲利普·登格耳、威廉·施万、恩斯特·施內勒、約尼·舍尔、奧托·屈內、馬克斯·施特勒策耳和海因茨·諾伊曼。[①]

这封公开信很长，用小号鉛字刊載在德国共产党日报[②]上时还占滿三版，它重新提起了曼努伊里斯基曾企图用它們来破坏德共团結的一切問題。它头一点就是把馬斯洛夫和費舍两人同共余左派区分开来。一切政策問題本来都是由中央委員会大多数委員——如果不是全体委員的話——决定的，但現在却要这两个人对党的錯誤負全部責任。据說，别的人都是意志受到“强奸”，被迫接受反共产国际政策的。[③]

---

① 屈內后来参加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曾多次被派往欧洲諸国从事各种活动。1946年，他在巴黎露面，成了一个在法国的德国难民协会的負責人。舍尔在納粹剛上台后就被他們杀害。施內勒在1933年被納粹囚禁起来，1939或1940年死于集中营。至于登格耳，自由德国委員会从莫斯科发出的許多宣言上，起初都有他的署名，但到1944年，他便突然下落不明。参看本书第562頁注③。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党的公开信》，《紅旗报》1925年9月1日。

③ 把要撤換的少数高級領导人和他們的同事区别开来，确是一种方便办法，当雅克·杜克洛在1945年干預美共事务反对白劳德时，所玩的手法几乎是这次对付德共

公开信先来上长长一篇开場白，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說了一通他們很难說服德国同志、他們不得不同好几个代表团談判数星期等等的話，然后便涉及本題，討論了三个重要而复杂的問題：第一，路特·費舍-馬斯洛夫的右傾偏差和一味依賴議会方法的趋向；第二，工会問題，特别是有必要在德国党內重新建立一个龐大的工会工作部；第三，党內生活和对待布兰德勒的态度問題。

信中先說明了国际背景；当时"帝国主义正在集中力量反对苏联（对莫斯科形成的一个軍事-外交包圍圈，英国的政策，以及保证公約）"。公开信然后指出：

"这个复杂問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須弄明白德国亲西方的新趋向。外交趋向的这一改变在人民中間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气氛，这反映在缺乏阶級觉悟的部分无产阶級的身上。……在被腐蝕的一部分工人阶級中，可以看到所謂'反莫斯科'的傾向增长了，这是資产阶級新动向的反映。部分說来，德国共产党內也存在着这种情緒。"

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結束后，执委会曾打电报給德共中央，要求把极左派开除出党。这封电报以通报形式发給了党的一切区域組織。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公开信抱怨說——激起全党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几个月后，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路特·費舍又反对提出全世界工会团結的口号，她竟指責这个口号只是支持苏联对英政策的一个策略。

"为爭取国际工会团結而进行的斗爭，竟被說成不过是'俄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着棋'，不过是用以接近麦克唐納社会民主主义政

的翻版。白劳德在工作中間，也获得了党中央委員会的大多数支持，而且，归根到底，美共中央只是执行了一种莫斯科强加給它的并且为整个組織所接受的政策，但白劳德却成了唯一要負責的人。

府的一种手法。”

公开信继續說，左派的反布尔什維克情緒还表現在它反对雇用大批領取薪金的人員从事工会工作。（不用說，提出这一点又是为了吸引渴望得到这些职位的右派。）信中认为左派犯了悲观主义；左派不相信德国革命的时机很快就将来临。馬斯洛夫特别被提了出来：

“馬斯洛夫的著述是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全部政策的一种进攻，一种迂迴的但却是极其危險的进攻。”

在他所写的《1917年的两次革命》（柏林1925年版）一书中，馬斯洛夫曾批評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也要为德国党的錯誤負一部分責任。公开信引用了他这本书中的几段話，然后对它們痛加譴責：

“这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凶恶进攻是不可容忍的，必須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回击。……打着同‘西欧’偏向、也就是說同背离共产主义的反布尔什維克偏向作斗爭的幌子，馬斯洛夫实际上在宣傳一种最坏的‘西欧共产主义’……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馬斯洛夫同志的集团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一直是不正确的，反布尔什維主义的……

在过去几年中，路特·費舍同志不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抗議，派遣代表到共产国际的許多支部去活动，責成他們通过派别活动来改变执委会的政策。”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抗情緒的另一个表現，是馬斯洛夫发表在《火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談談德国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馬斯洛夫在这篇文章中談到，1922年8月，在耶拿代表大会結束后，柏林党組織如何拒絕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因为它不同意执委会对德共政策的某些批評。用公开信的話来說，对这件逸事的报导

是“蓄意在德国工人眼中贬低共产国际身价的一种前所未見的行为”。公开信一再重复說，共产国际无疑是正确的；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无疑是不正确的。

德国党在推銷馬斯洛夫写的书和小册子时，采用了同工人运动傳統不相容的“美国”方法，这也成了馬斯洛夫的罪过。此外，他还由于有悲观主义思想而被攻击。因为他曾經說过，认为在目前就可以准备夺取政权是可笑的，他还說过，党要想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一支眞正的力量，至少需要有十年发展时間。

左派和极左派之間的关系一再受到譴責。“在党代表大会結束时，朔累姆-罗森堡提出共同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議被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而这种做法是違背一切原則的，因为代表大会的政治方向正是要同极左派作斗爭。”左派和极左派的这种联系对莫斯科說来特别危險，因此也特别受到了指責。

斯大林这次干涉的最荒唐部分，也許就是那种口口声声要保卫党內民主的姿态了。俄共总书記要撤換的德共領导人，是剛剛由一个按民主方式进行的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可是，总书記用来撤換他們的理由之一，居然是說他們对政治民主不够重視！另一方面，路特·費舍又由于过分照顾到选出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們的政治观点而受到譴責。“党的代表大都带有极左派傾向。”这种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顾的离奇作風，也一直是斯大林主义論战的主要特点之一。

公开信最后提出了另一种改变党的办法。德共中央委員会应該扩大，就像俄共中央在列宁逝世后所做的那样；在一个經过扩大的机构中，莫斯科政治局就可以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执委会重新蠱惑性地譴責馬斯洛夫的議会主义，要求党把力量集中于“純粹无产阶級的群众政策”上，也就是說，集中全力来組織工厂党小組。

对这种对純粹无产阶級政策的强调純粹是胡說八道，目的只在于防止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任何莫斯科所不願意的轉变。

“必須了解〔公开信写道〕，德国共产党人最近时期的主要錯誤之一，恰恰在于过多地注意了‘高級的’、‘議会的’問題，而忽視了在工厂中进行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参加1925年8月召开的主席团会議时，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封公开信。由于公开信中有一些論点和我本人对德共宗派主义性质的某些批評表面上似乎相同，我打算接受这些論点，主要只反对信上提出的組織性补救措施。我认为通过这种立場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爭取到一定时間，因为我希望馬斯洛夫在此期間能获釋出獄，另一个是不論怎样也可以把討論的中心轉移开，使話題从德国党的錯誤方面移到它是否应該独立于莫斯科的問題上。共产党人經常討論的那些問題——在工会、普魯士邦議会中的政策等等——已經被說烂了，再把它們提出来只能起到使党进一步分裂的作用。

可是，斯大林却另有打算。共产国际的紀律被抬出来了，要求主席团的所有委員，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得在公开信上签字，而且以后还得在各人的党內捍卫这封信。这就等于要我在宣布自己政治死刑的命令上签字，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当时，德国左派对共产党人的紀律还过于重視。这是我們最容易被人从那里下手的弱点，而作为駐共产国际俄国“代表团”团长的季諾維也夫，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我最初的决定是拒絕为别人火中取栗，我宣布，我将公开和这封信作斗爭。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曼努伊里斯基一再申述他們的理由：你可以在主席团的秘密会議上維护自己的观点，投票反对公开信，但是，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世界权威已經作出决定，要求主席团的全体委員都

必須在信上签字，你要是再拒絕服从就是破坏布尔什維克紀律。你同样不能拒絕在德国党內捍卫公开信。你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員，是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首先必須考虑你的这一身分，然后才能考虑你在德国党內担負的任何职位。你的首要义务是服从主席团；共产国际的紀律高于各国党的紀律。

就这样，等級紀律的原則成了他們用以对付我的武器。如果在政治局內有分歧，經过表决后多数作出的决定对所有的委員都有約束力，布尔什維克的准則甚至不允許他們在中央委員会中討論分歧点。在中央委員会中抱有不同意見的人，在党內也必須維护中央委員会的观点；党員在党外則一定要維护党的决定，即使他本人在党內并不同意它們。因此，在每一級机构，分歧总限制在人数尽可能少的范圍之內，从每一級往下，下一級較大机构从上級收到的总是一致同意的訓令。每一級內部討論的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一級的委員如果和下級单位的人談起这些討論，在共产党人看来就等于犯了重罪。

1925年8月，实現这一原則的办法正在形成，这是在共产国际范圍內实行这种原則的第一次，也是重要的一次。在此以前，共产国际中抱有不同意見的派別一直可以向任何听众大声說出他們的观点。用布尔什維克的紀律性来将我一軍是很有力的，但是，如果沒有另一个人支持这种做法，我还是会进行抵抗的。这个人就是季諾維也夫，他在另一次私下談話中坦白告訴我，他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險；共产国际正处在俄国党各方面的圍攻之下。另一方面，在几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俄国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希望能扭轉局势。他告訴我，斯大林曾打算让曼努伊里斯基把馬斯洛夫和我排除出德共政治局，他总算設法防止了这一点。他然后說道：你在德国党內的朋友会了解到，你現在以自己的签名支持一种你一

年来一直大力与之斗爭的政策，那只能是因为你必須在形式上服从共产国际的紀律。为党的錯誤承担責任正是領袖的义务，同时，通过这样做，你也能防止住对你个人的攻击。你在德国党內的地位是巩固的，足以在这种暧昧不明的处境下支持几个月，而在这以后，我們就能在德俄两国党內公开和我們的对手作斗爭。

因此，我在主席团內先投了反对票，然后在公开信上签了字。可是，事实证明，我們的所有这些用心良苦的打算都完全錯了；公开信只便利了斯大林权力的巩固。

当我回到德国时，他掀起的运动正在火热进行；朔累姆和罗森堡已經被排除出中央委員会。斯大林答应让罗森堡重返中央委員会，从而得以离間这两个人。在一段时間內，罗森堡和台尔曼合作，因此保住了他在議会外交委員会中的职位。在曼努伊里斯基的主持下，党正在討論“正常化”和“布尔什維克化”的問題；但是，这种討論在一般情况下势必要涉及到的当时俄国党內分裂的問題，自然是不容提起的忌諱。尽管存在着共产国际的紀律和党內的派系爭吵，党作为一个整体来說却傾向于拒絕公开信和这封信意味着的俄国統治。使党最起反感的部分也許是，公开信竟把政策失敗的責任推到了馬斯洛夫头上，而不是要曼努伊里斯基負責，尽管前者当时被关在监獄里，后者却一直在柏林指导着布兰德勒。我在柏林、埃森和斯图加特批評了公开信，当时拥护反莫斯科立場的力量相当巨大，而且日益增长。我在党內所感受过的人們对我的同情，从来沒有比我在斯大林开始进行干涉的这几个星期里所感受到的更眞誠的了。

1925年 9 月，馬斯洛夫終于作为一个危險的共产党領袖，被带到国家最高法庭面前进行审判。证据主要是他在监獄中写的《1917年的两次革命》一书。在开庭那一天，馬斯洛夫知道了公开信的

事,因此更急于使自己的刑期尽量判短一些,以便能早日回到党內为自己的政策进行斗爭。台尔曼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員都希望在反对莫斯科干涉的斗爭中得到馬斯洛夫的帮助,这种希望大过他們对馬斯洛夫在党內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恐惧,因此,他們批准馬斯洛夫在辯护时可以充分利用起訴书中的弱点。1923 年并沒有发生大暴动,同时,馬斯洛夫本人不仅不在德国(他被留在莫斯科),而且也不是德共中央委員。这一辯詞是很有力的,再加上那封公开信,使法庭觉得馬斯洛夫日后的地位和政策还很难断定,因此量刑較寬,只判了他四年徒刑。由于他已經被关押十五个月,所以在一两年內就有可能出獄。

馬斯洛夫为他自己所作的辯护,大大加强了德国共产党人当中的反莫斯科傾向。斯大林的反应是通过了另一道政治局决議,譴責馬斯洛夫在資产阶級法庭上的非布尔什維克表現。他公开討論了党內事务,并且把 1923 年的政策拿到公众眼前来出丑,指出它的种种弱点。当时,不仅所有共产党的报紙,而且全世界的报紙都在討論着德国共产党的危机,并且把它和俄国党內的危机正确地联系起来。可是,馬斯洛夫竟說破了密謀的內幕,竟把用以在資产阶級面前遮盖共产国际活动的毯子的一角揭开,就对党犯下了莫大的罪行。

审判結束那天,便召我去莫斯科。我在 9 月末到达那里,結果只是接到了主席团禁止我回德国的决定。我在共产国际中升了級。皮亚特尼茨基拿去了我的护照,我被安頓在路克斯飯店,在那里,我事实上做了十个月国事犯。我的所有信件都通过共产国际收发,因此也就要經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查,这样,我同德国党的所有联系便被割断了。于是,就在馬斯洛夫坐牢、我被軟禁的情况下,他們一手操纵了党內的討論。

在柏林监獄中，馬斯洛夫要比我在莫斯科飯店中更自由。他的通訊虽然也受檢查，但沒有我受到的那样严格，他可以定期会見他的律师和几个朋友，通过这些人，他便能同党員們始終保持联系。可我呢，却处在俄国党領导阶层日益仇視的包圍中，从精神上和組織上都被他們有計划地孤立起来。

斯大林对德共事务的这第一次干涉首創了先例，以后，对各国党的各級党組、对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对获得解放的国家，他继續进行了許多类似的干涉，斯大林在进行这类干涉时，过去和現在都根据直接向他負責的特工人員的情报办事。这些情报对于所观察的集体以及它的各个領袖都有詳細报导——列举了这些領袖的出身、过去的錯誤、他們的缺点、隐私、虛荣心等等。他向每一个集团允下他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而用他們最害怕的东西施加威胁，这样就把一个集体分化成了許多彼此攻訐、竞相邀寵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对于还沒有皈依政治局的某些人，总是多方拉攏，把他們收买过来。

这种过程的斯大林主义特点是，以前的反对派后来总要公开承认他們过去的錯誤，承认他們过去想錯了，只有总书記英明正确。这种把党的錯誤人格化的做法，提高了最高領导的威信，他的决断永远不会錯，如果有錯的話，只是因为能力不足的或者不忠实的同志阻碍了它們的实現。通过它本身的內在邏輯，这种威吓制度只能产生长期性的和越来越增长的恐怖。

第二十一章　俄国外交政策对共产国际

从列宁去世到斯大林作为他的继承人取得最終胜利的这些年中，呈現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怪現象。一方面，大家都承认資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并且尝試着恢复俄国同資产阶級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間里內訌激烈的俄国党，又在从英国到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許多国家中进行了一系列挑衅。

俄国为在它的外交政策中达到某种平衡而作的努力，从一开始起就和国外一切反布尔什維克宣傳的主要攻击对象——共产国际发生冲突。同資本主义世界調整关系，从俄国內政的角度来看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驟，因为它希望通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大稳定来鎮压一切反对派。苏俄已經在1921年被德国承认（在“拉巴洛条約”中），随着这一缺口的打开，一系列其他国家也相继效法。在以后两年中，苏俄駐国外代表加强了他們的外交活动，在党內，1924年被称为“承认年”。苏联政府先后为英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但澤、瑞典、丹麦、墨西哥、匈牙利、年輕的中华民国和法国所承认，最后，日本到1925年1月也承认了它。这种外交和解不仅加强了革命俄国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俄国可能在資产阶級世界中和平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諾維也夫在讲話时指出，这一政策尽管取得了成功，如果不以继續支持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作补充，它是具有一定的危險性的。在同斯大林爭夺权力的过程中，他强調共产国际在俄国政策中的作用；阶級斗爭并

沒有因为苏俄同資本主义国家签訂了条約而宣告結束。資本家的进攻仍在继續。5月14日，也就是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和科因布拉破获了阴謀爆炸案。費列克斯·諾伊曼和斯科布列夫斯基在柏林被捕，很快就要成为契卡审判中的主要被告。

另一方面，季諾維也夫說，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政权。“第二国际已經在最大的資产阶級国家——英国执政。英国不是波兰，不是冰島，甚至也不是德国。它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丹麦正在步英国工党的后尘。柏林有五十万共产党选民，巴黎有三十万以上。而在二月革命以后的选举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維克选民加在一起还不到八十万人。在索菲亚和布拉格也存在着共产党的巨大力量。因此，共产国际的下一步任务将是“使共产党人在倫敦和紐約取得巨大胜利”。

当斯大林在1922年4月2日成为总书記时，他在爭取控制党并且通过它控制国家的斗爭中，已經赢得了第一步重要的胜利；但是，直到1924年7—8月間举行过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他才得以大举滲入共产国际机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第一次以俄国代表的身分露面)。他充分利用了季諾維也夫提出的布尔什維克化口号，把它变成了排挤季諾維也夫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在許多国家中，阶級战爭都遭到失败，特别是在德国，領袖們在1923年秋天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机会主义錯誤，鉴于这些經驗，认眞考虑德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維克化問題，便成了当务之急。……代表大会提醒一切党注意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无比重要性，并指出有必要組織車間核心作为党組織的基本单位。在此以前，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一直保留着社会民主党的傳統，主要是根据地域原則按选区組織起来的。”①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212—213頁。

争取控制权的过程是长时期的，斯大林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代表活跃在每一个地方，不放过每一个可以用来瓦解共产国际的机会。

季諾維也夫信件

在英国，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不受欢迎，英国共产党在工人中間的影响很小。可是，在英国工会主义者当中，对苏俄的态度却是友好的，而且，这种友好情緒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增长。

在1924年夏天，俄国試图同英国达成貿易协定。談判在8月5日破裂，主要的障碍是战前的俄国債款問題，苏联代表拒不承认；但是，达成貿易协定的希望在英国仍然存在。俄国曾經表示，如果能有合理的貸款条件，俄国願意购买价值一千五百万英鎊的机器，甚至在官方談判已經破裂以后，苏联紡織托辣斯的一个采购委員会还继續想购买价值五百万英鎊的紡織机器。由于失业数字很高，职工大会贊成在俄方提出的条件下接受这笔交易。职工大会主席斯韦耳斯指出，受經济不景气的打击特别严重的造船业可以通过为苏联造船而得到复兴。职工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議：

“考虑到联合王国目前存在着不正常的和长期的失业現象，而一天不让俄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就一天不可能恢复联合王国的战前对外貿易，本总委員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同苏联重开談判，以达到下列目的：1）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俄国的苏維埃政府。2）鼓励和支持同俄国通商，对英俄貿易应用‘貿易促进法’和‘外貿法’。”①

英国工会主义者要求同苏俄通商的这种希望，首先只是由他們希望克服失业的意願引起的，以后，随着这种希望的发展，共产

① 职工大会总委員会1925年3月25日的声明；轉引自W.P.柯特和齐尔达·柯特：《英苏关系史》，倫敦1943年版，第199—200頁。

党的影响在工会中日益增加，終于在次年的总罢工中反映出来。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希望用促进对外貿易的办法来克服国內的經济困难。同英国进行的上述談判只是根据斯大林的这种願望制定的总政策的一部分。忙着寻求新貿易关系的俄共經济学家、外交家和政府官員，感到季諾維也夫的共产国际碍手碍脚，妨碍了他們同資本主义世界改善政治关系的努力。企图继續执行革命的政策，就是对俄国更广泛利益的一种直接破坏。

1924年10月10日，也就是第一届麦克唐納內閣剛成立几个月以后，英国外交部截获了一份据說是季諾維也夫写給英国共产党的信件。这封信指示英国共产党不要仅限于爭取批准悬而未决的英苏条約这种一般的宣傳鼓动，而要特别注意在英国軍队中建立党小組。

"从你們最近的报告来看，在陆軍中的宣傳鼓动工作显然是做得不够的，在海軍中也好不了多少。你們說，吸收的党員数量虽少，质量却很好，这种解釋在原則上讲并不錯；不过，如果能在每一个軍队单位，特别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駐軍，以及在軍需工厂和軍用仓庫的工作人員中，都有党小組存在，那总是一件好事……一旦发生战爭危險，在有后一批人的帮助以及同运輸业工人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資产阶級的全部軍事准备陷于瘫痪，开始变帝国主义战爭为阶級战爭。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警惕……

据我們所知，英国共产党的軍事工作部还有一个缺陷，这就是缺乏专家，缺乏未来的英国紅軍指揮員。現在是你們考虑建立这样一个专家机构的时候了，当激烈的斗爭一旦爆发时，这一批人同領袖們在一起，就能构成党的軍事組織的指揮中樞。……不要把这件工作推到将来，因为天有不測風云，很可能在你們措手不及的

时候，便爆发了事变。"①

信末的签名是季諾維也夫和庫西宁，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主席和书記。在英国流傳的这封信有两种文本。在一种文本上，英国共产党人亚瑟·麦克馬納斯也是信的签署者；在另一种文本上，他則是收信人。

麦克唐納以首相的身分指示外交部最仔細地审查信件的眞伪，同时起草致俄国政府的抗議书。10月24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指示一星期后，英国外交部交給苏联駐英代办一份照会，声明"英王政府不能容許这种宣傳，必須把这一事件視为从外界对英国內政的直接干涉"。② 苏联代办答复說，他的政府願意把这份文件的眞伪問題交給法庭作公正仲裁。

英国当时正在进行竞选，这封信不仅被保守党用来反对力量微不足道的共产党，而且被他們用来中伤工党。斯坦莱·鮑德溫說："看到季諾維也夫先生以那样的口气談論英国首相，我的血都沸騰起来了。"③

---

① 《伪造的反苏文件》，議会議員乔治·兰斯伯雷作序，倫敦工人出版社1927年4月版，第34頁。这本小册子并出有法文本（巴黎1926年版）和德文本（柏林1926年版）。

据这本未署名的小册子說，在資本主义国家軍事干涉失敗以后，1921年9月7日寇松勛爵致苏俄政府的照会，又对俄国发动了一場新的政治战。在照会中，寇松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特别是它在近东和远东的活动表示抗議。小册子揭露了一系列反苏的組織和中心：有几个是由白俄逃亡分子主办的；一份叫做《东方新聞》的杂志，是"德国間諜的秘密刊物"，其主办者是文策尔，住在柏林威廉街11号；倫敦警察厅厅长巴塞尔·湯普逊以及他的德国同事施提格列茨。小册子列举了大約二十种伪造的共产国际文件，其中有几件便是季諾維也夫的信；一封刊登在巴黎的《解放报》上，談論的是北非問題，收信人是法国共产党人馬塞尔·加香。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的有下列这些人：在柏林的德鲁日洛夫斯基、在維也納的雅庫鮑維奇、在中国的基道列万斯基、柏林副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魏斯、英国人辛格尔頓。小册子利用影印照片，比較了眞正的共产国际文件和这些伪造品，指出两种信紙上端所印文字中使用的各种标記不同。

② 前引《英苏关系史》，第186頁。

③ 同上，第184頁。

当时，我正作为参加英国党代表大会的德共中央代表停留在英国，把我的时間用在观察麦克唐納的竞选上。我在諾丁翰、利物浦和伯明翰的群众集会上听过他的演說。第一届工党內閣——由失业造成的动蕩局势的反映——不可能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立法，因为連它自己的劳工組織对它都不甚支持。我很感兴趣地看到，在一个只存在着人数很少的共产主义派系的国家里，共产国际的政策竟成了如此重要的一个問題。当我回德国后，某些英国报紙竟指責我是把季諾維也夫信件秘密带进英国的人。

工党在选举中遭到严重失敗，它在議会中的席位从一百九十一席減少到一百五十一席。自由党的議席从一百五十九席降为四十席，保守党重新获得多数。

新外交大臣奧斯廷·張伯倫照会苏联政府，声明英国政府认为季諾維也夫信件是眞实的。苏联政府駁斥了这一照会，再次提出把信件交給国际法庭仲裁，但英国政府未予理会。11月26日，季諾維也夫写信給英国职工大会，否认他写过这封信，第二天，他举行了外国記者招待会，这是共产国际主席极少采取的行动。英国工会派出由本杰明·提累特和乔治·楊格組成的代表团去俄国；他們在檢查了全部有关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議事录以后，得出信件显系伪造的結論。

在英国，工党成立了一个委員会，着手調查季諾維也夫信件的眞伪以及它发表前后的詳細情况。一个名叫布萊德雷·戴恩夫人所雇的一个女僕向这个委員会宣誓作证，說外交部的一个官长格雷戈里先生曾在部中接見过一个白俄，和他討論了一些金錢上的事。工党領袖托馬斯以这一证詞向格雷戈里提出責問，并指出，格雷戈里做法郎投机买卖損失了一大笔錢，于是他参与制造季諾維也夫来信的事件，从中撈到不少报酬。格雷戈里否认这些指責，以

后，这一事件暂时便被搁置下来。①

在英国，季諾維也夫信件是帮助保守党重新上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俄国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把保守党和工党分别开来，而且也区分了俄国党內的保守派和革命派。一切官方声明都为季諾維也夫辯护，駁斥外国人对他的攻击，但是在党內，特别是在党的上层集团中，这一事件却被用来加强反对共产国际及其領袖的运动。

国家政治保卫局玩弄了轉移别人注意力的相当漂亮的一手——他們从柏林警官那里弄到一份声明，說季諾維也夫信件和其他許多共产国际文件，都是由柏林的一个白俄机关伪造的。②10月19日，同一个柏林警察署在該市查出了一所設有伪造各国护照全部設备的房屋，这件新聞向全世界公布出来。

在英国，信件問題以俄国的明显失败而告終。苏联大使拉科夫斯基沒有得到他所要求的道歉。11月28日，俄国总理李可夫在一篇向紡織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說中，指責英国保守党是架着季諾維也夫信件的拐棍重新上台的，他說，英国企图把欧洲联合起来反对苏俄。

在我看来，季諾維也夫信件确实是伪造的。表明它多半不是

① "1928年1月26日，一件控告上述布萊德雷·戴恩夫人的案子开庭审判……原告是倫敦商业区的一家錢庄……据該錢庄說，被告在向它卖出和重新买进外鈔过程中，欠下它三万九千一百七十八英鎊……把戴恩夫人介紹給这家錢庄的是格雷戈里先生。1928年2月1日，政府为此特别指定了一个調查委員会……"(柯特，第190頁。)調查未获結果。3月28日，麦克唐納在下院中要求对格雷戈里采取行动，但首相斯坦萊·鮑德溫答复說，就此事进行調查于国家无益，而且它的性质本身便事先决定了不会有任何結果，因此，政府拒絕进行这一調查。不过，格雷戈里仍然被免了职；他在回忆录中談到这件事的时候說："說明我起初是怎样卷进这个紅色案件里去的，不是我的事情，已經有許多人就这一事件說了許多和写了許多，有的眞有的假；就让事情这样摆着吧。"(見格雷戈里：《在外交界的边緣》，倫敦1928年版，第217頁。)

② 参看《紐約时报》，1924年11月21日。

眞实的证据，并不在于各种技术細节——例如在英国流傳着各种互有出入的文本等等，甚至也不在于信的內容，而在于英俄两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从季諾維也夫对待西欧的整个政治态度来看，这封信便露出了破綻，因为共产国际在英国的活动中心肯定不是比較軟弱的軍队，而是群众性的劳工組織。另一方面，被工党的第一次胜利吓得要死的保守党，在为重新执政而进行的斗爭中，正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不难想像，一份不利于共产国际的文件自然会被他們視为至宝，立即发表出来。与此同时，这样一份文件会使季諾維也夫成为破坏英苏改善关系的罪人；不擇手段的斯大林，在他爭取控制共产国际的斗爭中，也正在急切地寻求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对有关的两个集团——英国的保守党和俄国党內的斯大林集团，它們都正在爭夺权力——来說，把季諾維也夫信件公布出来显然是有好处的；这也就是說，两个集团都很可能和編造这封信的活动有关。正在扩大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继承了沙皇暗探局挑撥煽动的一整套策略，它以新的技巧应用着这套老的手法，把那些同其他国家政治警察合作的反布尔什維克集团收买过来，利用它們作为滲入和操纵的掩护，从而和这些国家的政治警察間接搭上关系。經济一时拮据因而容易受賄的格雷戈里，正是俄国間諜所要寻找的那种文官。季諾維也夫后来告訴我，他曾經怀疑那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伪造的，但他找不到证据。工党調查中出場的女僕和白俄，肯定带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气味。直到1928年，这一事件才最后得出結論，而到那时，它的目的早就达到了：季諾維也夫已經被赶下台，保守党也又一次执政。

在爱沙尼亚的冒險行动

英国发生的事件使季諾維也夫更加感到自己的不安全。于是，

他和加米涅夫分别躲进了他們的都市要塞——季諾維也夫退回列宁格勒，加米涅夫躲在莫斯科。在他的列宁格勒堡垒中，季諾維也夫盘算着把势力扩展到邻近的爱沙尼亚去，以巩固他的党組織堡垒。

在内战时期，爱沙尼亚一直是对俄国发动入侵，特别是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基地。它同一切反对大俄罗斯人的势力合作，以这种方法赢得了自己的独立。在它的一百十二万五千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农民；1925年，全部人口中有70%是小农，耕种着他們在1919—1920年瓜分大田庄时获得的一份土地。工业主要是一些雇用二十名到五百名工人的小工厂，在工人們当中，亲共产党的情绪很淡。独立的爱沙尼亚过得很好；它的生活水平高于它那庞大的革命邻邦。爱沙尼亚有三个重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民主党；公开亲德的議員有三名，亲俄的議員只有一名。1920年2月2日，爱沙尼亚同俄国签訂了道帕特条約，在条約中，两国相互承认彼此新获得的地位。①

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人数不多，但是战斗性很强。1924年11月末，配合各国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爱沙尼亚政府突然襲击共产党本部，逮捕了好几百名共产党人。季諾維也夫的密友和秘书，米哈伊尔·柯别茨基是当时的苏俄駐累发尔大使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② 季諾維也夫对11月逮捕的反应是，决定把农业的爱沙尼亚和工业的列宁格勒合并。他同紅軍情报处长貝尔岑将軍达成协議，以此来抵制总书記日益增长的权力。他們一致认为，对付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是毋需經过长期准备的，由一小群人发动一次政变

① 昂利·德·尚崩：《爱沙尼亚共和国》，巴黎1936年版。

② 亚历山大·巴明：《虎口余生》，紐約1945年版，这本书詳尽地报导了柯别茨基的經历和他在清党中的結局。

就能决定它的命运。于是，在內战英雄齐博尔的領导下，一支由六十名紅軍軍官組成的队伍被送过了边界。①

12月1日，这群俄国軍官加上由他們武装起来的几百名爱沙尼亚共产党人，向若干政府建筑物同时发动进攻——这是通过攻占政权象征所在来夺取政权的标准方式。爱沙尼亚軍队以惊人的精力进行回击，把"起义"鎮压了下去，宣布实行戒严。俄国人越过边界撤回本国，有一百五十名共产党人在起义后二十四小时內就被处决。这些人当中有季諾維也夫的一个亲密合作者，維克多·金吉謝普，为了紀念爱沙尼亚的死难者，俄爱边境上的一坐小城亚姆堡改以他的名字命名。

此后，两国之間的关系依旧很疏远。十五个月后，一个前沙皇軍官帕德納在列宁格勒的一次审判中供认，爱沙尼亚間諜曾把紅軍的軍事秘密出卖給一个英国軍官弗兰克上校；这次审判的四十八名爱沙尼亚被告中，有十三名被处决。②

斯大林在俄国党內的支持者对爱沙尼亚事件拍手称快，认为这是季諾維也夫个人的失败，使他們的手上又多了一件武器，更便于把他从共产国际主席的位置上赶下来。这一时期，我到莫斯科去过好几次，在討論这一問题时，我总会听到一种弦外之音，这就是：俄国正在千方百計地調整它同世界各国的經济和外交关系，可不能再受共产国际这个烂摊子的連累了！

在保加利亚的最后一幕

共产国际的危机在保加利亚达到最高峰。

从贊科夫6月政变和共产党1923年9月暴动被鎮压以来，保

① 参看克里維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48頁。

② 参看《紐約时报》，1926年3月12日。

加利亚一直长期处于內訌状态之中。①贊科夫試图把参加政府的各党合幷在一个“民主联盟”(就和今天的“祖国陣綫”相似)之中，但是在他发动政变后五个月举行的选举中，竟有35%的选票为政府的反对党所获得。共产党继續在国民議会中具有席位，但它的組織活动則受到限制。

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在一种动蕩不安、充滿阴謀和反阴謀、恐怖和反恐怖的形势之下。数以千計的人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捕；許多人被暗杀。斯塔姆博利斯基反对派避居到南斯拉夫，在那里出版了他們的报紙《农民旗帜报》；他們經常越过边界向本国进行武装騷扰。馬其頓的民族主义团体“內馬其頓革命組織”(簡称IMRO)也同样活跃；他們在佩特里奇地区組織了一个国中之国。在政变已經过去一年零八天之后，內政部长居然还在国民議会中說出这样的話：“我走在索菲亚的街头，感到就像是在战时巡閱战壕一样。”②

共产国际通过季諾維也夫和季米特洛夫，企图为巴尔干指出

---

① 参看本书第347頁以下。

② 乔治·洛吉奥：《保加利亚》，曼彻斯特1936年版，第452頁。“內馬其頓革命組織”(IMRO)成立于1893年，是一个旨在使馬其頓获得独立的密謀团体。馬其頓位于瓦达河流域周圍，以薩洛尼卡为首府，是巴尔干半島的一个战略要点，对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維亚(或南斯拉夫)都非常重要。內馬其頓革命組織的旗帜是一方象征着压迫的黑布，上面横綉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个組織的經費来自对所有馬其頓人的普遍征税，它分为許多地方委員会，由它們选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恐怖行动由两三个人組成的别动队——称为“二人团”或“三人团”——执行。內馬其頓革命組織有代表在国外，不論是什么政治人物或組織，只要对促进馬其頓的独立感兴趣，他們都与之进行談判。在它的成員所进行的許多恐怖活动中，这一时期有三次重要的暗杀可以提一提。“1923年8月，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的內政部长雷科夫·达斯卡洛夫在布拉格被枪杀。1924年12月联邦派領袖彼得·乔列夫在米兰被暗害。1925年5月，一位年老的馬其頓总督托多尔·潘尼查在維也納的布格大剧院被一个青年妇女用手枪打得遍体彈孔。”見約瑟夫·魯契克：《巴尔干半島的政治風云》，紐約1939年版，第146頁。

一条摆脱这种閲墙之爭的出路。1924年春，在維也納召开的一次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議，拟訂了一个爭取成立巴尔干联邦的綱領，按照这一綱領，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馬其頓都将成为联邦中的自治单位。会議发表宣言，号召进步的欧洲工人和革命运动，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支持这些国家，帮助它們抵抗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帝国主义計划。1924年5月5日，巴尔干联邦的旗帜升上了天空，号召巴尔干的一切革命者都团結在它的周圍。

这份宣言的聳人听聞的一面是它宣布共产党人同內馬其頓革命組織結成了統一战綫。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好几个內馬其頓革命組織的眞正領袖，其中包括两个月后被暗杀的托多尔·亚历山德罗夫。在保加利亚，将不和索菲亚政府打任何交道。被压迫民族实行自决的綱領，将通过在巴尔干各国議会中同时采取行动来实現；但是在保加利亚国民議会中，馬其頓的六名議員仍将单独組成一个集团。

在倫敦以及在巴尔干所有国家的首都，人們对共产党和馬其頓民族主义分子的这种联合都惴惴不安地注視着。希腊独裁者潘加洛斯偸偸摸摸发动的一場小規模战事，加剧了这种联合所造成的紧張局势。他向保加利亚发动侵略，但是在国联的堅持下，終于又撤回軍队，并且賠偿他的軍队所造成的損失。

在許多次政治暗杀中，有一次造成了重大后果——保加利亚将軍和执政党主席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夫，于1925年4月14日在索菲亚为一个不知名的凶手所暗杀。两天以后，当人們正在圣日曜日教堂为他举行葬礼时，一枚定时炸彈突然爆炸，炸死了一群政府要人——十四名将軍、三名国民議会議員、索菲亚市的市长和警察总监——死者总数达一百二十八人。

保加利亚政府以反恐怖对付恐怖。它宣布戒严，实行宵禁，大

肆逮捕。调查工作秘密进行，但是查不出关于这次密謀的眞实綫索。有两名保加利亚軍官明可夫上尉和楊可夫上尉，被指控为安放炸弹的凶手，他們被捕时就被警察当場杀死。許多次要人物也統統被捕——教堂看門人彼得·扎德戈斯基、两个据說是窝藏了明可夫和楊可夫的人以及公开說这两个軍官完全无辜的犹太律师馬可·弗里德曼和后备役軍官高耶夫上校等等。沒有对公众发表詳实报告。有十人受到軍法审判；五人被判死刑，其中有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受到缺席审判。他的一个兄弟托多尔被捕后，在索菲亚监獄中被杀害；他的母亲和妹妹莉娜逃往俄国。有三人未經审判便被活活燒死。扎德戈斯基、弗里德曼和高耶夫被公开吊死，这一"飽人眼福的独特場面，吸引了四万名观众"。

"前部长彼得·雅涅夫和居里尔·巴甫洛夫同他們的几个朋友一道，在索菲亚警察总署熊熊的大火炉中被活活燒死。后备役軍官托帕尔吉科夫将軍和耶特切夫——他們曾在斯塔姆博利斯基手下服务——被解往庫斯坦第尔，从此下落不明。"①

据官方报导，这一期間举行了八十一次审判，牵涉到三千五百五十七人，其中三百人被处死，六百十一人被判徒刑。按照反对派的估計，则至少有五千人被杀或失踪。贊科夫承认，从 1923 年 6 月到 1925 年 4 月，有五名农民党部长、四十七名农民党和共产党議員和几百名教师被杀。这一极端恐怖时期为共产国际的行話增添了一个新名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那些反对俄国扩張进东欧的那些人，往往就受到要用"保加利亚手段"对付他們的威胁。但是，就連这种极端恐怖也沒有能平定当时的局势；农民掀起一系列暴动，同軍队发生过多次冲突。

① 約瑟夫·斯怀尔：《保加利亚的密謀》，1939 年倫敦版，第 199 頁。

索菲亚教堂中的定时炸彈，是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間恐怖主义風气的挑撥行动之一。英、法、德諸国的輿論矛头立即指向共产国际；人們认为季諾維也夫是阴謀家，是纵火犯，是扰乱世界安宁的密謀策划者；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同其他恐怖分子勾結在一起，打算以暴力来推翻資产阶級世界。

我們在德国党內深深为保加利亚事件所震惊，因此設法通过我們在莫斯科的代表探听消息，想弄明白共产国际机构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它果眞参与其事的話）。我們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巴尔干科科长迈耶尔·特里列塞那里得到一份官方报告，声明他本人以及季諾維也夫同炸彈阴謀都毫无干系。可是，这种官方的否认即使在共产国际內部也不太为人相信，在那里，經常風傳季諾維也夫确实是这次密謀的策划者，这个主意以及它的付諸实行都是当时籠罩着共产国际的惶惑和絕望情緒的产物。明可夫和楊可夫，“在企图脫逃时”被枪杀的两名上尉，都是地下共产党的党員。由于保加利亚在地理位置和語言上都接近俄国，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俄国党內危机的关系要比其他“外国人”密切得多，在列宁死后，大多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从俄国外部想办法才能避免一場大災难。在他們看来，上层領导——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之間的斗爭結局只能是反布尔什維克分子依靠耐普曼取得胜利。同維持党专政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領导人，非常热心于采取主动。究竟是誰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部指使索菲亚的代理人安放炸彈的，恐怕要成为千古疑案了。

保加利亚是适合国家政治保卫局进行活动的一块沃土。在按照恐怖主义团体“內馬其頓革命組織”的方式建立的巴尔干各国地下党內，在刀光血影的密謀迷雾之中，企图通过有組織地暗杀領导集团来解决巴尔干的难题，便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趋势。一个由

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联邦，要远比苏維埃化的爱沙尼亚更有助于俄国走出困境。索菲亚事件多半是各种恐怖主义党派的一次大聚会，这些党派在历来就盛行恐怖主义的巴尔干气氛中，竟相采取一个比一个更厉害的恐怖行动。

托洛茨基隐約提到这类事件的一番話，证实了以上的解釋。他譴責俄国官僚不該在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和"暴力"。

"沒有人要求苏維埃政府进行国际冒險，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企图以暴力硬性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相反，就官僚分子們过去作过的这类尝試(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广州等)而言，他們的所作所为只有利于反动力量。"①

直接暗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同索菲亚事件有关系的唯一文献，是别謝多夫斯基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叙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特工人員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遇害經过。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包括索菲亚教堂事件的內幕。一支契卡小队奉令执行他的死刑。由于雅罗斯拉夫斯基认为他的沉默已經为自己換得一定程度的安全，并不怎样注意躲藏，所以任务执行起来較为容易。他以前的一个朋友請他吃飯，用毒药結果了他。人們把他的尸体拍下照片，捺下他的指紋，然后把照片和指紋送到莫斯科，作为他已經被处死的证据。"②

另有一个名叫艾倫斯基的人——他同雅罗斯拉夫斯基一样，也是紅軍参謀部的軍官——也和这一事件有关。别謝多夫斯基继續說道，"正是他供应了炸药并且为恐怖主义襲击作出准备。在索

① 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紐約1937年版，第232頁。

② 格里戈雷·别謝多夫斯基:《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35頁。

菲亚教堂的暴行发生后，他便被召回莫斯科。”

据共产国际当时的官方文献說，索菲亚爆炸案是贊科夫政府本身組織的挑撥行动，以便为消灭反对派提供口实。由于贊科夫本人以及他的亲信幷不在被炸者之列，这种說法也博得了某些人的相信；但是，共产国际內部却沒有人眞正相信这种編給資产阶級听的神話，我們大家都肯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曾插足其中，但究竟是怎样参与和通过誰参与的，处于这架恐怖机器之外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季諾維也夫又一次丧失威信的这个机会。在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的过程中，他把地方支部一个接一个地爭取过来，直到反斯大林主义的重要中心消灭殆尽，只剩下了一个由季諾維也夫本人領导的列宁格勒支部。

第二十二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斯大林虽然在准备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間把大多数地方支部都爭取了过来，这一胜利并沒有使党就承认他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当时，他以一个新集团代言人的面目出現，这个集团要給党换上一个新的領导机构和一套新的政策。組成这个集团的有李可夫、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等这些著名的老布尔什維克，基洛夫、洛米納澤和日丹諾夫等这类有代表性的青年領袖，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除斯大林以外，就是尼古拉·布哈林。如果斯大林不曾把布哈林拉入他的集团，沒有同布哈林在政策問題上达成妥协，他就不能够把右派团結在自己的周圍。而对右派来說，斯大林則主要是一个組織家，是能够实行一种新的緩和政策的人。

布哈林的"新"新經济政策

促使布哈林也同斯大林結成联盟（即使只是暫时的）的原因，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早些时候这样做的动机部分相同——害怕托洛茨基会变成俄国的波拿巴。此外，他还害怕代表俄国无产阶級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会使得工农之間难以达成平衡。他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提出另一种解釋，建議創造一种寬和的、国家不干預农民經济的气氛。

像 1925 年时所有的俄国領袖一样，布哈林也认为俄国通过一次欧洲革命走出困境的道路已被堵塞，因此，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經来临。俄国的政策必須按照新的世界背景重新加以規定，而需

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便是农民的敌对情緒。新經济政策已經打破战时共产主义的束縛，但是市場并沒有开始自发地起作用。革命破坏了工业和农村之間的旧联系，新的联系一时又不容易建立起来。“在俄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沒有去过一个商人——不論是合作社的营业員或私商。只有铁路沿綫才有一些商业活动。直到最近为止，情况都是这样。”①

在国家商业机关同农民已經建立关系、并且在新經济政策时期继續維持这种关系的地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間日益悬殊的差距加剧了农村的不滿和反抗。一系列农民暴动在1924年的格鲁吉亚起事中达到高潮，这次起事比一年前流产的汉堡暴动更接近于內战規模。尽管1925年收成較好，党和农民之間的紧張状态仍有增无已。乡村中經常发生騷乱，許多党組織工作者和收稅員被暗杀。其任务在于向党报告农民不滿程度的所謂“农村通訊員”，时常只能間接地——通过他們本身的突然死亡②——报告情况。

从列宁认为俄国工农之間必須合作的观点出发，布哈林把它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主張使农民經济成为俄国經济进步的眞正中心。按照他的建議，国营經济将只限于在世界大战和內战后需要重建的重工业；而輕工业和商业則将在自由企业的条件下被給予最大限度的活动自由。这样，就能較快地生产出农村中迫切需要的商品，国营工业和农民之間的紧張关系就会有所緩和。由于工业品的供应改善，农民就会志願地而不是被迫地把他們的农产品

---

① 李可夫，轉引自弗里德里希·波洛克：《1917—1927年苏联的計划經济实驗》，来比錫1929年版，第143頁。

② 《宣誓》——歌頌斯大林为列宁继承人的1946年的一部苏联影片——的一开头，就是一个斯大林格勒的工人在1924年下乡为党做工作时被富农暗杀的場面。

拿到市場上来。“发財吧！”布哈林向农民說。①

只要采用現代化的农业生产方法，肥沃的俄国土地就能綽綽有余地养活数倍于它目前的人口。布哈林希望通过农民阶級上层的个人积极性来推进这种現代化。貧农和中农将通过合作社获得帮助，但是——布哈林强調說——不允許合作化妨碍个人农場的发展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将主要通过組織消費合作社来提高，这种合作社可以同农民的生产合作社直接交易，从而战胜新耐普曼抬高物价的投机活动。

布哈林的建議受到俄国許多社会阶层的欢迎。那些在內战中幸免于死幷被容納进苏維埃机关的知識分子——工程师、經济学家、技师等，也就是所謂的“旧专家”，对国營經济公开表示不滿。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諾維也夫曾抱怨过孟什維主义的“死灰复燃”。他說，在大学生和工程师中間，資产阶級的心理状态正在复活。工程师們在要求提高待遇时，把他們自己比作野牛——对这种稀有的野兽，連沙皇政府都知道要小心保护。对稀有的野兽尙且如此，为什么对稀有的技术人員就不好好照顾呢？他們討厌“旧专家”这个名詞，要求在苏維埃社会中同工人具有同等地位。这个集团的代言人之一烏斯特里雅洛夫教授，对布哈林的“新”新經济政策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要恢复正常的資本主义生产，只有重工业为国家所有这一点和国外的生产不同。他的一篇題为《路标轉换》的文章曾轰动一时。季諾維也夫在《时代哲学》一文中，对这种資本主义复辟論作了这样的答复：“工人阶級曾經在十月革命中为平等的理想战斗和流血。現在是把这种理想化为現

① 基佐也曾向法国农民提出过这一口号。在《共产党宣言》的头一段，他就被馬克思作为欧洲反动势力的象征之一提了出来。1885年，在一次經济蕭条剛結束之后，俾斯麦也曾說过同基佐的想法类似的話：“我多么希望德国有若干个百万富翁啊！”

实的时候了。”由于烏斯特里雅洛夫把布哈林的主張說得过于露骨，斯大林和布哈林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他加以駁斥。

布哈林的“新”新經济政策是一套广泛得多的新理論的国內部分，这种理論对国际革命失敗和資本主义世界稳定以后的形势作了重新估价。資本主义不仅已經从战后的衰落中恢复过来，达到战前水平，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业合理化、劳动分工和經营管理的新形式，加上更高阶段的壟断卡特尔化，使資本主义在政治上和經济上都得到“絕对的”加强，預示了一个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繁荣时期。这种轉变是走向一个全新局面的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正在逐步为壟断組織的更高形式所代替。这种新的壟断形式打破国家界限，构成了世界性的組織；从一国的規模来看——布哈林认为——它将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几乎同国家机器熔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布哈林指出——希法亭以及其他某些理論家的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即資本主义将能够通过壟断把相互竞爭的各国和平地联系在一个世界經济体系之中。与此相反，国家机器同經济壟断組織的熔合最終将使相互竞爭的国家經济之間加剧冲突。資本主义社会同非資本主义的俄国之間的矛盾、殖民地的动蕩不安、工业国中的阶級斗爭等等——这一切都将继續存在下去，使得和平发展最終成为不可能。但是在此以前，俄国同資本主义世界暂时休战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却应該成为制定俄国內外政策的出发点。①

① 布哈林是老布尔什維克学派的少数几个大經济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已大都被禁，很多都沒有英譯本。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整套理論，即世界大战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开始了一个政治和經济职能相熔合的过程，我們在这里只不过是提了几句；今天，結合从那时以来納粹和斯大林主义国家政权的发展情形来看，他的理論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布哈林的主要經济著作《过渡时期的經济》（汉堡 1922 年版），对若干同今

布哈林对当时俄国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关系的看法，同这一时期最激烈反对他的集团——“工人反对派”竟不謀而合。不过，他們的結論虽然一致，出发的前提却各不相同。工人反对派担心富农的发展会同时加剧乡村和城市中的阶級分化。如果实行布哈林的政策，富农就会靠牺牲貧农而大发其財，使貧农被迫流入城市，变成廉价劳动力。农村人口过剩，城市却无力吸收它的剩余人口；要摆脫困境，只有依靠外援。

“认为我們有可能通过賦稅挤出足够的資金来发展我国已經被摧殘殆尽的工业，那只能是以空虛的幻想来安慰我們自己。自夸我們能‘一文錢两文錢地’积累起这笔資本，只能是在旧幻想之上再加上新幻想……政府应該采取有力措施，通过向国外借款和发行国內公債，通过为取得貸款而作出比政府目前願意承担的損失和牺牲还要大的让步，来取得必要的資金。为了建設我們的工业而向国际資本作出巨大的物质牺牲，比起我們在今后几年中也許会淪落于其中的处境来，是两个禍害中較輕的一个。”①

以上就是梅德維捷夫在1924年写到巴庫——工人反对派的中心之一——去的一封信中說的話。翌年，巴庫派出一个携带着

天有关的問題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說明。从1929年起，布哈林便从来也沒有怀疑过俄国新政权的真实性质。他于1938年受审时，在他能够冲破国家檢察长維辛斯基精心編織的訊問之网的范圍以內，布哈林說明了一种同俄国的敌人——当时主要是德日两国——妥协，以便摧毁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壟断权力的理論。他供认自己甚至打算把苏联的部分領土，具体地說，把烏克兰、沿海各州和白俄罗斯割让給德国、日本和英国(对后者是間接割让)，如果那样做能够削弱斯大林独裁权力的話。“从心理上讲，我們，一度鼓吹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們，开始对我們那些龐大的、飞跃发展着的工厂感到不滿了，我們起先对它們只是聳聳肩膀，然后是諷刺挖苦，最后便怒火中燒，咬牙切齿，觉得它們好像是一些貪婪的巨怪，把所有的东西都吞食个精光，剝夺了广大群众的消費資料，象征着某种危險……”見《反苏維埃“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判記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381頁。

① 轉引自莫里斯·多布：《革命以来俄国的經济发展》，第298頁。

該市苏維埃旗帜的代表团来柏林，并且授予我巴庫苏維埃名誉委員的称号。就像俄德两国左派共产党人之間的一切联系一样，这种公开表示反抗的仪式使政治局更为不安。

正如这封巴庫信件所显示的那样，日积月累的不滿甚至使工厂工人——从理論上讲，他們是新国家的核心和主要支柱——都同党越来越疏远了。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居人口少数和处于孤立地位的工人阶級，对革命的結果大失所望，他們同国家机器疏远了，对国家党变得漠不关心。由于人們日益不滿，党在工厂中增加了压力，这又反过来使工人对党更加离心离德。經常要工人对党或党的許多分支組織之一捐献金錢，被視为对工人收入的額外征税，特别引起了不滿。实行計件工資制、更严格地規定"生产定額"、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待遇日益悬殊等等，标志着一个在今后十年中导致工資差别大过其他任何工业国的过程。偶尔爆发的反对这些状况的自然罢工，都遭到了无情的鎮压。

試行新經营方法的新的国营托辣斯，力图用加紧控制工人的办法来摆脱一切困难。在这一时期，工厂經理組織了一个团体，"紅色經理俱乐部"，宣傳进一步加强領导权限。当时，工业方法盛行，而他們所以成立这个曇花一現的組織，就是要試图引导当时的工业朝着有利于他們的方向变化。

工人的压力集团——工会——已經丧失其独立于国家管理机构之外的組織地位。工会領袖及其助手几乎全是党員；据莫洛托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1924和1925年，共产党員在区域工会委員会中的比例分别为95%和97%。不过，对工厂委員会的掌握却較为困难，委員中有半数以上是非党員，因为据莫洛托夫报告的这两年数字来看，党員只分别占46%和42%。① 党所

① 《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1月5日。在納粹国家党統治德国时期，也可以看

受到的孤立比以前增加了两三倍；它玩弄着手腕，而对国家漠不关心的工人阶級則沉默地、愠怒而带敌意地在一旁观望。

工人同农民以及工人同“新”新經济政策鼓吹者之間的矛盾，在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关于农民地位問題的論战中反映了出来。抛开其世界范圍的經济意义不談，布哈林的建議是对斯大林爭取控制权的派别支持。在他支持布哈林的农民政策时，斯大林表示了党官僚竭力要击敗工人阶級統治新国家願望的企图；最好是让党本身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相互冲突的各集团之間的仲裁人。季諾維也夫认識到，布哈林大力鼓吹的复返于农民經济，将使得主張无产阶級革命的共产国际失去容身之所；为了保卫已經在崩潰着的国际，他参与了一場关于“农民問題”的煩瑣冗长的爭論。季諾維也夫指出，加强农民上层和商人的經济地位，势必要使这些阶級的政治影响也相应增长。工人将被压倒，失去革命带給他們的一切有利地位。

正如在以前反对托洛茨基的斗爭中一样，斯大林煽动性地故意把爭論弄得尖銳化。他指責季諾維也夫实际上是要恢复战时共产主义，也就是說，恢复以恐怖手段控制农民的局面。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抗議对他們的观点的这种歪曲，可是徒劳无益；他們的綱領基础本来是这样的：貧农和工人之間的联盟应該继續保持，工人阶級居于統治地位对二者都有利。在过去几年中，季諾維也夫曾竭力寻求一种实現这一政策的政治途徑——例如成立农民国际。他援引了列宁就这两个阶級的关系所說的話：

到同样的現象。1936 年的工厂委員会选举，反映了对党的大力抵抗，因此，工厂委員会很快便被放棄，不再被視为一种操纵媒介了。1946 年的英国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在工会又一次被幷进了政府組織的时候，工厂代表委員会获得了重要地位。“一种显而易見和令人伤心的情况是：工人幷不願意追随他們那些屁股老貼着椅子的領袖；他們宁願服从大街上的工厂代表。”見《經济学家》，倫敦，1947 年 1 月 18 日。

"只要在10—20年內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圍內的胜利(甚至在无产阶級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則就会遭到20—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①

在加剧了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的爭論之后,斯大林又代表党官僚出面充当两派之間的客观仲裁人。他曾經利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他反对托洛茨基的矛头,現在,他又利用这两个人由此而丧失人心的处境来攻击他們本身。斯大林承认自己粗暴,但他指出,正是他本人保护了托洛茨基,使季諾維也夫打算开除托洛茨基的計划未能得逞。現在,他又不得不在这些革命无賴面前保护布哈林了。"你們要求处罰布哈林。請放心吧,我們是絕不会滿足你們这种要求的。"②

斯大林所以如此热烈地維护布哈林,部分是由于在斗爭的第一阶段,列宁夫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也是反对他的人。克魯普斯卡婭——当时我很熟悉她——是一个嫻淑女子的典范。列宁生前,她是他的忠实助手,但从不干涉党內事务,因此她本人在党內也沒有实权。在列宁临終前几年,当上层領导人剧烈爭夺继承地位的时候,列宁对她所談的知心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此,如果說有什么人知道列宁眞正希望哪一个領袖来继承他的話,那只有克魯普斯卡婭。各个派別都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列宁唯一的眞正继承者,因此也都急切地注視着羞怯的克魯普斯卡婭,希望从她嘴里打听出秘密。在1925年10月,克魯普斯卡婭曾經是反对派政綱上的四个签名者之一,同季諾維也夫、加

---

① 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引自列宁的論文《論粮食稅》。〔参看《〈論粮食稅〉一书綱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3頁。《〈論粮食稅〉一书綱要》和《論粮食稅》是两篇文章,原注有誤。——譯者〕

② 苏瓦林:《斯大林》,第378頁。苏瓦林的这本斯大林傳是比較詳細地談到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唯一著作。

米涅夫以及索柯里尼柯夫站在一起。可是，到两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会議上，她那胆怯的声音便被斯大林少壮集团的大合唱压下去了。她說：历史表明，偉大革命家的理想时常在他們去世后遭到歪曲，虽然他們的名字已被神化，他們的革命学說却被抛到了一边。这样小心翼翼地反对一下党的一般趋势，再加上謹愼地鼓励一番在代表会議上被击敗的季諾維也夫，便是她所能做到的一切了。

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嗎？

經过三次延期，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終于在1925年12月于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圍繞着两个主要問題：一，使工业同农业和小商业协調；二，改組党的領导集团。波波夫在他的官方历史中写道："这次大会是在我党許多年来的代表大会都未曾有过的紧張气氛中召开的。"①莫斯科的人心万分激动，既反映了全国的也反映了代表大会的紧張状态。从辽闊国土的四面八方，代表們像潮水一样涌来，異口同声地报告全国各地的形势都令人悲观。

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員会作报告，他所关心的是維持党在工业管理方面的壟断，以此作为它壟断政权的基础。他把列宁的話加以发揮，使党的旧术語适应于新环境；在代表大会上，他把国营企业說成是社会主义的实現，"按类型来說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②国营企业被认为是經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成分。"③因此，国营企业生产数字的任何增长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业統計成了极权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249頁。

②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頁。——譯者

③ 同上，第251—252頁。——譯者

主义宣傳的一部分。这种把国有工业和社会主义等同看待的說法，是斯大林建立他那套独創的和影响深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論的前提，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第一次充分說明了民族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国家和一党壟断的原則。

季諾維也夫答复說，难道社会主义所意味着的仅仅是工业国有化嗎？根据馬克思和列宁的一切标准，根据第一国际成立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准則来看，难道社会主义不是意味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根本改变嗎？国有工业同私人工业一样具有剝削性，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只有在制約着工人和党、工人和国家之間的关系的許多因素被改变以后，才能够廢除剝削。单是在今天的俄国，再沒有任何东西比社会主义更难以实現的了。如果把一切苏維埃制度的过渡状态、把我們的貧困和苦难都称做社会主义，那样一来，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它的吸引力和理論基础。

斯大林的駁斥是：現在，苏联和資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間已經确立了某种均势。一个“資产阶級世界”和“无产阶級世界”間的和平合作时期已經开始，两个世界之間現在已經有可能建立和平联系。資本主义已經摆脫它在战爭剛結束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混乱状态；衰落的年代結束了，“資产阶級的政治权力正在发展”。① 不过，这种政权的中心已經从欧洲移到美国，欧洲資本主义只是以在財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才换得它的稳定的。

“从前，主要的剝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現在世界上的主要財政剝削者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②

---

① 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9頁)相应部分，譯文是“資产阶級政权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与此句稍有不同。——譯者

② 参閱上引书，第223頁。——譯者

斯大林尽可能地利用了人們普遍要求共产国际改变政策的情緒。

“夺取政权的問題，不論是今天或明天，都不在日程之上……我們必須探索无产阶級运动的新形式、群众运动的新形式、工会統一的形式。”①

不过，在认为共产国际革命已經毫无前景的同时，斯大林幷沒有放棄德国会对西方进行“革命”民族战爭的可能性。

“道威斯計划加强了剝削，孕育着不可避免的革命……德国必須付出一千三百亿金馬克，而它也决不会接受目前的边界和殖民地的丧失。如果认为正在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現奇迹。”

斯大林在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来修飾这一論点，他列举了俄德两国历史上陈年古代的各种和約，证明它們都沒有能生效。德国所以在他的演說中占据这样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当时正在就1926年两国政府签訂的柏林条約进行談判。

斯大林警告說，欧洲有发生一場新战爭的危險，这場战爭不会是别的，而只会是“西方列强”对苏联的另一次干涉。

“罗迦諾公約孕育着欧洲的新战爭……罗迦諾公約是一个为新战爭配置力量而不是为了和平的条約……英国保守党人旣想用保持‘現状’的办法来对付德国，又想利用德国来对付苏联。他們不是太貪得无饜了嗎？”②

不过，关于苏联在亚洲的政策，斯大林提出的主張是非常謹愼的。眞理和正义“完全在”③中国革命方面，但是某些西方人所說

① 上引书相应部分文字上和这里頗有出入。此处系按原文翻譯，以下引文如未注明直接引自《斯大林全集》，情况同此，不再加注。——譯者

② 除中間一句外，譯文均用上引书第227頁。——譯者

③ 同上，第243頁。——譯者

的俄国因此就要对日本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那却是完全看錯了。与此相反，“我国只有同日本接近”来反对美国“才有好处”。①

“現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吸引中心：各資产阶級政府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傾向于苏联。”②

欧洲还沒有完全成为英美的殖民地，欧洲各国还在剝削着它們自己的殖民地。可是，形势却正在朝着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局面发展，因此“我們現在必須指望欧洲工人阶級的左傾”。

对于欧洲的这种左傾，应該以俄国的混合經济来配合。共产党应該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农身上，放在热心于改善自己的处境、从而也会改善全国农业的农民身上；党应該“使貧农摆脫战时共产主义的心理”。

“貧农……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領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应当使他們学习同富农作斗爭，但不是用請求国家政治保卫局帮助的方法进行斗爭，而是用政治斗爭的方法，用有組織的斗爭方法进行斗爭。”③

反对派夸大了富农和其他資本主义分子——耐普曼在农村中的作用，他們在这些分子面前張惶失措。列宁格勒要求挑起农村中的阶級斗爭，要求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因而就是要在我国宣布国內战爭”。④

这样一种国內战爭——斯大林継續說——将破坏我們迄今已

① 同上，第243頁。——譯者

② 参閱上引书，第233頁。——譯者

③ 参閱上引书，第275—276頁。——譯者

④ 同上，第278頁。

經完成的全部建設工作，将同列宁的合作社計划背道而馳，違反必須把农民經济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設体系中的列宁主义的一般立場。通过这样地鼓吹溫和政策和大力反对极端主义，斯大林得以把党內外和国內外一切希望在国外保持和平、在国內循序漸进的分子都团結到了自己的周圍。

人們在幻想烏斯特里雅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資产阶級专家会因为政策改变而兴高采烈——幻想我們是不禁止的。但是，他以及他那一类人如果不"为我們布尔什維克效力"①，那就会大倒其楣。

斯大林接着說，列宁格勒反对派拾托洛茨基以及在他以前的工人反对派的牙慧，說什么党正在丧失它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級性。这种哀叫党正在蜕化的悲号——斯大林叫嚷道——是吓不倒任何人的。"我們党沒有蜕化，并且一定不会蜕化。它不是由那种会使它蜕化的材料組成的。"② 党剛剛印行了一版《列宁选集》，如果党的干部讀一讀这些著作，单是这一点就将使他們不会蜕化。"哀叫党正在蜕化的悲号是吓不倒任何人的。不管有人怎样叫囂……"③

反对派曾建議党根本改变它的阶級基础，把俄国工人全部組織到党內，从而把党从蜕化的道路上拉回来。反对派指出，俄国党从来也不是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工人的群众性政党，特别不是西方的模范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体現的那种組織。反对派建議在短期內把俄国工人的90%吸收入党——这个計划被斯大林称为痴人說梦。斯大林以雇用二十人和二十人以上的工厂为产业单位，举出下列数字：

① 同上，第283頁。——譯者
② 同上，第282頁。——譯者
③ 参閱上引书，第283頁。——譯者

	产业工人总数	产业工人党員人数	%
1924年7月1日以前	5,500,000	390,000	7
1925年7月1日以前	6,500,000	534,000	8
1925年10月1日以前	7,000,000	570,000	8

把这七百万产业工人的90%都吸收入党，就会把党淹沒；布尔什維克优秀分子就会失去他們的中心地位。(这正是工人反对派的目的，他們希望用这种办法来遏制党的蜕化，資产阶級化和官僚主义化。)同时，斯大林指出，在这8%的产业工人党員中，只有5%是在大工厂中工作，而且，就連这个数字也是通过把共产党員調进大工厂人为地凑成的。

按照1925年11月1日、也就是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的統計，党員和預备党員总数为一百零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58.6%是工人成分，余下的党員有23.8%是农民，17.6%是职員。因此，斯大林重申，使党无产阶級化而不丧失政权是不可能的。

他然后比較了有关俄国农民的数字：

	农民总数 (18—60岁)	农民党員人数	%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	53,000,000	136,000	0.26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	54,000,000	202,000	0.37

斯大林举出这些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为的是强調农民在党內所占比例的微不足道，强調国家党完全脫离了俄国人口中的农民基础。①

---

① 在1926年，俄国只有两座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和一座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当时最大的无产阶級中心的人口和相应的最大党支部的党員人数，如下表所示：

	人口 (1926)	党員数 (1927)
1. 莫斯科	2,025,947	91,647
2. 列宁格勒	1,614,008	82,245
3. 基輔	513,789	10,838
4. 巴庫	452,789	18,976

在結論中，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对于党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它已經被完全粉碎。党在击敗列宁格勒反对派过程中，也将表現出同样成熟和自主的力量。比照幕后的秘密操纵来看，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一声明是非常有趣的。

季諾維也夫代表列宁格勒反对派，为他自己和加米涅夫提出了一份少数派报告；从工会問題曾經使党发生分裂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还从来不曾出現过少数派作报告的事。1923 年以来反对托洛茨基的斗爭，只是在政治局团結一致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的。促成这种团結的，是对托洛茨基的力量和野心的共同恐惧，但是党員們却以为这是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三人集团”被說成像一个人，几乎就同宗教上神秘的三位一体論一样。因为受人崇敬的俄国領袖仍然是列宁，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学生安全地領导俄国，但是，他們只有在保持团結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出于这种恐惧而創造出来的領导人团結一致的神話，是一种政治权变的产物；政治局对外发言时就像一个人一样，至于它是怎样通过辯論作出决定的，则不准对党員有絲毫暗示。因此，完全抛开季諾維也夫报

5. 敖德薩	420,888	9,250
6. 哈尔科夫	417,186	16,179
7. 塔什干	323,613	7,865
8. 罗斯托夫	308,284	10,183
9. 梯比利斯	292,973	9,098
10. 第聶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233,001	9,735
11. 下諾夫哥罗德	230,428	9,796
12. 薩拉托夫	215,369	7,173
13. 图拉	152,677	7,011
14. 斯大林格勒	148,370	5,648
15. 斯維尔德洛夫斯克	136,404	5,319
16. 伊凡諾夫-沃兹涅先斯克	111,443	5,669
17. 彼尔姆	84,815	8,885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11 卷，第 534 頁。)

告的內容不談，单是他提出少数派报告这一事实本身，便使代表們产生了不安的心情。当时的处境是困难的，即使是一个团結的、永不会犯錯誤的領导，要想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容易事，如果領导人之間一旦分裂，如果列宁的继承人之間竟开始內訌，那岂不是……

季諾維也夫首先說明，政治局內部发生分歧是在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說，在列宁刚去世后就发生了。他接着廓清了斯大林所强調的那些旨在迷人耳目的枝节問題。他說，問題的关鍵不在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使代表大会多数派和少数派分裂的，并不是富农問題，也不是俄国的工业化問題。在怎样对待农民才算适宜的問題上，两派之間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并沒有根本性的分歧。反对派更加强調有必要帮助貧农重新立定足跟，在购买农具方面給予他們以国家援助，支持他們組織合作社的願望；因为工人的国家党如果不給予这种帮助，貧农就会越过越穷。但是——季諾維也夫特別声明——少数派并沒有建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那套方法，从而在农村中重新发动內战，也沒有建議以暴力把落后的农民經济社会主义化。他向这些誣蔑展开了猛烈斗爭，指出斯大林提出这些东西来只是为了模糊問題。步托洛茨基的后尘，季諾維也夫也要求党更多地致力于把俄国工业化的中心任务。托洛茨基的綱領曾被称为“超工业化”，斯大林害怕强調工业化会危及他正在向农民上层寻求的支持。

然后，季諾維也夫談到了主要問題，把代表大会分成两个不可調和的对立集团的問題。中心問題是党和工人之間、国有工业和工人阶級之間的关系。单是国有化并不足以表明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只是几个有关因素之一，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工人和企业管理机构間关系的变化。一种国有化的或部分国有化的

工业，可以大致原封不动地并入标准的資本主义經济中去。决定国有化經济性质的，是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是工人阶級能不能在对国有化經济的控制中居于关鍵地位。如果在阶級結构方面沒有发生根本变化，单是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而只等于国家資本主义。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的剝削仍在继續，甚至可能更厉害。

季諾維也夫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布尔什維克历史上第一次使这个問題——国有工业的性质这一現代問題——成为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議題。在維护这种立場时，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必須与之作斗爭的不仅有斯大林（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一国建成的論点，作为他夺取独裁权力的理論前提），也有对斯大林并不热心（在这个問題上）的盟友布哈林。布哈林的补充理論是：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将像"蝸牛那样慢步前进"。（后来，在社会主义已被官方宣布以后，布哈林的这句話竟被用来证明他是反革命！）

季諾維也夫說，如果俄国的生产方式仍然具有剝削性，那么，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也就要随着改变。像俄国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級在国家中的地位、工人党的作用等問題，基本上都是以国有化工业是否等于社会主义这个問題为轉移的。在一种剝削无产阶級的經济制度下，是談不到无产阶級专政的。如果沒有无产阶級专政，也就談不到无产阶級委托党来专政。但是，当时的俄国又确实存在着一种斯大林正在加强的专政，因此，如果它不是无产阶級专政，它就是某种别的专政。

苏俄經济学家拉林猛烈抨击了这种推理方式：

"反对派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想法，具有許多重要的实踐意义。假如由于我們的技术落后——也就是說，由于我国的小資产

阶級性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便把一切都押在国际革命上，那岂不是比 1923 年反对派的想法还要糟得多嗎？”

拉林也强調說，对这个中心問題——俄国是不是国家資本主义性质——的回答决定着党的一切政策。

季諾維也夫为了向工人阶級呼吁，把“新反对派”同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新經济政策代表大会）上的工会反对派联系起来。当时，布哈林（他对国家資本主义的看法时常自相矛盾）同列宁的意見分歧，在关于新經济政策的斗爭中重新表現出来，而那次斗爭所圍繞的中心，也是国家和工人之間的关系問題。

季諾維也夫援引了列宁說明俄国五种經济形式的一段話：

“看来，还沒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經济問題的人否认过这种經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沒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維埃政权有决心实現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現在的經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末过渡这个詞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經济上是不是說，在这制度內旣有資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慮到：俄国現有各种經济結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問題的全部关鍵就在这里。

現在我們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經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的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資本主义；

（4）国家資本主义；

（5）社会主义。”①

① 《論粮食稅》。《列宁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20—321 頁。——譯者

向外国資本主义让步是国家資本主义的一方面，但幷不是唯一的方面。国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幷沒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据列宁說，国家資本主义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如果同时发生了若干比較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話。

季諾維也夫觉得列宁的这段話給予他的支持还不够有力，于是又引用了他的《論合作制》一文为自己撑腰：

“你們觉得，生产資料屬于工人阶級，国家政权也屬于这工人阶級，这样的**制度**〔注意**制度**两个字——季諾維也夫插入这样一句〕就不能叫作国家資本主义。但你們沒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資本主义’这个名称是为了确定我們現在的立場同我在与所謂左派共产主义者論战时的立場之間的历史上的联系。那时我就指出，国家資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时的經济制度；我很重視确定普通的国家資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讀者认識新經济政策时所說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資本主义之間的继承性的联系。”①

季諾維也夫强調說，因此，工人党在資本主义經济中的任务同工人反对国家資本主义剝削的政策之間，是存在着一种“继承性的联系”的。必須探求出使俄国工人不致为俄国国有工业所剝削的新道路。必須让工人阶級有可能組織起来反对国家剝削者。它的独立已經丧失，必須把这种独立爭取回来。

两派都連篇累牘地引证列宁的話来維护自己的观点。在新經济政策已經实行的 1921 年以后，列宁有好几次談到苏維埃經济的性质，但是这些話从来也沒有发展成对俄国新傾向的一种完整連貫的分析。引证这些偶然地、几乎是随便发表的言論，完全是一种学究作風，因为这些話幷沒有被列宁透彻說明，人們自然可以对它

① 参看《論合作制》。《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27 頁。——譯者

們作各式各样的解釋。

如果斯大林的中央接受季諾維也夫对国家資本主义的这种解釋，那么，它所主張的独攬大权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級的唯一代表这一理論就会被动搖。如果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独攬大权的国家党就是工人政党，专政国家也就同工人国家是一个东西了。

季諾維也夫在結束发言时，概括地提出了反对派要求立即实現的下列各点：

(1) 同“紅色教授”們的修正主义理論作斗爭。

(2) 同在国家資本主义問題上修正列宁主义的做法作斗爭……

(5) 发揚党内民主。

(6) 停止对列宁格勒党組織的攻击。

(7) 向已經被开除或疏远的一切反对派集团和流派表示，俄国党和共产国际願意同它們合作。〔場内嘩然，喊声：“重說一遍！”“重說一遍！”〕

(8) 保卫提名和选举党的工作人員时所遵循的原則。

(9) 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員会第一次会議上，重新估价設置总书記一职的問題。

随着这一綱領的提出，反对派便从学究式地解釋和引证列宁著作的空談上，一轉而为直接攻击給予斯大林以无限权力的方案。一旦眞正的問題这样摊开以后，爭論的激烈程度和势不两立的情緒就一步深似一步。斯大林在为这場斗爭作准备时，曾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除党以外的两支最重要的苏維埃力量——軍队和工会領导机关的支持。可是，尽管他进行了周密的操纵，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还是在危乎其危的情况下才夺得大权的，这反映在两个軍队最高代表的分裂上。

继托洛茨基之后担任軍队首脑的伏龙芝，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去世了；他曾經支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过斯大林，許多代表都相信他遭到了一种新方式的暗害。伏龙芝的身体很不好，于是党命令他去做一次手术，医治一下他的消化系統；他在手术台上的死亡是对反对派的一个最重大的打击。①在他死后，斯大林委派伏罗希洛夫继任他的职务，但斯大林的力量还沒有强大到足以把季諾維也夫的支持者拉謝維奇排除，仍然得让他在軍事人民委員会坐第二把交椅。这样，党的領导集团的分裂在軍队的最高指揮部中也反映了出来，这一事实更加重了普遍的不安。

“反对派〔伏罗希洛夫說〕打算完全改变政治局和书記处之間的关系，但是反对派幷不理解书記处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书記处幷沒有决定党的政策。……我根本不懂你們在政治局的集体領导問題上說的那些廢話。我們連政治局的指导也不需要。整个中央委員会将領导我們的党。”

反对派进行了大力掙扎。

“加米涅夫：……我們反对創造一种‘領袖’論；我們反对硬推出一个‘領袖’来。我們反对总书記集政治和組織权力于一身，站在整个党之上。我們主張制訂出这样一种党章，它将把各个最高机构的全部权力都交給政治局，政治局由党的所有政治領导人組成，同时指定书記处負責从技术上执行該局的决定。〔鼓掌〕……目

---

① 当时，鮑里斯·皮尔尼亚克在莫斯科的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說，它的神秘的标題是《永不黯淡的明月》，副标題是《一位司令官被暗杀的故事》。小說的內容如下：一个国家被三个人統治着，在他們当中，一个是軍事領袖，两个是政治領袖。其中的一个政治家强迫軍事領袖动一次手术，虽然医生和他本人都表示反对，因为他心里有許多奇異而可怕的預感。当斯大林下令沒收这一期杂志幷对杂志編輯采取行动的时候，这篇小說引起的轰动达到高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那几个月里，我正在莫斯科，从許多同志那里听到了他們对伏龙芝的死亡感到的怀疑。参看苏瓦林：《斯大林》，第371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8頁。

前，书記处兼具政治和組織工作两方面的职責，事实上成了政治决策机构，我們不能认为这种状况继續下去对党是有利的或正常的。

……我現在已經看出，斯大林同志并不能胜任統一布尔什維克总参謀部的工作。〔喊声：这是說謊！胡說八道！你想的可好！現在摊牌了！代表們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欢呼。喊声：看看吧，党就是这样統一的，布尔什維克总参謀部一定要統一！〕

叶夫多基莫夫〔从座位上喊道〕：我国共产党万岁！烏啦！烏啦！〔代表們再次起立，高呼：烏啦！热烈的长时間的鼓掌。〕我們党的中央委員会万岁！〔代表們高呼：烏啦！〕党高于一切！〔鼓掌声和高呼烏啦声。〕

許多声音：斯大林同志万岁！〔热烈的、长时間的鼓掌。喊声：烏啦！〕”

由于支持布哈林的政策而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托姆斯基，继加米涅夫之后起立发言，他在駁斥加米涅夫的同时，对斯大林发出了一个間接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警告：

“加米涅夫想把目前的状况說成这样，好像斯大林正在走向专制統治，好像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員也都支持他的这一企图，这种說法是同样可笑的。政治局內部現在实行着眞正的集体領导，专制領导制度是絕不会被接受的。这种制度不能够也絕不会存在。”

据代表大会的議事录記載，托姆斯基的話博得了“暴風雨般的长时間鼓掌”，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明白了一点：尽管他已經获得多数，斗爭还沒有結束。他为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周密的准备。他組織了討論——給反对派臉上抹黑的运动：在一百五十个要求发言的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只充当了单調地显示力量的工具，他們重复着攻击反对派的相同論点，重新肯定、重新申述和重新說明一切。斯大林使托洛茨基不得不保持沉默，并且把布哈林爭取了过来。

他安排了一次力量檢閱，他的拥护者中包括所有苏維埃机关的重要代表，这給那些带着动搖情緒来开会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这些周密的准备都取得了成果：他作为党的总书記的地位被肯定下来。但是斗爭幷沒有結束；甚至在他自己的拥护者当中也存在着不滿情緒的事实給了他一个警告，使斯大林了解到：在他进一步采取行动以前，还需要另一个进行多方面活动的准备时期。因此，在致閉幕詞时，他又披上了一件民主的长袍，以一个眞正的民主派和另一个民主派談心的姿态向欧洲工人阶級讲話。他說，全体工人阶級的团結要比党內的一些章則更为宝貴，工人阶級的团結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中具有最高的价值。

"到我們这里来的外国工人越来越多，他們不仅是以朋友或兄弟的身分来的，而且眞正是欧洲工人阶級派来的监督代表。他們在我国各处自由旅行，我們請他們参观我們的工厂和机关，我們在让他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幷不把他們当作我們要对之进行教育的好奇的学究，而是向他們汇报我們的成就和缺点。苏联是欧洲工人阶級的財产，他們有权对它进行干預。因此，我們希望在一旦发生資本主义干涉的时候，欧洲工人阶級会出面保卫苏联，我們也相信他們会这样做。到我們这里来过的已經有一千五百五十个代表团，还有十六个代表团不久也要来。"①

党代表大会在 459 票对 65 票和 41 票棄权的情况下接受了斯大林-布哈林政綱。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間关于我个人的插曲

我就是被邀請到莫斯科来的欧洲工人阶級"监督代表"之一，

① 《斯大林全集》有关部分未見此段。"代表和参观者"的数目是五百五十个而不是一千五百五十个（見第 7 卷，第 237 頁）。——譯者

可是不应該忘記，邀我来实际是为了把我这个人弄出德国。当时我住在路克斯飯店里，处于一种被軟禁的状态。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作为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正式选出的主席团委員，我有权列席和参加任何一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欧洲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党內經常有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員光临，他們参加党的一切集会，出席政治局、組織局和书記处的一切会議。这些来自世界組織的非正式的代表沒有投票权，但是，在大多数場合下，他們所表示的意見本身就足以影响政治的和組織方面的决定。在德国，甚至对于党及其附屬机构的技术性組織工作和財政問題的細微末节，他們都研究到了。①

不过，俄国党对它自己却从来也沒有应用过这条章程。俄国政治局只有在举行一些特殊会議、議程只限于和俄国內部无关的問題时，才偶尔邀請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如果在外国人面前辯論俄国問題，則总是一种做样子的討論，它們是事先安排好的专門为解釋和維护某种特殊观点而展开的說教。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全党比較大的会議，特别是党代表大会，却一直容許大批外国共产党人列席。这是一种沒有害处的礼貌表示，因为关于重大問題的眞正决定，总是在大会召开前的政治局秘密会議上早已作出了。不过这一次，俄国的政治領袖們却沒有能在政治局內部达成妥协，不得不在代表大会的公开讲坛上为他們的立場进行斗爭。

我要求得到一張大会旁听证，并且写信給斯大林书記处三番五次地提出这一要求。我有权列席代表大会和参加辯論这一点是

① 不过，只有由选举产生的主席团委員才拥有这些特权；在这一时期，德国党拒絕了多次向他們提出的一个建議，即邀請共产国际的技术专家参加德共政治局的会議。有两个这样的专家格罗尔曼和伊德松，他們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干部，1924 年在柏林住了好几个月，竭力想干涉德共中央的政治生活，但始終未能得逞。

无可怀疑的。我不仅是一个拥有上述特权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員，而且是德共柏林支部派来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德国問題”——在这一次，也就是对我和馬斯洛夫展开的誣蔑运动——是共产国际报告的一部分。具有十足諷刺意味的是，把我召到莫斯科来的表面理由，正是需要我亲自参加討論，以便澄清在德国政治問題上的分歧。斯大林不敢冒險让我参加代表大会，表明了他的沒有把握；我在大会上将沒有投票权，但是我的出席也許会使列宁格勒反对派多得到几票。不过，斯大林对欧洲工人阶級“监督代表”的欢迎，这一次可是应用到了克拉拉·蔡特金身上，她向代表大会所致的賀辞是：“你們正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向前迈进，你們是一支具有高度紀律的、不可粉碎的鋼铁般的队伍，你們一定会領导全世界无产阶級取得胜利。”

我虽然不能亲身参加代表大会，却能从两方面得到詳尽的消息。富有特征性的是，斯大林虽然对我大肆誣蔑，并且剝夺我在代表大会的公开讲坛上作答复的机会，他却又力图把我爭取过去。他派了許多私人說客来見我，匈牙利党的領袖貝拉·庫恩也是其中之一，他那不同于别人的粗魯而直率的态度，倒是改变了一下我周圍的气氛，几乎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在此以前，庫恩一直是給季諾維也夫捧場的，他称贊季諾維也夫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組織者”，現在，他已經轉到斯大林的陣营中，在莫斯科，流傳着几十个关于他不擇手段地为自己的新主子拉攏共产国际干部的軼事。在代表大会举行期間，他对我作了几次礼节上的訪問，向我談一些最新的消息；在快要举行反对季諾維也夫的决定性投票以前，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議。建議所圍繞的中心，是馬斯洛夫在来比錫法庭受审时的表現問題——代表大会有一项还沒有通过的决議，对他的表現作了指責。

“事情很好办，路特；我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你可以回德国去，依旧在德国党內担任原来的职务。我們不需要你对俄国問題发表长篇政治声明。我們所要的只是一两行反对馬斯洛夫的話。不要嚷，沒有人要你重复党对他的指責。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和就事論事地表示态度。你只要集中談一个問題：你不同意馬斯洛夫在法庭上的行徑，认为他不該对資产阶級听众談論党內事务。这种表示并不会使你受任何政治义务的束縛，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只要你肯这样做，斯大林和我就会同德共中央把一切都安排好，到时候你便会看到事情办得是多么出色了。”

这种旣威胁又利誘的方法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方面，他們答应給我一份党內的美缺；另一方面，通过意識形态上的党內恐怖和国家强制措施双管齐下，他們使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不安全，这样，党內的那份美缺也就会显得越来越誘人了。

在我9月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共产国际书記处按照慣例收去了我的护照，这样我便无法回国。我一再要求让我回柏林。对我的一再拒絕是違背共产国际章程的，因为我并沒有被免职。这种强制措施在当时还是很少采取的。但是，他們虽然不願意我在柏林，却也不願意我留在莫斯科；于是，便有許多医生接二連三地来檢查我的健康状况，異口同声地建議我到高加索的基斯洛沃次克疗养院去住一段时期。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书記处花費很长时間討論了这些建議，最后給我送来一份盖着鮮艳夺目的共产国际大印的通知书，以共产国际紀律的名义命令我立即到高加索去休养（这份奇怪的文件一直保存在我手里，直到1933年3月我在柏林的住所被盖世太保襲击时为止）。

除去庫恩以及像他这一类人以外，还有一个来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表伴随着我，这是一个叫鮑格里宾斯基同志的人，他以各

种借口每天早晚来看我，向我报告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并且探听我对反对派的政綱和前途的看法，而在日間，他則同傳达室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一起监視我的活动和来訪者。这种安排又一次使我认識到多数派地位是不稳定的，它意識到俄国工人对党专政的深刻不滿，因此才疑神疑鬼，处处設防。鮑格里宾斯基对托洛茨基特别感兴趣，当时，托洛茨基作为中央委員出席了大会，但是沒有参加辯論。两个集团都害怕他——他們曾經联合起来反对他——現在，两方面都希望把他爭取过去；在动摇不定的地方代表当中，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鮑格里宾斯基每天評論說，托洛茨基今天臉色好，或者臉色不好；他同这个人或那个人讲了話。"我今天在走廊里看見了托洛茨基。他在同一些代表讲話，我听到了一点談話内容。他沒有談到重大問题。他沒有表示支持反对派，在这方面連一点暗示也沒有。这可太棒啦！那些列宁格勒来的家伙們可要挨一通好打了！"

鮑格里宾斯基才三十来岁，是一个典型的新官僚。他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苏維埃国家政权，希望国家官吏能得到更多的特权。在他看来，斯大林体現了一种以俄国内外部稳定为基础的正确政策。他对那些妨碍实行新方針的老一代的憎恨是眞实而强烈的，因为除去他們的政策不正确而外，他們还妨碍了像他这样的晚生后輩升上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

从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奠定的基础出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便逐漸变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宗教，一切反对它的異端邪說都不容許存在。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以后写道：

"……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設能够获得胜利是'新反对派'的基本錯誤，因为'新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錯誤都是从这个錯誤产生的；……在新經济政策、国家資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无

产阶級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作用、对富农斗爭的方法、中农的作用和比重等等問題方面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是从反对派的基本錯誤、从不相信可能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产生的。……

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徹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錯誤，斥責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爭的道路，給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設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級。”①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重点是我加的。〔参看《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4—75、87—88頁。——譯者〕

第五部分　国家党建成

第二十三章　德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季諾維也夫对共产国际这个机构的控制，便只剩下了一个空名。在共产国际面临的无数問題中，斯大林专門致力于处理德国問題。曼努伊里斯基已經搜罗到大量情报資料，对台尔曼集团和整个德国党內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携带着一批专家再次在柏林設下总部，继續以高明的俄国技术来改善德国党粗糙的工作方法。作为一个从共产国际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公正仲裁人，曼努伊里斯基能够操纵左右两派的大小集团，对每一个派别都許下給予支持的諾言，挑撥他們互相爭斗，向一切反对派分子提出，如果他們不采取“反布尔什維克”的立場，并且及时悔过，就可以获得政治大赦。在他的手下，是稳可以享受到党內民主权利的；共产国际不仅准許人們批評德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准許对台尔曼領导集团进行最尖銳的攻击，只要人們能遵守下列两項条件：第一，不得提到俄国問題，德国同志不得“干涉”俄国党內危机；第二，不得批評苏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紅軍同国防軍之間的联系。

曼努伊里斯基借用党內民主的名义，使德共分裂成了許多集团；一个分崩离析的党是更便于操纵的。成十种的不同政綱被提到下层党員面前，鼓励他們对之进行研究，虽然这些政綱在德国問

题上并沒有多大实际分歧；地方組織被强迫听取和討論关于这十种观点的报告。而建立联盟——也就是說，在抵制斯大林政策这一主要問題上立場一致的反对派集团提出联合政綱——則遭到禁止。借助于这种挑撥战略，借助于阻撓抗俄派力量的任何团結，莫斯科打算首先粉碎各种反对派傾向，然后以一种使它完全为自己所控制的方式来改組德国党。通过以工厂党小組为工具来改变党的結构，它的这一目的終于实現。

烏布利希-皮克系統

如何改建德国党的方案，是在1925年3月和1926年2月举行于莫斯科的两次特殊組織会議上作出的。① 与会者包括保尔·梅尔克尔、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意大利的維奥拉·布里亚柯和莫斯科各工厂的代表。会議非常詳細地說明了共产党組織的新形式。譬如說，会議估計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共产党小組在一座两三千人的工厂中可以起多大作用的問題。会上并提出若干示范性工厂报告，这些报告都竭力以俄国工厂的工作报告为模仿对象。列宁格勒和普梯洛夫工厂和克虏伯工厂党組建立了通信关系。

这两次会議上的德共中心人物是瓦尔特·烏布利希。烏布利希——他在党內所用的名字一直叫蔡果——是一个搞党組活动起家的人。在1923年，他是一个来自图林吉亚的沒有色彩的党組織工作者，所謂“中派”集团的一員。他从如何能最有效地瓦解左派組織的角度出发，对党的組織結构进行了研究，斯大林很早便看中了他，认为他是一个擅长做这項工作的人。他在共产国际內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的領导下工作，逐漸发展了一套把党組織分

① 見《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第655頁以下。

化为易于控制的許多小組的技术。到举行两次莫斯科会議的时候，他已經变成一位专家。①“由于工业无产阶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他写道，“因此，党小組是我們党的組織基础。”②“皮克系統”也是烏布利希系統。这两个受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揮的人共同行动，把德国党組織完全打碎，改組成斯大林主义的干部体系。德国共产党只有通过这种打碎和改組，才能够布尔什維克化。

共产党的組織是从内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党員中几乎有95%是工人。德国左派知識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識分子，他們在德皇統治下被禁止在政府中任职）一般都更喜欢加入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些党能使他們获得更多的做官机会。通过一次澄清了一切重大問題的翻天复地的革命，一个使他們从此对一切党官僚都失去任何信任的过程，下层共产党員脫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强大組織和傳統。后来，納粹在兴起过程中便利用了这种蔑視官僚的情緒——在德国共产党人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在一般德国工人中也有所发展，不过程度較輕而已——掀起过所謂反对“大亨”的运动。

当时，共产党人对他們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看得很

---

①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有一大批德国共产党人被派到那里，烏布利希是其中之一，他在那里組織了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德国分部。他的本部設在阿尔瓦塞特，在那里，他亲自領导了审查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托派分子”的工作。許多德国的这类反对派分子备受折磨，遭到像后来盖世太保施行的那种酷刑，就是由他一手造成的。有一段时期，他們在沒有窗戶的牢房里被关了好多天，吃不到食物，通宵被审訊，在壁櫥一样的小房間里連續站立許多小时，并且遭到鞭打。妇女也受到同样的折磨。

在西班牙共和派失敗以后，大多数德国共产党人都移居到法国。随着法国在1940年的崩潰，在俄德条約生效期間，莫斯科命令他們当中的多数人都回德国；作为一种特权，烏布利希却被召回莫斯科。烏布利希是設在莫斯科的自由德国委員会的一个領导成員，在納粹战敗后，他又是第一批被送到柏林去的人之一。現在，他是德国統一社会党的第二号領袖。

② 《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第39頁。

重，不容它受到絲毫侵犯。这种权利之一便是經常召开地区性全体党員大会，在会上，根据一人一票而不論党內地位和职务的原則，对一切政治和組織問題进行討論和作出决定。这种地区組織有一种亲密的团結关系，其基础是大家具有共同的背景，生活在同一个区域，除去党的工作以外每天都有接触。它所包括的几百名共产党人彼此都是多年的熟人，共同經受过內战的危險，在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組織中有过相同的政治經历。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不領取报酬，是从一些证明自己最适合担任党內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領导人和普通党員在一个民主組織中具有同等重要性。他們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整体，在过去十年中的动蕩，他們共同經历过德国工人运动的禍福荣枯。在这种政治經驗和政治认識大体相同的基础上，他們自由地和志願地达成了一致意見，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結的集体。这个集体（誰在他們当中生活过，誰就永不会再忘記他們）在同不利的环境作斗爭时，展示了人类行为中最美好的品质——性格的独立，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个人和集体的融洽无間，迎接困难任务和承担責任的昂揚斗志等等。

这群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聚集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强大集体中的个人，在对待德国政治問題的态度上同一种难以摆脫的宗派主义思想傳統进行了斗爭。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联合起来的个人，这种分化的集体，已經在开始克服自己的缺陷，发展一种更为适宜的德国政策。他們为一个民主的党內結构作斗爭，按照这种結构，中央委員会将是各个地方組織的一个执行机关，而且仅此而已。地方組織——按照这种正在出現的方案的規定——将負責决定党的政策，中央委員会然后执行这些决定，而不是由中央决策交地方执行。来德国訪問的俄国工人反对派成員，完全被德国党

組織迷住了，因为这种組織正好体現了他們希望在俄国建立的那种政党。斯大林的反应也同他們一样强烈，因为这种由基层决策的組織恰恰和斯大林主义的党針鋒相对。最后，这种日益增长的加强地方自治的傾向——通过自由选出的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全国范圍內表示了出来——終于被粉碎了。借助于阴謀斗爭的方法，斯大林的代理人由上而下地对地方組織进行改組，把它們变成了一个个易于操纵的单位。

在这些地方組織中，如果对当前的各項問題展开討論，分别提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报告，全国的反斯大林主义左派反对派就会获得巨大的多数。1923 年的經驗在所有党員的脑海中都还記忆犹新，对俄国国家机器的不信任心理是极其强烈的。这些憎恶普魯士軍国主义、社会民主党領导和魏瑪共和国警察的革命工人，对俄国国家官僚也怀着同样强烈的厌恶。斯大林和曼努伊里斯基认識到，共产党的地方党員大会如果继續存在下去，克里姆林的政策就会长期遭到抵抗——他們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莫斯科机器对这些地方党員大会公开宣战。在“把党的工作集中于工厂！”的口号下，过去那种把党分成各地党員大会、把市鎮党組織和工厂党小組并在一个地区組織中的做法被廢除了。这时采用了“皮克系統”；大于一个工厂党組的单位都被正式解散，甚至比較大的工厂党組也要再細分为人数不超过十至十五人的更小的小組。党完全被打散了；每一个团結的战斗集体都被弄得五零四散。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变成了隔上三級的間接选举：先由党小組选出初級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出参加区域党代会的代表，最后，只有这种区域党代会才有权选派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另一个当然的民主权利是选举領薪和不領薪的党的工作人

員。按照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神圣的、受到坚决捍卫的傳統，任何人要在一个劳工組織中担任工作，都必須經过下层党員的提名、討論和投票表决。可是从現在起，領薪的工作人員却改由中央委員会在事先得到莫斯科有关領导人的批准后向党內提名了。以往同样由下层党員提名的議会和邦議会議員候选人，現在也改由中央委員会事先經莫斯科統治机构批准后向党內“推荐”，然后由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批准。

当时，有数以百計的德共党員变成了設在德国的各种苏联机构的雇員。在一个这样的机构中工作就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許多德国共产党人都竞相钻营，在这些机构里，工資要比在相似的德国机构中高得多，工作时間也比較短，并且还有許多其他特权。比如說，苏联駐柏林商务代办处的雇員在购买摩托車、皮外套和其他类似的奢侈品时，可以享受折扣很大的优待，他們可以同自己的家屬花很少的錢到俄国去度假日，或者到俄国疗养院去休养。除去这些物质利益而外，这种工作也带来了威望和社会地位。許多革命者由于从事过共产主义活动，不再可能在魏瑪共和国的机关中有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他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无謂的牺牲，而現在，这种牺牲在俄国的国家机关中得到补償了。这些职位完全改变了他們的物质生活和心理状态。

在这几年中，德共党員人数为十二万五千到十三万五千人——从德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力量薄弱的組織。① 不过，党

① 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間（1924—1928 年）的共产国际》（倫敦 1928 年版，第 109—110 頁）一书的报道，按繳納的党費統計的德共党員人数如下：

1924 年	121,394 人
1925 年	122,755 人
1926 年	134,348 人
1927 年	124,729 人

机器却是强有力的，它包括以下一系列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央委員会，連同它的秘书、編輯、技术雇員	850人
报紙和印刷厂，包括广告部工作人員	1,800人
书店及其附属的宣傳鼓动組	200人
工会雇員（主要在斯图加特、柏林、哈雷、图林吉亚和开姆尼茨）	200人
疾病互助会	150人
国际工人互助会及其附属报紙	50人
紅色救助会，包括图林吉亚的儿童疗养院	50人
苏联机关（苏联大使館、駐柏林、汉堡和来比錫的商务代办处、东方銀行以及各种德俄合股公司）的德国雇員	1,000人
总計	4,300人

所有这些雇員的地位能否保持，决定于能否不断得到莫斯科統治机器的賞識。只要对党的路綫有一句不滿表示，甚或把它維护得不够卖力，都足以使他們立即被解雇，而他們也明白这一点。他們可以經常請假去搞“党的工作”，作为“党的負責干部”被安插到經过改組的工厂党小組中。在安排这种万无一失的操纵結构时，为了使下层党員对之不起反感，往往举出了这样一种官冕堂皇和討好工人的理由：应該让苏联雇員同工作台畔的工人保持日常的密切联系，从而使他們不致官僚主义化和資产阶級化。

此外，不露面的秘密工作人員至少也一定有同样大的数目。因此，几乎有十二分之一的党員是直接領取俄国工資的；这是党內最积极的一支力量，可以命令他們去做任何一种党的工作，他們不能拒絕参加甚至最沒有意义的工厂党小組会議。官僚們不論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架政治机器的主要支柱；德国工人运动內部这些俄国干部的特点就在于：他們的工作处于秘密的統一指揮之下，他們受到特工人員的軍事性控制，并且直接隶属于莫斯科中央。这个斯大林主义諜报网变得越来越严密，終于完全打碎了德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1927年的德共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員人数是145,000人。党报的发行量据估計大約相当于党員人数的一倍。

內的德国工人傳統，扼杀了所有的反斯大林主义力量，清除了每一个可能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的人。

工厂党組制沒有能改善党和无产阶級广大群众之間的联系，而在向党兜售这套方案时，这正是所举出的主要理由。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工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出了大工厂。許多人被記上了黑名单，因此，即使是在一个經济状况相对良好的时期，也要花費很大力量才能在大工厂中找到工作；一部分得以保持住工作的人，也在他們的共产党員身分暴露后被解雇。典型的共产党工人越来越被驅进了边际工业部門，日益脫离德国經济的主流。烏布利希的格言“大工厂中的十个工人比十个理发匠更重要”，是不言自明的眞理，但是和当时的情况并沒有关系。德国工厂已經对共产党人进行过六次、七次和八次的清洗。党在工业区是最强大的，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一家雇用几百名工人的大工厂中也可能只有一小撮共产党員。

剩下的人垂头丧气地聚集在新的党小組中。在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工业中心，特别是在魯尔-来因区，住宅区同工厂区离得很远。往日地区組織中的那种亲密关系現在被破坏了，而且此后再也沒有类似的关系来代替它。在他們安排政治活动时，“党的負責干部”用心良苦地計算了各种地下火車和公共汽車的行車时間表以及交接班的时間等等——从而利用由这些情况造成的疲劳情緒。一个同时代的左派共产党人关于党小組会議的报导，确切地描繪了这种状况：

“你必須具体地設想一下一般的工厂党小組会議的开会情景。出席会議的也許有七八名眞正的工人，还有三四名有关的党內雇員。一个演說者对反对派进行了一通猛烈的攻击。会上一般都沒有反对派的发言人，因为小組委員会不是忘了邀請他，就是破坏了

这种邀請……在討論过程中，党机构的雇員把每一个不投票拥护中央委員会的人都痛斥为反布尔什維克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也許有一个工人会表示他并不同意这些話；他也許会建議‘大人物’們应該停止爭吵，互相团結。这时，大家就会对这个可怜的家伙群起而攻之，分析他的錯誤，指出他还沒有达到一个布尔什維克的标准。”①

反对把这种制度强加于党的斗爭，在柏林党組織中进行得特别激烈。柏林的一次区代表大会几次否决了中央委員会在书記人选方面的一切提名。当中央委員会通过人为制造的一些代表会議，一步一步地爭取到拥护莫斯科的多数票以后，反对派又立即在紐科恩和哈雷希托尔这些重要的选区获得控制权，在这些地方，党的会議都以大吵大鬧中途收場。“如果不經过改組，我們永远也不可能把柏林共产党員爭取过来。”② 1927 年，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員会报告人腓力普·登格耳③宣布：

“在好多个月的期間，我們都不得不把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力量都放在孤立卡茨和科尔施、路特·費舍和朔累姆这类分子的工作上，以便使党內的大量工人脫离他們的影响。这是一項非常棘手的工作。”④

在这几年过渡时期中，德国共产党工人反抗斯大林主义路綫的斗爭一直沒有中断过。即使是在經过改組的党組制和打入党內

① 《共产党政治》，柏林，1926 年 5 月底出版，第 1 卷，第 5 期。

② 弗兰茨·达累姆报道，載于《国际新聞通訊》，1926 年第 27 期，第 270 頁。

③ 腓力普·登格耳一度担任过科隆党支部的书記，在 1925 年 8 月的公开信事件中被斯大林爭取了过去。他在台尔曼集团中很活跃，一直工作到 1933 年，納粹上台后去俄国，在那里，他在几次大审判中都沒有受到連累；大战期間，他几次作为一个住在莫斯科的共产党流亡者被提及。可是到 1943 或 1944 年，新聞中便不再提到他，此后一直毫无音信。战后被送回德国的共产党人中間也沒有他的名字。

④ 《党代表大会报告》，埃森代表大会，1927 年 3 月，第 41 頁。

的特工人員的帮助下，要把反对派压制下去也不是很容易的。1926—1927 年期間，党内产生了圍攻的状态。在逐步扼杀反对派的过程中，使用了以下的方法：

1. 不再在共产党报紙上刊載反对派的声明，特别是在最初当某些声明提到俄国危机的时候。比如說，参加 1926 年 2 月执委会全体会議的柏林維丁区代表弗里茨·恩格尔的那篇表示柏林左派共产党人同列宁格勒反对派团結一致的声明，在《眞理报》和《紅旗报》上都沒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2. 經过很短一段时間，便不再允許少数派提出自己的报告。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散发出来的那些反对派文件都被沒收了。威廉·皮克宣布："如果提出特殊要求，可以到党中央来翻閱这些造謠生事、顚倒黑白和卑鄙可耻的文件。"

3. 甚至当分得五零四散的党小組会議也变得不便于控制——在某些地区，有很长时間存在着这种情况——的时候，小組党員們便被剝夺了开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召开党小組会議，而代之以"党的負責干部"开会解决問题，这也就是說，由党的一些雇員凑在一起，投票支持他們的雇主。

4. 从被怀疑的同志那里偷去私人信件，用它們在德国党組織中进行政治訛詐，或者把它們送到莫斯科去。

5. 秘密工作部参加党內的討論。特工人員襲击反对派的会議，用武装小組包圍会場，然后关起門来搜查与会者，看看他們身上有无反对派的文献或者能提供一些材料的信件。

6. 党的特工部門并且襲击私人住宅，进行正式的警察搜查。党內同志被带到总部去受审——不是由正規的党組織进行查問，而是由特工人員进行审訊。

7. 特工部門展开专門誣蔑某些人的运动，把这些人說得好像

是罪恶的化身。既通过党組織也通过其他途徑广为傳播莫斯科編造的材料。

8. 党的处罰是各种各样的。異端分子在一年內不得担任党內职务，不得参加党員会議（这是德国环境中一項特殊的莫斯科发明），不得談論政治或写作有关政治問題的东西，不得在报上——不論是一般的报紙或党报——发表討論任何問題的文章。他們被放逐到莫斯科、俄国內地、亚洲或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种流放期間，他們被禁止——譬如說——閱讀任何德国材料。

9. 选出若干反对派分子、反对派集团，乃至整个地方組織，把它們作为“反革命”开除出党；譬如說，魯尔区的小工业村伊肯和胡克斯瓦根的党組織，就遭遇到这种命运。当中央委員会在六次市鎭会議上都沒有爭取到多数以后，来因区的明兴-格拉巴赫、图林吉亚的特里比斯和苏尔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組織就都被开除了。

党員們不得同一个被开除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党甚至禁止他們和他讲話或是在大街上回答他的招呼。在这种情况下，数以千計的下层党員尽管并沒有在政治上犯什么大的罪过，但由于他們继續同那些在工厂或失业救助所里碰面的同志保持个人联系，往往就因此被开除出党。“私通異己者必須开除”的原則，首先在党的上层集团中应用。科尔施由于同卡茨有联系被开除出党，路特·費舍又由于同科尔施有联系而被开除；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不得不公开声明他們同費舍沒有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当他是特工部門的一个工作人員时，一个共产党人往往由于他对自己的反革命敌手表示亲善而被开除。在哈雷，一个叫施普林格斯图貝的青年同志被开除了，其理由是，据說他曾經用笔名在一种左派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德累斯頓，右派集团的一个成員艾里希·梅尔歇被开除了，因为有人看見他在公共俱乐部里和一

个社会民主党人談过話。在明兴-格拉巴赫，有三个紅色陣綫战士同盟的成員被开除了，因为他們竟搭坐一辆"非党"的汽車——一个被开除的明兴-格拉巴赫党支部的財产——去参加同盟的会議。①

国家政治保卫局控制下的党領导阶层

1926年，第一所列宁学校在莫斯科成立。这所学校表面上是由共产国际开办的，实际上却由紅軍的反間諜部門主持。在莫斯

① "党在发展方面的中心問題〔拉狄克后来写道〕就是党的分裂問題。每一个不让自己被仇恨迷住心竅而是从政治上去看問題的人，都知道路特·費舍、馬斯洛夫、烏尔班斯和朔累姆等人代表着共产党工人中的整整一个阶层。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这个阶层体現了革命急躁情緒。我們不得不和它进行斗争，以便使共产党工人明白：一个沒有希望的少数派是无力夺取政权的。但我們并不希望同这支群众队伍一刀两断，因为它代表着我們阶級的希望。……所以，在来比錫党代表大会上，我个人主动建議一定要把路特·費舍容納进中央委員会；可是，代表大会拒絕了这一建議。我希望中央委員会里有左派代表，这样，对于那些单純埋头于日常活动的政治家、对于那些不理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区别何在的同志来說，他們就能起到一种平衡作用……

那一年夏末，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皮克、古拉尔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員向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我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排除掉，布兰德勒并且在一封写給我的私人信里宣布，問題再也不能弥縫下去了。当时，我曾这样答复布兰德勒：我可不能同他們干这种丧失理智的事。他終于让步了。但是同左派始終沒有合作。……我設法同布兰德勒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单靠左派同志是不能領导党，不能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虽然我对他本人很器重，他个人同我也比較亲密。一个沒有左派工人的共产党，有变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險，而一个不同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耳歇尔这样的人以及数以千計的老斯巴达克分子合作的共产党，則有变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危險……

在卡尔和罗莎的逝世紀念日，我在莫斯科青年团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話——那次会上也安排了你的讲話。我在准备演說稿的过程中翻讀了罗莎的論文，我深深感到，我們德国的左派激进派不是觉醒得过早而是过迟了，对于危險所进行的斗爭不是过于尖銳而是过于軟弱了。"

克拉拉·蔡特金曾經在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作为德国反对派联盟代表的拉狄克进行了攻击，以上就是他写給蔡特金的一封信的片段。这封信在1934年12月第一次由紐約托派月刊《新国际》公諸于世，見該刊第1卷第5期，第155—156頁。

科近郊有一座秘密的附属建筑，专門用来进行密謀斗爭的訓练。在这里，密謀斗爭从“党的非专业活动”提高到了这样的水平——密謀斗爭成了普遍的行为准則，成了各部門之間一切关系的背景。分配到这座学校里任职是一种特殊的褒奖，只有在党內忠誠服务过多年、經受过彻底考驗的人才能得到机会。学員受訓两年，毕业后便成为特工人員的精华，可以到最重要的地区去担任最負責的工作。他們对“合法分子”——在必須严格遵守法律的崗位上工作的人——怀着某种輕視。

就这样，在民主化和正常化的幌子下，德国共产党被地地道道地俄国化了：它的一切組織都完全变成了莫斯科的附庸，热心于执行克里姆林宮的命令。每一个加入特工部門的德国共产党人都受莫斯科管轄；一接到召令，他就得去莫斯科向上級汇报工作。特工人員对这种差使是厌恶和惧怕的，因为一到莫斯科，他便完全孤立了，只能听任俄国党和国家发落。但是如果拒絕应召，便是“公开違反紀律”，这对小人物来說，会直接导致丢失飯碗。“大人物”們則会給本身召来更大的危險。有好几次，拒絕去莫斯科的特工人員都被强架到那里去了，此后，他們的亲友便始終打探不到他們的消息。

两年时間的这种正常化，已經足以完全更換党的干部。內战时期那些怀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共产党积极分子被排挤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莫斯科代理人。新干部們感到他們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工人党，而是俄国的国家党；他們是一个外国的間諜。合法的党机构、合法的党組織变成了空无所有的外壳，掩飾着一堆瓦礫的假門面。党的核心这时成了特工人員的堡垒，他們組織得十分紧密，以致任何一种恢复独立傾向的企图都会遭到粉碎。

这个諜报网是在1923年危机期間发展起来的。① 由于克里姆林宫不认为德国会爆发一次新的革命，所以秘密机构的工作都集中在各式各样的間諜活动上。“从共产主义革命的廢墟上，”克里維茨基写道，“我們替苏联在德国建立了一个为其他一切国家所羡慕的第一流情报机构。”

“我們选出汉斯·基彭貝尔格——一个汉堡出版商的儿子——做党的情报处負責人。他不倦地工作着，在軍队和警察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每一个政党和敌对的战斗組織中，他細心地布置了一个严密的諜报网……他在1927年被选入議会，成为軍事委員会委員……多年一直向苏联的軍事情报处供給宝貴的情报……1933年秋，他逃往俄国。1936年，他作为納粹間諜被捕……

‘你认不认識国防軍軍事情报处处长布雷道夫将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审訊員問道。

‘我当然认識他，’基彭貝尔格回答說……(布雷道夫将軍时常在議会軍事委員会的会議上出現)。”②

基彭貝尔格曾經奉俄国人的命令接触过布雷道夫将軍；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試探德国軍官的态度。不过，在六个月的审訊之后，他終于供认他也替德国軍事情报处工作，于是被处决。

沒有人知道基彭貝尔格的口供中有多少眞話，但是毫无疑問，許多間諜都是同时为两边服务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者关于德俄两国軍队能否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的无休止討論，同軍事諜报活动之間很难划清界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也同样很难弄清楚人們的眞面目，很难知道这些双重間諜究竟忠于哪一边。

党的軍事部門——軍事工作部不再被看重了。軍事教官紛紛

① 見本书第204頁以下。

② 克里維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39—40頁。

被召回莫斯科；党不再为购买武器撥款。許多老战士对这种冷遇深为不安，經常哀叹軍事組織得到的資金和支持每况愈下。于是，某些俄国教官把这些不滿分子聚集起来，使他們做一些不重要的諜报工作；他們使这些人的不滿轉移到党的身上，利用这种情緒促使党进一步分化。軍事工作部还維持着一个架子，拥有若干精通新战爭方式——大炮，无綫电、航空和化学战——的专家。这个“总参謀部”继續維持着一个秘密本部，在那里，設有一个軍事图书館，藏有各种軍事地图和其他有关材料。幷且定期举行討論軍事問題的会議。在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合力指导下，有几个小型的研究机构研究德国軍事科学，間或印行一些指导性的小册子和軍事宣傳材料。小規模的武裝組織仍然进行軍事操练，但是大規模的演习已不再举行。

在这一时期，設在柏林的苏联情报机构形形色色，数目众多。共产国际有它本身的情报处，大使館另有一个，商务代办处又有一个。《眞理报》和《消息报》的柏林特約通訊員除写一些公开发表的通訊以外，还得向他們的俄国上司秘密汇报德国形势，否則就不能继續保持自己的职位。苏联間諜时常以各种借口，譬如說，为俄国杂志搜集研究資料，向德国一切集团的人物——自由知識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主义者，軍界人物等等——收买情报。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虽然在政治态度上往往是反共的，却幷不反对向俄国出售情报和分析資料。这一批数量龐大和成分复杂的情报提供者为特工人員核心形成一个外圍，便利了他們打入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这个組織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方面，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所謂“工人通訊員”体系。在每一个党在那里有一些力量的工厂，都要指定一个党員做通訊員。表面上他的任务是为党报写通訊，实

际上却是秘密汇报工厂和实业界的情况。他們的报告先經过专家审查，然后写成摘要送往莫斯科。

在这段过渡时期，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控制的德共特工部門，为斯大林的书記处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德共地方領袖的个人档案——档案內容不仅包括每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而且包括他在党的历次爭論中所持的立場，特别是他对斯大林一貫所抱的态度。这套按照俄共秘密档案的榜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本部积累起来的人事材料，已經在最近二十年中日臻完备。納粹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当然使这套档案的一大部分丧失了价值，但是任何一个幸免于难的人如果現在被接納进統治机器，那都是因为档案表明他曾在长时期內俯首听命于斯大林的俄国。

在統一党的步調的过程中，情报部和恐怖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他們对各个反对派分子的性格和行为作了衡量，决定什么人必須被除去，并且把余下的人加以重新組織，使他們服服貼貼。在1923年的日子里，組成恐怖团的是一些对反革命組織充滿憎恨的坚决革命者。現在，这些德国战士已經被改造为俄国恐怖机器的屬員；出于对黑色国防軍的强烈憎恨而参加恐怖团的正直的革命工人，現在变成了骯髒的工具，領取津貼的刺客。①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打入了每一个重要的党支部；在党的决策机构——首先是中央委員会和政治局，在市議会和議会党

① 在内战初期，果尔克三兄弟——他們全是柏林的熟练工人——参加了党的秘密組織。1925年以后，为了摆脫由于参加共产党活动而長期失业的困境，他們变成了一个恐怖团的成員。当我在1925—1926年期間被放逐到莫斯科时，我在那里看到了他們，当时，他們仍旧是典型的头脑清醒的德国熟练工人。他們不得不生活在莫斯科，因为他們参预暗杀了一个替巴黎第二局效命的白俄軍官。一个俄国老相識在威斯巴登請他吃飯，在啤酒中下毒暗杀了他。果尔克兄弟并沒有干别的，只是在街头望望風，从門縫中听听情况，但就是由于他們偶然参加了这一凶杀案，便不能在德国立足，而完全淪于俄国机器的控制之下。

团中，在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的教师中，在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每一个广泛分支部門的領导机构中，都有他們这类人存在。在以后几年內，国际工人互助会、党的出版社、党报等机构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員开始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做工作，以便在正薪之外多得几个馬克。在左派掌握中央时期，皮克便曾从事过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中央委員会开会情况的活动；后来，烏布利希成了俄国特工部門和德共之間的主要联絡人。

还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德国党的蛻变，这件次要的但幷非沒有意思的事实是：柏林变成了俄国諜报人員向欧洲其他地区滲入的第二本部。德国党为过路的苏联間諜提供安全的住所、保鏢、速記員和其他便利条件。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間諜往往当場雇用刺客，从中央委員会推荐的人当中选出合适者，因此，在1933年以前的十年中，有数以千計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为一个外国服务，往往用各种化名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布置工作时，往往用新任务的重要性来打动新手，幷且强調德共粗糙的工作方法和“共产国际”細致的密謀斗爭艺术之間的差別。通过一系列不太重要的任务，先对候选人的能力和忠誠进行考驗。許多人只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但也有很大一批人成了俄国的終身特务。

在党的公开干部——他們也越来越由上面指定而不是下面选举——的身旁，发展了一个平行的秘密領导阶层，这个无形的領导集团的一切方面，都同前斯大林时代选出的工人代表正好相反。这群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軍官”自成一个系統，超然于他們所操纵的党之外。等級和职位以及相应的薪金和特权的大小，都取决于給俄国国家所做工作的价値。小娄罗和外圍分子有临时的和正規的情报員、“朋友”和手下人之分；由于这些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在党內操有生杀大权，久而久之，一个同志所負任务的性质便成了衡

量他地位高低的标准。“他担負着非常負責的工作”这句話，是对一个紅人、一个被莫斯科間諜认为可靠的人的标准介紹。

1945 年，我在紐約听过一次討論。参加討論的是一些給国家政治保卫局做过工作的德国人。这些人談論着国家政治保卫局过去的这种或那种工作的“重要”程度，就像是一群老兵談論着同他們交过手的敌人的作战勇气一样。这种特殊的心理，这种以“可靠性”来衡量每一个人的做法，使我回想起了二十年代中期的柏林，在那里，我曾目睹俄国走卒們的这种活动摧毁了德国党——我本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共产党。

第二十四章　国防軍和紅軍

道威斯計划剛实行一年，就使德国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开始复兴。这种复兴产生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政治成果，即1925年10月16日签訂的罗迦諾公約。英国保守党政府有意要通过这一公約，明确表示不再把德国当做一个侵略成性的軍国主义国家。公約規定，占領来因区的部队将大大削减；甚至当它还沒有在該区全部恢复民政主权的时候，德国就可以参加协約国的管制机构；科隆的占領軍将立即撤出。这些占中心地位的政治条款，加上一系列帮助实現这些条款的經济規定，冻結了德国的西部疆界。不过，东部疆界还沒有最后稳定下来，因此，人們普遍认为，一个东部的罗迦諾公約恐怕也在所难免。（正好和今天的情况相反：波茨坦宣言和雅尔达协定加上苏联迁移人口的旣成事实，似乎已經按照俄国的計划解决了波兰边界的問題，而薩尔和魯尔問題則还处在一种危險的波动中。）

德国經济的稳定

“和平大使”达波能勛爵在1925年10月16日的日記中写道：

“共同安全公約已在罗迦諾提出。正式签字仪式即将于12月1日在倫敦举行。一切都很順利。这个日子标志着欧洲战后历史的轉折点，不仅从外交上說是如此，而且从心理上說也是如此。这是对普遍存在的战爭情緒的一个决定性打击——迄今以来，这种情緒一直使战胜国和战敗国之間横亘着一条敌对的鴻沟。公約是一个經过协商产生的而不是一方专横提出的条約。它也結束了单

方面联盟的体系，因为英国和意大利已經保证，德法之間日后如发生冲突，两国一定給予被侵略一方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全部支持，而不論它是德国或法国。公約的宗旨以及它注定要起的作用，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保证法国和比利时不会有重新遭受德国攻击的任何危險。与此相似，它也保证解除了武装的德国不会受到全副武装的法国及其众多盟邦濫用权力的侵害。一句話，公約重新建立了必要的均势。”①

罗迦諾公約是新西方联盟的粘合剂。它能够緩和德法两国彼此的疑惧；它能够防止德国同俄国紧密合作。它将为欧洲带来这样一个稳定时期，就像1815年拿破侖被最終击敗，举行过維也納会議以后的欧洲一样。

“在罗迦諾公約签字那天，奥斯廷·張伯倫爵士在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悬起了卡斯尔雷勛爵②的肖像。他希望以此表明今天的罗迦諾会議可以同当年維也納会議的成就比美。”③

全欧洲的每一家自由主义报紙，也都流露了这种夸大的希望，以为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欧洲正在进入一个相当长的和平稳定时期。

“如果罗迦諾公約是一个事实，而在美国又达成了关于欧洲偿还債款問題的协議，这些事实便足以表明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将会持續一百年之久的新时代。”④

---

① 达波能勛爵：《和平大使：第三卷，复兴的年代》，倫敦1930年版，第199頁。

② 罗伯特·卡斯尔雷（1769—1822），英国政治家，出席維也納会議的英国代表。——譯者

③ 奧托·赫茨施：《德国的內政和外交》，倫敦1929年版，第74頁。拿破侖时代以后的欧洲稳定者卡斯尔雷，在进步分子看来是反动的象征。在《杀人魔王的假面舞会》一詩中（这首詩写于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以后），雪萊曾这样攻击他：“我在路上碰到了杀人魔王——他带着一副像卡斯尔雷那样的面具。”

④ 布拉格社会民主党日报語，轉引自季諾維也夫，見《1926年2—3月举行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議記录》，汉堡1926年版，第21頁。

作为罗迦諾精神的高潮，德国以全权会員国的資格加入了国联，但这是在經过几个月的多方活动之后才实現的。1926年3月，接受德国加入国联的动議被巴西否决；美国担心英德两国过于密切的联合会損害美国在德国的利益。此外，締結了保证德波疆界密約的波兰和法国，也不肯輕易同意走向修改凡尔賽条約的这一步。不过，六个多月以后，德国終于加入了国联。

德国在政治上重新加入了欧洲集团，在經济上也同样大有起色。依靠美国的貸款，德国工业得到恢复。它受到美国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每一个地方的实业家都在大談亨利·福特。在中德、在魯尔、在北部沿海的大港口，大量資金投入了使生产机器現代化的工作；1926年，发明了把煤变为合成汽油的方法，于是，德国化学工业便迅速扩展，在德国經济中占了主要地位。1927年，来因区的实业家阿尔伯特·弗格勒在杜塞尔多夫建立了汀塔研究所，研究怎样使劳資关系合理化和减少磨擦。

这种新繁荣大大减少了失业人数。

德国工人联合会

在各年年底的失业会員百分比

1922	2.8	1925	19.4
1923	28.2	1926	16.7
1924	8.1	1927	12.9

而且，这几年中的失业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造成失业的原因并不是經济蕭条，而是技术变革。当合理化使得无利可图的工厂或矿山紛紛倒閉——或是永久歇业，或是由于进行革新而暫时关閉——时，每年总要有二十五万名左右的工人失去工作。产业工人增加到二千八百万人，达到魏瑪共和国全部存在时期的最高数

字。①

在 1925—1928 年，德国工会扩大了它的社会和經济职能。德国工人联合会創办了工人銀行，以便通过工会投資来資助工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又相继成立了各种合作社——一个非营利性的工会房产公司、一个图书基尔特（一个出版社兼讀书会的組織，由印刷工人工会建立）和若干消費合作社。在貝尔瑙設立了一所工会大学；在正規大学里攻讀劳工法，工会可以給予奖学金。

工会的发展反映为社会民主党各級組織的加强。党的影响在市一級特别巨大，在那里，借助于美国貸款，开始建設起一系列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社；在运动場、市立托儿所、图书館、医院、博物館、俱乐部、市議事厅的数目和美观方面，各座城市一个爭着压倒一个。德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建設精神在全国范圍內受到压抑，这时在城市范圍內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最优秀的工业天才同社会民主党官僚勤恳而有效的管理相結合的情况下，建成了一种为提高了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种种設备。

这些設施虽然按美国标准来看并不見得了不起，却仍然引起了德国許多穷邻居——它的战胜国——的惊訝和妒忌；駐柏林的賠款委員会认为这种开支完全是对美国貸款的浪費。在德国人中間，这些市政建設計划也經常遭受着猛烈攻击；不多几次愚蠢的投机活动，例如柏林的施克拉雷克丑聞，被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

在全国范圍內，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加强反映为福利預算大大增加，福利机构——特别是儿童福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現，同时通过了許多新的社会立法，特别是关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立法。最后，这个社会和平时代的高潮表現为国家提供失业保險

① 弗拉季米尔·沃伊廷斯基：《最近十年来的德国：以数字表示的概况》，柏林 1929 年版，第 133 頁以下。

和强制仲裁劳資冲突。比起同样大小的任何国家来，德国的新社会立法整个說来要先进得多，它們在工业中心一般都能起很好效果，但是农村地区还沒有受到它們的影响。

德国工人在不断地向前迈进，以往几年来的进步为什么不能无限制地继續下去呢？人們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阻碍它的理由。弗里茨·納夫塔利，工人銀行董事会董事，是一个集团的中心人物，这个集团包括克累門斯·內帕尔、理查·宰德尔、阿道夫·布劳恩、罗伯特·施米特——这都是些工会理論家，他們引证目前处境改善的事实和数字，竭力鼓吹从壟断資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前社会民主党理論。据这些分析家說，德国的經济已經如此高度地集中化，以致使它的壟断組織預示了社会主义經济組織的面貌。他們可以举出造船、化工、采煤、碳酸鉀、电气設备等部門的德国卡特尔組織。許多这样的組織，首先是中欧鋼铁卡特尔，都拥有广泛的国际分支机构。通过它們的托拉斯协定，卡特尔正在破坏古典資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場；另一方面，通过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組織在一起，工会也在逐步破坏自由的劳动市場。这样，由卡特尔和工会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两头組織起来的德国社会，就有可能借助于中間的仲裁人——将日益受到居民中最广泛阶层民主控制的国家——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在1927年举行于基尔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魯道夫·希法亭是主要报告人，他把这种理論发展到了最完备和最深刻的程度；同年举行于汉堡的工会代表大会，也采取了一种支持“有組織的資本主义”、主張通过“經济民主”来改造資本主义的立場。

在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会活动家时常受到严厉攻击。譬如說，在1925年的維也納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布腊姆利就曾說过，德国代表扎森巴赫和格拉斯曼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国工人，而

是德国資本家。当格拉斯曼发言反对德国共产党时，布腊姆利反駁說："你們是怎么对付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內西的？"在1927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希克斯、法国代表茹奥和荷兰代表費姆門，都譴責德国工会缺乏阶級觉悟。虽然这些批評一般都使用着社会主义的名詞术語，骨子里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出于对德国工人較高生活水平——特别是同失业严重的英国相比——的妒忌。他們觉得，如果德国工人采取較强硬的态度，就可以束縛住德国工业家的手脚，使他們沒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上傾銷商品，夺去英国的原来主顾。

是否要沒收皇室財产？

在这几年中，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力量大大削弱，变成了一个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地方性小集团。希特勒为团結殘剩的信徒而进行掙扎，納粹运动看来正在消亡。施特雷澤曼的以东制西政策，要比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死硬态度为德国带来的好处多得多；他的政策愈成功，他們对他的攻击就愈厉害。

在德国政治光譜的另一端，共产党在这段相对繁荣的正常时期也丧失了影响，但它从来也沒有削弱到像納粹那样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般說来，德国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尽管对于沉重的賠款負担以及为合理化付出的代价有某种不滿，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和世界形势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追随着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个党又一次变成了德国工人中的領导力量。共产党人只能从事于組織失业者——在他們当中，由于战爭和战后危机，許多人都缺乏能使他們找到合意工作的經驗和教育。到后来的經济蕭条时期，这两个劳工集团的分裂便起了攸关大局的作用，那时，共产党的不利条件一变而成为有利条件，重新变成了德

国工人中的核心組織。

列宁的思想从来也沒有在德国的土地上眞正生根，曾經得到发展的列宁思想的各种歪曲形式都以陷入死胡同告終。虽然在这段經济稳定时期，斯大林版的布尔什維主义被推到了社会边緣，它同內战剛結束后的德国却頗为投合。美国人的統治势力一撤出，共产党就从边緣移到靠近中心的地带。东方巨人沒有能把德国拉进它的势力体系的圈子，但它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在斯大林把圍繞着欧洲飄浮不定的各种法西斯傾向合并到“列宁主义”、也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教里以后，經过1918—1923年的經驗加过工的布尔什維主义傳到德国。一旦移植到德国的土壤上，布尔什維主义便依靠那里的許多极权主义分子做肥料，成长为一种具有德国偶像和口号的特殊德国形式。一旦德国共产党完全布尔什維克化——也就是說，一旦它完全隶属于莫斯科——以后，它就只剩下了一个任务，即充当把极权主义病毒傳染給德国政治机体的病媒。对于这种傳染，德国只有在得到美国不断輸血的情况下才抵抗得住。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是一种奇特的混血儿：它的組成者是一些共同經历过內战的危險和希望的人，他們在失意的青年和失业者当中的威信几乎一点沒有降低，他們的許多口号和旗帜都还保持原样——这是它的軀体；而它的灵魂則是斯大林专制主义。移植极权主义思想的方法并不仅限于松散的宣傳，而且包括直接地和牢固地控制一个組織严密的机构的核心。德国是养育出大批新型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欧洲大国，这些人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国际社会主义信仰，而完全听命于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指揮。上自台尔曼下至共产党工厂工人，每一个党員都生活在一种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中，一方面，他們的脑海中还殘留着对1918年的燦烂希望和光輝幻想的追忆，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快地跨进了黑夜，变

成由莫斯科操纵的别动队。

德共虽然已經不再能直接控制大部分德国工人，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还能施加很大压力；这是由于工人們从1917年以来对它一直怀有同情，再加上日益扩大的宣傳机器不断鼓吹着俄国文化、俄国社会和社会主义的俄国。本来，社会民主党左右两翼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在国內問題上是否应該同共产党合作，工人統一战綫应該限制于何种范圍；而現在，在苏联文化的这种进攻下，共产党人便得以說服社会民主党左派，从而得以影响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斯大林排除"老近卫軍"的做法，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引起了非常混乱的爭論，但到最后他們都一致认为，这表明俄国回到了比較理性、比較清醒的世界政策上。德共不再那样粗暴干涉社会民主党的願望这一事实，虽然是这些年来德国社会形势大变的結果，却被部分地归因于莫斯科采取了比較友好的态度；德国自由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由此而产生的善意，起了比毫不阻碍地欢迎俄国宣傳还要大的作用。由于共产党已經不再有可能发动革命，对手們也就不再常对它进行尖銳的抨击；作为一个間接的压力集团，它不仅在左派当中，而且在德国的每一个社会集团中都取得了重要影响。在每一个政党內部，都有一派人还願意通过联合俄国来改善德国的地位，因此也听信了关于斯大林正在那里进行复兴的宣傳。

在决定是否沒收霍亨索倫皇室財产的公民投票中，共产党所起的作用也反映出它作为一个压力集团的影响。这次运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把过去十年中所有的信条和思想，同各种新的趋向——特别是群众操纵的新方法結合了起来。

威廉二世的財产已經于1918年被普魯士政府查封，但是由于发生一場要不要給予部分补偿的爭执，官司从各級法院一直打到

議会司法委員会，因此迟迟沒有实行全部沒收。許多年来，德国皇室以及巴伐利亚、薩克森、符騰堡等邦的前統治家族，都領取到大量金錢作为其財产的部分补偿；德皇就用这笔錢的很大一部分作为在德国进行活动的經費。当社会民主党提出一項妥协方案，建議議会通过一項給予霍亨索倫皇室以部分財产补偿的法案把問題彻底解决时，共产党人出面干預，要求毫无补偿地沒收皇室全部財产。他們的这一主張在自由主义集团和社会民主党組織中間获得广泛支持，为了組織一次决定这一問題的公民投票，各种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联合委員会紛紛建立起来；領导議会委員会的罗伯特·庫欽斯基，就是后来一个重要的同路人經济分析家。資产阶級自由主义民主派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共同組織起来，为一个共同的政治事业进行斗爭。

帝制派分子領导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运动。

"今天对付霍亨索倫或者布劳恩施威格-倫伯格家族的办法，明天也可能拿来对付舒尔茨先生或者繆勒小姐，如果'共和国'恰巧需要他的存款或她的結婚戒指的話……这种沒收实际上对任何人都沒有多大好处，因为誰也不能分到一小块御花园、博物館或画廊……"①

兴登堡总統亲自出馬；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他为普魯士国王和德国皇帝服务了一生，在他看来，这种沒收霍亨索倫皇室財产的建議，違反了作为魏瑪共和国基础的私有財产观念。建議的沒收措施是极不公平的，是一种令人伤心地缺乏傳統、粗暴和忘恩負义的行为。

随着"帝制派"和"反帝制派"之間斗爭的展开，內战年代中的

① 〔阿道夫·施坦〕：《从公民投票到新革命》，載于《政治文丛》，柏林，1926年，第6期，第3頁。

每一件丑聞、每一个象征、每一桩事件——秘密法庭事件、国旗問題等等都旧事重提。多給、少給或者根本不給霍亨索倫皇室以补偿的問題本身，本来并不会对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是，为了决定这个問題而展开的运动，却大大影响了納粹力量的形成过程。这是老派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最后一次大規模地打出君主政体的旗号，試驗它作为操纵群众的工具有多大效力。事实证明它已經沒有号召力量。許多主張給予补偿的集团，例如中央党，只是在非常小心地和帝制派划清界限之后才得以爭取到一批拥护者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认識到，霍亨索倫之鷹已經死去，再也不能用它来号召德国人，把他們重新团結在民族主义綱領的周圍了。对民族主义群众的情緒相当敏感的魯登道夫，同希特勒捐棄前嫌，在1926年12月又开始同《民族观察家报》的工作人員合作。

1926年6月20日，举行了一次民意表决；这是一次预备投票，以决定是否要举行实际解决沒收問題的公民投票。在这次預备投票中，必須获得二千万張贊成票，才能进行最后的公民投票；民族主义分子抵制了投票。在接近四千万名有投票权的公民当中，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参加投票，投贊成票的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投反对票的有五十万人。民族主义分子虽然获得了这一胜利，左翼也有收获。两党的联合政綱在民意表决中爭取到的一千四百五十万票，比它們在以前的議会选举中得票的总和还要多好几百万張。团結就是力量。

“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正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
他們将合力打断反动分子的头頸！”

1926年的德俄条約

1923年的德国危机使英美进一步认識到德国在欧洲所起的决

定性作用。从一个参加者的角度来看，在共产国际一系列挫折中，在力求实現的全球計划的各个部分中，那一年的共产党的企图也許要算是最可悲的了。在准备不足和內部互相傾軋的情况下，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丧失了他們最后的和最大的机会，否則，他們本来是有希望使四分五裂的欧洲历史車輪不致倒轉，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的。但是在局外人看来，差点儿沒让共产党的政变搞成功：俄德联盟是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致西方采取反措施已成为刻不容緩的事。1923 年危机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法国地位的下降。它的一系列打算——并吞鲁尔、使来因区脫离德国、同巴尔干半島和东欧各个小继承国保持联盟等等——都宣告失败。現在，英美推开法国，把德国拉进了它們的势力体系。

德国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是一个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东西方竞爭的人。他看上去像一个被啤酒撑大肚子的市民——秃脑袋、笨手笨脚——但是他有一个善用权术的政治家头脑，知道如何用快刀斬断外交上的乱麻，一下子抓住中心問題：德国能从这种局面中捞到什么好处？德国的处境就体現在他身上：一个战败国，它只能通过挑撥邻邦相爭坐收漁人之利的办法，来恢复它在欧洲的地位，从而維持一种未必能存在的和不稳定的平衡。施特雷澤曼的每一着妙棋，总怀着替德国捞一点眼前利益的部分目的，而更大的用意則在于增加它同别的国家討价还价的本錢：同俄国締結条約，以便使美国的貸款赶快送来；同法国达成协議，以便向俄国显示德国地位的加强。（同白里安在梭里共进午餐的著名事件，就是一种虛張声势。）使德国东山再起的步驟是：第一，占領軍撤出来因区；第二，归还鲁尔；第三，在事实上（即使不是在法律上）合并奥地利；第四，在德国如此加强了的基础上，重新划定波兰边界，收回但澤市和但澤走廊。施特雷澤曼願意擱下其他边界問

题——同法国有关的阿尔薩斯-洛林問題、同比利时有关的欧本-馬尔美提問題等不談，先集中力量要求对凡尔賽条約作比較緩和的修改，这种修改只足以使德国地位稍有改变，能在一个重新組織起来的欧洲发揮它的充分作用。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計划并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純粹幻想；在 1925 年，它看起来不仅有可能实現，而且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进程。

德国——俄国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不可靠的朋友——的加入国联，使政治局的恐慌情緒达到新的高潮。当时，俄国已經日益以欧洲弱小国家的保卫者自居，表示要保护它們不为来自海外的新帝国主义阴謀所危害，要保护欧洲不为美国霸主所奴役。“联合起来，为反对国联而斗爭！”是一篇宣言的标题。

“罗迦諾条約的和平主义只是一面幌子，在它的背后，帝国主义者仍在以工人阶級的生命进行着罪恶的賭博……第二国际已經公开地直接参加国联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接受联合起来对国联进行斗爭的一切建議，反而积极地直接参加了国联理事会及其小組委員会……

正如一家法国报紙所說，和平的奇迹并沒有出現。倒是一場新战爭的‘奇迹’正在以吓人的力量向我們扑来。美国財政資本……正在准备一系列新的强制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已被战敗和遭到掠夺的德国的命运，将成为一切欧洲国家、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命运……通过它的財政压力，美国正在向欧洲的劳动群众揮舞着饥餓的皮鞭。德国的命运，即一个偉大的工业国竟淪为任人宰割的貧困的殖民地的命运，威胁着波兰、法国、意大利和多瑙河沿岸国家，威胁着整个欧洲大陆……

今天，要摆脫战爭的威胁和掠夺，要使欧洲不致为美国資本所宰割，出路只有一条。同苏維埃共和国、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

团結起来，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而斗爭！”①

政治局以这种反对美国超帝国主义的欧洲保护人身份，发展了拉狄克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使它能一般适应于欧洲的新形势。

作为实現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驟的德俄柏林条約，被柏林方面接受了，因为它增加了德国对付英美的力量。达波能勛爵从他的柏林大使館里不安地注視着德国同苏联的合作。

“我仍然认为，德国右派和俄国左派之間的长期合作是不可想像的，但我必須承认，那天晚上在俄国大使館里，看到有那么多佩挂着铁十字勛章、挺直腰板和胸脯的軍界人士毫无拘束地喝着苏联的香檳酒，我的确有一些感到吃惊。”②

由施特雷澤曼和克列斯廷斯基在1926年4月24日签訂的柏林条約，在6月10日提交議会批准。內容共有四条，第一条是：“德国政府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了对于涉及两国在政治和經济方面的一切問題达成协議的目的，将在今后維持友好接触。”③条約規定，在五年时間內，④締約一方遭到其他国家进攻时，締約另一方保证保持中立，此外，当締約一方遭到其他国家抵制时，締約另一方将不参加这种抵制。在此以前，已經在1925年

① 《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第786頁。在1929年的美国經济蕭条出現后，这种比較緩和的語句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疯狂咒駡，譬如說，把楊格計划比成一只兀鷹，說它正在咬住德国嬰儿的頸子吸食鮮血。1928年实行的楊格計划，要求德国按年償还債款直至1988年还淸，但是放棄了对德国經济的其他一切控制。对国家銀行和铁路的控制权归还了德国政府，賠款委員会离开了柏林，并且在1930年，最后一个协約国士兵也撤出了来因区。

② 达波能勛爵：《和平大使》，第3卷，第205頁。

③ 《国际条約集(1924—193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242頁。——譯者

④ 1932年6月24日，条約延长二年。1933年5月5日，在希特勒上台后，条約再次延长。

10月12日签訂了一項預备性的通商条約，并且在軍事合作問題上作了补充性的秘密安排。此后，两个签字国交换了一系列照会，在一份照会中，施特雷澤曼特别声明：德国参加国联决不应該被理解为"对德俄两国政府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

按照德国共产党的說法，上述条約"消除了苏德两国之間发生战爭的一切可能性"①，这种情緒实际上表达了举国上下的共同希望。在議会中，从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到居于中間的社会民主党，最后到共产党，只有三个人投票反对条約——卡尔·科尔施、恩斯特·施瓦茨和海因里希·施拉格韦特，他們都是在5月1日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異端分子。在科尔施的鼓动下，这三个人对这項条約展开攻击，說它同德俄两国工人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馳的；在他的6月10日議会演說中，科尔施提到罗莎·卢森堡的警告——卢森堡曾在她的第十一封"斯巴达克信札"（1918年9月）中警告人們，存在着布尔什維主义和德国軍国主义結成联盟的危險。在議会中公开攻击苏联外交政策，即使以共产党異端分子而論，这也是破天荒第一次。②

俄国工厂重新武装了德国

俄共政治局最注意防止泄露的秘密之一，就是紅軍同国防軍之間的勾結。除去一般的外交理由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使得这种軍方合作一定要絕对保密。反对国防軍及其黑师，是战斗的德国工人政策賴以立足的坚实基础，如果那些現在已大白于世

① 《紅旗报》，1926年4月25日。

② 例如保尔·列維和脫离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另外一些人，仍然主張同俄国联合，特别是决不願意在議会的讲坛上攻击俄国的外交政策。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党的左翼和奧地利馬克思主义者对条約尤为大力支持（关于实例，可参看1927年1月1日的《来比錫人民报》和1926年12月24日的《維也納工人报》）。

的秘密联系当时就被人知道，建立德国共产党就会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

在导致签訂凡尔赛条約的談判期間，在困境中竭力寻找出路的德国軍官便开始想到，德国能否同正在兴起的东方强国携起手来反对协約国。1919年6月，在条約签字前后，两国軍队之間开始了最初的試探性联系；从1921年起，这种联系就巩固起来，一直继續下去。正是国防軍的政治謀士，为1922年4月签訂的重要的拉巴洛条約鋪平了道路。总参謀部中有許多人要求同苏俄結成联盟，在他們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有馮·施萊歇尔将軍和馮·汉默尔施坦将軍、新軍队的締造者馮·澤克特将軍以及一位軍事諜报专家馮·尼古萊上校。这些軍官以及另外一些人时常到俄国去作官方或非官方旅行，参加紅軍的演习，和俄国总参謀部的人員建立密切联系。德国軍官被苏俄的新軍队迷住了，对它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极为羡慕。

1921年3月，在喀琅斯塔得暴乱被平息以后，俄国总参謀部派卡尔·拉狄克赴柏林提出一項秘密建議。这个步驟符合于拉狄克在以后几年中要帮助宣傳的那条政治总路綫：欧洲革命已經停滞，因此，俄国这个年輕的工人国家和德国这个英美的工业殖民地，只有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欧亚强国把帝国主义的西方击潰，才能逃脫灭亡的命运。他越来越肆无忌憚地大談这种理論，但是借以实現这一政策的軍事計划的具体条件，却只有国防軍軍官才有資格听到。俄方向德国軍队表示，願意在俄国境內建立兵工厂，帮助德国在違反凡尔賽协定的情况下重整軍备。

这些建議在以后三四年中发展成了具体的合作。① 容克公司

① 在提供了这方面情况的其他資料来源中，应該提一提以下各团体和个人：德国的和平主义团体，特别是德国自由协会和新祖国联盟，卡尔·馮·奥西茨基的《世界

在費利、薩馬拉和薩拉托夫建立了若干工厂，在唐波夫地区建筑了一座飞机場。胡果·施托尔岑堡公司建立了一座生产“伯索尔”（一种爆炸盐）以及“伏斯根”和“洛斯特”（两种毒气）的工厂。国防軍少校洛曼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試驗潜水艇。德国軍官被派到俄国去訓练化学战专家和飞机駕駛員。

1921年，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簡称为“GEFU”的“工业企业促进会”。这个团体得到大量貸款，德累斯頓和达姆斯塔特銀行对它尤为支持。它的主席是卡尔-馮·鮑里斯将軍，前梅斯軍团司令，后来变成了国家档案館历史委員会委員。1925年春天，迫于广泛的輿論压力，国防軍解散了工业企业促进会，但又立即成立了一个簡称为“WIKO”的“經济办事处”来执行同样的任务。銀行存款改用一个私人名字开戶，由一个叫曾夫特累本的上校經管。

在这些年代中，德国托拉斯的办公桌上堆滿了俄国的計划。烏克兰的甜菜工业将要用德国資本去扩大。司丁尼斯集团有一个提高頓河煤矿产量的計划。克虏伯得到了一处高加索油矿的租让权，

舞台》一书；以及两家巴黎报紙，《自由报》和《巴黎回声报》。

一部分眞相是通过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容克公司曾經和国防軍签訂合同，替它在俄国建立軍事設施，軍方并委派一批軍官到公司去指导工作。后来，軍方竟拒絕为工程費用付款，由于一切协定都是秘密締結的，公司无法把它的合同拿到法院去打官司。于是，它便拟出了一份关于这一問題的詳細备忘录，向每一个議会議員各发一册；它也許还送了一册备忘录到国外，因为在1926年12月，《曼彻斯特卫报》曾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在俄国重整軍备的轰动一时的連載报导。（罗森果尔茨在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中供认，他曾經把“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情报”交給一个叫法布曼的英国記者。参看《反苏‘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訊記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261頁。）

奧西茨基在1931年11月23日被魏瑪共和国政府关押起来。通过共和国法庭的一項口头秘密判决，他把德俄两国軍队之間的詳細合作情况公諸于世——即使是在議会委員会已經討論过这些問題以后——的行动被认为是犯了叛国罪。納粹上台时他正在獄中，他們把他关进了一个集中营。当他还在那里的时候，他被授与諾貝尔奖金，后来便死于营中。

但还希望更多得一些。此外，还有一个移出二万五千名德国人——作为第一批——到烏克兰定居的計划。在一段时間內，这些計划搞得非常热鬧，然后，它們便逐漸烟消云散，很少留下什么实际成果。

1926年底，三艘德国船——"戈登堡号"、"阿图斯霍夫号"和"考尔堡号"——滿載着供国防軍使用的手榴彈从俄国駛抵斯德丁。卸貨的碼头工人得到一笔特殊賞金，作为保守秘密的酬劳，而且在工作期間，他們不得离开碼头。可是，他們当中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員把事情告訴了弗兰茨·金斯特勒，他是議会議員，并且是当时柏林党組織的主席。① 这項消息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手上的一把双刃宝劍，既可以用来打击可恨的国防軍，又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金斯特勒这位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員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仔細地搜集了所有目击者的证詞。他还搞到了在薩馬拉的特罗伊次克建立毒气工厂的证据；批准德国工人到那里去的許可证被拍下了照片。

在12月17日的議会会議上，謝德曼对共产党人竭尽嘲弄之能事。他說，从現在起，当他們再被国防軍杀害的时候，他們可以有福气知道，这是用苏联手榴彈干的事。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和民主党的《柏林日报》广泛宣傳了这些事件。可是，社会民主党請議会进行調查的要求却始終沒有实現，因为国防軍有足够强大的势力把这个要求压制下去。

这种宣傳在德国工人当中收到的效果，并不如預期的那样大，因为数以百万計的工人，即使是那些沒有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都已

① 金斯特勒于1943年在柏林被盖世太保杀害。参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員会出版的《苏联手榴彈事件》小册子，柏林1927年版；这本小册子的全文都作为附录收进了塞西耳·梅耳維耳的《德国的俄国面貌》，倫敦1932年版，第177頁以下。

經养成一种信念，即不相信社会民主党报刊上攻击苏联的任何一句話。《紅旗报》使用下列手法模糊了問題，这就是：它再次指出了艾伯特和諾斯克同德国总参謀部勾結的事实，把目前的問題同內战时期两党之間长期的剧烈爭执硬纏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不是由于它們本身有什么特殊价値，共产党脫党集团的出版物才显得那样重要。在它們当中，特别値得一提的是下列三种报刊：《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政策》(1925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和《共产主义旗帜》(1926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令人惊訝的是，虽然这些反对派报刊的发行量都不大，它們却遭到了那样多的辱罵。咒罵的用語极多，从标准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到当时爱用的"毕苏斯基和張伯倫的代理人"，应有尽有。恩斯特·施瓦茨，一个沒有地位的、本身毫不重要的人，竟成了莫斯科反宣傳的主要攻击对象。

对于国防軍企图摆脫凡尔賽禁令的活动进行任何討論，都被看做是叛国。指責这种重整軍备活动的德国和平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被扣上了祖国叛徒的帽子，并且受到要对他們进行法律处理的威胁。对德国共产党人来說，也要考虑考虑背叛工人祖国——社会主义祖国的罪名。基层共产党員是不信任拉狄克的；尽管采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他同德国軍队进行秘密接触的一些風声仍然走漏了出来。許多工人，不論是共产党員或非共产党員，都要求德共中央回答这些謠傳是眞是假。我去見曼努伊里斯基，向他詢問情况；他建議我去問季諾維也夫和皮亚特尼茨基。1926年12月，由庫西宁領导的国际监察委員会奉命重新审查开除我出党的問題，把我召到莫斯科去当面对质。① 在那里，我沒有打探出任何消息，所听到的都是圓滑的否认；只要一提到两国軍队的联系問題，

---

① 关于詳細情况，可参看本书第635—636頁。

便会引起人們的煩躁和敌意。欧洲共产党人如果过問苏联的这部分外交秘密，甚至只是对它产生好奇心，都是“反布尔什維克”的行为。

我回到柏林以后，在若干次公共集会上作了反对俄德軍事同盟的演說，于是，俄共政治局便在《眞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答复，这篇文章后来由《国际新聞通訊》轉載，題目叫《从路特·費舍到張伯倫》。文章把張伯倫和施瓦茨扯在一起，力图把問題从軍事同盟方面岔到反对“世界反动派”的斗爭問題上。①

这样，德俄軍事同盟便同时遭受到三方面的攻击——左派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和平主义-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祖国和普魯士軍国主义之間这种联盟的詳細揭露，使得德国的大部分輿論都受到影响。接連好几个星期，德国共产党組織了一系列抗議“伪造”苏俄手榴彈事件的集会，可是未获成功。事实是无法抵賴的，而对于这些事实的了解則給德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进一步瓦解了早期的国际主义团結。在共产党的教条中，整个事件被說成是徹头徹尾的捏造——用台尔曼的話来說，这是“最骯髒和最狡猾的反布尔什維主义伎俩之一”②——对于信徒說来，这

① “……施瓦茨举出的理由非常可怜。它們根本經不起批判分析，同施瓦茨本人所扮演的旣可怜又可厌的角色恰好相适应。在施瓦茨之流看来，苏俄在魯尔占領期間居然会帮助古諾执政的德国这一事实，就证明苏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国际的总路綫是对无产阶級的背叛。可是，这件事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解放无产阶級，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須支持其他国家，甚至資产阶級国家，假如它們已經为帝国主义强盜的武装力量所打垮的話……当然，容克在这里建立了工厂。誰不知道容克是一家飞机制造厂呢？——它当然制造飞机。但是，誰要是硬說这就构成同德国軍队的合作，他便背叛了苏俄的以及与之不可分的无产阶級的利益。……施瓦茨已經同張伯倫結成联盟，已經同英国外交部的阴謀家、老而不死的叛徒头子考茨基、俄国的白卫分子、毕苏斯基的追随者、立陶宛的宪兵和秘密警察勾結起来。……每一个普通工人都必須明白，施瓦茨是一个卑鄙的、万恶的叛徒。”（《国际新聞通訊》，1927年，第63頁。）

② 《党代表大会报告》，埃森代表大会，1927年，第49頁。

样就算是解决了問題。

对于这些揭露所产生的影响，采取許多措施——开除党籍、用大嚷大叫的方法把反对派压下去、进行蠱惑性宣傳等等——进行了斗爭。但是，反对这种政策的力量甚至在台尔曼的中央委員会內部也是很大，以致斯大林不得不亲自进行干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議上为"左派"共产主义辯护。斯大林的追随者曾經以"必要的右傾"这类含糊的說法为苏德条約辯护，这时，斯大林不得不来糾正他們；斯大林在一次閉幕会議上說，右傾政策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人阶級的背叛。人們立即理解了間接提到苏德条約的这句話的含意：这是一道要大家忘記那件事、不要再去談它的命令，这样，在共产国际內部便禁止进行这方面的正式討論。

斯大林打算以一种比革命者更为革命的姿态来抵消德俄联盟在德国工人中間产生的影响，他在同一次会議上对德国左派备忘录的攻击，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企图。由馬斯洛夫編写的这份声明，要求各国无产阶級实行"一种坚定不移地为推翻本国資产阶級而斗爭的政策，即使該国的資产阶級同苏俄友好"。单单攻击馬斯洛夫的备忘录是反布尔什維主义的，已經不够了；德共代表海因茨·諾伊曼得到斯大林的具体指示，要他从左的而不是右的立場上来攻击它。于是，諾伊曼遵照指示，給馬斯洛夫的备忘录加上"社会爱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罪名。事实上，从列宁造出这一名詞以来，"社会爱国主义"就一直意味着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的民族团結，恰恰是"一种坚定不移地为推翻本国資产阶級而斗爭的政策"的反面。

在发表于共产国际德国委員会会議上的长篇演說中，斯大林广泛地談到了德国的各种反对派集团。他令人惊佩地列举了各种細节，对各派領导人的性格作了往往是极准确的說明，从而加强了

这些人当中的向心倾向。意大利党的代表亚馬策奥·波尔迪加是一个优秀的斗士，但他的批評往往失之于抽象——斯大林說他是一个思想混乱而品格正直的人。斯大林对分裂派小集团的領导人这样注意，同时，在批評他們时态度又很溫和，把他們当作很快就会回到大家庭中来的一时走上歧途的浪子，这些都使他們感到很受用。而极左派——科尔施、施瓦茨和馬斯洛夫-費舍等人，則被說成是特別危险的分子，因为他們抱着反布尔什維主义的立場。这样，他們在被开除以后同他們留在党內的时候一样，各种反对派集团仍然受到离間，始終沒有能在共同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团結起来。在党內，关于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軍国主义有勾搭的危险話題被擱下了，誰也不敢再去提它。

在柏林，当时大力鼓吹德俄两国軍事合作的人之一，就是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在公开場合，他当然矢口否认果眞存在着这样的合作，但是在議会外交委員会（我是委員之一）比較小的圈子內，他便公然主張一切措施对于保卫祖国来說都是必需的。在委員会会議上，盖斯勒往往无所顾忌，暢所欲言，尤其爱談这样一个話題——波兰危险。德国民族主义的一切派別，都为反对波兰人而团結起来了；連那些在国內問題上反对同布尔什維主义作任何妥协的民族主义分子，也认識到盖斯勒下述論点的正确性，这就是：針对着新的波兰国家，針对着法国在东欧的这个据点，締結俄德同盟是一种最有利于德国的政策。

共产党人在外交委員会中具有一种特殊地位。在議会全体会議以及几乎每一个別的議会委員会中，共产党議員都被当作国家的敌人——內政問題上永远不可調和的反对派——看待。可是，在这个委員会里，同样的共产党議員却成了一个友邦的亲信代理人，可靠到足以向他們报告外交計划各种細节的程度，而这些細节对

于議会中的其他集团却是保密的。这方面的許多絕密情报都非正式地、有时候甚至是不当回事地告訴了委員会委員。譬如說，盖斯勒以及經常陪他出席委員会会議的那批軍官，往往会信口討論起某些德国軍官到俄国去旅行的收获。当时，正有数以百計的德国軍官在分批去俄国旅行；有些人用的是假名；有时候，在担負着比較重要的使命时，他們往往被正式免去軍职，但暗中領取津貼，到他們完成任务后，再重新被接納到軍队中来。

盖斯勒，一个性情愉快的德国南方佬，往往利用德国共产党和俄国国家之間的意見不一，一針見血地說明問題。他时常这样說，德共議員同議会中其他集团的所有这些爭吵都已經变得毫无意义了。現在，我們这些軍官已經同莫斯科搞得这样水乳交融，因此，你們共产党业已变成了內战时期的化石，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这些俄国政治家的明智使我們很欽佩，我們願意同他們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俄德联合軍事組織。这是苏联对德政策的眞正基础，因此，到适当的时刻，莫斯科就会关閉它在这里开設的共产党分店。

在1927年2月24日的外交委員会会議上，盖斯勒受到圍攻，为了答复人們提出的一系列质詢，他被迫說出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当时，委員会中的共产党代表是恩斯特·托尔格勒(后来的議会纵火案被告之一）和奥古斯特·克罗伊茨堡。（我在被开除出党后，便失去了委員会中的职位，虽然我在1928年5月以前，还一直是議会議員。)盖斯勒說，两国軍队之間的合作是在俄国人的倡議下开始的。在1920年的俄波战爭以后，俄国政府曾要求德国帮助它改組紅軍，由于这一建議給了德国一个秘密重整軍备的机会，并且可以合作进行軍事研究，因此被接受下来。据謝德曼估計，单是在19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就在俄国花了二亿五千万馬克——相当

于国防軍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一。可是，考虑到这一秘密扩張軍备的消息公开以后对德国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盖斯勒在强大压力下保证結束这种同俄国的合作。

在委員会会議一結束以后，我便同托尔格勒談了話(他幷沒有改变对左派反对派的友好态度)。他对盖斯勒的证詞深感震动。他說，苏俄政府把我們直接出卖給国防軍了；如果我們的下层党員知道这些事实，就会有大量党員离开党。我建議他退出共产党，把盖斯勒的证詞內容公布出来，以帮助我們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共产主义組織。托尔格勒在原則上同意我的話，但他认为，从策略上考虑，还是留在党內更为有利。

在盖斯勒的声明以后，两国之間的軍事合作幷沒有中止；在1927—1928年間，派到俄国去的軍官数目更为增多。在1928年，国防軍派去同紅軍合作的人至少有八百名。这些德国軍队的长期駐俄代表同俄軍的訓练計划、特别同訓练飞行員和化学战軍官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包括弗里茨·哈伯博士在內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紛紛去俄国帮助工作，譬如說，合作組織莫斯科化学战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彼尔姆、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和烏克兰，德国专家协助建立了若干軍火工厂，幷且帮助指导生产。

1928年8月，馮·布洛姆伯格将軍率領一群高級軍官前往莫斯科。一年以后，馮·哈默尔施坦男爵，馮·施萊歇尔将軍的密友，又在屈倫塔尔上校的陪同下去俄国。海姆上校在1929年到了那里。这一德俄秘密軍事組織的首領之一，馮·澤克特将軍，于1926年离开国防部以后在这方面格外活跃。同澤克特接头的主要联絡人之一，是一个罗馬尼亚血統的德国作家瓦列留·馬尔庫。馬尔庫在1921年同保尔·列維一起退出了德国共产党，可是他仍然同莫斯科集团保持着联系，后来，他傳递了許多危險到不能写在紙

上的口信。①

在很长时間內，两国軍队之間的联络人之一是爵士奥斯卡·馮·尼德尔迈埃博士，他在1936年以前一直在国防部担任中校。他訓练了数以百計的派到俄国去的軍官。他同屠哈切夫斯基交誼深厚，1934年以前，他每年都要到俄国去休假；在納粹党对勒姆集团实行清洗以后，他不敢再继續这类旅行了，但仍然常派他的妻子到俄国去維持联系。在1916年，尼德尔迈埃曾經率領过一个軍事代表团去阿富汗，考查能否从設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德国基地上对印度发动陆路进攻的問題。② 他著有两本分别介紹阿富汗和苏联的杰作；后者发表于1934年，是同俄国作家謝米奥諾夫合写的，旨在向德国讀者介紹俄国的地理政治和經济的巨大潜力。③

德俄两国軍队之間的长期合作，一直是近代史上隐瞞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可是，我們要想对斯大林主义和納粹主义的許多因素作出根本解釋，却必須从这种关系上去探求。在两个独裁政权历史上的許多重大关头，两国軍队都曾力求找到一种共同的政策：在1932年11月—1933年1月施莱歇尔短期担任总理期間，政治局曾試图在他和共产党之間找出一种可行的妥协方案。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又不断通过軍队途徑，試图同納粹德国結成联盟，后来，这个政策終于在1939年8月获得实現。当这一联盟在1941年随着德国的侵入俄国而宣告破裂后，它在1943年成立自由德国委員会时又借尸还魂，并且反映在1944年7月20日的“将軍暴动”上，尽管有許多复杂因素掩盖了这次暴动的本质。

① 馬尔庫在1933年以后同俄国党完全断絕了关系，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后来死在紐約。

② 参看〔格里辛格〕：《德国在波斯的阴謀：一个德国間諜的日記。尼德尔迈埃通过波斯到阿富汗和印度的远征》，倫敦1918年版。

③ 奥斯卡·馮·尼德尔迈埃和尤里·謝米奥諾夫：《苏俄——地理政治研究》，有卡尔·豪斯霍弗作序，柏林1934年版。

第二十五章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結成联盟

在1925年12月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打赢了一仗，可是并沒有赢得整个斗爭。在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委員中，有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但也有实际的反对派和可能成为反对派的集团的領袖。他們当中不仅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些人在斯大林看来——后来的事变果然证实了他的看法——都是不可靠的、純粹暫时性的同盟者，而且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这些人仍然是可怕的敌手。托洛茨基仍旧是能够左右斗爭結果的关鍵人物，这不論在代表大会上或代表大会后都是一样。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两方面都注視着他的每一步动靜，力图影响他的动向。

斯大林玩弄手腕，通过进一步削弱季諾維也夫及其追随者的方法，扩大了他在代表大会上获得的成果。在1926年1月2日举行的新政治局选举中，索柯里尼柯夫被排除出去了，加米涅夫也降成了候补委員。两星期后，索柯里尼柯夫又失去財政人民委員的职位，加米涅夫則从人民委員会副主席的崗位上被免职。柯馬罗夫代替季諾維也夫担任了列宁格勒苏維埃主席，加米涅夫的莫斯科苏維埃主席一职为烏哈諾夫所代替。柯馬罗夫和烏哈諾夫都是冶金工人，因此，斯大林趁机大肆吹嘘，說俄国两个最大都市的市长都是鋼铁工人。他說，但願倫敦和巴黎也学习它們的榜样！①

① 《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第2803頁。

这篇簡短的讲話表明了斯大林当时在党內扮演的脚色——反对知識分子和官僚的无产阶級領袖。甚至不是領袖，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談到“領袖們”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他把自己的缺点——缺乏学問和演說才能——变成了长处。在这方面，他是后来极权主义时期涌現出来的那些群众領袖的典型，这些領袖夸耀他們的无产阶級出身、土里土气的生活习惯，甚至往往以他們沒有知識分子那样复杂的头脑为荣。斯大林是那样一种党的負責干部之一——开門見山，不繞圈子，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很粗暴；这种反知識分子的作風在党的中等阶层中受到广泛欢迎。斯大林把馬克思主义加以庸俗化，认为无产阶級根据它在社会中的阶級地位，几乎可以本能地站到正确的政治立場上；这样，他便实际取消了列宁恰恰是在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所作的提炼。列宁曾經强調指出：一个党的优秀分子核心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个核心，才能通过科学的分析把工人的自发反应加以提高，化为政治理論和政治行动。斯大林那种直接迎合无产阶級本能的做法，在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斗爭中开始实行，以后継續发展，扩大成为一种新的操纵方法，在1928—1929年的消灭富农时期，这种方法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①

为了使这种无产阶級姿态得以站住脚，斯大林特别关心粉碎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問題，因为列宁格勒是党的无产阶級精华的中心。当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还在进行的时候，在选举新的中央委

---

① 共产国际各国党的新領袖，如威廉·福斯特、莫里斯·多列士和恩斯特·台尔曼，也都出身于普通工人的家庭。不仅他們是如此，而且連斯大林在过渡时期的欧洲的竞爭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不得不模仿他們的这种态度；这种向未經教育的社会群氓大献殷勤、迎合他們的虛荣心的做法，在当代的每一个独裁政权之下都受到采用。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根廷，在那里，庇隆所以能建立起独裁統治，就在于他狡猾地操纵了“无衬衫党人”（los descamisados），利用他們来反对阿根廷社会的中等阶层。

員会以前，在斯大林获得党內多数的事实还沒有正式确定以前，他就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到列宁格勒去展开活动。“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同志，”斯大林写道，“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向列宁格勒党組織中的党員們解釋……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場，是一种罪恶的和反布尔什維主义的立場。”[①] 在一支强大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队伍的伴随下，这些全权代表和激动的党員群众見了面。他們解釋說，列宁格勒支部无意中选出了一些反苏維埃和反布尔什維主义的代表，这些人用“假充”布尔什維克的手段取得了代表資格。“你們被你們的領导人出卖了，”斯大林的使者向列宁格勒党組織說。受欢迎的回答是：“不錯，同志，我承认我被出卖了。我沒有认識到，我选举季諾維也夫就是选举了一个反布尔什維主义分子。”作这样答复的人不仅能得到寬恕，而且能在改組的支部中立即获得一个职位和被提升的机会。

可是，反对派仍然在列宁格勒进行着斗爭。按照党的老規矩，代表大会的一切決議，包括譴責季諾維也夫的決議在內，都必須提交列宁格勒支部通过，而斯大林主义者却不能断定，这种通过是否只是口头上的，目的在于爭取时間。这是一項难办的工作，因为每一个被爭取过来的反对派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不太靠得住的，必須割断他們同列宁格勒党組織的联系，以便可以对那些留下来的人进一步实行拉攏。几个星期以后，斯大林的代表陆續回到莫斯科，但是留下了謝尔盖·基洛夫这条新的斯大林之鞭，于是，他在发展党內恐怖鎭压方面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謝尔盖·基洛夫于1904年入党，1922年被选入中央委員会，

① 〔約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1頁。

那正是斯大林开始把党的中級干部吸引到自己身边的一年。他参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幷沒有明确屬于那一派；斯大林进行了幕后活动，把他爭取到多数派一边。他几乎立即得到了奖賞；代表大会結束后，他代替季諾維也夫担任了列宁格勒支部的书記。这位从外面插进来的中央委員会代表，在周圍人們的憎恨和厌恶之中开始了他那改組支部的工作。

反对派在青年当中的力量尤为强大。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閉会后，季諾維也夫立刻就召集了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会議，其中各上层分子，是由季諾維也夫、查魯茨基、巴卡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庫克林、薩发罗夫以及其他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养成的。在这次会議上，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决議，即拒絕服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議的决議。”①

基洛夫小心翼翼地开始，終于树立起斯大林的統治。列宁格勒工人，俄国城市中最有西方傾向的居民，对这种統治的反应是不良好的；每一陣恐怖浪潮都只能把反对派驅入地下，使它抵抗得更为頑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4年12月需要有一个发起大規模清党的借口时，它便布置了基洛夫暗杀案，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一系列做样子的审判宣告开場，幷且通过这种选擇首先对列宁格勒人施加威胁。选擇列宁格勒作为斯大林的議会纵火案的地点，表明了二十年代的半合法反对派活动和它在三十年代继續进行的密謀斗爭之間的联系。②

① 〔約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1頁。

② 杀死基洛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具，是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人，他被說成是季諾維也夫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成員。作为他的同謀者被捕的，有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查魯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費奥多罗夫、薩发罗夫、庫克林、巴卡也夫、夏罗夫、費維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閉会后，斯大林便集中力量解除列宁格勒反对派成員的掌权职位。与此同时，对其他反对派集团的領袖却进行了拉攏。譬如說，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亚历山德拉·柯倫泰被派到了奥斯陆大使館，这一方面使她同她的朋友們隔开了，另一方面又捧了她。斯大林特别向托洛茨基表示，过去两年来的斗爭幷沒有排除新的联合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在新政治局中維持住了原来的地位，幷且后来被任命为科学技术委員会主席。这是一种姿态，但幷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它的目的在于防止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結成同盟。

几星期后，对托洛茨基作了更加亲善的表示：他被批准去德国就医。

"莫斯科医师……一直在催促我到国外去旅行一段时間……这件事……拿到政治局去进行了討論……让我作最后決定。声明上附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意見，认为我当时出国頗为不宜……

同德国使館毫无困难地办好了一切手續〔这几个星期內，正在談判柏林条約問題〕，4月中旬〔1926年〕，我的妻子和我便以化名庫茲明科的护照出国……伴同我們的有我的秘书西耶尔穆克斯、

洛維奇、瓦尔金、果尔切宁、布拉克、格尔提克和柯斯提娜；讀者应該把这一名单和斯大林所著党史上的名单比較一下。参看托洛茨基：《基洛夫暗杀案》，紐約先鋒出版社1935年版。

所有这些在1926年遭到斯大林譴責的季諾維也夫分子，以后都被恢复党籍，組成了反对派的一个新核心。1935年，他們由于同暗杀基洛夫有牵連而受到审判，被判处长短不等的徒刑。1936年，这一群人又从监獄里被提出来，以同样的罪名再次受审；这一次，他們全都被处死。

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暗杀基洛夫有关系这一点，現在已經得到证实。以国家政治保卫局列宁格勒負責人梅德維尧德为首的十二名俄国秘密警察，在这一案件中以玩忽职守罪被控告。制造基洛夫煽动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果达，他本人在1938年的审判中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的前专用列車車长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表。”①

这样，就像对付柯倫泰一样，斯大林一方面割断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联系，同时又对他作出了一种妥协姿态。托洛茨基会影响德国党內任何集团的危險是很小的，因为他当时在那里并无基础。台尔曼領导集团对他是完全敌視的。布兰德勒及其追随者非常謹小愼微，因此也不敢和他站在一起；他們还在希望借斯大林的力量恢复党內領导地位呢。馬斯洛夫正在獄中，我則在莫斯科，而德国左派又已經被1923年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煩瑣討論弄昏了头脑。

斯大林这种謹愼的和解姿态未尝沒有产生一点影响。据托洛茨基說，在他的追随者当中，有“許多人”反对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結成联盟。“甚至有人——虽然只是几个人——认为有可能同斯大林联合起来反对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②

同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的談話

在这段时期，我仍然被扣留在莫斯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参加了最后一次反对斯大林书記处逐漸建立极权主义統治的合法斗爭。坐落在特維尔斯卡婭大街上的路克斯飯店，共产国际外国代表在莫斯科的住处，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它早先是一座接待商人的飯店，室內的装飾和家具都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那种纖巧华美的庸俗式样，飯店的各方面都办得不算差，只是自来水經常出毛病，臭虫和老鼠猖獗已极。捉老鼠成了飯店里德国同志們喜欢干的一項消遣，他們有着德国人的那种执拗脾气，认为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把老鼠消灭干淨。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522—523頁。

② 同上,第521頁。

路克斯飯店在莫斯科工人中非常招致反感。共产国际的代表們过着一种脫离俄国人民的生活。外国人享有許多特权和优待；他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俄国党的一般干部都要高得多。飯店处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从門房算起，每一个雇員——以及某些外国客人——都是它的耳目。通过这道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封鎖綫，沒有特别許可证，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不能够进入飯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类特工人員中，某些人是大家认識的——例如庫西宁的秘书海摩——但是一般說来，大家只是有一种怀疑，这种怀疑从一个房間散布到另一个房間，毒化了整个飯店的气氛。我时常到住在路克斯飯店的几家德国人——这都是由于参加共产党活动而无法在德国存身的那些人的家庭——那里去串門；他們都对我談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經常监視着人們的情况。在他們的朋友工作的工厂里，在他們的党小組中，在他們的同志中間，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密探。他們警告我說，正因为我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我决不会逃脫这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視；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注意和报告上去。

斯大林不断地拉攏我，向我提出新的和解条件。在这里，我不妨举一个例子說明一下共产国际領袖受到的那种賄賂。我在多次要求他們准許我离开俄国的时候，曾举出一个理由：我的父亲病得很重，很希望看看我。可是，他們并沒有准許我回去，而是向我提出，我可以把全家人——包括需要我照顾的小儿子在內——搬到俄国来，一切开銷都由国家負担。我的父亲虽然絲毫也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們却答应給他在俄国大学中找一个位置，使他不再像住在維也納那样淸苦。① 长期依違于斯大林和反对派之間的帕尔

① 魯道夫·艾斯勒于1926年12月13日去世。他著有《哲学概念与語汇大詞典》以及其他許多关于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

米罗·陶里亚蒂，也被給予了一个类似的机会。他接受了这种优待，把他那龐大的家庭全部迁到了俄国，在这里，他把他們的物质生活安排得很舒适——此后，他們就一直留在莫斯科，作为保证永远忠实遵奉斯大林主义路綫的人质。

1926年2月初，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議举行前夕，斯大林邀請我到中央委員会去作一次私人会見。我們的翻譯是彼得罗夫斯基，他曾同我在1924年一道去倫敦。这一次，斯大林沒有作旁敲側击的試探；他沒有再提出那些有关德国妇女組織的可笑問題。以一种冷靜的和坦率到了粗魯地步的态度，他和我討論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形势；在这个討論中，斯大林显示出一种不顾任何反对来“改組”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铁的意志。在这两小时的私人談話中，他幷沒有向我提出上述那种露骨的賄賂；那是他的下屬份內的事。他向我保证：如果我脫离季諾維也夫，他将在德国給予我全力支持。俄国政治局将放我回德国，幷且給我一封写給台尔曼的信，要他停止对我的攻击运动；我将重新参与領导德国党。当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联盟正在形成的时候，为了使它失去在德国的支持者，斯大林願意付出巨大代价。

我同布哈林是处得很好的，尽管他追随着斯大林集团。列宁死后，在俄共的所有大人物当中，布哈林是最有人情味和最討人喜欢的人之一。他不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而是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館里占着两个房間，同他那从不参加党內爭論、身体病弱而惹人怜爱的妻子住在一起。他出現在莫斯科的每一个地方，出現在各个大学里和青年的集会上。当我同他談話的时候，他力图把我爭取到他的立場上去，当时，这种立場已經看得出不同于斯大林的理論。他要求实行一种和緩的政策；他不希望走极端，不論是对于反对派分子或是更普遍地說对于农民，他都不主張采取极端的手段。他

有一天晚上对我說：我們的国家太穷了；我們的农民还在使用原始的工具劳动，效率低得惊人。我們并沒有西方所說的那种富农；我們的富农不能同德国法国的富裕农民或者美国的农戶相比。在我們这里，凡是有两匹馬和一点儿农业机器的人，都被扣上了富农的帽子。要把这种农民經济改造为現代农业，需要若干年的时間。让几个这样的富农发財致富，并不会威胁到党的壟断統治；重要位置都掌握在我們手上，我們可以通过它們来維持控制。强迫实行集体化会改变我国政权的全部性质；它将会产生災难性的后果。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应該是通过一个国家給予帮助的合作社网，把俄国农业提到一个較高的水平。

作为一个还有可能重新得寵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員，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我領到一張"派司"——克里姆林宮的长期出入证，并且可以在莫斯科任意漫游。可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同許多俄国領导人的談話便不得不带有某种秘密色彩。譬如說，当我到克里姆林宮去找季諾維也夫的时候，我总是以某种借口走进大門，然后繞到共产国际主席办公室的一扇側門跟前，由季諾維也夫亲自把我放进去。这样做的好处并不在于避人耳目，因为我的行踪还是有人看到，但这种看到只是一种非官方性质的；如果我由正門进去，被卫兵登記下姓名，季諾維也夫就不得不向党报告我訪問他的情况了。

就以这种方式，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閉会几天后，我去見季諾維也夫，同他作了第一次抛开布尔什維克詞藻的坦率談話，討論了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失敗造成的新形势。他虽然沒有灰心，却深深为多数派的力量之大所震惊，因为他曾經希望在地方支部当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据他估計，当前存在着真正的危險。他不再为共产国际的紀律所束縛，对我推心置腹，第一次談出了他对斯大

林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是热月政变的急先鋒，是反革命复辟的領袖。他說，斯大林还远沒有获得最后胜利。我們还有充分的机会击敗他。但是，如果我們不重新补充力量，不扭轉当前的趋势，那么，这就会是一系列連鎖反应的第一环，不是导致資本主义复辟，就是导致波拿巴主义。最終的結果将是白色恐怖統治着俄国和欧洲。

这种語言使我深为震惊。过去几个月中，由于同德国党的联系被割断，而在莫斯科又不敢过于自由地討論問題，我曾对新的形势产生过一种类似的感觉。我特别为季諾維也夫的突然改变态度所打动；那些关于布尔什維克紀律的門面話，那些辯证法的高談闊論，現在統統沒有了。在过去的年代中，我对布尔什維克紀律的永远无錯是相信的，虽然我对这种理論的实际应用有某些批評；但在这几个月中，我发現这种神話正在消失。面对着斯大林的現实主义，在他那种一心一意追求独裁权力的压力下，季諾維也夫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我本人，被迫扔掉了这套陈詞滥調的包袱，为一場新的斗爭作出准备。

在我們的半秘密会晤中，季諾維也夫不仅向我傳达了政治局的各种秘密报告（它們由他的一个心腹秘书特别譯成了德文），而且以长时間的交談丰富了它們的內容。这时，我对俄国形势的复杂問題有了更多的认識，而这些問題不是我通过閱讀列宁选集所能了解到的。早在1924年秋天，也就是列宁去世后不久，季諾維也夫和他的朋友就开始怀疑，斯大林是否会无情地把党变成他那个集团的掌权工具。他們并不认为这种改变仅仅是出于斯大林的野心或乖張性格。他的追求权力是俄国和欧洲无产阶級革命普遍倒退的一个方面，这种倒退最終将导致整个欧洲大陆都出現反革命的政府和国家政权形式。据他們的分析，斯大林企图使自己的

集团把一切重要职位都抓在手里，这对于十月革命說来是一种法西斯式的反动。季諾維也夫强调說，党的干部还沒有蛻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鼓励他們重新集聚起来，对斯大林集团展开斗爭。这种重新集聚可以产生根除波拿巴主义冒險的足够动力。

当我們討論同托洛茨基結成联盟的問題时，季諾維也夫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眞誠悔恨他在1923年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爭；这一严重錯誤使得斯大林赢了第一个回合。可是，他从不抹杀他同托洛茨基之間依然存在的政治分歧。季諾維也夫正在修正他的一貫看法，即“布尔什維克鋼铁般的絕对团結”是一个国家党的指导原則。在討論党組織問題时，他說：我們必須区别开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任务。继續采用为夺取国家政权所必需的密謀斗爭方法，在一个上百万人的国家党內部維持鋼铁般的絕对团結，只能导致災难性的蛻化和我們的运动在社会性质上的改变。我們必須找到一种这样的組織，在这个組織中，革命社会主义的一切傾向都能得到足够的生存条件。在苏維埃和党的合法范圍以內，比我們的集团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分歧大得多的政治分歧，不論是过去的或者是可能在将来发生的，都应当能同时共存。如果我們不能够展現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多面性，那就大糟特糟了。

季諾維也夫討論了应该使各种苏維埃民主形式中的哪一些形式具有合法地位：布尔什維克党內允許派别存在，以后准許孟什維克和一个农民党加入苏維埃等等。不过，国家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一問題，在反对派領袖們本身中間也始終沒有得到过徹底討論。人們认为，一旦在斯大林集团被剝夺壟断权力以后，党內的新統治集团只有向那些希望广泛扩大苏維埃民主的分子求助，才能

維持它的地位。另一方面，反对派分子又不敢支持为其他苏維埃政党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正是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他們的重点。党內有很大一批人尽管贊成他們的一般政策和反对斯大林統治的斗爭，在組織体制方面却决不会接受这样影响深远的变革。季諾維也夫集团和工人反对派之間的主要分歧就在于这一点：究竟是立即要求让几个工人政党合法存在，还是先在国家党內夺得大权，然后再实行这一原則。仅仅是在經过多年的流亡生涯和希特勒上台的教訓以后，托洛茨基才同国家党一党壟断的信念决裂，而且，他在还沒有来得及澄清这一問題之前就被暗害了。

通过在他的办公室中进行的这些坦率討論，我在这次逗留莫斯科期間逐漸眞正了解了季諾維也夫。斯大林主义的誹謗运动已經完全掩盖了他的名字，以致国外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眞实面目。格雷戈里·季諾維也夫出生于烏克兰南部一个犹太小資产阶級家庭，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派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它的一員。他是这个运动的产儿；他的教育、他的人格都是在反对沙皇統治的日常地下斗爭中接受和形成的。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反动年代中，他伴随列宁一起流亡国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支持俄国国內地下党的工作。从一开始起，他就是列宁的左右手；也是从一开始起，反对列宁思想的謾罵和攻击，就往往集中到季諾維也夫身上，因为他是两个人当中比較軟弱可欺的一个。这种作为挨批評的靶子的角色，在他成为共产国际主席以后更是有增无已。在这个崗位上，他不仅要为每一个軟弱的共产党的缺点和每一次流产的革命的每一个失敗負責，而且連一个书記沒有得到所希望的工作这样的事也要归咎于他。人們往往說季諾維也夫沒有足够的威信領导共产国际，这句話是正确的，但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說来才是正确的，即：欧洲革命一旦进入低潮以后，莫斯科

統治的共产国际的存在便成了一个时代錯誤，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能通过它"組織"世界革命。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总部本来应該迁到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共产国际的活动和政策本来应該同俄国党脫离关系。

在季諾維也夫的冷靜外表之下，在他由于多年来遭受人身攻击而磨炼出来的面具之下，藏着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格。就像十九世紀的社会主义护民官一样，季諾維也夫相信，群众的无形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一旦推动起来就能像救世主那样挽救天下蒼生。在这方面，他同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同整个第一代俄国共产党人是观点一致的，他們都宣揚着一种国际主义新宗教。作为一个青年，作为年輕一代的一員，我对于群众的不可战胜性是不像他們这样坚信不疑的；在我看来，季諾維也夫是在用幻想安慰自己。这种救世主义是季諾維也夫的弱点，也是他的长处。当他由于群众的同情反应而热情洋溢的时候，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演說家并且滿怀勇气；而当他遇到的是人們的沉默时，他便"惊慌失措"了。他为之受到最多辱駡的罪行，即他在1917年曾要求同参加苏維埃的一切政党联合，也是由同样的性格特征造成的；他害怕自己的党同其他工人政党失去联系，害怕它脫离俄国群众而陷于孤立。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閉会几天后，在一次像我上面談到的这种会見中，季諾維也夫同我討論了同斯大林斗爭的各种可能性，在討論中，他几乎是胆怯地提出了同托洛茨基联合的問題。他說，这是一場爭夺国家权力的斗爭。我們所以需要托洛茨基，不仅是因为我們如果沒有他的杰出智慧和广泛影响，就不可能夺得国家政权，而且是因为我們在夺得政权以后，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把俄国和共产国际拉回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外，只有他能够組織軍队。斯大林是用强力而不是用宣言来对付我們的，因此，我們也只

能用更大的强力而不是用宣言去对付他。拉謝維奇是我們的人，假如托洛茨基和我們联合起来，我們就能胜利。

他继續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一次政变，而是要喚醒党的基层群众，并且通过他們喚醒俄国和欧洲的工人阶級看到当前的危險。(这一点也許是衡量托-季联盟历史价值的最可靠的尺度；别的密謀者，例如在1944年阴謀刺杀希特勒的集团，最害怕的甚至不是他們的計划被独裁者发現，而是怕全体人民参加到他們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中来。)反革命的牺牲者将是俄国工人阶級。在不断玩弄革命詞藻的烟幕后面，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在兴起的斯大林統治阶层将把工人政权的殘迹消除干净，展开一个消灭革命一代的运动。在这一时期，单靠党内斗爭的方法是不能消除这种危險的。我們当然要在党內爭取多数，但是必須使这个多数得到下列保障，即能够用暴力来对付和击退敌方以暴力阻止它执政的企图。只有联合起一切反对派力量，才能实現这样一种綱領。

他告訴我，加米涅夫已經开始同托洛茨基談判，希望很快就能达成明确协議。与此同时，季諾維也夫本人也已經向民主集中派以及其他工人反对派集团的領袖进行了活动，这时正在努力打消他們的怀疑，特别是对托洛茨基的怀疑。另外，同格魯吉亚的反斯大林集团也有了接触。

我在这次会見以后，立即写信去柏林，告訴大家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将要結成联盟，劝告德国左派支持这个联盟。

从多少有些相同的前提出发，托洛茨基得出了同样的結論：必須击敗斯大林，而要击敗他，只有結成联盟才办得到。托洛茨基同季諾維也夫一样，也需要別人的帮助。在1923年的斗爭中，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和軍队的上层；在党內，老布尔什維克——即使是那些在这次或那次派别斗爭中支持过他的人，也从沒有把

他完全看做是他們当中的一員。他是一个有才干的杰出政治家、第一流的軍事領袖、在党內无人能及的演說家和作家，但却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維克”。托洛茨基是从外面闖入党內的，并且凭他的个人天才挤进了党的最高行列。他是政治局的常任委員，但他从沒有領导过一个区域的党組織；他有許多热烈的崇拜者，但在党內却沒有足够的有組織支持。季諾維也夫則和托洛茨基不同，他是共产国际主席，也当过列宁格勒党組織的領导人；他曾經拥有一列最快的专用火車，往来于两大首都之間，在每一处各住半个星期。加米涅夫是政治局委員，領导过莫斯科支部。这种在党內的关鍵职务表明了他們的党內地位；在1923—1925年期間，尽管托洛茨基只要說一句話，就会在党內外、在軍队、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广泛阶层中获得响应，他却一直保持沉默——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支部中都得不到多少有組織的支持。

托洛茨基的力量仍然是在軍队里。他已經在1925年1月被解除軍事人民委員的职务，但是在那些由他在內战时期領导建立的师团里，他的巨大威信实际上还保持如故。在伏龙芝去世或者說被謀害以后，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通过伏罗希洛夫和拉謝維奇为代表在軍队中对峙着，而三人集团分为两派的这种相持局面使双方都受到束縛。其部分結果是維持了托洛茨基占統治地位的現状。①

可是，不管他过去的力量有多大，在1926年初，托洛茨基的地位却比1923年削弱了。两年来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幷不是沒有效果的。他的敌手加强了，动搖不定的人离开

① “在1923—1924年，托洛茨基反对派在紅軍、苏維埃和高等教育机关的党員核心中，拥有相当可观的一批追随者。”（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273頁。）

他了，他的支持者也因为他的长期沉默而感到不满和不安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虽然是三人集团中較弱的一方，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剛剛遭到惨败，他們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党內領袖，因此，他們提出的联合建議不是可以等閑視之的。这些人同托洛茨基結成联盟，就能够赢得党內多数，或者即使說不能爭取到数学上的多数，也可以赢得各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列宁格勒、莫斯科、巴庫、基輔、哈尔科夫、奧德薩——的支持。即使斯大林在地方党組織中維持住多数，他也会为联盟的都市优势所击败。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閉会后的几个月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几次秘密聚会，商談联合各派力量的可能性問題。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間的深刻裂痕必須加以消除，因为季諾維也夫毕竟充当过反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主要宣傳家。在个人方面，仅就他們两个人之間而言，这是可以做到的；斯大林机器日益强大的事实，每天都在促使他們认識到彼此帮助的必要。在列宁臥病垂危期間，加米涅夫曾把列宁同他談話的內容告訴过季諾維也夫，也告訴过托洛茨基，因此，虽然托洛茨基遭受了两年的背后攻击，他同加米涅夫之間的友誼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托洛茨基在动身去德国时这样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我告別的时候，流露出了眞正依依难舍的感情；他們想到此后要面对面地同斯大林打交道，心情很不輕松。"①

可是，在这两派的下层成員当中，要消除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永久敌人"或者对如此辱罵托洛茨基的那个人所抱的怀疑和憎恨，却不是那么容易。重新安排原則和重新拟訂提綱，对于領袖要比对于信徒来得容易。不过，他們仍然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战斗。托洛茨基写道："在我們第一次会見的时候，加米涅夫就宣布說：'只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 523 頁。

要你同季諾維也夫在同一个政綱上列名就够了，只要这样一表示，党就会找到自己眞正的中央委員会。'"①

早在托-季联盟成为事实以前，斯大林就在忙于同它作斗爭。以一个天生的权力政治家的准确本能，他首先向对方的要害——軍队——发动打击。改变紅軍的体制是一个必要步驟，因为在当时，由托洛茨基締造的紅軍仍然保持着中央集权的組織形式，而这也正是托洛茨基潛在势力和巨大威望的基础。正如在以后經常所做的那样，斯大林打着民主化的幌子进行了夺取壟断权力的活动。

"1925年带来了一个新时期。那些早先鼓吹无产阶級軍事理論的人掌了权……在以后的短短几年內，竟有百分之七十四的軍队在民兵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組！"②

这种改組实际上同軍事理論、特别是同那种用作改組借口的"无产阶級軍事理論"毫不相干。每一个打散了的地方化軍队单位都被当地的党支部牢牢控制；而地方党支部則又日益为斯大林所掌握。即使有一些队伍不能够被爭取过来，另外一些却是能够爭取的；而那些不能被爭取过来的队伍比起过去、比起有一个相对独立于总书記的統一指揮部的那段时期，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即使抛开軍队普遍支持托洛茨基这桩偶然性的因素不談，斯大林也有害怕軍队的理由。在內战时期，他曾經組織过反对軍队——也就是說，反对托洛茨基——的斗爭；他在那次斗爭中理解到，党的壟断政治权力可能受到軍队的严重威胁。

在更广泛的范圍內，斯大林急忙着手于改組共产国际所屬的各国党，以此来对付威胁他的联盟。季諾維也夫在俄国党內仍然代表着足以維持他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力量，而这一点本身就是一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521頁。

② 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第218頁。

个很大的障碍；假如斯大林能够撤换他，就像以伏罗希洛夫撤换伏龙芝一样，即使再让另一个拉謝維奇坐第二把交椅，改組共产国际的进度也会比現在快得多。可是，作为一个現实主义者，斯大林暂时只做了他能够做到的事：共产国际的代表日益受到了威胁利誘。

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候选人名单

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于莫斯科举行扩大全会。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之間暂时宣告休战；在俄国代表团的建議下，全会决定不討論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問題。这使季諾維也夫得以继續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是作为回报，季諾維也夫也給予了斯大林以充分自由，使他能放手打击共产国际中一切反对他的集团。德国左派，馬斯洛夫-費舍集团及其近邻，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干預的主要对象。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一套仪式，每一个出席全会的代表都表示了他們对德国左派的敌視；声明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譴責德国左派不重視工会工作、忽略同社会民主党組成統一战綫、沒有足够的党內民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批評都不过是提出一个最主要罪名的开場白，这就是：德国左派是一个反布尔什維主义和不忠于俄国国家的集团。由于代表們受到严格約束，不得提及危机的眞正內容——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冲突、德俄两国的軍事联盟——对于德共左派这种反布尔什維主义的攻击只能利用各种巧妙的借口来进行。于是，代表們就这样同时公开表白了他們对新老板斯大林的忠誠和对季諾維也夫的遺棄，并且通过这些声明本身，向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各党灌輸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新教条。与此同时，季諾維也夫在这种曖昧境地中虽然頗为尷尬，他却感到有这样的把握：如果他能够重新控制俄共政治局，他就能把共产国际所屬的各国党爭取回来，使它們

拥护自己的政策。由于代表們并沒有被要求攻击他本人，他感到自己并不会由于等待时机而丢臉。

在这段时期，对我說来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保证我同馬斯洛夫以及其他德国朋友的通信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干扰。我采用了一种向某些俄国同志学来的方法：我用細绳子把信十字交叉地縫上，然后在绳子的好几处地方盖上印章。我以为，如果我的信有可能被偷看，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一定不会放过的，但他們总还不致于公然拆开密信。然而，事实表明这种預防措施太幼稚了。在二月全会会議期間，有一天，埃維特上台发言，开始一封接一封地宣讀起我給獄中的馬斯洛夫写的信。他不仅讀出有关政治的部分，而且朗讀那些純粹屬于私人性质的段落以娛乐听众。我跑上讲台，从他手上搶过了这些信件，并且在他企图拦我时动手打了他。我立即离开会議厅回到路克斯飯店。季諾維也夫打电話来問我发生了什么事；斯大林派貝拉·庫恩来探問这一事件的詳实情况。可是，尽管埃維特企图使我受到紀律处分，却沒有人打算把这些信要回去。

議程上的一个重要項目是，討論美国在欧洲事务中新起的关鍵作用。由美国提出的道威斯稳定化和工业合理化，据会議的分析，是超資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美国同貧困的和日益依賴他人的欧洲之間矛盾日益加深的前提。美国对欧洲經济的这种統治将促成“一个左傾欧洲的統一”，这个新欧洲由工会領导，将发展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貝拉·庫恩提出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泛欧洲”口号。

这样一个同苏俄組成統一战綫的工会主义欧洲，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論的基础。他的集团不厌其煩地把共产国际政綱中的这条新路綫，硬塞到各国共产党代表的头脑中去。这是斯

大林主义热闹好戏的另一幕，是以新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另一面来教訓人們的一幕。斯大林的謹愼党羽监視着这場檢閱；他們向每一个代表示意，希望他向新領袖表示忠誠。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后举行的这第一次共产国际会議上，发言者的情况表明欧洲各国党已經发生內部更动，傾向于支持斯大林。代表各国党发言的人如下：法国的塞瑪尔、意大利的陶里亚蒂、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德国的盖什凱和埃維特、①波兰的博古茨基、瑞典的基尔博姆、南斯拉夫的奥格亚諾維奇、美国的达西和挪威的福格逊。在俄国代表中，曼努伊里斯基在洛米納澤和芬兰代表庫西宁的支持下，为斯大林最热烈地大卖了气力。在这最后一次由季諾維也夫主持的共产国际全会上，也有一支反对派力量。德国左派的代表是烏尔班斯、朔累姆、恩格尔和費舍。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公开攻击俄国党，就像挪威的少数派代表阿維德·汉森一样。布哈林对这种譴責感到有些恼火，向波尔迪加反唇相譏，他指出：这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本身，就足以駁斥說共产国际不民主的讕言，因为全会邀請了少数派代表。“如果能进行这样一种討論，还談得上什么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內部存在着恐怖統治呢？”对于波尔迪加的党內民主概念，以及朔累姆要求把开除出去的左派集团都召回党內的建議，布哈林都斥之为“同領导的連貫性相違背”②。在他說出这句話的时候，朔累姆曾用“不理解！”的喊

① 在左派中央委員会控制德共时期，德国党常駐共产国际代表克拉拉·蔡特金不大公开露面。她发表了一篇激烈攻击德国左派、特别是攻击我的演說，在演說中，她作了大量的人身攻击。斯大林带着一个翻譯，快意地諦听着她的长篇謾駡；后来，一个朋友告訴我，斯大林曾几次贊賞地叫道，“多棒的老婆子！多了不起的老婆子啊！”

② 另一方面，台尔曼却又抱怨他难以打破左派領导的連貫性。“我們在柏林有一伙这样的干部，在路特·費舍的領导下，他們势力很大，过去五年来一直很少受到更动。經过长期的努力，我們才一步一步地打垮了他們。”見《1926 年 2—3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記录》，汉堡 1926 年版，第 205 頁。

声打断他。布哈林特别对路特·費舍和科尔施展开論战——前者认为共产国际目前正处在一条危險的道路上，后者提到了赤色帝国主义問題。波尔迪加提出召开一次共产国际非常代表大会，专門討論苏联国家政策和革命无产阶級的政策之間的关系，这一建議也遭到了憤怒的否决。

季諾維也夫所作的反对极左派傾向的总結，語气和緩而謹愼，避免明确地承担責任。

"我們同意这样一种意見，即今后两三年內一定会继續呈現出相对稳定的形势。某些极左派代表甚至认为会有十年的稳定。[朔累姆打断他說："誰这样說的？"]馬斯洛夫！馬斯洛夫认为我們至少得再等待十年[以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才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决定德国的命运]。

显而易見，我們必須考虑資本主义进一步繁荣的可能性。很明显，美国将不会丢开德国。假如德国突然又一次出現1923年10月的局面，在那里已經投入那么多資本的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一方面，欧洲通过美国的力量得到了'稳定'；另一方面，同一个美国又正在使欧洲革命化。"①

季諾維也夫继續說，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也正在美国化。他引证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几个領导人的話，这些人认为，逐步改革社会的道路是通过雇主和雇員之間的相互了解来进行的，他們强調美国社会未来发展中一切阶級的共同利益。美国劳工联合会被說成是"工人貴族之中的一个工人貴族組織"②。

共产国际的經济学家尤金·瓦尔加教授进一步发揮了这一論点：

① 《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記录》，第37—38頁。

② 同上，第34頁。

“欧洲已經丧失它作为世界工厂的統治地位；在向欧洲以外的市場輸出資本方面，它也不再能同美国竞爭……欧洲資本主义的这种瓦解及其結构变化，警告我們不要过高地估計稳定的时間和程度……欧洲虽然会出現一些短暂的繁荣时期，却难以避免长时期的危机；每遇一次危机，失业者的数字就要增加一次……[欧洲的]內战将继續进行，在长时期內不能定局。其最終結果可能是‘剩余人口’为战爭、饥餓和瘟疫所消灭；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可以作为美国的附庸而复活。”①

在全会閉会后，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继續进行。报导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議的3月16日《眞理报》，要求加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維克化。在同年7月举行于里尔的法共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二月全会上的最坚决支持者之一莫里斯·多列士，变成了法国党的新領袖。② 在1925年的工人党(美国共产党当时的名称)代表大会上，福斯特-坎农集团失去多数，而依靠莫斯科說它更忠实于共产国际的一紙海底电报，魯登堡-洛夫斯通少数派便掌握了領导权。这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第一桩；有人俏皮地說，美国共产党是用莫斯科的海底电綫吊着的。

英俄工会統一委員会

在此后一年中，两派之間的斗爭在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的俄共中央全会上不断展現出来。在这些全会上，斯大林逐一地更换了中央委員会的組成人选。这样做是悍然違背了党內仍然很重視的傳統，即中央委員会的政治成分只能通过全党討論，然后按規定选

① 《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記录》，第109頁以下。

② 在这些年代中，斯大林在法国党內的热情崇拜者之一雅克·多里奥，曾被奖予“法国的卡尔·李卜克內西”称号。在1944年，当他被盟国的飞机炸死时，他是一个納粹的支持者。

出代表大会进行研究，才能加以根本变更。这些全会是走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去的道路上的歇脚站，在这里，对立各方可以爭取支持者，彼此重新估量；但在这一时期，它們也是斯大林用来为本集团树立专政的工具之一。要反对斯大林，只能通过两种途徑：或是在党的机构内部进行斗争，或是采取不合法的手段。如果放棄合法斗爭，就等于放棄了立即取得胜利的希望，因为只有通过国家机关广播他們的政綱，才有可能把各种反对派力量团結在一个共同綱領的周圍。到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联盟組成以后，只有到那时候，才談得上直接行动的問題。

在托洛茨基临去德国以前，也就是1926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每一个反对派集团都单独提出了自己的声明。当时，它們之間的联盟还沒有建立起来。季諾維也夫特别希望把所有的工人反对派集团都包罗到联盟中来；他希望在“工人反对国家机器！”的口号下进行反斯大林的斗爭。

“就在这一次中央四月全会上，季諾維也夫无耻地歪曲党綱，为了党迄今沒有把工业交給工会管理而指責中央，也就是說，直接維护了前‘工人反对派’的要求。”①

托洛茨基从德国一回来以后，各种因素便促成了反对派的联合。国内的情况很糟：生产下降，工資減低，商品稀少。工人情緒的日益低落已經表現在——譬如說——最近的苏維埃选举中，据反对派估計，只有52—57%的无产阶級参加了选举。② 1926年4—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272頁。

② 只有36%的代表是工人，这比1925年下降了10%。在市苏維埃中，党員人数逐步减少；造成这种現象的部分原因是，斯大林施展手腕，在党外寻求支持来对付党内的反对派。在1922年，市苏維埃中的共产党員占70%，1923年占60%，1924年占57%，1925年占46%，1926年占36%。（参看莫洛托夫对莫斯科党組織所作的报告，《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第1854頁。）

6月間，联盟逐渐达成正式协議。它由下列各集团組成：

1. 托洛茨基反对派；

2. 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新反对派；

3. 以薩普罗諾夫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

4. 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維捷夫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

5. 格魯吉亚的反斯大林集团。

最后三个集团已經有一只脚站在党外。它們在下級党員和非党工人中拥有支持者。

这样，反对派联盟便聚集了很大一部分布尔什維克老近卫軍。它代表了工业中心反对党內新兴統治等級和內战时期那一代人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綫的情緒。斯大林集团通过玩弄一系列手腕，已經变得高高在上，非一般党員所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情地”运用如此取得的国家政权来粉碎任何反对派。这些策略終于把党員中的一切反对派集团、一切被日益走向极权主义的方法排斥于党領导之外的集团都推进了一个大联盟。

联盟在国外拥有許多支持者。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斯大林就一直在利用把反对派分子送出国的办法来削弱俄国的反对派集团，因此，到这时候，大部分使館和商务代办处中都有不少同情季諾維也夫或托洛茨基的人。这些政府官員限于身分，不得不支持斯大林路綫，但他們組成了一个极好的情报网，把联盟的活动告訴国外各党內部的反对派集团，并且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报告本国的联盟。通过对斯大林政策的暗中破坏，他們增加了对总书記的压力。如果联盟获胜，它就能从这一大批老布尔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后备軍中补充干部，这些人已經在国外取得广泛的經驗和有价值的联系。

1926年4月的中央全会剛一結束，国外便发生了两桩对两个

集团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波兰的毕苏斯基政变和英国的总罢工。

5月12日，毕苏斯基向华沙进軍，經过三天巷战后，他推翻了农民領袖維托斯的政府。几天以后，主要以参加政变的“团长們”为支柱的毕苏斯基新政府，获得波兰議会多数的批准。这一发生在俄国前院的事件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在以后几个月中，党的領袖們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

分裂成好几派的波兰共产党，傾向于在不同程度上給予毕苏斯基以有批判的支持。大家都认为他走得还不够远，但作为前进的一步，应該把他的革命熔合到波兰工人阶級的一般运动中来。这种政策很快便为俄共政治局所糾正，在政治局看来，毕苏斯基政变是英美向俄国側面刺来的一刀。从1925年秋天以来，美国专家凱默勒博士就一直在波兰进行考查，以便为提供道威斯式的貸款奠定基础；这种打算把美国影响一直扩大到苏联边境的做法，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安。

另一方面，毕苏斯基暴动是波兰对欧洲极权主义統治总趋向的一个貢献，虽然这种趋向在波兰始終沒有发展成熟。毕苏斯基开始发动政变时提出了一个后来永未实現的綱領，表示要把工业收归国有，并通过国家帮助来发展和刺激农业。根据政治局的解釋，波兰是另一个步意大利后尘走向法西斯主义和軍国主义的欧洲小国。

政变对俄国的派系斗爭也产生了影响；反对派联盟从这件事上受到了另一个启发。在流血和混乱达到最小限度的三天之內，毕苏斯基便在不改变波兰社会結构的情况下接管了政府。在波兰这样輕而易举地实現了的事，难道不能在俄国如法泡制嗎？难道反对派分子不能同样接管政府而仍然保持着国有化經济的基础

嗎？反对派分子这样考虑着，而斯大林也不是不懂得观察政治預兆，他进一步加紧了自己的控制。

英国发生总罢工这一事实本身，似乎便证实了斯大林所說的話：英俄两国工人很快就有可能联合起来。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論的基础，是他所解釋的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① 美国要統治欧洲的企图，将促成一个工会欧洲发展起来，同資本主义美国的霸权相对抗，而社会主义的俄国則会被接納进这个大集团——起先是作为合作者，然后便可以成为它的領袖。

从 1917 年革命以来，英国工人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亲苏情緒。英国的工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緒，但是，即使是在沒有直接反映出这种情緒的时候，下层群众的压力也常常使本来会采取反苏立場的領导集团改变态度。費边社会主义者、英国工会运动史的作者悉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几乎变成了非共产党人中正式的苏俄辯护士，这一事实就体現了普遍的情緒。1920年，一个英国代表团去俄国訪問，团員中包括著名工党領袖艾伯特·柏塞尔② 的妻子菲利普·斯諾登夫人和罗伯特·威廉斯。在发生“季諾維也夫信件”問題时，英国工会曾經維护苏联，反对本

---

① “在第一章中，草案〔1928年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綱領〕便指出，‘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一条絕对規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变得更为加剧。’

这种說法是正确的。这一段話部分譴責了斯大林最近在同一問題上提出的公式，按照他的說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知道那条据說是列宁第一个发現的发展不平衡規律……

一种更为正确的說法应当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为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所制約的……各个时代各部分人类发展水平的极端多样化和发展速度的极端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起点。”参看托洛茨基：《列宁去世后的第三国际》，紐約 1936 年版，第 18—19 頁。

② 1925年，在英国职工大会的支持下，柏塞尔曾去美国游历，以便获得美国工会的支持，促使美国承认苏联。

国政府对它的攻击。苏联的最热烈維护者之一，是矿工联合会主席庫克。在他为鼓吹两国友好而进行的活动中，他得到了不少工人領袖的支持，例如他的老朋友亚瑟·霍尔納(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共产党的領导成員和南威尔士区矿工联合会主席)、埃倫·威金逊(他在1924年脫党)、菲利普斯·普賴斯、乔治·兰斯伯雷等等。只有在英国这一个国家，像埃倫·威金逊这样的異端分子才能安靜地退出本国共产党，并且继續对莫斯科公开表示同情。

这种自始至終都違反英国外交部官方政策的对苏俄的同情，在1925年体現为英俄工会統一委員会的建立。在运輸工人国际的支持和"荷兰佬"埃多·費姆曼（他是三十年代欧洲工会界最重要的同路人之一)的領导下，它的左翼强大到足以推动欧洲最保守的英国工人运动同俄国合作。在俄国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項成立統一委員会的决議，这一建議在英国被接受。另一个英国工会代表团，这一次是在柏塞尔的率領下，于1924年最后两个月內訪問了俄国，并于回国后发表了一部热情称頌苏联的見聞录。① 作为俄国工会領导人，托姆斯基进行了回訪；他以兄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25年5月在赫尔举行的职工大会。5月14日，拟定了一份成立英俄委員会的协議书，两国工会的代表分别在协議书上签了字。

斯大林希望英国工会同明显反俄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决裂，从而构成一个新工会国际的核心。然后，就可以让莫斯科控制的赤色工会国际同这个国际合并，或者把它解散。尽管俄国党

① 《俄国》，英国工会代表团于1924年11—12月訪問俄罗斯和高加索的正式报告，倫敦1925年版。

値得指出的一个怪現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开始同情苏联的奧地利左派社会党人弗里茨·阿德勒，当时却激烈反对这一政策；他的同国人奧托·鮑威尔支持他的立場。

內业已产生的对立是如此尖銳，认为它能够通过欧洲的根本变化而摆脫困境的微弱希望还沒有消失。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都极其关心地注視着英国工会的这种友好态度，在英俄委員会剛成立的头几个月里，他們两人以及整个俄国領导集团全都认为它是一个新时期的預兆。这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一个在俄国社会經济現实的石头城堡中被囚禁着的、軟弱而蛻化的工人运动的代表，对外界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步驟都抱着夸大了的希望。在斯大林看来，这是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成果；現在，主要的任务已經只是保卫苏联的問題了。社会主义不是通过无产阶級革命，而是通过俄国的**示范作用**来实現的。

托洛茨基对英俄工会合作的前途最抱怀疑；他警告說，联盟在遇到第一次眞正考驗时就会破裂。英国工会根本說来是忠于本国政府的，在英俄两国发生的任何严重冲突中，它們都将支持英国政府。大英帝国还非常强大，远不是莫斯科的总书記办公室通过英俄工会統一委員会和托姆斯基同志所能操纵的。英俄两国的利益冲突不会这样容易地被消除。在英国，阶級斗争还沒有成熟，在俄国，阶級斗爭在革命中达到高潮以后，这时正在衰退。想通过两国工人阶級上层之間的联系把这两个集团結合在一起，只能以失敗告終。斯大林由于对英国工人运动存在着根深柢固的誤解，自以为能够把它拉到自己的权力体系中，这是他的特色。

对这种新思想的考驗，随着1926年5月的英国总罢工和接着发生的九个月矿工大罢工而到来。罢工显示了英国工人阶級的潜在战斗性；它深深震撼了英国社会。在这一年中，共产党的党員人数迅速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机关报的发行量达到这个数字的十倍。苏联工会用大量捐款支持了英国罢工者。罢工終于被破坏了；大部分英国工会領袖，特别是欧內斯特·貝文，坚决反对这次罢工。

斯大林派往倫敦的几个人，彼得罗夫斯基、托姆斯基和埃維特，为了維持住英俄委員会，实际上批准了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員会破坏罢工的政策。他們的这种态度幷沒有換来任何好处，因为他們沒有能把領袖爭取过来，而英国工会会員对領袖們的深刻不滿也发泄到了共产党人身上，他們的影响再次一落千丈。

林中会議

英国总罢工的失敗在莫斯科引起深刻反响。托姆斯基和其他俄国人的出現于英国，加剧了两国之間的紧張关系，这种状态在以后几个月內发展到几乎要发生战爭的地步。英国工会幷沒有有效地抵抗鮑德溫內閣的政策，英俄两国工会之間的"团結"終于在国际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冲突)的險峻礁石上碰碎了。1926年6月26日，內政部前一天发表的证明英国共产党人勾通莫斯科的文件，在下院引起一場激烈辯論。第二天，在为了防止英国間諜滲入俄国的需要这一受欢迎的借口下，俄国随即通过了一項加强国家政治保卫局权力的新法律。

斯大林主要利用加强的权力来对付反对派——他們已經由于他的政策在英国的失敗而大大增强。尽管出現了这項新法律，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仍然感到鼓舞，因为他們为联盟扩大力量的活动——这时已不得不带有密謀性质——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响应。联系的范圍远达海参崴。分散的地下組織由三人委員会領导。带着通訊密碼的反对派信使被派往各地，散发政治局的文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項严重罪行。他們秘密躲藏在反对派成員的家里，因为官方住处都安置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密探。信使們旅行时都跟着护卫，以免为"白卫分子"的流彈所伤；在他們聚会时，也总是布下护卫，防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突然襲击。

与此同时，开除党員的工作在继續进行。为了說明这些被大批开除出党的人的身分，也許值得引证一下中央监察委員会的一份文件，即該委員会关于1926年7月26日在莫斯科被开除出党的一批人的履历說明：

“1. 米哈伊洛夫，莫斯科一家工厂的經理，支持工人反对派的米雅斯尼柯夫。他曾同楚加耶夫、奥西普、雅卓克等人一道，油印幷散发了若干秘密文件；該集团自称为‘工人眞理派’。

2. 别連斯基，1884年生，1901年参加社会主义活动，1903年成为布尔什維克，通过自学获得文化，1908年当兵，从1912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莫斯科紅勃列斯尼亚区党組織书記。[我认識别連斯基。他是那种純朴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在莫斯科的下层党員中很得人望，眞称得上是全心全意地忠于革命事业。]

3. 切尔尼朔夫，1892年生，农民出身，1918年入党，先在沙皇軍队中，后来参加紅軍(1919—1921年)。别連斯基組織中的成員。

4. 沙皮罗，1898年生，铁匠，1918年加入党和紅軍。

5. 华西里耶夫，1895年生，紡織工人，1917年3月入党。

6. 符拉索夫，1884年生，铁匠，1918年入党。”①

在这种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联盟領袖开始策划最后的步驟。即使他們在党內取得了多数，他們肯定斯大林也不会把党的領导权让給他們，因此，他們必須准备好以武力支持党的意志。他們认为，他們将不得不同越来越多的恐怖措施作斗爭，反对派的領袖也許会被突然暗害。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都采取了个人預防措施，甚至当他們在共产国际总部附近走动的时候，都得拉上一两个忠誠的朋友陪伴着。

---

① 《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第912頁。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5年同斯大林决裂以后，两人都在可靠的地方藏下了这样的遺书：

‘如果我們突然死去，要記住这是斯大林下的毒手’。

他們劝我也这样做。‘你以为斯大林大概正在考虑怎样答复你的論点吧，’加米涅夫对我說，‘决沒有那样的事。他正在打算怎样能不受懲罰地干掉你呢！’

……这些話并不是猜測，在三雄政治正搞得火热的时候，他們彼此談起話来是十分坦率的。”①

党內的形势在常常被人引用的列宁寡妻的一句話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結；她曾經說过：如果列宁还在世的話，他就得住在监獄里。

因此，当反对派領袖决定討論他們綱領中的軍事問題时，他們并不在任何屋子里聚会。全莫斯科沒有一处地方可以认为是完全保險的；任何一間屋子都可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耳目。他們选擇莫斯科近郊的一处树林作为聚会地点，在那里討論了軍事方面的布置：如果“合法”的反对派爭取到足够的支持力量以后，那些仍然忠于托洛茨基的部队应該怎样行动。这主要是一項由托洛茨基和拉謝維奇这两个軍事領袖安排的技术問題。由于拉謝維奇作为紅軍的副总指揮，仍然处于較好的合法地位，因此决定让他負責筹备反对斯大林的軍事行动，而行动的时間則由联盟的領导委員会决定。与此同时，他要在軍官中組織反对派核心，作好同时采取行动的准备。他們希望，托洛茨基和拉謝維奇联合起来的威信会构成足够大的軍事影响，依靠这种影响来支持党內的潛在多数，就有可能迫使斯大林放棄无希望的掙扎而自动辞职。

当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从我的朋友施克洛夫斯基那里听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頁。

到了这些准备情况，后来在柏林，又从其他朋友那里再次听說了其中的情形，因此，我知道討論的內容是多么复杂。关于軍事压力应該在多大程度上同夺取党內領导权的斗爭(大部分是地下活动)結合起来的問題，联盟存在着分歧意見。托洛茨基所一再宣布的观点是最正确的了，这就是：他从不打算发动政变，他从不希望在沒有党和全国群众的支持下推翻斯大林。这些人本身都是老派革命家，他們在一条走极端的路綫面前长期迟疑不决，因为这种路綫可能导致全国发生混乱，以致造成两派都为反革命力量所推翻的結局。他們担心自己的发动会引起一系列騷乱，結果可能使俄国整个瓦解，导致資本主义复辟——这种顾虑一直是妨碍国内外反斯大林主义者获得成功的最严重阻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这一直是导致反斯大林主义集团相继潰敗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反对派在为苏維埃社会可能被扰乱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础却正在被改造为斯大林主义的权力机器。斯大林通过手下的密探知道了林中聚会的事，虽然他还不知道反对派領袖聚談的內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使他大为恐慌，急忙动員全党防范可能发生的政变。波波夫写道，在聚会时，拉謝維奇“說明了反对派联盟‘迫使中央屈膝’的計划，要他的听众特别注意在紅軍中进行活动的必要性”①。

下一次中央全会在7月举行，但是在此以前，我已經設法回到柏林。馬斯洛夫已經在监獄中被囚禁两年以上，到7月10日德国通常要宣布一次特赦的时候便会被释放。6月初，季諾維也夫告訴我，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短期休假去了，我应該趁他不在的时候設法逃走。他問我能不能撒野哭鬧一番，我回答說，我希望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274頁。

最好是不必鬧得太凶就能让我走。他告訴我，布哈林将負責在政治局里办好一切。他对你个人很有好感，极願意帮助你，但是你必須給他一个違令放你的借口。最后，我終于表示同意，于是我們安排了一套行动方案。

第二天，当政治局正在开会时，我突然冲了进去。季諾維也夫站起来。裝出怒气冲冲的样子命令我出去；他責备卫兵不該让我随便进来。我开始擂桌子，大嚷大叫要他們放我回国。长期压抑的感情一旦得到机会，便极其强烈地爆发了出来；我暈过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布哈林正在向我嘴里灌茶。他对我說，路特，你可以回国。我們对自己的同志不会采取恐怖手段。我剛給皮亚特尼茨基下过命令，要他給你准备护照。

他們用一辆共产国际的汽車把我送回路克斯飯店。几小时后，皮亚特尼茨基給我拿来了护照，但是面色阴沉，态度很不友好。他不肯給我旅費，于是，我的好几个朋友（特别是波兰人亨利克·道姆斯基尤为热心，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被枪决）便为我四处奔走弄錢。我当天便启程回国，旅途上非常紧張，直到出了俄国国界，肯定国家政治保卫局不会在那里把我劫下火車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我曾經几次檢查了我的行李和所帶的文件，以保证里面沒有任何違禁材料；我其余的东西后来由一个同情季諾維也夫集团的外交信使帶到柏林。①

这件軼事本身虽是一件小事，在另一方面却很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了人們是怎样間接抵抗极权主义統治措施的。我毫不怀疑，

① 1926年7月4日，德俄两党駐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議："据执委会主席团报告，路特·費舍同志違背1926年3月31日共产国际决議（55号議事录，第11—A节）和1926年6月5日执委会书記处决議（19号議事录，第19节），业已徑自回国。該項行动是对共产国际党紀有意識的和严重的破坏。"（《国际新聞通訊》，1926年7月。）

季諾維也夫准是同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安排了让我逃走的詳細計划，因为这两个人虽然处在斯大林的管轄之下，却願意参加这件反对他的小小行动。但他們需要让斯大林抓不到把柄，因此得給他們一个借口。布哈林完全有理由指出，我当时非常激动，很可能引起外国記者的注意，那样一来，他們就会如获至宝地抓住这件事，宣傳有一个共产国际官員被强扣在莫斯科等等。皮亚特尼茨基則可以推托說，他只是执行上級命令預备了一份护照，此外并沒有再做任何事情；他曾經拒絕給我旅費。

在7月的中央全会上，联盟第一次以反对派联合陣綫的姿态出現在全党面前。在一篇由托洛茨基代表整个集团宣讀的声明中，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承认他們过去互相攻击是犯了錯誤。季諾維也夫宣布，托洛茨基在1923年对党官僚組織的攻击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承认，当他在《十月的教訓》一文中給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加上"机会主义"罪名时，他自己犯了严重的錯誤。这种相互大赦立即被指責为"极度缺乏原則"，因为一切反对者的联合对斯大林集团来說是一个严重危險。在反对派联盟內部还存在着許多分歧，但它圍繞着两个根本論点团結了起来，这两点是：一、单在俄国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二、放棄了革命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維克党正在蜕化。反对派政綱从解釋列宁的話出发，談到"一个被官僚主义歪曲了的工人国家"。它譴責斯大林集团造成下列錯誤：

"1. 那些企图把我国拉入資本主义发展軌道的力量有了过分的增长；

2. 工人阶級和貧农的地位削弱了，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力量則日益强大；

3. 工人国家在反对世界資本主义斗爭中的总地位正在削弱，

苏联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①

联盟建議，在完全把国家党改变成一个民主工人政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全会的官方报告中充满了斯大林对这种"超工业化"計划的斥責。反对派的計划是以工业化和"工人管理"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为基础的，这个前提是反对国家党壟断苏联工业的战斗口号。另一方面，只是在每一个独立的工人組織的残余全都被摧毁以后，斯大林才开始了他的全面工业化。在这段时期，他却宁願維持农民俄国的現状，而不願去冒削弱国家党的風险。

如果不了解斯大林为国家党壟断大权，在国家党內部为他的集团壟断大权而进行的斗爭，斯大林激烈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計划一事就成了一个悶葫芦，成了时常使自由主义观察家大惑不解的秘密之一。事实是，反对派的工业化計划和斯大林的五年計划是两回事；他們的出发点不同，所要造成的社会图式也不一样。早在1924年，季諾維也夫就曾考虑过容許一个貧农的政党参加苏維埃。在1926年的四月全会上，当提出了把管理权交給工会的要求时，反对派的这个工人民主口号也被提了出来。只有在"工人集团"被粉碎以后，才能以五年計划的恐怖主义方式实行工业化。

七月全会的一个主要議程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問題。斯大林的

---

① 見反对派政綱，轉引自托洛茨基：《俄国的眞相》，第33頁。反对派的成員之一奥索夫斯基要求立即給予一个新的无产阶級政党以合法地位。七月全会一結束，他便被开除出党。奥索夫斯基生于1893年，铁匠出身，1918年入党，任計划委員会委員。他在1923年3月第一次被开除出党，1924年1月恢复党籍，1926年8月10日再次被开除。他曾要求让反对派政党（包括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获得合法地位。当时，单是提一提让这些改良社会主义者合法存在，就是大逆不道，可是，尽管在莫斯科是这种情况，同欧洲的改良工会主义者謀取团結的努力却一直沒有中断。

政策在英国的失败、德国党的公开分裂、这种分裂对欧洲其余各国党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被用来譴責斯大林主义干涉的破坏性影响。斯大林在答辯时充分利用了季諾維也夫几个月前对馬斯洛夫-費舍集团的指責（这时，联盟已經公开和它站在一起）。

七月全会以反对派联盟获得道义上的胜利而告終。它的队伍团結起来了，并且在党内得到了有利的反响。現在，各地的党組織都已知道一場新的斗爭正在进行，存在着推翻斯大林集团的机会。經济情况是不好的；"征粮政策"已經把国家弄得毫无粮食儲备，結果不得不在公开市場上以高价购买粮食。① 可是，反对派失去了重要的組織位置。季諾維也夫被逐出政治局，拉謝維奇被取消中央委員資格。加米涅夫甚至連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也无法保住，米高揚代替他担任了貿易人民委員。

斯大林剝夺反对派的党內合法地位

共产国际內部的斗爭紧張化了。柯倫泰从挪威被派到墨西哥，离莫斯科更远了一步。加米涅夫被給予駐东京大使的职位，但他拒未接受。8月20日，季諾維也夫的假定继承人布哈林也飞到柏林清洗德国党去了。

我在两个月前回到柏林时，发現德共党內的各个集团仍然在进行着激烈斗爭。馬斯洛夫在7月10日获釋出獄，于是，我們一道展开了支持俄国托-季联盟的活动。当布哈林到来时，他假装对我在莫斯科愚弄他的事很生气；他遵照斯大林的命令，立即着手

---

① 最高国民經济委員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为中央委員会辯护，反駁皮达可夫在国家經济和新耐普曼的关系問題上对中央的各种批評。捷尔任斯基在发表过演說几小时后就突然去世，接替他的是古比雪夫，到1930年，古比雪夫又为奥尔忠尼启則所替換。

清党，不仅把馬斯洛夫和我本人，而且把另外三个左派領袖胡果·烏尔班斯、魏納·朔累姆和威廉·施万都开除了。我們，加上另外几个接受我們的政綱的議員，在議会中单独組成了一个集团。我們在柏林建立起总部，展开广泛宣傳。1927年中，图林吉亚索尔区党組織轉到我們这方面，他們带来了一家报紙《人民之声报》，于是，这家报紙便开始宣傳俄国反对派的政策。

七月全会以后，联盟在俄国变得非常活跃。它的成員参加各个地方的党小組会議，力图掀起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对党小組討論的这种干預，在斯大林看来是一种不可饒恕的罪行，因为对党小組的順利操纵是壟断統治的基本前提。譬如說，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就出席过莫斯科航空仪器飞机制造厂的一次会議；这种企图把飞机制造工人爭取过去的努力，被认为特别具有危險性。

"党机器进行了瘋狂的反击，思想斗爭让位于行政手段了：打电話召集党官僚参加工人地方組織的会議，在一切会場面前布置大量安着警报器的汽車，当反对派分子登上讲坛时报之以經过周密組織的噓声和起哄。"①

中央委員会下令成立和反对派作斗爭的"别动队"。大量情报員被組織起来，派到各单位参加党小組会議，然后回来汇报情况。在十月全会举行前夕，斯大林发出在全国各地清洗反对派分子的命令。有些人被逮捕；許多人在党內工作需要的名义下，被流放到俄国遙远的东部和北部亚洲地区。丈夫和妻子一般都被分配到不同的崗位上。

在进行这种迫害的同时，斯大林又向反对派領袖提出新的建

---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528—529頁。

議：如果他們放棄一切罪恶活动中最大的罪恶——分裂党的話，斯大林願意恢复大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在党和政府中的职位。反对派領袖害怕他們的支持者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全部打散，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以便爭取时間，好继續进行反对斯大林机器的密謀活动。10月16日，也就是全会召开一星期之前，

“我們发表声明，宣布我們虽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保留我們在党組織內部为之进行斗爭的权利，我們願意放棄那些有分裂党的危險的活动……这表明我們願意留在党內继續为它工作。虽然斯大林主义者在締結协定的第二天就破坏休战，我們仍然贏得了时間。1926—1927年的冬天給了我們一段喘息时間，使我們有机会对許多問題作了更徹底的理論考察。”①

作为上述声明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同俄国的工人反对派和共产国际中的左派脫离了关系。

10月14日，挪威左派共产主义者阿維德·汉森到达柏林，他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險，带出了一大包俄国反对派的秘密材料。对季諾維也夫的忠誠使他成为信使，虽然他知道如果在边境上受到搜查，挪威国籍是挽救不了他的。我們仔細檢查了文件，决定那些应該譯出公布，那些只供我們的集团內部参考。这些文件有一大包，我們一口气工作了三天。然后，在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們出去散步休息；我們买了一份报紙，不料在头条新聞中就談到这样的消息：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业已放棄反对派活动，并同馬斯洛夫-費舍集团断絕了关系。汉森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他离开莫斯科才一个星期，在同季諾維也夫所作的一次秘密长談中，季諾維也夫曾要求他千万要坚定。他不能理解这种“背叛”；結果，他竟同反

① 托洛茨基：《自傳》，第529頁。

对派断絕关系，回到斯大林的陣营中去了。

不理解反对派何以发表这項声明的人，幷不止汉森一个；这給反对派联盟的团結(特别是在俄国以外)带来了災难性后果。它多次被举出来做例子，說明反对派的“品格有亏”、“缺乏原則”、“投降”等等。可是，这样一种估价是不恰当的。不論是这一次或以后的退却，都不能用自由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它們不是发生在汉森的挪威。在这些过渡年代中，对于党和国家日益发展的极权主义性质的抵抗，必須同党內生活日益发展的独裁形式相适应。当压力太大时，必須退却和重新集聚力量，然后再发起进攻。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独裁党的斗爭中，联盟的过錯幷不是为“原則”进行的斗爭太少了，而是在被消灭的危險已經临头的时候往往退却得过迟，不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合适时机重新进入战斗，而是在斯大林的挑逗下盲目乱动。

利用这些方法，斯大林集团在1926年10月22—26日召开的中央监察委員会和中央委員会全体联席会議上贏得了压倒多数。联席会議解除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員和季諾維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① 不过，即使是这种全盘清洗也不等于取得最后胜利。斯大林的多数是靠在党內大大加强威胁和恐怖而获得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党員們被迫給了他支持，但也因此对他心怀不滿。如果联盟能在俄国国內外重新发动进攻，斯大林的多数不是沒有垮台的可能。

十月全会以后，中央监察委員会邀請德共左派領袖去莫斯科，以便审查他們被开除出党的問題。我們在柏林討論了很长时間，研究是否接受这一邀請，最后决定有俄国国籍的馬斯洛夫不去，共

①·11月22日，托洛茨基又被解除了科学技术委員会主席的挂名职务。几天以后，季諾維也夫被任命为国家計划委員会主席团委員——这是眞正的斯大林手法。

余的人虽然无疑地也有危险，但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宣傳我們的观点，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在莫斯科，施克洛夫斯基一看見我就說，“你瘋了嗎？”斯大林胜了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一个回合以后，无疑地在希望利用他們反对我們的声明，爭取把我們拉过去。

委員会主席是奥托瑪·庫西宁。大部分会議都是秘密举行的，但是一部分审問的速記記录被发表了出来，① 以便为俄国政治局辯护，否认它破坏德国共产党的責任。作为表明斯大林主义恐吓手法的一个典型实例，我們在下面轉載了这一官方文本的一部分：

“庫西宁：……我們不得不审理被开除出德国党的五个人，路特·費舍、馬斯洛夫、烏尔班斯、施万和朔累姆的上訴，审查了和开除他們出党有关的全部材料。……我們給了他們陈述意見的机会，以便确定他們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究竟是恢复他們的党籍和重新让他們加入共产国际，还是最后批准开除他們的决定。上訴人不滿意这种程序，他們向有些人，例如拉狄克同志訴苦。〔喊声：听啊，听啊！〕

費舍：我們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原告〔！〕到这里来的，我們要指責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內目前正在执行的政策，一种将会使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走向毁灭的政策。

庫西宁：我們这些‘原告’里有一位并沒有被委員会看到。五个人里只来了四个。乐队指揮竟沒有出場。他宁願在德国警察的保护下继續攻击共产国际和德国党，而不願在扩大执委会的委員会面前为他的观点进行申辯。那四个来了的人全按照第五个人的指示讲話：

---

① 《国际新聞通訊》，1927年，第180—183頁。

'我們沒有带馬斯洛夫一起来，为的是不让他落到你們手里。'

他的同伙在委員会里暗示，馬斯洛夫假如到这里来，也許就不让他回去了。我們說，党的机关只拥有道义手段，党的法庭作出的判决只有道义上的約束力。但是这些人竟回答說：'我們不相信苏維埃机关！'

我們一共向他們提出十六个問題。我現在就来非常簡单地說一說他們对这些問題的回答……

'你們承认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苏联的政策同国际革命的利益沒有任何冲突嗎？'

路特·費舍回答說：'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同俄国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們完全贊同季諾維也夫同志的具体說明。'

針对这一点，我們指出：'可是，季諾維也夫同志已經公开和你們划清界限了。'但路特·費舍只是以下列方式重复了她說的前半句話：

'在所有这些俄国問題上，我們都贊同俄国反对派的观点。……特别是那些眞誠支持无产阶級专政的人，更必須同这种政策进行最尖銳的斗爭，'也就是說，同'苏維埃国家的政策'和'这种斯大林政策'作斗爭——这两个名詞她都使用了…………

这些人认为自己沒有錯誤，沒有任何可責备的地方。你可以一連詢問他們好几个星期，到最后，他們仍然不会承认自己有半点錯誤、半点过失。上星期天，我們以最大的耐心一連詢問了他們許多小时，最后，我們对所有这些回答都有些厌倦了——因为这些人表現得好像眞沒有任何錯誤或过失似的……

他們談到了共产国际的'危机'、'蛻化'和'瓦解'等等。"

第二十六章　联盟的失败

在这段时期的每一次党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的多数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巩固的；他在每一項决議上获得的票数，似乎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个多数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团結紧密的整体。在党內寻求平衡的三个主要集团一同投到斯大林的麾下——莫洛托夫最能代表的党內新兴的統治阶层，以托姆斯基为代表的工会，由布哈林和李可夫領导的緩和派。人們曾希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会化为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胜利，但这种希望并沒有实现，而国外的每一个失败在党內都有反映，使斯大林拼湊成的多数发生了离心震动；在每一次挫折之后，他总要依靠对反对派更多地使用暴力来重整威信。1926 年斯大林在英国的实驗，曾使他在政治局中的地位有所降低，而 1927 年他在中国实行的政策，則使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多数。

斯大林和蔣介石

从一开始起，中俄两国革命者之間的关系就是眞誠友好的。布尔什維克政变一成功，孙中山就向列宁致电祝賀。1919 年 7 月，苏維埃政府在“对华宣言”中宣布放棄沙皇政府对中国領土和財产的一切权利。不过，在最初这几年中，双方的联系还不多，因为在俄国內战期間，中俄直接交通綫被高尔察克部队一直封鎖了十八个月。

1921 年，荷兰共产党人馬林—斯尼弗力① 同孙中山进行联系

①、亨利克·斯尼弗力在二十年代中期脫党，成为一个反斯大林社会主义团体的領袖，并被該团体选入荷兰議会。納粹占領期間，他同另外六个同志一起被捕；他被誰

后，对年輕的中国民族主义組織国民党印象很好，作了于他們有利的报告。1923 年 1 月，孙中山和苏联外交家阿道夫·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在那一年，国民党聘請了一批苏联顾問，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鮑罗廷。

通过他来中国的这一使命，米哈伊尔·鮑罗廷变成了共产国际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他过去是俄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身世和政治色彩都不很清楚，1905年革命之后一段时間內，他化名格魯森堡移居美国。在这里，他做过各种工作，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一段时期，他化名伯格在芝加哥开办一所商业学校。他于1918年回到俄国，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被視为外交专家，曾多次被派往国外工作，去过德国和土耳其，可能还去过墨西哥。当他被派往中国去的时候，他的鴻运来了。

鮑罗廷坚持国民党应該有"一套明确的党的原则、党組織的团結一致和严格的党紀"。从一开始起，求教于莫斯科的国民党組織結构就是俄国范本适应于中国情况的产物。鮑罗廷帮助建立了黄埔軍校；在軍校中，由德国和俄国教官訓练中国士官生。在莫斯科，建立起一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 年，又創办了中山大学，由卡尔·拉狄克担任校长，在这座学校的全盛时期，学員人数几达一千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蔣介石也在莫斯科的一所紅軍学校进修，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对它进行了研究。

1924年，莫斯科指示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①

世太保杀害，在牺牲时，他表現了視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关于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可参看哈罗德·艾薩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倫敦 1938 年版，第 61—65 頁。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出席的十三名代表中，有現在的中共領袖毛澤东。在 1924 年，也就是共产党并入国民党的那一年，中共党員还只有一千人左右。

后来，有两名共产党人成为新国民政府中的部长。① 斯大林和布哈林企图操纵东方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取得胜利，借以弥补俄国威信在德国遭到的損失，因此，他們使一切“原則”都适应于这种新的努力。他們制造出适合于需要的理論；以冗长、复杂和教条主义的宣言为这些理論作解釋。布哈林提出的中国民族革命中“四个阶級联盟”的理論，变成了苏联在全亚洲实行新政策的起点。被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的民族資产阶級同工农結成統一战綫，将成为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在亚洲的翻版。

早在1923年，托洛茨基就开始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在一系列无关痛痒的和煩瑣哲学的冗长論辯中，他不断攻击对方的弱点——认为蔣介石和他的国民党会是共产国际忠实盟友的幻想。托洛茨基——后来还有季諾維也夫——警告俄共說，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但是，斯大林打算从莫斯科控制整个欧亚地区的迷梦，可不是容易被震醒的。②

1925年7月，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派利用当时高漲的群众运动控制了广州的党組織。在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继任国民党領袖的蔣介石，乃于1926年3月突然襲击广州城。他逮捕了好几名共

① “你們知道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部长……后来，他們……便不再到部里办公，自己根本就不露面，而让成百的职員代替他們工作。在这两位部长活动期間，沒有頒布过一項有利于工农的法律。这种应該受到譴責的活动，以一种更应該受到譴責的可耻結局而告終：最后，这两位部长竟一个宣布因病不能視事，另一个声明要出国游历；……他們并沒有通过一項政治声明宣布辞职。”契塔罗夫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轉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問題》，紐約先鋒出版社1932年版，第286頁。

② “假如1905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現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組織，那末可能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維埃了。……由此应得出什么結論呢？由此应得出这个結論：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現在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維埃在1905年对俄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斯大林在1927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的演說》。《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3－274頁。）

产党領袖，給他們加上阴謀推翻国民政府的罪名，并且枪毙了他們的一些支持者。关于这些事件，共产国际的任何报刊都不許有絲毫透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毫无改变。与此相反，在发生这次广州事件的两个月以后，党又恢复了从内部接收国民党的政策。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于1926年5月召开中央非常全会，这次会議通过了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其內容如下：1. 共产党人不得批評孙中山的主义，而只能对之絕对服从；2. 共产党須将加入国民党之全部党員名单交国民党保存……3. 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級党部不得占委員三分之一以上。4. 共产党員不得担任中央党部各部部长。5. 未經党批准，任何国民党党員均不得以党的名义召开討論党务的任何会議。6. 未經党的最高机构批准，凡国民党党員均不得加入任何其他政治組織或从事任何其他政治活动。7. 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員的指示，須先交由非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共联席会議通过。8. 国民党党員如欲加入共产党，須事先提出退党声明，而党員一旦退出国民党，即不得重新加入。9. 凡違反以上各項規定者，得予以懲罰。”①

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議容許国民党代表列席，而批准了开除德共左派的决定。② 斯大林亲自作了关于“俄国問題”的报告——这表明他同他的对手們一样軟弱；他几乎是客客气气地重复了以前的論点，即认为反对派联盟是“苏联共产

---

① 艾伯特·魏斯博德：《夺取大权》，紐約1937年版，第1001頁。

② “蔣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广州政变（关于这次政变，我們的报刊只字不提），使共产党人淪为国民党的可怜附庸，甚至要签字保证不批評孙文主义，在此以后，他居然还恬然自若地——这的确是一桩值得惊異的小事！——坚持要共产国际接納国民党；在准备充当劊子手的时候，他要借用一块世界共产主义的招牌——他也果真把这块招牌弄到了手。蔣介石和胡汉民領导的国民党真的被接納进了（作为一个‘同情’党）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問題》，第270—271頁。）

党內的社会民主主义偏向"。由于他們在10月的妥协，联盟領袖得以参加会議并为自己辯护。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发言为他們的反党观点辯护，抗議第十五次代表会議对他們的社会民主主义偏向所作的指責。加米涅夫甚至猖狂到在国际无产阶級的代表面前譴責我党犯了民族改良主义的錯誤。"①

全会加剧了对联盟在国际范圍內的支持者进行的斗爭；在法国，鮑里斯·苏瓦林被开除出党，阿尔弗雷德·罗斯梅和比埃尔·莫納特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意大利，則继續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进行斗爭。

在1927年4月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拥有六万名党員，而两年前則只有一千人。② 在4月5日的一篇演說中，斯大林称贊蔣介石是一位很好的革命战士；他們两人还互贈相片。不料一星期后，蔣介石便明确改变立場，开始清洗国民党內的共产党集团。有好几万名上海工人慘遭屠杀。可是，即使到这时，共产党的政策依然如故——在国民党內部进行工作；斯大林宣称，同蔣介石公开斗爭就等于把胜利送給他。5月21—22日，又一次发生大屠杀，这次是在武汉。

"这次进軍定在5月21日。农民开始召集起越来越多的战斗队向长沙进发。显而易見，他們可以輕而易举地拿下长沙城。但是，正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却来了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命令他們应該尽量避免公开冲突，把問題提到武汉去解决。根

① 尼·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308頁。

② 党員的准确数目是59,967人，而1925年1月举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964人。在1927年，53.8%的党員是工人，其余大部分是学生。同一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有35,000名团員，参加童子团的有120,000名儿童。

据这封信，省委会于是下令让农軍退却，不再前进；但是有两队沒有接到命令，继續向武汉挺进，結果被軍队消灭了。”①

这些事件在莫斯科产生的影响，不是用几个形容詞可以表示的。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在自我吹嘘，祝賀他們的政策在中国获得的成功；这时，却不得不急忙压下斯大林的論文，收回布哈林所写的一本书。斯大林主义中央委員会 1927 年七月全会通过的決議，即使竭尽掩飾之能事，也流露出了不安。

“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正确策略，中国革命还是遭到了重大失败，这首先要从这个国家內部阶級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的角度来解釋……另一方面，必須承认，慣常拒絕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国共产党領导机构也要承担一部分責任……

中国革命的当前特点是，革命遭到了严重失敗，与此同时，阶級力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新配置，工人、农民和城市貧民正在組織起来反对一切統治阶級和帝国主义。就**这个**意义来說，革命正在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为工人阶級和农民的专政**而直接斗爭的阶段。以前的发展經驗业已清楚表明，資产阶級无力担負起……**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任务。”②

在苏联-国民党联合期間，英俄关系恶化了。到 1927 年初，两国間的貿易几乎已全部中断。英国报紙掀起了一場要求同苏联断絕外交关系的运动，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則加强了同波兰和罗馬尼亚的合作。2 月 23 日，英国向俄国发出警告性照会；5 月 12 日，俄国在倫敦設立的貿易公司“阿尔柯斯”③的办事处遭到二百名警

---

①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問題》，第 290 頁。

② 轉引自波波夫：《苏共簡史》，第 2 卷，第 314—315 頁。

③ 阿尔柯斯（Arcos）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1920 年在倫敦設立的股份公司的簡称。——譯者

察的襲击。两星期后，首相鮑德溫总結了英国对俄国的五点不滿，其內容如下：(1) 苏联間諜从事探听英国軍事秘密的活动。(2) 一份絕密文件已經失落，很可能为苏联間諜所窃取。(3)在苏联商务代办处发現了秘密文件，证明代办处在充当苏联同英国共产党以及英屬各殖民地共产党之間的联絡站。(4) 苏联代办曾支持英国国內反对政府在华政策的一次政治运动。(5) 苏联政府进行反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宣傳，从而破坏了 1921 年 3 月 16 日英俄通商协定中的規定。

1927年 5 月底，英国同苏联断絕了外交关系。一般說来，劳工界的立即反应是反对决裂；但是到 7 月初，在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年会上，托馬斯便开始譴責托姆斯基，抗議他干涉英国工会运动的內部事务。

几天以后，苏联駐华沙大使彼得·沃依柯夫被暗杀。他是在波兰政府竭力反对的情况下就职的，因为据說他是处死沙皇及其家屬的那群人中的一員。这时，一个俄国保皇党杀死了他。

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英俄关系紧張的影响。例如在法国，雅克·多里奥和另外九个人由于在法屬殖民地进行顚复性宣傳而被捕。国立軍校所在地圣西尔的两名市議員，受到向俄国出卖軍事秘密罪的控告。6 月 12 日，铁路工会領导人比埃尔·塞瑪尔① 以煽动兵变罪被控告和逮捕。法共书記处成員克雷美以替俄国进行間諜活动的罪名被控告。巴黎向莫斯科发出半官方的警告，要它撤走間諜。

这样，始而是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突然破产，继而是英俄两国关系恶化、劍拔弩張，最后是全欧洲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在这种

---

① 1942 年被盖世太保处决。

一步坏似一步的形势下，俄国再次陷入了危險的孤立境地。不过是几个月以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祖国还希望領导一个工会运动的欧洲同美国爭霸，不过是几天以前，它还同蔣介石的中国保持着牢固的联盟，曾几何时，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便孤单单地置身于一个敌对的世界中了。在全欧洲，它只有一个既軟弱又靠不住的朋友——一只脚站在敌人陣营中的德国。德国大大增加了对苏联的抵押貸款；另一方面，柏林警察在7月27日一下子就逮捕了七百名共产党員，他們的罪名是破坏财产和襲击警官。

格奥尔格·契切林急忙赶到柏林。他同德国总理馬克斯以及布罗克道夫-兰曹举行了会談；6月7日，在他动身去国联开会前夕，他又同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进行了商談。后来在日內瓦，施特雷澤曼同張伯倫一道研究了国际形势，而英俄战爭所以沒有爆发，德国的不願加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行动还是不行动？

在俄国，随着斯大林的外交政策遭到慘重失敗，反对派的力量日漸加强。党內的上层队伍本以为斯大林这个人能够把俄国領入一个同資本主义世界和平合作的时代，現在却发現俄国以及他們本身已經走到深淵的边緣。亚历山大·巴明——他认为自己在这一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干部"——描繪了俄国当时人心改变的情况：

"当时沒有人預見到斯大林会实行个人独裁。我們的一般情緒是一种健康的乐观主义。我們对我們自己和未来都充滿信心。我們相信，只要沒有战爭来打断俄国工业的复兴，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不断革命論在我們看来是一种危險的理論……。我就是永远支持中央意見的那种人中的一个……。当共产国际和

苏联顾問发动起来的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跨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政治激情达到了頂点……。斯大林……对各方面傳来的蔣介石正在准备軍事政变的警告都置若罔聞……这种策略的災难性后果很快就引人注目地暴露出来……。斯大林的威信受到严重損害。反对派加倍地进行努力。"①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破产了。他的統治机器搖搖欲墜，只是依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加强恐怖鎮压才沒有垮台。英国在5月底的断絕外交关系和沃依柯夫在6月7日的遇刺，都被充分利用来迫害反对派。5月20日，五名"波兰間諜和反革命分子"被处决。6月6日，另外五个人在奥德薩被枪斃，7月13日，又有十个人遭到同样的命运。6月20日，在莫斯科，有二十个人由于"同英国政府勾結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枪决。

特别是在列宁格勒，紧張的国际形势成了消灭反对派分子的借口。6月7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一批列宁格勒工人由于向政府写恐吓信已被枪决，但幷未举出他們的名字，也沒有經过审判。凡是反对派力量特别强大的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总会在那里发現俄国"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間諜"勾通的事实。例如在喀琅斯塔得，一个前白軍指揮官克列比科夫在6月17日作为英国間諜被处死；几星期以后，他的妻子也被控为同謀犯。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于7月5日不費事地破获了一件企图爆炸該局总部的阴謀；三名阴謀分子企图脫逃，被当場击斃，这样，就使得进一步調查无从进行。

政治局夸大了这一企图爆炸国家警察总部的阴謀以及所有其他"被捕获的英帝国主义間諜"——不論是实际的或"客观上"的間

① 亚历山大·巴明：《虎口余生》，第161—166頁。

諜——的活动。在一个敌对的資本主义世界中，挽救社会主义祖国之道在于以恐怖对付恐怖。这时开始風傳斯大林打算把反对派联盟的領袖統統枪决；8月17日，在政治局的特别命令之下，托洛茨基出面辟謠。从中央委員会的一次会議到另一次会議，斯大林在不断地找寻逐出反对派領袖的机会；然而，只是在度过另一个使他遭受了許多挫折的艰苦斗爭的年头以后，他的計划才得以实現。

9月7日，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員会建議英国工会同苏联工会界断絕关系；第二天，这一建議被接受，英俄工会統一委員会宣告解散。俄国工会的代表終于被不客气地抛开了——因为他們干預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內部事务。

反对派联盟由于斯大林的政策在中英两国的慘重失敗而日得人心，这就提出了立即行动的問題。在反对派当中有这样一些人，他們有鉴于日益迫近的战爭危險，主張反对派应該撤退——如果必要的話，应該投降。在另一次外国干涉日益增长的危險面前，主要应該考虑俄国万众一心地迎击外国軍队。

托洛茨基以他的所謂克雷孟梭論旨反对这种失敗主义情緒。1914年，当德軍正在向巴黎挺进之际，克雷孟梭毫无顾虑地領导了一場激烈反对法国政府災难性政策的运动。通过这种大胆的策略，他推翻了那个政府，把动搖的法国人民团結到新政府的周圍，扭轉了局势，終于把法国导向胜利。在托洛茨基看来，正是由于战爭危險迫在眉睫，联盟才不仅更有可能而且更有需要取得胜利，因为俄国人民不会追随斯大林投入一場战爭。他希望，同資本主义干涉作斗爭的需要将复活十月革命时代的精神。

在俄国，把托洛茨基和克雷孟梭并列，被认为是号召反斯大林暴动的口号。斯大林派加米涅夫去罗馬担任大使；在他离开莫斯

科时，反对派在車站上举行了抗議示威。

英国剛同俄国断絕外交关系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6月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議。斯大林摆出了俄国軍事領袖的姿态；通过他那一身通常是簡朴的軍裝和威灵頓式长筒靴，他在共产国际代表面前强調了他兼具党和軍队最高領袖的双重身分。会議討論了战爭危險和中国的大失敗問題；"俄国問題"还是被忌諱的話題，人們只能在圣安德魯厅的走廊里悄悄議論几句。

在斯大林的鼓动下，俄国代表团建議把托洛茨基和符約·符約維奇开除出执委会。在四天的辯論中，意大利代表团(包括帕米罗·陶里亚蒂)、法国的亚尔培·特兰特①、捷克斯洛伐克的維克多·斯特恩和貝拉·庫恩发言反对这一动議。斯大林的最热烈支持者是德共新領袖恩斯特·台尔曼。已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季諾維也夫，被門口的武裝卫兵拦住，不能进入会場。海摩向代表們說，会場里沒有足够的地方容納他。但是，这种廉价的小詭計甚至都遭到阿尔都尔·埃維特的反对，他担心这种做法会給国外留下坏的印象。在中国的失敗是如此慘重，而这种失敗是他們的政策造成的这一点又如此明显，以致斯大林和布哈林連反对派的攻击都怕让代表們听到。从小处找麻煩——他企图以此来羞辱季諾維也夫——是斯大林的一种典型手法，因为，通过这种他可以毫无損失地让步的小事，能够試探出他在比較严肃的問題上能走多远。

在1927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尽管表面上一敗塗地，实际上却显示出，他們在以前几个月中，并不是单单苟延殘喘，毫无作为。随着斯大林在中国的失敗，联盟的威信有

① 特兰特在六月全会后退出法共；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說斯大林的手上沾滿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鮮血。

所提高。斯大林当然还維持着他的数目上的多数——如果这方面形势倒轉，那就意味着政变已大功告成了——但他的集团显然正在动搖。斯大林的多数通过的决議本身就表明他的权力是不稳定的。

“最近，当苏联的国际处境特别困难和中国革命遭到部分失敗之际，反对派集中火力攻击党的国际政策路綫（在中国和英国）……

他們大嚷什么中央委員会已經热月政变化、党正在实行保守的民族主义政策、奉行富农-烏斯特里雅洛夫路綫，大嚷什么‘**一切危險中的最大危險是党內制度**，而不是战爭威胁等等——所有这一切叫嚷实际上都是旨在削弱国际无产阶級保卫苏联的意志，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所說，它們是‘一种当战爭危險迫近时……在工人面前掩飾他們的逃兵行为……的手段’。”①

斯大林逼迫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再一次作出不从事派别活动的保证，但这一次的声明語气非常含糊，远不像1926年10月那一次有瓦解作用。在危机阴影的籠罩下，不論是俄国党內或共产国际內部，都沒有人对它字面上的話信以为眞。

俄国党內的危机快要达到摊牌阶段；用不了多久，就要有一派赢得决定性胜利。七月全会閉会还不到一个月，联盟的領袖就发布了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的政綱；在政綱中，他們指責政治局——用波波夫的話来說——“蓄意解散共产国际、出卖中国革命、承认沙皇政府外債、廢除对外貿易壟断、在农村实行一种有利于富农的政策以及諸如此类的誹謗和讕言”②。联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組織非党工人作为反对派党小組周

① 轉引自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316頁；重点是我加的。

②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317頁。

圍的支持集团。在軍队中加强了組織联系，并且派出特殊小組同共青团联絡。

对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危險，斯大林的主要抵制工具之一是中央监察委員会，委員会主席当时由斯大林的密友（“謝尔果”）·奥尔忠尼启则①担任。对于那些已經被开除或者受到开除威胁的党員，对付他們的方法要比单純的肉体折磨阴險得多。在平均时間长达三天的“討論”中，中央监察委員会运用了一种把心理攻势和肉体恐怖結合起来的特殊手法；一边是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处以死刑的威胁，另一边则摆着国外待遇优渥的职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处理弗拉季米尔·斯米尔諾夫的时候，討論連續进行了八天之久。在党的教条方面提出极其繁瑣复杂的問題，打动被审查者的爱国心，提醒他們如果他們失去党員身分，他們的孩子就会被剝夺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不断逼迫他們談出其他反对派分子的一切情况——在长时間进行这样的审訊之下，比較軟弱的人一般是經受不住的，最后总难免低头。

这种懺悔者的檢閱，这种为三十年代做样子的审判所作的彩排，使斯大林的监察委員会有机会打垮了很大一部分反对派。許多被开除的人恢复了党籍。

“以这种方式〔奥尔忠尼启则报告說〕，我們恢复了百分之九十被开除的人的党籍。我們用这一只手打击反对派，把他們开除出党，同时，监察委員会又用另一只手——上面已經說过——恢复了

① 像許多把斯大林捧上台的人一样，奥尔忠尼启则也沒有被允許活下来和他分享权力。1936 年，“完全出于他的家屬和照顾他的医师的意料之外，奥尔忠尼启则突然死去。有人认为，他是在一时感到絕望的情况下服毒自杀的。也有人认为他是被医师列文毒死的——这个医师后来供认他曾經毒死了馬克辛·高尔基。他的去世是一种暴死，他决非‘因病亡故’，关于这一点，据我所知是毫无疑問的。”見維克多·克拉夫琴柯：《我选擇了自由》，紐約 1946 年版，第 240 頁。

他們所有人的党籍。这种情况发生在好些地区，例如在外高加索，我們几乎恢复了全部反对派分子的党籍。"①

在反对派看来，这种相对說来算得上寬大的措施是一个吉兆，因为这反映了他們在党內的影响。可是，恢复他們的党籍还有另一个目的：故意让他們在一段时間內以好像是自由的党員身分到处活动，这样，反对派分子以及他們的一切联系就都淪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掌握之中。

在中央监察委員会以上述方法使联盟的支持者就范的同时，斯大林也加强了操纵群众的活动。革命前每个家庭用来供奉圣像的角落，这时已改变性质；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代替了圣徒像，但是鼓励人們依旧保持那种頂礼膜拜的情緒。在这一时期，工厂中的这种所謂"紅角"从七千个增加到了四万二千个。各种軍事輔助組織相继建立起来——有"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协会"（一个研究化学战和空战的团体）、射击俱乐部等等。加强了电影和无綫电宣傳。② 共青团在莫斯科的大街上組織檢閱和联欢。妇女組織和少先队受到更多的注意；对学校儿童灌輸党的最新路綫。

最后这一点可以用一件和我个人有关的趣事来表明。我这一时期在莫斯科的时候，时常去看我的好朋友施克洛夫斯基。他是列宁流亡国外时的亲密同志，1923年俄国駐汉堡領事，季諾維也夫和德国左派的忠实朋友。这个經驗丰富的老人把繁瑣复杂的教条主义討論一手撥开，下了一句簡单的結論：情况越来越糟了。他在中央监察委員会担任化学家，对党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化具有深

① 奥尔忠尼启则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轉引自《国际新聞通訊》，1927年，第2881頁。

② 参看柯西奥尔关于組織活动的报告，轉引自《国际新聞通訊》，1927年，第2809頁以下。

刻的了解；在他看来，除非他們开始打破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国内的恐怖統治，否則，党的一切綱領都不过是廢話。施克洛夫斯基在西欧住过若干年，会說德語、法語和英語。他是一个性格极其正直的人，一个布尔什維克革命家的优秀典型。我时常到他家里去——那是一套三个房間的簡朴住所，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十多岁的女儿住在一起。有一天，他最小的女儿(才十二岁)放学回家时，完全被老师讲的話弄糊塗了，因为老师談到路特·費舍在工会問題上的錯誤，而她却知道我是时常和她父亲一起吃飯的孀子；她向我問了几个問題，但她当然沒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留在莫斯科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沒有再到施克洛夫斯基家里或銀林的別墅里去玩过；我們經常在公园里会面。

在国际范圍內也展开了操纵群众的新活动。特别是訪問苏联的工人代表团，在作为宣傳工具方面变得更为重要。192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在来自四十三个国家的九百四十七个代表中，德国一百七十三人，法国一百四十六人，英国一百二十七人；他們当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員。11月13日，斯大林和来自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芬兰、丹麦、爱沙尼亚、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八十名工人組成的代表团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談話。①

第四国际？

在国际范圍內，联盟計划于1927年底在柏林召开一次左派共

---

① 关于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反对派，有两个早經准备好的問題，斯大林对它們充分地作了回答。对另一个問題，“在农民問題上你們想怎样实行集体制？”斯大林回答說：“我們想采取經济、財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实行集体制……在这方面，我們的措施共有三种：通过私有經济、通过合作社和通过国营經济。”(参看《和外国工

产主义者国际会議。这样，反对派在俄国的政变就能得到国际支持；新領导集团将作为国际的而不是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特别是季諾維也夫，对准备这次会議尤其关心；他利用大使館的密碼和信使，把他对召开会議的看法通过伊斯坦布尔的薩发罗夫①傳达到各国。

成立一个支持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国际联盟的前景，在1926—1927年看起来是非常良好的。最大的困难是同俄国反对派分子保持联系，在这方面，許多苏联机关工作人員不惜冒丧失工作和自由的危險，突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封鎖把有关的材料带出来。在柏林商务代办处工作的图罗夫在这方面很有帮助，卡普林斯基和伊薩耶夫也和他一样。作为铁路技术专家被派去参加日內瓦某委員会的彼烈韦尔捷夫，有一張可以在欧洲的所有車站通行无阻的护照。我們在柏林收到了各处联盟支持者送来的材料——从罗馬、从巴黎、从駐巴尔干諸国的大使館、从英美；我們同中国托派的联系尤为密切。

被斯大林送出国的反对派分子大都設法繞一下柏林，因此，我們同他們全都見了面，并且安安靜靜地討論了联盟的問題。譬如說，我在柯倫泰去挪威途中見过她。她給我們的印象是：性格軟弱而感情易于冲动，只是出于对反对派政治目标的模糊同情，她才和他們站到一边；因此，当她变节支持斯大林时，我們并不感到惊訝。1927年初，托洛茨基的一个密友松桑夫被調到柏林。他是一个极聪明的年輕人，一个狂热的托洛茨基信徒，在同他进行許多次热烈

人代表团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0—191頁。——譯者）

① 格奥尔格·伊凡諾維奇·薩发罗夫从1908年起便是布尔什維克和列宁格勒党組織的成員，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被放逐到北京，1927年春調往伊斯坦布尔的商务代办处。

討論（例如关于不断革命論的討論）时，我們发現他同卡普林斯基或彼烈韦尔捷夫那类季諾維也夫分子有很大不同。[①]

1927年夏末，当加米涅夫假道柏林去罗馬时，我們拟出了召开柏林会議的詳細計划。大概是在下一个月內，我們同各国的反对派集团进行了联系——在法国是亚尔培·特兰特，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两派，一个是以阿洛伊斯·諾伊拉特为中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集团，一个是圍繞着青年領袖卡尔·米察列茨的集团；在奥地利是由約瑟夫·弗雷領导的集团。我們預备在会上提出的綱領，将部分取决于俄国的发展状况；假如联盟重新执政，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将回到一个統一的共产国际中。如果联盟不能取得胜利，即使在俄国还不可能成立第二党，我們也打算建立一个左派共产国际，作为在俄国继續进行地下抵抗的基地。

通过和这許多集团的联系，我們听到了联盟內部所謂“极左翼”的意見，在他們当中有——譬如說——薩发罗夫和姆腊奇科夫斯基[②]以及許多托派軍官。这派人认为，斯大林是不得人心的，他只能依靠恐怖手段在反对派面前保住政权，而他对于使用恐怖手段也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斯大林集团还执掌政权，对反对派的潜在支持就大都不敢表示出来。因此，他們不贊成举行任何街头示威或非法会議，而主張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突然采取行动，把总数只有几百名的領导人同时逮捕，然后发布临时政治局的宣言。只有到那时，到党摆脫了对国家政治保卫局恐

---

① 松采夫在1928年被派往美国。1935年回到俄国后，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在那里，他死于从一个监獄被押往另一个监獄的途中。

② 謝尔盖·姆腊奇科夫斯基，1905年参加布尔什維克党，曾指揮过击敗高尔察克的游击队。他成了烏拉尔軍区司令員，后来，在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斗爭中被免职。他于1927年11月被捕，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期間正在獄中。他在1936年的审判中被判死刑和处决。

怖手段的恐惧以后，一次正規的党代表大会才能有充分民主的內容，而这个集团相信，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将使反对派获得絕对多数。

馬斯洛夫和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它等于把联盟的成敗孤注一擲地放到了一次冒險行动上；如果政变失敗，斯大林将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敌人消灭干净。我們认为，当极权主义統治正在俄国日益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反对派分子应該固守陣地，实行一种沉默抵抗的政策，直到日益临近的欧洲危机造成最有利的行动时机。我們的德国同志彼此間存在着許多細微的意見分歧，但在他們当中却普遍流行一种“非此即彼”的情緒。不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这个党的中心任务将不仅是支持俄国反对派，而且要在德国工人中起重要作用。就是回到原来的队伍中去——考虑到俄国反对派領袖的不断投降及共在德国的影响，从此放棄派別分歧的斗爭，回到正統的共产党中，共同为反对日益增长的納粹危險而斗爭。有的人走上前一条路，致力于維持一个小集团——像这样的小集团，在納粹执政前的德国很快出現了十多个；有的人选擇了后一条路，轉而为建設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出力。当同，不論是在德国或整个西方，都沒有人充分体会到反对派在俄国面临的困难；人們往往以自由主义民主的标准去衡量他們的行动，而沒有想到这些行动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鎮压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采取的。

在俄国，反对派加强了他們的地下工作。在姆腊奇科夫斯基的指导下，他們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秘密印刷所；有些傳单甚至就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印刷所里印刷的。反对派为自己的成功所鼓舞，試图在这种危險的联盟和挑唆之間采取一种走鋼絲的政策。斯大林政权展現出的恐怖，引起了恐怖机器本身的內部抵抗；两个国

外間諜伊格納茨·雷斯和瓦尔特·克里維茨基在1937年的叛变，为俄国恐怖机器內部的长期紧張状态提供了为时已晚的证据。①

反对派策划了一場新的“爭取合法地位”的斗爭。由八十三个反对派主要領袖签名提出的一份政綱在党內和共产国际內部散发开来，幷且得到了——尽管存在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相当可观的支持；例如在哈尔科夫，就有一百八十名党員敢于在政綱上签名。“在一切反对派的政綱中，”斯大林写道，“这个政綱要算是最虛假最伪善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政綱中，他們幷不反对党內統一幷表示反对分裂，但在事实上，他們却极横蛮地破坏党內統一，进行分裂路綫，且已成立有自己特殊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分明是会变

① 斯大林的歌頌者賽耶斯和康恩，在一段最能說明問題的文字中，談到苏联官僚对他們自己建立起来的恐怖机器怀有的恐惧：

“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以后〕被捕时，四名苏联秘密警察官員把他們带到了內务人民委員会总部。这些官員是：內务人民委員会秘密政治司司长莫尔查諾夫、行动司司长巴烏克尔、行动司副司长沃洛維奇和內务人民委員会主席助理布拉諾夫〔在后来的1938年审判中，他同布哈林和雅果达一起成为被告〕。

在逮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过程中，这四名內务人民委員会特工人員表現得非常奇怪。他們不仅沒有在被捕者住所里搜索罪证，而且实际上容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銷毀了許多罪证文件。

更突出的是这四个內务人民委員会人員的来历。莫尔查諾夫和布拉諾夫本身就是托洛茨基-右派密謀組織的秘密成員。巴烏克尔和沃洛維奇則是德国間諜。

这些人是由內务人民委員会主席亨利·雅果达特地挑选出来执行逮捕任务的。”見迈克尔·賽耶斯和艾伯特·康恩：《大密謀：反苏秘密战爭》，波士頓1946年版，第252—253頁。

一个警察国家会在警察內部孕育出叛变密謀的事实，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年中也有所表現。吉澤維烏斯告訴我們：在斯特林克的地窖里，他經常同刑事警察領导人內貝和柏林警察总监馮·赫尔多夫伯爵碰头。这两个人每天都要向盖世太保作例行报告，他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午餐会結束以后，便匆忙——而且屢次不放心地掉过头去張望身后——赶赴地窖开会，策划反希特勒的7月20日政变。参看汉斯·貝恩德·吉澤維烏斯：《死而后已》，苏黎世1946年版，第2卷，第285—358頁。

成为一个反苏維埃的、反革命的政党的。

在口头上，即在政綱中，他們贊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責备中央沒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但在事实上，他們却笑罵党关于爭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决定……

在口头上，即在政綱中，他們贊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責备中央沒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集体化，但在事实上，他們却譏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政策。”①

在“八十三人政綱”上签名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工人反对派虽然和托-季联盟保持联系，却致力于加强自己的組織，这样，即使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退出斗爭，他們仍旧能够独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局。几个月以前，民主集中派集团曾經頒布过一个“十五人政綱”，其內容圍繞着下列主要三点：（1）国家党已經蛻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为爭取另一次党內多数、爭取获得党內合法地位而作的斗爭是徒劳无益的，是一种愚蠢的抵抗形式，这只能把反斯大林的干部驅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陷阱，使工人疏远反对派联盟。（2）国家党的蛻化表明了十月革命的終結，这个革命已經为一个踩着它的肩膀爬上去的統治阶层所出卖。（3）在俄国，工人事实上从沒有执掌过政权，但十月革命为他們提供了一个本来可以建立工人社会的基础。現在，这一基础已經为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所摧毁，工人已經重新淪为一个同独裁国家相对立的阶級。他們必須組織反抗敌对国家政权的活动；他們必須建立一个眞正的工人党，其目的不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在这一时期，他們认为国家政权問題沒有什么重要意义，只能引起人們抽象的和理論上的兴趣——而是保卫工人权利不受斯大林主

① 〔約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9—350頁。

义国家的进一步侵犯。

在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定于12月召开)进行准备时,反对派分子竭力在党員集会上展开活动,发表維护“八十三人政綱”的演說。

“党代表大会計划于12月召开,为它进行了狂热的准备活动。大会召开前,首先是举行一些集会,听取中央全会的报告。只有接到个别邀請的人才能参加会議;那些显然是反对派分子的党員,一概在排斥之列。如果这种預防措施并沒有能阻止某些反对派分子出席会議,党机器则雇用一些由流氓分子組成的冲鋒队,以喧鬧和起哄来打断反对派分子的演說。”①

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下,这些冲鋒队拚命搖鈴,高声喊叫,甚至动手打人。还有这样一些同志,据說他們激怒的感情突然爆发了,他們再也不能容忍反对派大放反革命厥詞了,于是,他們站起身来,以布尔什維克的热情把反对派的文件撕得粉碎。在某些会議上,还举行了焚燒这些文件的仪式。有时候,当一个反对派发言人剛登上讲台时,电灯便被熄灭了。正如斯大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說的那样,“党員群众給了反对派分子一个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甚至老实不客气地把他們逐出了会場。”②

与此同时,尽管奥尔忠尼启則后来报告說,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恢复了党籍,开除和放逐仍在继續。“在9月12—13日夜間,国家政治保卫局进行了一系列襲击,搜查反对派共产党人和非党工人的住宅。”③特别是反对派书記的住所,时常遭到搜查;国家政

---

① 《俄国来信》,載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27年9月30日。

② 〔約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8頁。

③ 《俄国来信》,載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27年10月14日。

治保卫局总是沒收他們的打字机，当时，这种工具在俄国还相当稀少。①

斯大林的主要策略是設法把許多人扯在一起，尽量株連，使联盟成員不知怎的就和英国間諜、地下白卫分子、在华沙暗杀沃依柯夫的凶手纏到一块。一个例子是：据說托洛茨基同一个叫舍尔巴柯夫的非党分子有联系，这个人是一个前工厂主的儿子，曾和一个前弗兰格尔的軍官拉关系，向他要一架油印机，同时，某个特維尔斯柯依也同这个軍官有联系，告訴他就要发生一次軍事政变了。从这种細微末节的地方开始，加上新的人物，把捏造的政变計划添枝加叶，說得活灵活現，于是，反对派的每一个步驟都被塗上了阴謀色彩。这样，他們的存在本身便被說成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危險：如果他們和什么人会面，那准是策划密謀；如果他們做什么事，那准是抱着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如果他們什么也不干，

① 俄国当时缺乏各种技术設备的情况，也許可以从一件奇特的軼事上得到最好的反映。列宁的孀妇娜捷施达·克魯普斯卡婭曾向全世界呼吁，請求人們为俄国农村提供紡車，她在一种以好几国語言出版散发到世界各地的共产国际官方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共产国际通訊》，1927年，第1863頁），在文章中，她描繪了“苏联农村中极其缺乏紡車”的情况，呼吁全世界給予帮助。农妇們一夏天都在田里像奴隶般劳动，到冬天也得不到休息。她們坐在那种沒有窗戶的黑暗草屋里，用人力紡車紡着亚麻和大麻。在布里揚斯克区，农家少女从不上学，因为她們沒有时間。

斯摩棱斯克和科諾托普的农妇，听說有一种便利織布的机器存在，于是向国家呼吁，請政府帮助她們弄到这种机器。不用說，她們是非常穷苦的；在許多村子里，她們連訂閱《农村妇女》的几个戈比都拿不出来。莫斯科的紡織辛迪加回答說：“我們調查研究了这个問題以后，发現目前并不存在这种供家庭工业使用的紡織机。”

因此，克魯普斯卡婭向国内外所有发明家呼吁，請他們帮助俄国农妇。在紀念俄国革命十周年的文章中，她这样大声疾呼道：“給我們一架紡車，一架将提高农妇文化水平的十月紡車吧！”

《国际新聞通訊》德文版編輯部加了一段提醒德国发明家注意的編者按語：为了审查征求的发明，已經成立了一个委員会，凡有关建議都可以送交該委員会，但发明家应該考虑一个事实，即“連那种祖輩傳下来的脚踏紡車在俄国农村中都是非常稀少的。俄国农民所使用的是一种手搖紡車”。

那只是因为他們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种局面，当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单是提一提托洛茨基或季諾維也夫的名字就是一种反对派行动。

在不得参加各地支部党內討論的情况下，反对派組織了自己的秘密会議为代表大会作准备。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在工人的两个房間住所中发表演說（为了这种好客举动，主人冒有丧失一切的危險）；有二十到二百名不等的人站着或坐在地板上听他們讲話。当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赶来破坏一次秘密集会时，人們往往把他們請到房間里听大家的討論。据托洛茨基估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一共有两万人左右参加了这种会議。① 为了試驗自己的力量，反对派临时把持了莫斯科技术学校，有两小时之久，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不受阻拦地向两千名听众发表了演說。虽然斯大林有足够的警察驅散这次集会，他并不敢过早攤牌。不过，在莫斯科以外，联盟却不得不停止举行規模較大的非法集会。

斯大林在十月中央全会上的演說也反映出他的地位尙未稳固。

“斯大林：难道我們过去什么时候責备过或現在責备反对派策划軍事阴謀嗎？当然沒有。难道我們过去什么时候責备过或現在責备反对派参加这个阴謀嗎？当然沒有。

穆拉洛夫：在上次全会上責备过。

斯大林：不对，穆拉洛夫同志，我們这里有关于反党非法印刷所和关于跟这个印刷所有联系的非党知識分子的两个通报。在这两个文件里，你找不出一个字一句話来证明我們責备过反对派参与軍事阴謀。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員会在这两个文件里只是

---

① 参看托洛茨基：《自傳》，第531—532頁。

断定：反对派建立非法印刷所，跟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发生联系，而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又跟策划軍事阴謀的白卫分子有联系。"①

不过，同一次十月全会还是取消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中央委員資格。

当时正处在布尔什維克革命十周年前夕，全国各地都在組織群众游行。党的所有領导人都在列宁格勒出席中央全会，因此，在塔烏里达宮面前举行了一次官方庆祝大会。在領袖們分乘汽車挨次檢閱游行队伍时，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有意識地选擇了最后一辆汽車，这样，他們就和前面車子上的大多数中央委員分隔开来。他們的支持者簇拥住了最后这一辆汽車，向联盟的两个領袖发出暴風雨般的欢呼；他們在离开游行队伍时情緒很高。

斯大林在11月7日紀念日到来之际，玩了一手旨在平息国內不安的花招。在一篇中央委員会宣言中，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級的措施（首先是七小时工作制）被庄严宣布为社会主义俄国的法律。宣言答应豁免貧农的賦稅，并保证国家援助他們改善生活处境。早在10月1日，作为这种手法的一部分，已經对輕罪罪犯宣布特赦。这种"轉向左边，轉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轉变，表面上似乎采納了反对派的綱領，却对摧毀反对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反对派支持者在10月27日的列宁格勒庆祝会上表現出来的热情，使联盟的領袖受到鼓舞，决定打出他們的最后王牌。按照俄国以外的一般共产党策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組織反对党中央的街头示威。对斯大林政策的不滿是如

① 参閱《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現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0頁。穆拉洛夫在1937年审判中，同皮达可夫和另外十一人一起被判处死刑。同一次审判中的被告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各被判处十年徒刑。

此普遍，因此他們希望，这两个地方的示威将扩大到其他工业中心，从而迫使党的統治阶层让步。“离开小型的秘密会議，走上街头去公开示威！”他們預备了傳单招貼，組織了人員，指定了演說者。

在柏林，当馬斯洛夫和我从充滿乐观主义情緒的赫尔茨貝格①那里听到这个計划时，我們送信給季諾維也夫說，在我們看来，他們的計划不会成功，而如果計划失敗了，斯大林的报复就将使他們永难再起。虽然我們当时认为这种計划是不成熟的和危險的，我今天却承认赫尔茨貝格以及和他同样乐观的俄国人，比我們更了解斯大林的数字上的多数和他在俄国获得的实际支持是如何名实不符。国家党的孤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和大多数人民之間的裂痕已經公开显露。即使游行示威不能达到它的直接目的，它也会使斯大林受到威慑，削弱和推迟他的种种計划。

在十月革命紀念日到来之前的一周中，又通过逮捕进一步打击了反对派干部。赤裸裸的恐怖出現了。突然从柏林商务代办处被召回的图罗夫，在莫斯科附近被人杀死了。在計划举行示威的前几天，中央监察委員会迫使反对派的好几个重要成員——包括克魯普斯卡婭、索柯里尼柯夫和查魯茨基——宣布投降。

当托洛茨基出現在莫斯科街头时，許多人向他扔烂苹果。他到哪里，哪里就发生斗毆，結果，游行示威变成了一次騷乱。为这种“騷乱带”所包圍，他始終沒有机会向群众讲話。“一个警察假装发出警告，公然向我的汽車开枪。”② 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

① 赫尔茨貝格是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党組織工作者。他在柏林商务代办处担任着一項不重要的职务，但他几乎把全部时間都用来为反对派工作。他在1935—1937年审判时期被枪决。

② 托洛茨基：《自傳》，第 534 頁。

干得更出色。組織的搗乱是如此奏效，以致警察觉得有必要在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上街以前对他們实行保安羈押。在游行期間，他們始終被鎖在屋子里，幷且有一大队武装卫兵守在房屋前面。

这样，“爭取合法地位的斗爭”便以慘敗告終。正如波波夫所說，“通过11月7日的走上街头，反对派对自己宣布了甚至更具有毁灭性的判决。它在自己的死刑执行书上签了字。”①

四天以后，向反对派发出了另一道最后通牒：每一个党員都必須維护党的路綫；不得在党外进行任何討論。也不得在党內进行討論：反对派的秘密集会再次遭到禁止。当国家政治保卫局正以上述方式在反对派領袖和所有会听到他們讲話的人之間建起一道銅墻铁壁的时候，柯倫泰以一篇发表在《眞理报》上的文章为她在外交机关的美差付出了代价，这篇文章的題目是《群众不相信反对派》。

11月14日，恰恰在反对派策划的游行过去一星期之后，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員会举行联席会議，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开除出党。

两天后，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上层領袖被开除后，全国各地的追随者便遭到了极端恐怖的鎮压。决定一个被告命运的，不是他的罪行而是他的个人价値——他在联盟組織中的重要性，他在工人同伴中的声望，他的智力和道德品质，等等。坚强的性格必須被粉碎，知識水准高的人必須被断絕一切情报来源，得人望的人必須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調走。这样，通过从单純的降級到处以死刑等各种措施，国家政治保卫局确确实实地大張撻伐，把殘余的反对派打得土崩瓦解。对那些“完全”投降的領袖說来，总是有可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319頁。

能重新做人——在一段短时期內。

托洛茨基放逐中亚細亚

反对派被粉碎了，它的領袖被开除出党，它的許多中級領导人被逮捕或杀害，它的基层队伍被吓得噤若寒蟬。此外，对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择，甚至比对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擇还要严格；那些甚至只是在次要問題上对反对派观点流露出絲毫同情的人，都遭到了淸洗。单是口头上拥护斯大林的政策是不够的；选擇代表时正如逮捕反对派分子时一样，主要的取舍标准是他們的个人作用。代表大会是經过严密布置的，因此，它无疑会使斯大林获得压倒多数。可是，斯大林仍然感受到全国沉默抵抗的压力，他感到需要給代表大会打一針麻醉剂。从那时以来在官方党史中被称为"广州公社"的发动，就是所提供的这种刺激。

蔣介石在4、5月剛背叛以后，斯大林就派了一群他的追随者去中国，看看从一团糟的局面中还能救出哪些东西。在这些人当中有德国人海因茨·諾伊曼，他当时是俄国新領袖的狂热信徒。他在广州放了一系列特殊的焰火，轉移开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再想起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的大失败。

在革命高潮期間，中国共产党一絲不苟地遵循斯大林的指示，像一根尾巴一样跟在国民党后面，可是时机一到，蔣介石便一刀割断了这个討厌的累贅。現在，旣然革命已被粉碎，旣然数以万計的中国共产党人已被屠杀，斯大林便向左轉了。在中共"八七会議"上，老的領导受到譴責(因为他們太忠实地遵循莫斯科指示了)，新的領袖命令全党准备立即举行暴动。

在中国革命高潮期間，斯大林曾宣布：有了国民党这样一个組織，就可以毋需建立苏維埃。現在，到1927年12月，他又命令建立

苏維埃了。定做出来的"广州公社"只存在三天，就被蔣介石淹沒在血泊中。諾伊曼和他的俄国朋友逃之夭夭，但广州共产党人为了以革命口号裝飾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会場，却付出了他們的生命。迟至1928年2月7日，《眞理报》还写道："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武装起义。中国的整个形势证实了这是正确的路綫。"①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日召开，举行了两个多星期。八百九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着大約八十九万名正式党員和三十五万名候补党員。有一半代表(八百九十八人中有四百四十九人)是第一次参加党代表大会；他們根本不懂得怎样去衡量大会議程的布尔什維克現实主义。正如官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干部經过了全部更新。"② 党工作人員在代表中所占的比例，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百分之七十降为百分之四十五；工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八。1917年以前入党的代表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是百分之五十九，現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按照官方統計数字，投票拥护斯大林的党員有七十二万四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四千人，即不到党員总数的百分之一。③ 国家政治保卫局干的很出色。但是，正同过去一样，由不能自主的代表湊成的数字上的多数不一定就具有决定意义。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头几天，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都沒有认識到他們的失敗深度；他們都还幻想影响一部分代表，从他們的表面大潰敗中挽救出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少数派。他們感到，只有在反对派再次保证服从

① 轉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問題》，第294頁。

② 《国际新聞通訊》，1927年12月。

③ 这两个数字引自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波波夫(第2卷，第323頁)的数字是七十二万五千人对六千人；甚至从一本官方历史到另一本，反对票的票数都被縮小了三分之一。

党紀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代表大会一开幕，联盟就正式宣布对党忠誠服从，斯大林立即把这說成是“完全解除武装”。

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員会作报告。为了配合他的报告，布置了适当的背景：“前烏克兰反对派成員”克里契夫斯基的一份文件被散发给代表，克魯普斯卡婭发言譴責反对派，布哈林引证了列宁的一封信。斯大林集中攻击反对派希望保持“党的統一”——也就是保持党內合法地位的要求。他指出联盟本身就存在分裂——同各种工人反对派集团、同馬斯洛夫-費舍集团的决裂。他尽量强調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之間的一切分歧，新的或旧的，眞的或假的，私人間的或政治上的，一条也不放过。尽管对整个反对派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他的弦外之音还表明一点，即托洛茨基同老布尔什維克們比起来，是罪恶最大的人。

当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拉科夫斯基登上讲台时，迎接他的是一陣鼓噪。人們不断地叫喊“可耻！分裂者！反革命！”使他无法讲話。他的声明被一片吵鬧声淹沒，并且不让他延长发言时間。在他演說結束时，又响起了一片叫罵声：“你退党吧！把他拖下台！讲台不是給孟什維克預备的！把他拖下去！把他拖下去！”①

叶夫多基莫夫反对开除像季諾維也夫这样的領袖。喊声：“普列汉諾夫也是一个領袖，他还不是照样走錯了道。”来自列宁格勒的代表基洛夫，譏笑拉謝維奇和他的“登山訓众”②（指反对派的林

① 克里斯提安·拉科夫斯基原来是保加利亚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参加了革命，1917 年以后，他成为烏克兰苏維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他是一个經常活跃于国外的外交家，是出席 1922 年热那亚会議的代表，担任过駐英和駐法大使。在1938年审判中，他同布哈林等人一道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

② 耶穌曾登山布道，訓导愚众，这里用作譬喻是一种諷刺。——譯者

中会議)。他指着薩发罗夫,說他曾在列宁格勒的納尔瓦区組織秘密集会。

接着,加米涅夫走上讲台,企图作一次最后掙扎,挽救联盟的合法地位。他談到了这样一个問題:联盟是否打算成立第二党?只有"老近卫軍",反对派中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团,才被认为有能力实現这一計划,因此,对它的态度要比对托洛茨基分子好一些。在加米涅夫讲話时,台下的起哄要少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人們甚至注意听他的发言。我們不要建立一个第二党,他說。我們願意和解,因为苏联正面临着危險。反对派在党內构成一个少数派集团,因此,当我們要求和解的时候,我們就是提出挽救党——同时也是挽救国家的适当措施。我們进行了一場激烈的斗爭,但現在,我們願意服从多数的意志。

加米涅夫对逮捕反对派分子提出强烈抗議。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局面:像穆拉契柯夫斯基那样的人被关进了监獄,我們則还保有自由——这样一种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我們是同那些同志一起战斗的;我們为他們的一切行动承担責任。……不可能把他們和我們分开。情况就是如此。你們要是硬把我們分开,你們就失去了对我們的尊重。"〔喊声:从10月16日以来,我們对你們就沒有什么尊重可言了。〕①

加米涅夫的态度是尊严的;他沒有放棄反对派的政治綱領,但是努力爭取保存它的合法地位。他婉轉提出的要代表們再次同联盟妥协的建議遭到拒絕,但他給代表們留下了較好的印象,至少使某些反对派分子沒有被立即流放到西伯利亚。

当这位老近卫軍最后一次登上合法的讲坛发言时,对斯大林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議事录》俄文本,莫斯科1928年版,第256頁。这里只引了議事录中記載的許多次打断声中的一次。

說来是一个危險的时刻。正如斯大林十分了解的那样，加米涅夫一直是列宁最亲密的私友。列宁去世时，曾亲自委托他編纂自己的著作和負責其他許多工作——同托洛茨基联系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把加米涅夫开除出党不仅象征着同革命的过去、而且象征着同列宁本身割断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步驟，連不擇手段夺取无限权力的斯大林集团的无賴們都迟疑了片刻。

加米涅夫一讲完話，李可夫立即站起来发言，以消除他所造成的印象：

“加米涅夫同志的讲話內容，是由托洛茨基党的非法的中央委員会决定的。从他的讲話中可以明显看出，反对派中央作出的决定不是投降，而是竭力要保存它今后在我們党內的合法地位（同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孟什維克思想），以此来掩盖它的非法活动。〔喊声：听啊！听啊！〕这是对加米涅夫同志的演說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在演說的最后一部分，李可夫特别攻击托洛茨基的克雷孟梭公式，幷竭力把他和加米涅夫分开。他說：反对派分子是分成三个房間商量問題的，等各个集团本身商量妥了，才最后凑到一块。他們把本集团的紀律看得高于党紀，他說。

“难道他們不知道，通过这种反党反政府的街头示威，他們是在准备和組織推翻政府的活动嗎？……事实上，他們所組織的就是一般所說的內战。”①

每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发言都强調，再也不能听信反对派保证服从党紀的声明了。玩弄手段的日子已經过去了；現在所要求于他們的是完全投降。这种話主要幷不是說給反对派听的，而是

① 《議事录》，第264頁。

为了警告斯大林本集团内部的动摇分子。

保存党內合法地位的幻想很快便全部消失。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联盟的領袖一到那里，就将同国內外的支持者失去一切联系。在粉碎反对派过程中的这一时刻，我們見到了斯大林所独有的那种手法。在口头上說，联盟已經完全失敗，已經为代表大会的决議所摧毁，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本人却又和反对派进行协商，談判投降条件。在党紀的幌子下，他要求已告瓦解的联盟中的个人給予协助，使那些还在动摇不定的分子完全投降。談判中使用的釣餌总是答应将来恢复他們的地位，十年以后，当同一批人中的大部分从监獄中被解往克里姆林宫补充他們供詞的細节时，又使用了同样的誘惑手段。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閉幕以前，斯大林就向反对派提出了明确建議：如果他們的投降十分徹底，把他們排斥在党外的时間便不会很长——日后将考虑恢复他們党籍的問題——联盟領袖将被允許留在莫斯科。在对待这項建議的态度問題上，反对派分裂成两个集团。托洛茨基拒絕接受建議；他說，这样一种声明只能加速反对派力量的士气完全瓦解，而不会減輕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鎮压。季諾維也夫集团則再次决定爭取得到另一个喘息时机。在代表大会的后一个阶段，反对派提出了两个政綱。在政治問題上，两个政綱的措詞几乎完全相同；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附加了一个表示对党忠順的声明。斯大林終于达到目的：联盟被分裂了。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反对派全体开除出党。大会决定：

“指示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員会，当已被开除出党的前反对派領导成員請求恢复党籍时，只接受个別向党呈递的申請书，并且至少須經过六个月的考查，认为申請者符合下列要求以后，方得

恢复他們的党籍，其要求是：(1) 呈递申請书的人必須言行一致，他們的行为必須符合他們在声明书上所作的保证；(2) 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书本身，必須完全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必須以放棄八十三人政綱、9月3日政綱和十五人政綱为基础。"①

按照官方統計，有二千五百多人呈递了与反对派断絕关系的声明书。

托洛茨基不得不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爭取另一次喘息时机的企图付出代价。斯大林立即利用了联盟的分裂，挑出托洛茨基来特别加以严懲。这样，季諾維也夫便枉費了心机；只有斯大林从分裂中得到好处，因为他趁机除掉了和他爭夺国家权力的最危險对手。

国家政治保卫局通知托洛茨基，他将被流放到中俄边界上的阿拉木图，該地离莫斯科有二千五百英里，距离最近的火車站也有一百五十英里。在預定他动身的那天，即1月16日，車站上发生了一次同情示威，他的流放不得不宣告延期。这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沒有能够遏制的事件，在政治局里几乎引起了恐慌；假如托洛茨基继續留在莫斯科，他們害怕国家政治保卫局促成的代表大会的一致会当着他們的面土崩瓦解。据托洛茨基說，斯大林穷凶极恶地責成布哈林把他最后送走。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把他从住所里硬拖

① 《議事录》，第1319頁。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要求被击敗的反对派放棄他們的斗爭，解散派別組織和遵守党紀，而且要求他們放棄自己的思想。加米涅夫曾請求代表大会不要提出这一要求："你們已要求我們无条件地絕对服从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議，完全停止派別活动，放棄一切形式的派系斗爭，解散所有的派別組織，但是，如果除去这些要求以外，还要求我們放棄自己的观点——这在我們看来，便未免有些不像布尔什維克做的事了……在我們党的历史上，还从沒有过这种要求放棄观点的先例。假如我們居然放棄了我們在一两个星期前还在鼓吹的观点，这在我們这方面将是言不由衷，你們也不会相信我們。"

了出来，他的住所已經完全同外界隔絕，只有他的儿子謝多夫提出了唯一的抗議，大喊“他們把托洛茨基同志押走啦！”他从一个郊区車站上車，沒有人知道开走的火車里載着托洛茨基。

国际左派的柏林会議

正当俄国党內进行这一斗爭之际，曼努伊里斯基和德共左派之間的斗爭也逐漸接近高潮。单是在德国問題上，斯大林主义党和各种左派共产主义集团之間的分歧在1927年并不足以构成建立第二党的基础。与此相反，談到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举行公民投票、对帝制派、鋼盔团以及其他民族主义組織进行斗爭等問題，双方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尽管如此，这两派之間的斗爭仍然很尖銳；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在俄国实行的清洗在德国和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內都重演了一次。1927年初，大約有一千三百名党工作人員被开除。許多重要的地方組織被作为一个整体开除出党——在汉諾威、汉堡-舍夫貝克、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腊特諾、施奈德米尔等地，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其余地方的支部也有大批党員被开除，特别是在来因-魯尔区——如多特蒙特、埃森、哈姆、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以及曼海姆、帕拉廷奈特和东普魯士。

这些开除措施使党深受震动，把它弄得四分五裂，变成了許多派别和分裂集团。在1927年2月举行埃森代表大会时期，党內外一共有十个共产主义集团，按由右至左的政治傾向排列如下：(1)布兰德勒集团，参加这一集团的有保尔·伯特歇尔、雅各布·瓦耳歇尔、罗西·伏尔夫施坦和亚瑟·罗森堡。① (2) 恩斯特·迈耶尔

① 罗森堡曾經是台尔曼集团的一員；他在六个月后退党，向斯大林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他放棄第三国际。

集团，是布兰德勒傾向的比較調和的翻版。(3) 党官僚集团——威廉·皮克、瓦尔特·烏布利希、阿尔都尔·埃維特和汉斯·普斐弗尔。[①] (4) 台尔曼集团，包括菲利普·登格耳、海因茨·諾伊曼、恩斯特·施內勒、特奥·諾伊鮑威尔、海因里希·聚斯金德[②]和卡尔·伏尔克。(5) 开姆尼茨左派，由保尔·貝尔茨領导，在柏林和科隆也有它的集团。(6) 左派反对派，領导者是阿尔卡迪·馬斯洛夫、胡果·烏尔班斯和路特·費舍。(7) 汉斯·貝尔領导的帕拉廷奈特极左派集团。(8) 保尔·克特領导的一个极左派集团，其主要力量在柏林的无产阶級郊区維丁区。(9) 卡尔·科尔施的极左派集团。(10)主要力量在柏林的恩斯特·施瓦茨极左派集团。这些派系中有一部分是人为的产物；特别是韦貝尔和克特集团，就是曼努伊里斯基一手培植起来的。事实上只存在三种原則分歧：主張同社会民主党密切合作的右派，主張同莫斯科密切合作的中派，主張德共政策既独立于施特雷澤曼也独立于斯大林的左派。

事实上，在埃森代表大会以前，曼努伊里斯基早已完成分裂德共的工作，而埃森大会只不过是批准了已經做的事，并且把它全部做完。尽管經过了十八个月的激烈斗爭和几千党員被开除，一百三十三名代表中仍有十名左派。在大会上，左派反对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也被开除了；在莫斯科的老板完全击敗反对派联盟前十个月，曼努伊里斯基就在柏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反对派分子是在十八个月的时間內被陆續开除的，他們分裂

① 普斐弗尔在这一时期是柏林党組織的书記，1933 年以后被派往挪威和瑞典。他于 1936 年在俄国被枪决，是莫斯科几次审判的牺牲者之一。

② 从 1933 到 1939 年，諾伊鮑威尔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并在那里死去。聚斯金德是开姆尼茨共产党日报的編輯，于 1936 年在莫斯科被枪决。

成为許多小集团，每一个集团都以为自己那种特别嚕嗦的宣言回答了一切問題，結果，这就阻碍了它們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团結起来。有时候，它們的議会議員也像一个集团那样进行合作，但此外便很少采取共同行动了。这种反对派彼此分裂的現象——一部分是莫斯科操纵的結果——在共产国际所屬的每一个党內全都存在；两年以后，布哈林領导的国际右派反对派也为相同的方法所瓦解。由于他們还摸不清斯大林主义党的底細，反对派耍了一些实在是很笨拙的花招；只有在接受了冷酷事实的教訓以后，他們才懂得同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是不能这样斗爭的。

在1927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我們一直在团結欧洲左派，准备在莫斯科举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們同时在柏林召开一次国际会議。11月中旬，季諾維也夫分子薩发罗夫从伊斯坦布尔到达柏林，他批評了托洛茨基分子松采夫，认为組織欧洲左派的工作进行得太慢了。从此以后，工作不得不加快。我們在12月初开会；出席会議的有二十名左右来自各地大使館和商务代办处的俄国同志，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左派代表。

作为会議主席，薩发罗夫就召开会議的背景作了报告；他說，現在已經快到最后关头，是开始組織一个新国际的时候了。可是在他演說到一半时，有人交給他一份莫斯科来的电报。薩发罗夫看了看电报，脸上立刻变了色；他显然是勉强地控制住自己，继續报告下去，但完全改变了报告的內容。这时，他忽然强調起遵守党紀的必要性，而且話題轉得如此巧妙，以致一部分代表看不出发生了什么問題。馬斯洛夫插嘴問道，是不是又要来一次投降。薩发罗夫否认这一点。可是，他和馬斯洛夫已經写好的那份准备交由会議发表的作为一个新国际成立起点的宣言，却始終沒有拿出来让大家签名。俄国反对派联盟的垮台，事实上也就宣告了欧洲左

派共产主义者陣营的崩潰。①

① 左派的失敗預示了日后欧洲工人运动普遍遭受挫折的情景；共产国际中的經历使他們懂得了恐怖主义一党专政国家的性质，知道这样一种政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对于社会主义組織具有什么意义——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只是日后从希特勒那里才領略到这些教訓。

有一两年时間，左派共产主义者继續作为一个独立的集团存在，以后，他們便分裂成許多小派系。同季諾維也夫的联系继續到1933年，这种联系越来越危險和越不經常；施克洛夫斯基好几次带信到柏林来，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第二党。可是为时已晚。布哈林在1929年被斯大林打下去以后，他也向德国求助，但是当时納粹已經逐漸掌权，建立第二个共产党的机会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一部分左派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其余的人或是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或是积极从事工会活动。在反对新兴納粹的普遍斗爭中，左派共产主义者构成了一支特殊的潜流，它由于自己的經驗，能够警告大家注意納粹政权的发展。1933年以后，他們当中的許多人在集中营中遇到了新一代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些人都是为托洛茨基对合尔曼政策的批評所吸引的工人和学生。

魏納·朔累姆，左派的杰出領袖之一，在一座集中营里被囚禁了若干年后被杀害，但他只不过是牺牲的許多領袖中最知名的一个。海因茨·兰格汉斯于正在油印反納粹傳单时在柏林被捕，他在布兰登堡和薩克森豪森的集中营中被囚禁了六年。1936年，卡尔·施勒德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領导人之一，当时已加入社会民主党，由于領导一个称为"紅色战士"的地下集团而被捕。1937年，在柏林-夏洛騰堡，以卡尔·希帕尔为首的一群工人被判处长期徒刑。

这張名单远不是完全的，在苏联也有类似情况。1937年，海因茨·諾伊曼和赫尔曼·雷梅累，德共最后一届合法中央的成員，也在俄国被杀害。在納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德国非正統共产主义者都遭到恐怖鎮压，不仅如此，两国警察机构还在这方面相互合作。一个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艾米尔·克路布施的遭遇，他是一个机器工人，1928年迁居到高尔基城。1937年，他被扣上了"赫尔茨分子"的帽子，由內务人民委員会交給蓋世太保，他們把他关进了薩克森豪森集中营。

第二十七章　宣傳鼓动

德国共产党变成了俄共政治局一个分部的事实，从二十年代中期傳入和发展起来的新宣傳方式上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首先在德国适应于西方环境的俄国宣傳方法，在那里由一个領域扩展到另一个領域，而随着数以千計的德国人在1933年以后移居各国，这些方法便以它們的德国形式傳遍世界。特别是目前美国共产党組織非共产党群众的方法，同早期的德国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紅色陣綫战士同盟

模仿鋼盔团建立的紅色陣綫战士同盟，給后来的納粹冲鋒队树立了一个榜样，它从1924年成立以后，便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身穿制服、英俊威武的青年共产党人，像軍队一样有紀律有指揮地列队街头，在德国变成了一种常見的和受欢迎的景象；当他們的乐队在集市广場上奏起工人歌曲和軍事进行曲的时候，往往吸引了大群圍观者。盟員們排成整齐队形参加一切共产党会議，肃立在讲台面前，当每一个发言者登台时，向他举手致敬并高呼"紅色陣綫！莫斯科万岁！"他們守卫着会議厅入口，保护散发文件的党員；在街头集会上，他們环繞着发言者的讲台。当克拉拉·蔡特金或恩斯特·台尔曼发言时，他們組成仪仗队，挺胸立正，接受这些共产党領袖的檢閱。他們伴随着到处向小商人募捐的党員。紅色陣綫战士同盟吸引了許多社会主义工人和天主教工人。它的地区代表大会变成了地方上的大事，小城鎮上的居民往往都涌去参加；盟員們的队伍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人行道上和窗口的男人和姑娘們紛紛

向他們欢呼致意；游行以后，他們受到免費喝啤酒的款待。按照傳統，每逢圣灵降临节，柏林总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国联欢大会。

1926年，有二十五万盟員——大都是青年——来参加联欢，他們在柏林各条大街上示威游行。民族主义报紙对这些青年人的威武气概表示吃惊。《德意志日报》指出了他們那种“无与倫比的紀律和組織程度的极大进步”。柏林交易所的喉舌《交易所报》写道：“这些示威者不是匪徒，也不是恶棍。他們是我們德国的棒小伙子，像我們过去見过的那样穿着漂亮的制服，但是使我們万分遺憾的是，現在却被共产党迷住了心窍。”

随着俄国情况的发生变化，同盟的思想傾向也有所变动。它本是为保卫共产党組織而成立的，現在却很快被变成了一种“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宣傳工具。同盟的代表时常去莫斯科；例如在1927年12月7日，在紅場上的数十万群众面前，举行了由一个同盟代表团向莫斯科党組織书記米哈伊洛夫献旗的仪式。在德国，盟員們举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俄国領袖的肖像游行。一种經常举行的仪式是在柏林公园檢閱，在那里，盟員們經常向他們的总司令恩斯特·台尔曼庄严宣誓，保证尽一切力量保卫苏維埃祖国。

1925年，女盟員单独成立一个組織，建立起德国最早几个穿制服的妇女团体之一。在这一时期有許多妇女組織：新成立的“反强制生育国际同盟”，它要求使节制生育合法化；为母嬰謀福利的“大家庭联盟”；一个爱国妇女团体“路易絲团”，以普魯士皇后路易絲命名。1925年底，成立了以克拉拉·蔡特金为主席的紅色妇女联盟。一个龐大的德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国际妇女会議。

在要求沒收霍亨索倫皇室財产的运动中，妇女們組織了她們

自己的示威。“让皇室的城堡成为孩子們的游戏場，”妇女們抬着一些周长六碼、用貶值的十亿馬克大鈔編成的花环，上面写道：“这就是給威廉的补偿！”

1924年，在召开于魏森費耳斯的一次全国儿童工作会議上，倡办起一种供青少年閱讀的杂志《少年同志》。少年先鋒队，1920年成立的一个共产党儿童团体，在这几年中也开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一切場合，共产党的儿童团总被推到最前面。

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不再采用那种非常单調的社会民主党方式，而变成了一种新式俄国宣傳和美国广告术的混合。在討論党务的会議上，組織了群众合唱，并且焚毁共产党敌人的俑像，从而使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射击俱乐部使用的靶子上，往往画着張伯倫和苏联其他敌人的面像。

1925年，在它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党第一次尝試把戏剧作为一种宣傳手段。党为此租用了柏林大剧院，这个剧院曾被它的第一个老板馬克斯·賴因哈德命名为“大众剧場”。这次演出由党的戏剧专家欧文·皮斯卡托担任导演，柏林党組織的教育工作負責人恩斯特·托尔格勒和他合作；布景制作人是約翰·哈特費尔德。① 所演的戏剧規模盛大，以反战为主題，共分二十三場：第一場的背景是1914年正在等待宣战的柏林；其余各場內容是李卜克內西在波茨坦广場煽动兵变，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在1914年7月25日的表現，李卜克內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等等，最后一幕是一群少年斯巴达克团儿童登上舞台，后边跟着一队穿制服的紅色陣綫战士同盟的盟員。

---

① 皮斯卡托現在是紐約新社会研究所附屬戏剧研究組組长。哈特費尔德在战时居住于倫敦；他的兄弟維兰德·赫茲菲尔德則在德国共产主义陣綫設于紐約的一家出版社——北极光出版公司工作。

不久以后，便出現了一本內容相似的剧本选集《紅色讲坛》。作品之一是恩斯特·万根海姆——目前在柏林的一家剧院里当导演——的一出工人阶級合唱剧。另一篇是艾米尔·哈路普写的《国际》描繪战时一座軍营中反对社会民主党叛徒的斗爭。不論在城市和乡村，每一个党支部、每一个党的附屬組織(例如紅色救助会)都掀起这种从感伤到諷刺、內容应有尽有的戏剧宣傳。俄国的一种鼓动性戏剧形式"藍衫剧"傳到德国，以"紅色鬧剧"的形式出現。这种时事諷刺剧把杂耍、滑稽剧和时事活报剧結合起来，在德国風靡一时。

这种戏剧鼓动形式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德国展开得非常成功，后来，其他国家特别是远东的共产党都紛紛效法。当时，柏林有专門被派来学习这种宣傳方法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共产党人。例如有一个来自东京的日本人伊藤邦雄，就曾在德共宣傳鼓动部以及"工人剧团"中工作过好几年。他是一个才能杰出的画家兼演員，精通舞台設計、化装游行面具設計、展覽会布置、幻灯画和招貼画的繪制。当我現在談到①共产党中国的宣傳方法——这在抗战时期大都是由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主持的——时，一切細节都使我回想起 1925—1928 年柏林的共产党戏剧。

这种追求戏剧效果，把七种艺术結合起来千方百計地吸引群众的努力，在这几年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但是，在內容方面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的戏剧和活报的那些反战主題、国际主义甚至德国的背景都逐漸消失了，代替它們的是越来越多的对俄国国家及其領导人的歌功頌德。

① 例如，可参看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紐約1939年版；哈里逊·福尔曼:《紅色中国訪問記》，紐約 1945 年版。

維利·明岑堡

这种新的宣傳方法在維利·明岑堡的手上达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

維利·明岑堡是德共的創始人之一，戏剧艺术方面的眞正天才，他在1899年出生于图林吉亚。① 他曾参加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体，称为——这一点很意味深长——"宣傳团"。明岑堡在一家鞋厂做了六年粗工以后，离开故乡爱尔福特去瑞士。在那里，他白天在苏黎世的一家药店工作，晚間便同一个具有广博修养和特殊吸引力的无政府主义知識分子弗里茨·布鲁普巴赫尔坐在一起談天。他同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分子討論人生和政治，逐漸形成了他此后一生中永远坚持的基本态度。

在苏黎世，明岑堡同俄国布尔什維克的許多領导人，同列宁、克魯普斯卡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曼努伊里斯基、契切林等人都发生联系。他特别受列宁的影响，列宁把他那种模糊的激进主义納入了实际活动的軌道。从1916年起，明岑堡便成为列宁集团的心腹。1917年11月，当布尔什維克在俄国夺得政权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次声援他們的游行；一年以后，警察把他从瑞士驅逐出境。

一回到德国，明岑堡便成为斯巴达克团的一員，参加了反对其右翼的斗爭。早在战爭剛爆发以后，他曾接办过一种已停刊的杂志《青年国际》，此后，从1914年圣灵降临节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国际青年大会开始，他便逐步組織起一个青年书記处。1920年，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时，三十一岁的維利·明岑堡，一个"职业青年"，成为它的第一任主席。

① 参看維利·明岑堡:《第三陣綫》，柏林1930年版，这是一部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历史，其中有很多自傳材料。

他后来在群众宣傳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在这段較早时期就可以看出来。甚至早在战前，他就已开始利用戏剧技术——不过还是粗糙的，因为“无产阶級戏剧”尽管以戏剧代替了枯燥乏味的演說，阶級意識还相当濃厚。有一次，为了吸引青年姑娘們参加运动，他組織了一次以“青年女工应該嫁給什么样的人？”为題的讲演会。許多人都来听讲，但是，当他什么也不說，光是談一套社会主义原理的时候，她們有一半人都逃走了。不过，即使如此，在一个女青年参加政治集会的情况还很少見的时候，和任何别的組織者相比，毕竟要数他为青年运动吸引来的姑娘們最多。

1921 年，在德俄两国分别发生卡普暴动和喀琅斯塔得暴动以后，明岑堡不再搞党的活动，开始从事他眞正的終生事业。俄国正处于严重的饥饉之中；数以百万計的人在挨餓。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向俄国以外的一切同情者呼吁，請求他們給予援助。一个月后，也就是 1921 年 9 月 12 日，明岑堡在柏林建立了国际工人援助会，这是第一个深入到非共产党工人和知識分子阶层中去的共产党組織——是此后兴起的成百上千类似組織的典范。

在明岑堡的領导下，国际工人援助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柏林汽車制造厂的工人們捐贈一辆載重汽車，开姆尼茨一个工厂送了十四架針織机，斯图加特一个工厂援助五架牛奶脫脂器，来比錫一家工厂的工人贈送了大批药品，其他团体还捐贈了医院用的冰箱、工具、粮食等等。在 1921 年，裝滿二十一艘船的物质运往俄国；1922 年运去了七十八船。在 1926 年，据明岑堡統計，国际工人援助会募集了价值二千五百万金馬克的物資。捐得的全部商品大約值二百万美元。这些物資大都是些旧貨，是否眞能頂用是很难說的，而且，不管怎么讲，对于俄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經济危机来說，这

只能是杯水車薪。但作为宣傳来讲，这些捐品的价值便不可估量：每一个捐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感到自己和工人祖国联結到一起。

此外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募集現金：工人向俄国人民捐献一天工資；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募捐，举办特殊的音乐会义演和展覽会义展；义售各式各样的物品，包括俄国風景明信片、馬克思和列宁的半身像、国际工人援助会的特殊邮票、花束、紀念章、特殊的徽章、紀念册、报紙、书籍等等。在此以前，苏俄政府曾发行一笔为数十亿美元的公債，1922年9月13日人民委員会頒布一項由李可夫、斯莫利亚諾夫、格拉澤尔和加米涅夫签署的特别法令，保证公債年息为百分之五，1933年7月1日还本。在許多号召大家认购这种公債的宣傳品中，明岑堡的密友馬克斯·巴特尔(后来变成納粹党員)的一首詩具有典型意义：

向辽闊的俄罗斯，向欧洲，
和着汽缸、发动机、拖拉机、透平机、圓盘耙、机器、机器、
　　机器轰鳴的节奏，
发出了这样的口号：
工人們，弟兄們，世界的改造者，
伸出手来吧，为了建設偉大的
沒有阶級的无产者社会而伸出你的手，
工人們，全球的无产者！

可是，整个的計划后来都由于通貨膨脹而化为泡影。

明岑堡信托机构創始于德国，但很快便遍及全世界。首先是欧洲，然后是南北美洲和远东，都响应了援助苏俄的号召。在美国，悉尼·希尔曼捐贈了四十五万美元。在日本，世界工人援助会有十九家同情报紙和杂志。1923—1924年經济危机期間国际工人

援助会在德国創办的施湯所和儿童福利机构，在1925年罢工風潮中傳到日本，第二年又在矿工罢工时期傳到英国。在俄国本国，明岑堡創办了一系列儿童之家；他組織了若干机器修配厂，同苏联工厂訂了不少合同。

为了配合他的救济工作，明岑堡用內容生动丰富的杂志来补充共产党正式报紙之不足。《紅旗报》和其他党报滿紙都是非共产党人望而生厌、难以理解的党八股，整版整版地刊載着冗长的决議和宣言。明岑堡創办了一种叫《苏俄画刊》的杂志，后来，为了模仿《柏林画报》(德国的《生活》杂志)，他把这一杂志最終更名为《工人画报》。《工人画报》第1期于1921年8月問世，发行量只有五千份；但五年以后，它的发行量便几乎达到一百万份。在他創办的其他許多杂志中，有一种叫《紅色建設》，它后来成为宣傳斯大林五年計划的最得力刊物之一。他还出版两种日报，《柏林晨报》和《新聞晚刊》，一种业余摄影爱好者杂志，一种內容广泛的无綫电爱好者杂志。他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并且建立了一个讀书会以帮助推銷这个出版社印行的书籍。

当謝尔盖·艾森施坦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德国上映时，得到了所有批評家的贊揚，德国公众希望看到更多的俄国电影。不久以后，明岑堡便組織了一个拥有发行苏联影片专利权的公司；这个公司很快就在倫敦、巴黎、罗馬、阿姆斯特丹和紐約有了代理人。公司起先只經营发行业务，后来自己也摄制影片。

明岑堡沒有参加这些年代中党內激烈的派别斗爭。他同情左派(季諾維也夫的被开除使他对俄国党的信仰大受損伤)，但他宁願一只脚跨在党外，忙着实現他常說的一句話："我們必須把知識分子組織起来。"在这段过渡时期，当党的政治生活在党被斯大林控制以前一直处于停頓状态的时候，大批积极分子都以他創办的

許多組織为藏身之所，用这种工作来安慰他們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和苦悶。他們同明岑堡发現的一种新人——“同路人”——一起工作。他們在他发明的一种組織——“陣綫”——中展开活动。

在1929—1933年的經济蕭条时期，明岑堡的企业展开了各式各样的反法西斯宣傳，大肆鼓吹俄国的文化、电影、文学、科学和風景。世界各地希望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斗爭而又不願意加入政党的进步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能在明岑堡建立的无数組織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这些組織中，最重要的团体之一是反对战爭与法西斯主义同盟，① 这个組織得到了国际运輸工人工会书記埃多·費姆門和英国工党領袖之一埃倫·威金逊这类知名人士的支持。

1935年，当“人民陣綫”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明岑堡正在巴黎，同他在一起的，有数以千計的德国逃亡者。这几年中在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当中推行共产党路綫所获得的成功，《今晚报》和《下午报》分别在巴黎和紐約的出版，数以千計的画家、作家、医生、律师和其他社交界新人的一致鼓吹經过冲淡的斯大林主义路綫——所有这一切成就究其本源都要归功于維利·明岑堡的国际工人援助会。②

---

① 在美国，这个組織一再更名，最初定名为“美国自由和平同盟”，1939年9月改称“美国和平动員会”，1941年6月又称为“美国民众动員会”，最后，到1946年4月，变成了“全国爭取和平委員会”。

② 从1928年到納粹上台这段时期，同海因茨·諾伊曼和庫特·藻埃兰(他們两人后来都在莫斯科被杀害)一道，明岑堡曾不断試探在德国另外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可能性。在他停留于巴黎的这段时期，許多內务人民委員会的密探鉆进了他的組織，其中有一个来自比尔森的捷克人安得烈·西蒙-卡茨尤其可恶，对他进行了暗中监視。

在举行过几次莫斯科审判以后，曾数次召明岑堡去莫斯科。他起先是尽量拖延行期，到最后便干脆拒絕前往。从1938年起，他开始置身于流亡者之列；他非但不参加任何集团，而且尽量避免和“托派分子”发生接触，以避免內务人民委員会的注意。

1940年5月，明岑堡同其他所有在法国的德国人一起被拘留。一个月后，他在納粹

虽然明岑堡是共产党在同情分子当中展开活动的最重要人物，他的活动却不是党在这一时期拿出来广泛推銷的唯一貨色。在“馬校”(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里，許多青年同情者們学习着各式各样的課程。这样，德国共产党人在政治領域中的成就愈小，他們就愈热衷于发明組織方法。他們开始以一种新的狂热来研究“市場”——德国社会，从而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安排他們的运动。在一味迷恋于宏偉組織規模的情况下，德共組織局委員恩斯特·施內勒向1927年的党代表大会报告説，必須把下列各种組織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它們是：三万个体育俱乐部、九千个体操俱乐部、八千个射击俱乐部、五千个足球俱乐部、三万个摩托車俱乐部、一万二千个徒步旅行俱乐部、二千个养兎养鸡俱乐部、一千个板球俱乐部、一万个歌咏会、二万个基督教青年会支部。这一系列組織的会員总人数几乎达六百万人。施內勒这套野心勃勃的計划，直到1933年以后才完成——由納粹完成。

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庫西宁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説成是創造一个太阳系，在这个星系中，每一个行星，从极其巨大的到非常渺小的，都环繞着共产党的太阳旋轉。

貝托尔特·布雷希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歌手

党在性质上的变化，在德国共产党所曾有过的唯一天才詩人

入侵前同另外几个同被拘留的德国人逃出了拘留营。后来，人們在离拘留营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現他被吊死了；斯大林主义者散布了明岑堡自杀的消息。

我不相信明岑堡是自杀而死的。同他一起逃出集中营的那两个人忽然不知去向，再也查不出来；他們很有可能是內务人民委員会的特工人員。在离他死处不远的地方，在法国的濱地中海地区，就住着他的好朋友瓦列略·馬庫，在这个朋友那里，他准可以得到避难所、金錢和有势力人物的援救。他不相信納粹能胜利，一点也不灰心。虽然已經五十岁，他仍然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脑子里还装着許許多多新的計划。

貝托尔特·布雷希特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布雷希特直到1930年才入党，因此，他歌頌党的詩歌都是在經济蕭条时期写出的；他从不了解、从未参加过原来的那种共产主义运动，也从沒有对它发生过兴趣。与此相反，当德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战斗的和按照民主方式組織起来的机构时，年輕的布雷希特，奥格斯堡一家造紙厂厂主的儿子，对它是漠不关心的，如果不說是敌視的話；內战时期，他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参加党以前，和党并沒有多少联系，对党也很少了解。他的作品反映了过渡时期及其最終产物——斯大林主义党。①

布雷希特屬于那样一种青年詩人，他們为战爭及其在德国造成的后果所深刻震动，因而表現出一种否定一切的色彩；他是反映德国社会解体的詩人之一。他以“先鋒派”的艺术形式代替了現实主义，在早期作品中企图表現出一个动乱时代給人們带来的恐怖和毀灭。他的第一部剧作《黑夜鼓声》是对魏瑪共和国的辛辣諷

① 布雷希特于1933年离开德国。在欧洲漫游一段时期后，他在希特勒統治时代定居于丹麦的斯文堡。当納粹在1940年入侵丹麦时，他又逃到别的地方，最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那里，他同老朋友汉斯·艾斯勒形成了一个共产党文艺集团的核心。这个集团的另一个成員是萊昂·福伊希特万格，他曾在一次被接見时听斯大林亲自談过举行莫斯科审判的原因。在居住于美国的反納粹十年中，这个集团——布雷希特、艾斯勒、福伊希特万格、海因里希·曼等——同德国共产党都有联系，他們在許多美国人看来就是反法西斯德国人的代表。布雷希特把不加掩飾的共产党宣傳品、高尔基的小說《母亲》改編成剧本，以这部作品和美国公众見了面；由汉斯·艾斯勒配乐的这个剧本曾先后于1932年和1935年在柏林和紐約上演。布雷希特一直忠順于莫斯科，但由于俄国党的批評家对他的詩歌并不是絕对贊同的，所以他宁願尽量长地留在美国。另外两个德国共产党詩人約翰內斯·貝希尔和埃里希·魏納特，作为艺术家来讲要比布雷希特逊色得多，但他們在1933年去莫斯科后都获得了重要的党內职位，譬如說，魏納特就曾在自由德国委員会中同包路斯和宰德利茨一起担任領导工作。貝希尔是第一批回国的人，現在已成为德国再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領导人。

战爭結束以来，布雷希特的作品已經在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被广泛演出。他是德国共产党詩人中最有独創性的人，对战后青年可能产生很可观的影响，他們都喜欢他的“先鋒派”形式，而不欣賞莫斯科制造出来的陈腐頌歌。

刺。一个早已被认为陣亡了的士兵，出人意外地回家了，但他发現自己的爱人已經投入一个黑市商人的怀抱，沒有人再需要他。剧中提到了斯巴达克团的反抗斗爭和罗莎·卢森堡，但只是作为一种加重色彩的背景。这个士兵长期搖摆于“臥床和軍营之間”，最后选擇了挂着藍色帳幔的臥床而决定不去过問政治。

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布雷希特以各种奇特的形式表現了他的虛无主义。在他看来，不論是过去、現在或将来，都不存在任何社会形式，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和美德；他要傳达的主题是：一切都是虛无。在另一个剧本中，布雷希特把我們带到了一座假想的城市“紅木市”，这座城市位于西半球的某个地方，是一个花天酒地、吃喝嫖賭、喧囂不堪和野蛮墮落的享乐中心。一个阿拉斯加的伐木工人約翰来到这里，把他用血汗掙得的工資揮霍干凈。在最后一幕中，他不仅发現一切尘世的享乐到头来都是空虛，而且人类也沒有任何寄托可言。这一时期的傾向发展到最高潮的作品，是他的最知名剧作《三分錢歌剧》，在这部歌剧中，只有小偸和娼妓才是有价值的人。这部歌剧由庫尔特·魏尔作曲，成为德国經济蕭条时期第一个大受欢迎的剧本。剧中最精辟的警句，“首先得塡飽肚子，然后才談得上道德”，已經变成民間諺語。

从这种全面否定一切、这种玩世不恭地抛开一切价値标准、这种充滿痛苦的虛无主义出发，布雷希特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轉而歌頌德国共产党的紀律和統治阶层。为它的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特征所魅惑，布雷希特变成了德共所曾拥有的最具有独創性的詩人。“先鋒”派社会批評家变成了灌輸敎条的歌手，向群众宣傳共产党哲学的工具。在这一时期，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敎育剧或学生歌剧。德文版布雷希特文集里就附有柏林-諾伊克倫馬克思学校（一所以它的社会民主党校长命名的进步中学）学生討論学生

歌剧《不答应》的部分意見。①

布雷希特的剧本使用的道具力求其少，內容力求其抽象。在一个空蕩蕩的舞台上，沒有吸引观众的自然主义布景，一个象征性的物体被推到台前，几乎成为剧中的角色之一。这些剧本是为在空場上、会議厅和軍营里演出而写的。除去三五个演員以外，时常还附有一支象征群众的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他們对剧中人的是非功过作出評定。主題是寓言性的，往往把古代的或中世紀的情节加以改編，搬到現代环境中来。它們就像鼓声一样不断地重复着——为集体而牺牲个人，这个人和那个人完全一样，沒有什么所謂个性；为了集体利益，可以不讲什么个人道德；党的等級統治是必要的和沒有伸縮余地的；恐怖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別有一种奇特的美等等。布雷希特告訴人們，个人不仅必須为事业牺牲自己，而且必須为党內統治集团的深謀远虑而牺牲事业。布雷希特在史詩剧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自己的独特手法：事件不是在它們发生的当时表現出来的，而是經常以剧中剧的"灯光暗轉"形式来倒叙。在布雷希特剧本的形式——有时也包括主題——方面，他显示出对莎士比亚的有意識模仿；总結全剧寓意的典型的莎士比亚式独白，往往以合唱的形式搬到布雷希特的作品中。布雷希特醉心于中国哲学，喜欢把馬克思和列宁描繪成"圣賢"或"先哲"。

布雷希特最初写出的教育剧之一《人就是人》的主題是：个人是軟弱无力和可被替換的。在序幕中，只有一个演員登場，宣布貝托尔特·布雷希特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接着，戏剧正式开場，表現一群在加尔各答的士兵；由于某种意外，他們当中有一个人失踪了，可是立即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不管太阳究竟照在

① 貝托尔特·布雷希特：《探索丛談 11—12》，柏林 1931 年版，第 4 卷，第 308 頁以下。

誰身上都是一样。”1947 年德国发生的一件事，就好像是布雷希特这一早期剧本的說明书。在波茨坦，一个俄国士兵押解着十二个德国战俘，准备把他們送到一个沒人知道的地方去。在市区車站上，这队人从一群下班回家的男女旁边走过。一个衣衫襤褸的中年妇女突然扑到其中的一个德国战俘身上；这是她的丈夫，公报上已經宣布他陣亡了。俄国卫兵竟允許这对破鏡重圓的夫妇在另外十一个战俘和平民們瞠目注視之下一起回家去了。卫兵从人群中挑出一个夹着公事皮包的小伙子，向他說道：“你跟我們走吧！”于是，这一小队人又凑足十二个，好像沒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地揚长而去。凡是蹲过集中营的人都領略过这种待人的方法。正如布雷希特在他那个剧本的收場白中所說：“以后的事实自会证明我說的話，自会证明！”

《懲罰》

在布雷希特所写的这一系列教育剧中，最能够把一切恐怖主义特征都集中表現出来，熔鑄为反映极权主义政党及其精銳卫队——內务人民委員会——的一面鏡子的，是一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影响下写出的剧本《懲罰》①。伴奏的乐曲出自汉斯·艾斯勒之手，他的兄弟格尔哈特曾在 1929 年底被派往中国，負責消灭違抗俄共政治局的反对派。这一个表現消灭党內反对派的寓言剧，可以說是莫斯科几次大审判的預演。布雷希特对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具有一种天才的敏感，因此早在他的主子举行做样子审判的五年以前，他在 1931 年就写出了一部表現这种审判的剧本。

---

① 《懲罰》，見《貝托尔特·布雷希特全集》，第 2 卷，第 329—359 頁。馬利克出版公司(倫敦中西区 1 号) 1938 年版。

四名鼓动員向一个合唱队报告他們到沈阳去执行任务的情况。合唱队隐在幕后，鼓动員在台前表演出他們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的事件。許多段都配上了音乐，中間插进一些朗誦詩式的台詞。戏是这样开幕的：

"合唱队：站到前面来！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在这块土地上，革命也发动起来了，战士們的队伍在这里已經組織起来。我們同意你們所做的一切。

四个鼓动員：等一等，我們还有話說。我們把一个同志判处了死刑。

合唱队：誰杀了他？

四个鼓动員：我們杀了他，我們把他枪毙了，他的尸首被扔进了一个石灰坑。

合唱队：他做了什么事，使得你們枪毙了他？

四个鼓动員：他往往做得对，有时可做錯了，但是在最后，他让运动遭到了危險。他的动机頗好，但是效果很坏。我們請你們判决。

合唱队：如果把事情的經过原委告訴我們，你們就会听到我們的判决。

四个鼓动員：我們将接受你們的判决。"

接着灯光暗轉，倒叙出一系列事件，第一場題为"經典著作(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在这一場中，四个鼓动員談到他們如何在边境上最后一个党的联絡站歇足，找寻一个把他們領进中国的向导，在那里，他們遇見了一个"青年同志"：

"三个鼓动員：我們来自莫斯科。

青年同志：我們早就在等着你們。

三个鼓动員：为什么？

青年同志：我們已經走投无路。这里到处是騷乱和貧困，飯吃得少，仗打得多。許多人有胆量，可是沒有几个人认得字。"

青年同志問他們是否带来了火車头和拖拉机，机关枪和軍火。可是，与此相反，他們連一封中央委員会的指示信都沒有带来。

"三个鼓动員：情况是这样。我們沒有給你們带来任何东西。可是，在越过边界到达沈阳的时候，我們将給中国工人带去經典著作和宣傳家讲述的原理：共产主义的入門知識；使愚昧的人了解他們自己的处境，使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級觉悟，使有阶級觉悟的人获得革命的經驗。可是，我們倒要向你要一辆汽車和一个向导。"

这一場結束后，合唱队唱了一支《苏联頌歌》。

在題为"隐姓埋名"的第二場中，四个鼓动員准备进入中国，但他們首先必須化装，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

"联絡站負責人：你們得化装成中国人越过边界。你們一定不能被人看見。

两个鼓动員：我們不让人看見。

联絡站負責人：假如你們当中有一个受了伤，一定不能让他落到敌人手里。

两个鼓动員：我們一定不让他落到敌人手里。

联絡站負責人：你們准备好牺牲生命和藏尸灭迹了嗎？

两个鼓动員：准备好了。

联絡站負責人：那么，你們此后就不再是你們自己了。你不再是柏林的卡尔·施米特。你不再是喀山的安娜·基尔斯克，你也不再是莫斯科的彼得·薩維奇。你們全都沒有姓名，沒有母亲，你們是革命将要在你們身上写下命令的空白傳单。"

負責人发給他們每人一副面具，让他們戴到臉上。

"合唱队：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必須既能进攻也能退却，既能坦

率也能說謊，旣能为人服务也能不为人服务，旣能遵守諾言也能言而无信，旣能投入危險也能躲避危險，旣能出头露面又能隐姓埋名。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一切美德中只有一件美德，这就是：他在为共产主义进行战斗。”

在中国的第一个插曲題为“巨石”。鼓动員們先到商业区去发动苦力。他們事先告誡那个“青年同志”不要“落进怜憫的陷阱”。苦力們正在拉着一条船逆水而上，他們在淤泥中不停地滑跌着。“青年同志”混到他們当中，他把一块大石头搬到淤泥里，好让他們不致滑倒。“青年同志”搬了三次石头，然后忍不住大喊出来，要求除这种最初步的改善以外，还要进一步改善苦力的处境，給他們更好的鞋子。他这样暴露自己以后，便被监工抓住了，于是，鼓动員們不得不赶快逃走。

下一个插曲的題目叫“小委屈和大不平”。

“四个鼓动員：我們在工厂里建立了第一批党小組，教育了第一批积极分子，創办了一所党校，并且教会他們怎样散发秘密文件。”

他們派“青年同志”到工厂門口去散发傳单，但是指示他不能暴露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須避免同当局发生冲突。可是，当一个警察毆打工人时，“青年同志”又忍不住出面干預，甚至大叫求救。結果，他同鼓动員們不得不再次逃走。

在一幕題为“人到底是什么？”的插曲中，他遭受到最大的考驗，这关系到他对企业界的态度問題。

“四个鼓动員：我們每天都同旧工会、同絕望和屈从进行斗爭。我們教育工人把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化为夺取政权的斗爭，教导他們使用武器和組織示威的方法。后来，我們听說商人們正在同統治着这个城市的英国人爭夺关稅。为了利用統治者之間的这种

矛盾来帮助被統治者，我們派'青年同志'給最有錢的一个商人送去一封信。信里写的是：把苦力武裝起来。我們指示青年同志：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武器。我們就来表演一下发生的事情。

一个鼓动員：我是商人，我在等着苦力工会关于共同对付英国人問題的来信。

青年同志：这是苦力工会的来信。

商人：我請你跟我一起吃頓飯。

青年同志：能同您一起吃飯实在荣幸。"

商人指出苦力工会和他自己的共同利益；工会和他都很聪明，都依靠苦力过日子。"青年同志"想到鼓动員对他的指示，对商人的話表示同意。到酒席摆好以后，商人唱起了他心爱的歌曲《商品之歌》：

"河的下游盛产大米，
上游的人需要吃米，
如果我們囤积起大米，
他們的錢就得多給。
那些拖粮船的縴夫，
得到的米也就要更少，
可我呢，更可以吃便宜米，
用不着多掏腰包。
我知道米是什么东西嗎？
我知道誰知道这一点嗎？
我根本不知道米是什么！
我知道的只是米价！……"

"青年同志"被这首歌气坏了，他不再願意同商人一起吃飯。

“青年同志(站起身来)：我不能同你一起吃飯。

四个鼓动員：他就是这样說的。不論是諷刺嘲笑还是强施硬拽，都不能叫他同一个他所鄙視的人同桌吃飯。結果，商人把他赶了出去，苦力們也就沒有能得到武器。”

在这里，剧中插进了一段关于共产党策略問題的討論。

“合唱队：难道不应該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嗎？

四个鼓动員：不！

合唱队：我們早就不再以法官的身分听你們讲話了，而是开始从中学习。”

然后，合唱队唱起“改变世界吧，这个世界需要改变！”的歌曲：

“为了消灭罪恶，有什么罪恶
　你不願去干呢？
你能不能改变世界？做这种事
　你是不是还不够心辣手狠？
你是什么人？
不怕陷进泥坑，
　不怕同劊子手拥抱，但是要
　改变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改变。”

最后一場的題目叫“背叛”。

“四个鼓动員：这几个星期，对我們的搜捕大大加强了。我們只有一間藏着排字机和小册子的密室。一天早上，城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搶粮風潮，听說乡下也騷乱不安。”

“青年同志”同鼓动員們討論起义时机是否成熟。党决定延期发动起义以等待更好的时机，他竟違抗党的命令。

“三个鼓动員：你到失业工人那里去，說服他們一定不要先单

独起事。我們以党的名义要求你做到这一点。

青年同志：可是党又是誰？党是不是坐在一間装着电話机的屋子里？它的思想是秘密的嗎？它的决議是瞞人的嗎？它是誰？”

合唱队这时唱了一首“歌頌党”：

一个人只有两只眼，
党有一千只眼。
党的眼睛看着无数国家，
一个人只看到一座城市。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党却能长期存在。
一个人能被杀掉，
党却是杀不死的。
因为它是群众的先鋒队，
它以从現实經驗中提炼出来的
經典著作的指导原則，
領导着群众进行战斗。”

“青年同志”这时已經把經典著作撕碎，他大喊道：

“那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在战斗的时刻，我拒絕接受只是在昨天有效的一切理論，怎样做合乎人情，我就怎样做。我的心为革命而跳动。”

他扯下面具，高呼：

“我們来帮助你們了，我們来自莫斯科。”

他把面具撕成碎片。

“四个鼓动員：我們看到了他当时的模样。在薄暮中，我們看到他那張裸露出来的面孔，坦率眞誠，富有人情味。他已經撕下了

面具。他不断地在大街上高呼。我們把他打昏过去，抬起他失去知觉的軀体，急忙跑出了城。”

接下去就是題为“懲罰”的高潮部分：

“三个鼓动員：

我們作出决定：
一定不能让他再露面，他必須永远消失踪迹。
因为我們要回去继續工作，
我們不能带着他，又不能把他留在那里，因此，我們必須
把他枪毙，然后把他抛到石灰坑里，石灰将燒掉他的尸体。

合唱队：再沒有别的办法了嗎？

四个鼓动員：

时間紧迫，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我們
花費五分钟时間，研究了
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杀人的确是可怕的事。
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
我們不仅要杀死别人，而且要
杀死自己。
我們认为，我們沒有权利
怀着不杀人的慈悲之心。只有我們
那要求改变世界的不屈意志，才是
我們决定如何行动的依据。

第一个鼓动員：我們要征求他本人的意見，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第二个鼓动員：可是，即使他不同意我們的决定，他也必須消失踪迹，永远消失踪迹。

第三个鼓动員：我們現在問你，你同意我們的决定嗎？

青年同志：同意。我明白我經常做錯事。現在让我死掉反而更好。

三个鼓动員：对。你打算一个人干这件事嗎？

青年同志：帮我一下。

三个鼓动員：把头靠在我們的手臂上，閉上你的眼睛。

青年同志：为了共产主义……

三个鼓动員：我們就这样把他枪毙了，然后把他扔到石灰坑里，当石灰把他完全吞沒以后，我們便回去继續工作。

合唱队：

> 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
> 你們傳播了
> 經典著作中的原理，
> 共产主义的入門知識。
> 革命在这里也发动起来了，
> 在这里，战士的队伍也已經組織起来。
> 我們贊同你們所做的一切。"

在剧本的語言方面，在它使用的各种象征手法方面，这部教育剧《懲罰》都具有共产国际改变后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失敗和随后的清党，在德国被用来向德共灌輸新的教条，使它俯首听命于莫斯科并且对納粹不进行积极斗爭。布雷希特以"先鋒派"的抽象形式，

美化了斯大林主义党并为它祝福。他在剧中大胆运用的合唱队，象征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党內生活的干涉，以及人們对它的等級統治紀律的志願服从。那个天眞的共产党人象征着經斯大林改組后的共产国际，他志願接受莫斯科代理人的最后判决。在俄国的边界地区，到处都設有党的联絡站，通过那里，莫斯科的使节隐藏他們的本来面目潛入每一个国家——誰要是揭下他們的面具，就是犯了最大的罪行。在这种面具下，他們操纵着各地的群众运动，就像布雷希特剧本中所写的那样，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反对英国人、即反对西方的斗爭，可以不惜牺牲这种运动同商人联合。布雷希特以一种非常具有德国風格的簡单方式，描繪出德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形象：它早年的一切革命动力都已丧失干淨，它已經絲毫不再有自己的生命，完全变成了俄国統治集团手上的一个馴服工具。

第六部分　綜述与結論

第二十八章　綜述与結論

由十月革命产生的政权，經历了一系列各有明显特色的改变。苏維埃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产生的，此后五年中，在內战的烽火不仅遍及俄国而且燃燒在欧洲的背景之下，苏維埃社会的新形式得到了发展。德国战敗以后，欧洲在十九世紀后五十年建立起来的岌岌可危的均势終于被打破，而一时又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势力平衡。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国当中，在沿着多瑙河和中欧的一系列磨擦点，局势始終动蕩不安，并且在曇花一現的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成立时达到最高潮。不过，对苏維埃新国家的形成起了更大影响的，还是席卷德国和中間地带的內战。在这些年代中，革命国际主义是列宁党的动力，这个党在夺取政权时曾怀着这样一种想法：沙皇統治制度的被推翻，将是一場以德国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斯大林主义者和大部分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把列宁主义政党描繪成一个具有铁的紀律实行独断制度的集团——前者希望以继承十月革命家衣鉢的旗号为他們的专制統治撑腰，后者則认为从1917年11月以来，莫斯科就沒有发生过任何根本性变化。可是，列宁主义的党事实上远非如此。1917年起义前夕，列宁主义的党便曾发生过分裂。列宁的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做了脫离列宁陣营的“逃兵”，反对建立一党专政的傾向，主張各苏維埃政党共同执政。一个外人，一个一二十年来一直以俄国

社会主义者論战中所具有的那种刻毒方式大力反对列宁的人——列夫·托洛茨基——却变成了列宁的影子。1918年，当年輕的苏維埃国家的生命本身系諸于能否解决当时还很强大的德国軍队造成的問題时，革命目标和抵抗德国侵略的意願之間的矛盾，使布尔什維克党在取得政权还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再次发生分裂。

虽然布哈林和卢森堡对布尔什維克政策的一般批評远不是相同的(譬如說，他們在民族問題上便存在着尖銳分歧)，他們却一致指出，苏俄同德国总参謀部单独媾和必定要阻碍德国革命的发展。毫无疑問，德国軍方所以能有效地鎮压1918年11月的革命，其原因之一就是东綫的和平給了他們一个喘息时机；可是，俄国苏維埃政权的垮台——如果不签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很有可能出現这种局面——是否就能帮助德国革命者呢，这种情况是否就能鼓舞他們更坚决地同德国总参謀部进行斗爭呢？俄国同毗邻諸国之間的关系，正如俄德两国之間的关系一样，并未由于布列斯特和約或它的影响得到解决。为俄国革命和同盟国的战败所引起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复杂的多重民族願望，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帝国兴起时期的欧洲一直存在着。目前的斯大林主义解决方式，不仅把毗邻国家而且把一大部分德国并入一个大俄国的做法，只能使这个問題更趋尖銳。

列宁的伙伴都狂热地献身于一个事业，但他們的心目中絲毫也不存在着一个固定的"元首"；列宁的話所以有威信，只是依靠他的有力的邏輯，他得时刻不停地說服这些头脑頑梗的人，他們同他一样全心全意地信仰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他只是領袖之一。党內不仅不存在自动的意見一致，而且列宁也不是自动地就居于多数，他必須同那些在才干上几乎同他不相上下的人作斗爭，才能使他的观点获胜，而他的經常获得胜利，也絲毫不是由于他的身后

站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給予人以威胁。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期間列宁的主要反对者尼古拉·布哈林，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着深摯的爱，这种爱只能以往往在两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士兵之間产生的那种感情来相比，而且还由于志同道合而更为深厚得多；但是，这些早期的布尔什維克首先是有原則的人。在布哈林看来，国际社会主义的前途将要为一番布列斯特和約所葬送，因此，他为了挽救这种前途而进行了极其尖銳的斗爭。作为党的多数派領袖，他曾考虑把不听話的列宁軟禁一段时間，以实現他的政策。这項大胆的計划始終沒有被付諸实行，最后，列宁为自己的政綱爭取到了多数。但是，这段历史的值得注意之点并不在于他們的冲突，而在于这两个人随后的完全和解。为自己的观点战斗了三十年的列宁，能够以最惊人的灵活性把渙散的战友重新团結起来。他不仅把全党爭取到他的政策这方面，而且能够在曾經彼此进行过尖銳斗爭的人們中間重新造成一种团結友好的气氛，一种忘掉过去、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目前的困难任务和将来的远景上的团結。曾經反对过列宁的观点并不成为一种罪状；他們当中不存在私下怀疑的潛流。这批第一代布尔什維克能够毫无拘束地和抱着罕見的客观态度来討論問題，討論怎样进行斗爭以及从斗爭中吸取教訓。

当二十年代初期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我还是来自西欧的一群青年共产党人中的一个，布哈林曾向我們毫无保留地談到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及他对列宁进行的斗爭。在喀琅斯塔得暴动发生后的俄国，有不少現象使我們这些来自西方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感到不安，但是布哈林的心里肯定沒有任何隐私。只有在革命头几年的俄国生活过并且看过列宁和布哈林如何相处的人，才能充分体会二十年后維辛斯基說布哈林曾策划暗杀列宁是多么

荒誕不經。

如果仅仅依靠他在布列斯特危机期間的表現，斯大林是不会得势的。他贊成必須同德国締結条約，甚至比列宁本人更过火地指出，德国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希望，在俄国制訂政策时应該不考慮李卜克內西。

“‘西方沒有革命运动；我們看不到事实；有的只是可能性，而可能性是不能放在考慮之列的。’‘不能放在考慮之列嗎？’列宁立刻拒絕了斯大林的支持；誠然，革命在西方还沒有开始；‘可是，如果我們因此而改变策略，我們就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①

随着德国1923年暴动的失敗，这种国际主义观念終于破产了；这些希望，这些意願从此被永远摧毁。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1923年的慘敗，部分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內部結构，它們的类似弱点——共产党的年輕幼稚和社会民主党达到中年的苟且偷安，部分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列宁主义观点移植到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中来，要涉及到許許多多的問題，决不是把一套教条主义公式从俄文譯成德文就算完事的。尽管已經战敗，德国社会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組織性，有一个組織严密的制度网，凭借这种条件，統治阶級在保卫自身的地位方面，能够比1917年处于土崩瓦解情况下的俄国統治者有效得多。想击敗复辟力量，单是一次經过周密准备的政变并不能达到目的；它需要一种革命政治手腕，而那位感情冲动的空想家罗莎·卢森堡，始終也沒有学会运用这种手腕。她同强权政治家正好相反，想摸索出一条代替俄国經驗的德国道路，但是她的思想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发揮。不过，假如革命不曾在俄国倒退、从而沒有为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50頁。

它增加了一重新的障碍的話，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本来也未尝不可以发展成熟，不可以摆脫敎条主义的束縛和工会狭隘性而現实主义地大胆行动。

十月革命后的孤立并沒有导致俄国共产党像人們所預料的那样直接丧失政权，而是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并沒有让失去政权的阶級——地主和大資本家复辟，另一方面革命的一切初衷也都逐漸消失。在一个已經解体但仍然具有强大資本主义势力的欧洲，布尔什維克发現他們原来的願望不可能实現。由于他們决心要保持住一个在不同的前景下夺得的政权，結果，他們便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只能改变苏維埃制度，使之适应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一个革命国际主义的政党，統治着一个单靠它本身并不能实現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开始于1920—1921年的十月革命宗旨的破产，在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团体胆怯露面之初已經使它受到侵蝕。通过这种可以觉察的一步步加重的侵蝕，从外界看来像是在最有利条件下发动的德国1923年暴动，由于其內在的必然性而被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冒險。这次流产政变的細节反映了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瓦解过程。德国共产党人的失敗标志着**1917—1923年革命国际主义时期**的結束。

作为1923年德国暴动的国际背景，在意大利、巴尔干諸国以及苏俄边疆的另一面——土耳其都发生了社会大变动。在1923年，崛起了三个将要主宰欧洲命运达二十年或更多时間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斯大林于1922年4月2日第一次被选为总书記，从而为他夺取全部权力的斗爭取得了一个前提条件，这以后，他便逐步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領导集团并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法移入党內，通过这些步驟开始了他那爭夺大权的斗爭。希特勒以发动慕尼黑暴动在历史的銀幕上閃現了一下，他

当时还是一个外省的狂想家，在以后許多年內都不能战胜还未被粉碎的德国工人的力量。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民主和部分国有化的綱領下夺得政权，以后几年中，他专心致志于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馬提奥蒂在1924年的被暗杀标志着这个巩固过程的完成。与此同时，在邻近的巴尔干，政治上受着俄德夹攻的一些新国家地位极不稳定，正在竭力謀求农民和新兴城市阶級之間的平衡。斯塔姆博利斯基-贊可夫插曲以及那些恐怖主义特点，正是整个半島历史的縮影。在被战败和削弱了的土耳其，通过一次成功的政变，穆斯塔发·凱末尔使一种半現代化的专政适应于已經过时的专制政体，他的国民党以一个民族主义的和現代化的綱領更換了这种专制主义。在中国，布尔什維克的学生和門徒蔣介石，在短期的联共以后便反抗自己的老师，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其控制政权的一切方法又都适应于中国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內容。

当代标准的极权主义政权是一种以党为国的国家，統治着它的是一个有紀律的和等級森严的国家党及其秘密警察。党把經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合而为一；国家党在許多国家中已經实現生产資料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化，但在上述政治控制和經济控制相結合的背景下，这种国有化首先是一种通过經济生活滲入政治权力的手段。国家党使它本身以及它所控制的社会失去了过去留下的一切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特点。当代的国家党是一种嶄新的現象，它既不同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也不同于反对沙皇統治的恐怖主义密謀者或列宁的革命团体。但是，国家党又是这些早期組織的继承者；它的語言、象征标志和思想，都直接产生自这种早期傳統的經驗。如果沒有雅各宾主义或列宁主义，国家党的思想和組織就会呈現出另一种情况，而对这些早期社会現象进行詳

細考察以后，我們会发現它們同今天存在着的国家党之間的确有許多类似之处。不过，在我看来，历史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如果再进一步，就不足以作为进行有成果分析的根据。

列宁一生从事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爭，他希望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来更換这种制度。列宁主义的党是在反对沙皇統治的斗爭中作为一种工具組織起来的；它的密謀方法是这种专制制度的产物，每一个反对沙皇的革命团体——左右两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維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少数民族团体等等——都具有这种特点。列宁主义的党所以实行集中制，是为了要維持在它以前的革命团体的战斗性，但要擯棄用恐怖手段对付个人的那种无益壮举，而代之以进攻整个制度。人数很少、势单力薄的布尔什維克队伍，在党的領袖、特別是列宁大胆提出的革命前景的号召下团結一致；它的成員服从流亡国外的总参謀部的指揮，因为他們对共同的事业有一种共同的狂热信仰，因为每一个人都願意为共同的奋斗目标而牺牲自己。要創造一种团体精神和执行党紀，列宁所能依靠的只是他的精神感召力量；他不能給人以領取薪金的工会职位、名誉地位和政治前途，甚至个人表揚也沒有，因为党的工作必須隐姓埋名地、不声不响地在暗中进行，甚至在精神上都要孤立于当时社会主义国际的兄弟党之外。

这样一种組織培养出来的，是一种不同于执政党走卒的人——不管这样一个政党是否有能力完成它为自己規定的任务，不論这样一种組織是否能成功地从沙俄本土移植到西方（在那里，工人阶級已經按照它所处的环境——資产阶級民主国家——的格式发展了民主組織），这种說法始終是有效的。列宁主义理論的巨大缺陷，恰恰就在于沒有能預料到：当这样一种政党居于掌握无限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时，它将会发展出各种預料不到的形式，迈

出未曾預見到的跃进步伐，面临种种新的和复杂的社会組織問題。当事实已經表明无产阶級专政并不是过渡到无产阶級民主的短暂时期时，俄国統治者便面临着一个新历史时代的前景和相当巨大的难題。

列宁在1923年已經病重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慘遭失敗阶段，他始終沒有能神智清醒地視事。在俄国的內战年月中，他已經悲哀地注意到苏維埃結构的开始破裂和僵化。在他每一次保卫党不改变方向——像工人反对派集团、喀琅斯塔得叛乱者、工会反对派以及党和共产国际內部其他各种集团所要求的那样——的时候，他也充分意識到暗含着的危險，并且尽力在每一次采取剧烈手段以后总要适当地緩和一下形势。他在去世前几年不断地作出努力，希望防止极权主义政权的形成（他已預見到这种政权将会带来災难性的后果），可是，这些努力都悲剧性地以失敗告終。列宁在垂危之际防止斯大林继承他的地位的斗爭，是人类历史上极富有戏剧性的大事之一；关于这一事件，我們在这里只是作了枯燥的介紹；当新一代的俄国人能够彻底弄清楚它的时候，这一史实将大大有助于解决面临的新問題。

列宁对待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特点。他力图把德共党內的各种冲突力量統一起来，限制那些教条主义的而且往往是幼稚的討論，使那些怀着不必要的怨毒情緒彼此竞爭的人能互相和解。列宁对德国，特别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是俄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章，对这方面的問題，还从来沒有人作过足够的研究，在本书中也只是作为一种主要內容的陪衬，并沒有得到它理应得到的詳尽闡述。我希望能在本书的續編中更詳細地探討这一問題，比較一下列宁和斯大林对待德国的迥然不同的态度。

托洛茨基，苏維埃共和国的另一个奠基者，从不同的个人地位和理論前提出发，反对建立国家党制度。正因为他在內战时期是軍队司令，比别人更多地参加了为极权主义制度奠定基础的工作，所以他也比别人更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危險性：

"五百万紅軍的复員在奠定官僚統治基础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凱旋归来的指揮官們紛紛在地方苏維埃、在經济和教育部門担当起領导職务，他們坚持不懈地到处傳布那种保证了內战胜利的制度。这样，在一切部門，群众都被逐漸排斥于实际参与領导国家的大門之外。"①

正因为托洛茨基不得置身于布尔什維克党內"老近卫軍"的內部专政之列，正由于这种使他在爭夺继承列宁地位的斗爭中受到阻碍的处境，托洛茨基才比别人更早地和更清楚地看出蛻化的征兆，1923年托洛茨基企图在党內实行"新方針"的斗爭，是划分两个历史时期的界标之一。他以巨大的精力进行战斗，强調指出把夺得政权以前十四年中的布尔什維克党和目前的党等同起来是一种謬誤，他同那些說革命前的党和革命后的党是有机一致的、党是永不会犯錯誤的神話进行了斗爭。他力图遏制住新的統治阶級，这个阶級正在利用一套教条主义的和先驗的公式爬上个人权力的頂峰，并且打算把这套公式一代代地傳下去，作为防止任何变革的思想壁垒。

由于党統治阶层需要一个人来巩固党的权力和压服一切抵抗，斯大林便应时而起，他不顾快要去世的列宁的警告，同"老近卫軍"联合起来反对当时的主要危險——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他显示了自己翻云复雨纵横捭闔的天才。他在执行这一极其巧妙的

① 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第89—90頁。

策略时，并沒有事先准备好的方案，而是实驗主义地試探着行事，通过党的傳統格局和个人野心的网眼摸索道路，一个一个地小心除去他夺取絕对权力的所有障碍。利用德国革命失败后的絕望情緒，斯大林把1917年国际主义变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了俄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这种理論虽然是通过教条主义的和內容空泛的长时間討論后产生的，却大胆地和具有深远意义地重新肯定了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了帝俄的一切民族主义願望。

“不言而喻，所爭論的〔他的同时代党史作者波波夫写道〕并不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任何国家——不論其幅員大小和經济发展水平如何——建成的問題，而正是我国的一个問題，以我国的領土、自然資源和已經达到的經济发展水平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問題，也是具有一般資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典型問題。”①

在这种斯大林主义理論中，“**社会主义**”一詞失去了它在十九世紀所曾具有的一切意义；它同馬克思主义的任何学派、集团、注釋家或左道旁門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沒有共同之处；它把一整套同列宁的社会主义哲学观点截然相反的概念固定下来。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最初一段年月，社会主义只包括下列含义：我們，斯大林主义党，能够作为一个少数派集团保持住政权、加强这个政权，并且不同国內的其他任何集团分享，我們能够成功地和单独地保卫住这个政权，抵擋住外国施加的任何压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或者說保卫壟断政权，其定义在事变过程中变得愈来愈为狹窄。要保卫的政权既不是苏維埃的也不是党的权力，而是一个集团的权力，这个集团使党的利益和它本身的利益如此一致，又使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如此一致，以致为了保卫本民族的基本利益，

---

① 波波夫：《苏共簡史》，第2卷，第276頁注。

便有理由用最专横的方法来維持这种壟断局面。

二十年代中叶过渡时期的特征是为維持这种壟断政权而斗爭，也标志着欧洲极权主义时代的开始。这样一种壟断政权的局面不可能由一个友爱的集团——哪怕也具有一个等級統治阶层——来維持；它需要一个独裁者。斯大林必須把“老近卫軍”的代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后来的布哈林排除出政治局，因为这些人是他走向个人独裁的障碍。开始于这一时期的对“領袖”的歌頌，是这架政权机器必要的潤滑剂。革命后俄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大权集中在党的总书記手中成了一种領导制度。不过，尽管如此，俄国的极权主义政权（革命倒退的产物）仍然承继了革命所創造的各种形式和制度；斯大林不得不按照革命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偶像要求，在俄国群众面前把自己打扮成新政权开基者列宁的长子和最亲密的学生。虽然帮助希特勒上台的操纵行动和操纵者是德国革命起义的副产物，而不是革命起义的創造者，希特勒却是作为一个下层阶級的儿子，領导着群众解决深刻社会危机而取得政权的。在1923—1924年，斯大林則是从道路的另一端以独裁者的身分出現，他不是走在日益不滿現状的群众的前头，而是一个新統治阶級委托的代表，負責防患于未然地鎮压所有的反对派，保证它的新地位万世长存。

这样，在斯大林夺取个人独裁权力的过程中，新的国家党便开始发展起来。为了建立他的个人統治，斯大林必須在权力机构內部除去一切反对分子，从而必須改变党的內部結构。尽管这些年代中革命倒退了，革命傳統的影响仍然如此巨大，十月的精神仍然如此深刻地滲透着党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致斯大林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現他那冷酷的但并非不流血的政变。他必須在权力机器內部夺取权力，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一个

人一个人地把它們爭取过来。他必須孤立、誹謗、瓦解、賄賂和威脅一切在危机时期可能为不滿的党所接受的实际竞爭者和打算同他竞爭的人，如果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就必須把他們消灭。这一系列强权政治的罪恶或高明手段，不仅反映了斯大林要排除一切障碍誓必夺得个人权力的决心，也反映了这些障碍之特别巨大，他所面临的1917年精神作梗的时期之长，虽然俄国人民表面上对政治是那样漠不关心。革命的遺产、习慣、傳統和格局在党內具有巨大的影响，使斯大林发現：即使是在已經退化的苏維埃民主和党內民主的范圍內，他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对党內生活的最大限制，即使是等級統治的最严格紀律，都不能給予他以足够的保障。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修正的而是一个新的权力工具。要控制党，他就必須建立一种新的权力控制机构。

在1923年，当斯大林充分利用契卡的时候，他变更了这个組織的职能。契卡是在內战时期成立的，本来为的是打击敌人、敌对的阶級——地主和資本家，这时也变成了斯大林集团在党內夺取和維持壟断权力的工具。这时，党的每一种职能都得到了双重保证，第二个保证者是先鋒队之中的先鋒队，它就像阴影一样站立在公开的党組織的背后。如果沒有党內的恐怖主义先鋒队，斯大林就无法利用合而为一的政治和經济权力对付他的敌手，并且把国家要职完全集中在几万个紅人的手上，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下层党員参加領导甚至一部分党的干部对另一部分干部实行民主領导的最后一点痕迹都消除干净。契卡在变成党內主人的同时，一般說来也更加移近到俄国社会的中心，并且在那里更加巩固地立定了足跟。

本书已經詳細描述的这段**1923—1929年轉变时期**，有一个特点得到了清晰的說明，这个特点迄今还沒有被人們足够地分析过

甚至还沒有看明白，这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新政权的平行对等关系。为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教条所迷惑，大多数分析家都把他說成是一个現实主义的独裁者，他在放棄早期的世界革命思想以后，便聪敏地躲在边界壁垒后面統治着他那幅員辽闊的帝国，不怀有統治世界其他地区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形势发展，已經粉碎了这种斯大林沒有野心的神話。在本书对国家党制度的起源作了詳細論述以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意义便显得十分清楚了。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植根于本国的社会矛盾之中，抱着革命时期的殘余傳統和仍然存在的列宁主义詞藻不放，原本是一些并不容易被摧毁的有生命力的組織。在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政策中，重新調整共产主义运动使之适应于工会主义欧洲的修談，同国家党的铁腕統治形成了鮮明的对比，这个党不能容忍附屬于它的各国党的独立超过它的民族支部的范圍。共产国际打出的旗号是空洞的，过去已經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旗帜也就得收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按照新主子的統治方式被改造，变成了恐怖主义俄国国家党的縮影；它具体而微地再現了这样一种国家党的一切特色，所不同的只是：作为它的权力来源和服务对象的国家不再是它本民族的国家，而是"社会主义俄国"，地球的中心，不是依据国际主义思想而是依据地理政治观念規定的一个权力体系中樞。

随着俄国在1926年的轉变，共产国际所屬各党都受到清洗。不仅仅改变了綱領，不仅仅开除或更替了領袖——这样做不过是表面檢修罢了；实际上就連党的結构本身也被破坏无遺。由欧洲內战产生的欧洲各党被打散了，变成了一个个无能为力的党小組——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来的政治大师們用暴力办到的。某些同时代人以为党被打散的这种过程意味着共产国际的消灭，是民主对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一个欧洲持久稳定时期的

开始；但是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他們沒有看到打碎了的部分已經被熔鑄成一个新的整体，分散的集团已經重新聚集起来，一种新型的組織——它只是到后来才被称为“吉斯林集团”或“第五纵队”——已經在二十年代中期形成。这种在莫斯科直接操纵下重新配备共产国际干部的过程，已經在本书所举的一个德国例子中得到詳細說明。由于我本人曾被深深卷入这一过程，本书也說明了我从切身的痛苦經驗中領会到的許多个中秘密。让現代讀者有机会漫游一下共产国际危机的迷宫，对某些死胡同只是順便指点几句，看来是一种可取的安排，因为1925—1927年的共产国际是极权主义的温室，在那里，可以看到日后成长为大树的幼苗。

已經有許多人試图对納粹制度的起源作出事后的解釋。人們仔細研究了德国的政治史和經济史，力图从德国的历史或民族性中找寻出通向納粹野蛮制度的綫索。有一位分析家竟然走到这样的极端，以致把德国問題說成是一个心理疗法的問題。① 新兴的納粹政权和西方之間的冲突，掩盖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德国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当然，忽視促使納粹具有其特殊形式的德国因素也是不对的。納粹的哲学和政策，起源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敗而变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德国那种开始較晚但发展迅速的工业化——这使得它那日益扩展的工厂很难适应于国內市場——是嫁接在一个半封建社会的身上的。拥挤在德国各个不通气的角落中的，不仅有一个皇帝而且还有一二十个小君主，即使是在德皇退位以后，这个封建残余阶层及其追随者仍然在德国生活中形成一个有力集团。德国軍界通过相互通婚这类强有力的社会紐带同重

① 理查·布利克勒医学博士：《德国是否无可救药？》，紐約1943年版。

工业界联結在一起(从德国重工业界这方面来說，它大部分是沿着軍需工业的路綫扩展的)，同时，軍界上层主要又由大地主分子构成；因此，軍队代表了土地貴族和工业貴族两方面的利益。它反映了德国社会本身自相矛盾的二重性；因为它从技术上来讲居于全世界最現代化的軍队之列。在超然中立的幌子下，它維持了作为一支政治軍队的傳統，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德国在欧洲的处境，部分是由于威廉退位以后，保卫威廉帝国社会的責任落到了它身上。面对着一系列正在經历着社会和政治剧变的国家，德国的边界无險可守，深受威胁，在它战敗以后，这种外圍压力加剧了仍然活跃着地方爱国主义的各邦的离心傾向，从而加重了德国的困难。与此同时，战敗的事实也加剧了德国內部的社会矛盾、旣得利益集团和不馴服的劳工之間的斗爭。軍界幻想有可能恢复威廉帝国——这在他們看来，是恢复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前提条件，因此自动担当起保卫帝国团結和傳統的責任。另一方面，在反对俾斯麦帝国的斗爭中成长起来的劳工，则打算利用德国的战敗形势完成五十年斗爭的宿願，把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的殘余完全扫除干凈。从东方傳来的革命国际主义思想同德国工人根深蒂固的理想和平主义接触以后，二者結合起来变成了反对德国軍队及其野心的主要力量。在此后的內战中，軍队得以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結成了联盟。在一段时期內，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曾失去对群众的影响，因为尽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状况相比，当时德国战敗的經济后果还不算怎样可怕，但实际上也已經殘破得相当可观，足以使一个漸进主义的綱領失去任何吸引力。

持續三年之久的德国內战充满了富有启发性的事件；被击敗的革命者在年輕的共和国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被称为“卡普暴动”的流产軍事政变，軍队和工人之間的一个冲突高潮，显示出

这时由軍队代表的战前阶級的軟弱，它們几乎連仅剩的一点权力都丧失掉而被完全消灭。工会的动搖最好地反应了达成的均势是如何岌岌可危；在1920年总罢工中第一次領会到自己全部力量以后，它們考虑要建立一种工人专政政府，反对軍方及其所代表的保守阶級。

帝国軍队已經由于战敗和凡尔賽和約的限制而被摧毁。重建国防軍是通过改編和約准許拥有的十万人并且补充以志願团和黑色国防軍来进行的。战爭留下了一批失业的下級軍官，他們本来打算在帝国軍队中干一番事业，不願意放棄这种軍事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战后德国做一个仅能糊口的平民。以这群前軍官为核心，志願团吸引了一切阶級的那些满腹辛酸、憤世嫉俗、前途无望和喜欢冒險的青年，而在他們当中，以沒有前途的中产阶級占多数。这种类型的人——他們在德文中被称为"Landsknecht"（雇佣兵），这是个很难翻譯的字——素受俾斯麦遺教的熏陶，极其仇視工人，憎恶信奉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們是复辟德意志帝国的主要障碍。在德国各地耀武揚威、杀人放火、采取种种恐怖手段的志願团，就是那些在希特勒时代成为欧洲之恐怖和德国之耻辱的納粹党卫軍的直接前身。随着內战的結束，志願团逐漸消踪灭迹，而在短暂的稳定时期，恢复老式帝制派运动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敗。不論是志願团或帝制派都沒有能达到他們的共同目标：打夸劳工的組織力量，从而把它从战后德国的政府中排挤出去。君主政体已經死亡，不可能再复生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复兴需要一种新的号召标志。

1917年以后，俄德两国之間有悠久历史的亲密关系更为加强。通过不稳定的边界薄墙滲透进来的俄国影响，不能单用德国共产党的选举胜利来衡量。在他担負着民族布尔什維主义使命来德国

时，卡尔·拉狄克迎合了施拉格特分子、德国軍界和破落中产阶級的民族主义願望，这些人日益願意考虑如何应用成功的布尔什維克强权政治經驗来复活一个强大的帝国。随着德国的国际主义由于俄国民族主义的复活而被粉碎，德国的民族主义又重新旺盛起来，它不仅不再受到任何有力抵抗，而且得到了許多曾經剧烈反对过它的力量的支持。俄国民族主义的复活是一把钥匙，使納粹得以为工业德国打开通向广闊天地的大門，而在此以前，这种广闊的天地只有社会主义者能够看到。国防軍和紅軍之間的关系，换个情况也許只不过是日常的軍事联系，在俄德两国民族主义高漲的这种背景下，却变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在曼努伊里斯基完成德国共产党的改組以后，它便开始在瓦解德国社会的过程中起双重作用。党不再是德国一个阶級的代表，而是一个在領土和人力上都大于德国的外国統治机构的代表。或深或淺地同俄国有联系的无数同路人，通过他們在这一时期滲透进去的許多社会环境广泛散布于全国，这些人越来越成为一个外国的走卒。在这些走卒中，德共的实际党員也許要算是最笨拙和最不济事的了，他們的影响远比不上那些企业界高級人士、高級文官和外交官，特别是軍界人士(他們是德俄結成大陆联盟的最重要鼓吹者)。可是，在这場錯綜复杂的强权政治角逐中，共产党仍然招引了一切民族主义集团的刻骨憎恨，这些集团虽然願意按照自己的条件直接同俄国打交道，却害怕共产党在德国的胜利会把德国并入俄罗斯帝国。因此，这支相当大的第五纵队的存在本身，便刺激了民族主义分子采取进攻态度，推动他們和衷共济，組成統一战綫反对俄国設在德国社会中的这个国中之国。1929年以后——当时，美国的經济蕭条使納粹得到了新的动力——納粹的瘋狂，反映了这种确实存在而并非想像的德国俄罗斯化的危险。

我們也必須强調指出斯大林主义党对国社党組織結构的直接影响。俄共党內爭夺列宁继承人地位的斗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型党組織和党国家，在德国受到了密切注意和批判分析，德国人对这些情况的濃厚兴趣是在其他任何国家所找不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一傾向进行了持續好几年的斗爭，虽然始終沒有能恢复早期的革命国际主义，它的巨大压力——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难以見到的——却使得曼努伊里斯基的操纵公开暴露出来，从而使广大公众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正在出現。左派同俄共政治局內的反对派有直接联系，它的报刊对俄国問題的評論有根据有事实，因此，虽然它的人数始終显得微不足道，它在关于德国应該走什么道路的大辯論中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每一个有資格决定政策的德国要人，都最密切地注視着俄国社会一步步地——有时候几乎是无法觉察的——落入斯大林的独裁掌握之中。斯大林的成功为人羡慕。斯大林那种无情消灭一切反对派的方法，成了每一个初出茅庐的納粹潜心研习的典范，他們在1933年以后，特别是在納粹党日趋沒落的希姆萊恐怖时期，都竭力仿效这位老师。希特勒在1928—1929年再度出面时，德国已經迥然不同于1923年：志願团已經銷声匿迹，新納粹全盘接受了共产党人——以及紅色陣綫战士联盟、明岑堡的各种宣傳陣綫——的方法、作風、歌曲、制服和口号。两党旗帜的相似使西方很感触目——納粹的党旗也是一片紅地，綴着一个小小的黑白卐字；但在这面旗帜后面提出的却是斯大林的口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优秀民族的社会主义，上天注定这个民族要掌握一切权力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国家社会主义。

在俄国，托-季联盟是在充分了解这种新現象的本质的情况下与之进行斗爭的。他們在进行抵抗时面临着一系列巨大困

难——斯大林机器对他們本身及其追随者的迫害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他們最不利的是：曾經使他們得以掌权的革命浪潮已經消退；在一个正在进入以道威斯計划为基础的繁荣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也已經声势不振。列宁曾希望一个革命的德国将在革命俄国的身旁兴起并后来居上，在这种希望已經化为泡影之后，列宁格勒国际主义中心的斗爭及其必然为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所击敗的命运，实在是一种令人伤感的現象。反对派分子已經被党的紀律和斯大林国家机关越来越严的管制束縛得透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們甚至都沒有权利公开地进行一次已經輸定的斗爭。他們忠貞不渝，因而被誣蔑为叛徒。他們进行了一場頑强的斗爭，有时大胆地进攻，有时机智地退却，但最主要的还是表現了一种坚韌不拔的精神，这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无与倫比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是一些遭到历史上規模最大的有組織誹謗的名字——毕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和一般人一样有坚强的地方也有弱点，有时也会感到惶惑、絕望、恐惧乃至惊慌失措。他們不是我們这些坐在安乐椅上进行事后分析的人，因此并不总能着着走对；他們不是馬克思主义眞理和无产阶級力量的化身。由于他們每一个人都和新俄国的締造有密切关系，他們也得为自己所創造的东西分担責任。十年以后，当他們在駭人听聞的莫斯科审判中作为被告出現时，这些人在法庭上通过唯一能够使用的語言——供詞，說出了他們对苏維埃政策的基本批評。但是，不管他們有多少缺点和过失，却永远抹杀不了他們的业績，一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来愈为人欽敬的业績：只是在鎮压了数以万計的十月革命一代人自觉的、明确的和无私的抵抗以后，俄国的独裁者才上了台，他的宝座是以这些人的尸体为基础的。这些人的斗爭在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留下了痕迹，另一代俄国的年青人也許会由于托-季联盟的前車之鉴，而得以摆脱这种矛盾，从重复出現的一系列災难和清洗中得到解脫。

本书对于托-季联盟的形成和失敗的闡述，都以我自己的亲身經驗为根据，同时也参照和补充了另外一些資料，特别是官方党史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不能认为我是卷入斗爭的任何一个集团的成員。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对托洛茨基的立場作了深刻批評——当然，我对这位偉大革命人物永远怀有的崇敬，并不因此而有絲毫减少。但是，对于反对派的状况以及我个人这些年代中的經历，本书并沒有加以詳尽叙述，涉及的只是同主要題旨——国家党在德俄两国的发展——有关系的部分。托-季联盟的斗爭在思想方面是如此丰富，它的許多插曲是如此富有启发性和引人入胜，它所涉及的許多杰出人物是如此具有魅力，以致理当有一部关于它的专著，使它得到更詳尽更丰富的闡述。本书只是在俄国党历史的迷雾中标出一条道路，这个党的历史在未来的年月中将越来越吸引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把托洛茨基，苏維埃国家的締造者之一，拖到郊区的一个車站上，把他送往阿拉木图的时候，同时代的观察家曾說过：反对派的斗爭以这一桩极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告終了，斯大林从此将高枕无忧，統治着他那天下太平的帝国。可是，反抗的根子不是把一个人除去就可以斬得断的：曾几何时，斯大林昨日的盟友——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又成了对他的极权主义专政进行新斗爭的中心。他們的斗爭屬于一个新的时期，1929—1939 年国家党制度在欧洲兴起的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續編中加以研究。

托洛茨基虽然居住在中央亚細亚一个荒僻的角落，在那里，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严格监視，横隔着千万里的俄国荒原，他同国家

的中心和自己的支持者完全不通声息。可是，甚至連这种状况都还威胁着斯大林的独裁政权，因此，他在1929年被放逐到了土耳其。几个月前，布哈林已經被排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实际上，他在其他一切决策机构中的地位也已經丧失；此后，在三十年代中叶以前，他一直躲在党內的一个偏僻角落过着苟延殘喘的生活。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1929年的被免职，标志着工会的最后一点独立也全部消失。在过渡时期，当斯大林正集中全力对付十月革命一代人的反对活动时，农民曾得到一段喘息时机。現在，到1928—1929年，更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便再一次掉轉头来全力对付农民。只要俄国社会的主要部分基本上还处于国家控制之外，斯大林的国家党理想便沒有实現；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是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合乎邏輯的发展結果。俄国的这場“二次”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說，反革命，完全改变了俄国的經济和社会面貌。

列宁曾认为，只有同一个或更多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同德国联合起来，社会主义在俄国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种理論的具体含义是：由于工业将有可能改变俄国农民的古老生活方式，使他首先成为一个富裕农民，然后成为富裕的合作农民，这样，俄国农民就会被推动参加革命。列宁曾在許多場合和許多情况下以許多方式維护他的这种工农联盟信念。他多次不厌其煩地指出，农民有权只是逐步地适应于工业化将給他們带来的新生活，但也有权过这种新的生活。列宁从沒有忘記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典型的俄国人是农民，一个工人政党可以同农民共同执政，但如果要統治农民，便只能依靠极其巨大和不断增长的恐怖。他作为一个农民国家中政治領袖的天才——不同于，譬如說，农民国家匈牙利的貝拉·庫恩或西欧社会主义一般傾向的地方，就表現在他能够使一个馬克思主义政党配合农民革命的主流。1904年，在布尔什維克

党形成的年代中，列宁曾創造出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名詞，其意义是对資产阶級和地主实行专政，在工人和农民中間实行民主。

列宁在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下捍卫着这种思想，从右边攻击他的是孟什維克，从左边攻击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这个理論实质上意味着：工人在沙皇俄国取得胜利以后，只能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經济措施来加强它，才得以保持这种胜利。① 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爭論內容，涉及革命将要引起的变化的每一个方面。孟什維克坚决认为，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沒有成熟到可以实現社会主义，因此，他們的任务应該是領导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列宁完全同意——和后来人們編造的列宁主义相反——他的論敌孟什維克的看法，即希望从推翻封建沙皇統治出发就能在俄国实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痴心妄想。他同孟什維克的基本分歧主要在于判断哪一个阶級，自由資产阶級还是农民，应該是革命的动力。列宁宣称，自由資产阶級的胜利旣不会使农民获得全部自由，也不会把工人推到中樞地位；它将不会根本改变俄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因此，工人政党应該同农民而不是同自由資产阶級結成联盟，并且通过这种联盟来取得胜利。胜利了的工农不会在一个国家中实現社会主义；俄国社会将被彻底革命化和民主化，它的封建殘余将被扫除干淨。俄国技术設备低劣这一不利的客观条件，将迫使胜利的无产阶級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时不得不自我克制。列宁說，假如我們在 1905 年曾以为我們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我們就会蒙受巨大的政治損失。

---

① 参看托洛茨基：《1905 年的俄国革命》，特别是題为“我們的意見分歧”的那一章，第 222—231 頁。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論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的拥护者之間，一直进行了一二十年的煩瑣論战。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实現，已經使这場爭論的历史形式变得毫无意义，但却使它的內容具有了新的重要性。

布尔什維克在 1917 年人数虽少却得以夺得政权，并不是因为他們策划了一次万无一失的政变，而是因为他們利用了农民革命浪潮的浩大声势——在內地，农民革命早就执行了几个月后才被布尔什維克接受过来的革命口号。領导着这支农民大軍，布尔什維克便能够在初期克服人数很多的城市集团的反抗；到后来，当外国干涉和白卫分子的重新集聚使苏俄縮小到只有莫斯科大公国那样的面积以后，也是依靠农民，布尔什維克才粉碎了一切反革命企图，并把入侵者赶出国界。列宁鼓吹农民夺取土地，并且同許多反对这样做的西欧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展开辯論，这两个人抽象地证明，大面积耕作的生产力高于小块土地經营。这种农业学上的理由也許是正确的，将来有一天也許会变得很有关系，但是在俄国，要采取这种抽象地讲来更为可取的綱領，其方法却只能是保存封建所有制或者由国家强迫成立国营集体农庄。

在实行工人管理和地方分权的流产試驗逐漸消失以后，农民对大庄园的沒收便成了十月革命留下的唯一德政。这样做本身并不能解决俄国的农业問题；已被削弱的解体的工业不能满足农业要求的局面继續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在过渡时期，不論是在工业或农业領域，斯大林的政策都是搖摆不定的；他既沒有全部接受他表面上贊同的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布哈林綱領，也沒有全部排斥他表面上不贊同的使工业更高度集中化的反对派綱領。在这一段时期，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一項中心任务上了，这就是：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国家党，并且使它同国家的每一个行政部門都联系起来。通过更加紧地运用他的恐怖机器，斯大林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却同国內一切有生机的力量都断絕了关系；虽然他疏远了工人，他并沒有因此把农民吸引到身边。

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以后，斯大林反而比他1922年开始爭夺权力的时候更要孤单。他先后摔开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这时，他在政治局中却遭到布哈林、托姆茨基和李可夫的反对，他們几乎取得了反对他的多数。党不能再吸引任何阶級支持它，于是变成了一种征集强迫劳动大軍的恐怖机器。在內战时期的紧張环境中曾悄悄露过头的思想和方法，这时全部复活了，并且在已經改变的环境下被发展到卑鄙可耻的程度。这种在俄国的广大国土上把数以百万計的人赶出家园流放異乡，这种以原始的方法完成規模巨大的工程，只有亚洲专制君主的丰功偉績才可以相比。俄国农民失去了他通过十月革命获得的一切——他的土地、个人尊严、参政权和行动自由；他又一次被束縛到土地上，只是过去的地主沒有了，代替他們的是集体农庄的国家經理，或者是强迫劳动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监工。

在內战时期，俄国农村中的恐怖就像战爭本身一样殘酷、野蛮和可怕。首先是农民本身对他們的压迫者地主及其走卒自发地采取了行动，然后，各党各派的游击队——白卫軍和紅軍、无政府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等等——把这种行动继續了下去。由工人和貧农組成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恐怖，是新兴阶級反对旧专制阶級的恐怖。另一方面，斯大林的新恐怖則是一个独裁的国家政权对付一切阶級的恐怖，包括对付統治党党內的反对派。內战在农村中进行得非常激烈；无数房屋被燒毀，无数农民被杀害。每一支赶走了敌人的軍队，在占領或收复一座村庄以后，都要吊死几个敌方的領导人，把能够找到的粮食全部拿走。不过，农民的主体仍然存在着；千百万农民并沒有全被赶出家乡，越过几千俄里的苔原流落天涯。正如斯大林經常爱做的那样，他接受了过去的革命經驗，而把它們应用于現在的不同环境；他对农民发动的战爭称为反对富

农的斗爭。他的集体化政策給极权主义語言增加了一个新詞——“消灭富农运动”。

1928年2月15日，也就是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三星期后，《眞理报》发表了一篇显然是斯大林写的未署名文章，指出新經济政策的措施不能使軍队和城市得到足够的粮食。通过一系列迅速采取的步驟，这种警告便化为全面的农业集体化綱領。規定“进一步利用罪犯劳动力”的第一道法令，于3月26日頒布。①

在这一时期拟訂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其主要新特点幷不是策划整个工业，甚至也不是对所有国营工厂作扩大安排，而是这种土地的强迫集体化。从1929到1934年，有好几百万农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迫离开他們祖祖輩輩居住的乡村，迁徙到俄国遙远的角落去。这种懲罰措施——在談到它时，我們必須考虑到俄国的落后交通設施、俄国气候的严寒和酷暑——是1918年以来标志着当代特点的大規模强迫移民的第一次，是正当納粹踏上欧洲历史舞台的时候实行的。在强迫劳动营——第一个五年計划一个重要的和不可分的部分——中，被赶出家乡的农民遇到了被流放的工人。当俄国的饥饉在1932—1933年严重到頂点的时候，大多数农民都已經集体化——不是在强迫劳动营中，就是在集体农庄上。在集体农庄上，农民完全同革命前一样，有一小块远不足以养家活口的自留地，而他的大部分劳动时間則被迫用在耕种主人的土地上。恐怖已經从阶級斗爭中的武器变成了一种新型經济的动力。

只有对照这种强迫集体化的背景，才能了解苏联少数民族的

① 参看大卫·达林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苏俄的强迫劳动》，紐黒文1947年版，第206頁。达林継續說：“其目的在于‘通过广泛利用在社会保护措施下被判处徒刑的个人的劳动力……极其节約地实現一系列經济計划’。同年7月，司法人民委員下令对所有身体健全的犯人实行强迫劳动。”

地位，在这里，十月革命的原来倾向又被轉向了它的反面。列宁革命政策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就是支持民族独立，在維护这一点上，他甚至发展到了承认少数民族有权退出沙俄大混合体。斯大林在1923年以恐怖手段鎮压反抗的格魯吉亚人，是促使列宁同他决裂的重要原因。烏克兰民族主义强烈地反映在烏克兰共产党內，把这种情緒鎮压下去的人之一，就是那个在德国干了同样工作的曼努伊里斯基。随着消灭富农运动的展开，解决“民族問題”就容易多了，因为那些渴望摆脱大俄罗斯統治的少数民族，都可以被扣上富农和反革命的帽子。强迫集体化剝夺了他們保持民族独立的最重要条件——在同国人当中始終作为一个集团存在的权利；今天，由于俄国少数民族已經被打散过二三十次，本来可以用二三十种語言伴随着二三十种民族舞蹈歌頌斯大林的权利，也就减少到比用一个手势还要簡单。

在消灭富农时期的这种开头，必然有其合乎邏輯的发展，于是，数以百万計的人被大規模强迫移民便成了苏俄生活中一个經常的和重要的特点，成了它那另一部无形宪法的中心条款。根据1941年8月28日最高苏維埃的命令，取消了日耳曼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六十万人口有三分之二被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尔梅克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二十万居民，从伏尔加河下游和頓河之間的原来領土上被全部赶走。哈拉查伊自治区的二十八万公民中，有一半以上被强迫迁徙。人口在七十万以上的切切諾-印古什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北高加索被整个搬走。这三个民族是在1943年战时迁徙的；胜利以后，在1945年，由于一百万韃靼人被强迫迁走，克里米亚的大片地区成了无人区。从远处被运到这些騰空了的地区来安家的人表現得也不可靠，于是，强迫移民继續进行；正如1923—1924年期間的格

魯吉亚一样，土地不得不“重新开垦”。

对内政策的这种特点成了对外政策最有效的輔助手段之一。在1939年的德俄条約把波兰瓜分以后，几乎有一百万波兰人被內务人民委員会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另外一百万人則被盖世太保抓去，在波兰和德国从事强迫劳动。在俄国的这部分人大約有十分之一已被釋放，关于苏联經济这一方面的情況，这些人为我們提供了最詳尽和最有文献根据的报导。① 大規模强迫移民是东普魯士、波罗的海沿岸諸国和巴尔干諸国俄国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德国也应用了同样的强迫移民方法，数百万德国人从苏台德区和东方被赶回德国。有几十万人在路上死去。

在以恐怖手段消灭党內反对派的过渡时期，控制社会的新科学开始产生；一旦在那里得到发展，这种制度便愈来愈严密，規模愈来愈大，直到把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和一亿七千万人口都置于它的統治之下。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斗爭好像是一个小規模实驗場，在这里，各种新型的杵槌和鉗子經受着試驗。虽然反对派被粉碎和消灭了，反抗仍在继續，并且日益发展；在軍队中，在政府里，在党內，在城市和乡村，每一陣恐怖的浪潮都引起了反抗的回响。只有一种情况改变了：不再有人打算以不合法的方

① 关于被强迫迁徙到俄国去的波兰人的命运，有一本具有永久价值的匿名著作《明月的黑暗面》，該书由埃利奧特作序，紐約1947年版。波兰人的故事使德国集中营的全貌大白于世，关于这些集中营的詳細情况，直到战后才被人們知道。在好儿百部論述德国集中营的书中，有两部最引人入胜的著作，这就是貝奈迪克特·考茨基（卡尔·考茨基的儿子）的《魔鬼和被詛咒的人》（苏黎世1946年版）和奧伊根·柯根的《党卫軍王国：德国集中营制度》（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46年版）。柯根的研究尤其令人感到兴趣，因为他分析了集中营作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希特勒經济部門的作用。除去波兰人和德国人的著作以外，法国人深刻的心理学研究为它們作了补充，在这方面，特别以大卫·罗塞的两本书最为有名，它們是《集中营世界》和《我們死去的那天》，巴黎1946年版。把关于德国集中营的大量著作和达林分析俄国强迫劳动营的这类作品比較一下，就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在組織方式上的相似。

式进行斗爭；从此以后，反抗只是以一个道地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所能容許的形式和方法进行的。这样，从党的中心发出的恐怖便在全国及其各种机关中繞行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党內。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計划（1933—1937）的同时，党內的反斯大林集团一个一个地都被无情消灭——从1934年的基洛夫被暗杀到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哈林审判。在这些审判中，被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牽連的，不仅有布哈林及其同伴，而且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果达和紅軍元帅米哈伊尔·屠哈切夫斯基。在这些审判中，不是实行思想控制而是防患于未然的原則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迄今为止，只有小說家和記者对这些“审判”作了探討；如果对它們进行透徹的分析，我們就会看到，在恐怖主义的紀律背后，在党的上层集团中始終是离心离德的，始終存在着派系的对立。①

① 对担任国家秘密警察領导职位达十六年之久的雅果达的控告，是各次审判中最具有关鍵意义的一点。如果竟能控告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人，說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策划和执行了毒死許多高級官員的阴謀，那么，斯大林的法庭的确可以說是拜占庭迫害異己法庭的再現。在这种新型的世界中，風傳着各式各样的謠言；在这种气氛中，說斯大林毒死了列宁的一个特殊謠言（参看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7—379頁）在一定程度上流傳了开来。这些謠言是危險的，必須把它們安到某一个人、某一个除斯大林以外的人的身上去，从而使它們不再作祟。这个对象必須是布哈林，斯大林消灭富农計划的主要反对者。这些同恐怖制度作斗爭的人暗中获得的人望，必須被連根摧毀；必須证明：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一样，布哈林从1917年以来也就是工人国家的敌人，早在1918年，他同列宁的合作就已經只是表面上的了；必須证明：現在被控告图謀暗杀斯大林的这批人，在他們开始从事卑怯的叛逆活动时，也曾策划过暗杀列宁。为此，在1938年的做样子审判中，又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旧事重提，而这一插曲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为它既集中表現了斯大林主义社会的恐怖制度，又集中表現了加强这种恐怖的方法。

在这一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壮观中，有一批前左派共产主义者（雅各弗列娃、奧新斯基、曼采夫）和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加列林）粉墨登場，举出了許多細节证实被告的罪行。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帮手，維辛斯基仍沒有能迫使布哈林承认他曾打算暗杀列宁。在整个审訊中，布哈林始終坚持这样一点：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期間反对列宁政策的活动，不能被說成是阴謀和恐怖主义，而必須被理解为更换綱領的斗爭。当时，布哈林在党和政府中都拥有多数，他試图以合法方式使自己的政策得到实行，

消灭富农运动和清党給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只是在

---

*維辛斯基〔对布哈林說〕：在这段时期，你进行过反对苏維埃政权的非法活动没有？

布哈林：在这个問題上，必須分清楚不同的时期。如果指的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签訂以前的时期，从这个字的严格意义上讲来，当时是談不到什么'非法'問題的，理由很簡单，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場斗爭，有一种进行这种論爭的公开机关报，談話都是公开的。……

維辛斯基：你是否公开談过要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維尔德洛夫？

布哈林：談到过逮捕，但不是肉体消灭。这不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签訂以前，而是在和約签訂以后。在和約签訂以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宗旨，是要通过合法手段在党内获得多数。

維辛斯基：什么合法手段？

布哈林：开会討論、投票表决等等。

維辛斯基：这种希望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

布哈林：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签訂以后。我要澄清这一問題，以便反駁雅各弗列娃的证詞。她談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締結以前的时期，这显然是胡說八道，因为那时我們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央委員会里居于多数，我們希望在党內贏得多数，因此，談到当时进行密謀活动是胡說八道……

維辛斯基：你当时在情感上是不是怨恨到了极点？

布哈林：这不是对某些人和某些領袖的私人仇恨問題。

維辛斯基：我的問題是，当时的气氛是不是够激烈的？

布哈林：不錯，从派别斗爭这方面說来，是非常激烈的。

維辛斯基：气氛非常紧張嗎？

布哈林：是的，非常紧張。

維辛斯基：在这样一种气氛里，逮捕，在某种情况下，也許还有暗杀的念头，不是不可能想到的吧？

布哈林：談到逮捕，我承认；至于暗杀，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回事。

維辛斯基：可是气氛——

布哈林：气氛是气氛。

維辛斯基：在某些人激动的头脑里，这种气氛不是很容易激起这类念头和計划嗎？

布哈林：也許它們眞在某个人的头脑里起了这种作用，但是我个人并没有看到这种征象。

維辛斯基：没有人在这方面鼓动过你嗎？

布哈林：没有，没有人。

維辛斯基：没有人提出必須把列宁、斯大林和斯維尔德洛夫除掉嗎？

布哈林：没有，总檢查长公民，没有人。"

——录自《反苏維埃'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法庭审訊記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447、508頁。

今天，在德国和日本被战败以后，我們才有可能估价这种社会控制方法对欧亚两洲潜在极权主义力量的刺激。

列宁的全盘战略以德国革命为基础，而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则以担心德国会发生革命为基础。在1929—1933年納粹逐漸得势的时候，他在德国进行的操纵有一个出发点，即决心不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益增长的国家社会主义危險，以免干扰他在欧洲的更大雄图。德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发展得相当壮大，这不仅表現在以前那种間接影响上，而且表現在党員人数和选民的支持上。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它实行了——不顾人們的責罵——同納粹取得默契而恶毒攻击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一政策是通过斯大林亲自說明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新定理来执行的。工会，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說，在这一时期最不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德国社会阶层，它們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爭——被說成比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更坏，被认为是最危險的敌人，是第一个攻击目标。正当納粹党的兴起已經使旧日的仇恨变为陈迹、正当共同斗爭的迫切需要已經开始使人們捐棄前嫌的时候，散布这种斯大林主义理論的群众宣傳机器却煽風点火，重新挑起德国內战时期的宿怨。在經济蕭条时期，工人对魏瑪共和国普遍威到的失望情緒已經轉变成强烈的怨恨，工会也正处在轉变的初期，处在抛棄艾伯特和諾斯克傳統的过程之中。当納粹的威胁在它的眼前日益增长的时候，1930年的德国工会主义者比从前进步多了，他們非常願意摆脫过去的消极傳統，采取任何切合实际的新政策，但是，共产党人这时的行动却使他們陷于瘫痪。此外，由于軍界和保守力量都圍繞着反动派的极端——納粹团結起来，这也促使一切自由主义的和共和派的集团走上了另一个极端。1930年的德国分成了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納粹軍事陣营，由于內部的日益团

結而变得肆无忌憚、胆大包天；另一方面是反納粹陣营，这个陣营中的人看到納粹正在为一場新的战爭作准备，預見到納粹可能获胜，德国人民可能在新战爭中被毁灭，可是，尽管如此，他們却无法达成他們自己也知道是必不可少的团結。反納粹陣营內部又有分裂，它被斯大林用一把大斧——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大斧——拦腰斬断了，結果，反納粹陣营中的共产党那一半，便被变成了希特勒心照不宣的盟友。

1933年，第二个充分发展的国家党制度在欧洲的主要地区之一获得胜利。隐藏在希特勒的与斯大林的反法西斯主义相对抗的反布尔什維主义这种意識形态的幕布之下，为1917年以来破坏了欧洲原来面貌的强权政治冲突所推动，这两个极权主义社会在它們主要的組織特点上越来越相互接近。在消灭德国劳工力量的斗爭中发展起来的希特勒恐怖的特点，受到了斯大林恐怖的推动和加强；希特勒在1934年7月30日对納粹党內的勒姆左派集团实行的圣巴托罗繆之夜①式的大屠杀，也标志着俄国大清洗的开始。另一方面，斯大林俄国实行的数百万人强迫移民，在希特勒德国被奉为楷模，它在大战时期輸入了大約一千二百万奴隶。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仍然是不稳定的，因此，它力图从东西方两面都得到好处，竭力挑撥东西方相斗以便自己坐收漁利。那些施拉格特分子——他們曾經同情地諦听过拉狄克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宣傳，曾經梦想过欧亚联合成为一个反西方巨人——現在都加入了納粹党，在党內，他們仍然认为同苏俄的合作总会有一天实現。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則始終希望俄国可能通过同德国的联盟而摆脱自己的孤立。有一段时間，至少是在外表上，这样一种政策好

① 在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繆节，法国胡格諾教徒慘遭大屠杀。——譯者

像很少有希望实現。1935 年，俄国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开始了十年反法西斯运动；1936年，在德国主持下締結了反共产国际公約。但是，这两个步驟都不是明确的；它們都部分是政策的直接反映，部分是間接的威胁和建議。据克里維茨基說，他在这一时期曾奉斯大林的特殊命令，竭力想保持他在德国的联系，但是未能如願。在 1936—1938 年的莫斯科大审判中，在这面鏡子的歪曲反映之下，我們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两国仍在合作，但是規模縮小了。在拉狄克、罗森果尔茨，特别是克列斯廷斯基的证詞中，揭发了一部分情况；这种特意安排的证詞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警告德国：两国之間仍然保持着的政治联系也可能破裂。但是希特勒是不热情的；正如尼德尔迈埃向一个朋友所說的，“最高者”并不认为德俄結成联盟是当务之急。不过，破裂的只是两国軍队之間的关系；秘密的政治联系始終也沒有完全断絕，并且在 1938 年慕尼黑事件以后又重新加强。就在英法駐莫斯科大使館的鼻子底下，納粹为 1939 年 8 月的条約奠定了基础，这个条約标志着一場新战爭的开始，而对那些把共产国际反法西斯吶喊全都信以为眞的人来說，則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德国軍队始終也沒有能恢复它在威廉时代的沉着自信，在魏瑪共和国时期，它的一部分——正規部队——被减少到只有十万人，更大部分变成了非法存在的黑师，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深感震惊。但是，尽管处境如此不利，通过保存它的上层，德国軍队仍然維持了它的存在。在內战时期，它曾利用过自己的私生子——志願团，可是在秩序恢复以后，到过渡时期，它便把这些臭名昭彰的雇佣軍头目再一次藏匿起来。志願团里的这些亡命之徒，后来大都变成了冲鋒队員；从一开始起，納粹党便得到軍队的支持，起初这种支持是不太关心的，到后来便越来越注

意。可是，也是从一开始起，軍队中就存在着反对这种培育革命分子政策的强烈趋势，随着納粹的日益发展，他們也日益看到了这个平民阶級混血儿同他們的危险竞爭。上层将帅之間的这种分歧，引起了軍队反对第三帝国的一系列武装叛变，这种活动从1933年开始，經过一个又一个流产的計划，最終在1944年7月20日发展到高潮。几乎直到最后，总参謀部的两个派别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幻想，以为权力基本上是由軍队掌握着的，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把那些納粹烏合之众一脚踢开。

德国将軍們习惯于掌握数量龐大的人群；在1914年，他們已經指揮着一千一百万士兵。希特勒在1935年3月16日頒布的恢复义务軍訓的法令，一下子便使軍队控制下的人数从凡尔賽条約限定的区区十万人增长到六十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总参謀部周圍的密謀者曾企图动一次小手术——把希特勒除掉。可是，希特勒凭借他那爭夺权力的惊人本能，总是在适当的时机插进手来，通过貶黜某些心怀異志的将軍和提拔另一些将軍，使他們的阴謀遭到粉碎。①

斯大林收到了关于德国总参謀部中这种分歧的情报，毫无疑問，他从德俄战爭一爆发就以最大的兴趣注視着这方面的情况。为了未来的利益，过去的民族布尔什維主义口号又被搬了出来，以便为拉过一部分德国軍队来（如果有可能的話）作好准备。1941年10月8日，在那个“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如記录上称呼他的那样——瓦尔特·烏布利希的主持下，在莫斯科举行了东綫德

① 参看汉斯·貝恩德·吉澤維烏斯：《苦战到底》，苏黎世1946年版；并作一卷的英文节譯本于1947年問世，出版者是波士頓的霍夫頓·米富林公司；并参看法比安·馮·施拉布倫道夫：《反对希特勒的軍官》，苏黎世1946年版；烏里希·馮·哈塞尔：《馮·哈塞尔的日記，1938—1944年》，紐約1947年版；福尔克·貝納多特伯爵：《戏唱完了：第三帝国的末日》，紐約1945年版。

国战俘的第一次会議。①这样开头以后，接着便在整个东綫展开了巨大的宣傳运动，以斯大林自己的方式重复了1918年对德国士兵的呼吁。安在战地的扩音器把民族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灌輸进許多有接受能力的人的耳中——在这些人当中，有年輕的軍官，也有年长的軍官，前者仍然抱着他們借助德俄联盟就能統治全世界的希望，后者則更为清醒，打算通过这样一种政策的改变使德国摆脫希特勒。

1943年7月，当德国第六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击潰以后，在莫斯科成立了自由德国委員会，以共产党人埃里希·魏納特任主席，以俾斯麦的一个直系后裔馮·艾因济德尔伯爵任副主席。1943年10月11日，該委員会又成立了一个分支組織“德国軍官联盟”，其領导人是第六軍情报处长汉斯·京特·馮·霍芬上校。②当德軍在东綫投降的时候，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将領加入了这一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比任何人都参加得迟而且更为惴惴不安的陆軍元帅弗里德里希·馮·包路斯，作为一个富有号召力的人物被推到最前面；瓦尔特·馮·宰德利茨将軍成为他們这群人的領袖。他們得到特殊优待，有充分的便利条件在战俘中进行宣傳：有一笔用于軍事和宣傳活动、設立广播站、办一种周刊《自由德国》等等方面的經費。

自由德国委員会在1945年8月正式宣告解散，但在俄国境內直到今天仍然秘密存在着德国軍队。这支軍队曾一度駐在东德和波兰，执行肃清殘敌的任务。希特勒倒台后，不論是包路斯或宰德利茨——以及埃德蒙·霍夫迈斯特这类德国将軍——都沒有返回

---

① 参看《在苏德国战俘列兵和軍士第一次会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1年版。

② 《德国人，你們何去何从？》自由德国全国委員会与德国軍官联盟成立大会記录，由保尔·梅尔克尔和阿尔諾德·維特·馮·果尔塞瑙作序，墨西哥城1944年版。

德国，也沒有在俄国作为战犯受审。包路斯在紐倫堡出現过很短一段时間，但很快又回到他的莫斯科总部去了。

以这个自由德国委員会为中心，展开了一个大規模运动，力图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德国难民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吸收进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組織。在西半球，它的总部設在墨西哥城，在那里，大約有八十个德国斯大林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1]它在美国以及几乎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設有支部；在欧洲，主要的支部設在英国、法国和瑞典。自由德国委員会在希特勒德国产生的影响，也比迄今已經被揭示出来的更为深刻。莫斯科无法同战綫后面的軍队集团建立联系，但是由一群最知名的封建世家的后裔領导的一个德国軍官組織，却在計划暗杀希特勒，改变德国的政策，从此倒向东方。

这些得到宰德利茨委員会鼓舞的胸怀大志的軍官，同那些反对希特勒而又动摇不定的亲西方文武官員之間的显著不同，在吉澤維烏斯的回忆录中鮮明地表現出来。作为一个反納粹的保守分子，吉澤維烏斯参加了战前和战时一个接一个的反希特勒計划，所有这些計划都經过长期的周密准备，但总是以流产的政变告終。密謀者圍繞着来比錫市长卡尔·格尔德勒博士，他通过斯德哥尔摩和瑞士同英美諜报部門有联系。三个貴族——舒倫堡、施陶芬貝格和赫尔多夫——参加了这个集团，他們立即以一种新的敏銳的行动主义打断了无休止的討論。这三位国家社会主义派伯爵都贊成同苏俄紧密合作；舒倫堡曾担任德国駐莫斯科大使。

在1944年7月20日发动政变前的最后几天，这一小群密謀者激烈地爭論着一个重大問題——究竟倒向哪一边，东方还是西

---

① 参看《我們反对希特勒的斗爭》，墨西哥自由德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議事录，墨西哥城1943年版。

方？在柏林的一个地窖中，分别以格尔德勒和施陶芬貝格为首的两派人討論着——这种討論經常为空襲警报所打断——摆脱希特勒德国的两条可能出路。“倒向东方”意味着希特勒将被杀死，俄国战綫上的德軍将放松压力，听任紅軍长驅直入地开进柏林。針对这种政策，吉澤維烏斯和格尔德勒提出“西方路綫”。

“我再一次提出〔吉澤維烏斯写道〕我們已在瑞士多次討論过的‘亲西方’解决办法。我所提出的这条路綫意味着：我們将放棄暗杀希特勒以及在柏林搞暴动的計划，而代之以在西方采取单边行动。假如克路格和罗梅尔已經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就让他們拒絕服从希特勒，并且向艾森豪威尔建議单独休战。这实际上意味着西部战綫将被突破，英美軍队将在抵抗很少或根本遇不到抵抗的情况下，越过齐格飞防綫涌入德国。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們也会赶在俄国人前头到达柏林。”①

这項計划遭到上校克劳斯·申克·馮·施陶芬貝格伯爵的反对；他所代表的青年軍官們不需要一个由資产阶級和反动过时人物領导的文官政府。他們所需要的是

“让能够打破貪污腐敗風气的軍人来拯救德国，他們将建立一个井井有条的軍政府，鼓舞人民作一次最后的巨大努力。簡单归結为一句口号，他要求德国保持尙武精神幷变成社会主义的……

施陶芬貝格要求由‘眞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实行軍事独裁。現在，納粹的領导已經失敗，希特勒已經暴露出是一个笨拙的战略家，在这种情况下，必須由軍人出来独当难局，挽狂瀾于旣倒。施

---

① 吉澤維烏斯：《苦战到底》（霍夫頓·米富林出版公司1947年版；弗雷茨与瓦斯穆特出版社，A—G，1947年版权），第526頁。本书此处和下面的摘录业經美国出版公司同意。

陶芬貝格要求保留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极权主义、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施陶芬貝格一直在和我捉迷藏。几星期以前，他还在指望挑撥东西方相爭而我們坐收漁利；現在，他却又在幻想德国軍队和紅軍联合起来，胜利地踏平实行財閥专政的国家。最近的軍事慘敗是否加速了这种重新倒向东方的激进傾向的发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問題。①〔不仅如此，有一点也是很难否认的。为什么俄国人要成立宰德利茨委員会呢？为什么西方列强不給我們以任何希望呢？〕"②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差一点被炸死。陆軍元帅欧文·馮·維茨累本和路德維希·貝克将軍試图組織一次反对希特勒的軍队暴动；暴动失敗后，貝克自杀，維茨累本以及三个将軍和四个參謀部軍官被納粹法庭判处死刑，并当众絞死。

德国軍界在希特勒統治下掌握的权力并不算小，假如总參謀部曾利用这种权力，完全可以让德国眞正的反納粹力量得到机会，領导德国摆脫由于希特勒統治而陷入的絕境。一批以施陶芬貝格为代表的軍官表現了普魯士容克阶級的最优秀傳統——个人的勇敢和为了祖国而牺牲自己，但是沒有任何效果。总參謀部分裂成納粹和反納粹两派，反納粹派又分裂成亲西方和亲东方集団，再加上个人之間的矛盾使这些政治分歧更为复杂和加深，这样，它便不能把德国从一敗塗地和被瓜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斯大林的无数組織一直在工作着，把世界各地的德国难民都收罗到共产党和同路人团体中去，这些組織早就作好了接收政权

① 吉澤維烏斯：《苦战到底》，第503、504、516頁。

② 方括号中的这几句話在美国版中被删去了，这里是根据德文原本第2卷，第319頁譯出的。

的准备。① 主要的接收大队来自莫斯科，其領导人是威廉·皮克，他那个穿着俄国少校軍服的儿子阿尔图伴随着他。同烏布利希一道，他組織了同唯一的重要竞爭者社会民主党的剧烈斗爭；一年以后，斯大林的代理人終于分裂了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亲俄派幷进統一社会党，这个党把它的两个极权主义先驅者——共产党和納粹的特点結合了起来。

① "元首"在柏林的廢墟中自杀后才几个星期，一个剛从莫斯科来的德国共产党詩人約翰內斯·貝希尔就又向德国人民抬出了一个新元首：

"在重新建立起的工厂中，
每当机器再一次开始轰鳴，
它們总是唱起那人人懂得的贊歌
——感謝你啊，斯大林！

"每当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走，
再一次播种，永不受欺凌，
他常会停步佇立，凝望远方，
开始感恩地祝禱：斯大林……

"每当清晨人們又开始去工作，
在走出自己的房間以前，
总要仔細地看一看你的像片，
这样早啊，你就浮現在他的心田。

"如果再一次見到了和平的王国，
我們会为它感激你神圣的辛勤。
大地以万紫千紅的鮮花向你志謝，
人类感謝你——你使自由再次新生。"

（見德文版《国际文学》，文学出版社，莫斯科，第15卷，1945年6—7月。这一官方期刊的战后第一期，就以上面这首詩作为发刊詞。）

人名对照表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畫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

十七画